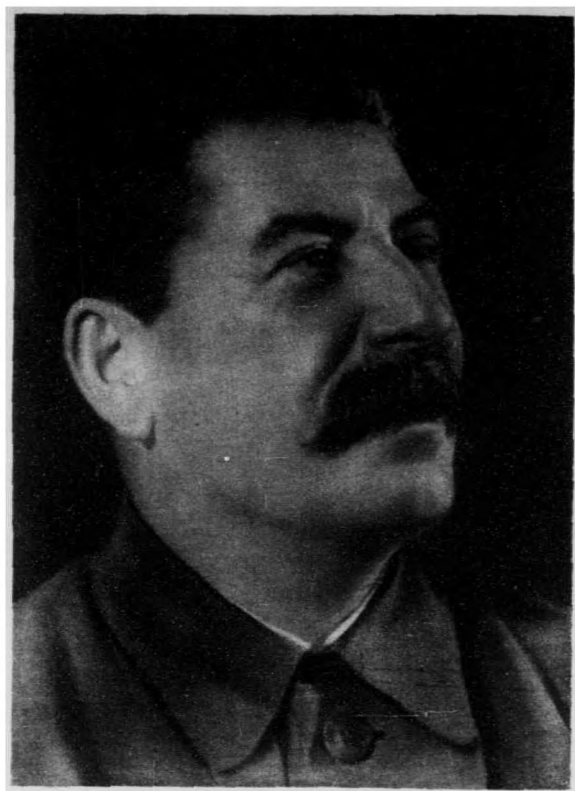


著 林 大 斯

題 問 義 主 寧 列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А. Гамма

119.142  
554-2=6

# 著 林 大 斯

## 題 問 義 主 寧 列



3 1238 0200 5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一 年 〇 四 九 一

A 231170





# 本書內容目次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底聲明：……………一  
 出版局底聲明：……………一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一—八七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三  
 (二) 方法……………九  
 (三) 理論……………一五  
 (四) 無產階級專政……………二九  
 (五) 農民問題……………四〇  
 (六) 民族問題……………五〇  
 (七) 戰略與策略……………五九  
 (八) 黨……………七三  
 (九) 工作作風……………八五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到十月革命之路一書底序言)……………八八—一二〇  
 (一) 十月革命底內外環境……………八八  
 (二) 論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九一

(三)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波爾什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 一〇五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 一一六

關於列寧主義問題 ..... 一二一

-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 一二一
- (二) 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 一二三
-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 一二六
-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 一二八
-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 一三七
-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 一六〇
-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 ..... 一七三

論黨關於農民問題的三個基本口號

(答楊—斯基同志) ..... 一八五—一九六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答S·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 一九七—二〇六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 二〇七—二一四

在糧食戰線上

(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專門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們談話處一部分) ..... 二一五—二二五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答S同志) ..... 二二六—二三六

論聯共(波)內的右傾危險

(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 二三七—二四七

論聯共(波)內的右傾

(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波)中央全會上的演說底一部分) ..... 二四八—三〇二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 二四八

(二)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 二五四

(三) 在國內政策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 二六〇

(一) 關於階級鬥爭——二六〇。(二) 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二六五。(三) 關於農民——二六八。(四)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二七一。(五) 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二七五。(六)

布哈林之爲理論家——二八三。(七) 是五年計劃呢，抑是兩年計劃呢——二九二。(八) 關於播種面積——

二九四。(九) 關於糧食採辦工作——二九六。

(四) 關於反對右傾的鬥爭 ..... 三〇〇

偉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 三〇三—三一五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 三〇四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 三〇五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 三〇八

結束語 ..... 三一五

關於蘇聯土地政策問題

(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 三一六—三三七

(一) 「平衡」論 ..... 三一七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自流」論 ..... 三二〇

(三) 小農經濟「穩固性」論 ..... 三二一

(四) 城市與鄉村 ..... 三二六

(五) 論集體農莊本質 ..... 三二九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 三三三

(七) 結論 ..... 三三六

關於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問題 ..... 三三八—三四一

勝利衝昏頭腦 ..... 三四二—三四八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 三四九—三六九

給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的答覆 ..... 三七一—三七九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 三七一—三七九

(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 三七一—三七九

新環境和新經濟建設任務 ..... 三八〇—四〇〇

(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 三八〇—四〇〇

(一) 勞動方 ..... 三八一

(二) 工人工資 ..... 三八三

(三) 勞動組織 ..... 三八六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 三八九

(五) 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的轉向的徵象 ..... 三九二

(六) 論經濟核算制 ..... 三九五

(七) 按新方法來工作，按新方法來領導 ..... 三九七

關於波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 四〇一—四一三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

(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波)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 四一四—四三三

(一) 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 ..... 四一四

(二)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和實現這任務的道路 ..... 四二二

(三) 在工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 四二七

(四)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 四三五

(五) 在工農物質狀況改善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 四四〇

(六) 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 四四四

(七) 在和敵對階級餘孽鬥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 四四八

(八) 一般結論 ..... 四五—

論農村中的工作

(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聯共(波)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 四五四—四六六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 四六七—四八一

(一) 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 四六七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爲生活豐裕者 ..... 四七七

(三) 幾點個別意見 ..... 四七七

向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 四八二—四五五

(一) 世界資本主義處延續危機和蘇聯底外部狀況…………… 四八二

(一) 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底動象——四八三。(二) 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狀況之尖銳化——四八九。(三)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四九五。

(二) 蘇聯國民經濟之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四九九

(一) 工業之高漲——五〇二。(二) 農業之高漲——五〇八。(三) 勞動者物質狀況和文化水平之高漲——五二一。(四) 商品流轉之高漲與運輸業——五二七。

(三) 黨…………… 五三一

(一) 思想政治的領導問題——五三三。(二) 組織的領導問題——五四四。

幾句代替結論的話…………… 五五五

在克列姆里宮裏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五五六—五六一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五六二—五六六

(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 五六二

(二)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 五六六

(三) 新人材和新技術定額…………… 五七〇

(四) 最近的任務…………… 五七三

(五) 兩句話…………… 五七五

論蘇聯憲法草案

(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五七七—六〇六

(一) 憲法委員會之成立及其任務…………… 五七七

(二)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生活中發生的變更…………… 五七八

(三) 憲法草案基本特點	五八五
(四) 資產階級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	五九〇
(五) 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五九六
(六) 蘇聯新憲法底意義	六〇五
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一九三八年九月)	六〇七—六三七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六三八—六九五
-------------	---------

- (一) 蘇聯底國際形勢
- (二)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新經濟危機。為銷售場、為原料來源、為重新重分世界而鬥爭之尖銳化——六三九。
- (三) 國際政治形勢之尖銳化，戰後和約體系之崩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之開始——六四四。
- (四)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六四九。

- (二) 蘇聯底內部狀況
- (一) 工業與農業之更加高漲——六五二。
- (二) 人民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之更加高漲——六六六。
- (三) 蘇維埃制度之更加堅固——六七一。

- (三) 聯共(波)之更加堅固
- (一) 改善黨成份的辦法。把組織單位分小。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六七五。
- (二) 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六七七。
- (三) 黨的宣傳工作。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教育黨員和黨幹部——六八〇。
- (四) 幾個理論問題——六八三。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底聲明

本版列寧主義問題中文譯本，是按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於一九三九年所印俄文最新版（第十一版）譯出的。

爲求譯文更符合俄文原本起見，我們在準備排印這個譯本時已按俄文原本來把舊有中文譯本仔細校訂過了。

在本書內所有一切引證下面註明的頁數號碼，概指各該著作底俄文版頁數號碼而言。



## 出版局底聲明

本版——第十一版——列寧主義問題與其第十版不同處，就是在本版內已加進下列具有比較迫切意義的新的著作：

- (1) 在克列姆里宮裏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 (2)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 (3) 論蘇聯憲法草案（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4) 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同志爲聯共（波）歷史簡要讀本所寫的著作，一九三八年九月）；

(5)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爲保存本書原來篇幅起見，在本版列寧主義問題內沒有編入那會登載於第十版內的下列著作：與第一屆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在聯共（波）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與英國作家格、德、威爾思的談話。

這些變更是經作者同意後實行的。

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

# 列寧主義問題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謹將此書獻給

那些在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時入黨的同志們。

約、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一個大題目。爲要詳盡無遺地說明這個題目，就必須著作一整本書。甚至於必須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詳盡無遺的說明。這些講演，至多也只能是列寧主義基礎底簡要大綱。雖然如此，但是我認爲敘述這個大綱，以指出幾個爲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需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底世界觀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者按範圍說來，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敘述列寧在其著作中所放置於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的，因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關連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

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將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義是有一部分真理的，可是它遠遠沒有說盡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很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它是在整個國際發展過程中有其根源的，而並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為這個定義是苦於片面性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之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而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似乎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劃分為革命部分與溫和部分的愚蠢而又庸俗的意見撇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於連這個完全不充分和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曾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的革命內容。然而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內活動的，當時還沒有已臻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是在準備無產者們去作革命的

時期內活動的，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的事情。而列寧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門生呢，則是在已臻發展的帝國主義時期內活動的，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展開的時期內活動的，此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已經打破資產階級民主制，已經開闢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蘇維埃紀元。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向前的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所具有的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間長成和強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鬥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為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鬥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對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曾不能不是列寧主義最重要任務之一。

##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此時，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極點；此時，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此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到盡頭而轉變爲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

達到頂點，接着就是革命開始起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者，要算是下列三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乃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底巨大勢力。與這巨大勢力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方法——職工會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鬥爭——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非人生活而每况愈下；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

——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鬥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的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已得贓物的老的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鬥爭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着不可避免的原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底陣地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更加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上必然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數萬萬殖民地和依賴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數萬萬居民施行最橫蠻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剝削和這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之出現，本地智識界之開始產生，民族自覺之喚醒，解放運動之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發生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就中乃是在於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為一團，並投入天秤底一端，結果就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為不可避免的實踐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可是，這個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有什麼關係呢？這個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為俄國而工作的列寧，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故鄉呢？

因為，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為，俄國當時懷妊革命的程度，曾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大，所以祇有俄國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乃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底巨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乃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放任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

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它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犧牲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律塞爾得到借款而替它們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勾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底重要角色呢？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以至於結合爲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鬥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能甘心喪失像舊時的沙皇的資產階級的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入力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誰會想打擊沙皇制度，誰就會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會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會應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會真正想打破而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麼當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他就會應也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會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就會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接近起來，而且會應轉變爲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國又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會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會應向前進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俄國會應成爲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爲這些矛盾在俄國



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是因為俄國會是西方帝國主義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繫起來；而且是因為當時只是在俄國才有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在俄國的革命會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它會不能不在其最初發展時就具有國際的性質，它於是就會不能不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本身。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在自己的工作，會受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麼？當然不能！正是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無論是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會推動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擴展到國際舞台上，揭露帝國主義底癱疽，證明資本主義破產之必不可免，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便利世界各國無產者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會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會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的復辟。

就是因為這些緣故，所以俄國就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就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懷妊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線，是注射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和具有比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曾移到德國。

毫無疑義的，正是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就成爲以下一件事實底概然原因，就是恰巧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的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它曾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和具有比在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實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曾經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不是偶然的，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列寧在其所著做什麼？一書內，就已經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約·斯大林註」）提出了最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其他那一國無產階級底一切最近的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打破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而且也是打破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曾應當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已經綽綽有餘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實了。

既然這樣，那末曾作過這樣的革命和具有這樣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故鄉，——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由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教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考茨基以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的。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的遷就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所謂「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會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當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會給與「黨心醉目」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胖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羣衆底生動的革命鬥爭脫離關係的、變成陳腐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記起馬克思底理論，可是，爲的是要閹割這理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見小利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

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爲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束諸高閣。不是使黨根據本身的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可是，爲的是要用某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巨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和無能爲力了。

會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會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整個武庫，拋棄那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當時，如果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去與資本主義交戰。當時，如果沒有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遇到武裝不足，而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阿福基馬廐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列寧主義底方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底革命鬥爭火燄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燄中，去審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這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被破壞的理論和實踐間的一致，要消滅這兩者間的分離狀態，因爲祇有這樣，才能造成那以革命理論爲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而是根據第二國際黨底實際行爲，根據它們的行動，去審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爲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羣衆

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羣衆和準備羣衆去作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受訓練和受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

這個方法會如何實際應用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們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自己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它就不能夠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如果已造成這樣一個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在這個環境之下，無產階級雖在人口中佔少數，然而它有可能來把極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週圍，——那末，為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線，並加速總結局之到來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就會「很好」麼？難道大家和每個人不是都知道，當時在德國的無產者是比一九一七年在俄國的——舉例來說——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

擊和打破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 and 行政幹部，它就不能保持政權，——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給無產階級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就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他們且援引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危險的（據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所批評過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什麼關係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羣衆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曾企圖用國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國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前夜動員並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

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麼，——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什麼關係呢？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過：「革命理論不是教條」，「革命理論只是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中，才最終形成起來」（見幼雅病），因為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為「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夜」），因為理論應當被實踐材料所考驗。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回憶「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底歷史，就足以瞭解這些黨底政治實踐是何等虛偽和腐敗，它們以堂皇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蔽它們的反革命勾當。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舉行的堂皇示威，當時，第二國際會威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開始戰爭，那就要遇到慘象百出的起義；並且曾提出「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待開始時，巴塞爾決議却已束諸高閣，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即為資本主義祖國光榮而互相殘殺的口號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行，那豈不是顯然一文不值麼？祇要把列寧那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就能懂得機會主義底政客是何等卑鄙，而列寧主義底方法是何等偉大。我不能不在這裏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在這一段內，他無情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底機會主義企圖，這企圖就是想不按黨底實際行動而按黨底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黨。

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市僧的庸人的政策，妄想……提出口號就能改變事情。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為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會總是和現在還是提出隨便那一

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做比較，不要以唯心的或騙人的空話為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還不說第二國際黨懼怕自我批評的態度，我還不說它們的手腕——掩蔽自己的錯誤，抹煞迫切困難的問題，用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來遮掩自己的缺點，這種話頭是消磨着生動的思想，阻礙黨根據自己本身的錯誤去領受革命教育，而它們這些手腕是曾被列寧所譏笑和釘上羞恥柱的。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這本書上關於無產階級黨底自我批評問題寫道：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這個黨是否鄭重和它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那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鄭重黨底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有些人說：揭露自己本身的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危險的，因為這會被敵人利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黨。列寧認為：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還在一九〇四年時，當我們黨還幼稚而不甚大時，列寧就在他所著進一步這本書上說道：

「他們（指馬克思主義者底敵人而言。——約·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章句。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久歷戰鬥，飽受風霜，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却能夠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之發展而被克服的」（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列寧方法底原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在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在實質上是批評的革命的學說」。而列寧底方法，就正是徹頭徹尾都被這種批評的革命的精神所貫注的。可是，如果以為列寧底方法僅僅是馬克思底方法之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在事實上，列寧底方法不僅只是馬克思底批評的革命的方法之恢復，不僅只是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方法之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之具體化和往前發展。

### (三) 理論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問題來講：（一）理論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二）對自發「論」的批評，（三）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化為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據說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這點的。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會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表示「不關心」。同樣，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喜愛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應當指出：這種非常奇怪的對於列寧及列寧主義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與列寧主義全部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於事的巨大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如果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它就會變成無對象

的理論，同樣，實踐如果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它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最偉大的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夠給運動以信心，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能力，給運動以對於四周事變內部關係的瞭解；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夠幫助實踐不僅瞭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而且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應如何行進和向那裏行進。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瞭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的黨，因為我們黨擔負有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作用，而又處於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他預察我們黨所擔負着的這種特殊作用時，他就已經認為必須指出：

「祇有被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底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列寧這個原理是具有特別力量和特別意義的。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期最重要的科學貢獻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而担任實現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列寧，——這件事實可算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應當隨同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在其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

\* 著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傑作裏面，爲自己的時代實現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是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的，而普列漢諾夫本人却甚至於不敢認真着手執行這個任務。

(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在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黨——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它反對使工人運動向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方向進行，——它主張工人運動完全祇向着資本主義「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方面進行；它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系統。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它反對使黨在工人階級前面前進；反對由黨把羣衆提高到覺悟性水平，反對由黨領導運動，——它主張要運動中的覺悟成份不致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它主張黨祇聽從自發運動，跟着這運動做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成份在運動中的作用底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系統，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這個理論在實際上曾經使它自己的信徒，即所謂「經濟主義者」，否認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黨之必要，出來反對工人階級爲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和根本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所進行的鬥爭和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批評，不僅打破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進行這個鬥爭，那末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創造獨立的工人黨，就莫要想由這個黨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黨裏都是最廣泛流行

的，雖然形式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就是第二國際首領們重複得令人作嘔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們；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為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這些事實指出來並加以解釋，而指出以後，它就安心不管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限於說明世界，它還應當改造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底黨曾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那它們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待開始時，這些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諸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為帝國主義祖國而戰爭」。人們說，因為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致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可是，如果以為這裏有什麼人應負其咎，某人叛變了或叛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為國際是「和平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第二，因為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水平」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生產力」「應負其咎」。考茨基老爺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而誰不相信這個「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平」這樣的決定因素，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飾機會主義真面目為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祇是同一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個理論作過鬥爭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個理論上的假冒，乃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黨的預備條件。

(三)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乃是財政資本底主要業務；

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乃是帝國主義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巨大勢力，乃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就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底粗暴寄生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新迪加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更加增長，把羣衆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唯一救星（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資本之加緊向殖民地 and 依賴國輸出；「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之擴展，一直囊括全球；資本主義之變爲由極少數「先進」國對於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全世界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另一方面，將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剝削並壓迫着廣大殖民地 and 依賴國的那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而另一個則是迫得要進行鬥爭以求解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 and 依賴國（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國外的，即殖民地戰線上的反帝國主義義憤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份額」的國家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復那已經破壞的「平衡」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就使得第三條戰線——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因而削弱帝國主義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之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統一的世界的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把上述這一切結論綜合爲一個總結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這革命底性質、範圍、深度問題的觀察法本身，以及這革命底一般方案，也隨着改變。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個觀察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爲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獨自在的單位，已經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爲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爲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那極少數「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壓迫的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裏，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統一整體整個系統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爲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對於革命的程度，那末在這系統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就不能成爲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單個的孤獨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的資本戰線爲敵方。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爲各單個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的民族。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線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各個矛盾發展底結果，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個國家裏被衝破呢？

從前，人們通常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不是的，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鍊條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鍊條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開始了革命的國家，衝破了資本戰線的國家，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鍊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鍊條就在這裏被衝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會展開以革命無產階級為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為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為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會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鍊條在俄國却原來比較薄弱些。

在最近將來，這鍊條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它最弱的地方。譬如說，這鍊條也許會在

印度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年輕的奮勇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具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顯然偉大的顯然嚴重的同盟者。因爲，在印度與革命對立的，是這樣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是沒有絲毫威信，而理應爲印度被壓迫被剝削羣衆所共恨的。

這鍊條很有可能會在德國被衝破。爲什麼呢？因爲例如那些在印度發生作用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與德國兩國在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經由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的平衡「成熟」，而是經由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由帝國主義大戰中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革命運動，已最終被捲入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鍊條之被衝破，照例總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時，已失去那被第二國際方面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瘟疫的書獃子們所喜歡賦與的特殊意義。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硬說（而且現在還硬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條不可越渡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着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已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 and 準備反資本主義的「決鬥」。這個距離時期，通常是以好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



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它祇是，而且不能不祇是資產階級反革命慾望底掩蓋物和粉飾品。顯然用不着證明：在懷妊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環境內，當「繁盛的」資本主義已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語），而革命運動正在全世界各國裏發展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反動勢力，以至於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因而使一切革命勢力，由西方的無產階級運動到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就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餘孽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已經多少發展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這個原理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無怪乎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夜，在其所著兩個策略這本書裏，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鍊條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貫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份子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說列寧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比在兩個策略中說得更明顯的，這個思想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基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思想，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機關手裏轉到資產階級手裏，而不是轉

到無產階級手裏。據說這種斷語甚至流傳到我們的共產主義報章上來了。我應當指出：這種斷語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上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即民主革命勝利，當作不是「秩序」組織，而是「戰爭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論臨時政府的幾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幾篇論文裏，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曾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謀得現時執政當局底細微讓步，而是要完全推翻這執政當局」；在這幾篇文章裏，他發展了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在歐洲發生的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寫道：

「假如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候將延燒到歐洲；那在資產階級反動高壓下備受折磨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底革命高潮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會不惜犧牲地爲奪取政權、爲成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收『非無產者民衆』參加那使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沙皇制度和擺脫地主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局面，這不是爲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聯合歐洲無產者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見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著名言論，在這段言論內，他曾援引兩個策略中那一段已由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發展規模的話，而得出以下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的。除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座勉強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鄙陋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看來是已經夠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進行鬥爭反對「不斷（不停頓）革命」思想呢？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力，澈底利用農民底革命精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主張者們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底革命精力，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就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害了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爲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於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主張者們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作就是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餘孽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肯願及像俄國農民這樣的嚴重力量；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的政策祇能阻止把農民爭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主張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爲列寧自己

就是站在不停頓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這個最大的後備力量——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這個思想並不是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由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那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停頓革命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底樣子，而改變了它的樣子以後，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於實用了。會需要列寧用自己老練手臂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不停頓革命思想底真相，而使之成爲自己的革命論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其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列舉他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會如何說到不停頓革命問題：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只要盡可能多實行上述要求就最迅速地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要使革命成爲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直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直到無產者底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都已經發展到使這各國無產者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時候，直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者手裏的時候」。

換句話說：

（1）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革命事業，這和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底計劃相反；

（2）馬克思祇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各派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燄燃遍於世界各國，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

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而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革命過程中所已實行的一切，完全相合。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底意義，而且改變了（破壞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底樣子，使它不適於實用。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曾嘲笑我們的「不斷論者」底理論，稱之為「奇怪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與這個漂亮理論背道而馳」（列寧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就是說，是在「不斷論者」底理論在俄國出現以後已經十年的時候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認爲這個理論是半孟什維主義的，說這理論「從波爾什維克方面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什維克方面拿去的，就是「否認」農民作用」（見同卷所載列寧論文——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

列寧底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們底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的跳躍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經直接證明這一點。不過在這裏必須記着：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順利推翻資產階級；而沒有這些條件，就簡直莫要想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這本書裏怎樣說到這些條件吧：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定律，就在於：爲要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羣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要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出來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要革命，第一，就必須要多數工人（或無論如何也必須要多數覺悟的、有思想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性命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受政府的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羣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並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已獲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然而這是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的、最終的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夠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要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已獲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已獲勝利的國家底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孤獨自在的東西，而應把自己看作是加速無產階級在其他國家內勝利的助力，工具。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列寧用兩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已獲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在於「最高限度地實行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所有各國內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其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以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夠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以後，由於許

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那已把它推翻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爲不可被戰勝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怎樣辦呢？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是必須實現下面三個主要任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一天」就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1) 打破那些已被革命所推翻所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和任何企圖；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肅清，消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就是爲着實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復辟企圖。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已被推翻的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以增長百倍的仇恨心奔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堂」，爲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被這般「平常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平常」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跟着。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是有其根據來實行復辟企圖的，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那已把它推翻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破——而這當然是普通的情形，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罕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已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所有國際聯繫底力量和結實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在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間內不免保存着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而一下子消滅金錢是不行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動產，還有聯繫，組織慣技和管理慣技，還有對於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技術高等的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還有比較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慣技（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底力量，就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每日、每時、自發、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而這種人是不可驅逐的，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協和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而且只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者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見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九九頁〕。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要反對較強大的敵人，爲要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的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正因其被人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見同上，第一七三頁和第一九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就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是要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轉瞬即逝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條例與訓令，而是要把它看做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包含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教育並鍛鍊自己成爲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些保證着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者階層。

馬克思曾向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要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是爲要改變你們自己並使你們自己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們」（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而寫道：

「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

統」，同樣，也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為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本身的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不是用奇術，不是依聖母旨意，不是依口號、決議、法令底旨意，就能擺脫這些成見的，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羣衆鬥爭中，才能夠擺脫這些成見」（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頁和第二四七頁）。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上所述，已經可以明白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平常的，以保留而不侵犯舊經濟政治制度爲條件的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孟什維克與機會主義者，是懼怕專政如洪水猛獸的，他們因爲懼怕得太厲害，就把所謂「爭取政權」概念來代替專政概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爲更換「內閣」，歸結爲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上台執政。顯然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由真正無產階級爭取真正政權，毫無相同地方的。麥克唐納爾輩和謝德曼輩之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難疽底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羣衆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之表現；可是，雖然如此，這種政府始終不免仍舊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爾政府或謝德曼政府之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是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新的地方政權機關，是在舊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廢址上面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

級強力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力為倚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與其他任何階級專政都沒有任何區別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迄今以前所有一切階級國家是剝削者少數對被剝削者多數施行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施行的專政。

簡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力為倚據，並得到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底同情和擁護（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裏就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給一切人的，既給富人而又給貧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給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關於普遍平等、「純粹」民主、「十足」民主等等的廢話，乃是以資產階級立場來掩飾下面這一件無疑的事實：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平等的。「純粹」民主論，乃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馴育飼養的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求掩飾資本主義底癱疽，粉飾帝國主義並賦與它以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羣衆。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是沒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倉庫等等——為享用「自由」權所必要的東西，乃是剝削者獨享的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羣衆是沒有真正參加，而且沒有可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甚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並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理德輩和司丁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尼斯輩、洛克費爾輩和摩爾根輩所指定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為目標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人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少數為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祇能是由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軍隊，打破資產階級官吏機關，打破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工人階級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國家機器而運用它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上這樣說。無產階級革命應當「……不是如迄今以前那樣把官僚軍閥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打破這架機器……」這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馬克思曾於一八七一年，在他寫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這樣說。

馬克思這一句以大陸為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為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曾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為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有可能。的確，馬克思曾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他會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已臻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已臻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可是，經過三四十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而無例外；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在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失，——於是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的見解，也就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的、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破、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裏造成『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作為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裏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如果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時，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們，由於『不利的』國際環境的關係，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作嚴重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運用什麼組織才

可以完成這個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長成的無產階級舊式組織，對於這個工作是不夠用的，——關於這點是不容懷疑的。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一種新式組織能夠實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掘墓人底作用，不僅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僅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個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底力量，——與舊式組織比較起來，——是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爲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而無例外。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羣衆組織，只有這樣的組織才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先鋒隊方面，即無產階級方面對於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最容易和最完全實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羣衆武裝起義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打破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巨大勢力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的組織，即最民主的，因而也就是羣衆底最有信心的組織，這組織能盡量便利羣衆去參加新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毀壞舊制度而奮鬥中，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而奮鬥中的革命精力、首倡精神和制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各地方蘇維埃之統一並形成爲一個總的國家組織，爲無產階級——即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即統治階級——國家組織，就是說，統一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那些從前受資本家地主所壓迫者階級底最羣衆的和最革命的組織，現

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羣衆，這些羣衆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則被用幾千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羣衆則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三頁）。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國家組織，它在原則上與舊形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和國會制的國家組織不同；它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出現，於是「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回，——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徵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羣衆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爲，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鬥爭中結合與合作的場所，它在自己的工作中心雖然以這個結合與合作爲倚據，所以它就是由居民多數來統治少數的政權，就是這多數底國家，就是這多數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爲，它既然是打破一切民族壓迫而以各族勞動羣衆底合作爲倚據，所以它就使這些羣衆易於在統一的國家的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是使被壓迫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即蘇維埃中最有團結和最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羣衆。

\*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導我們：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夠統一並領導勞動者被剝削者居民中散漫的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個經驗底指示易於實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既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並以生產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它於是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導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夠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長官的服從，把軍隊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夠真正一下子就打破並最終地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吏的和法官的機關」（見同上）。

就是在於：只有蘇維埃的國家形式，因其吸引勞動者被剝削者底羣衆組織來經常地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才能準備使國家組織消亡，而國家組織底消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要素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這樣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得的政治形式，在這形式底範圍中，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會是這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就是這形式底發展和完成。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 (五) 農民問題

從這個問題目中，我拿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關於農民作用、關於農民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乃是一個從生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絲毫不使農民問題喪失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毫無疑義地具有的嚴重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開始於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大家也都知道：在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和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關於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底黨之所以漠視農民問題，甚至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在西方有特殊發展條件。這

首先是因爲這些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作他們的文禮家風底表現，「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表現。而在事實上，這裏是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的，因爲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另一方面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毫無疑義地是表明着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爲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潛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否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者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他們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會是這樣，而且現在還是這樣，——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承認多數農民是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爲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些革命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已完全證實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就得出一個實際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羣衆爲反對奴役和剝削而進行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和貧困而進行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是說要援助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鬥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夠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底解放運動，能夠這樣或那樣協助無產階級革命，能夠促進把農民變爲工人階級底後備力量和同盟者。

(二)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包含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時止。這一時期底特徵，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影響，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農民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波爾什維克黨方面來。這一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

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波爾什維克（無產階級）彼此爲爭取農民而鬥爭的歷史。杜馬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爲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是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底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爲戰爭年份已經完全指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這完全是畫餅充飢，自作幻想。如果沒有杜馬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領導），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結果就引導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當時在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在那裏，農民擺脫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尙少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使資產階級底政治比重大大加強了。

反之，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直接相反的結果。在俄國，革命底結果，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力量增加，而是使它喪失基本的後備力量，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到首位，它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革命無產階級周圍。

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比較短促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無產階級領導權，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爲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特殊現象呢？這個特殊現象是從何而來呢？

這是因爲資產階級革命在俄國，是在比西方更發達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開展的，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變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喪失任何革命性底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列幾個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比方，大家知道，在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工作者，曾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在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工作者，却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有像波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革命黨的條件下，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全國政治生活裏的最偉大的力量。

（2）企業裏醜惡不堪的剝削形式，再加上沙皇禁衛軍殘酷不堪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就使工人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徹底革命的力量。

（3）俄國資產階級底政治的萎靡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變成效勞沙皇政府的醜態和直接的反革命性，這不僅是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入沙皇制度懷抱，而且是因爲俄國資產階級是直接依賴於政府定貨的。

（4）當時在農村中存在着最醜惡的最不堪的農奴制度餘孽，更加上地主專權，——這個情況，就把農民拋入革命懷抱。

(5)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深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個情況，就把工農鬥爭匯合爲統一的革命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一切矛盾匯合成爲深刻的革命的危機，並使革命具有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應向那裏走呢？農民應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專權，反對沙皇專橫，反對那毀滅性的破壞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麼？然而它是敵人，——前後四屆杜馬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麼？「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合適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可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想祇倚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軟弱無力，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新力量，這個新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列去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奴役，擺脫沒有土地的情況，擺脫壓迫，擺脫戰爭呢？一般說來，當時在俄國，是否有這樣的力量呢？是的，有這樣的力量。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它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就已經表明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本領，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是無從取得的。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接近「社會革命」黨人以後，終於覺悟到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當時決定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三)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二月革命（一九一七年）起到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止。這個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可是，從羣衆底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可以大胆

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整整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向於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的革命力量，唯一能夠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力量。這個時期底歷史，乃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波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彼此間為爭取農民，為爭得農民多數而鬥爭的歷史。決定這鬥爭底命運的，是聯盟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為繼續戰爭而鬥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

如果在以前，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時，在二月革命以後時期中，當沙皇已被推翻，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已將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時，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為革命底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已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轉移到基本問題——戰爭問題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陷於疲困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為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政權，因為，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拖延戰爭，要把戰爭拖延到「勝利的結局」。當時，除非推翻資產階級，在實際上已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出路。

這已經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革命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後一派，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極左派，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力謀民主和平的黨，即波爾什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都贊助了工人為爭得和平，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對於農民，並沒有別的出路。而且曾不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就是給與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教訓，因為它已明白指明：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約言，而在事實上他們所施行的，也是那同一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夠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之繼續拖延，祇是更加證實這個教訓是正確的，催促革命並推動千百萬農民羣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孤立，已成爲一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盟政府時期底實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這就是便利了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的情況。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在以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却是以推翻資產階級爲方法來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麼在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爲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有的工業；爲此目的而利用那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以便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可是，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且來看看其中主要



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曾經過三次革命底教訓，曾協同無產階級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領得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曾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領得土地，並因此而變成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自由，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力量。

恩格斯曾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爲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過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造成爲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一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經濟合作底建立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用一切可能方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協作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而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儘多時間，讓他們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之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爲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則社會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都

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來，爲着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由社會公款中擔負一些物質犧牲，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將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在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這難道不很明白麼？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現時就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着，——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個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農業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因爲，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之國有化這兩個原因，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在俄國，農業應按別一條道路發展，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列寧在其論合作制的論文中，已正確指出：在我們俄國，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就是說，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是在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各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等）為標準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麻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麻農民生產協作社。這個麻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類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的巨大的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家庭生產系統。我在這裏說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底家庭生產系統，是與紡織業生產——舉例來說——方面的資本主義底家庭生產系統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底家庭生產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農業其他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將很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那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這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這無產階級具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必要的一切，以便經過合作社，而且祇是經過合作社，——我們以前曾鄙視合作社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社，——這難道不是為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成，然而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人民組織底新原則」和新「社會制度」，他繼續說：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必須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曾花費多少萬萬盧布的代價，這是用不着提起的。現時，我們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須把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看作真正的幫助，就是說，如果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週轉，那還是不夠的，——須要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那有真正民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週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作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以便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以便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上去。

## （六）民族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已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

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彼此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彼此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都限制在一些主要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這些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注意其命運的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幾千萬幾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洞的，不痛不癢的，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底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已經揭破這個豈有此理的差別，已打破那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橫在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橫在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並因此而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關於使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原則通常都被人曲解，往往被人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某些首領，甚至於竟把民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民族自決思想，會遇到從反對吞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吞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已經擴大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為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吞併政策辯護了。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羣衆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毫無疑義地曾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樣的工具，——而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切

沙文主義鬼蜮技倆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給羣衆以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被壓迫民族問題通常都被人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冠冕堂皇地宣佈「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底黨所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靠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鬥爭，則「民族平等」的宣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關於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爲關於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爲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獨立國家生存而鬥爭的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曾被人以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被人看作是一個單獨的獨立的問題，看作是與關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曾經默然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可以無須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而就能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道，可以無須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而就能於無形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已經證實：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則須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一部分，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用完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否還有希望，是否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些可能性呢，是否可以將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

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為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為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為被壓迫國民族解放運動是含有革命能力，認為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已完全證實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被壓迫的和依賴的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這樣一種民族運動，這種民族運動是要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要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之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為什麼呢？因為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當時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為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為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乃是歐洲革命運動底最危險敵人。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並不是一個絕對物，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的（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之下，部分也許和一般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部分」（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

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具體地，以革命運動利益為觀點來估量個別民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底毫無疑義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有無產階級份子參加這運動為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政綱為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基礎為前提。阿富汗國王為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戰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個鬥爭是削弱、瓦解和掘毀帝國主義；

然而例如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這些「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大戰時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個鬥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是帶有資產階級稱號的，雖然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為保持埃及底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政府底關員是由無產階級出身，是帶有無產階級稱號的，雖然他們是「贊成」社會主義。我還不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令這一步驟是違反形式民主要求的，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非常嚴重的打擊，就是說，毫無疑義地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是要以形式民主為標準，而是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為標準，就是說，「不是要單獨看待，而是要以世界範圍為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 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就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這些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各殖民地和依賴國組成這絕大多數居民的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人民；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來源；

(3) 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人民底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共同戰線，來反對共同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不鞏固共同革命戰線，則發展國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被壓迫民族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桎梏以謀得解放；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和不堅決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以反對「祖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線，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8) 這個援助，就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的國家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而這統一的世界經濟

就是社會主義勝利底物質基礎；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個趨向就是趨向於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這個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基礎上產生的；另一個趨向就是趨向於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這個趨向是由於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之形成而產生的。

列寧說：

「發展着的資本主義，知道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是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而第二個趨向，則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乃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除非剝削殖民地，除非以強力將殖民地束縛在「統一的整體」範圍內，就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只有靠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吞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為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各民族自願聯合之建立，只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經過使殖民地變為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進行堅持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以反對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等）裏「社

會主義者」底大國的沙文主義，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爲擺脫壓迫、爲謀得國家分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以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裏勞動羣衆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會應該首先就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如果沒有這樣作，那就會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會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會不能創造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這個組織就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組織就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底具體榜樣。

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家裏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以及孤獨思想，這些社會黨人不願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瞭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裏無產階級底獨立的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裏無產階級間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而不進行這樣的鬥爭，則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和被壓迫民族裏勞動羣衆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主義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方面的工作所說的話吧：

「這個教育……在強大的壓迫的民族裏與弱小的被壓迫的民族裏，在吞併的民族裏和被吞併的民族裏，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不可能。要達到使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極密切接近、更加融合的共同目的，就顯然要走彼此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左邊和右邊走向這張紙底中心點一樣。如果強大的、壓迫的、吞併的民族中的社會黨人只是一般鼓吹民族融合，而同時却忘記——那怕就是一分鐘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用吞併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等，——那麼這樣的社會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信條主義者，而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裏，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必須在於由他們來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裏無論那個社會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務必鄙視他，視之為帝國主義者，視之為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黨人却應當以我們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第二個字為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可以既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XYZ等等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為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無論如何，他應當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閉關主義、孤獨思想，而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分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會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黨人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黨人堅持「聯合自由」，這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要達到這個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 (七) 戰略與策略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階級與戰略，(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戰略領導，(五)策略領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多少和平發展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把國會活動作為階級鬥爭主要形式的時期。關於偉大階級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搏戰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在當時都似乎不是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合法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適應着當時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仍然站在，並且似乎應當仍然站在在野黨地位，——去利用國會活動。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瞭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之下，既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籌劃週到的策略。當時，祇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可是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該死的罪惡，並不在於它曾實施連用國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是在於它誇大這些鬥爭形式底意義，它差不多把這些鬥爭形式看作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搏戰時期，當國會外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爲首要的迫切問題時，第二國際底黨就退避了新的任務，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時，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爲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表明自己時，祇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週到的策略。

馬克思和恩格斯那些曾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的關

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遂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然而列寧並未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爲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爲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系統。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等著作，毫無疑義地都是放置於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武庫中的最貴重的貢獻。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乃是領導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 革命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一定階段基礎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製定相當的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佈置計劃，在革命一定階段整個過程中爲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而自十月革命以後，則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戰略也與此適應而改變過。**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餘孽。革命底基本力量，乃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乃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乃是使自由保皇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在俄國推翻帝國主義並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乃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乃是貧農。鄰國無產階級，乃是意料中的後備力量。拖延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乃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乃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孤立，這個民主派想抓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

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份子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同上）。

**第三個階段。** 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運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時代已經開始。革命底基本力量，乃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力量，乃是各發展國內的半無產者和小農羣衆，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乃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底黨孤立，這些黨乃是與帝國主義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乃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各殖民地及依賴國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有關於革命底基本力量及其後備力量的。它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而變更，而在每個一定階段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 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 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來潮或退潮，革命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為實現這個路線而鬥爭，其方法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以及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如果戰略底目標，是要取得——譬如說——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戰爭底勝利，澈底完成反沙皇制度鬥爭或反資產階級鬥爭；那末，策略底目標，就沒有這樣重大，因為策略所努力做到的，不是要取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搏戰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一定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乃是戰略底一部分，是服從於戰略的，是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是依着來潮退潮而變更的。在革命第一個階段時期（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略計劃始終沒有變更，而策略却在這個時期內再三變更過。在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黨底策

略是進攻的，因為當時是有革命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此適應的鬥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政治罷工、抵制杜馬、武裝起義、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這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形式。當時，組織形式也因鬥爭形式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比較公開的工人黨，——這就是這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內，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策略，因為當時是有革命運動底低落，革命退潮，所以策略也就不能不顧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形式以及組織形式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公開的杜馬外的革命活動而是杜馬內的活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者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會應祕密起來，而羣衆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要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會變更幾十次，而戰略計劃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有關於無產階級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是有關於這些形式底更代和配合的。策略在革命每個一定階段基礎上可以依革命來潮或退潮、高漲或低落為轉移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領導。革命底後備力量有兩種：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地和依賴國內的革命運動，(4) 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與獲得物，而無產階級為收買強有力的敵人並取得休戰時間起見，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之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獲得物的；

間接的：(1) 本國各個非無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



弱敵人並加強自己後備力量的，（2）那些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大戰），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被迫退却而機變動作時所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力量，用不着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和每個人所明白的。至於第二種後備力量，因其意義並不時常都很明白，所以必須說明：有時，它們對於革命底進程，實有頭等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和第一次革命後，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保皇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所發生衝突底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上，毫無疑義地是起了自己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的事實所有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因為在當時，帝國主義者因忙於自己相互間的戰爭，曾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而有能來直接實行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必不可免的事情的時候，這種後備力量對於無產階級，一定會有日益重大意義的。

戰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力量來達到革命在其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後備力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的主要條件，要算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時，當進攻以全力進行時，當武裝起義已急待發動時，當調動後備力量去緊緊跟上先鋒隊已成爲決定成功的條件時，——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處。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可算是表明這樣運用後備力量的實例。毫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敵人最易受傷處就是戰爭。毫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

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舉行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在後方經過蘇維埃和在前線上經過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力量，使其緊緊跟上先鋒隊。革命底結局表明了：後備力量會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會用自己的語句來敘述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而說明這個在戰略上運用革命力量的條件，請看列寧這說話吧：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兒戲，而在開始武裝起義時，就要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因為否則那擁有更好準備和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轉為進攻。」「防守就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那就可說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第二。計算到危機已達到頂點，計算到先鋒隊已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力量已具有贊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的情緒已極端混亂時，計算到這幾點而選定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武裝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

「決戰條件可算是完全成熟了」，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勢力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已爭鬥到充分程度，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使自己充分疲竭」，如果「一切猶疑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中間的份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

自己，已因其實際破產而充分丟臉」，如果「在無產階級中，羣衆那贊助進行最堅決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情緒，已經開始並且雄偉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條件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上述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十月武裝起義之舉行，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弄出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掉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因而就會造成失敗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武裝起義，這要算是這樣「失掉速度」的例子，要算是不會選擇武裝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感覺着動搖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力量還沒有被拉來緊緊跟上先鋒隊。

第三。一往直前地實行已經採取的方針，不顧那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種種阻難和障礙，這個條件之所以必要，是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莫大的錯誤，即海員們所熟識的所謂「失掉方針」。我們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犯的錯誤行爲，——黨曾通過關於參加預備國會的決議，——要算是這樣「失掉方針」的例子。當時，黨似乎竟忘記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想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去的企圖，黨如果參加這種機關，那就會紊亂全部計劃，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迷失道路。這個錯誤是因波爾什維克退出預備國會而被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時，當退却必不可免時，當受敵人挑撥而去迎戰是顯然於己不利時，當在那時力量對比下祇有實行退却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保存其後備力量時，——那時，必須隨機應變地運用後備力量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列寧說：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經學習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已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來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正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標，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然後轉而實行進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曾給黨以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給自己保留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

列寧當時說道：

「我們既締結單獨和約，於是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難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我們既然這樣利用，我們就取得相當的手足自由的時間，以便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這就是保證有正確戰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領導。策略領導乃是戰略領導底一部分，它是服從戰略領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精通無產階級底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保證這些形式底正確運用，以便得到在一定勢力對比下最高限度的為準備戰略成功所必要的結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的主要條件，要算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因為最適合於當時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和保證把羣衆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羣衆引到革命戰線上，把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並不在於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之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之不可免。問題是在於要使羣衆，千百萬羣衆瞭解這種不可避免性並表示出贊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就在於要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之不可免，並提出這樣一些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這些方法和形式可以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察知革命口號底正確性。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工作，並根據這工作去發展鬥爭，以便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察知杜馬之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約言之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之不可能，農民與工人階級聯盟之必不可免，——如果在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其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杜馬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人就不會被揭破，而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吾回主義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在這個策略會威脅着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千百萬人的後備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會跟着那些於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他們實行武裝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為在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來得及揭破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底擁護者，因為在當時，羣衆還沒有來得及根據本身經驗來察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自由的言辭之虛偽性。如果沒有羣衆

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的經驗，那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不會陷於孤立，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因此，「耐煩解釋」各小資產階級黨底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鬥爭的策略，曾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這個策略會威脅着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變成一小羣徒託空言而毫無根基的陰謀家。

寧列說：

「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或是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的立場時，却叫先鋒隊單獨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者和被資本壓迫者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那末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在不僅已由俄國，而且已由德國所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的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是德國文化程度高的個個識字的羣衆，也會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是如何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向資產階級委曲盡忠、完全卑鄙齷齪以後，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只會有極反動份子（俄國之科爾尼洛夫，德國之賈卜及其同類）專政以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條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環節，而一抓住這個環節，就可以握住整個鍊條而準備那些爲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在於要從黨面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這樣一個當前任務，而解決這任務，就是工作底中心點，實

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可從很久以前時期（黨形成時期）引來，而另一個例子，則可從我們所最切近的現今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引來。

在黨形成時期，當時，無數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還由上而下地腐蝕着黨，而思想離散狀態會是黨內生活底特點，——在這時期，整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和黨面前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竟是創辦全俄秘密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之下，祇有經過全俄秘密報，才能造成黨內這樣的意見一致的中堅，這個中堅能夠把無數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奠定基礎以形成真正的黨。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當時，工業正處在萬分破壞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產品不足；當時，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已變成順利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所有一切任務中的基本任務，竟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可結合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祇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經由發展商業去擴展銷路，才可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以後，只有把握商業以後，只有把握這個環節以後，才可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解決其他當前任務，以便造成條件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鍊條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環節，而這個環節是必須用全力抓住的，以便握住整個鍊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以下一個環節」……『在現有時機內……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國家調節

(引導)下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這就是在歷史事變鍊條中，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的「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這就是保證有正確策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為列寧主義是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一切妥協的。這種見解是完全不對的。波爾什維克之知道下面這一點並不亞於其他任何人：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凡施皆善」的；在某種條件之下，一般改良以及通融和妥協，是必要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同時却預先就拒絕採用看風轉舵的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就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那怕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在攀登一座艱難險阻、還沒有被人考察過和從來為人跡所沒有到過的高山時，却預先就拒絕有時曲折前進、有時回頭退後，拒絕變更既經選定一次的方向和拒絕試用各種各樣的方向，是同樣可笑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〇頁)。

問題顯然不在於改良或妥協和通融，而是在於人們怎樣使用改良和妥協。

由改良派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至於革命工作，那就是小事情，不過是用作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而已。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之下，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



具，瓦解革命的工具。

而由革命家看來，却恰巧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之下，自然要變為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鞏固革命的工具，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撐點。

革命家之所以接受改良，是為要利用它來做連環鉤以便把合法工作與不合法工作聯貫起來，是為要利用它來做一個掩飾物以便加強不合法工作，這種不合法工作底目標，就是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以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利用妥協的實質。

而改良派之接受改良，却恰巧相反，是為要拒絕任何不合法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作革命的事業，却安息於「恩賜」改良底福蔭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採取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採用列寧在論金子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改良道路」，採取迂迴而進的道路，採取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休戰時間，養精蓄銳和準備實行新進攻的條件。不可否認：這種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道路。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特點，而這特點就是：在這種形下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政權方面出發的，它鞏固着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休戰時間，它的使命，不是瓦解革命，而是瓦解那些非無產者階級。

於是，改良在這種條件下就變成與改良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就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革命在前一時期內的發展規模是充分偉大，所以它給予了充分廣闊的場所，使得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迂迴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一來，如果在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改良會是革命底副產品，那末在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良底來源就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就是那握在無產階級手中而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而同時，馬克思會只能從一方面，就是說只能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個環境裏，無產階級即令是在一個國家裏都沒有獲得第一次的、多少穩固的、多少長久的勝利。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改良是無產階級底革命階級鬥爭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已即令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就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還是與以前一樣，可是在形式上，却已有這樣一個變化，這個變化是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先見到的；可是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洽，才能瞭解這個變化。在革命勝利以後，它們（即指改良。——「約·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依然還是「副產品」），除此而外，對於已在其中獲得勝利的國家，當實力在其極緊張運用以後而弄得顯然不夠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就是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休戰時間。勝利給予這樣多的「後備力量」，使甚至在迫不得已而實行退却時，也有所倚靠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倚靠而支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至八五頁）。

##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黨，乃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是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底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在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之下，當然是談不到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按新的革命的風格去改造整個黨工作，培養工人以爭取政權而進行革命鬥爭的精神，準備和吸引後備力量，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制度和和平條件中訓育出來的陳舊的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擔負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而以陳舊的黨

爲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樣的情形的。因此，就必須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爲爭取政權而鬥爭；這個黨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這樣機敏，以至於足以繞過那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的一切和任何障礙。

如果沒有這樣的黨，那就甚至於莫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莫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要成爲真正先進的部隊，黨就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就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它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平上，那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它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它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着自發性做尾巴。第二國際底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黨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夠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平上的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說到鬥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

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如果不甘願遭受失敗，都非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給可咒敵人去吞食，就更非有這樣的參謀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才能夠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可是，黨不能僅僅只是先進的部隊。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本階級底一部分，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各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用由其他階級出身者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平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羣衆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竟變成隔離，如果黨竟閉關自守而與非黨員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和非黨員羣衆發生聯繫，如果在黨和非黨員羣衆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接收了二十萬新黨員。這裏最可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羣衆送進黨的，這些非黨員羣衆會積極參加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非有他們的贊同，一般就未曾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員工人羣衆把我們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近的和至親的黨，他們認爲黨之發展和強固是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捉摸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員羣衆聯結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時，在國內戰爭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都

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來行動，都應當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隊伍，自己的社會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諾夫精神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黨人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為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的水平，那就是欺騙自己，故意不看見我們的任務之巨大，縮小這些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如果它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底任務是非常偉大而繁雜的。黨應當在國內國外發展底非常困難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要求進攻時，它就應當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要求退却時，它就應當使無產階級避開敵底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員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精神和堅定精神。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就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黨章第一條的著名定義裏就規定了，在這個定義裏，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為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組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定義，他們提出來代替這個定義的，就是自己把自己列入黨的「制度」，這個「制度」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

末結果就一定會使黨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以至於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關於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平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制度」之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爲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寧說：

「從馬爾託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爲「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之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灌入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搗亂思想」（見同上第二一一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許多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之造成，思想威信之變成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於黨的上級機關」（見同上第二九一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之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這些原則之始終一貫的實行。列寧把那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是應受譏笑和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

## 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這本書上評論這些不穩定份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猙獰古怪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一聽見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一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面孔和發出蔑視他人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為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為要掩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倚據代表大會底形式決議，而不倚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為你只倚據黨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自行補充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們」\*（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第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許多組織；而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它就不能進行反對資本的正確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組織形式（如果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

\*這裏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雪里羅得、馬爾託夫、頗特列索夫等等而言，這些人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  
並且責備列寧為「官僚主義」。——「約·斯大林註」。



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黨的，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靠近於黨或是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擔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担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爲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就是說，這一切組織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爲它們都是爲一個階級——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爲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爲有必要的經驗而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爲它有充分威信而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產生間斷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是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的：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這些份子是与無產階級各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很時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爲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所以它就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爲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就是這樣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種種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爲把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只是要使凡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們，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當中

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們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無產階級組織其他一切形式方面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那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理論產生了一些離黨而獨立的國會議員以及脫離黨的出版家，近視的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的合作運動家，——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在無產者階級內部和在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基本的領導的始基。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們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同時並且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無產階級就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無產階級就運用它來鞏固和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危機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其他一切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無產階級在俄國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着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着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最完全的最奮勇的擁護，就是說，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誠正直的、舍己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夠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股份子最完全的最奮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支持至今已有一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支持至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造成骨幹和堡壘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者階層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以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因自己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那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乃是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鐵的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正直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善於注視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當階級已經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要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自己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則黨內的鐵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料到黨內的批評和黨內的意見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料到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為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這樣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的鐵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時的已尖銳化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夠實現自己的職責，就是如果它是組織得最集中，如果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如果它的黨中央是具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是無論與黨底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

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這就是說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滅弱和破壞紀律，滅弱和破壞專政。當然，第二國際底黨，既進行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是能容許如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的自由主義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任務作為自己工作底基礎，是既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以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底基本條件——為觀點」，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關於黨底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和立刻地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立刻解散那一切而無例外的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關於黨底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就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僧、智識界當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們，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又發生無產階級上層份子腐化過程，這些份子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的工會家和國會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就生活方式說來，就工資份量說來，就整個世界觀說來，他們是完全市僧化了的，——乃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家階級底工人傭僕，是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底真正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從內部搗亂和爆裂黨的行動底主要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那就是陷於兩面受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份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進行反帝國主義順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想思鬥爭方法來「克服」機會主義份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來「消除」這些份子的理論，乃是腐敗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麻痺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去吞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託夫與唐恩輩、頗特列索夫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黨已經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會能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它會能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那就不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所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曾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那些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

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爲甚至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慘酷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爲那對這政權的逼迫還過分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這不是滅弱，而是既加強黨，既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 （九） 工作作風

這裏不是說文學作風。我在這裏所說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這樣一種特別和特殊的東西，這種東西造就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工作者。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這個學校造就特別式樣的黨國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在那裏呢？它的特點怎樣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革命廣度；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就是黨和國家工作裏這兩個特點底結合。

俄國的革命廣度是這樣的消毒劑，這個消毒劑能消除頑固習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祖先傳統態度。俄國的革命廣度是這樣的活力，這個活力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展前途。如果沒有它，那就不能前進一步。可是，如果不把它和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它就有的一切可能在實踐中墮落爲空洞的「革命的」馬尼諾夫精神。這種墮落例子，簡直不可勝數。誰不知

道有這樣的「革命的」杜撰主義病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病，這個毛病底來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依·愛倫堡曾在他那篇標題爲共產主義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的小說中，描寫一位患有這個毛病的「波爾什維克」底風格，這個人會立意擬定一個理想完人標準表……結果，他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雖有些過於誇大之處，然而這篇小說之正確抓住這個毛病，那却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患有這種毛病的人。他曾痛斥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毛病爲「共產黨員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黨員誇大狂，這就是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竟妄想他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就能解決他自己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凡的事情來對抗這種「革命的」空砲，並以此而着重指出：「革命的」杜撰主義是無論與真正列寧主義底精神或字句，都是相反的。

列寧說：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凡的事。少發些政治噪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頁和第三三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乃是這樣的消毒劑，這個消毒劑能消除「革命的」馬尼諾夫精神和虛幻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的不可遏止的力量，這個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阻礙，這個力量以其求實堅忍精神去掃除一切和任何障礙，這個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個力量，則認真的建設工作就沒有可能。可是，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



精神和俄國的革命廣度結合起來，那它就有一切可能墮落爲狹隘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波爾什維克」陷於蛻化而離開革命事業呢？波、皮里略克在他那篇標題爲荒涼年份的小說中描寫過這種特殊的毛病，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某些俄國「波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遍身都充滿着行動意志和實踐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究竟爲着什麼」，並因此而誤入迷途，離開革命工作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冷酷地譏笑過這種事務主義毛病。列寧會痛斥這種毛病爲「狹隘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都是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日常工作一切事務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對抗這種毛病，並以此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事務主義，也同「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列寧主義相反的。

俄國革命廣度與美國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這就是黨和國家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這樣的結合，才給我們以列寧主義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底工作作風。

#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到十月革命之路——書底序言——

## (一) 十月革命底內外環境

有三個外部情況，曾促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比較易於打破帝國主義鏈條並這樣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第一，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兩個基本帝國主義集團——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拚命鬥爭時期開始的，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彼此間的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物力來認真注意到與十月革命作鬥爭。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是有巨大意義的，因為它使十月革命有可能利用帝國主義內部殘酷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實力。

第二，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十月革命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進程中開始的，當時那些苦於戰爭而渴望和平的勞動羣衆，被客觀情勢本身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為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個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是有極大意義的，因為它給予十月革命以力爭和平作為強有力的工具，它促使十月革命能易於把蘇維埃革命與結束可恨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並因此而給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當中造成廣泛的同情。

第三，就是當時在歐洲有雄偉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被長期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事實。這個情況對於俄國革命是有無限意義的，因為它保證俄國革命在其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俄國境外獲得可靠的同盟者。

可是，除這些外部情況以外，十月革命還有許多促使它易於勝利的內部順利條件。上述幾點，要算是這些條件中的主要條件：

第一，十月革命擁有俄國工人階級絕大多數羣衆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它擁有那些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兵士羣衆不容置疑的擁護。

第三，它擁有如波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久經鍛鍊的黨爲首，爲其領導力量，這個黨所以強有力，不僅是因爲它有自己的經驗和多年造成的紀律，而且還因爲它與勞動羣衆有廣大的聯繫。

第四，十月革命當時所遇着的，是些比較易於克服的敵人，如比較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已經被多次農民「騷動」弄得完全頹喪的地主階級，以及已經在戰爭進程中完全遭受破產的妥協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

第五，十月革命擁有新國家的廣大疆域，在這個疆域內，它能夠自由隨機應變，能夠在環境要求退守時而退守，能夠暫時休息，能夠養精蓄銳等等。

第六，十月革命在其反對革命的鬥爭中能憑藉於自己國內所具有的充足的糧食的、燃料的和原料的資源。

這些內外情況配合起來，就造成了那促使十月革命比較易於勝利的特殊環境。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內外環境方面未曾有其不利條件。例如，這樣一個不利條件，如十月革命是處於某種孤獨地位，在它旁邊和鄰近沒有一個可爲它所倚靠的蘇維埃國家，——這個不利條件是有多大作用呢？毫無疑義的，例如在德國將來的革命在這方面是會處在比較便利地位的，因爲它在鄰近有我們蘇聯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十月革命底這樣一個不利條件，即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那更不必說了。

可是，這些不利條件，祇是着重指出十月革命上述特殊內外條件底巨大意義而已。我們一分鐘都不可忘記這些特殊條件。在分析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事變時，特別應當記着這些特殊條件。托洛茨基是首先就應當記着這些特殊條件的，因為他竟籠統地把十月革命拿來與德國革命做比擬，並放肆地痛斥德國共產黨底真正錯誤和虛構錯誤。

列寧說：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那種具體的、歷史上非常新奇的形勢中，曾是容易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而要繼續這個革命並把這個革命貫徹到底，俄國却就比各歐洲國家難些了。我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經指出這一點，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論斷是正確的。下述這樣一些特殊條件：（一）有可能把蘇維埃革命與藉這個革命來結束那已使工農受苦異常的帝國主義戰爭的事業，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兩個雄震全球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而這兩個集團當時却不能聯合起來反對其敵人蘇維埃；（三）有可能支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是因為國家疆域極廣和交通不便；（四）當時在農民中有這樣一個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致使無產階級黨從農民黨（即「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激烈仇視波爾什維主義的）手中拿來革命要求，並因由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之；——這樣一些特殊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重複這些條件或與此類似的條件，是不很容易的。其中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除其他某些原因以外，——所以西歐要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我們難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五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 (二) 論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 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所以必須加以說明，首先就是爲着瞭解這個革命底內容和歷史意義。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這就是這樣一件事實：已在我國誕生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基礎上、在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勞動羣衆的條件下產生的政權。第二，就是這樣一件事實：已在我國奠定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資本主義少發展的國家裏、在其他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依然保存着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獲得勝利的結果。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再沒有其他特點了。可是，現時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是因爲它們確切表明十月革命底實質，而且還因爲它們十分明白地揭露「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本性。

我們來簡略分析這兩個特點吧。

關於城鄉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問題，關於把這些羣衆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極重要的問題。革命底命運如何，無產階級專政堅固與否，是取決於下述一點的：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城鄉勞動羣衆將擁護誰，是擁護資產階級，還是擁護無產階級，將成爲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還是將成爲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法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遭受失敗，主要是因爲農民後備力量曾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爲它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得其農民後備力量，它把這些後備力量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成爲城鄉千百萬勞動羣衆唯一領導力量。

誰沒有瞭解這一點，誰就永遠也不會瞭解十月革命底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底本性，我們無產階級政權國內政策底特點。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那用「老練戰略家」精緻手腕來「機巧」「挑選出來」並「合理憑藉於」某黨居民階層的簡單政府上層。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爲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爲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爲條件。

所以，這裏所說的，不是什麼「稍微」輕視或「稍微」誇大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如某些要外交的「不斷革命」擁護者現時所愛用的字眼那樣。這裏所說的，是由於十月革命結果而產生的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底本性。這裏所說的，是無產階級政權底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底基礎。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者先鋒隊——與那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間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這是反資本的聯盟，這是以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爲目標的聯盟，這是以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爲目標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其次：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拉丁文的科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名詞翻譯成爲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正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那一定的階級，即城市工人和一般工廠工人，即工業工人，能夠領導全體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六頁）。

列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專政論，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革命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底模範式的實現。

有些同志以爲這個理論是只與俄羅斯實際情形有關的純粹「俄國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列寧在說到那些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時，他所指的，不僅是俄國農民，而且還有蘇聯境內那些不久以前還是俄國殖民地的邊區裏的勞動份子。列寧會始終不倦地說：如果不與這些別族羣衆聯盟，則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其關於民族問題的各篇論文中以及在共產國際各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都再三說過：如果沒有各先進國無產階級與各被奴役殖民地被壓迫民族間的革命聯盟，革命同盟，則世界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而什麼是殖民地呢，豈不也是那些被壓迫的勞動羣衆，豈不首先就是農民勞動羣衆麼？誰不知道，殖民地解放問題在實質上是那些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擺脫財政資本壓迫與剝削而獲得解放的問題呢？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決不是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爲世界各國所必須採用的理論。波爾什維主義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波爾什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必須採用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底特徵，就是如此。

從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方面看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們不來多講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當時他「簡單」忘掉農民是革命力量，却提出「不要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的口號，就是說不要農民參加革命的口號。甚至拉狄克這位愛要外交的「不斷革命」擁護者，現在也不得不承認：「不斷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離開實際環境而「向空一躍」。現在，大概是人人都認爲不值得再和這「向空一躍」周旋了。

我們也不來多說托洛茨基在大戰時期，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場，當時他在其所著論文為政權而鬥爭中，由「我們處於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與舊制度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等語出發，而作出結論，說農民底革命作用應當減少，說沒收土地的口號已沒有它從前所有的那種意義。大家知道，列寧在割解托洛茨基這篇論文時，曾責備托洛茨基為「否認」「農民作用」，說「托洛茨基在事實上幫助俄國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而這些政治家是把「否認」農民作用瞭解為不願意發動農民去革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我們倒不如來看看托洛茨基關於這個問題的比較晚些的著作，來看看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奠定和他已能根據事實來檢查他那「不斷革命」論並改正他那些錯誤的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給一九〇五年一書所作的序言來說吧。請看托洛茨基在這篇序言中會如何說明「不斷革命」：「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變和十月罷工間，在本書作者方面形成了自己那些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對於俄國革命發展性質的觀點。這個奧妙名稱底含義，就是認為，俄國革命，雖然直接擺在它面前的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不能停止在這些目的上面。除非先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自己那些最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而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又不能使無產階級以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反之，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保證其勝利起見，還在其統治最初時期內，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主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與那一切曾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贊助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衝突，而且會與那些曾協助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的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是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的」\*。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托洛茨基就是這樣說明他那「不斷革命」的。

祇要把這段引證拿來與以上從列寧幾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著作中引來的幾段引證對照一下，就可看出那橫在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論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間的整個鴻溝了。

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階層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而托洛茨基則說「無產階級先鋒隊」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而托洛茨基則說「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的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

按列寧說來，革命首先就從俄國本國工農當中吸取自己的力量。而托洛茨基則認為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

而如果國際革命竟只得遲些到來，那又怎樣辦呢？我國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前途呢？托洛茨基認為是沒有任何光明前途的，因為「……工人政府地位中的矛盾，是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的」。按這個計劃說來，我國革命祇有一個前途：在自己所有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和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枯朽。

按列寧說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以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為倚據、以「完全推翻資本」、以「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權。

按托洛茨基說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是那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衝突」和祇有力求「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解決「矛盾」的政權。

這個「不斷革命論」與那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孟什維主義理論，有什麼區別呢？按實質是毫無區別的。

在這裏是絲毫沒有懷疑餘地的。「不斷革命」不是什麼對農民運動革命可能性的簡單輕視。「不斷革命」是對農民運動的這樣一種輕視，這種輕視是歸結於否認列寧無產階級專政論的。

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是變形的孟什維主義。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特徵怎樣呢？

列寧在研究帝國主義時，特別是在大戰時期，發現了關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不平衡發展，跳躍式發展的規律。按這個規律底含義說來，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是發展得不平衡的，不是按一定秩序發展的，不是這一個托拉斯、這一個工業部門或這一個國家總是在前面走着，而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國家則按次落伍；——而是跳躍式的，在某些國家發展中發生停頓，而在別些國家發展中却發生向前跳躍現象。同時，那些落伍國家是「完全合乎情理地」希圖保持舊陣地的，而那些已向前跳躍的國家却又同樣「合乎情理地」希圖奪取新陣地，其結果就使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事衝突，成爲絕對不可避免的事情。例如，德國情形會是如此，在半世紀以前，德國同英法比較起來還是一個落後國家。日本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曾是如此。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向前躍進得很遠，德國已超過法國並已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而日本則已超過俄國。大家知道，從這些矛盾中就產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規律是從下述各點出發的：

(1)「資本主義已經變成極少數」先進」國對於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殖民地壓迫和財政資本扼

制的全世界體系」(摘自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法文版序言，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四頁)。

(2) 「瓜分這種『擒獲物』的，是兩三個雄震全球而全身武裝的惡獸(美、英、日)，他們把全世界捲入他們自己爲瓜分自己擒獲物而進行的戰爭」(見同上)。

(3) 財政資本壓迫的世界體系內各種矛盾的增長以及軍事衝突的必然性，結果就使帝國主義世界戰線容易被革命打破，而由個別國家來衝破這條戰線是概然的。

(4) 最概然的，是在帝國戰線最弱的地點和國家，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最鬆懈而革命最易展開處衝破這條戰線。

(5) 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勝利，甚至如果這個國家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同時在其他國家裏，甚至如果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較更發展的國家，却保存着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和概然的。簡括說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基礎，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何在呢？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就在於這個革命是實際應用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的模範。

誰沒有瞭解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也不會瞭解這革命底國際本性，這革命底偉大國際力量，這革命底特殊對外政策。

列寧說：

「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得出結論：社會主義首先在不多或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勝利，是可能的。這個國家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

級及其國家」。因為「如果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比較長期的堅持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各國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開始於——如果按他們那種理論說來，無產階級革命一般應在什麼地方開始的話——工業發展的國家；他們硬說，這些國家在工業關係上愈是發展，則社會主義勝利底機會愈多；而且在他們看來，在一個國家內，況且在資本主義少發展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是完全不近情理而絕對沒有可能的。還在大戰時，列寧就已倚據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律，將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甚至如果這個國家是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來與機會主義者對立。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已完全證實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看來，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是怎樣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所著小冊子我國革命（一九〇六年出版）來說吧。

托洛茨基寫道：

「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國家幫助，則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就不能把自己臨時的統治變為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不容片刻懷疑的」。

這個引證是說明什麼呢？原來就是說明：「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國家幫助」，換言之，在歐洲無產階級尚未奪得政權以前，在一個國家內——這裏是指在俄國內——社會主義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個「理論」與列寧關於社會主義有「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可能的原理，有什麼相同處呢？

很明顯的，在這裏是沒有絲毫相同處的。

可是，就假定說：托洛茨基這本小冊子因爲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當時還難於斷定我國革命底性質，所以這本小冊子含有一些無意中的錯誤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在較晚時期內的觀點。我們就拿托洛茨基所著其他一本小冊子和平綱領來說吧，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現時（一九二四年）已在一九一七年一書中再版了。托洛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裏批評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並拿歐洲聯邦口號來與之對立。他硬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勝利，祇能是歐洲幾個聯合爲歐洲聯邦的基本國家（英、俄、德）底勝利，否則完全不可能。他簡直說道：「除非在德國發生革命，則在俄國或英國就絕對不能有勝利革命，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托洛茨基說：

「拿來反對歐洲聯邦口號的唯一的稍許具體的歷史意見，已由那在瑞士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波爾什維克黨當時的中央機關報。——「約、斯大林註」）歸納爲以下一句話：「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由此就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說因此就無須以創立歐洲聯邦爲每一個別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底前提。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平衡，——這是完全不容爭議的意見。可是，這不平衡性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法國底資本主義水平不是一樣的。可是，與非亞兩洲比較起來，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實現社會革命的資本主義「歐洲」了。說任何一個國家在自己的鬥爭中都不應「等待」別國，——這是一個淺顯的思想，——重複提起這個思想，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以便使平行的國際行動觀念不被等待主義的國際不動觀念所代替。我們不等待別國而在民族範圍內開始鬥爭並繼續鬥爭，因爲我們完全相信我們的創始會推動其他各國家內的鬥爭；而如果這一點竟不能實現，那末如果以爲革命俄國

——舉例來講——能在保守主義歐洲面前支持得住，或以爲社會主義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孤身保留下去，却就是絕無希望的想法，正如歷史上的經驗以及理論上的推論所證明一樣。

由此可見，這仍然是社會主義在歐洲各基本國家內同時勝利論，而這種論調是通常都絕對排斥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論的。

不待說，爲要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爲要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是必須有數國無產者們共同努力的。不待說，除非有歐洲無產階級來援助我們俄國革命，則我們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擋住那種合力的進逼；同樣，除非有俄國革命去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則這個運動就不能以它在俄國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所具有的那種發展速度向前發展。不待說，我們是需要援助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們對於我國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壞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所有這些是不是援助呢，是不是嚴重幫助呢？絕對是的。如果沒有這種援助，如果沒有這種不僅歐洲工人們，而且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所給予我們的幫助，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困難地位了。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再加上我們紅軍底實力和俄國工人們挺身護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所有這些，至今是否足夠擊退帝國主義者進攻並取得爲進行認真建設工作所必要的環境呢？是的，是足夠的。這種同情現時是在增長着還是在減弱着呢？絕對是在增長着的。這樣，我們有沒有各種順利條件來不祇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事業，並且還給予西歐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以援助呢？是的，是有這種條件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來的歷史，就是燦爛說明這一點。可以否認在我國已有雄偉勞動高潮開始麼？不是的，是不可否認的。

既然這樣，那末托洛茨基說革命俄國不能在保守主義歐洲面前支持下去的議論，還能有什麼意義呢？它祇能有一個意義：第一，托洛茨基沒有感覺到我國革命底內部實力；第二，托洛茨基不瞭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國革命的精神援助所含有的無限意義；第三，托洛茨基沒有覺察到現時正腐蝕着帝國

主義的那種內部虛弱症。

托洛茨基因醉心於批評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於是在他自己那本於一九一七年出版並於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冊子和平綱領中，竟不知不覺迎頭打破自己。

可是，也許托洛茨基這本小冊子也已經陳舊，也因為某種原因而不復符合他的現時觀點了？我們且拿托洛茨基最晚的著作，當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在俄國——以內勝利後所寫的著作來說吧。例如，我們就拿托洛茨基於一九二二年給其和平綱領這一小冊子新版所寫的跋文來說吧。請看他在這篇跋文中如何寫道：

「無產階級革命在民族範圍內不能勝利完成，——這種曾在和平綱領中屢次重復過的斷語，在某些讀者看來，彷彿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及五年來的經驗所推翻了。可是，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國家在一國以內，而且在一個落後國以內，竟抵擋住全世界，——這個事實是表明無產階級有巨大實力，而這種實力在其他較先進較文明的國家內，是將能作出真正神奇的事業來的。可是，我們雖在政治上軍事上維持自己為一個國家，但我們却沒有着手來進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事業，甚至於還沒有接近這種事業。在其餘歐洲國家還由資產階級當權時，我們在為反對經濟孤立性而鬥爭中不得不設法去與資本主義世界妥協；同時可以大胆說：這些妥協至多也祇能幫助我們醫治某些經濟創傷和求得某種進步，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却祇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獲得勝利後，才會成為可能哩」\*。

托洛茨基這種說法，顯然是違反實際情形並拚命想挽救「不斷革命」於完全破產的地步。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這樣說來，那就是無論你怎樣支吾辯解，可是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不僅「沒有着手」，而且甚至於還「沒有接近」。原來有人會希望「與資本主義世界妥協」，可是這些妥協原來也沒有絲毫結果，因為無論你怎樣支吾辯解，可是在無產階級尚未「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勝利以前，「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總是辦不到的。

好吧，而既然在西方還沒有勝利，於是俄國革命就祇能「二中取一」：或者是連根枯朽，或者是蜕化為資產階級國家。

無怪乎托洛茨基說我們黨「蜕化」已經說到兩年之久。

無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已預言我們國家定會「亡滅」。

這個奇怪「理論」怎能與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相容呢？

這個奇怪「前途」怎能與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一定使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前途相容呢？

這個「不斷」絕望思想怎能與列寧下述一段言論——舉例來講——相容呢：

「社會主義現時已經不是一個遼遠將來的問題，或某種抽象幻景的問題，或某種偶像的問題。我們對於偶像的意見，仍然如舊，仍然是很不好。我們已把社會主義拉入日常生活中，而在這裏我們就應當把事情弄清楚。這就是我們時期的任務，這就是我們時代的任務。讓我在結束演說時表示這樣一個信念，就是無論這個任務怎樣困難，無論這個任務和我們舊時任務比較起來是如何新穎，無論這個任務會使我們受到多少困難，——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無論怎樣都一定會解決這個任務，所以新經濟政策俄羅斯是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俄羅斯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六頁）。



這個「不斷」前途黑暗思想怎能與列寧下述一段言論——舉例來講——相容呢：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這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小農結成聯盟，這無產階級具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必要的一切，以便經過合作社，而且祇是經過合作社，——我們以前會鄙視合作社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社，——這難道不是為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成，然而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很明顯的，這裏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可以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就是對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論的否定；反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就是對「不斷革命」論的否定。

不相信我國革命底力量和本事，不相信俄羅斯無產階級底力量和本事——這就是「不斷革命」論底內幕。

迄今以前，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它這一方面，就是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應當補充指出它那另一方面，它那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本事。

托洛茨基底理論與孟什維主義所謂除非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各基本國內」預先勝利，則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內——何況是在一個落後國內——勝利就不可能的通常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按實質是毫無區別的。

這裏是絲毫沒有懷疑餘地的。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是變形的孟什維主義。

近來，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了一些腐敗的外交家，這些外交家力圖私販「不斷革命」論，說它是某種

可與列寧主義相容的東西。他們說：當然，這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時原來是不適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底錯誤就在於他當時跑得太前，竟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環境裏應用這在當時還不可應用的理論。可是後來，——他們說，——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時，托洛茨基底理論却已完全適得其所了。不難猜到：這些外交家中的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拉狄克。請聽他說吧：

「戰爭在趨向於奪取土地與和平的農民和各小資產階級黨間，掘就了一條鴻溝；戰爭已把農民交給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波爾什維克黨來領導了。當時已有可能的，不是工農專政，而是以農民為倚靠的工人階級專政。羅沙、盧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為反對列寧而提出的主張（即「不斷革命」。——「約、斯大林註」），事實上竟已成爲歷史發展過程第二個階段」。

這裏每字每句，都是顛倒是非。

說在戰爭時「已有可能的，不是工農專政，而是以農民為倚靠的工人階級專政」——，這話是不對的。其實，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就是工農專政在與資產階級專政特殊錯綜結合中的實現。

說拉狄克所含蓄不提的「不斷革命」論是於一九〇五年時由羅沙、盧森堡和托洛茨基提出的，——這話是不對的。其實，這個理論是由巴烏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現在，經過十個月以後，拉狄克已來自行更正，認為必須把巴烏斯大罵一頓，說他不應當提出「不斷革命」論。可是，拉狄克也必須把巴烏斯底同道人——托洛茨基罵一頓，才算公道哩。

說那已被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拋棄的「不斷革命」，在「歷史發展過程第二個階段」上，即是在十月革命時，竟已成爲正確主張，——這話是不對的。十月革命底全部進程，十月革命底整個發展過程，都已表明並已證明說「不斷革命」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不斷革命」論是與列寧主義基礎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議論和腐敗外交，是不能掩蓋「不斷革命」論和列寧主義間的無底鴻溝的。

### (三)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 波爾什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爲要瞭解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波爾什維克策略，至少就必須認清這個策略底幾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其所以更必須這樣作，尤其是因爲在許許多多談論波爾什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正是往往把這些特點忽略了。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特點。如果聽信托洛茨基，那就可以設想，以爲在十月革命準備史中，總共只有兩個時期，即偵探時期和武裝起義時期，而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由於誤信邪說。一九一七年的四月遊行是什麼呢？「結果比原來所預料的來得『左些』的四月遊行，乃是偵探性的發動，其目的是要檢驗羣衆底情緒和檢驗羣衆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的相互關係」。而一九一七年的七月示威又是什麼呢？按托洛茨基底意見說來，「其實，這一次示威也不過是在運動底新的更高階段上舉行的新的更大規模的偵探動作」。不待說，那依照我們黨要求而舉行的一九一七年的六月示威，在托洛茨基看來，更應稱爲「偵探動作」了。

這樣說來，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波爾什維克就已有由工農組成的現成政治軍隊，如果波爾什維克無論在四月間、無論在六月間、無論在七月間都不曾調用這支軍隊去舉行武裝起義，而祇作過一些「偵探動作」，那末這就是因爲，而且祇是因爲當時「偵探得來的消息」還未曾供給順利的「情報」。

不待說，這種對於我們黨政治策略的簡易化的觀念，無非就是把通常的軍事策略與波爾什維克的革命策略混爲一談而已。

其實，所有這些示威遊行，首先就是羣衆自發衝動底結果，羣衆反戰義憤湧現於街上的結果。

其實，黨在當時的作用，是在於給那些自發產生的羣衆發動以一定形式和領導，使之按照波爾什維克底革命口號進行。

其實，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間，波爾什維克是還未曾有現成政治軍隊，而且不能有現成政治軍隊的。波爾什維克只是在由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鬥爭和階級衝突進程中造就這個軍隊（而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則已終於造成這個軍隊），他們在造就這個軍隊時，是既經過四月遊行，又經過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又經過區議會和全城市議會選舉運動，又經過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又經過奪取蘇維埃的鬥爭的。政治軍隊是與軍事軍隊不同的。如果軍事指揮部在臨戰時就已擁有現成的軍隊；那末黨却要在鬥爭本身進程中，在階級衝突進程中，按羣衆自己根據本身經驗而確信黨口號正確，確信黨政策正確爲標準，逐漸造就自己的軍隊。

當然，每一次這樣的示威遊行，都同時也相當揭示出那不可一覽而知的勢力對比關係，也有相當偵探作用，可是偵探作用在此地不是示威遊行底動機，而是示威遊行底自然結果。

列寧在分析十月武裝起義前夜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與四月至七月間的事變比較時，說道：

「此時情形恰巧不是與四月二十一—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情形一樣，因爲在當時所發生的是自發激動，而這種激動是我們這個黨或則沒有把它握住（如四月二十日），或是加以約束和形成爲和平示威的（如六月九日與七月三日）。因爲當時我們很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農民所相信的還是李別爾唐恩—切爾諾夫的道路，而不是波爾什維克的道路（武裝起義），所以還不能有多大多數民衆跟從我們走，所以武裝起義還是爲時尚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很明顯的，專靠一個「偵探動作」，是做不出多大事情來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探動作」，而是在於：

- (1) 黨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在自己的鬥爭中，是倚據於羣衆革命運動自發高漲的；
- (2) 黨倚據着自發高漲時，總是保持着自己對於運動的獨佔領導的；
- (3) 黨這樣領導運動，就使黨會易於編成羣衆政治軍隊去舉行十月武裝起義；
- (4) 這樣一個政策會不能不使十月革命全部準備工作都在一個黨——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進行；

(5) 這樣準備十月革命，又使由十月武裝起義的結果，政權落到一個黨——波爾什維克黨——手裏。

總之，一個黨，即共產黨底獨佔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底基本要點，——這就是十月革命底特徵，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波爾什維克策略第一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波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就會不可能了。

這就是十月革命與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不同而優勝於它的地方，因為在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中，革命底領導是由兩個黨所分担的，而且無論其中那一個黨都不能稱爲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 所以，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是在一個黨——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進行的。可是，黨會是怎樣進行這個領導呢，這個領導是按着什麼路線進行的呢？ 這個領導是循着使各妥協黨——即在革命總爆發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路線進行的。

列寧主義底基本戰略規則何在呢？

這個規則就在於認定：

(1) 在革命總爆發迫近時期內，妥協黨是革命敵人底最險惡的社會支柱；

(2) 除非使這些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3) 因此，在革命準備時期，主要鋒芒應當用去使這些黨陷於孤立，使廣大勞動羣衆離開它們。

在進行反沙皇制度鬥爭時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沙皇制度底最險惡社會支柱，是自由保皇黨，即「立憲民主」黨。爲什麼呢？因爲「立憲民主」黨是妥協黨，是要大多數民衆——卽整個農民——與沙皇制度妥協的黨。自然，黨在當時會把主要打擊用去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因爲除非使「立憲民主」黨人陷於孤立，就不能指望農民與沙皇制度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就不能指望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瞭解波爾什維克戰略底這一特點，却責備波爾什維克爲過分「仇恨」立憲民主黨，說在波爾什維克方面反對「立憲民主」黨人的鬥爭「蒙蔽着」那反對主要敵人——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毫無根據的責備，祇是揭露這許多人簡直不懂波爾什維克戰略，而這個戰略是要求使妥協黨陷於孤立的，以便促進戰勝主要敵人，使這種勝利更其迫近。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戰略，那末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會不可能了。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各鬥爭勢力底重心已移到新位置上來了。沙皇已不存在了。「立憲民主」黨已由妥協勢力變成當權勢力，變成帝國主義底統治勢力了。此時，鬥爭已經不是在沙皇制度與人民間來進行，而是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來進行了。在這個時期內，帝國主義底最險惡社會支柱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爲什麼呢？因爲這些黨在當時是妥協黨，是要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妥協的黨。自然，波爾什維克底主要打擊，當時是用去反對這些黨的，因爲當時除非使這些政黨陷於孤立，就不能指望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決裂，而不保證有這種決裂，就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

多人當時不瞭解波爾什維克策略底這一特點，却責備波爾什維克爲「過分仇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責備波爾什維克爲「忘記」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都燦爛說明波爾什維克祇有採用這個策略，才會保證十月革命勝利。

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勞動羣衆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失望，他們離開這些黨，他們轉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這一能使國家達到和平的唯一澈底革命力量周圍。這個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方面與波爾什維克方面爲爭取農民勞動羣衆，爲抓得這些羣衆而鬥爭的歷史。決定這個鬥爭命運的，就是聯盟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鬥爭、前線上六月進攻、兵士死刑律、科爾尼洛夫暴動。而它們決定這一命運，是僅僅只是證實波爾什維克戰略正確的。因爲當時除非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政府，而不推翻這個政府，就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陷於孤立的政策，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陷於孤立，是領導十月革命準備事業的基本路線，——這就是波爾什維克策略第二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波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就會懸在空中了。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托洛茨基在其所著十月底教訓中是完全沒有說到，或幾乎完全沒有說到波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的。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對於十月革命準備事業的領導，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循着使廣大工農羣衆脫離這些黨的路線而進行的。可是，黨是怎樣具體實現了這個使這

些黨陷於孤立的路線呢，在什麼形式中，在什麼口號下實現了這個路線呢？這個路線是在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羣衆革命運動形式中，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下實現的，而其實現手段，就是爲把蘇維埃由羣衆動員機關變成武裝起義機關，變成政權機關，變成無產階級新國家機關而鬥爭。

爲什麼波爾什維克當時正是緊緊抓住蘇維埃，作爲能促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能推進無產階級革命，並負有引導千百萬勞動羣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基本組織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就已經說過：

「蘇維埃是新式國家機關，第一，這個機關能保證有工農武裝力量，同時這個武裝力量是不和人民隔離的，如像舊時的常備軍那樣，而是和人民最密切聯繫着的，在軍事方面說來，這個力量是比舊時軍隊強大得不可比擬的；在革命方面說來，它是爲任何其他東西所不能代替的。第二，這個機關能保證有與羣衆、與大多數人民發生這樣密切不可分離的易於審查復新的聯繫，這種聯繫是在舊時國家機關內完全沒有的。第三，這個機關，因其成份是爲人民所選出和依民意來更換而沒有官僚形式手續，所以比舊時機關要民主得多。第四，它能保證有和各種不相同的職業有堅固聯繫，於是就能不要官僚制度而使各種極不相同的最深刻的改良易於實行。第五，它能保證有先鋒隊組織形式，就是說被壓迫階級——工人與農民最覺悟最努力最先進部分底組織形式，所以它就是這樣一個機關，運用這個機關，被壓迫階級底先鋒隊就可激動、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中的全體廣大羣衆，而這些羣衆是向來都完全處在政治生活以外，處在歷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證有可能把議會制底長處和直接選直民主制底長處結合起來，就是說把立法權和法律執行權結合於選出的人民代表身上。與資產階級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制發展過程中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大進步。如果革命



階級底民衆創造力未曾創立蘇維埃，那麼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就會是沒有希望的事情，因為毫無疑問的，無產階級是不能利用舊機關來保持政權的，而新的機關又不能一下子就創立成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五八至二五九頁）。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波爾什維克就會緊緊抓住蘇維埃，作爲促進十月革命組織事業和無產階級國家新式強大機關創立事業的基本組織環節。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從其內部發展方面看來，是經過兩個階段的：第一個階段（在波爾什維克遭受七月失敗以前，在兩個政權並存時期）和第二個階段（在科爾尼洛夫暴動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上，這個口號是要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聯盟破裂，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因爲蘇維埃在當時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保證在野黨（即波爾什維克黨）以自由鼓動權，保證各政黨在蘇維埃內自由鬥爭，預期着波爾什維克將能經過這個鬥爭方法而接革命和平發展道路來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底成份。這個計劃當然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它毫無疑義會便利着預備那些爲保證專政所必要的條件，因爲它既使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並迫使他們在事實上實施其反革命政綱，就能加速揭破這些黨底真正本性，就能加速使它們陷於孤立，就能加速使它們脫離羣衆。可是，波爾什維克在七月事變時的失敗，却截斷了這個發展過程，因爲這次失敗使軍閥的「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佔得優勢，並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拋入這反革命底懷抱。這個情況就使黨不得不從日程上暫時收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以便在革命新高漲條件下又把它提出來。

科爾尼洛夫暴動底失敗，就開闢了第二個階段。「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又擺在日程上來了。可是，這個口號在此時的意義已不是像第一個階段上那樣了。這個口號底內容已經根本改變了。

此時，這個口號是要和帝國主義完全決裂並使政權轉到波爾什維克手上，因為蘇維埃中的大多數已經是波爾什維克的。此時，這個口號是要革命經過武裝起義而直接進到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此時，這個口號是要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給無產階級專政以國家形式。

把蘇維埃變成國家政權機關的策略所含有的無限意義，就在於它使千百萬勞動羣衆脫離帝國主義，揭破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爲帝國主義工具，並把千百萬勞動羣衆一直引到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把蘇維埃變爲國家政權機關的政策，是一個使各妥協黨陷於孤立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波爾什維克策略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爲使情景完全明白起見，我們還須說明一個問題：波爾什維克會是怎樣和爲什麼能把自己的黨口號變成爲千百萬羣衆用以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呢，波爾什維克會是怎樣和爲什麼能不僅使先鋒隊和不僅使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人民大多數來確信黨政策正確呢。

問題是在於：爲着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包括千百萬羣衆的真正人民革命，——祇靠黨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爲着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說還要羣衆自己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這些口號正確。只有在這個時候，黨底口號才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只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才成爲真正人民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波爾什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能夠正確決定某些道路和轉折，其結果就自然把羣衆引到黨口號下面來，可以說引到革命門口，這樣就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本身經驗來覺察、檢驗、察知這些口號底正確性。換言之，波爾什維克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不把領導黨的方法與領導羣衆的方法混爲一談，它明白看見第一種領導方法和第二種領導方法間的區別，所以它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科學。

波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表現得彰明較著的實例，就是那與召集和解散立憲會議有關的經驗。

大家知道，波爾什維克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提出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根本與蘇維埃共和國基礎相矛盾的資產階級國會。試問怎麼竟能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就是波爾什維克既然是向着蘇維埃共和國前進，而同時却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集立憲會議呢？試問怎麼竟能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就是波爾什維克會不僅參加立憲會議選舉，而且還會親自召集立憲會議呢？試問怎麼竟能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就是波爾什維克在實行武裝起義一個月以前，在由舊制度過渡到新制度時，會容許有把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暫時配合的可能呢？

這件事情所以「竟能發生」，就是因為：

- (1) 立憲會議思想，曾是在廣大民衆中間最通俗的思想之一；
  - (2) 要求立刻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曾能便利於揭破臨時政府底反革命本性；
  - (3) 爲要使立憲會議思想在民衆心目中完全破產，就會須引導這些羣衆拿着他們關於土地、關於和平、關於蘇維埃政權的要求而走到立憲會議門前，因而使這些羣衆與實際的具體的立憲會議相接觸；
  - (4) 祇有這樣，才會能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立憲會議底反革命性和將其解散之必要；
  - (5) 所有這些，就會自然預定可以容許把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暫時配合，作爲藉以消除立憲會議的手段之一；
  - (6) 這種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下實現的，就祇能是使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使立憲會議變爲蘇維埃底附屬品，使立憲會議不必引起苦痛而自行消亡下去。
- 顯然用不着證明：除非有波爾什維克底這個政策，則立憲會議底解散，就不會如此順利進行，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後來在「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這一口號下所進行的各種發動，就不會這樣大遭破產。

列寧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我們曾參加俄羅斯資產階級國會選舉，就是說參加立憲會議選舉。我們的策略會是否正確呢？……我們俄國波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豈不是比較任何西方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來說在俄國，國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麼？當然，我們當時是更有理由來這樣說的，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已如何準備。（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實踐上）採納蘇維埃制度而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因為有種種特別條件，已非常準備就緒來採納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置辯和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可是，波爾什維克却未曾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曾參加其選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至二〇二頁）。

列寧說，這是因為：

「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個星期內，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無產階級受害，而是促使它有可能向落後羣衆證明爲什麼這種國會應被解散，促使把這種國會解散成功，促使「在政治上消除」資產階級國會制度」（見同上）。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托洛茨基不瞭解波爾什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却唾棄立憲會議與蘇維埃配合「論」爲希法亭主義。

他不瞭解：在武裝起義口號和在蘇維埃勝利很有把握的情形下，容許這個配合而召集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這個策略是與那把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附屬品的希法亭策略沒有絲毫相同處的；他不瞭解：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決不能給他以根據去非難列寧和黨關於在相當條件下成立「配合

國體』的完全正確立場（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八頁）。

他不瞭解：如果沒有波爾什維克對立憲會議採取的特殊政策，那波爾什維克就不能把千百萬民衆奪到自己方面來，而不奪得這些民衆，那他們就不能將十月武裝起義變成深入的人民革命。

很有趣的，就是托洛茨基甚至唾棄那些在波爾什維克論文裏遇見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認為應用這些字眼是有傷馬克思主義者體面的。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即是在專政勝利前一月，還說『全部政權必須立刻過渡到由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手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八頁）。

托洛茨基顯然忘記了：列寧這位不容置疑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引證馬克思致顧格爾曼的一封信著名信（這封信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該信說打破官僚軍閥國家機關是大陸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時，曾白紙黑字寫過下面一段話：

『馬克思說破壞官僚軍閥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馬克思這個非常深刻的意見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從馬克思口中說出『人民革命』這一概念來，這似乎是很奇怪的，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份子和孟什維克們，這些司徒盧威信徒們，這些想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們，也許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用這樣簡陋的自由主義精神來曲解馬克思主義，以至於認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對立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見解又是極端死板的。在一八七一年的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還沒有成爲人民大多數。應把真正大多數人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兩者都包括在內，才能成爲這樣的革命。正是這兩個階級在當時組成爲『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爲同受『官僚軍閥國家

機器」所壓迫、摧殘、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破這個機器，搗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生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農和無產者自由聯盟底「預備條件」，而除非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不可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至三九六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總之，善於以把羣衆引到革命立場爲方法來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而確信黨口號正確，是保證把千百萬勞動者奪到黨方面來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波爾什維克策略第四個特點。

我認爲，以上所述，已完全足以使人認清這個策略底各個特徵了。

####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毫無疑義的，說革命在歐洲各基本國家內同時勝利的籠統理論，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勝利的理論，乃是一個矯揉造作而毫無生氣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來的歷史，不是證實這個理論，而是駁斥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不能被採納爲世界革命發展底方案，因爲它是與顯然的事實相矛盾的。它尤其不能被採納爲一個口號，因爲它不是展開，而祇是束縛那些因爲某種歷史條件而有單獨衝破資本戰線可能的個別國家底首倡精神；因爲它不是推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資本，而祇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總爆發」時機；因爲它不是在個別國家無產者中間培養革命堅決精神，而是培養哈姆列特猶疑精神而顧慮着：「萬一別國不來援助，那又怎麼樣呢」。列寧說得完全對：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普通

的情形」，而「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却祇能是「罕有的例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的革命論是不以此爲限的。它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這不是一個自滿自足的任務。已在一個國家裏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做是用去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工具。因爲在一個國家裏——這裏是指在俄國——革命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和日益崩潰過程底產物。它同時還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毫無疑義的，世界革命底發展道路，已不像從前在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以前，在已發發展的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前夜」——尙未出現以前所能想像的那樣簡單了。因爲已經出現這樣一個

新因素，如在已發發展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發生作用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規律，而這個規律是說明軍事衝突必不可免的，是說明世界資本戰線一般削弱的，是說明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因爲已經出現這樣一個新因素，如處在西方與東方間，處在世界財政資本剝削中心與殖民地壓迫舞台間的偉大蘇維埃國家，而這個國家是單用自己存在的事實，就足以使全世界革命化的。

所有這些，都是在研究世界革命道路時不可不顧到的因素（關於其他的次要的因素，我姑且不講）。從前，人們通常認爲革命底發展道路，將是社會主義成份首先在那些較更發展的「先進」國家裏，平衡「成熟起來」。現在，這個觀念已須要有重大改變了。

列寧說：

「國際關係體系現在已形成得這樣，即在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

\* 請看上述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約·斯大林註」。

則，西方有些國家，而且是最老的國家，因為獲得勝利而處於這樣的條件中，即它們能夠利用這一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重要的讓步，——這些讓步雖然是不重要的，可是到底足以推延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造成幾許類似「社會和平」的局面」。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各國，印度、中國等等，正因為有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底影響，已完全被拋出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已最終循着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軌道進行了。一般歐洲式的醞釀，已在它們中間開始。而現在全世界都看得明白：它們已被捲入這樣一個發展漩渦，這個發展是不能不引起整個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

因為這一點和由於這一點的關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將不是和我們從前所期待的一樣。這些國家完成這種發展過程的道路，並不是經由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的平衡「成熟」，而是經由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由帝國主義大戰中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革命運動，已最終被捲入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除此以外，如果還注意到這樣一件事實：不僅是各戰敗國和殖民地被各戰勝國所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落入最強大戰勝國——美國和英國——財政資本剝削的羅網；所有這一切國家間的各種矛盾是使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因素；除這些矛盾以外，在這些國家每個內部，還有各種極深刻的矛盾存在着和發展着；所有這一切矛盾，又因有偉大蘇維埃共和國與這些國家並存的事實而日益加深和尖銳化，——如果注意到所有這一切，則特殊國際形勢底情景，就會多少完全了。

最概然的，是世界革命將經由這樣一條道路發展着：許多新國家將用革命手段脫離帝國主義國家體系，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底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國家底無產者。我們看見，第一個已脫離這體系的



國家，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已經爲其他各國工人羣衆和一般勞動羣衆所援助着。如果沒有這種援助，則這個國家就會不能支持了。毫無疑義的，這種援助是將增強着和發展着。可是，同樣毫無疑義的，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愈徹底鞏固，這個國家愈迅速變爲更加擴展世界革命的基礎，變爲更加破壞帝國主義的主要武器，則世界革命發展過程本身，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過程本身，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

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的無產者們共同努力，則第一個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不能，——這固然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切實，則世界革命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發展，——這同樣也是正確的。

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什麼呢？

第一，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使那已獲勝利的國家「最高限度地實行在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所有各國內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第二，這種幫助應當表現於使一國「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已獲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底顯著特點，不僅在於它加速其他各國無產者底勝利，而且還在於它既然促進這一勝利，於是就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得到最終勝利。

最概然的，是在世界革命發展進程中，會造成在個別蘇維埃國家內的社會主義策源地以及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體系，以與那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帝國主義策源地以及這些國家在全世界範圍

內組成的體系並列，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底歷史。

列寧說：

「因為，如果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所進行的比較長期的堅持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見同上）。

十月革命底世界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體系這件事業中的偉大創始，不僅在於它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策源地，而且還在於它是世界革命第一階段和世界革命繼續發展過程底強大基礎。

因此，不僅那些因忘掉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而宣稱一國革命勝利是純粹民族現象和祇是民族現象的人們，沒有道理。而且就是那些雖記得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而竟企圖把這個革命看作是某種祇應接受外援的被動現象的人們，也是沒有道理的。其實，不僅十月革命要有其他各國革命底援助，而且其他各國革命也要有十月革命底援助，以便加速和推進那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關於列寧主義問題

謹將此書獻給

聯共（波）列寧格拉組織。

約·斯大林

## （一）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曾給了人所共知的列寧主義定義，這個定義大概已經爲大家所公認了。這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這個定義是否正確呢？

我認爲是正確的。它之所以正確，第一就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定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和某些批評列寧者相反，而這些批評者却荒謬認爲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它之所以正確，第二就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質，而和社會民主黨相反，而社會民主黨却認爲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民族環境中。它之所以正確，第三就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

與馬克思學說間的有機聯係，認定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和某些批評列寧主義者相反，而這些批評者却認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更進的發展，而僅是恢復馬克思主義和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實際情形。

所有這些，都似乎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解釋的。

可是，在我們黨內，竟還有些人認為有給列寧主義以稍許另外一種定義之必要。例如，季諾維也夫認為：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革命是在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裏直接開始的」\*。

季諾維也夫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把俄國底落後性及其農民性質放在列寧主義定義以內，這究竟是表明什麼呢？

這就是表明，他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學說變為俄國特殊情况底產物。

這就是表明，他替鮑威爾和考茨基助威，因為鮑威爾和考茨基正是否認列寧主義能適用於其他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的。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是有極重要意義的，我們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可是，這件事實對於估計列寧主義底基礎，能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根據俄國條件和專為俄國製定的，而不是根據帝國主義條件和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製定的麼？難道列寧以下諸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皆有

\* 若重點是季諾維也夫自己所加。——「約·斯大林註」。

意義麼？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綜合麼？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對於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黨都是適用和必要的麼？難道列寧說「波爾什維主義是適用於世界各國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不是說得正確麼？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波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有國際意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不是說得正確麼？難道例如列寧以下一段話不是說得正確麼：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這是因為我國很落後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但基本力量——以及社會經濟底基本形式——在俄國也是和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只能牽涉到非最主要之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〇八頁）。

可是，如果所有這些都是對的，那豈不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季諾維也夫所給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麼？

試問：這種以民族為限的列寧主義定義怎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 (二) 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曾說：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關於農民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作用、關於農民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乃是一個從生問題」。

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我認爲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的確，如果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很明顯的，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就在於規定這個問題，就在於論證這個問題並使其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也夫却顯然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在他所著論文紀念列寧裏說道：

「我已經說過，農民作用問題，是波爾什維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

你們看見，季諾維也夫這一原理，是完全從他所給的不正確的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因此，這一原理也和他所給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七頁）這一提綱，是否正確呢？絕對是正確的。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與策略這一提綱，是否正確呢？我認爲是正確的。而由此就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列寧主義底根基，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帝國主義問題、帝國主義發展跳躍性問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無產階級國家問題、這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國家底蘇維埃形式問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問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正是列寧所規定的，——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正是這些問題構成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底基礎、根基，——這難道不是事實麼？如果沒有規定這些基本問題，那就根本不能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規定農民問題，——這難道不是事實麼？

不待說，列寧是很諳通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是有極重要意義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那也就不會有無產階級底同盟者這個從生問題，即農民問題，——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個實踐問題，那也就不會有與農民聯盟問題，——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如果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規定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規定這個問題，那他就不是一個最偉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像他實在是那樣，而不過是一個簡單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那些文墨庸人所常常把他描寫的那樣了。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那時列寧主義對於那些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國家，對於那些非農民的國家，就是不適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那時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底國際學說，是對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國家——其中也包括那些資本主義關係發展的國家——都適用而且必要的。這裏必須選擇一個。

###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作用的「理論」。那裏說：

「列寧所以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主張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停頓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這個最大的後備力量——作用」。

這個對俄國「不斷論者」的評語，直至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個評語雖然一般是正確的，却還不能認為是窮盡無遺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分析，都已經指明：俄國「不斷論者」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足以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事，還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因此，在我所著小冊子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評語，並且用另一個更完全的評語來把它更代了。在這個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迄今以前，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它這一方面，就是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指出它那另一方面，它那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本事」。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那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宣佈的無括弧的不斷革命思想。恰巧相反。列寧是正確瞭解並發展了不斷革命思想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論者」間的區別，就是「不斷論者」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毫無



生氣的書本上的奧理；而列寧則採納了純粹的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自己的革命論基礎之一。要記着，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如何關於這個問題寫道：

「我們將立刻從民主革命開始過渡，——而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為標準，依照有覺悟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為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

我們既不陷於冒險主義，既不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既不追求便宜的聲譽，那我們就只能說而且只是說一點：我們將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去實現民主革命，以便我們，無產階級黨，更易於儘快過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至一八七頁）。

再看列寧經過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後，如何關於這個問題寫道：

「考茨基輩、希法亭輩、馬爾託夫輩、切爾諾夫輩、黑爾克維特輩、龍格輩、麥克唐納爾輩、屠拉梯輩以及「第二半」馬克思主義其他英雄們，不能瞭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順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鬥爭，而且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夠如何搶過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頁）。

我請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我着重指出這一點而要這樣一些人注意，這些人還在硬說列寧似乎祇是在帝國主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義戰爭以後，大概在一九一六年左右，才得出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不斷革命思想。這個引證是毫無疑義地說明這些人已深入迷途了。

####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特徵，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為下列五個基本要點：

(1)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那些比較現成形式已經存在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還在公開革命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並成熟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現成形式尚不存在或幾乎尚不存在時開始發生的。

(2) 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並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3)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却祇是無產階級革命底開始，而政權則被利用為改造舊經濟並組織新經濟的槓桿。

(4) 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執掌政權，所以它無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把所有一切種種剝削者集團都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並使全體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底領袖——無產者階級——去執掌政權，所以它必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以新的代替之。

(5) 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若干長久時期內把千百萬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周圍，這

正因爲這些羣衆是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它想要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它就能夠而且應當使這些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聯盟，這正因爲他們都是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列寧說：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內部，就已有新經濟組織逐漸形成起來，而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掃除、摒除、破壞舊社會所有一切羈絆。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一完成這個任務，它就已完成它所應當做的一切：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轉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則它由舊時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也就越困難。這裏除破壞任務而外，更加上一種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列寧繼續說：

「如果俄國革命那經過一九〇五年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不是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已創立了蘇維埃，那他們在十月間就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了，因爲在當時，成功只是依靠於那包括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已有現成的組織形式爲轉移。蘇維埃就成了這個現成形式，而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遇着的那些燦爛的成功和全盤的凱旋進展，因爲新政權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須頒佈幾道法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的胚胎狀態中變成爲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的法定形式——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見同上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兩個極困難的任務，而解決這兩個任務的方法，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像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過的那種凱旋進展的」（見同上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資本主義這些最發展的形式在實質上也祇包括着一小部分工業上層，却還絕對很少涉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最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爲一個個巨大機器，變成爲使幾萬萬人都按照一個計劃而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放在我們肩上的宏偉組織任務。據現時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無論如何都不許用高呼「烏拉」來解決，如我們從前得以解決國內戰爭任務那樣」（見同上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極大困難……就是國際問題。如果我們很容易就打破了克倫斯基匪股，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在本國創立了政權，如果我們毫未費力就得到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得到了所有這一切，那就只是因爲當時徵倖湊成的條件，曾在一個短時間內給我們撐開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是具有全部資本勢力的，是具有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的——而這種軍事技術乃是國際資本底真實力量 and 真實堡壘，——它是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的，這既是由於它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由它所代表的那個資本主義階級底經濟利益，——其所以不能，是由於商業聯繫，由於國際財政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裏就有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困難，就有它所應解決的最大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引起國際革命」（見同上第三一七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沒有強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是否可以實現這種根本改造資產階級舊制度的事業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為可用和平方式，在那適應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中來實現這樣的革命，——那就或是神經錯亂而喪失人類常態意識，或是粗暴而公開背叛無產階級革命。

這個原理之所以應用更力更鄭重指出，尤其是因為在現時，無產階級革命，暫且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這個國家是被那些仇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讓大多數居民，在保存着私有制度的情形下，即保存着資本政權和資本壓迫的情形下，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黨吧，——只有在那時候，無產階級黨才能夠，才應當奪取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讓革命無產階級去推翻資產階級，打破資本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吧，——那時候，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就能以取償於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迅速取得這些羣衆底同情和擁護」（見同上）。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列寧繼續說：

「無產階級爲要把大多數居民奪到自己方面來，第一，它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它就應當粉碎舊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它就一舉而打破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者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信以及影響；第三，它就應當用革命手段，以取償於剝削者來實現那些非無產者勞動羣衆底經濟需要，以便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特徵，就是如此。

既是這樣，既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如何呢？

請看列寧所給的最一般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吧：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那已獲得勝利的已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以反對那雖已被打敗，但未被消滅，未嘗絕跡，未嘗停止其反抗的資產階級，反對那更加強其反抗的資產階級」（見同上第三二一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全民公選」政權、「非階級」政權混爲一談時說道：

「那已奪得政治統治的階級，是在它深知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而奪得這個統治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底內容。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它獨自奪取政權，而不用什麼「全民的、全民公選的、全民尊崇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時，這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才有意思」（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這並不是說，一階級底政權，即無產階級底政權，這不和其他階級瓜分這個政權，而且不能和其他

階級瓜分這個政權的階級底政權，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竟不需要其他階級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來幫助，竟不需要與這些羣衆結成聯盟。恰巧相反。這個政權，一階級底政權，祇有經過無產階級與各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首先是與農民勞動羣衆間的特式聯盟，才能奠定並貫徹到底。

這個特式聯盟究竟是什麼呢，其內容何在呢？這個與其他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羣衆間的聯盟，一般是「否和一階級專政思想相矛盾呢？」

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國家底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是不和其他黨去瓜分領導，而且不能和其他黨去瓜分領導的。

你們由此可見，這裏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者先鋒隊——與那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間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這是反資本的聯盟，這是以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為目標的聯盟，這是以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聯盟。這是特種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環境，即猛烈國內戰爭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堅決擁護者與其動搖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堅決擁護者與「中立者」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由鬥爭協定變為中立協定）；這些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精神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間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加米涅夫在他某一個指示報告中反對這樣瞭解無產階級專政時說道：

「專政不是 \* 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

我認爲，在這裏，加米涅夫首先就是指我所著小冊子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裏的一段話而言，該段原文如下：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那用『老練戰略家』精敏手腕來『機巧』『挑選出來』並『合理憑藉於』某些居民階層的簡單政府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爲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爲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爲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爲它是和列寧所給的上述定義完全相符的。

我斷定：加米涅夫這樣絕對肯定地宣稱「專政不是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乃是和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論毫不相干的。

我斷定：祇有那不懂結合思想、不懂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不懂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意義的人，才能這樣說。

祇有那不懂下述列寧提綱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國家裏還沒有到來時，祇有與農民協定 \*，才能夠挽救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祇有那不懂得列寧下述原理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 \* 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鎮壓剝削者時說道：

「專政底科學概念，並不是別的，而正是無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條規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永遠記着)無所限制的，憑藉於強力而不是憑藉於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任何已獲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是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頁和第四三六頁)。

可是，專政固然非有強力不可，但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強力。

列寧說：

「專政固然非有強力不可，但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強力，它並且是比以前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只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而且甚至於不是以強力為主要點。這個革命強力的底經濟基礎，它能生存並達到成功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那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至三三六頁)……。「它(即專政。——「約、斯大林註」)那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這先進部隊底先鋒隊，這先進部隊底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它的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那種把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全體組成員都成為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並不是一下子就可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這既因為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事情，又因為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再則因為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

克服那種習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和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巨大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就說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見同上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特徵，就是如此。

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三個基本方面：

（1）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來保衛國家，來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者間的聯繫，來保證世界各國革命底發展和勝利。

（2）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來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來吸收這些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來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領導。

（3）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來保證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所有這三方面底合一。無論其中那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特徵，反轉來說，只要缺少其中某一方面，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復成爲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那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危險。祇有把所有這三方面都總共拿來，才能給我們以完備而週到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其各個時期、各種特別形式、各種不同工作方法。在國內戰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強力方面。可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進行任何建設工作。如果不進行建設工作，那就沒有可能進行國內戰爭。反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却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者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制等等。可是，從這裏同樣也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期，專政底強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現時，在建設時期中，鎮壓機關、軍隊

以及其他組織，也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是同樣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專政就沒有可能進行。有若干保證的建設工作。不要忘記，革命暫且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則也就會有武裝干涉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一切結果。

##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我在上文裏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從其階級內容方面，從其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從其應在整個歷史時期——即所謂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實現的破壞任務和創造任務方面，談論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現在就要從無產階級專政底結構方面，從其「機構」方面，從「引帶」、「槓桿」、「指引力量」底作用和意義方面，來說說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引帶」、「槓桿」、「指引力量」總和起來就構成「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寧)，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助於它們來實現的。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引帶」或「槓桿」是什麼呢？這個「指引力量」是什麼呢？這些東西為什麼需要呢？

槓桿或引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織，那就沒有可能實現專政。

指引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些引帶，這些槓桿，這個指引力量，其所以為無產階級所必要，就是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則無

產階級在其爭取勝利的鬥爭中，在那有組織有武裝的資本面前，就會成爲手無寸鐵的軍隊。這些組織所以爲無產階級所必要，就是因爲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則無產階級在其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鬥爭中，在其爲鞏固自己政權而鬥爭中，在其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中，就會必遭失敗。這些組織底一貫幫助和先鋒隊底指引力量所以必要，就是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職工會及其在中心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組織。它們把所有各業工人都聯合起來。這不是黨組織。職工會可以稱爲包括我國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全體組成員的組織。它們是共產主義學校。它們從自己隊伍中提拔優秀份子來担任一切管理部門方面的領導工作。它們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它們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心和各地的許許多多的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國家組織，更加上無數自動組織起來的勞動者羣衆團體，這些團體環繞着這些組織，並把這些組織與居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鄉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種種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就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組織，這羣衆組織把勞動者聯合起來，首先把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而然後就逐漸把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時期，這種組織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便利

着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的聯繫，並造成可能來把農民羣衆引入社會主義建設底軌道。

第四，這就是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組織，但它是很接近於黨的。其任務就在於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年輕後輩。它以年輕後備人材供給無產階級在所有一切管理工作部門方面的其他一切羣衆組織。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進行廣濶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已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這就是無產階級底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黨底力量，就在於它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吸入自身中來。黨底使命，就在於統一無產階級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羣衆組織底工作，並把它們的行動指向於一個目標，指向於解放無產階級的目標。而把它們統一起來並指向於一個目標，却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否則無法保證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因為否則無法領導無產階級羣衆去爲政權而鬥爭，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可是，能統一並指引無產階級各羣衆組織底工作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黨。只有無產階級底黨，只有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爲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基本領導者的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這些份子是与無產階級各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很時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爲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所以它就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爲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就是這樣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種種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爲把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在生產方面把黨和本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在國家方面把黨和勞動者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是農民意羣衆組織，它首先就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和農民羣衆聯繫起來；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其使命就是幫助無產階級先鋒隊按社會主義精神來教育新起後輩並培養年輕後備人材；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指引力量，其使命就是領導這所有一切羣衆組織，——專政「機構」底情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情景，大體上就是如此。

沒有黨爲基本領導力量，就不能有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樣，用列寧底話來表示，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潤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經過這個機關，黨就和本階級以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領導之下，就實現着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二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夠或應當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羣衆組織。黨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但它並不是直接來實現這個專政，而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引帶」，就會不能有若何堅固的專政。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把先進階級先鋒隊和這階級羣衆；把這階級和勞動羣衆連結起來的「引帶」，那就不能實行專政」……「黨是把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吸入自身中來的，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如果没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就不能實現專政，那就不能執行國家職能。而爲要實現這

些職能，就必須經過\*一些也是新式特別機關：經過\*蘇維埃機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五頁和第六四頁）。

例如，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是黨領導作用底最高表現，這件事實就是在我們這裏，我們的蘇維埃組織或其他羣衆組織，除非有黨底領導指示，就不解決任何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專政」，是無產階級底黨——無產階級底基本領導力量——「專政」。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會如何說明這個問題吧：

「田涅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他說他所瞭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完全和我們所瞭解的一樣的。他說，我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正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當時，工人羣衆是遭受着不斷剝削而不能發展其人類才能的，——工人政黨底最大特點，正在於它們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包含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真正覺悟工人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裏都祇佔全體工人少數一樣。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能夠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而如果田涅爾同志說他自己已黨底敵人，但同時又主張由那少數最有組織最革命的工人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有什麼差別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但這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黨領導作用（黨「專政」）間畫上一個等號，可以把前者與後者看作同一個東西，可以用後者去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當然不可以。例如蘇林就說過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五頁）。這個提綱顯然是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如果仍然站在列寧主義立場上，那是否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說法是正確的呢？不是的，是不可能的。而原因就是如下。

第一。在上面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演說中所引來的一段話裏，列寧並沒有把黨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他祇是說，「祇有有覺悟的少數（即黨。——「約、斯大林註」）能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這還不是說「完全」。我們往往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概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按其範圍說來是和民族問題相等，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是同一個東西。不必證明：民族問題按其範圍說來是比農民問題更廣泛更豐富的。同樣，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也要這樣說。如果黨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黨「專政」，那這還不是說，「黨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同一個東西，前者按其範圍說來是和後者相等。不必證明：無產階級專政按其範圍說來是比黨領導作用更廣泛更豐富的。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其他什麼專政。誰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無論那一個重要決議，都非有黨底領導指示不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只是黨底領導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底領導指示和無



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黨底領導指示再加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對於這些指示的實現，再加上居民對於這些指示的實施。由此可見，這裏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的，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很重要的因素。於是，處在黨底領導指示與這些指示底實施中間的，就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本階級底意志和行動，本階級有決心（或不願意）擁護這些指示，本階級善於（或不善於）實行這些指示，本階級善於（或不善於）正確依照環境要求來實行這些指示。顯然不必證明：担承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及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忽視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底指示來代替本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那已獲得勝利的已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階級鬥爭能表現於什麼呢？它能表現於無產階級爲反對那已被推翻的資產階級之襲擊，或爲反對外國資產階級之武裝干涉而進行的許多武裝發動。在無產階級政權尙未鞏固時，它能表現於國內戰爭。在政權已經鞏固後，它能表現於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廣大的組織的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羣衆來參加事業。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人物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黨，僅僅一個黨，竟無須本階級贊助而只靠自己本身力量來進行所有這些發動的事情，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黨通常祇是領導這些發動，而它所以能領導這些發動，祇是由於它爲本階級所贊助。因爲，黨不能包括本階級，不能代替本階級。因爲黨無論有如何重要的領導的作用，都始終是本階級底一部分。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本階級。

第四。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底直接執政的先鋒隊，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着政權，黨管理着國家。但這還不是說：黨是越過國家政權，無須國家政權而實現着

無產階級專政；黨是越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管理着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拿來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同一個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它不是國家政權，它不能被看作是和國家政權同一個東西。列寧說：「我們既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上層』與黨『上層』融成一片；他們現在我國是融成一片的，而且將來也會是如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並不是想以此而說：我們所有一切蘇維埃機關，例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黨能被看作是和國家政權同一個東西。列寧會屢次說「蘇維埃系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和第一五頁）；但他從來沒有說黨是國家政權，黨和蘇維埃是同一個東西。具有數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數百萬人——黨員和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心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黨不能夠而且不應當用自己來代替它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波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黨底全部工作，都是經過\*那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二頁和第一九三頁）。專政是「須經過\*蘇維埃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四頁）。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是一個國家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本身是一定包含着強力概念的。如果按專政這個名詞底本來意義來瞭解專政，那末沒有強力，就不會有專政。列寧所給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就是「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說對於無產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者階級關係上的黨專政，並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那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導師，而且應當是對本階級採用強力的某種國家政權。因此，誰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誰就是默然認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強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是完全和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而工人階級底信任又不是可以用強力取得的，——用強力是祇能喪失工人階級底信任的，——而是要黨有正確理論，要黨有正確政策，要黨對工人階級忠誠，要黨與工人階級羣衆有聯繫，要黨有決心並善於說服羣衆來相信其口號正確，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一切當中就得出什麼結論呢？

而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

(1) 列寧使用黨專政這個字，並不是指專政這個字底原來意義（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言，而是指假借意義而言，指領導而言。

(2) 誰把黨底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誰就是曲解列寧，謬將那以強力對付整個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

(3) 誰把實際上非黨所有的那些以強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是違背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黨和無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起碼要求。

這樣，我們就已直接說到黨和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工人階級中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按列寧所給的定義，這種相互關係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見列寧全集，

\* 着重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 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當仔細諦聽羣衆底呼聲，它應當注意看待羣衆底革命本能，它應當研究羣衆底鬥爭實踐並根據這點來審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它不僅應當教導羣衆，而且應當向羣衆領教。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當一天一天爲自己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它應當以其政策和工作來爲自己造成羣衆底擁護，它應當不是命令羣衆，而首先是應當說服羣衆，使羣衆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認識黨政策是正確的，因此，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導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就是破壞「相互信任」，就是既瓦解階級紀律，又瓦解黨紀律。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最完全的最奮勇的擁護\*，就是說，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誠正直的、舍己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夠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份子最完全的最奮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支持至今已有一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支持至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下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乃是最可怕的勢力。如果沒有鐵的在鬥爭中鍛練出來的黨，如果沒有爲本階級裏全體忠誠正直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善於注視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可是，黨是怎樣取得本階級這種信任和擁護的呢？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它是在什麼基礎上長成的呢？

請看列寧會如何說明這點吧：

「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它的舍己犧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他們融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由於它那政治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真正能成爲先進階級——這先進階級應推倒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政黨的革命黨內的紀律，就不能實現。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那些要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一定會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的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却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

「爲要獲得戰勝資本主義的成功，就要在領導黨，即共產黨，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與羣衆，即全體勞動者被剝削者之間，存在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它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它把革命階級所有一切優秀代表都包括在自身以內，如果它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革命鬥爭經驗所教育所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與本階級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而經過這個階級又與全體被剝削者羣衆聯繫起來，並享有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最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一切勢力。」

其次：

「爲要獲得戰勝資本主義的成功，就要在領導黨，即共產黨，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與羣衆，即全體勞動者被剝削者之間，存在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它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它把革命階級所有一切優秀代表都包括在自身以內，如果它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革命鬥爭經驗所教育所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與本階級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而經過這個階級又與全體被剝削者羣衆聯繫起來，並享有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最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一切勢力。」

另一方面，只有在這樣的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展開其革命進攻底全部威力，使那已被資本主義所腐化的很少數工人貴族、舊有工會領袖以及合作社領袖等方面必不可免的冷淡以及其中一部分的反抗完全不能發生作用，——只有在這樣的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展開其全部力量，而它這種力量，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所致，是比它在居民總數中所佔份額更大得不可計量的。」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些引證裏就得出結論如下：

（1）黨底威信和工人階級中間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並不是建築在恐嚇或黨底「無限」權力上，而是建築在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工人階級對黨的擁護上；

（2）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不是一下子就可得到的，不是由於以強力對付工人階級，而是由於黨在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羣衆中的長期工作，由於黨底正確政策，由於黨善於使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政策是正確的，由於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並善於引導工人階級羣衆；

(3) 如果沒有黨那種爲羣衆底鬥爭經驗所鞏固的正確政策，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任，那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4) 如果黨享有本階級底信任，如果黨底領導是真正的領導，那就不可把黨及其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因爲如果沒有那享有工人階級信任的黨底領導（黨「專政」），那就不能有若何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黨底威信和鐵的紀律，就或者是一句空話，或者是誇張和冒險。

決不可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起來。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爲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這裏所說的，是若何堅固的完全的專政，而不是例如巴黎公社那樣不完全不堅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站在一條工作路線上，是按照一個方向行動着的。

列寧說：

「只要提出問題來發問『黨底專政抑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領袖底黨）抑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就足以證明發問者思想是糊塗到極端不可思議而無可救藥的地步。大家知道，羣衆是分成爲幾個階級的，通常和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各現代文明國內，各階級是由各政黨領導的；各政黨通常都是由一些比較固定的最有威信的、最有影響的、最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擔任最負責職務的、稱爲領袖的人所管理的。如果：竟一般把羣衆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七頁和第一八八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個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的，就是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在黨與本階級間是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它是從這樣一個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依然是常態的，依然是在「互相信任」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本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本階級間的「互相信任」關係被違背了，那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竟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本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基礎，違背「互相信任」基礎，那又將怎樣呢？這種情形，一般是否可能呢？是的，是可能的。這種情形是可能的：

(1) 如果黨竟開始把自己在羣衆中的威信不建築在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上，而建築在自己的「無限」權力上；

(2) 如果黨底政策顯然是不對的，而它又不願加以修改並糾正自己的錯誤；

(3) 如果政策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羣衆還沒有準備就緒來領會這個政策，而黨又不願意或不善於等待一下，讓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歷史上，有過許多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所以倒塌而消散了，就是因為它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且把所有這些條件都違背了。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說法，只有在下述情況中，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

(1) 如果把對於工人階級關係上的黨專政，不是瞭解爲原來意義上的專政（「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是瞭解爲黨底領導，而這個領導，正如列寧所瞭解一樣，是絕對不容許以強力對付整個階級，對付它的多數的；



(2) 如果黨有根據來做本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就是說，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是適合於本階級利益的；

(3) 如果本階級，如果本階級底多數，都接受這個政策，領會這個政策，並由於黨底工作而確信這個政策是正確的，信任黨並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本階級間的衝突，引起它們彼此的分裂，引起它們彼此的對立。是否可以由強迫來使本階級接受黨底領導呢？不是的，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若何長久的。如果黨始終仍然是無產階級底黨，那它就應當知道，它首先和主要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導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裏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够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能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做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底導師、領導者、領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是不正確的，如果黨底政策是與本階級底利益相衝突的，那是否可以認為它是本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不可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仍然做領導者，它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並糾正這個錯誤。為證實這個原理起見，或可從我們黨歷史中援引這樣一件事實，如廢除餘糧收集制時期，當時工農羣衆是顯然不滿意於我們的政策的，當時黨就實行，公開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曾如何談論關於廢除餘糧收集

制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吧：

「我們不應當力謀隱瞞什麼，而應當爽直說：農民是不滿意於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現有的相互關係形式的，他們是不願意這個相互關係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這是不容置辯的。他們這種意志已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分勞動居民底意志。我們應當顧及這一點，而且我們是充分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夠爽直說：讓我們來修改我們對農民的政策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竟因本階級在政治上落後——假定說——而還沒有得到本階級底信任和擁護，如果黨竟因事變尚未成熟——假定說——而還未能說服本階級來確信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那末是否可以認為黨只要以自己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政策為理由，就應當擔起提倡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鬥呢？不是的，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它就應當善於等待一下，應當說服羣衆來確信黨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黨在各革命階級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武裝起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則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一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爭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或是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能援助其敵人的立場時，却叫先鋒隊單獨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者和被資本壓迫者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那末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大家知道，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寧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武裝起義的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而正因爲它依照列寧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它就在武裝起義中取得了勝利。

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如此。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本階級間的正確關係又不被違背，那末什麼是領導呢？

在這種條件下的領導，就是善於說服羣衆來相信黨政策是正確的，提出並實行這樣一些口號，這些口號能把羣衆引到黨底立場上來，使他們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認識黨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水平，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擁護，使羣衆有進行決鬥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本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獲得了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空前勝利以後，給職工會規定「承認專政」爲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爲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份子，要善於在他們裏面做工作，而不是臆造一些幼稚的「左派」口號去和他們隔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七

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直至最後一個為止，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絲毫也不是。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期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本階級多數底善意中立。否則那關於爭取工人階級多數到黨方面來是勝利革命必要條件的列寧原理，就會沒有任何意思了。

好吧，而如果少數不願意，如果少數不同意於自願服從多數底意志，那又應怎樣對待這少數呢？黨既已得到多數底信任，它是否可以，是否應當強迫少數服從多數底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黨用以影響羣衆的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絕對排斥，而是預定要採用強迫手段，如果這強迫手段是有工人階級多數對於黨的信任和擁護爲其基礎的，如果這強迫手段是在已說服多數以後來對少數採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職工會問題辯論時期對於這一點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爲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它既不能說服多數來相信它自己立場正確，既已喪失多數底信任，却竟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竟堅持要「振刷」那些擁有多數信任的人們。

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問題的演說內會怎樣說吧：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須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竟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梭夫在這裏所表明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

陷於政治破產了。我們應當首先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都應當首先說服，然後才強迫。<sup>\*</sup>我們未能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違背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所著小冊子論職工會裏也是如此說：

「只有當我們首先已給強迫手段奠定說服基礎時，我們才正確而有成效地運用了強迫手段」（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四頁）。

而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拿黨來說，那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整個階級來說，那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則在工人階級隊伍內就會有分裂、渙散和解體。

黨的正確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如此。

任何其他對於領導的見解，都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說它是什麼都可以，——只是波爾什維主義，只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間，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存在着正確相互關係，那就不可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專政」）對立起來。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尤其不可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蘇林根據不能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就作出了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可是，列寧不僅說這樣對立是不可容許的。他同時還說把「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豈不是要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專政與

<sup>\*</sup>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循着這條道路走去，那我們就會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領袖專政」。而須知這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的政策，本來正是引導到這種齟齬地步的：

季諾維也夫對於這問題的見解是怎樣呢？

季諾維也夫在實質上也與蘇林抱着同一觀點，就是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一點分別，就是蘇林說得更直爽更明顯，而季諾維也夫却在那裏「打圈子」。只要拿季諾維也夫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下述一段來看，就可相信這點：

「按其階級內容看來，季諾維也夫說，——蘇聯現存的制度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璜機是怎樣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在我們這裏，是黨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形式是怎樣呢？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對於整個工人階級關係上的黨專政瞭解為黨領導的話。可是怎樣可以根據這一點而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專政」間，畫上一個等號呢？列寧會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乃是勞動羣衆在黨領導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究竟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曾在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黨「專政」與蘇維埃制度間畫上一個等號，如現在季諾維也夫所作一樣呢？不僅只是黨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領導（「專政」）也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不相矛盾的。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那豈不是要根據這一點而宣稱我們的國家既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也就是說，黨專政國家，也就是說，領袖專政國家呢？而須知季諾維也夫所暗中偷摸實行的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一個東西的「原則」，正是引導到這種愚蠢地步的。

列寧在其無數著作中會稍稍涉及黨專政問題的地方，我只找到五處。

第一個地方，就是他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的論戰；他在這裏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如你們所已經聽到一樣——建立社會黨人統一戰線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地上的，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因為這是在幾十年內奪得整個工廠產業無產階級先鋒隊地位的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因戰勝高爾察克而告工農書；他在這裏說：

「人們（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有他們大家，甚至其中的「左派」）以「一黨專政」——波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專政——作為稻草人來恐嚇農民。從高爾察克實例中，農民已學會不怕稻草人了。或者是地主資本家專政（即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與田涅爾論戰時的演說。這篇演說，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

第四個地方，就是在幼稚病一書裏的幾行文字。這幾行文字，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

第五個地方，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大綱底草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存第三冊裏發表，在這裏，有一個小題目叫做「黨專政」（見列寧文存，第三冊，第四九七頁）。

必須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的兩個地方，即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是着重指明這個公式具有不確切的假借的意思。

同樣必須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列寧把對於工人階級關係上的「黨專政」，並不是瞭解爲此字本來意義的專政（「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是瞭解爲黨底領導。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其任何一個解釋或祇是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作用的基本著作或次要著作中，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每頁每行，都是大聲反對這個公式的（請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政黨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專政的；而這些提綱是在列寧直接領導下規定的，並且列寧在其多次演說中屢次引證過這些提綱，認爲它們是正確規定黨任務及其作用的模範。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就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爲「黨專政」這個公式是無可非難的精確的公式，因此，這個公式在列寧著作中是用得極少的，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在少數地方，當列寧與敵人論戰而不得不說黨專政時，他通常都是說「一黨專政」，就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和其他黨瓜分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對於工人階級關係上的黨專政，應當瞭解爲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爲須要給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以科學定義時，他絕對只是說黨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地方有幾千處）；



(四)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沒有「猜到」要把「黨專政」這個公式寫入關於黨作用的基本決議，——我  
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

(五) 從列寧主義觀點上看來，則那些將黨「專政」，因而也就是將「領袖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  
作同一個東西，或企圖將這些東西看作同一個東西的人們是不對的，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他們這樣就  
違背了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底條件。

我還不說，把「黨專政」這個公式拿來而不加以上述附帶條件，就能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  
險和政治缺憾。把這個公式拿來而不加以附帶條件，那就是等於：

(一) 向非黨員羣衆說：切勿辯駁呀，切勿議論呀，因為黨是無所不能的，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專  
政；

(二) 向黨幹部說：勇敢些幹吧，強硬些逼迫吧，不聽聽非黨員羣衆底呼聲也是可以的，因為在我們  
這裏是黨專政；

(三) 向黨上層說：可以稍許自滿自足，或許還可以稍許驕傲，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專政，「因而」  
也就是領袖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在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時期，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此時，黨有決  
心去仔細聽聽羣衆底呼聲，這對於我們是有特別價值的；此時，體貼羣衆要求，就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  
此時，黨必須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此時，驕傲的危險，就是黨在正確領導羣衆方  
面所遇到的最嚴重危險之一。

不可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至理名言：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約·斯大林註」——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是正確代

表人民意識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於是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代表人民意識」，這正是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執行其為基本領導力量的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四月，第一版），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問題有兩個措辭。第一個措辭是：

「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們底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為出發點，因為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的跳躍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見關於列寧主義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不需要什麼解釋。這個措辭底目標，是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的，因為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如果沒有在其他各國內同時勝利的革命，則無產階級要在一個國家內奪得政權，就是空想。

可是，在關於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裏，還有第二個措辭。那裏說\*：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待解決。如果沒有幾個先進國內無產者們共同努力，那是否可能解決這個任務，是否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呢？不是的，是不可能的。爲要推翻資產階級，只須有一國底努力就夠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革命底歷史已向我們證明。爲要獲得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僅是一國底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底努力，却就不夠了，——爲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內無產者們共同努力」（見關於列寧主義基礎第一版）。

這第二個措辭底目標，曾經是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者底論調的，是反對托洛茨基份子的，因爲托洛茨基份子說過，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當在其他國家內還沒有勝利時，是不能「抵擋那保守主義的歐洲」的。

在這個限度內，——但只是在這個限度內，——這個措辭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而且它毫無疑義是貢獻了相當益處的。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已在黨內被克服時，當在眼前已擺着一個新問題，已擺着關於有可能無須外援而只用我們本國力量來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時，——第二個措辭却已經顯然不夠，於是也就不正確了。

\* 指該小冊子第一版而言。

這措辭底缺點何在呢？

它的缺點就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關於有沒有可能用一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是應當給以肯定回答的；而另一個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是可以認爲自己無須革命在其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就已完全有保障，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因而也就是免除舊制度復辟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是應當給以否定回答的。我還不說，這個措辭可以使人這樣設想，以爲用一國力量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正確的。

根據這一點，我就在我所著小冊子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糾正了這個措辭，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解釋成爲「有免除舊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這只有經過「幾國無產者們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第二，是根據列寧所著小冊子論合作制來宣佈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我們具有爲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這個新措辭，也就是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波）底任務這個著名決議底基礎，這次黨代表會議，曾因注意到資本主義穩定而考察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一九二五年四月），並認爲用我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這個新措辭，同時也是我所著小冊子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閉會後立刻出版的。

\* 這個新措辭後來已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以後各版內代替了舊措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提法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國有兩批矛盾。一批矛盾是內部的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此地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而言。——「約、斯大林註」）。另一批矛盾，則是外部的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此地是指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而言。——「約、斯大林註」）。：。」「第一批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努力來克服的，第二批矛盾則要有幾國無產者們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批矛盾混爲一談，誰就犯了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或是糊塗蟲，或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見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

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協同農民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去建設它」：因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一切必要條件來克服所有一切種種內部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用自己本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見同上）。

而關於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問題，在這裏則說：

「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有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也就是有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爲若何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嚴重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援助下，才有可能。因此，各國工人所給與我國革命的援助，而尤其是這些工人卽令是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乃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已勝利國免除那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乃是保證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見同上）。

看來是很明白了。

大家知道，在我所著小冊子問題與回答（一九二五年六月）內和在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

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以同樣精神解釋這個問題的。

事實就是如此。

我認爲這些事實是大家和每個人都知道的，連季諾維也夫也是知道的。

如果現時在黨內思想鬥爭以後幾乎已達兩年並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通過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季諾維也夫竟認爲可以在他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結論時把斯大林於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小冊子內的陳舊的完全不充分的措辭拖出來，作爲解決這已經解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礎，——那末季諾維也夫這種特殊的姿態，就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向前進展以後而把它拉轉去，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以後而迴避這個決議，——這就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離開列寧道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可能呢？

這就是說，有可能用我國內部力量來解決工農矛盾，有可能由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並在他國無產者們同情與資助下，但是無須他國無產階級革命預先勝利，而就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種可能，則建設社會主義就是沒有前途而建設，就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誰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誰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後不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礙，誰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種可能，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什麼是除非有他國革命勝利，則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完全的最終的勝利就不可能呢？

這就是說，除非有至少幾國革命勝利，就不能有完全保障以免除武裝干涉，因而也就是說——以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否認這一個不容置辯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裏生活着，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系統裏生活着，而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其最後結局，不是這個獲得勝利，就是那個獲得勝利。而當這個結局還未到來時，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間的許多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只要是它願意實行統治並將要實行統治，它就還應當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的，但終究是毫無疑義的，不容置辯的相當的均勢。這是否長久——我不知道，而且我認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此在我們方面是須要極其謹慎的。我們政策第一個訓條，由我們政府在一年以來工作中所得出來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就是要時刻警戒着，要記着，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人們、階級、政府所包圍着的。必須記着，我們所能遇到的任何侵襲，時時都是逼近得聞不容髮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季諾維也夫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觀點是怎樣呢？

請聽呵：

「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至少應當是瞭解爲：（第一）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第二）取消一階級專政，此地是說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國內問題是怎樣擺着，就要分清兩件事情：（第一）有保證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

——這樣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當然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的；（第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那就是說明，季諾維也夫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最終勝利不是瞭解爲有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的保障，而是瞭解爲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而季諾維也夫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則瞭解爲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建設是不能夠而且不應當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的。得過且過的、茫無前途的建設，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底立場，就是如此。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你們看季諾維也夫竟說出怎樣荒謬的議論。

可是，須知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呵！

而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州黨代表會議上，竟講出什麼話。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既然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所包圍，我們能不能在這種條件下面，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且還是單獨的，暫且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我們將建成這個社會主義」（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麼？難道這裏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麼？」\*。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這樣，據季諾維也夫說來，承認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就是站在民族狹隘性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却是站在國際主義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是不是值得爲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而進行鬥爭呢？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這種勝利沒有可能麼？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投降，——你們看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是得出怎樣的結論。而這種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荒謬議論，季諾維也夫却向我們捧出來作爲「國際主義」，作爲「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

我斷定說：季諾維也夫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什維克蘇漢諾夫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言論吧。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還在一九一五年八月，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就已說過：

「經濟的政治的發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得出結論：社會主義首先在不多的或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勝利，是可能的。這個國家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列寧那句由我加上着重點的話「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已獲得勝利國家底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而「組織社會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主義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顯然用不着證明：列寧這個明顯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解釋的。否則列寧號召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就會令人莫解了。

由此可見，列寧這個明顯原理是與季諾維也夫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糊塗「原理」——說我們能「在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相差如天壤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說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經過奪取政權經驗以後，他的觀點已有改變吧？我們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吧。

列寧說：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這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這無產階級具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必要的一切，以便經過合作社，而且只是經過合作社，——我們從前會鄙視合作社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社，——這難道不是為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成，然而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擁有為建成這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吧。

請你們把列寧這個典型原理與季諾維也夫那個用以反駁雅可福烈夫的反列寧主義論調比較一下，那你們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們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只是重復了列寧關於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的話，而季諾維也夫既然起來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可福烈夫，那他就是離開列寧而站上了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站上了那認為在我們國家裏因其技術落後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

所不知道的，只是如果我們沒有打算建成社會主義，那我們究竟爲着什麼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了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政權的，你們看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是得出怎樣的結論。

其次，我斷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也夫是去反對了我們黨底明確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波）因共產國際執委會擴大會議而具有的任務這個著名決議裏明文規定了的。

讓我們來看這個決議吧。在這個決議裏，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問題，曾規定如下：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體系之存在，就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經濟壓迫形式、武裝干涉、復辟之經常威脅。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乃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底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的保障\*。」。「列寧主義教導着：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說有免除資產階級關係復辟的完全保障\*，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裏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除非有那在技術上經濟上更發展的國家方面底「國家幫助」（托洛茨基），就沒有可能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見決議）。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你們由此可見，決議是把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解釋爲有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的完全保障的，——這是與季諾維也夫在其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的。

你們由此可見，決議是認爲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有可能無須那在技術上經濟上更發展的國家方面底「國家幫助」，而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這是與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結論時，在反駁雅可福烈夫中的反面斷語完全相反的。

這不叫作季諾維也夫反對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的鬥爭而叫作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黨的決議也含有錯誤。一般說來，可以假定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也夫認爲該決議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波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指出這一點。但不知季諾維也夫因爲什麼原故而這樣做。他寧願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襲擊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同時却連一個字也不提起這個決議，對決議不作任何公開批評。季諾維也夫大概是以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却只有一個，就是要「改善」決議和「稍微」修改修改列寧。顯然用不着證明：季諾維也夫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也夫底錯誤是從何而來呢？這錯誤底根源何在呢？

據我看來，這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也夫深信我國技術落後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深信無產階級因我國技術落後而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在四月黨代表會議以前的黨中央一次會議上，試圖提出這個論據。可是，他們曾因受到反駁而不得不退却，竟在表面上服從那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季諾維也夫雖曾在表面上服從這個觀點，但時時都是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看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在其致列寧格拉州黨代表會議覆信中

會如何說到聯共（波）中央內這次「事件」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擁護一個觀點，就是以爲如果國際革命不來拯救我們，則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經濟落後而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認爲：我們不管我國技術落後並違反着這種技術落後，而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它。我們認爲：這個建設之進行，當然是比在世界勝利條件下緩慢得多，但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將繼續前進。我們同樣又認爲：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工人階級以及跟着我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底內部力量。我們認爲這個觀點是離開列寧主義立場的」（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時出現於報章的。季諾維也夫當然會有可能就在代大會上發言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就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竟沒有找到證據來駁斥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是出于偶然呢？我認爲這不是出于偶然。這個責備顯然是打中了目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緘默辦法來「回答了」這個責備，正是因爲他們「無言可答」。

新反對派因人們責備季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而氣憤。可是，如果季諾維也夫在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已經討論整整一年以後，在季諾維也夫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所推翻（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在黨關於這個問題已有一定意見並已把這意見明文規定於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如果在所有這一切以後，而季諾維也夫却還是敢於在其所著列寧主義一書內（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言論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然後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復這種言論，——那末，季諾維也夫這樣頑強地固執地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是因爲季諾維也夫中了，無可救藥

地中了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的病毒，而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也夫是樂於把自己這種不相信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的。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如果說在這裏違反國際主義和違反國際革命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也夫，那豈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這「建設着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而是什麼呢？但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它是否能夠成為世界革命底真正根據地呢？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裏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份子，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裏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它是否能夠仍然是對於世界各國工人們的最大吸引中心，像它現在毫無疑義是這最大吸引中心一樣呢？我認為是不能夠的。但從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態度，結果就會使我國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資格，而使我國喪失這種資格，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麼。社會民主黨人老爺們會藉助於什麼來恐嚇工人，以便使工人離開我們呢？就是藉助於鼓吹「俄國人決不會幹出什麼事情來」。我們現在是藉助於什麼來打擊社會民主黨人，而吸引一批一批工人代表團到我們這裏來，並因而鞏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陣地呢？就是藉助於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既然如此，那末誰鼓吹着不相信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發展規模，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你們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底「國際主義」，是不比他那在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稍許好些的。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觀點估計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估計為「曲解列寧主義」，這是作得正確的。

##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

我認爲：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就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所以認爲這個錯誤是基本錯誤，是因爲新反對派其他一切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裏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在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方面的錯誤，在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方面的錯誤，在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本質問題方面的錯誤，在關於合作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作用問題方面的錯誤，在關於與富農鬥爭方法問題方面的錯誤，在關於中農底作用和比重問題方面的錯誤，——所有這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基本錯誤中，從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國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

什麼是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基本羣衆由於我國發展中某些條件而能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國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無產階級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反對派那些關於我國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就是默然從這兩個論據出發的，——至於反對派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這樣做，那都是一樣。

可以把蘇聯農民基本羣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麼？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會有以下兩個基本原理：

(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曾經過三次革命底教訓，曾協同無產階級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領得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

曾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領得土地，並因此而變成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自由，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力量」。

(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為一談。西方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我國，農業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因為，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之國有化這兩個原因，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在俄國，農業應按另一條道路發展，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列寧在其論合作制的論文中，已正確指出：在我們俄國，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就是說，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是在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將很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那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的道路」。

這兩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我認為，所有這兩個原理，對於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整個建設時期，都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

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下述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結合，關於把農民經濟歸併到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體系以內，關於無產階級應當協同農民基本羣衆走向社會主義，關於使千百



萬農民羣衆合作社化是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條件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這對於我們就等於社會主義發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的確，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可以而且應當按什麼道路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農戶來說，乃是小商品經濟。而小商品農民經濟又是什麼呢？這乃是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既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如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所發生一樣；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如在我們這裏，在我們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所應當發生一樣。

爲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其原因何在呢？

其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依賴於城市，依賴於工業，依賴於信貸制度，依賴於國內政權性質，最後，其原因還在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在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且是應當跟着城市走的。

農民經濟按資本主義道路去發展，就是經過農民最深刻分化——在一個極端上形成巨大的大地產，而在另一極端上則引起羣衆貧困化——去發展。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可避免的，因爲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於城市的，依賴於工業的，依賴於城市裏集中信貸的，依賴於政權性質的，而在城市裏統治一切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信貸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政權。

而在我們國家裏，城市既有完全另一種面貌，工業既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既是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既是全國通行的法律，——那末，農民經濟是否必須按這條道路去發展呢？當然不必按這條道路去發展。恰巧相反。正因爲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們城市裏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國民經濟一切命脈的無產階級，所以農民經濟就應當按另外一條道路去發

展，即按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去發展。

這是什麼道路呢？

這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合作制各方面羣衆合作化的道路，這就是把散漫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週圍的道路，這就是在農民當中培植集體原則——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戶所需要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而然後就是在農業生產方面——的道路。

而且愈往前去，則這條道路就愈成爲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中不可避免的道路，因爲，銷售方面的合作化，供給方面的合作化，最後，信貸和生產方面的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救廣大農民羣衆於貧窮破產境況的唯一手段。

有人說，我國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不能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但這並不是一種足以反對農民經濟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論據，如果已經證明農村是隨着城市走的，而在城市裏指揮一切的，却是社會主義工業。在十月革命時，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完全沒有想要在我國奠定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是消滅地主政權和結束戰爭，奠定和平。可是，他們當時終究是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而由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在當時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因爲在當時，我們黨能夠尋找，能夠找到一個把農民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全國共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於後者的標準，而這個標準就成爲對於農民可以接受而有利的。於是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就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把農民吸入這個建設軌道問題，也要這樣說。農民按其地位說來

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為除與無產階級結合以外，除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以外，除經過農民羣衆合作化而把農民經濟吸入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足以救農民於貧窮破產境况的道路。

爲什麼正是經過農民羣衆合作化呢？

因爲羣衆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這樣一個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業利益和國家對於這利益的審查監督結合起來的標準，能使這種利益服從於公共利益的標準」(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而有利的，這個標準保證無產階級以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正因爲農民利於經過合作制來銷售自己商品並供給自己經濟以機器，所以農民應當按羣衆合作化道路走去，而且一定會按這條道路走去。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領導下實行農戶羣衆合作化，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農民經濟離開那必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即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爲使農民經濟按新道路發展而奮鬥，爲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乃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決定得正確的，它說：

「農村裏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道路，就是在日益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國家信貸機關以及其他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作用的條件下，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入合作社組織中來，並保證這組織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同時利用、克服並排擠這組織裏的資本主義份子」(見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新反對派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它不相信農民能按這條新道路去發展，看不見或不懂得這條道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它所以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因為它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能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由此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就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就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多半是退却。

由此就誇大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份子底作用，並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各個槓桿（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底作用。

由此就不懂得我們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並對列寧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持懷疑態度。

由此就吹大農村中的分化，在富農面前張惶失措，輕視中農作用，企圖破壞黨關於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並一般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方面忽東忽西地亂撞。

由此就不懂得黨為吸收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和農業建設、來參加改善合作社和蘇維埃工作、來參加國家管理、來參加反官僚主義鬥爭、來參加力爭改善改造我們國家機關而進行的巨大工作，而這一巨大工作就是表明着新的發展階段，而且任何社會主義建設都非有這一工作不可。

由此就感覺沒有希望，並因在我國建設中看見困難而茫然無主，懷疑我國工業化底可能，悲觀式地胡說黨在蛻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們那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們這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如果從西方不能有革命及時跑來救急，那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就是如此，而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派的論調，但不知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它冒充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季諾維也夫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所有這些說法，當

然都是不對的。其實，新經濟政策乃是黨底這樣一個政策，這個政策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並計算到由社會主義成份戰勝資本主義成份。其實，新經濟政策只是以退却而開始了的，但它打算着在退却過程中實行重新佈置力量並舉行進攻。其實，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很有成效，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可是，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這個提綱底意思是怎樣呢？這個提綱是從什麼出發呢？

它是從一種不正確設想出發的，就是以為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是單純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復歸」過程。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懷疑我國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在富農面前張惶失措。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這樣匆忙抓住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謬訛數目字。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特別善於忘記中農是我國農業裏的中心人物。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輕視中農比重，並懷疑列寧合作制計劃。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論證」，為什麼新反對派不相信新的農村發展道路，不相信吸收農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其實，現在我國所發生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彼此鬥爭的矛盾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這無論對於城市，在這裏，國家工業是社會主義底基礎；無論對於農村，在這裏，那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的羣衆合作制是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環鉤，——都同樣是不容置辯的。

單純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不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國，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大工業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運輸業和信貸事業是由無產階級國家支配的。

分化是不能具有舊時那種範圍的，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羣衆，而富農則不能再有舊時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爲在我國，土地是已國有化了，土地是已被禁止買賣了，而我們的商業政策、信貸政策、賦稅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是以限制富農剝削趨勢、提高最廣大農民羣衆幸福以及剷除農村兩極對立現象爲目標的。我還不說，我們現在與富農的鬥爭，不僅是按着舊路線進行，即按着組織貧農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而且是按着新路線進行，即按着鞏固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羣衆聯盟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反對派不懂得按着這條路線去與富農作鬥爭的意思和意義，這件事實就是再次證實反對派是滾到舊的農村發展道路，滾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曾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曾日益磨滅」。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而且還援引列寧所著糧食稅，於是它就不相信有可能利用合作制作爲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環鉤。在這裏，反對派也犯了極粗鄙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在糧食稅寫就時，是充分而可令人滿意的，當時在我國還沒有已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爲我國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可是，這種解釋現在已經不充分而被歷史所超過了，因爲從那時起，時間已經改變了，社會主義工業在我國已經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育到當時所願意的那種程度，而合作制——它現在包括一千萬以上的社員——却已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了。

如果不如此來解釋，那又怎樣來解釋下述一件事實呢？這件事實就是列寧在糧食稅發表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已用另外一種看法去觀察合作制，認爲「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和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如果不如此來解釋這件事實，說正是因爲在這兩年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

有發育到應有程度，於是列寧就不把合作制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而把它拿來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觀察，——如果不如此來解釋，那又怎樣來解釋呢？

合作制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於是對於合作制問題的看法也會應改變。

例如，請看列寧所著小冊子論合作制（一九二三年）裏的一段闡明這個問題的燦爛言論吧：

「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合作企業是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的，因為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之下\*，合作企業是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的，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們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如果它們是建立在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立在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在這一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的現存制度」並非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我們的制度」相配合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認為很難比這說得更明白了。

又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單純的合作制發展，這對於我們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發展，而同時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變更」（見同上）。

很明顯的，我們在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中遇見對於合作制的新估計，而這種新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承認的，是新反對派力圖違反着事實、違反着明顯真理、違反着列寧主義而默然不提的。

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而拿來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觀察的合作制，却是另一回事。

可是，並不可由此作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與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中間有什麼鴻溝。這種結論當然是不正確的。例如只須引證糧食稅下述一段，就可立刻看出糧食稅與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存在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請看這一段吧：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大生產形式。從小業主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就是說，這是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是比較複雜的，可是它在成功時却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却能拔除舊關係——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即最頑強反抗任何「革新」的關係——那種更深厚的根蒂」（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一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寫糧食稅時，即在我們還沒有已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時，就已認為合作制在成功時能變成爲反對「社會主義以前」關係，因而也就是反對資本主義關係的強大鬥爭工具。我認爲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就成了他所著小冊子論合作制底出發點。

可是，從這一切當中就得出什麼結論呢？

而從這一切當中就得出結論如下：新反對派不是按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是按玄學觀點去觀察合作制問題的。新反對派不是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配合着的，例如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的（一九二一年）或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的（一九二三年）歷史現象，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之物」。

由此就有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的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經過合作制去向社會主義發展，由此反對派就滾到舊的道路去，滾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去。

新反對派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實際問題方面的立場，大體上就是如此。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如果它有路線的話——，反對派底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相信態度和見難慌張心理——是歸結到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的。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是有疑問，如果富農幾乎萬能，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作用日益降落，新的農村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幾乎是在蛻化，而革命從西方又還不如此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武庫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那末在對我國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份作鬥爭中，它究竟是指望於什麼呢？須知只靠一個「時代哲學」是不能跑去作戰的。

很明顯的，新反對派底武庫，如果一般可以稱之為武庫的話，是值不得羨慕的。這個武庫不是為着進行鬥爭。它尤其不是為着勝利。

很明顯的，如果黨帶着這樣一個武庫跑去作戰，那黨就會「一舉」而斷送自己的性命，——那它就會簡直只得向我國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是決定得完全正確的，它說「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乃是我們黨底基本任務」；它說為解決這任務所必要的條件之一，就是「進行鬥爭去反對那種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態度以及反對那種想把我們的企業——「澈底社會主義式」（列寧）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企圖；它說「這樣的思潮，既使羣衆不能自覺對待一般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其中的社會主義工業，

就只能阻止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增長過程，並幫助私人資本來和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它說「代表大會因此認為必須進行廣泛教育工作去克服這種曲解列寧主義的行爲」（見蘇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波）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蘇聯共產黨（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善於根本揭破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新反對派底不相信和號泣態度，明白確切地指出了繼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了黨以勝利的前途，並因此而以確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堅固信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論黨關於農民問題的三個基本口號

——答楊——斯基同志——

楊——斯基同志！

你的來信當然已按時收到了。回信稍遲，請你原諒。

(一)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被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

黨在革命某一階段整個時期內都保存其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如果不是完全全倚據於列寧底這個根本提綱，就不能稱為基本口號。基本口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下才能是正確的：如果它們是以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分析為基礎，如果它們規定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底正確佈置計劃，如果它們便利於把羣衆引到為革命勝利而鬥爭的戰線，引到為由新階級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戰線，如果它們使黨易於從廣大民衆中間編成一支為完成此任務所必需的廣大雄偉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某一階段當中，是能有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的，但這還不是說基本戰略口號不正確。例如，我國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聯合全體農民，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為資

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而奮鬥」——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了失敗。

所以，決不可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與革命在其某一發展階段上遭受失敗或失利的問題混為一談。

也能有這樣一種情形，就是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進程中已達到了推翻幾個舊階級或一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革命要求却没有實現，或實現這些要求的事情竟延長到一整個時期，或需要一次新革命才可將其實現，但這還不是說基本口號不正確。例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等等，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不正確。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沒有一下子就達到以下兩點：（1）一般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2）就是在鄉村裏使富農陷於孤立；而却把這件事情延長到相當時期，——但這還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為無產階級政權而奮鬥」——是不正確的。

所以，決不可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與關於那從這口號中產生出來的某種要求底實現期限和實現形式問題，混為一談。

因此，決不可以某一時期內革命運動底個別成功或失敗為觀點來估計我黨戰略口號，更不可以由這些口號中產生的某種要求底實現期限或實現形式為觀點來估計我黨戰略口號。只有以用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階級力量，以在為革命勝利、為使政權集中於新階級手中而鬥爭的戰線上正確佈置革命力量為觀點，才可估計我黨戰略口號。

楊——斯基同志，你的錯誤就在於你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或是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2）你在來信內寫道：

「說我們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聯合全體農民而進，——這算正確麼？不是的，是不正確的。」

「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都是有效的，因為全體農民都會利於要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於是，照你這段話說來，黨在革命第一階段內（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在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權而建立工農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是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內（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問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沒有區別的。於是，你就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而你所以犯了這個錯誤，是因為你大概不願意瞭解這一件簡單事情，即戰略口號底基本題目是關於革命一定階段上的政權問題，是關於究竟那個階級應被推翻和那個階級應取得政權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證明：你在這裏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我們都會實行「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因為全體農民都會利於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可是，誰告訴過你，說十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只是限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是以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呢？你這個說法是從何處得來的呢？難道可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安置在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內麼？難道爭取無產階級專政不是超出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麼？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須知這也是農民）能贊助我們推翻資產階級和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呢？怎麼可以否認說關於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權、禁止土地買賣等等法令——雖然它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法令——是我們在與富農鬥爭中而不是在與富農聯合中實行的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也是農民）能贊助蘇維埃政權關於剝奪工廠、鐵路、銀行等等的法令，或無產階級關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十月革命底基本內容不是實行這些以及諸如此類辦法，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呢？

固然，十月革命底主要任務之一，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則資產階級革

命就不能進行到底；同樣，如果十月革命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則十月革命本身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既然十月革命會從事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於是它就應遇到全體農民底同情。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點而斷定說，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不是十月革命進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十月革命底本質或基本目的麼？十月革命底主要目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剝奪資本家等等，被你拋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如果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是任何一個革命底基本問題，即政權由一個階級轉入另一個階級的問題，那末由此就可明白看出：無產階級政權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就不可與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得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混爲一談，就是說不可與這成爲革命第二階段戰略口號底主要目的的問題混爲一談。

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大成績之一，就在於它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並把中世紀一切污垢都盡行剷除了。這對於鄉村是會有最主要的，並且真正是有決定意義的。除非如此，就會不能實行把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兩者匯合起來，如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已經說過那樣。除非如此，則無產階級革命本身就會不能鞏固。而且在這裏須要注意以下一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不是一舉而成的。其實，這件事情會延長到一整個時期，不僅包括一九一八年一段時間，如你在來信內所說那樣，而且還包括一九一九年一段時間（窩爾加河流域和烏拉爾）以及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烏克蘭）。在這裏是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進攻而言，當時在整個農民面前都擺着地主政權復辟的危險，當時，農民——正是整個農民——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周圍，以保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並替自己保全這革命底果實。實際生活過程底這種複雜性和多樣性，專政底這種直接社會主義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彼此「奇巧的」錯綜結合，是須時刻注意到的，以便正確瞭解你從列寧著作中引來的引證以及黨口號如何見諸實現的訣竅。可以說這種錯綜結合情形是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不

正確麼，是證明這個口號與黨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區別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這種錯綜結合情形只是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政權而鬥爭等等——是正確的。爲什麼呢？因爲，爲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首先，在十月革命時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因爲只有這樣一個政權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爲要在十月革命時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就會須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和組織一個能夠推翻資產階級，能夠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而且不必證明，這樣一個政治軍隊，我們會只有在無產階級與貧農聯合，反對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的口號下，才能把它準備和組織起來。很明顯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實行的戰略口號，我們就會不會有這樣一個政治軍隊，於是也就會不會在十月革命時取得勝利，就會不會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於是也就會不會有可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不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情與那在革命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專取政權爲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

只有用一個方法才可避免所有這一切「矛盾」，這方法就是承認在革命第一階段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口號與革命第二階段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固有基本區別，承認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是協同全體農民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而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則是協同貧農反對資本政權和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而這一點是必須承認的，因爲對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上階級力量的分析，使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否則不能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主專政口號下進行工作的，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我們則已用無產階級與貧農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來代替它。楊——斯基同志，你同意吧：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用這一個口號代替另一個口

號的事實，按照你的公式是無法解釋的。

列寧還在他所著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就已指出黨底兩個戰略口號間的這個基本區別了。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癱瘓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換言之：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爲民主革命而奮鬥。

至於說到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那他就把這個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份子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癱瘓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同上）。

換言之：聯合貧農以及一般半無產者居民階層，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鄉小資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政治情況估計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與資產階級實在政權錯綜結合局面時說道：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則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層\*」（摘自列寧所著四月提綱，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道！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農民與工人這篇專門論文寫

道：「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夠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而言。——「約、斯大林註」）基本定義。而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祇有領導着貧農\*（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才能夠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警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的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不應把這一點瞭解成這樣：以爲我們這裏現在好像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底專政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並且我們在十月革命時曾在形式上實現這個口號，因爲我們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行聯盟並與他們瓜分過領導，雖然在事實上我們在當時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爲我們波爾什維克在當時是佔大多數的。可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盲動」以後，在我們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連在形式上也不存在了，因爲這時候領導已完全全轉入一個黨手中，轉入我們黨手中，而我們黨是決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黨瓜分國家領導的。這在我們方面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在迴顧革命所已經過的道路時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協同整個農民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是我們會最明白認識到的，是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已說過幾百次和幾千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中這個必經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的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在十月革命很久以前，在我們奪取\*政權很久以前，我們就已公開說過並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空前程度，這種破產現象要求（不管誰願意不願意），要求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進步驟。因為；否則不能前進，否則不能挽救那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否則不能減輕勞動者被剝削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由此可見，列寧曾屢次着重指出那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實行的第一個戰略口號，與這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實行的第二個戰略口號間的極端深刻的區別。在那裏，口號是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在這裏，口號是協同貧農反對資產階級。

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事情，曾在十月革命以後延長到一整個時期，而既然我們會從事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於是「全體」農民就會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件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那樣，是絲毫不能動搖下述基本原理的，這原理就是：我們是協同貧農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我們是協同貧農，在富農（也是農民）反抗和中農動搖下，共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曾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之一）。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看來是很明白了。

(3) 其次，你在來信內寫道：

「說『我們是在聯合貧農和中立中農的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這算正確麼？不是的，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以及從列寧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引證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個口號是只有在『農民內部階級分化已經成熟』（列寧）時，就是說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產生的」。

照你這段話說來，黨走上中立中農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農委員會以後。這是完全不對的，楊——斯基同志。恰巧相反，中立中農的政策，不是在貧農委員會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正是在那時候完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宣佈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時說道：

「舊時社會主義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理論上思想上效勞於革命時——曾說要中立農民，就是說，即令不能把中農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階層，至少也要把他們變成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佔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社會階層。這個抽象的理論上的對任務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進入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此時已須具體地詳細地規定一種為農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基本規則和指示，而這些規則和指示，就是我們為着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立場所應當遵照執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由此可見，結果是恰巧和你在來信內所說者相反，而你在這裏是把我們真實的黨的實踐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政策底開始及其終結混爲一談了。

當還在實行推翻資產階級時，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時，中農是會懊喪呻吟的，是會在革命與反革命間動搖不定的，因此也就會須使他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當真」已被推翻，蘇維埃政權已在鞏固，富農正被打破，紅軍已開始在國內戰爭戰線上獲得勝利時，他就開始轉到我們方面來了。正是在這樣一個轉變以後，列寧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我黨第三個戰略口號才有可能提出來，這口號就是倚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堅固聯盟——向前爲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

你爲什麼竟能忘掉這件盡人皆知的事實呢？

其次，據你來信說來，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和在這個革命勝利以後最初時日裏中立中農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不適用的，因此就是不能採納的。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情形恰巧相反。正是在實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和在無產階級政權尚未鞏固以前，中農是最表示動搖和反抗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聯合貧農和中立中農。

你在堅持自己的錯誤時，說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國，而且對於其他「與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經濟多少相似的」國家，都有巨大意義。你這後面一點意見當然是對的。可是，請看列寧在他提交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土地問題提綱內，會怎樣說明各國無產階級黨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對待中農的政策吧。列寧會把貧農，或更確切些說，「農村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確定爲一個由農村工人、半無產者或極小農和小農組成的單個集團，然後在講到中農是農村特別集團的問題時，說道：

「按經濟含義說來，應把「中農」瞭解爲這樣一些小農人，這些農人按所有權或租佃權而佔有也是一塊不大的土地，但終究是這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常是不僅使他可以勉強

維持家庭和產業，而且有可能得到某些能夠——至少在很好年份——變為資本的剩餘；這些農人是很時常僱用別人勞動力的。革命無產階級不能力謀——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開始時，——把吸收這個階層到自己方面來。它只應當力謀中立這個階層，就是說迫使這個階層不去積極贊助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鬥爭」（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速記錄，第六一〇至六一一頁）。

既然如此，那怎麼還可以說，中立中農的政策，在我們這裏「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產生」，就是說在鞏固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政權——事業中已有決斷成功以後才能「產生」呢？

由此可見，關於各國無產階級黨在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時的戰略口號問題，也如中立中農問題一樣，是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的。

(4) 由上述一切中就可明白看出：你從列寧著作中所摘引的幾段引證，是絲毫不可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對立起來的，因為：第一，這幾段話不是談論黨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基本口號，而是談論在十月革命以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第二，它們不是駁倒，而是證實這個口號正確。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而且現在不得不再重複說一遍：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實行的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是不可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的以政權問題為其主要題目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的。

(5) 你說到莫洛託夫同志那篇曾在真理報上發表的著名論文——論我國資產階級革命（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真理報），說原來正是這篇論文「推動」你來向我要求解釋。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樣閱讀他人論文的，楊斯基同志。我也讀過莫洛託夫同志底論文，而且我認為這篇論文是與我在我們黨第十四

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黨對農民口號問題所說的話，絲毫不相矛盾的。莫洛託夫同志在他的論文內，不是說黨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基本口號，而是說既然黨在十月革命以後會從事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於是它在當時會得到一切農民底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把這一個事實指出來，這並不是否認，反而是證實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正確，這個原理就是：我們是協同貧農，中立中農，反對城鄉資產階級，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則我們就會不會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了。

（此回信曾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在波爾什維克雜誌第七第八兩期合刊上登載）

##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答S、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我認爲：你在今年五月二日寫來的信，是使我既沒有緣由，也沒有根據來詳細回答的，所謂逐條回答的。其實，你這封信和楊——斯基同志那封信比較起來，是沒有絲毫特別新穎東西的。而如果我畢竟還是來回答你這封信，那就是因爲這封信包含有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加米涅夫立場的成份。只是爲着揭破這些恢復加米涅夫立場的成份起見，我才認爲要來簡括回答你這封信。

(1) 你在來信裏說道：「其實，我們在由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時期內所有的，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黨在由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時期內所堅持和擁護的，是自己那個對農民的舊口號——與整個全體農民聯盟」。

第一，照你這樣說來，波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四月至十月）是沒有力謀把貧農與豐裕農分開，而是把農民看作一個整體的。

第二，照你這樣說來，波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是沒有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來代替「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舊口號，而是停留在舊時立場上，即停留在列寧於一九〇五年著的小冊

子兩個策略裏所規定的立場上。

第三，照你這樣說來，波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爲反對蘇維埃動搖態度和妥協立場而鬥爭的政策，爲反對中農在蘇維埃內以及在前線上的動搖態度而鬥爭，爲反對那種在革命與反革命間動搖態度而鬥爭，爲反對那些在七月事變時——當時，蘇維埃以「社會革命」黨人妥協派和孟什維克妥協派爲首，協同反革命將軍們來從事於孤立波爾什維克，——已帶有特別尖銳性質的動搖態度和妥協立場而鬥爭的政策，——照你這樣說來，波爾什維克爲反對某些農民階層這種動搖態度和妥協立場而鬥爭，原來是無的放矢的絕對不需要的。

最後，照你這樣說來，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堅持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舊口號，原來是對的；而列寧當時認爲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並宣佈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新口號，却原來是不對的。

只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就可以明瞭你這封信是從頭到尾都荒謬絕倫的。

可是，因爲你是一位很喜歡從列寧著作裏引證個別章句的人，於是就讓我們來看引證吧。

不必花費多大工夫就可以證明下述一點：列寧曾認爲，以革命向前發展爲觀點看來，在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中的新現象，不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農民間的利益一致，而是貧農與富裕農間的分裂：貧農趨向於無產階級，而富裕農則跟隨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立場爭論時，曾如何說明這一點吧：

「現在，\*來指望於與農民有一致利益，這對於無產階級黨是不可容許的」（摘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五頁）。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其次：

「我們現時就已經在一些農民代表大會決議上看見一種要等到召集立憲會議時才來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豐裕農 \* 底勝利」（摘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再其次：

「也許農民將拿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只限於今天，而且我在直率而明確規定土地綱領時，還顧計到這樣一種新現象：僱農貧農與農業主間的更深的分裂 \*」（摘自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寫論文論策略書，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三頁）。

這就是列寧在二月革命以後的農村新環境裏所看出的新穎的和重要的現象。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時期內規定黨政策時所持的出發點。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是根據這個原理而說出下述一段話來的：

「僅僅在這裏，在當地，我們才知道，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了。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與兵士專政底實現；而在兵士中間，大多數都是農民。這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與資產階級妥協了。正是在這裏須要重新審查「舊」波爾什維主義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下述一段話時，也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的：

「誰在現時還只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已落後於實際生活，誰因此就在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實際上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鬥爭，誰就應當被送到「波爾什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董陳列所（可以叫做「舊波爾什維克」陳列所）裏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一頁）。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以代替舊口號——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你可以說——而你在你這封信內正是這樣說——這是企圖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革命的托洛茨基立場，但這樣說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正如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反駁列寧時那種說法沒有理由一樣。列寧當時完全願到這種反駁，所以他說道：

「托洛茨基主義——不要沙皇，而政府是工人的」。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的，決不可把它勾銷。可是，它有兩部分，它的貧苦的\*部分是與工人階級一塊兒走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二頁）。

加米涅夫底錯誤，而現在你願克羅夫斯基同志底錯誤，就在於不善於指明，不善於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在這裏是說農民——兩部分間的區別；就在於不善於從整個全體農民羣衆中間劃出貧農部分來，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環境內的政策；就在於不善於由這一點推出一個新口號，即黨第二個戰略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

我們現在來在列寧著作裏循序考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實際歷史吧。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則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層。」（摘自列寧所著四月提綱，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工人——如果他們獲得貧農\*底擁護——才能夠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實行無代價地奪取土地，達到完全自由，打破飢荒，打破戰爭，達到正義的堅固的和平」（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七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着貧農\*（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才能夠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的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與貧農\*專政才能夠打破資本家底反抗，表現出政權底真正偉大的勇氣和決斷心，保證自己無論在軍隊或在農民裏都能得到羣衆底喜躍的、奮勇的、真正英勇的擁護」（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列寧在波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本小冊子內與新生活報爭論時寫道：

「或者是\*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而這是你們早已不擁護的，而且連資產階級自己也甚至不敢提及的，因爲它知道，在四月二十號至二十一號，人民只把肩膊一聳就把這樣一個政權拋開了，而現

\* 若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在呢，將會多倍堅決地和多倍冷酷無情地拋開這樣一個政權的。或者是\*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就是說歸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同盟（聯盟，協定），因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單獨和獨立採取政權，這是已被一切革命底經驗所證明了的，是被經濟科學所證明着的，這經濟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可以站在資本方面，可以站在勞動方面，但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個同盟在俄國半年以來已經嘗試數十百種方法而終歸失敗了。最後，或者是\*全部政權歸無產者和貧農\*，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是還沒有嘗試過的，而這是你們——新生活報方面的老爺們——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在資產階級面前的恐懼心理去恐嚇人民。第四種辦法是連臆造也臆造不出來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五頁）。

事實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所有這一切事實和事變，都被你「平安」迴避過去了；波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爲反對那些坐在蘇維埃內的「農民業主」底動搖態度和妥協立場而進行的鬥爭，都被你從波爾什維主義歷史中「平安」一筆勾銷了；列寧底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竟被你「平安」埋葬了，而你同時却又裝腔做勢說這還不是橫蠻曲解歷史，不是橫蠻曲解列寧主義。

願克羅夫斯基同志，你從這些引證中——而這種引證是還可摘引許多多來的——就應當看見：波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所持的出發點，不是聯合全體農民，而是聯合農民貧苦部分；波爾什維克在走向十月時所實行的口號，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舊口號，而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

由此可見，波爾什維克是在這樣一個鬥爭中實行這口號的，這個鬥爭所反對的是蘇維埃底動搖態度和

\* 若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妥協主張，是那坐在蘇維埃裏的某一部分農民底動搖態度和妥協主張，是那名叫「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有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黨底動搖態度和妥協主張。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新口號，我們就會不會能收集一支充分強大的政治軍，而這支政治軍是能夠克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妥協主張的，是能夠使某一部分農民底動搖性中立起來的，是能夠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這樣來使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成爲可能的。

由此可見，「我們是協同貧農，在富農（也是農民）反抗和中農動搖下走向十月革命和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的」（見我給楊——斯基同志的回信）。

這樣看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以及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主張正確的，原來是列寧，而不是加米涅夫。而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現在來恢復加米涅夫立場，就未免是落到一個不大的夥伴裏去了吧。

（2）你引證列寧說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在整個農民贊助下取得政權等語，來與上述一切對立。說我們在整個農民相當贊助下取得政權，——這是完全對的。可是，你竟忘記補說一件「小事情」：在十月革命時和在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曾從事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才贊助過我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情」，它是在這裏決定問題的。「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並因此而抹煞最重要的問題，這對於波爾什維克是不可容許的，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從你的來信內可以看出，你把列寧所說的整個農民贊助我們的話，與這也是由列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黨口號對立起來。可是，爲要把列寧這句話與以上從列寧著作中摘引出來的引證對立起來，爲要有根據用你所引來的列寧說到整個農民的幾句話來駁倒以上所引的列寧說到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的幾段引證，——爲要這樣作，就至少必須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就必須證明：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中的主要點。列寧認爲：把資產階級革命

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底「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解決這個任務。首先就必須駁倒列寧這個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中的主要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是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請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試來證明這一點吧，你如果能夠證明這一點，那末我就決意承認：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四月至十月間的口號，不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而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從你的來信內可以看出，你認為自己是不可擔任這個過於冒險的任務的，但你企圖「順便」證明，在十月革命最重要問題之一上面，在和平問題上面，似乎全體農民整個都是贊助過我們的。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頗克羅夫斯基同志。在和平問題上，你落到庸人觀點上去了。其實，和平問題當時在我們這裏就是政權問題，因為在當時，只有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才可以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你大概是忘記了列寧以下幾句話：「只有使政權過渡到另一個階級手中，才可結束戰爭」，「打倒戰爭——這並不是拋棄鎗枝，而是使政權過渡到另一個階級手中」（摘自列寧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一頁和第一七八頁）。

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中的主要點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得出結論說，在十月革命中，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曾從事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才贊助過我們。

第二。你就應當證明：波爾什維克會不必要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一貫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口號，不必要根據這個口號來進行一貫鬥爭反對各小資產階級黨底妥協主張，不必要同是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中的代表們底動搖態度，而就能夠在十月革命時和在十月革命以後，在他們曾從事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請你試來證明這一點吧，頗克羅夫斯基同志。其實，為什麼我們得以保證自己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呢？就是

因為是我們得到了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性。為什麼我們得到了這種可能性呢？就是因為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而用無產階級政權代替了它，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為什麼我們得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就是因為我們曾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口號下進行十月革命準備工作，就是因為我們曾根據這個口號來進行一貫鬥爭反對各小資產階級黨底妥協主張，就是因為我們曾根據這個口號來進行一貫鬥爭反對那些坐在蘇維埃裏面的中農底動搖態度，就是因為我們當時只有在這樣一個口號下才能克服中農底動搖態度，打破各小資產階級黨底妥協主張和集合一支能夠為着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而鬥爭的政治軍。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些曾決定十月革命命運的預備條件，那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時或在十月革命以後，都不會能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了。

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彼此匯合的問題，就是要這樣來瞭解的，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把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底贊助，與我們是在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下準備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起來，就等於絲毫不懂得列寧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頗克羅夫斯基同志既沒有懂得在十月革命進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互相錯綜結合的事實，也沒有懂得十月革命那些從黨第二個戰略口號——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裏得出來的個別要求如何見諸實現的訣竅。

讀到你的來信時，簡直可以發生這樣一種感想，以為不是我們曾把農民拿來替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却反而是「整個農民」——連富農也包括在內——曾把波爾什維克拿去替自己服務。如果波爾什維克會是這樣容易「受僱」去替非無產者階級服務，那末波爾什維克事業就會很糟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加米涅夫立場，這就是使你脚跟動搖的東西，頗克羅夫斯基同志。

(3) 你硬說斯大林看不見一九〇五年環境與臨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時環境間的區別。你這種說法

當然是不莊重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不能這樣說。我在我的信內只是說：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而這當然是對的。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在農民和工人這篇論文內就正是這樣描寫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夠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約、斯大林註」）基本定義。而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再次證實了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太過於「講辯證法的」同志呵，你不過是想來吹毛求疵罷了！

（4）其次，你企圖證明斯大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把他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裏說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有與中農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的話，與他說在十月革命以前中農抱着妥協主張的提綱對立起來。不必花費多大工夫就可證明：你這樣把兩個不同現象看作同一個東西，是絕對不合科學的。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當資產階級專政時的中農，與在無產階級專政已鞏固以後的，當資產階級已被剝奪、合作制已發展、基本生產資料已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時的中農，是兩個彼此不同的東西。把兩種中農看作同一個東西，把他們混為一談——這就是把現象看作是與歷史環境沒有聯繫的東西，並喪失一切前途。這頗與季諾維也夫混淆年月時期而胡亂引證他人言論的姿勢相同。如果這叫做「革命辯證法」，那就須承認頗克羅夫斯基同志是已打破一切「辯證」魔術紀錄了。

（5）其餘的問題，我不談及，因為我認為在我與楊——斯基同志通信內已把這些問題說得透澈無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十月革命不是僅僅「民族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爲它是全世界人類史中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

從前所有的革命，通常是以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執掌政柄而收束的。剝削者是更換了，而剝削制則依然存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期的情形，曾是如此。農奴武裝起義時期的情形，曾是如此。英法德等國有名的「大」革命時期的情形，曾是如此。我不來說巴黎公社，因爲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爲反對資本主義而轉變歷史的第一次光榮英勇的嘗試，但終究是沒有成功的嘗試。

十月革命是在原則上與這些革命不同的。它不是以用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以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爲目的，而是以消滅任何人剝削人現象，以消滅一切種種剝削者集團，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建立這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階級底政權，以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爲目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底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中、風俗和傳統中、

文化和思想系統中的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所以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其基礎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各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刻同情，把它看作是它們獲得解放的保障，其根源也是在這裏。

可以指出這樣幾個基本問題，在這幾個問題上，十月革命是影響着全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

(1) 十月革命首先一個出色處，就是它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線，在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之一裏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

被僱傭者階級、被驅策者階級、被壓迫者被剝削者階級，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統治階級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世界各國無產者。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在帝國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奪取了地主資本家底生產工具和資料，並將其變成社會公有財產，於是它就利用社會主義所有制與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於是它就揭破了資本家說資產階級所有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恆久不變的騙人鬼話。

十月革命奪取了資產階級手裏的政權，剝奪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利，毀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於是它就利用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民主制與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即資本主義民主制對立起來了。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已正確說過：在革命以後第一天，「所有從前一切資本家都將被褫奪選舉權」。於是十月革命就揭破了社會民主黨人說現在有可能經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是沒有停留而且也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的。十月革命把資產階級舊制度毀壞以後，

就已經着手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十月革命底十週年，就是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建設底十週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各種毫無疑義的成功，已經具體表明：無產階級是能夠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管理國家的，它是能夠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建設工業的，它是能夠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領導全部國民經濟的，它是能夠不顧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那說被剝削者非有剝削者不行，正如頭腦和其他肢體非有胃部不行一樣的舊「理論」，不僅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羅馬元老梅涅尼、阿格里波底心得。這個「理論」，現在一般是社會民主黨政治「哲學」底基礎，特別是社會民主黨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盟政策底基礎。這一個已具有成見性的「理論」，現在是阻礙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它已給了這種騙人「理論」以致命的打擊。

十月革命所有這些結果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曾不能不而且現在還不能不大影響到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蒸蒸日上發展，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同情的增長，以及大批工人代表團接踵而來參觀蘇維埃的國家，——所有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就是毫無疑義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開始出產果實了。

(2) 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裏動搖了帝國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外藩，震撼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裏的統治。

十月革命既經推翻地主和資本家，就打斷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鍊，使一個幅圓廣大國家內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被壓迫民族都已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為旗幟，

而是以蘇聯各族工農互相信任和兄弟接近爲旗幟，不是爲着民族主義，而是爲着國際主義。

正因爲民族殖民地革命在我國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的，所以素被賤視的民族，素被奴役的民族，就被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民族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世界各被壓迫國裏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和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自古以來，世界就分成下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而只有淪爲被剝削者的命運，而後者却是唯一的文明代表者而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打破和已被擊潰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那些已被解放的已被捲入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民族，其能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使民族彼此脫離的方法，使民族彼此分開的方法，使各民族勞動羣衆間民族惡感加強的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個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方法，是可能而且適當的；因爲它在事實上表明了，各國極不相同的民族裏的工農彼此在自願原則和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兄弟聯盟，是可能而且適當的。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以世界統一經濟爲基礎的聯合的榜樣——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巍然存在的事實，不能不是對於這點的直接的明證。

不待說，十月革命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曾不能不而且現在還不能不大大影響到殖民地和依

賴國裏的革命運動。中國、馬來羣島、印度以及其他諸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這些民族對蘇聯同情的日益增長，——所有這些事實，就是對於這點的不容置疑的明證。

安然剝削和安然壓迫殖民地和依賴國的紀元，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依賴國裏民族解放革命的紀元，這各國無產階級覺醒的紀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3) 十月革命既把革命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底中心和後方，既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並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於是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命運本身都發生問題了。

如果資本主義自發發展的過程，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因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因衝突和武裝接觸不可避免，最後因為空前未有的帝國主義大屠殺，已轉變為資本主義腐化和衰亡的過程，那末十月革命以及一個極大國家因有十月革命而脫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不能不加速了這一過程，一步一步破壞着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本身。

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動搖了帝國主義，它同時還建立了世界革命運動底強大的公開的基礎，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礎是世界革命運動以前從來未曾有的，而現在却可把它作為靠山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革命運動這樣一個強大的公開的中心，這個中心是世界革命運動以前從來未曾有的，而現在却可在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了。

首先，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永遠不能治好的致命傷。正因為如此，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能收回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所曾有過的「平衡」和「穩固性」了。資本主義儘可局部穩定，它儘可使自己生產合理化，它儘可把國家管理事業交給法西斯主義，儘可暫時壓制工人階級，可是它永遠也不能收回它從前曾引以自豪的那種「安寧」、那種「確信心」、那種「平衡」和那種「穩固性」了；因為世

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此時革命火焰是必然要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藩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正好似著名寓言所說那樣：「剛剛抽出尾巴來，鼻子又陷落下去了；剛剛抽出鼻子來，尾巴又陷落下去了」。

第二，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底力量 and 比重、勇氣和戰鬥準備性提到一定的高度，迫使各統治階級把它們作爲新的嚴重的因素來看待。現在已經不可把世界勞動羣衆看作是徘徊於黑暗鄉和茫無前途的「盲目人衆」了，因爲十月革命已給他們建立了一座替他們照耀道路和指明前途的燈塔。如果從前沒有一個全世界公開發議場可以表明和規定被壓迫階級底希望和志願，那末現在却已有這種集議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毫無疑義的，如果這個集議場竟被消滅，那末肆無忌憚的黑暗反動勢力就會長期籠罩着「各先進國」底社會政治生活。誰也不能否認，甚至單是「波爾什維克國家」巍然存在的事實，就扼制着黑暗反動的勢力，而促進被壓迫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其實，全世界各國剝削者所以這樣野獸般地仇恨波爾什維克，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歷史又在重復着，不過是在新基礎上重復着罷了。正如從前在封建制度覆亡時期，「雅可賓黨人」這一名詞曾引起世界各國貴族底驚恐憎惡一樣，現今在資本主義覆亡時期，「波爾什維克」這一名詞也同樣引起各資產階級國家底驚恐和憎惡。反過來說，正如從前巴黎會是那興盛的資產階級革命代表避難所和學校一樣，現在莫斯科也正是這興盛的無產階級革命代表避難所和學校。對雅可賓黨人的仇恨，不會救封建制度於滅亡。對波爾什維克的仇恨，也不能救資本主義於不可避免的粉碎，——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資本主義「穩固」的紀元，已隨身帶着那說資產階級制度不可動搖的奇談而一同過去了。  
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4) 十月革命不僅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

工人階級思想中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旗幟下，在列寧主義——它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下誕生和鞏固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對於改良主義的勝利，是表明列寧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是表明第三國際對於第二國際的勝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間，在列寧主義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政策間，掘成一條不可越渡的鴻溝。從前，在無產階級專政尚未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還不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但絲毫也沒有設法，絕對沒有設法促使這思想見諸實現，——當時，社會民主黨還能夠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因為社會民主黨這種行為是沒有給資本主義造成任何威脅的。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在表面上還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或幾乎是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勝利以後，大家都已顯然看見馬克思主義底目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底勝利能表明什麼的時候，——此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了，已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了，否則就會給資本主義造成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早已和馬克思主義精神脫離關係，結果竟不得不也和馬克思主義旗幟脫離關係，而來公開和決然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此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不表示和馬克思主義無關，而且果然已表示和馬克思主義無關了，因為在現時條件下，誰不公開地奮勇地擁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誰不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本國資產階級，誰不創立使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條件，誰就不能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稱。在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間已橫着一條鴻溝。自以此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唯一代表者和堡壘。

可是，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已使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隔開，而且還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而直接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營壘中去了。當阿得列爾輩、鮑威爾輩、威

爾斯輩、列維輩、龍格輩、布留姆輩這班老爺們咒罵「蘇維埃制度」而讚美國會制度的「民主」時，其用意就是想說：他們現在是進行着鬥爭，而且將來還會進行鬥爭，爲着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爲着要在各「文明」國家裏保存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現時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思想支柱。列寧說得萬分正確：現時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辦，是資本階級底工人僕役」；「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是必然會站在「凡爾賽派方面反對巴黎公社社員」的。除非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衰亡的紀元，同時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衰亡的紀元。十月革命底偉大意義，其中也就在於十月革命是表明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統治的紀元，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此文曾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

兩日在真理報第二五五期上登載）



## 在糧食戰線上

——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紅色教授專門學校，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們談話底一部分——

問題：什麼東西要算是我國糧食事業困難底基本原因呢？逃出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呢？既然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底速度方面，特別是從輕工業與重工業對比較關係方面看來，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回答：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一種偶然現象，只是由於設計工作不好，只是由於在經濟計算工作中有某些錯誤。可是，只有驟然看來才會覺得是這樣。其實，困難底原因在這裏是更深刻得多的。說設計工作不好和經濟計算工作錯誤在這裏也起了頗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以設計工作不好與偶然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輕視設計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如果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爲我們已達到可以計劃與調節所有一切東西的發展階段，那就更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國民經濟成份內，除那些服從於我們計劃影響的份子而外，還有一些暫且尙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份子，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可用單純的國家計劃局的設計工作手續來加以克服的。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爲不可把一切都歸結爲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爲設計工作錯誤等等。

那末，我們在糧食戰線上困難底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們糧食困難底基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速度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速度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技術作物（棉、麻、糖、蘿蔔等等）出產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需要額，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出產額增長速度却慢得要命。不可說，我們今年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些。反之，我們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是比過去幾年多得多的。可是，我們現在還是遇到糧食困難。請看幾個數字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我們到四月一日止共採辦到四萬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以採辦到的糧食在國內剩下的，有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我們到四月一日止共採辦到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採辦到的糧食在國內剩下的，有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我們到四月一日止共採辦到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採辦到的糧食在國內剩下的，有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換言之，我們今年到四月一日止，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是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有困難。

我在自己某一個報告裏已經說過，這些困難曾被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首先是曾被富農利用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採取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在這裏不來多說。在這裏使我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所指的，就是關於商品糧食出產額所以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出產總量已經達到戰前程度，而我國商品糧食出產額還是比糧食需要額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的確，我國播種面積已達到戰前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就已等於戰前出產額，就是說已達到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麼？是的，這是事實。既然如此，那爲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幾乎比戰前少至二十倍呢？這裏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國農業結構因十月革命結果而發生了變化，就是因爲我國農業已由那些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多的巨大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我們現在這些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我們在戰前曾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們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個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細小農莊。巨大農莊——無論它是地主農莊也罷，富農農莊也罷，或者是集體農莊也罷，——所以強而有力，就是因爲這巨大農莊有可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績、採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並因此而出產着最多的商品糧食。反之，細小農莊所以軟弱無力，就是因爲它沒有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因此它也就是半消費性的農莊，商品額很少的農莊。例如，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說吧，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等於它們自己所有總產量百分之四七點二。換言之，它們所糶出的商品糧食是比戰前地主農莊所出產的更多的。而小農農莊和中農農莊呢？它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只等於它們自己所有出產總量百分之一點二。由此可見，這裏的差別是頗顯著的。

請看幾個可以說明過去的戰前的與現在的十月革命後的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的數目字吧。這些數目字是中央統計局幹事會委員聶蒙啓諾夫同志製定的。這些數目字，正如聶蒙啓諾夫同志在其說明書裏所附帶聲明那樣，並不能說是完全精確的，——它們只給予一種作出大約計算的可能。可是，這些數目字完全足以使人明白，從一般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是從商品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戰前時期與十月革命以後時期，是有多大的差別。

大戰以前：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商品額所佔百分數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百分數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百分數	
(1)地主	六〇〇	一二・〇	二八一・六	二一・六	四七
(2)富農	一九〇〇	三八・〇	六五〇・〇	五〇・〇	三四
(3)中農和貧農	二五〇〇	五〇・〇	三六九・〇	二八・四	一四・七
總計	五〇〇〇	一〇〇	一三〇〇・六	一〇〇	二六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

	糧食出產總量		商品糧食（運出農村以外的）		商品額所佔百分數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百分數	以百萬普特為單位	百分數	
(1)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八〇〇	一・七	三七・八	六・〇	四七・二
(2)富農	六一七・〇	一三・〇	一一六・〇	二〇・〇	二〇・〇
(3)中農和貧農	四〇五二・〇	八五・三	四六六・二	七四・〇	一一・二
總計	四七四九・〇	一〇〇	六三〇・〇	一〇〇	一三・三

這個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是說明，絕大部分糧食出產，已從地主富農方面過渡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

既已完全解脫地主壓迫和在基本上打破富農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改善自己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的有決定意義的利益，首先就表現在這裏。

第二，它是說明，我國商品糧食底基本擁有人，是小農，首先就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出產總量方面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出產額方面看來，蘇聯由於十月革命底結果，已變成小農經濟的國家，而中農則已變成農業「中心人物」。

第三，它是說明，地主經濟（巨大經濟）已被消滅，富農經濟（巨大經濟）已縮減至三倍有奇，我國已由巨大地主富農經濟過渡到那只糶出百分之一的產品的小農經濟，同時在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若何發展的巨大公共經濟（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情形，本來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商品糧食出產額比較戰前銳減。雖然我們現在糧食出產總量是與戰前標準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至兩倍，——這是事實。

你們看，我們在糧食戰線上困難底基本原因，就在這裏。

你們看，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不可把我們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當作是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義的，還有一個情況也在這裏起了某種不良作用，這就是我們商業機關會担承一個本來沒有必要的替許多中小城市供給糧食的義務，而這就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糧食儲存。可是，毫無疑義的，使我們在糧食戰線上遇到困難的基本原因，不是這個情況，而是我國農業商品額增長得遲慢，而同時商品糧食需要額却增長得很迅速的事實。

出路何在呢？

有人認為出路就在於回到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回到地主經濟，因

爲他們大概是懂得，在現時來瞎說這類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就更高興說必須多方發展富農經濟以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認爲：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於兩個彼此對立的階級——一方面倚靠於以剝削工人階級爲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而另一方面却又倚靠於以消滅任何剝削爲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值不得證明：這些反動「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原則，與列寧主義任務沒有絲毫相同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公司，富農絲毫也不比城市耐潑曼危險些，因此我們現在用不着「害怕」富農，——這種說法是空洞的自由派的廢話，是用來催眠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底警覺性的。不要忘記，如果我們在工業方面能以那供給工業商品總量十分之九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去對抗城市小資本公司，那末我們在農村生產方面所能用以對抗巨大富農生產的，却就不過是那些尚未強固而其糧食產量尚比全體富農農莊總共糧食產量少至八倍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懂得巨大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是比資本公司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高過百倍，——那就是神經錯亂，完全離開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1) 首先，出路就在於要由細小的落後散漫的農民農莊過渡到聯合的巨大的公共農莊，這公共農莊是得到機器供給的，是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的，是能夠生產最多商品糧食的。出路就在於在農業中由個人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經濟。

列寧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就已號召我們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關於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在我們黨內，是始終沒有停止的。可是，關於建設集體農莊的號召只在近來才得到羣衆響應。這首先是因爲農村中合作運動的廣濶發展已在農民情緒上準備了一個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轉變，而那些在現時就未能每俄畝出產一百五十至兩百普特收成，而其商品額等於收成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集體農莊存在的事實，

又在貧農和下層中農裏面造成了很願意加入集體農莊的趨向。還有一個情況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國家只是在最近以來才獲得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國家在今年所已支出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多至兩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完全正確的，它認為羣衆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它認為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額的最嚴重方法之一。

根據中央統計局底統計，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出產總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其一般平均商品額是等於百分之三十。本年年初發生的成立新集體農莊的廣濶浪潮和實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事實，將使集體農莊糧食產量到本年年底大大增加起來。任務就在於要保持現時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規模，取消那些虛張的集體農莊而用真正的集體農莊代之，並規定這樣一個規則——要各集體農莊將其全部商品糧食都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否則它們就得不到國家津貼和借款。我認為：只須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經過三四年後，就會能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約近四五千萬普特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這些人大概是認為集體農莊是一件事，而合作社却是另一件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還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待說，這種對立是絲毫不符真情的。其實，集體農莊是合作社底一個形式，是生產合作社底最明顯的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說來是合作社運動不可分開的組成部分，局部說來是列寧合作社計劃不可分開的組成部分。實行列寧合作社計劃——這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業合作社。其中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才有下面這樣一件事實：集體農莊在我們這裏是只由於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發展和加強的結果，才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2) 其次，出路就在於要擴大和鞏固舊的蘇維埃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巨大蘇維埃農莊。根據中央

統計局底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糧食出產總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其中商品額佔居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義的，在國家予以相當贊助下，蘇維埃農莊就可大大提高糧食生產了。可是，任務並不以此爲限。按蘇維埃政權已有的決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的區域內組織新的巨大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由一萬至三萬俄畝不等），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就應當出產約近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在於無論如何都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定。我認爲：只須完成這些任務，那我們大約經過三四年後，就能夠從新舊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左右的商品糧食。

(3) 最後，出路就在於要一貫提高小的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底收成率。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贊助巨大的個人經濟——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贊助小的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提高其收成，將其引上合作組織底軌道。這是一個舊的任務，是我們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糧糧收集制時就已特別用力宣佈的任務。這個任務後來又由我們黨在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加以批准了。現在因爲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也就更其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正好像堅決執行頭兩個任務——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蘇維埃農莊的任務——一樣。

所有一切材料都是說明，農民經濟底收成率是在幾年以內就增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現在我國使用着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須用鐵犁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長起來。更不必說用某種最低限度數量的肥料、乾淨種子、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農莊了。訂立合同，與整鄉整村訂立關於供給它們以種子等等並一定要從它們方面得到相當數量糧食的條約，就是提高農民農莊收成率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方法。我認爲：只須在這方面認真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就可從小的中等的個人農民農莊方面得到不下一萬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了。



這樣，只須執行這一切任務，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國家就擁有二萬萬至二萬五千萬普特的新增商品糧食，這就多少足以使我們在國內和國外都能夠機動自如了。

爲逃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要的辦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除採取這些基本辦法而外，還採取一些改善關於用商品供給農村的設計工作的臨時辦法，並且使我們各商業機關不再擔任以糧食供給許多中小城市的義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這些辦法而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某些辦法，譬如說採取關於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呢，因爲我國工業增長是使糧食需要額迅速增長，以至於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產量增長速度的？不是的，是不應當的。這是無論如何都不應當的！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爲在工業發展方面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按照列寧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它在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中的陣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在一有可能時就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入農村，並從那裏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以便把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爲着更加「慎重」起見而應當阻延重工業發展速度，以便把那個主要是爲農民市場而生產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底基礎吧？這是無論如何也不應當的！這就會是自殺，這就會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也在內。這就會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底附屬品。我們在這裏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著名的指南原理，這些原理是我們全黨所絕對必須遵行的。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爲要挽救俄國，就不僅要農民經濟有良好收成，——這還不夠，——也不僅要那替農民供給消

費品的輕工業有良好情況，——這也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其次：

「我們在所有各方面都實行節省，甚至在學校方面也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根本不能繼續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取上面所指出的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樣呢？我認爲這些辦法是只會促進工農聯盟鞏固事業的。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將加快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中農的結果，他們的農莊底收成率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將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普特爲實行機動辦法所必要的新有商品糧食；如果由於實行這些以及諸如此類辦法的結果，富農將被壓制並漸被克服，——那末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將因此而日益消失，糧食採辦事業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取的必要，廣大農民羣衆將日益轉向農業集體形式，而爲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將日益帶有羣衆的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工農聯盟事業只會因實行這種辦法而得到利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只是應當注意一點：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彼此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1）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2）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3）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就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做什麼都可以，只是馬克思主義，只是列寧主義。

怎樣使工農聯盟思想與列寧說農民是「最後資本主義階級」這一著名原理彼此相容呢？這裏沒有矛盾麼？這裏只有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在這裏是沒有絲毫矛盾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

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裏是曾把農民估計爲「最後資本主義階級」的，同是在這個報告裏，他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底必要性，說「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很明顯的，列寧無論如何也沒有認爲這裏有絲毫矛盾。

須怎樣瞭解列寧說農民是「最後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所組成麼？不是的，不是說這一點。這是說，第一，農民是一個特別階級，它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並因此而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爲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是從自己隊伍中分泌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家、富農以及一般各種剝削者的。

這個情況是對於工農聯盟組織事業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麼？決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就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這樣一個聯盟，除非對農民資本主義份子作鬥爭，除非對富農作鬥爭，就不能見諸實現。這樣一個聯盟，除非組織貧農爲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就不能堅固。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現時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底一個著名口號下才能實現，這口號就是：要倚靠貧農，要與中農成立堅固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的鬥爭。因爲只有以實行這個口號爲條件，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來。

你們由此可見：在列寧這兩個公式彼此間只有臆造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實，在它們彼此間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答S同志——

S同志！

把列寧在其論皮梯尼姆、索洛卿的著名論文中所提出的「要善於和中農達到協定，連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這一口號，看作似乎是「貧農委員會時期」的口號，看作似乎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的口號，——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末，我們在農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而根據這個轉變，於是中央當時就決定：取消那在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間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改選鎮蘇維埃和村蘇維埃，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內，因而就是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個決定由蘇維埃正式規定，是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我所指的，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所通過的關於改選鎮蘇維埃和村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於蘇維埃內的決議。而列寧那篇標題為皮梯尼姆、索洛卿底寶貴的自供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裏，列寧宣佈要與中農協定的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

• 本文篇幅，略有刪減。——「約·斯大林註」。

月二十一日出現的，即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以後，經過幾乎兩星期時出現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直截說道：我們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吧：

「我們在農村裏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者底反抗；爲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堅固地倚靠半無產者，即倚靠「貧農」。但中農對於我們不是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的：感化動搖份子的任務，是與推倒剝削者以及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不同的。要善於去與中農達到協定——連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農鬥爭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爲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農轉向我們這方面來是必不可免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

由此就得出什麼結論呢？

而由此就得出結論如下：列寧底口號不是關係於舊時期，不是關係於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關係於新時期，即與中農協定時期。所以，他所反映的，不是舊時期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斷語，不僅在形式上不對，不僅在所謂年月方面不對，而且按實質說來也不對。大家知道，列寧所提出的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在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爲用全黨名義宣佈的新口號。大家知道，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正是那確定了我們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基本原则的代表大會。大家知道，我們聯共（波）底黨綱也是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大家知道，在這個黨綱內有幾項專門條文規定黨對於農村各個集團的態度：對於貧農的態度，對於中農的態度，對於富農的態度。在聯共（波）黨綱這幾項條文內，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以及關於黨對於他們的態

\*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度，會如何規定呢？請聽吧：

「俄國共產黨在其全部農村工作中，照舊還是倚靠着農村的無產者階層和半無產者階層，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為獨立的力量，在農村中成立黨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特式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於富農，對於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在於堅決反對他們那種剝削者的趨向，鎮壓他們那種反抗蘇維埃政策的行動。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底任務就是使中農離開富農，以仔細看待中農需要為方法而把中農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感化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克服中農那種落後性，在一切有關中農切身利益的地方，都要努力與中農達到實際協定，在決定關於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的時候，向中農讓步」\*（見俄共（波）第八次黨大會速記錄，第三九六頁）。

請你試找出黨綱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口號間的區別，那怕就是最小的區別，那怕就是字句上的區別吧！你是找不出這個區別的，因為在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區別。不僅如此。毫無疑義的，列寧底口號不僅不與第八次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相矛盾，而且恰巧相反，它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的最中肯的措辭。須知，事實是這樣：聯共（波）黨綱是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那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那篇會宣佈與中農協定口號的反對皮梯尼姆、索洛卿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即在第八次黨大會四個月以前出現於報章的。

\*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完全批准了列寧在他那篇反對皮梯尼姆、索洛卿論文內所宣佈的口號，作爲黨在整個現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在自己農村工作中所務必當作指南的口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列寧口號底要旨何在呢？

列寧口號底要旨就在於非常準確地把握着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並用一個簡短公式表示之：（一）要倚靠貧農，（二）要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停止反富農鬥爭。請你試從這個公式內拿出其中某一部分作爲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它其餘兩部分，——那時候，你就一定會走入絕境。在現今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條件下，如果不倚靠貧農和不進行反富農鬥爭，那是否可以與中農建立真正的堅固的協定呢？是不可能的。在現今發展條件下，如果不倚靠貧農，如果與中農沒有協定，那是否可以進行反富農的順利鬥爭呢？是不可能的。怎樣最中肯地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用一個概括口號表示出來呢？我認爲列寧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示。必須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爲什麼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必須着重指出列寧口號底適當性呢？

因爲正是在現時，可以看見個別同志是趨向於把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撕成幾部分並把這些部分彼此隔開的。這已由今年一二月間我們糧食採辦運動底實踐所完全證實了。必須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一切波爾什維克都知道的。但怎樣成立這個協定呢——這却不是每個人都懂得了。有些人想以放棄反富農鬥爭或減弱這個鬥爭爲方法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認爲進行反富農鬥爭就會嚇退一部分中農，即那部分豐裕中農。另外有些人則想以放棄組織貧農工作或減弱這個工作爲方法來與中農成立協定：他們認爲組織貧農就會使貧農獨樹一幟，而獨樹一幟就會把中農從我們方面嚇走。由於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的結果，於是就忘記馬克思主義原理如下：中農是一個動搖階級，只有進行着堅決的反富農鬥

爭並加強在貧農裏的工作，才可使與中農協定成爲堅固的協定，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中農就會認爲富農是強者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吧：

「必須決定對於那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地位的，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要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如中農這樣一個階層時，那就可以看見這是一個動搖着的階級。他一方面是私有主，而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是不剝削其他勞動者的。他在數十年內都會須千辛萬苦地勉強維持自己的地位，他曾親自受盡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削，他曾忍受一切苦痛，而同時他又是私有主。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動搖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困難的」（見俄共（波）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四六頁）。

可是，也有另外一種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其危險性是不次於上述趨向的。有時候，人們進行着反富農鬥爭，可是他們把它進行得這樣笨拙，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中農和貧農頭上來了。結果，富農仍然是完整無缺，而與中農聯盟事業却引起裂痕，而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進行着反蘇維埃政策的陰謀破壞鬥爭的富農爪牙裏了。也有這樣一種情形，就是人們企圖把反富農的鬥爭變爲剝奪富農財產，而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爲餘糧收集制，却竟忘記下述一點：在我們現今條件下來剝奪富農財產乃是一件蠢事，而餘糧收集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鬥爭。

這些離開黨路線的趨向是由於什麼東西產生出來的呢？

是由於不瞭解：黨在農村中工作底三重任務是單一而不可分開的任務。是由於不瞭解：決不可把反富農鬥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爲黨在農村中的支柱的任務分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開\*。

爲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日常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隔離，那就須做些什麼呢？

爲此至少就須發出這樣一個領導口號，這個口號應把這一切任務合併爲一個總公式，因而不容許把這些任務彼此隔離。

在我們黨的武庫內不是有這樣一個公式，這樣一個口號呢？

是的，有。列寧下述一個口號就是這樣的公式：「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協定，連一分鐘也不放棄反富

由此可見，離開正確路線的趨向是給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的：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把——譬如說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黨底經常的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務來放縱富農，來宣佈貿易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所調節。因此，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

我還要乘機指出的，就是我們的出版物並不時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却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這樣的情形：揭露着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想把糧食採辦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爲我們政策底經常方針，因而給工農聯盟造成一種威脅。這樣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沒有充分注意和沒有盡量揭露那些從另一方面威脅工農聯盟的人們，沒有揭露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是屈服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要求減弱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和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其不受國家所調節，因而從另一端來破壞工農聯盟的。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也有這樣一種情形：揭露着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是否認——譬如說——振興那在現今階段上還是農業基礎的個體小農中農農莊底可能性和適當性的。這樣揭露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同時却沒有揭露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是忽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意義，而不懂得，振興個體小農中農農莊的任務在現時是應當在事實上拿振興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的任務來補充的。這就是片面態度了。

爲要保證正確路線，就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和拋棄任何片面態度。

農鬥爭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適當的包括一切的口號，正是在現時，正是在農村工作現今條件下，須把它提到第一位。

你認爲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並且在你的來信內問道：「爲什麼這一個反對派口號竟能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號前夜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呢？爲什麼這個口號竟然出現於在聯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呢，這是否只是排印上的錯誤，抑或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呢？」不待說，話是說得氣勢洶洶的！可是，S同志，你總得在「轉彎地方」慎重一點兒吧，免得你在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黨綱，而這個黨綱是完全批准列寧口號的（是事實呵！），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份子！）起草而由我們黨（也不是反對派！）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黨綱上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條文吧！請多尊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吧！：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認爲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因爲這句話大概是你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莫明其妙的，大概是這樣一個情況：在列寧底口號裏和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波）黨綱上所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所說的，却是與中農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爲在這裏有某種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這樣設想，以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的方法。這是不對的，S同志。這是一個很大的迷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字母而不會考究口號意思的人們，纔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們，纔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是說要實行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列寧在同是這次代表大會上所作另一篇演說內以及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實行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於是他就自己離開自己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就是因為列寧和黨——以第八次代表大會為代表——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中間沒有絲毫區別。原來就是因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切演說內，到處都認為「聯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態度」的決議也是如此，在這裏也是認為「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是完全相等的。而因為列寧和黨認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很快就成過去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於是他們曾經有而且現在還有完全理由來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曾經有而且現在還有完全理由來把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稱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須讀一讀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底速記錄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就可以深信這一點。

請看從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裏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因為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為問題困難，所以那些預定對付富農的打擊就往往落到了中農身上。我們在這裏犯了非常大的過失。在這方面集合起來的經驗，將能幫助我們來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今後避免這種過失。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明明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還沒有什麼物質福利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具體物質福利，而這種福利是我們現在還拿不出來的，而且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福利的情況下渡過那些在現時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鬥爭月份。可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實踐中能做出很多事情來：改善我們的機關，糾正大抵濫用職權的現象。我們能夠而且應當設法糾正並完全糾正我們黨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同盟、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的路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線」(見俄共(波)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二四至二五頁)。

你由此可見，列寧是沒有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間有絲毫區別的。

又請看從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態度」的決議裏摘引來的一段話吧：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對付富農的辦法在某種程度內推行到中農身上，那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魯地違背共產主義一切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其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期與中農協定，是無苦痛地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現象的條件之一。

因為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之故，——甚至於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裏，更不待說在俄國，——中農是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的，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頗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黨工作人員在農村中的策略，應當是計算到與中農實行長期合作……

……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完全正確的政策就能保證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工農政府和共產黨底政策，今後也應當本着這種由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協定的精神來進行」\*(見俄共(波)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四一七至四二〇頁)。

由此可見，這個決議也是沒有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間有絲毫區別的。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這個決議中沒有一個字是講到與中農「堅固聯盟」的。可是，這是說決議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政策麼？決不是。這只是說，決議認為「協定」

\* 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合作」概念是與「堅固聯盟」概念完全相等的。而這是不言而喻的：不與中農「協定」，就不能與中農「聯盟」，而如果不與中農實行「長期」協定與合作，則與中農聯盟就不能成爲「堅固」聯盟。

事實就是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離開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聲明，或者是必須拋棄這種不莊重的假設，而承認列寧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是沒有認爲在「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間有絲毫區別的。

總之，誰不願意成爲空洞咬文嚼字主義犧牲品，誰願意細心思索列寧口號——倚靠貧農、與中農協定、與富農鬥爭這一口號底意思，誰就不能不瞭解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就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撞騙的圈套，却中了他們挑撥離間的詭計，落入敵人替你掘好的陷阱。反對派騙子們在那裏大喊大叫地硬說他們是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口號的，同時他們故意作出挑撥離間的暗示，說與中農「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箭雙鷗：第一，隱瞞自己關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其內容不是要與中農協定，而是要「與中農紛爭」（請參看我在第十六次莫斯科省黨代表會議上引證過的反對派份子斯米爾諾夫那篇有名的演說）；第二，把「協定」與「聯盟」間的虛構的區別拿來做圈套，以便擒拿波爾什維克那些頭腦簡單者，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某些同志是怎樣回答這一點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徒底假面具，不僅不揭破這些騙徒對黨隱瞞其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爲，——却反而滾入圈套，滾入陷阱，讓別人推着他們自己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吹大擂地暢談列寧口號，反對派份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者，——因此我應當避開這個口號，免得人家把我混在反對派一塊，否則人家就可責備我是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底邏輯就是如此！

而這還不是反對派撞騙手段底唯一例子。例如就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說吧。波爾什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黨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波爾什維克培養幹部方法底靈魂。反對派大聲囂嚷地硬說自我批評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硬說黨是從他們那裏抄襲這個口號並因此而向反對派投降了的。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想瞞着工人階級，欺騙着工人階級，不讓工人階級知道在以破壞黨性為目的的反對派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為目的的波爾什維克自我批評中間是隔着一條鴻溝的；第二，——使某些頭腦簡單者落入圈套，並逼迫他們表白自己不同意於黨的自我批評口號。

而我們某些同志是怎樣對付這一點呢？他們不僅不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不僅不堅持波爾什維克自我批評口號，——却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口號而聽憑反對派愚弄，並：向它投降，而同時却誤以為他們是表白自己不同意於反對派。

這樣的例子是可以引出一大堆來的。

可是，我們在自己工作中是不能聽憑任何人愚弄的。我們尤其不能在自己工作中以反對派關於我們的議論為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排斥反對派底拐騙手腕，也排斥我們某些落入反對派挑撥離間圈套的波爾什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底話：「一心按照你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去說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此回信曾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在真理報第一五二期上登載）

## 論聯共(波)內的右傾危險

——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首先就須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問題等等，以便解決那引起我們注意的右傾問題。在我們黨內不是有右傾的機會主義的危險；是不是存在着有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對這個危險作鬥爭，——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不撇開那一切蒙蔽這個問題並妨礙着我們來瞭解問題本質的小事情和次要成份，那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查波爾斯基以爲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問題，——他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他硬說，這裏全部事情，並不在於右傾，而完全是在於意氣鬥爭，在於個人陰謀等等。就暫時假定說這裏也同在任何鬥爭裏一樣，意氣鬥爭和個人陰謀是有幾許作用吧。可是，拿意氣鬥爭來解釋一切，只看見意氣鬥爭而不看見問題本質，那就是離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就是像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疑義是巨大的老練的團結一致的組織，竟會因爲幾個意氣鬥爭者或陰謀家努力而上下下都被驚動，都被發動起來。不呀，同志們，天下是不會有這樣的怪事的。我還不說，對於莫斯科組織底力量和能力是不可這樣輕視的。在這裏起作用的，顯然是一些更深刻的原因，這些原因是無論與意氣鬥爭或個人陰謀，都毫不相干的。

福龍托夫雖然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但他不認為這個危險是值得由認真求實者去認真從事的，——他這種想法也是不對的。照他這樣說來，右傾問題原來是空喊者從事的對象，而不是求實者從事的對象。我完全懂得福龍托夫底意思，他是這樣忙於日常的實際工作，以至沒有工夫來想到我們的發展前途。可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些黨工作人員底狹隘求實的實踐主義變為我們的建設工作底教條。健全的事務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前途和不使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它就會變成不良現象了。可是不難明白：右傾問題是關於我黨基本路線的問題，是關於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是否正確的問題。

有些同志在討論右傾問題時，把問題完全着重在那些代表右傾的個人身上，——這些同志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指出右傾份子或調和份子來，請說出他們的姓名來，以便使我們能夠懲辦他們。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個人當然是有相當作用的。可是，這裏問題不在於個人，而是在於那在黨內產生右傾危險的條件和環境。儘可以把個人排除，但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就算把我們黨內右傾危險底根源打破了。所以個人問題雖然也確實值得注意，可是它不能解決事情。說到這裏，不能不回憶起一九一九年末和一九二〇年初在奧德沙地方發生的一件故事，那時我方軍隊已把鄧尼金軍隊逐出烏克蘭，並正在肅清奧德沙一帶的鄧尼金軍隊最後的殘部。那時，有一部分紅軍戰士在奧德沙怒氣沖沖地搜尋協約國，因為他們相信，他們一拿獲協約國，那戰爭就會終結了。（全場發笑）。就假定說紅軍戰士當時在奧德沙竟能拿獲協約國底某個代表吧。可是，協約國問題當然是不會因此而解決的，因為雖然當時奧德沙是鄧尼金隊伍最後一塊地盤，但協約國底根源並不在於奧德沙，而是在於世界資本主義。我們某些同志在談到右傾問題時就專門着重於那些代表右傾的個人，同時却忘記產生這種傾向的條件，——這實在是和上述故事相彷彿哩。



所以，我們在這裏首先應當說明的，就是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托洛茨基傾向）藉以產生的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共產黨內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而走向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趨向，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但畢竟是一種偏向。既然有某一部分共產黨員認為選舉鬥爭中的「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是不妥當的（法國），或發表意見反對由共產黨提出的獨立的候選名單（英國），或不願加重反「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鬥爭問題（德國）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就是說，在共產黨內是有人正在極力想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的。如果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得到勝利，那就會使共產黨在思想上被人粉碎，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而什麼是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呢？這就是使資本主義加強和鞏固，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裏的主要支柱。所以，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勝利，結果就會使那些為保存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蘇聯發展條件下——在這裏，資本主義已被推翻，可是資本主義根蒂還未被拔除——共產黨內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我們黨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趨向，偏向，固然是尚未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但畢竟是一種偏向。既然我們有某部分共產黨員企圖拉着我們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往後退，否認有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必要，或要求縮小我國工業，認為現時工業發展速度是使國家趨於滅亡的，或認為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不妥當的，是枉費金錢，或認為以自我批評為基礎進行反官僚主義鬥爭是不妥當的，認為自我批評能動搖我們的機關，或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就是說，在我們黨隊伍內是有人企圖使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他們自己還不覺得）「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和需要的。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

就會使我們國內資本主義份子大大加強。而使我們國內資本主義份子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滅弱無產階級專政和加強資本主義恢復機會。所以，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就會使那些為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使資本主義恢復（復辟）成為可能的條件呢？是的，存在着。同志們，這也許好像是很奇怪的，但這却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加強速度發展着我們社會主義工業，並使農民經濟與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可是，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這些根蒂到底是深藏在什麼地方呢？它們是深藏在商品生產裏，深藏在城市小生產和特別是在農村小生產裏。資本主義底力量，正如列寧所說，是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每日、每時、自發、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很明顯的，既然小生產在我國具有大批的甚至於比重較大的性質，既然它經常地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所以在我國就有使資本主義恢復成為可能的條件。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為消滅剷除資本主義恢復可能所必要的工具和力量呢？是的，存在着。列寧關於在蘇聯有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的提綱，其所以是正確的，就正因為這提綱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為此就必須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工農聯盟，以國家工業化為觀點來發展我國經濟命脈，用很快速度來發展工業，使全國電氣化，把全部國民經濟都轉到新技術基礎上，使農民羣衆合作化和提高農民經濟收成率，逐漸使個人農民農莊聯合成為公共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請看列寧如何說明這一點吧：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這是必須記着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和將它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者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我們還沒有打破國內敵人的基礎和根基。國內敵人是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的，爲要打破它的基礎，就只有一個方法——這就是把全國經濟，連農業也包括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只有電氣才是這樣的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否則國家仍然還是一個小農國家，而這是我們必須明白覺悟的。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些。這是人人皆知的。我們已覺悟這點，而且我們一定會做到使經濟基礎從小農的過渡爲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已電氣化時，當我們已給工業、農業以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時，——只有那時，我們才獲得最終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至四七頁）。

第一，由此可見，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當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時，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有時候，人們把樹砍倒了，而樹根子却還沒有拔除，因爲力量不夠。由此就有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可能。

第二，由此可見，除有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而外，在我國還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因爲我們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能夠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和達到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努力實行全國電氣化，如果我們給工業、農業以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由此也就有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

最後，由此可見，不可只在工業裏建設社會主義，而同時却使農業聽命於自發的發展，以爲農村「自己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裏社會主義工業底存在，就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底基本因素。但這還不是

說，這個因素是完全足夠的。爲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夠引導農民的農村到底，爲此就必須如列寧所說那樣，「把全國經濟，連農業也包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列寧這一段話，不是與他那另一段話說「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相矛盾麼？不是的，是不相矛盾的。恰巧相反，這兩段話是彼此完全相符的。]列寧完全不是說新經濟政策給我們以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只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可能建成與社會主義實在建成之間，是大有差別的。不可把可能與現實混爲一談。正是爲要把這個可能變成現實，正是爲着這一點，列寧才主張全國電氣化，主張給工業、農業以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作爲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底條件。

可是，要在一兩年內就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不可能的。決不可在一兩年內就把全國工業化，建成強大工業，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給農業建立新技術基礎，把個人農民農莊合併爲巨大集體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並克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爲此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多年的緊張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時，——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到的，——我們就仍然還是一個小農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小生產是經常地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在這個國家裏，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還是存在的。而既然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複雜的最現實的最實際的生活裏，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份子就「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用這自發勢力來浸染無產階級，來腐化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由醉心轉爲灰心等舊病復發的現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九頁)，並這樣把某種猶疑心理，某種動搖情緒，注入無產階級及其黨中來。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我黨隊伍內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裏。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可把我們黨內右傾或「左」傾問題當作一個值不得注意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傾，即公開機會主義傾向底危險，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它輕視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底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底訣竅，因而就很輕易地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要求寬待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和城市資本主義份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毫無疑義的，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勢力，就會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陣地，就會提高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起來的機會。

我們黨內「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底危險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它誇大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底力量，只看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而看不見有用我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陷於悲觀失望而不得不以妄說我黨正在特米多爾化來聊以自慰。列寧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從列寧這句話當中，「左」傾就作出一種不正確的結論，說在蘇聯根本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說和農民是辦不出任何事情來的，說工農聯盟思想是一個已經過時的思想，說如果沒有西方已獲勝利的革命趕快來救急幫忙，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會倒台或蛻化，說如果不採納那種幻想的超工業化計劃——那怕就是以與農民決裂為代價來實行這計劃也吧——那末，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就要算是已經滅亡了。由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類的」跳躍。毫無疑義的，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脫離其餘工人羣衆，——因而就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恢復資本主義的條件易於形成。

由此可見，這兩個危險，無論是「左」傾危險或右傾危險，這兩個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左」傾，雖然各從不同的兩端出發，而它們兩者所引起的結果，却總是一樣的。

在這兩個危險中間，那一個壞些呢？我認爲兩個都很壞。從我們進行順利鬥爭反對它們的觀點上來說，這兩個傾向間的區別，就在於「左」傾現時對於黨是比右傾明顯些。我們已對「左」傾作過幾年的緊張鬥爭，——這個情況對於黨，當然曾不能徒然過去。很明顯的，在對「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幾年中，黨已學會許多東西，誰要用「左的」辭句來欺騙黨，那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至於說到右傾危險——這個危險，從前也是存在的，現在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因去年糧食採辦工作危機而加強的原故，所以更加顯露出來，——那末我認爲，右傾危險對於我們黨某些黨員層是還不如此明顯的。因此，任務就在於連一分鐘也不減弱對「左」傾危險——托洛茨基主義危險——作鬥爭，而同時却着重於反右傾的鬥爭，並採取一切辦法使這個傾向底危險，在黨看來是與托洛茨基主義危險一樣明顯的。

右傾問題，如果它不是與關於我國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的問題有聯繫，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可是，事情也就在於：右傾底存在是使我國發展過程中的困難趨於複雜，並阻難着克服這些困難的。正因爲右傾危險是阻難着爲克服困難而進行的鬥爭，正因爲這樣，所以關於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在我們看來是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

現在要關於我國所有困難底性質問題說兩句話。應當注意到，我國所有的困難不是停頓過程中或衰落過程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過程中或經濟停頓過程中的困難，而在發生這種困難時，人們總是力圖把經濟停頓現象弄得比較不沉重，或使經濟衰落狀況比較不深刻。我國所有的困難是與這種困難毫不相同的。我國所有困難底特點，就在於它們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是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當在我國講到

困難時，我們通常所講的，都是關於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幾，要把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幾，要把收成率增加多少普特，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正因為我國所有的困難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過程中或停頓過程中的困難，正因為這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不應當是有什麼特別危險的。可是，困難終究還是困難。正因為要克服困難就必須緊張一切力量，必須有剛毅性和堅定性，而剛毅性和堅定性又不是每個人都夠有的，這也許因為有人覺得疲倦和疲勞，或是因為有人寧願過着比較安靜的過活，而不願有鬥爭和風波，——於是正是在這裏就發生猶疑和動搖，轉向到阻力最小的方面去，說要減低工業發展速度，說要寬待資本主義份子，否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并根本否認一切超出日常工作尋常安靜環境的事情。可是，我們除非克服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就不能向前進展。而為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破右傾危險，首先就必須克服右傾，因為右傾阻礙着為克服困難而鬥爭的事業並企圖動搖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鬥爭的意志。這裏所講的，當然是對右傾作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因為怕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也不拒絕宣佈對右傾危險作鬥爭，好像傳教師有時唱唸「上帝至善，上帝至善」一樣，可是並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把反右傾鬥爭放在應有的基礎上和在事實上克服這個右傾。這樣的派別，就是我們所稱爲的對於右的公開機會主義的傾向的調和派。不難瞭解：反對這種調和派的鬥爭，是與反右傾，反右傾危險的總鬥爭底組成部分。因為不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反對這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派，就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代表者問題，毫無疑義是值得注意的，雖然它不能解決事情。在去年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發生危機時，我們在我們黨下層組織裏會碰見右傾危險代表者，當時在村鎮裏有一整批共產黨員起來反對黨底政策，設法去與富農份子勾結起來。你們知道，這種份子在今年春季已被清出我們黨以外，這一點在今年二月間，已經在我們黨中央一個著名文件裏特別提到了。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剩下這種份

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縣黨組織和州黨組織，仔細查看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那你們用不着花費什麼工夫就可在這裏找到右傾危險代表者以及對於這個危險的調和態度代表者。大家知道有我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好些工作人員底「書信」、「申明書」以及其他文件，在這中間，右傾趨向是表現得十分鮮明的。你們知道，在中央七月全會速記錄上曾提到這些書信和文件。如果再往上去看看並提出關於中央的問題，那就必須承認，在中央委員成份裏面，也有一些對右傾危險採取調和態度的份子，固然這些份子是極少的。中央七月全會速記錄就是對於這一點的直接證明。而在中央政治局內又是怎樣呢？在中央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既沒有右傾份子，也沒有左傾份子，也沒有對他們採取調和態度的份子。這是必須在這裏十分鄭重說明的。仇視黨的份子以及各種反對派份子散佈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於右傾的調和態度，——拋棄這種謠言的時候已經到了。

在莫斯科組織裏或在其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動搖和猶疑呢？是的，是有過的。如果現在硬說那裏未曾有過猶疑和動搖，那就愚蠢極了。彭可夫底誠懇演說就是對於這一點的直接證明。彭可夫並不是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裏的沒有作用的人。你們已經聽見，他直接地公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政策許多極重要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這當然不是說，莫斯科委員會整個都會發生動搖。不是的，不是這樣說。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全體黨員書這樣的文件，就毫無疑義地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克服了自己某些委員底動搖。我相信莫斯科委員會底領導中堅是一定能完全糾正現狀的。

各區組織曾出來干涉這件事情，曾提出關於必須剷除莫斯科組織裏某些領導人底錯誤和動搖的問題，而有些同志對於這一點却表示不滿意。我不知道，這種不滿意究竟有何理由。莫斯科組織裏各區積極份子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而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這有什麼壞處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情況中進行的麼？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一般無產階級的下層份子底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



實麼？如果各區積極份子會議竟然勝任了自己的責任，那又有什麼壞處或危險處呢。

中央會出來干涉這件事情，這是不是做得對呢？我認爲中央是做得對的。伯爾津認爲，中央會提出關於撤換一個曾被區組織所反對的區領導人問題，這是做得太激烈了。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可請伯爾津記起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發生的幾件故事，當時有些中央委員犯了一些違背黨路線的錯誤，——我認爲是不很嚴重的錯誤，——當時依照列寧提議，會給這些人以懲罰，以警效尤，其中有一個人曾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而另一個人則幾乎曾被取消中央委員資格。列寧當時是不是處置得對呢？我以爲他是處置得完全對的。當時在中央裏的情形，不像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着托洛茨基跑的，而在中央本身裏面的情形是不穩固的。現時，中央底處置法已經是寬柔得無比了。爲什麼呢？也許是因爲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吧？不是的，原因不在這裏。原因是在於中央底情形在現時已比當時穩固些，所以中央現在有比較從寬處置的可能。沙哈洛夫硬說中央出來干涉得太遲了，——他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他所以說得不對，是因爲他顯然不知道，中央底干涉在事實上是從本年二月起就開始了的。沙哈洛夫如果願意，就可信服這一點。固然，中央底干涉是沒有立刻就收到具體效果的。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1）右傾危險是我們黨內的嚴重危險，因爲它是在我國社會經濟環境中有其根源的；（2）右傾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而不克服右傾以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就不能克服這些困難；（3）在莫斯科組織裏，會有動搖與猶疑，會有不穩固性底成份；（4）莫斯科委員會底中堅，因有中央和各區積極份子會議底幫助，已採取一切辦法去剷除這種動搖；（5）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克服從前暴露出來的錯誤，這是不容懷疑的；（6）任務就在於剷除內部鬥爭，使莫斯科組織團結一致，在擴展自我批評基礎上來順利進行支部改選工作。（鼓掌）。

## 論聯共(波)內的右傾

——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波)中央全會上的演說底一部分——

###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呢？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就是與最近在我們國內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問題有聯繫的。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具有偶然性質的。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由於最近所發生的這樣一些階級變動，這樣一種階級鬥爭尖銳化，這種變動，這種尖銳化就造成着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布哈林集團底主要錯誤，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本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新反對派就不瞭解黨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就是新反對派底特徵。

新反對派領導者們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發言時，完全避開我們國內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階級鬥爭尖銳化，甚至於絲毫沒有暗示到我們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鬥爭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這一點呢？他們講到所有一切事情，既講到哲學，又講

到理論，可是關於那些在現時決定我黨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階級變動，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爲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爲他們有健忘病吧。當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記主要事情的。這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和不瞭解現時在我們國內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爲他們忽略了主要事情，忽略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的階級變動。本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新反對派就在我黨新任務面前表示張惶失措和空拳無力。

試回想最近在我們黨內發生的種種事變吧。試回想我們黨近來因在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的各個口號吧。我所指的是這樣一些口號，如自我批評的口號，加緊反官僚主義鬥爭和清洗蘇維埃機關的口號，組織新經濟工作幹部和紅色專門家的口號，加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的口號，進攻富農的口號，減低成本費和根本改善職工會工作實踐的口號，清黨的口號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胆戰心驚和令人頭昏目眩的。可是很明顯的，這些口號是黨在現時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赫亭案件發生而從新提出關於培養新經濟工作幹部的問題，關於由工人階級人材中造就紅色專門家來代替舊專門家的問題。因沙赫亭案件發生而暴露出什麼呢？暴露出以下一點：資產階級還遠未被澈底擊破，它正在我國經濟建設方面組織着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勾當；我們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以及一部分黨組織，竟把我們階級敵人在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因此就必須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手段來鞏固和改善我們各個組織，發展和鞏固其階級警覺性。

於是就特別加重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不把我們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那就不能改善我們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以及黨組織，那就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鎮壓資產階級暗害勾當。而暗害勾當是不僅在煤礦區內，而且在金屬工業方面，而且在軍事工業方面，而且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黃金和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方面，都曾有過

而且還繼續存在着的，——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因為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加重了關於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關於進攻富農的問題，關於以壓榨富農豐裕份子為方法來組織糧食採辦工作的問題。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暴露出什麼呢？這些困難暴露出以下一點：富農不是在那裏睡覺，富農是正在發展着，他們組織着暗中破壞勾當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我們各個黨組織、蘇維埃組織以及合作社組織，至少是其中某一部分，却或是看不見敵人，或是遷就敵人，而不去進行反對敵人的鬥爭。

於是就更加重了關於自我批評的口號，關於審查和改善我們黨組織、合作社組織以及一般糧食採辦工作組織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以社會主義為基礎來改造工業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關於一貫減低成本費的口號，關於鞏固勞動紀律的口號，關於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口號等等。這些任務會要求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底全部實際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官僚主義份子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

於是就更加重了關於與那種存在於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以為不預先砥礪我黨本身，而就可以鞏固我們各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職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可以把官僚主義骯髒東西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了。官僚主義份子，不僅在經濟組織與合作社組織裏，不僅在職工會組織與蘇維埃組織裏生活着，而且還在我黨本身組織裏生活着，——這是不容懷疑的。如果黨是所有這一切組織底領導力量，那末很明顯的，清黨就是這樣一個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澈底振興和改善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於是就提出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的，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可以看見它們不是偶然的。它們是

一個分不開的鍊條上的各個必要環節，這個鍊條就叫做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

首先，這些口號就是與我國工業和農業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改造的時期有聯繫的。而國民經濟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改造又是什麼呢？它就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向國民經濟裏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着建成社會主義方面的一個最嚴重的進展。可是，為要實行這個改造，首先就須改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幹部，——無論是經濟工作幹部、蘇維埃幹部和職工會幹部也好，無論是黨幹部、合作社幹部也好——就須砥礪我們所有一切組織，把骯髒東西從這些組織裏清洗出去，就須提高千百萬工農羣衆底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與國民經濟裏資本主義份子對進攻着的社會主義實行反抗的事實有聯繫的。決不可把所謂沙赫亭案件看作一件偶然事情。「沙赫亭派」現時正盤踞在我們所有一切工業部門裏。其中有許多已被拿獲，但還遠未盡被拿獲。資產階級智識界底暗害勾當，是對於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最危險反抗形式之一。更因為暗害勾當是與國際資本有聯繫的，所以它就更具危險。資產階級的暗害勾當，毫無疑義是指明資本主義份子還遠未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新發動。至於說到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那末富農迄今已繼續到第二個年頭的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更不可以說是一件偶然事情。許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的，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却已不復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了。可是，這個事實却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如果從前，富農還比較軟弱，還沒有可能認真佈置其經濟，還沒有充分資本來鞏固其經濟，因此他會不得不將其全部剩餘糧食或者幾乎全部剩餘糧食都拿到市場上去，那末在現時，在經過好幾個豐年以後，他已將其經濟佈置周到了，他已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他就已有在市場上玩弄手腕的可能，已有把糧食——這個金幣底金幣——藏起來的可能，作為自己的後備資本，而寧肯把肉類、燕麥、大麥以及其他次要

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如果希望富農會自願讓我們從他那裏取得糧食，那就可笑了。你們看，富農現在實行反抗蘇維埃政府政策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而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對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勢力重新配置，其目的就是要堅持舊關係而反對新關係。不難瞭解：這些情況是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可是，爲要打破階級敵人反抗和替社會主義進展肅清道路，那末除掉其他一切事情而外，還須砥礪我們所有一切組織，把官僚主義從它們中間清洗出去，改善其幹部和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村勞動階層羣衆去反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

你們看，我們黨現時的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關於資本主義各國階級變動，也要這樣說。如果以爲資本主義穩定局面仍舊沒有改變，那就可笑了。如果硬說這個穩定局面日益鞏固和日益堅固，那就更可笑了。其實，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是逐月逐日削弱着和動搖着的。爲市場和原料的鬥爭的尖銳化，武裝的增長，英美對抗的增長，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左化，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的到來，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革命運動的發展，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毫無疑義地證明新革命高漲成份是正在資本主義各國增長着。

於是就有這樣一個任務：加緊鬥爭去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是反對該黨「左」翼，因爲它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有這樣一個任務：加緊鬥爭反對共產黨內右傾份子，因爲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有這樣一個任務：加緊鬥爭反對那種對於右傾的調和派，因爲它是共產黨內機會主義底避難所。於是就有把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共產黨裏清除出去的口號。於是就有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瞭解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可是，馬克思主義者總是瞭解：如果不實現這些口

號，那就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鬥，那就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那就不能實行挑選那些能引導工人階級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真正的共產主義運動首領。

同志們，這就是在我們國內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所發生的這樣一些階級變動，在這些變動基礎上就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方面以及在共產國際方面的現時的口號。

我們黨是看見這些階級變動的。它是瞭解新任務底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的。因此，它總是全副武裝去迎接事變。因此，它就不害怕那些擺在它面前的困難，因爲它總是準備着克服這些困難的。

新反對派底倒霧處，布哈林集團底倒霧處，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和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正因爲它不瞭解這些新任務，所以它就完全張惶失措，總是準備着逃避困難，見難而退，放棄陣地。

你們會看見在大河中間，比方在葉尼塞河這樣一條大河中間遇見大風浪時的漁夫麼？我曾看見過他們多次。有這樣一種漁夫，這種漁夫遇見已經到來的大風浪時，就動員自己所有的一切力量，鼓勵自己的人文心，大胆朝着風浪划船：『兄弟們，不要軟勁，努力抓着舵，破浪前進罷，我們是一定會勝利的！』。可是，也有另一種漁夫，這種漁夫一聞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開始叫苦連天而使自己所有隊伍底精神頹廢：『真倒霉呀，大風浪來了，弟兄們，臥在船板底下吧，閉着眼睛吧，也許可以僥倖勉強挨到岸邊吧』。（全場大笑）。布哈林集團底方針和行爲，是與這遇見困難就張惶退却的第二批漁夫一模一樣的，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我們說：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正在歐洲成熟着，這種情況向我們提出一些新任務：加強鬥爭反對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把右傾份子從黨內趕出去，加強鬥爭反對那掩護右傾的調和派，加強鬥爭反對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而布哈林却回答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不足掛齒的，我們沒有任何這種新任務，其實問題只是在於中央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即布哈林——『教訓一頓』。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向我們提出一些新任務，這些新任務要求我們一貫地減低成本費和在各企業裏鞏固勞動紀律，而爲要執行這些任務，就非根本改變職工會全部實際工作不可。而托姆斯基却回答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不足掛齒的，我們沒有任何這種新任務，其實問題只在於中央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即托姆斯基——「教訓一頓」。

我們說：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向我們提出一些新任務——加強鬥爭反對蘇維埃經濟機關底官僚主義，從這些機關裏清除腐化的和異己的份子、暗害份子，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而李可夫却回答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不足掛齒的，我們沒有任何這種新任務，其實問題只在於中央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即李可夫——「教訓一頓」。

而這難道不是可笑麼，同志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除了自己的肚臍而外就看不見世界上任何東西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布哈林集團底不幸，就在於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和不瞭解黨底新任務。而正因爲它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所以它就不得不做事變底尾巴，屈服於困難。

你們看，我們意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裏。

## (二) 在共產國際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和不瞭解那些由日益增長的新革命高漲條件向共產國際提出的新任務，這些任務就是要從共產黨內趕出右傾份子，制止調和派和把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共產黨內清除出去。這個情形已完全由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各問題的意見分歧所證實了。



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關於國際狀況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種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波）代表團內審核的。可是，這一次卻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由布哈林署名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波）代表團，同時就分發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各外國代表團了。可是，在這個提綱上會有許多條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波）代表團會不得不對這提綱加進大約二十個修正。

這個情況就使布哈林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應歸咎於誰呢？試問布哈林為什麼要在尚未交給聯共（波）代表團審核以前就把提綱分發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竟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波）代表團能否不加進一些修正呢？而結果竟是如此：由聯共（波）代表團內得出來的，其實已是一篇關於國際狀況的新提綱，而各外國代表團就拿這篇提綱來與那由布哈林署名的舊提綱對立。很明顯的，如果布哈林沒有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發給外國代表團，那就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

我想指出聯共（波）代表團所加進布哈林提綱的四個基本修正。我所以想指出這些基本修正，是為着更明顯昭示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各問題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個問題——這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局面底性質問題。按照布哈林底提綱說來，現時並沒有發生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的新現象，而是恰巧相反，資本主義是正在改造着和在基本上是比較穩固地支持着。很明顯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的這樣一種估計，是聯共（波）代表團所不能同意的。它所以不能同意這一點，是因為如果保存這種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那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們有材料來說我們是抱着所謂資本主義「健康化」的觀點，即抱着希法亭底觀點，抱着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抱的觀點。因此，聯共（波）代表團就加進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是不穩固的，而且不能是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尖銳化，這個穩定局面是正被事變進程

所動搖着，而且將來還會被事變進程所動搖的。同志們，這個問題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是有決定意義的。資本主義穩定局面是動搖着抑是鞏固着，——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整個方針都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我們現在究竟是處在什麼時期，是處在革命運動低落時期，處在簡單收集力量的時期，抑是處在新革命高漲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處在準備工人階級去作當前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底策略方針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波）代表團所提出的修正——這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其好處也就在於它規定出指望於第二個前途，指望於新革命高漲條件日益增長的前途的明白方針。

**第二個問題**——這就是關於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的問題。在布哈林提綱內說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但這還不夠。爲要使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進行得有成效，就須把問題着重於進行鬥爭反對所謂社會民主黨「左」翼，即反對那玩弄「左派」辭句和以此而巧妙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很明顯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克服一般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問題却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波）代表團會不得不對布哈林提綱加進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這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必須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可是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到要進行鬥爭反對那對於右傾的調和態度。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問題是在於當我們向右傾宣戰時，右傾份子就總是裝扮爲調和份子而使黨陷於困難情況。爲要預防右傾份子這種手腕，就必須提出關於進行反對調和態度的堅決鬥爭的問題。因此，聯共（波）代表團會認爲必須對布哈林提綱加進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這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竟沒有提到必須在各共產黨內保持鐵的紀

律。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爲什麼呢？因爲在加強反右傾鬥爭時期，在實行從共產黨裏清除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時期，右傾份子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組織，建立其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派別組織的襲擊，就須提出關於黨內鐵的紀律的問題和關於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如果不然，那就根本莫要想進行反右傾的嚴重鬥爭。因此，聯共（波）代表團就對布哈林底提綱加進一個相當修正，這個修正後來已由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曾能不把這些修正加進布哈林底提綱麼？當然不能。古代有人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但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波）代表團會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進布哈林底提綱中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各問題的意見分歧第一階段。

我們意見分歧第二階段是與所謂維托爾夫和特爾曼兩人案件有聯繫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部前任書記，他曾被控告爲濫用黨內經費。他曾因此而被開除黨籍。德共中央裏的調和派，曾以維托爾夫與特爾曼同志有接近關係爲藉口——雖然特爾曼同志是與維托爾夫犯罪行爲毫不相干的——竟把維托爾夫案件變成特爾曼案件而開始來攻擊德國共產黨底領導。你們大概已從報紙消息中知道，調和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當時竟能暫時拉攏德共中央大多數委員來反對特爾曼同志。而結果怎樣呢？結果，他們竟把特爾曼從領導機關中撤銷了，控告他爲舞弊營私，並且事先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委，也沒有得共產國際執委批准，就把「相當」決議公佈出來。於是在事實上，他們就不僅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反調和派的鬥爭的指示，不僅沒有進行鬥爭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却反而最無理地違背這個指示，進行鬥爭反對德國共產黨底革命領導，進行鬥爭反對特爾曼同志，以圖在德國共產黨員隊伍裏掩護右傾並批准調和態度。

而布哈林却不僅不去拉轉船舵和糾正現狀，不僅不去恢復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那已被違背的指示底權力，不僅不去制止調和派底越軌行動，却反而在自己一封有名的信內提議批准調和派底這次政變，把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派，而對於特爾曼同志，却又在報紙上加以誹謗，再次說他犯有罪過。而這還叫作是共產國際底「領導者」哩！難道天下有這樣的「領導者」麼？

中央討論了布哈林底提議並否決了這個提議。這當然是布哈林所不高興的。可是，這應歸咎於誰呢？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決議所以通過，並不是爲着要人違背它，而是爲着要人執行它。既然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曾決定向右傾及調和態度宣佈鬥爭，把德共領導保留給那以特爾曼同志爲首的基本中堅，而調和派份子愛維爾特和黑爾哈特却竟想來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底職責就在於制止調和派份子底越軌行動，而不是把德共領導留歸他們。布哈林自己應負其咎，因爲他「忘記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

我們意見分歧第三階段，是與反對德共內的右傾份子鬥爭的問題有聯繫的，是與粉碎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派別組織以及將該派別組織底首領從德共黨裏開除出去的問題有聯繫的。布哈林及其朋友們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的「立場」，就在於他們總是迴避參加這個問題底解決。其實，當時所解決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底生命問題。而布哈林及其朋友們雖然明明知道這一點，但他們却還是始終一貫地迴避參加相當機關底會議，這樣來阻礙這件事情底進行。爲着什麼呢？大概是爲着要無論在共產國際面前，無論在德共內的右傾份子面前，都不失爲「潔白君子」。爲着要在後來可以說：「把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開除於共產黨外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而是中央大多數」。而這還叫作是反對右傾危險的鬥爭哩！

最後，我們意見分歧第四階段。這階段是與布哈林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提出的要求有聯繫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品依曼，要求制裁特爾曼同志，說特爾曼同志似乎在自己某一個演說內曾批評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會不能同意布哈林底意見，因為我們手內完全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底要求。布哈林會答應交出文件來證實品依曼和特爾曼底錯處。可是，他連任何文件都沒有交出來。他不僅沒有交出文件來，而且把恩伯德洛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內的有名演說辭分發給聯共（波）代表團各委員，而這個演說辭就是後來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評判為機會主義演說辭的。布哈林所以把恩伯德洛底演說辭分發給聯共（波）代表團各委員並把它介紹為控告特爾曼同志的材料，本來是想證明他關於召回品依曼和關於制裁特爾曼同志的要求是正當的。而其實，他却以此而證明了他同情於恩伯德洛，而恩伯德洛立底場是被共產國際執委看作機會主義立場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各問題的意見分歧底各個主要點。

布哈林認為：我們既進行鬥爭反對共產國際各支部裏的右傾以及對於右傾的調和態度，既把社會民主黨份子和社會民主黨傳統從德國共產黨和捷克斯拉伐克共產黨裏清除出去，既把布蘭特列爾輩和達里格麥爾輩從共產黨內拋除出去，於是我們就「瓦解」共產國際，「殺害」共產國際。反之，我們却認為：我們既實行這樣的政策，既把問題着重在進行反對右傾以及反對那對於右傾的調和態度的鬥爭，我們就是鞏固共產國際，就是把機會主義者從共產國際裏清除出去，就是使共產國際各支部波爾什維克化，就是幫助各共產黨準備工人階級進行當前的革命搏戰。

你們由此可見，這並不是聯共（波）中央委員裏面的簡單的不同色彩，而是關於共產國際政策各根本問題的很嚴重的意見分歧。

### (三) 在國內政策各問題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我已說過：布哈林集團患着瞎眼病而看不見這些變動，不瞭解黨底新任務。我已說過：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新反對派底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和準備屈服於困難的心理。決不可說新反對派底這些錯誤是從天上落下來。恰巧相反，它們是與那已經過去而叫作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發展時期有聯繫的，當時建設事業是按和平道路進行的，可以說是按自流通路進行的，當時還沒有現在所有的階級變動，當時還沒有現在所有的階級鬥爭尖銳化。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一個與舊時期，即與恢復時期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是新的建設時期，即整個國民經濟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改造時期。這個新時期就引起新的階級變動，引起鬥爭尖銳化。它要求我們採取新的鬥爭方法，要求我們重新配置我們自己的力量，要求我們改善和鞏固我們所有一切組織。布哈林集團底不幸，也就在於他們現在還過着舊生活，看不見這個新時期底特點，不懂得必須採取新的鬥爭方法。由此就有他們那種瞎眼病，張惶失措和害怕困難的心理。

#### (一) 關於階級鬥爭

布哈林集團這種瞎眼病和這種張惶失措心理底理論基礎，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認為：這種瞎眼病和張惶失措心理底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對於我們國內階級鬥爭問題採取了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所指的，是布哈林那個非馬克思主義的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裏階級鬥爭訣竅的不瞭解。

在這裏，已經有人再三引證布哈林所著到社會主義之路這一小冊子裏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有名議

論。可是，這裏所引證過的，却有一些遺漏。讓我把這段議論完全引證出來吧。同志們，爲着暴露布哈林已如何深遠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起見，這樣引證是必要的。請聽吧：

「我國農民合作社組織底基本網子，將由這樣一些合作社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不是富農式的，而是『勞動』式的，這些細胞將生入我們一般國家機關體系中去，並這樣變成爲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鏈條底單個環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的巢窩，也將同樣經過銀行等等而生入這個體系中去；但它們在某種程度內將是異類物體，例如和租佃企業一樣。」。

有些同志從布哈林小冊子裏引證這段議論時，却不知爲什麼竟把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遺漏了。羅季特大概是想替布哈林幫忙，於是就乘此機會而從座上叫喊，說人家曲解布哈林底意思。可是，這全段引證底要點，正在於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因爲如果把租佃企業家與富農看作同等的東西，而富農又生入社會主義，那末從這裏就會得出什麼結論呢？結論只有一個，就是：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不僅富農，而且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全場大笑）。

這就是從這句話裏得出來的結論。

羅季特說：布哈林所說的是『異類物體』。

斯大林說：布哈林所說的，不是『異類物體』，而是『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所以，富農和租佃企業家『在某種程度內』是社會主義體系內的異類物體。可是，布哈林底錯誤，就在於他認爲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但終究還是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底理論竟弄到何等荒謬的地步。城市資本家和鄉村資本家，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生入社會主義，——你們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看，布哈林已說出何等荒謬的話來了。不呀，同志們，我們是不需要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讓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享用吧。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至今都認為在城鄉資本家與工人階級間是有不可調和的利益對立性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建築在這一點上面的。而現在，照布哈林底資本家和平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說來，所有這些原理都要頭顱顛倒過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不可調和的階級利益對立性正在消滅，剝削者正在生入社會主義。

羅季特說：這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預定需要的。

斯大林說：可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形式。

羅季特說：問題就在這裏。

斯大林說：而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是生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你羅季特怎麼不瞭解這一點呢？如果城鄉資本家是生入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去，那末到底是爲反對誰而必須進行鬥爭，爲反對誰而必須進行最尖銳形式的階級鬥爭呢？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需要，是爲着對資本主義份子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爲着鎮壓資產階級和根本剷除資本主義。可是，如果城鄉資本家，如果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是生入社會主義的，——既然如此，那是否一般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需要，那末是爲着鎮壓什麼階級呢？

羅季特說：問題就在於照布哈林說來，生入是預定要階級鬥爭的。

斯大林說：我覺得，羅季特已經賭咒發誓要替布哈林效勞了。可是，他的效勞却正好似狗能效勞一樣，因爲羅季特本來是想去挽救布哈林的，而事實上却完全把他沉到水底下去了。難怪人們說：「喜歡效勞的狗熊是比敵人更危險的」。(全場哈哈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在資本家階級與已爭得政權並奠定自己專政的工人階級間有不可調和的利益對立



性；或是沒有這種利益對立性，那就唯有宣佈階級利益協和而已。

或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或是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或是階級利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或是階級利益協和的理論。二者必居其一。

像布連唐諾或西得利、維伯這類的「社會主義者」鼓吹社會主義生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入社會主義的主張，那還可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在實際上就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可是，一個人既然想做馬克思主義者而同時又鼓吹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那就不可解了。

布哈林在其發言中企圖援引列寧一段有名言論來辯護自己的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他硬說列寧所說的，也同布哈林說的一樣。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粗魯地不可容許地誣蔑列寧。請看列寧這一段話底原文吧：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合作上面的，現時在某種條件下，也容許「耐潑曼」，即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摘自列寧所著我們要怎樣改組農檢查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你們由此可見，這裏沒有一個字是講到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這裏只是說我們「在某種條件下」，也「會容許」耐潑曼，即資產階級來參加工農合作。這是說明什麼呢？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會容許有耐潑曼生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只有不知羞恥者才能這樣來解釋列寧這一段話。這只是說，我們暫且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暫且不沒收其財產，而是在某種條件下還容許它存在，所謂某種條件，就是要它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法律，就是以逐漸把資本家從國民經濟生活中排擠出去為目的，而日益加緊限制他們。如果不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那難道可以實行排擠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底根源麼？不是的，是不可能的。在主張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下，難道可以消滅階級麼？

不是的，是不可以的。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是只能培植和永遠保存階級的，因為它，這個理論，是與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而列寧這一段話却完全完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內的階級鬥爭理論上的。在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列寧關於專政是殘酷階級鬥爭的理論中間，能有什麼相同處麼？很明顯的，在這裏是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處的。布哈林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應當熄滅和取消，以便達到消滅階級。反之，列寧却都教導着：只有經過堅持的階級鬥爭，階級才可被消滅，而這個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更殘酷的。

列寧說：

「消滅階級是一件長期的困難的堅持的階級鬥爭事情，這個階級鬥爭，在推翻資本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並不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鄙陋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是變更自己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成爲更加殘酷的」（摘自列寧所著匈牙利工人致敬禮，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你們看，這就是列寧關於消滅階級的言論。

經過無產階級底殘酷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底公式。

經過階級鬥爭熄滅和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底公式。

在這兩個公式中間能有什麼相同處呢？很明顯的，在它們中間是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處的。

所以，布哈林的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理論，是接近於講座社會主義派理論的理論。

布哈林及其朋友們所有一切錯誤底基礎，就在這裏。

也許有人說，布哈林的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值不得多講的，因為它本身就說着——不僅說着，而且喊着——反對布哈林哩。這是不對的，同志們！當這個理論還藏在櫃子裏面的時候，尙可不去注意它；在個別同志底作品裏面有些愚蠢話，這有什麼重要呢？直到最近以前，我們都是這樣處置的。可是近來環境已稍許改變了。最近幾年來囂張起來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已經在鼓舞着這一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它具有迫切的性質。現在已不可說它是藏在櫃子裏面了。現在，它，布哈林這一奇怪理論，企圖成爲我們黨內右傾底旗幟，機會主義底旗幟。因此，我們已不能把這種理論忽略過去。因此，我們務必打碎這種理論，打碎這個不正確的有害的理論，以便利我們黨員同志們去對右傾作鬥爭。

## (二) 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

布哈林從其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個錯誤，就在於他對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份子加強反抗蘇維埃政權社會主義政策這個問題，採取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裏是說什麼呢？不是說資本主義份子比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因此就加強其反抗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不是的，不是說這一點。況且，說資本主義份子似乎是比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是不對的。如果這是對的，那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已經瀕於滅亡了。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主義順利進攻着資本主義份子，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份子增長得快些，資本主義份子底比重因此降落下去，正因為資本主義份子底比重降落下去，所以資本主義份子就感覺得有滅亡危險並加緊其反抗。而他們暫時還有加強其反抗的可能，這不僅是因爲世界資本主義給他們以幫助，而且還因爲他們的比重雖然是降落着，他們的相對增長與社會主義底增長比較起來雖然是減低着，但資本主義份子底絕對增長還是有的，這也就給他們相當的可能來積聚力量，以便反抗社會主義增長過程。而在現今發展階段上，在現今力量對比條件下，階級鬥爭

底尖銳化和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反抗底加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布哈林及其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懂得這種簡明真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以馬克思主義態度而以庸人態度去觀察問題，企圖用各種偶然原因來解釋階級鬥爭尖銳化，例如說是因為蘇維埃機關「不中用」，因為地方同志們底政策「不謹慎」，因為「缺乏」靈活性，因為有「過火行動」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例如，請看布哈林所著到社會主義之路這一小冊子內一段足以表明他以完全非馬克思主義態度觀察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議論吧：

「鄉村中的階級鬥爭，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在其舊時形式中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通常都是由富農份子引起的。例如，當富農或靠剝削別人而發財並鑽進蘇維埃機關裏來的人們，開始槍殺農村通訊員時，——這就是階級鬥爭在最尖銳形式中的表現（這是不對的，因為最尖銳鬥爭形式是暴動。——「約、斯大林按」）。可是，這種情形通常都是在這樣一些地方發生的，在這裏，地方

蘇維埃機關還是軟弱的。隨着這機關底改善，隨着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支部底強固，隨着地方農村黨團組織底改善和加強，這種現象將——這是完全顯然的——日益稀少，歸根到底將完全消失」\*。

這樣說來，階級鬥爭尖銳化是由於機關性質的原因，由於我們下層組織中用或不中用，軟弱或強固。這樣說來，例如沙赫亭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暗害勾當——資產階級份子對蘇維埃政權的進行反抗底形式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底形式，——竟不是由於階級力量對比，不是由於社會主義增長，而是因為我們機關不中用。這樣說來，那末在大規模暗害勾當尚未出現於沙赫亭一帶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大規模暗害勾當出現的時候，這機關却不知為什麼就變成毫不中用了。這樣說來，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採辦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工作還是自流進行而階級鬥爭尙未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各地方組織是好的，或甚至是盡善盡美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反抗已採取特別尖銳形式時，我們各組織就忽然變壞和毫不中用了。這不是解釋，而是譏笑解釋。這不是科學，而是妖術。

這階級鬥爭尖銳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呢？

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是前進着，我們是進攻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是在工業和農業裏增長着，這種增長同時使得城鄉相當資本家隊伍受到相當排擠。現在情形是這樣，就是我們是按照列寧底這樣一個公式生活的，這個公式就是「誰戰勝誰」：或是我們把他們——資本家——打翻，給他們一個——正如列寧所說那樣——最後的決鬥；或是他們把我們打翻。

第二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份子不願自動下台：他們反抗着而且將來也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的生命末日到來。而他們暫時還能夠反抗，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降落了，但他們在絕對關係上還是增長着：城鄉小資產階級，正如列寧所說那樣，是每日每時從自己中間分滋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的，而這些資本主義份子則採取一切辦法來保持自己的生命。

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階級自動下台的事情。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資產階級不用盡自己所有最後殘餘力量來保持其生命的事情。無論我們各下層蘇維埃機關將來是好是壞，而我們的進展，我們的進攻，總是要縮減資本主義份子和排擠他們的，而他們這些垂死階級則將要不顧一切而實行反抗。

階級鬥爭尖銳化底社會基礎，就在這裏。

布哈林及其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底增長與其比重底增長混為一談。可是，這樣混為一談是沒有絲毫根據的。其所以沒有根據，是因為如果他們——資本家——進行反抗，那就完全不

是說他們變成比我們強大多些。實際情形恰巧相反。垂死階級起來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變成爲比我們強大多些，而是因爲社會主義比他們增長得快些，因此他們就日益比我們薄弱些。正因爲他們日益削弱，所以他們聞見自己生命的末日，就不得不盡一切力量和採取一切手段來實行反抗。

你們看，在現今歷史時機內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和資本家反抗底加強，其關鍵就在這裏。客觀實際情況既是如此，那末黨底政策又應當怎樣呢？

它應當是要喚醒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羣衆，提高其戰鬥力，發展其動員準備性，去進行反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去進行反對那正在反抗着的階級敵人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底好處之一，就在於它便利着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

布哈林的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布哈林的對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其害處是在什麼地方呢？

其害處就在於它催眠工人階級，搖動我國革命力量底動員準備性，渙散工人階級，便利着資本主義份子來進攻蘇維埃政權。

### (三) 關於農民

布哈林第三個錯誤是與農民問題有關的。大家知道，農民問題是我們政治上最重要問題之一。在我國條件下，農民是由幾個不同的社會集團組成的，即由貧農、中農以及富農組成的。很明顯的，我們對於這些集團的態度是不可同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底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於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所有這些都是不言而喻和盡人皆知的。可是，布哈林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估計農民時，階級分化底事實是失落了，各個社會集團存在底事實竟不知消

失到什麼地方去了，而只剩下一個叫做農村的灰色斑點。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而是什麼農村中的一片貧窮現象。而他在這裏發言時也就是這樣說：難道我國富農可以叫作富農麼？須知這是窮人呀，——他說。而我國中農難道像個中農麼？——布哈林在這裏聲言道。——須知這是餓肚子的窮人呀。很明顯的，這樣看待農民的觀點，是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根本錯誤的觀點。

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是的，是絕對正確的。爲什麼把農民看作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爲農民在現時組成我國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是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爲經濟基礎的階級。因爲，農民，當其還是經營着小商品生產的農民時，是經常地不斷地從自己中間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資本家的。這個情況對於我們，在我們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工農聯盟問題的態度問題上，是有決定意義的。這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工農聯盟，而只是那以反對農民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爲基礎的聯盟。由此可見，列寧說農民是最後資本主義階級的提綱，不但不與工農聯盟思想相矛盾，而是恰巧相反，是給這個聯盟以根據，使它成爲以反對我國經濟裏資本主義份子爲目標的工農聯盟的。列寧所以提出這個提綱，是爲要指明：工農聯盟只有在它是以反對那些由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爲基礎時，才能是堅固的聯盟。

布哈林底錯誤，就在於他不懂得和不接受這個簡單道理，他忘記在農村裏有幾個社會集團，看不見富農，看不見貧農，而只看見一片籠統的中農羣衆。這是布哈林毫無疑義的右傾，與「左」傾——即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相反，「左」傾在農村中是只看見貧農和富農而看不見其他社會集團的，是看不見中農的。

在工農聯盟問題上，托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集團間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區別就在於：托洛茨基主義反對與中農羣衆堅固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團則主張與農民實行隨便一種聯盟。用不着證明：這

兩個立場都是不正確的，它們兩者好像是好像半斤和八兩一樣的。

列寧主義絕對主張與農民基本羣衆堅固聯盟，主張與中農聯盟，但它不是主張隨便一種聯盟，而是主張與中農作這樣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保證着工人階級領導作用，鞏固着無產階級專政和便利着消滅階級的事業的。

列寧說：

「關於工農協定的公式，是可以隨便來解釋的。從工人階級底觀點上看來，只有當這個協定是維持工人階級專政和成爲消滅階級的手段之一的時候，這個協定才是可容許的，正確的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不注意到這一點，那末關於工農協定的公式，當然還是爲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敵人所主張的公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八七頁）。

其次，列寧說：

「現在，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並領導着這個政權。它領導着農民。領導着農民，——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以消滅階級爲路線，而不是以適應小生產者爲路線。如果我們離開這個根本的基本的路線，那我們就會不成其爲社會主義者而陷入這樣一些小資產者底營壘，「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營壘，這些小資產者，這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現在是無產階級底死敵」（見同上，第三九九至四〇〇頁）。

你們看，這就是列寧對於與農民基本羣衆聯盟，對於與中農聯盟問題的觀點。

布哈林集團在中農問題方面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中農底兩重性，介於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中間的兩重地位。列寧說「中農是動搖着的階級」。爲什麼呢？因爲中農一方面勞動者，這就使他與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這就使他與富農接近。由此就有中農底動搖。而這不僅在理論



上是對的。這種動搖在實際上也每日每時都表現出來的。

列寧說：

「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趨向於社會主義，寧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趨向於資產階級，趨向於自由貿易，就是說，後退到「慣常的」舊有的「歷來的」資本主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四頁）。

因此，與中農聯盟，只有當這聯盟是以反對資本主義份子為目標，以反對一般資本主義為目標，只有當這聯盟是保證着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只有當這聯盟是便利着消滅階級時，才能是堅固的。奇怪得很，布哈林集團竟把這些簡明道理忘記了。

#### （四）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

布哈林第四個錯誤，是與新經濟政策問題有關的。布哈林在這裏的錯誤，就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底兩方面性質，他只看見新經濟政策底一方面。當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我們會把這政策底鋒芒用去反對戰時共產主義，反對那排除任何貿易自由的規則和秩序。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表示某種貿易自由的。布哈林是把這一方面記住了。這是很好的。可是，布哈林弄錯了，他竟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有這一方面。布哈林忘記了新經濟政策還有另一方面。事情就在於新經濟政策絕對不是容許完全貿易自由，不是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新經濟政策是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起調節作用為條件的，在某種界限內的，在某種範圍內的貿易自由。新經濟政策第二方面，就正在這裏。而且，新經濟政策這第二方面，並不如第一方面次要些，甚至於也許比第一方面重要些。在我國市場上是沒有像在資本主義各國常見的那種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的。糧食價格在基本上是由我們規定的。工業品價格是由

我們規定的。我們努力實行減低成本費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時極力保持農產品價格穩定性。市場上這樣一種特殊的特別的秩序，是在資本主義各國內根本沒有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在新經濟政策尚存在時，就應當保存其兩方面性：一方面是反對戰時共產主義規則和以保證某種貿易自由爲目的；第二方面是反對完全貿易自由和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起調節作用爲目的。如果你們取消這兩方面底某一方面，那你們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了。

布哈林認爲新經濟政策只能「從左邊」受到危險，只能從那些想取消任何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受到危險。這是不對的。這是最粗鄙的錯誤。況且，這種危險現在是最不實在的，因爲現在我們各地方組織和中央組織內，沒有一個人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懂得保持某種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和適當的。現在比較更實在得多的，是從右邊來的危險，是從那些想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並這樣開關完全貿易自由紀元的人們方面的危險。毫無疑義的，這種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現在是比較更實在得多的。不應忘記，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是在這方面進行工作的，——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同樣應當記着，富農和豐裕份子底叫號，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底叫號——而我們有許多同志是往往受着這種叫號所影響的，——正是從這方面來衝擊新經濟政策。布哈林看不見這種真正實在的破壞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危險，——這件事實就不容置疑地證明他是被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所俘虜了。

布哈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和按區來「運用」糧食採辦價格，即增高糧食價格。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市場條件，他想漸漸消滅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並提議向那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讓步。

暫時假定我們是聽從了布哈林底勸告吧。由此會得出什麼結果呢？譬如說，在秋季，在糧食採辦工作初期，我們提高糧食價格。可是，因爲在市場上時常總有人，有各種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能多用多至三

倍的價錢來收買糧食；又因為我們不能同投機商人去搶生意，因為他們總共收買什麼一千萬普特，而我們却需要收買幾萬萬普特，於是糧食所有者橫直還是會把糧食扣着不賣，等候繼續漲價。於是到春季的時候，當國家正開始最需要大批糧食的時候，我們又得增加糧食價格。而什麼是在春季來抬高糧食價格呢？這就是害死貧農和農村困乏階層，這些人在春季不得不買進糧食，一部份是作為種子，一部份是供給食用，而這些糧食就是他們自己在去年秋季以賤價賣出去而現在又以高價買回來的。做完這些手續以後，我們不是能得到什麼重大結果，就是說得到充分糧食呢？一定是不能得到的，因為總是有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他們是能夠又用比我們多至兩三倍的價錢來收買這同一糧食的。於是我們又得準備更提高糧食價格，白費氣力來與投機商人以及屯賣商人競爭。

而既然如此，既然我們已走上提高糧食價格的道路，於是我們就應當往下滾去，同時却沒有得到充分糧食的担保。

可是，事情還不就此完結。第一，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然後就會應當也提高原料價格，以便維持各種農產品價格底相當比例。第二，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就會在城市裏也不能維持低廉糧食價格，——於是我們就會應當也提高糧食賣價。而我們既然不能而且不應當得罪於工人，——我們就應當加快速度來提高工資。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不提高工業品價格，因為如果不這樣辦，那就會使財源違反着工業化事業利益而從城市裏流入鄉村。結果，我們就會應當不是根據低降的價格或至少是穩定的價格來調勻工業品與農產品底價格，而是根據糧食和工業品一同高漲的價格來調勻這些價格。換言之，我們就會應當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不難瞭解：這樣「運用」價格，不能不弄到完全取消蘇維埃價格政策，弄到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弄到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這將有益於誰呢？這將僅僅有益於城鄉豐裕階層，因為高價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不能不是工人階級和貧農以及農村困

乏階層所買不起的東西。佔便宜的，是富農、豐裕份子、耐潑曼及其他富足階級。

這也會是結合，但這是一種特殊結合——是與鄉村富足階層和城市富足階層結合。工人和農村困乏階層將有全權來質問我們：我們究竟是誰人的政權，是農的政權呢，抑是富農耐潑曼的政權呢？

與工人階級以及與農村困乏階層破裂，與農村豐裕階級和城市富裕階級結合——這就是布哈林的市場「常態化」和按區「運用」糧食價格所要弄出的結果。

很明顯的，黨是不能走這條死路的。

布哈林所有一切關於新經濟政策的觀念是混亂到什麼地步，他是被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俘虜到如何厲害的地步，這在他對於城市與農村間的，國家與農民間的商品流轉底新形式問題採取極端反對態度的事實裏也是看得出來的。他氣憤起來和叫喊起來反對這樣一種事實，就是國家已變成對於農民的商品供給者，而農民則正變成對於國家的糧食供給者。他認為這是違背新經濟政策一切規則，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的。試問爲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如果國家，國家工業已變成對於農民的商品供給者，而農民則變成對於工業，對於國家的糧食供給者，那又能有什麼壞處呢？要是農民已變成對於國家工業的棉花供給者，糖蘿蔔供給者以及亞麻供給者，而國家工業則已變成對於農業這些部門的城市商品、種子和生產工具供給者，那從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新經濟政策方面看來又能有什麼壞處呢？定貨合同制在這裏是建立城鄉間這些新商品流轉形式的基本方法。而難道定貨合同制是與新經濟政策底要求相矛盾麼？如果因採用這種定貨合同制，農民不僅在棉花、糖蘿蔔和亞麻供給方面，並且在糧食供給方面也變成爲國家底供給者，那又能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小批生意，零星生意可以叫作商品流轉，而按照關於價格和商品質量的預定條約（定貨合同）來進行的大批生意就不能叫作商品流轉呢？這種荒唐話是來自何方呢？城鄉彼此按定貨合同制來實行商品流轉的這些新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它們是我們

各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極大進步，——這難道不容易瞭解麼？布哈林已經不會瞭解這些簡明的事情了，——這不是奇怪麼？

#### (五) 關於工業發展底速度和城鄉結合底新形式

最後，就是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關於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意見分歧底最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底重要性就在於：我們關於黨經濟政策問題的實際意見分歧底所有一切線索都是集中於這個問題的。

什麼是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呢，這從我們經濟政策方面看來是說明什麼呢？

首先，這就是說，除城鄉結合底舊形式而外，我們現在還需要這個結合底新形式：在舊形式下，工業會主要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花布、靴鞋、一般布疋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業將滿足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農業機器、拖拉機、精良種子、肥料等等）。如果我們從前主要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而少牽涉到農民莊稼底生產需要，那末現在我們除繼續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而外，同時還須盡力供給他們那些與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有直接關係的農業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了。從前，當任務還在於恢復農業和使農民好好經營過去地土富農土地時，我們還能以城鄉結合底舊形式為滿足。可是，現在當任務已在於改造農業時，這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更加前進，必須幫助農民以新技術和集體勞動為基礎來改造農業生產。

第二，這就是說，除重新武裝我國工業而外，我們同時還應開始來認真重新武裝農業。我們正在重新武裝着我國工業，而有一部分已經重新武裝過了，給它奠定着新技術基礎，供給它以新式的優良的機器，新的優良的幹部。我們建造着新工廠，我們改造着和擴大着舊工廠，我們發展着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

器製造業。在這個基礎上，城市就增長起來，新工業地點就增多起來，舊工業地點就擴大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對於糧食，對於工業原料的需求就增長起來。而農業却依舊使用着舊的工具，使用着舊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耕種方法，使用着舊的、粗笨的、現在已不中用或幾乎已不中用的技術，採用着舊的小農的個人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例如，在革命以前，我國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却有二千五百萬農戶，——這個事實是有何等意義呢？所有這些難道不正是說明農業帶日益散漫零碎性質麼？而散漫的小農農莊底特點，就在於它們不能在應有限度內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農業科學成績，就在於它們是商品額很小的經濟。由此就有農產品輸出額不夠的現象。由此就有城市與鄉村關係破裂，工業與農業關係破裂的危險。由此就必須催促農業發展，促使它趕上我們的工業發展速度。而為要防止這種破裂危險起見，就須以新技術為基礎來開始認真改造農業。而為着改造農業起見，就須逐漸把各個零碎農戶聯合為巨大農莊，集體農莊，就須以集體勞動為基礎來建設農業，就須擴大集體農莊，就須發展新舊蘇維埃農莊，就須有系統地把普通定貨合同形式應用於農業一切基本部門，就須擴大機器——拖拉機站體系，以幫助農民熟習新技術和把勞動集體化，——總而言之，就須逐漸把小農戶轉移到巨大集體生產基礎上，因為只有公共式的巨大生產才能盡量利用科學成績與新技術成績，一日千里地推進我國農業向前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忽視個體貧農中農經濟。不是的，不是這樣說。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工業供給糧食和原料方面，現在是起着主要作用的，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起着主要作用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必須幫助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可是，這是說，單靠個體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正是說明這一點。因此，除發展個體貧農中農經濟而外，同時還須盡力發展集體農業形式和蘇維埃農莊。因此，必須以普遍定貨合同，以成立機器——拖拉機站，以盡量發展合作社，作為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和集體公共農莊間的橋梁，以便使農民易於把自己細小的個體經濟轉到集體勞動軌道上

來。除非有這些條件，就不能真正發展農業。除非有這些條件，就不能解決穀物問題。除非有這些條件，就不能使困乏農民階層解脫貧苦，解脫窮困。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國工業，因為我國工業是農業生產在其改造方面的基本養料源泉，必須發展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廠和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經過普遍定貨合同制來促使基本農民羣衆進到集體經營形式，如果不用大批拖拉機、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那就沒有可能來發展集體農莊，就沒有可能來發展機器—拖拉機站。可是，如果不加緊速度發展我國工業，那就沒有可能用機器和拖拉機供給農村。由此，加快速度發展我國工業，就是以集體制爲基礎來改造農業的關鍵。

城鄉結合底新形式之意義和意義，就是如此。

布哈林集團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城鄉結合底新形式之必要。可是，這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認，其目的是要在口頭上承認城鄉結合底新形式爲旗幟來暗中偷運一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其實，布哈林是反對城鄉結合底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發點，不是以加快速度發展工業作爲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積杆，而是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在布哈林看來，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場「常態化」，以及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農產品價格，其實就是容許完全自由貿易。於是他就對集體農莊採取不信任態度，這種不信任態度，是在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的演說內以及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以前起草的提綱內表現出來了的。於是他就對於在採辦糧食時爲反對富農而實行的所有一切種種非常辦法，採取否定的態度。大家知道，布哈林之躲避非常辦法，是好像邪鬼躲避神香一樣的。大家知道，布哈林至今還不能瞭解，在現今條件下，富農是不會自願地自流式地交出充分數量的糧食的。這在現時已由我們糧食採辦工作兩年來的經驗所證明了。

好吧，而如果商品糧食畢竟還是不夠，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對此回答道：切勿用非常辦法驚動富

農；從外國輸入糧食吧。他不久以前還提議從外國輸入約等於五千萬普特的糧食，就是說輸入約值一萬萬盧布金幣的糧食。而如果金幣需要用來輸入工業裝置品，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對此回答道：必須先從外國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說要把輸入工業裝置品的事情擱置在後面去。

照他這樣說來，解決穀物問題和改造農業的基礎，竟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而是以自由市場和在自由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為基礎來發展個體農民經濟，連富農經濟也包括在內。

於是我們就看見兩個彼此不同的經濟政策計劃：

黨底計劃：

(1) 我們重新武裝（改造）工業。

(2) 我們開始認真重新武裝（改造）農業。

(3) 爲此就須擴展建設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廣泛採用定貨合同制和設立機器——拖拉機站，作爲建立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結合的手段。

(4) 至於說到現時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困難，那就必須承認可以在這裏採取一種以中農貧農羣衆共同贊助爲後盾的臨時非常辦法，作爲打破富農反抗和盡量取得其剩餘糧食的手段之一，而這些剩餘糧食是爲免得從外國輸入糧食而保存金幣來發展工業所必要的。

(5) 個體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國家供給糧食和原料方面，現時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將來也還會起着主要作用；可是，單靠它已經不夠了，——因此，除發展個體貧農中農經濟而外，同時還須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廣泛採用定貨合同制，加緊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以便易於把資本主義份子從農業中排擠出去，易於漸漸把個體農莊轉移到巨大集體農莊軌道上去，轉移到集體勞動軌道上去。

(6) 可是，爲要做到這一切，首先就必須加緊發展工業、五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



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否則不能解決穀物問題和改造農業。

結論：加快速度發展我國工業，就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布哈林底計劃：

(1) 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提高糧食價格，那怕這會使工業品、原料和糧食都昂貴起來。

(2) 盡力發展個體農民經濟，而同時相當降低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發展速度（布哈林在七月間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3) 按自流手續採辦糧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不容許採取——那怕就是局部採取——非常辦法對付富農，即使這些辦法得到中農貧農羣衆底贊助，也是不可採取的。

(4) 在糧食繳納不夠時，就從國外輸入約值一萬萬盧布的糧食。

(5) 而在金幣不夠來同時開支糧食輸入和工業裝置品輸入時，就必須減少裝置品輸入額，也就是說降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否則我國農業就會「踏步不進」，也許還會「筆直下降」。

結論：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就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同志們！事情真相就是如此。

布哈林底計劃是降低工業發展速度和破壞城鄉結合新形式的計劃。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如此。

我們對於發展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對於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等等事情，是不是做遲了呢？

有人硬說，黨對於這件事情，至少是做遲了兩年。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完全不懂蘇聯經濟的「左派」叫喊者才能這樣說。說在這件事情上做遲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是

說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則我們還在十月革命時就已開始做這件事情了。而關於黨還在當時，還在十月革命時就已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這是不容絲毫疑義的。最後，還可拿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們黨綱來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在那裏是已經十分明顯地注意到的。可是，爲着實現和組織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單靠我黨上層領導份子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還是不夠的。所以，這裏所說的，不是預見，而是實現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的計劃。可是，爲要實現這樣一個計劃，就需要有一整批條件，而這些條件是我們從前沒有的，這些條件是只在最近以來才出現的。問題就在這裏，同志們。

首先，爲要實行這個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的計劃，就須使我們黨上層份子在這方面首先得到黨員羣衆底贊助。而我們黨是人數達百萬的黨，這是盡人皆知的。因此，曾須說服廣大黨員羣衆，使他們相信上層領導份子底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爲此就須在農民羣衆裏造成擁護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就須使農民不害怕集體農莊，而是根據本身經驗相信集體農莊優於個體農莊，並自動加入集體農莊。而這却是一件需要相當時間的嚴重事情。這是第二。

其次，爲此就要國家有一批爲資助這個運動，爲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必需的經費。而爲要資助這件事情，是需要許多萬萬款子的，親愛的同志們。這是第三。

最後，爲此就要把工業發展到多少足以拿出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來供給農業的程度。這是第四。可以硬說我們在兩年或三年以前就已經有這一切條件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

不可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在野黨。在野黨可以發出口號，——我所說的，是運動底根本實際口號，——以便後來在自己取得政權以後去加以實現。誰也不能責備在野黨，說它不應不立刻實現其基

本口號，因為大家都懂得，執掌政柄的，不是它這個在野黨，而是其他的黨。而像我們波爾什維克黨這樣的執政黨所處的情形，却就完全不同了。這樣一個黨底口號不是簡單的（鼓動的）口號，而是一種更大的東西，因為這些口號是有實際決定效力的，是有法律效力的，是應當立刻實行的。我們黨決不能提出某個實際口號而然後却把它延擱下去而不立刻加以實行。如果這樣，那就是欺騙羣衆。爲要發出口號，特別是如把千百萬農民羣衆轉移到集體制度軌道上去這樣一種嚴重口號，就要有一些可以使它直接實現的條件，最後就須創立和組織這些條件。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單是黨上層份子預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性，這對於我們還是不夠的。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們就要有一些爲實現和具體執行我們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黨底黨員羣衆，譬如說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是否已經準備就緒來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不是的，他們當時還沒有準備就緒來做這件事情。黨員羣衆向着城鄉結合底新形式方面的嚴重轉變，只有從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第一批嚴重困難發生時才開始的。只是因爲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羣衆才感覺得十分需要加速建立城鄉結合底新形式，首先就是加緊建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堅決贊助自己的中央來進行這件事情。你們看，這就是我們從前沒有而現在却已經具有的一個條件。

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我們不是已有千百萬農民羣衆擁護集體農莊或蘇維埃農莊的嚴重運動呢？不是的，是未曾有的。每個人都知道，在兩年或三年以前，農民是仇視蘇維埃農莊的；至於集體農莊，却被他們譏笑爲毫不中用的「康姆尼」。而現在呢？現在已是另一回事了。現在我們已有整批整批農民階層是把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看作是使農民經濟可以得到種子、優良牲畜、機器、拖拉機幫助的來源了。現在，只須給他們以機器和拖拉機，則集體農莊事業就會加快速度前進了。

在某些很廣大農民階層中的這種轉變，是從那裏來的呢？它是由什麼促成的呢？首先就是由於合

作社和合作社運動底發展。毫無懷疑的，如果沒有合作社，特別是農業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已在農民中間造成贊助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雄偉的發展，那我們就不會有像現在整批整批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這種趨向於集體農莊的熱心。現有的組織得優良的集體農莊在這裏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為它們給了農民一個很好的榜樣，它表明一把小農農莊合併為巨大農莊，合併為集體農莊，就可怎樣改善農業了。現有的設備得優良的蘇維埃農莊在這裏也起了相當的作用，它們會幫助農民來改良其經濟。我還不說你們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種種事實。你們看，這又是我們從前沒有而現在却已具有的一個條件。

其次，可以硬說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我們曾有可能認真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發出數萬萬盧布來資助這件事情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你們很清楚知道，我們在當時連用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的經費都不夠——而沒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工業，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工業化——，更不必說改造農業了。我們曾能從那成為全國工業化基礎的工業方面取出這些經費，而將其轉交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麼？很明顯的，我們曾不能這樣做。而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經費來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最後，可以硬說在兩年或三年以前，我們在工業方面已有充分基礎來加緊供給農業以機器和拖拉機等等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當時，任務是在於創造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將來供給農業以機器和拖拉機。當時，我們所有的區區經費也就用去創造這種基礎。而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這種工業基礎來供給農業需要了。無論如何，這個基礎在我國是以加快速度創造着的。

可見，我們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普遍發展所必需的條件是只在最近時候才造成了的。情形就是如此，同志們。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可說我們把發展城鄉結合底新形式的事情做遲了。

## (六) 布哈林之爲理論家

右傾反對派底理論家——布哈林——在我們政策各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上就是如此。

有人說，布哈林是我們黨底理論家。他當然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不小的理論家。可是，問題就在於他那套理論是不完全吉利的。這是只從他在黨政策各問題上所作出的那一堆錯誤中，——關於這些錯誤，我在上面已經講過，——就可看出的。他關於共產國際各問題，關於階級鬥爭問題，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城鄉結合底新形式問題所犯的這些錯誤，決不是偶然出現的。不是的，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底這些錯誤是從他那不正確的立場，從他那些理論缺陷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是一個理論家，但他是一個不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這個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以後，才可以成爲完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有些人援引着列寧那封論布哈林之爲理論家的有名的信。讓我們來讀這封信吧：

列寧說：

「從年輕的中央委員中間，我想關於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說幾句話。我以爲這是最出色的人材（就最年輕的人材來說），關於他們須要注意以下一點：布哈林不僅是黨內一個很寶貴的很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作是黨所喜愛的人；可是如果把他的理論觀點當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疑的，因爲在他的理論觀點中，有些學究氣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認爲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速記錄，第四冊，第六六頁）。

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學究式的理論家。如果把他的「理論觀點當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的理論家。列寧給布哈林底理論面目所作的估計，就是如此。

同志們，你們自己懂得，這樣一個理論家是還須補習一下的。而布哈林懂得：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他是一個還沒有完全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却是馬克思主義底靈魂，——如果他懂得這一點，那他就會謙遜一些，而這對於黨是只會有好處的。可是，倒幕處就在布哈林並不如何謙遜。倒幕處就在於他不僅不如何謙遜，而且關於許多問題，首先是關於國家問題，他還想去教訓我們的導師列寧。倒幕處就在這裏，同志們。

說到這裏，讓我來引證一九一六年在列寧與布哈林間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有名的理論爭辯吧。這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以便既揭露布哈林那種太不量力而竟想教訓列寧的奢望，又揭露他在這樣一些重要問題上，如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鬥爭問題等等方面的理論弱點底根源。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青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一篇署名為Zs. Bane的論文，這篇論文在事實上是用來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如果以為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是在於前者贊成國家而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其實，區別是在於革命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集中的，即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只是倒退到舊技術，舊企業形式去……」

「……對於社會民主黨——它是羣衆底教師，或至少應當是羣衆底教師，——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是仇視國家的……現在的戰爭已表明國家觀念底根蒂是何等深入到工人心靈中去了」。

列寧在其於一九一六年發表的專門論文中批評布哈林這些觀點而回答道：

「這是不對的。作者所提出的，是關於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有什么區別

的問題，而他所回答的，却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即關於他們對於將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何區別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必要的問題。可是，由此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忘記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中利用現代國家及其各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它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n)它，如Noth Bane同志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而且誤將這種觀點加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在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就會消亡，「逐漸」「死滅」……。

「：要想」着重指出」對於國家的「原則上仇視態度」，就須真正「明白」瞭解它，而作者却恰巧沒有明白性。至於「國家觀念底根蒂」這種話，那是完全糊塗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並不是「國家觀念」與否認國家觀念相衝突，而是機會主義政策（就是說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對待國家）與革命社會民主黨政策（就是說以革命社會民主黨態度對待資產階級國家和以這種態度利用國家去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個階級）相衝突。這是兩個彼此完全不同的東西」（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青年國際）。

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是滾入了什麼半無政府主義泥坑中去，——這看來是很明白了！

斯騰說：當時列寧還沒有盡量規定「炸毀」國家底必要性。而布哈林雖然是犯着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來規定這個問題了。

斯大林說：不是呵，這裏所說的，不是這一點，這裏所說的，是對於一般國家的態度，這裏所說的，是按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就中也仇視工人階級底國家。

斯騰說：列寧當時只說到利用國家問題，而關於「炸毀」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時是絲毫也沒有說到的。

斯大林說：你弄錯了。我敢向你担保，這裏所說的，是按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們）底意見，工人應當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因此也就是仇視過渡時期底國家，仇視工人階級底國家。你試去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哩。布哈林在他那篇登載於青年國際雜誌上的論文中所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在這裏沒有看見一件「小事情」，就是說沒有看見一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工人階級如果確實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就除非有他自己的國家不行。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其批評中未曾說到「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僅會說到這個理論，——這是從我們所引證過的那段話內就可看出的，——而且還會澈底批評這個理論，說它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關於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它對立。最後，不可把無政府主義的「炸毀」國家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打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理論混為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認為它們都是同一個思想底表現。但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同志們。列寧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時，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理論出發的。

爲了更加明白起見，我不妨在這裏引證列寧關於國家問題的手稿之一——這個手稿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末或一九一七年初（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寫的。從這篇手稿中就可容易看見：（1）列寧在批評布哈林那些關於國家問題的半無政府主義錯誤時，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理論出發的；（2）雖然布哈林，——如列寧所說那樣，——是「稍比考茨基近於真理」，但他還是「不



僅沒有揭破考茨基份子，反而用自己那些錯誤去幫助了他們」。請看這篇手稿底原文吧：

「在關於國家問題方面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是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六日（新歷三月二十八日）致伯爾的信。

茲將該信最重要處完全引錄如下：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按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橫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一字來挖苦我們已太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普魯東的著作以及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直截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後，國家就會自行解散（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不得不用來以強力鎮壓自己的敵人的一種臨時機關，那末所謂自由的人民國家的話頭，就純粹是無謂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時，那就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自己的敵人而需要的；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要提議到處用「團體」（Genossenschaft）一字來代替國家一字，團體一字是個很好的德國古字，是與法文「公社」相當的」（着重點是恩格斯所加）。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裏，這大概是最顯著的最激烈的所謂「反對國家」的語句了。

（1）「應當拋棄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

（2）「公社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究竟是什麼呢？顯然是由國家過渡到無國家狀態的過渡形式！）

（3）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一字來「挖苦」（原文 in die Zinne geworfen——打嘴巴）我們已經夠了（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爲他們的德國朋友犯了這個顯然的錯誤而覺得羞恥；但他們認

爲——而且按當時情況說來當然是正確地認爲——這個錯誤是遠不如無政府主義者底錯誤那樣嚴重的。這要NB!!!。

(4)「從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施行時起」，國家就會「自行解體(『自行解散』)(Nota Bene)和消失」……(請與以後的「消亡」一字對照看)……

(5)國家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需要的「臨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6)國家所以需要，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Niederhaltung)一字按字面說來不是鎮壓，而是制止復辟，鎮服(無產階級底敵人)。

(7)在有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8)「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要提議『到處』(在綱領上)不講『國家』而講『團體』(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見，不僅僅機會主義者，而且連考茨基也如何俗化了和污辱了馬克思與恩格斯。

機會主義者是有懂得這八項極豐富思想中任何一項的！

他們只看見現今的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鬥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得讓步」。這是對的(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用這樣用算術方式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其宣傳作品和一般時評著作上，完全抹煞了(或是忘記了？或是沒有瞭解？) 馬克思那(1)、(2)、(5)、(6)、(7)、(8)等項和 Zerbrechen 一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與潘業枯克辯論時(見下文第四五至四七頁)，關於這個問題已完全滾落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處，就是我們主張（甲）現在利用國家和（乙）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也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立刻就對於實際工作有最重要意義的幾項。（而布哈林却正是把這幾項忘記了！）

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處，就是我們主張以下幾點更深刻『更恆久的』真理：（甲甲）國家是有『暫時』性的；（乙乙）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丙丙）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性質；（丁丁）國家與自由是相矛盾的；（戊戊）用『團體』一字代替國家一字，『團體』一字是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名辭）；（己己）『打破』（Zerschlagen）官僚軍閥機器。還有一點不可忘記，就是德國的公開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和科里布等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却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它，容忍科里布及其同流底叛徒行爲。

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已向布哈林寫過：『請你讓自己的關於國家的思想完全成熟吧』。可是，他不僅沒有讓自己這些思想完全成熟，却反而署名『Nota Bene』爬到刊物上去發表論文，而且他在這篇論文裏不僅沒有揭破考茨基份子，反而是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而按實質說來，布哈林是稍比考茨基近於真理的』（尼、列寧）。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辯底簡要歷史，就是如此。

看來是很明白了：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已經是改正這些錯誤而跟隨列寧前進的時候了。可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能這樣想。布哈林原來是不同意於這點的。他反而硬說：不是他錯了，而是列寧錯了；不是他跟隨了或應當跟隨着列寧走，而是相反，原來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走。同志們，你們不相信麼？那末，就請再聽下去吧。自從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以後已過九年時——在這九年當中，布哈林是沒有做聲的，——在列寧逝世一年以後，即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把自己那篇標題爲關於帝

國主義國家的理論的論文登在法權革命彙刊上——這篇論文就是從前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編輯部（即列寧）所沒有接受來發表的，——他在這篇論文附註中簡直說道：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這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却是事實哩，同志們。

請聽聽這個附註底本文吧：

「弗、依（即列寧）曾發表一篇小評來反對青年國際雜誌上的一篇論文。讀者容易看到，我未曾犯有那種加在我頭上的錯誤，因為我明白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性，另一方面，從依里奇底小評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對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原理是抱有不正確態度的，因為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消亡問題混淆了\*。也許我當時應當多多發揮專政這一題目。可是我能這樣來替自己辯白，就是當時社會民主黨人曾經這樣風行一時地讚美資產階級國家，以至於在這種情形下，自然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關於炸毀這架機器的問題上。

當我由美國回到俄國而會見納捷施達、康士坦丁諾夫娜時（這是在我們的祕密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弗、依躲藏起來了），她第一句話就是說：「弗、依請我轉告你，關於國家問題，他現在與你沒有意見分歧了」。依里奇在研究這一問題時，關於「炸毀」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可是他已如此發揮了這個題目以及關於專政的學說，以至於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了一個新紀元」。布哈林在列寧逝世以後一年時，就是這樣用筆墨來議論列寧的。

你們看，這就是沒有學習成就的理論家過分奢望底標本。

也許納捷施達、康士坦丁諾夫娜真是會對布哈林說過布哈林在這裏所寫的話，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只可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列寧曾有某些根據來意料布哈林已經放棄或準備放棄自己那些錯誤。不過是這樣罷了。可是布哈林却有另外一種打算。他竟打定主意：從今以後應當算是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創造者或至少是鼓舞者的，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

我們向來都認為並且現在還照舊認為我們自己是列寧主義者。而誰知列寧及其門生——我們，却原來是布哈林主義者。這真是有點兒好笑哩，同志們。可是，你既碰到布哈林誇大吹牛的奢望，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可以設想，布哈林在其上述這篇論文附註上，不過是偶然失言，無意中說出一番蠢話，而後來却已把它忘記了。可是，這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原來是完全認真說出這番話來的。這從下述一件事實中間也就可以看得出來：布哈林在這個附註中所說的關於列寧錯誤和布哈林有理等語，在不久以前，就是說在一九二七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襲擊列寧以後已經過兩年的時候，又在馬列茨基所作的布哈林傳略裏發表出來了，而且布哈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去抗議馬列茨基這種：大膽行爲。很明顯的，布哈林反對列寧的言論，是不可算作偶然的。

照這樣說來，對的竟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鼓舞者竟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布哈林底理論錯誤和理論奢望，就是如此，同志們。

雖然有這一切，而這個人却還是有勇氣來在這裏發言時，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中「有些腐朽東西」，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中有趨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而說這種話的，就正是這個布哈林，這個布哈林是現在正犯着（而且過去已經犯過）一些最粗鄙的理論錯誤和實際錯誤的，是在不久以前還作過托洛茨基底門生的，是昨天還找過托洛茨基份子做同盟者來反對列寧主義者，還跑去和他們暗中私通的！同志們，

這難道不是好笑麼？

(七)是五年計劃呢，抑是兩年計劃呢

現在讓我來講李可夫底發言。如果布哈林是企圖給右傾思想奠定理論根據，那末李可夫就是極力想在自己發言中替這件事情立定實際提議的基礎，拿我國農業困難方面的「可怕情形」來恐嚇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沒有涉及理論問題。不是的，他是涉及這些問題的。可是，他涉及這些問題時，至少是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在他那已被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所否決的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草案中說：「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已否決這個完全不正確的立場，可是李可夫在這裏發言時又來擁護了這個立場。說在蘇維埃國家內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這話對不對呢？不是的，是不對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隨便一種增長。我們所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一定的增長，就是這樣一種增長，這種增長是能保證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部份有系統地超過資本主義部份的。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如果五年計劃忘掉這個中心思想，那它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胡說。勞動生產率底一般增長，是任何一個社會所願意的，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無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也好，都是願意的。蘇維埃社會與其他任何社會不同處，就在於它所願意的，不是勞動生產率底隨便一種增長，而只是這樣一種增長，這種增長是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形式超過其他各種經濟形式，首先是超過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並以此而保證克服和排除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而李可夫却把蘇維埃社會五年發展計劃底這一真正中心思想忘記了。他第一個理論錯誤，就在這裏。

它第二個錯誤，就在於從商品流轉觀點看來，他不認為或不願意瞭解在集體農莊——譬如說——和任何個人農莊——連資本主義個人農莊也包括在內——中間的區別。李可夫硬說，從糧食市場上的商品流轉觀點看來，從取得糧食的觀點看來，他看不見集體農莊和糧食私有主間的區別，所以在他看來，我們是從集體農莊方面，從私有主方面，或是從某個阿根廷糧食商販方面收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福龍金底底有名言論，福龍金會有一個時候硬說，在他看來，在何處以及向何人，向私有主或是向集體農莊收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的。這就是暗藏式地擁護、辯護與辯白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玩弄的詭計。雖然這種擁護是從商品流轉觀點上進行的，可是這個事實並不能改變事情，就是這種擁護畢竟還是辯白富農在糧食市場上玩弄的詭計。如果從商品流轉觀點上看來，在集體式經濟與非集體式經濟之間沒有區別，那是否還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否還值得給它們以優待條件，是否還值得去實現關於克服農業資本主義份子的困難任務呢？很明顯的，李可夫是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他第二個理論錯誤，就在這裏。

而且這還不過是順便說說而已。現在來講李可夫在他發言中所提出的實際問題吧。

李可夫在這裏硬說，除五年計劃而外，還需要另外的平行的計劃，就是關於農業發展的兩年計劃。他援引農業困難作為指出這兩年平行計劃的根據。他說過，五年計劃是一件好事情，他也是贊成這件事情的，可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擬定農業兩年計劃，那就更好了，——否則農業情形就會糟糕了。從表面上看來，這個提議似乎是一點也不壞的。可是如果切實去考察一下，那就可看見：他所以想出農業兩年計劃，原來是為要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實在的紙上空文，而兩年計劃則相反。我們曾能同意這一點麼？很明顯的，我們曾不能同意這一點。我們曾向李可夫說過：如果你不滿意農業方面的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為五年計劃上所規定的農業發展經費不夠，就請你公開說出你的補充提議，說出你的補充投資數目來，

——我們同意把農業方面這些補充投資加進五年計劃中去。而結果是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什麼關於農業方面補充投資的補充提議。試問：那末究竟爲着什麼而需要農業兩年平行計劃呢？其次，我們又向他說過：除五年計劃而外，還有每年計劃，即五年計劃底一部分，——請把你關於發展農業的具體補充提議加進頭兩年度每年計劃中去，如果李可夫一般是有這些提議的話。而結果怎樣呢？原來李可夫並沒有提出這樣的關於補充經費的具體計劃。那時我們就明白了：李可夫關於兩年計劃的提議，並不是要去發展農業，而是想來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實在的紙上空文的計劃，而是想來辱沒五年計劃。爲着安慰「心靈」，爲着掩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劃；爲着進行事情，爲着進行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你們看，這就是李可夫底戰略。李可夫所以提出兩年計劃來，是爲着在以後，在五年計劃具體實行過程中，好拿兩年計劃來對抗五年計劃，好來改造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遷就兩年計劃，縮小和刪削那用來發展工業的經費。

你們看，我們就是根據這些理由而否決了李可夫關於兩年平行計劃的提議的。

#### (八) 關於播種面積

李可夫在這裏恐嚇我們黨，硬說全蘇聯播種面積有一貫縮小下去的趨勢。同時他指着黨而暗示說，播種面積底縮減是應歸咎於黨底政策的。他沒有公開說我們事情有退化趨勢。可是，從他的發言中可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就是我們是有類似退化的趨勢。說播種面積有一貫縮減下去的趨勢，——這話對不對呢？不是的，是不對的。李可夫在這裏運用的，是關於全國播種面積的平均計算。可是，不用按區統計材料來修正的平均計算方法，是不可算作科學方法的。也許李可夫會讀過列寧所著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如果他讀過，他就應當記得，列寧怎樣在那裏責罵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因爲他們關於播種面積



增長情形是採用平均計算法，而忽視按區統計材料。很奇怪，就是李可夫現在來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底錯誤。所以，如果按區考察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就是說如果按科學方法來考察問題，那就以看見：在某些區域裏，播種面積是一貫增加的，在其他區域裏，播種面積，主要是隨着氣候條件為轉移而有時減少，並且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證明我們在什麼地方，那怕就是在某一個重要穀物區域內，是有播種面積一貫縮減下去的現象的。

的確，在某些遭受大冰凍或旱災的區域，例如在烏克蘭有些區域裏，播種面積近來是有一些縮減的。座·上·有·人·說：不是整個烏克蘭。

施·里·赫·特·爾·說：在烏克蘭，播種面積已增加百分之二點七。

斯·大·林·說：我所說的，是烏克蘭草原地帶。可是，在其他沒有被不良氣候條件所牽累的区域，例如在西伯利亞和在窩爾加河流域，在卡查赫斯坦和在巴什基里亞，播種面積是一貫增加着的。為什麼在有些區域裏播種面積一貫增加，而在別個區域裏却有時縮減呢？實在不可說黨政策在烏克蘭是一樣，而在蘇聯東部或中部又是另一樣吧。這是說不通的，同志們。很明顯的，氣候條件在這裏是有不小意義的。

對的，富農是不管氣候條件如何而縮減着播種面積的。這裏也許可以「歸咎」於黨底政策，因為黨底政策是要幫助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的。可是，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難道我們曾在什麼時候約許說要進行一種能使農村一切社會集團——連富農也在內——都能滿意的政策麼？而且一般說來，如果我們一般是想進行馬克思主義政策，那末難道我們可以實行一種能夠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都感覺滿意的政策麼？如果由於我們實行這個以限制和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為目標的列寧主義政策的結果，富農已開始局部縮減其播種範圍，那又何足為奇呢？難道可以不這樣麼？也許這個政策是不對的吧，——那就請向我直截了當說出這點來吧。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人，竟一看見富農局部縮減着播種範圍，就大驚小怪

起來說這是表明一般播種面積已經縮減，却竟忘記，除富農而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播種範圍是正在擴大的——還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它們的播種範圍是正在加快速度增長着的，——這不是很奇怪麼。

最後，在李可夫底發言中，關於播種面積問題還有一個不正確的地方。李可夫在這裏訴苦，說在某些地方，而正是在集體農莊最發展的地方，貧農中農的個人耕地面積開始縮減着。這是對的。而這有什麼壞處呢？而怎能不是如此呢？如果貧農中農開始拋棄個人耕地而加入集體農莊，那末集體農莊之擴大和增多，就應當使貧農中農個人耕地相當縮減，——這難道不很明白麼？而你想要怎樣呢？現在集體農莊方面有兩百萬餘海克脫土地。到五年計劃末，集體農莊將有二千五百萬海克脫以上。集體農莊耕地面積是靠誰人土地來擴大的呢？是靠貧農中農底個人耕地來擴大的。而你想要怎樣呢？如果不然，那又怎樣來使貧農中農底個人經濟轉移到集體經濟軌道上去呢？集體農莊耕地面積將在許多區域內靠吸收個人耕地而增加，——這難道不很明白麼？人們竟不願意瞭解這種簡單事情，真是奇怪。

#### (九) 關於糧食採辦工作

關於我們糧食困難，有人在這裏說了一大堆荒唐話。可是，他們却把我們糧食方面的暫時性的困難中的主要點忽略過去了。他們首先就忘記了，我們今年所收穫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收成總額，——約比去年少五六萬普特。這能不反映到我們糧食採辦工作麼？當然是不能不反映到的。也許這應歸咎於中央底政策吧？不是的，這是與中央底政策無干的。這是由於烏克蘭草原地帶有嚴重的歉收（大冰凍和旱災），以及北高加索、中央黑土省、西北區有局部的歉收。主要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去年到四月一日時，我們在烏克蘭已採辦了二萬萬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却只採辦了二千六百萬至二千

七百萬普特。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小麥與黑麥採辦額在中央黑土省幾乎降至八倍，在北高加索——降至四倍。今年在東部某些區域內，糧食採辦額幾乎增至兩倍。可是，這當然不能補償，而且也沒有補償我們在烏克蘭、北高加索以及中央黑土省糧食採辦不足的情形。不要忘記，在常態收成下，在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所採辦的糧食，等於全蘇聯所採辦的全部糧食一半以上，而有時還甚至等於三分之二。李可夫竟把這個情況忽略過去了，真是奇怪。

最後，還有第二個情況，這個情況是我們糧食採辦工作的暫時性的困難方面的主要點。我所指的，是農村富農和豐裕份子對於蘇維埃政權糧食採辦政策的反抗。李可夫迴避了這個情況。可是，迴避這點，就是迴避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主要點。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工作的經驗，是說明什麼呢？它是說明，那些握有大部分剩餘糧食並在糧食市場上起指揮作用的農村殷實階層不願意把我們所需要的糧食，按蘇維埃政權所規定的價格自動賣給我們。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萬萬普特糧食來供給城市和工業地點，供給紅軍和技術原料作物區域。按自流手續，我們大約能採辦三萬萬至三萬五千萬普特。其餘一萬五千萬普特，却不得不以有組織的逼迫富農和農村殷實階層的手續來取得。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工作的經驗所對我們說明的，就是這一點。

在最近這兩年內究竟發生了什麼變遷，這種變遷究竟是從何而來，為什麼自流辦法在從前有濟於事，而現在却已經不夠了呢？變遷就在於富農和殷實份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他們在經濟方面已強固起來，他們已積蓄起某些資本，因此他們現在已能在市場上玩弄手腕，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屯積起來等待高價，而拿其他農產品來週轉週轉。糧食不是平常商品。糧食與棉花不同，棉花是不能吃的，是不能見人就賣出的。在我們現今條件下，糧食與棉花不同處，就在於糧食是這樣一種商品，這種商品是大家都買的，是沒有它就不能生存的。富農注意到這一點，於是就把糧食屯積

起來，使一般糧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金幣之金幣。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使自己發財的工具，而且是可用來盤剝貧農的工具。富農手裏的剩餘糧食，在現今條件下是加強富農份子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工具，所以我們從富農方面取得這些剩餘糧食，就不僅便利着城市和紅軍底糧食供給，而且根本破壞着那個使富農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加強的工具。

爲要取得這些剩餘糧食，就要怎樣辦呢？首先就要消滅那種有害的危險的自流心理。就要組織糧食採辦工作。就要動員貧農中農羣衆去反對富農，並組織他們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關於加強糧食採辦工作的辦法。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按農民大會自動規定糧食繳納額原則實行糧食採辦的方法底意義，正是在於它使得有可能來動員農村勞動階層去反對富農以加緊糧食採辦工作。經驗已經表明這個方法給予我們以良好的結果。經驗已經表明這些良好結果是我們按以下兩方面得到的：第一，我們徵取農村富裕階層底剩餘糧食，這樣來便利我國供給事業；第二，我們在這事情上動員貧農中農羣衆去反對富農，並在政治上教育這些羣衆，把這些羣衆組織爲我們在農村中的強有力的數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却沒有注意到這第二個情況。而這個情況却正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糧食採辦方法底重要結果之一，甚至可說是最重要的結果。固然，有時候，這個方法是與採用反對富農的非常辦法配合着的，這就引起布哈林和李可夫底可笑的叫喊。而這裏有什麼壞處呢？爲什麼不能在有些時候，在一定條件下，採用非常辦法去反對我們的階級敵人，反對富農呢？爲什麼在城市內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機商人，將他們放逐到土魯汗斯克邊區去，而對於那些企圖扼住蘇維埃政權底咽喉和盤剝貧農的富農們，則不可按公共強制手續，按貧農中農賣糧食給我們採辦機關的價格去取得他們的剩餘糧食呢？這是從那裏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黨曾經說過它在原則上反對採用非常辦法對付富農麼？李可夫和布哈林顯然是在原則上反對採取任何非常辦法對付富農的。可是，須知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你們不能不知道，列寧在施

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甚至還曾表示主張——當然是在一定條件下——回到貧農委員會政策。而什麼是局部採取非常辦法對付富農呢？這與貧農委員會政策比較，甚至於還算不得滄海一粟哩。

他們，布哈林集團中的人們，希望說服階級敵人，讓他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自願交給我們。他們希望，富農——已經長大的，有可能拿其他農產品來玩弄手腕的，隱藏着自己所有剩餘糧食的富農，——會按照我們的糧食採辦價格而自願把自己的剩餘糧食交給我們。他們不是發了瘋麼？這難道不是明白證明他們不懂得階級鬥爭底訣竅，不知道什麼是階級麼？而他們是不是知道在為加強糧食採辦工作而召集的鄉村大會上，富農怎樣譏笑我們的工作人員和蘇維埃政權呢？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就是例如在卡查赫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費了兩點鐘工夫去勸說糧食所有人把糧食交出來供給國家的時候，有一個富農口裏啣着煙斗出來講話而向着這位鼓動員回答道：「喂，小後生，你跳一跳舞吧，那時我會給你兩個普特糧食」。

座上有人喊道：真是混蛋！

斯大林說：請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是呀，同志们，階級到底是階級呵。誰也逃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方法底好處，本來也就在於它使得更有可能來推動貧農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使得更有可能來打破富農底反抗並強迫他們把剩餘糧食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現時在新反對派中間，在布哈林集團中間最時髦的字眼，就是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過火行動」一字。這個字眼在他們那裏是最流行的貨物，因為它幫助他們掩飾他們自己的路線。當他們想掩飾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就是說：我們當然不反對逼逼富農，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犯的並且觸犯中農的過火行動。然後就來敘述這些過火行動底可怕情形，宣讀「農民」信札，宣讀如馬爾科夫一類同志們底大驚小怪的信札，然後就做出結論說：必須取消逼逼富農的政策。因為在實行正確政策時犯有過火行動，所以

就必須取消這個正確政策本身，——這豈不是很妙麼？這本是機會主義者底慣用手段；藉口說在實行正確路線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同時，布哈林集團裏的人們却細心緘默着，一言不說這樣一種事實，就是還有另一種過火行動，更危險更有害的過火行動，——這種過火行動，就是要與富農結合，遷就鄉村裏的富裕階層，用右傾份子底機會主義政策去代替黨底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反對這些過火行動的。我們大家都是反對把那些用去對付富農的打擊拿來觸犯中農的。這是很明顯的，關於這點是沒有絲毫疑義的。可是，我們堅決反對那種想用布哈林集團所努力實行的關於過火行動的那一套廢話來取消我們黨底革命政策和用布哈林集團底機會主義政策來代替它的企圖。不行的，『你們這套把戲是要不通的』。

請你們說一說，在黨底政治辦法裏，究竟有那一個政治辦法在實行中沒有遇着某些過火行動。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要進行鬥爭反對過火行動。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就責罵那是唯一正確路線的路線本身麼？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日這樣一個辦法來說吧。這個辦法是我們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辦法之一，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誰不知道，這個在實質上是十分革命的辦法，在我們這裏實行時往往遇着整批過火行動，有時甚至是極可惡的過火行動呢？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日的政策呢？新反對派中的人們是不是懂得，他們既然動輒藉口於糧食採辦工作方面的過火行動，於是他們就滾到何等污濁的泥坑裏去了呢？

#### (四) 關於反對右傾的鬥爭

這樣，我們就把我們意見分歧底一切主要問題——無論是在理論方面，無論是在我們黨底共產國際政

策及內部政策方面，——都逐條分析過了。由以上所述，就可看出，李可夫說在我們這裏有一致路線的聲明，是不符實情的。由以上所述，就可看出：其實在我們這裏是有兩條路線的。一條是黨底總路線，是我們黨底革命的列寧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就是布哈林集團底路線。這第二條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這一部分是因為在布哈林集團裏有不可思議的觀點糊塗，一部分是因為這第二條路線由於自己在黨內所佔比重軟弱之故，所以總想這樣或那樣暗藏起來。可是，你們看見，它，這條路線，到底還是存在着，而且是以一條與黨路線不同的路線，是以一條幾乎在我們政策一切問題上都與黨總路線對立的路線資格存在着。這第二條路線在基本上是右傾底路線。

布哈林已在這裏說過，政治局三個委員受着『公民死刑』，據他說，這三個委員被我們黨各個組織所『教訓着』。他說，黨已經使政治局這三個委員——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着『公民死刑』，因為黨在刊物上和會議上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而他們——政治局這三個委員——却『不得不』閉口不言。同志們，這是廢話。這是企圖滅弱黨反右傾鬥爭的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底假話。

照布哈林說來，如果他及其朋友們犯了右傾錯誤，那末黨是沒有權利來揭露這些錯誤的，黨應當停止反右傾鬥爭，等候布哈林及其朋友們自願放棄自己的錯誤。布哈林所要求於我們的，不是太多了麼？他不是以為黨是爲着他而存在，而不是他爲着黨而存在呢？當全黨動員起來反對右傾，進行決戰去克服困難時，誰強迫他閉口不言，靜靜地坐着呢？爲什麼布哈林及其知己朋友們現在不可出來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呢？如果布哈林及其知己朋友們決意採取一個並不是怎樣困難的步驟，那末黨一定會歡迎他們的，——關於這一點，難道有誰可以懷疑麼？爲什麼他們不決意採取一個歸根到底還是他們一定要採取的步驟呢？這不是因為他們把自己集團底利益看得比黨和黨總路線底利益更高麼？在反右傾鬥爭中，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竟不在場，這應歸咎於誰呢？說政治局三個委員遭受『公民死

刑」的話頭，乃是政治局三個委員底一個掩飾得不很巧妙的想強迫黨閉口不言和停止反右傾鬥爭的企圖，——這還不很明白麼？

反右傾鬥爭，並不是我們黨底次等任務。反右傾鬥爭是我們黨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我們自己隊伍內，在我們自己黨內，在領導運動和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參謀部內，——如果我們在這個參謀部本身內，容許右傾份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而這些份子是企圖使黨廢弛，企圖腐化工人階級，企圖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並這樣來在我國建設事業困難面前投降的，——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就會是說明什麼呢？這不會是說我們想漸漸消滅革命，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逃避困難，把陣地讓給資本主義份子麼？布哈林集團是不是懂得，拒絕反右傾鬥爭，就是叛賣工人階級，叛賣革命呢？布哈林集團是不是懂得，不克服右傾和調和派，就不能克服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而克服這些困難，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呢？既然這樣，那末關於所謂政治局三個委員受着「公民死刑」的廢話，究竟還有什麼價值呢？

不行的，你們用所謂「公民死刑」這類自由派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你們來和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內進行堅決鬥爭反對右傾及調和派。黨要求你們這樣做，是爲着便利動員工人階級，組織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的進攻，打破階級敵人底反抗並保證克服我國建設事業方面的困難。或是你們執行黨底這個要求，那時黨就會歡迎你們。或是你們不做到這一點，——但那時就請你們去埋怨自己吧。



# 偉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過去這一年，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各條戰線上都發生偉大轉變的一年。這個轉變，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在社會主義向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堅決進攻的標誌下進行的。這個進攻底特點，就是它已經使我們在我們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各個基本方面，都已經獲得許多有決定意義的成功。

由此就得出結論：黨在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個階段中，是適當地利用了退却，以便在新經濟政策往後各階段中組織一個轉變，並對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順利的進攻。

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曾說：

「我們現在退却着，好像是向後退却，可是我們所以這樣做，是譬如預備跳遠一樣，首先退後幾步，然後才向前猛進，更有力地跳往前去。僅僅是在這個條件下，我們在實行我們新經濟政策中，才會向後退却：以便退却以後，開始一個最堅持的向前進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頁）。

過去這一年底總結就是不容置疑地說明：黨在自己的工作中是順利執行着列寧這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指示的。

如果拿過去這一年在那對於我們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總結來說，那我們在這條戰線上進攻的成功，我們在這一年來的成績，就可歸納爲以下三個基本要點。

## (一) 在勞動生產率方面

毫無疑義的，我們的建設在最近這一年當中的最重要事實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已經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轉變。這個轉變是表現於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創造發起作用和雄偉勞動熱潮的擴展。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基本成績。

羣衆創造發起作用和勞動熱潮的擴展，是按以下三個基本方向促成的：第一，是由於經過自我批評而反對了那束縛羣衆勞動發起作用和束縛羣衆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第二，是由於經過社會主義競賽而反對了那些偷懶逃工者和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者；最後，第三，是由於經過實行不斷生產制而反對了生產中的頑固守舊的惡習。結果，我們在勞動戰線上就獲得了極大的成績，其表現就是在我們這個廣闊無邊的國家各個地方，都看得見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底勞動熱忱和勞動呼應。而這個成績是有無限偉大意義的，因爲只有千百萬羣衆底勞動高潮和勞動熱忱，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有蒸蒸日上增長，而如果沒有這種增長，則社會主義就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列寧說：

「勞動生產率，——這歸結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未曾有過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所以能夠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最終戰勝

資本主義，就是因為社會主義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二頁）。

列寧由此出發而認為：

「我們應當具有滿腔的勞動熱忱、勞動意志、堅持精神，因為在目前，只有這樣，才可最迅速挽救工農，挽救國民經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七七頁）。

列寧提在黨面前的任務，就是如此。

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黨是順利執行着這一個任務，堅決克服那些橫在這條道路上的困難的。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一個重要成績，就是如此。

## (二) 在工業建設方面

黨第二個成績是與它這第一個成績有密切聯系的。黨這第二個成績，就是在過去這一年當中，我們在大體上已經順利解決了重工業基本建築工程資金積累問題，採取了發展生產資料製造業的加快速度，造成了把我國變為五金國的前提。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基本成績。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幾年以前，我們就已經把它解決了。而重工業問題却就比較困難，而且更加重要。其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巨量資金，而且工業落後國底歷史已經表明，如果沒有大批的長期的借款，則重工業就無法發展。其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如果不發展重工業，那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就不能實現任何工業化。而因為我們未曾得到，而且現在也沒有得到什麼

長期的借款和多少長期的信貸，所以問題底緊張性對於我們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各國資本家正是由此出發，所以不肯給我們以借款，不肯給我們以信貸，却料想着，我們會不能自力解決資金積累問題，會在重工業改造問題上遭受失敗，因此會不得不向他們低頭求救，去受他們盤剝。

而過去這一年底總結，關於這點是說明什麼呢？過去這一年總結底意義，就在於這總結把資本老爺們底盤算打得粉碎。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雖然我們蘇聯遇到明裏暗中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並沒有去受資本家們盤剝，却用自己所有力量來順利解決了資金積累問題，奠定了重工業底基礎。現在，甚至於連工人階級底死敵也不能否認這件事實了。的確，如果在上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有十六萬萬餘盧布，其中投入重工業的，約有十三萬萬餘盧布，而在今年，投入大工業的基本建設金，則有三十四萬萬餘盧布，其中投入重工業的，則有二十五萬萬餘盧布；如果在上年，大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增加的百分數等於百分之三十，而在今年，大工業出產總量，則應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出產總量，則應增加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重工業建設資金積累問題對於我們沒有什麼無法克服的困難，這難道不很明白麼。我們現在正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重工業，超過舊時的速度，剷除我們「向來的」落後性，——這怎可懷疑呢？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五年計劃底預料，在過去這一年已被超過執行，而五年計劃最高標準，被資產階級「作家們」當作「高不可攀的幻想」，並使我們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膽戰心驚的五年計劃最高標準，在事實上却已成爲五年計劃最低標準了，——這又何足奇怪呢？

列寧說：

「爲要挽救俄國，就不僅要農民經濟有良好收成，——這還不夠，——也不僅要那替農民供給消費品的輕工業有良好情況，——這也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

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根本不能繼續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金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金，那我們就會不能繼續維持我們爲文明國家的地位，——更不必說繼續維持我們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由此可見，列寧是如何激烈規定了重工業資金積累的問題和黨在建成重工業方面的任務。

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黨是順利執行着這一個任務，堅決克服那橫在這條道路上的一切種種困難的。這當然不是說工業已經不會有嚴重的困難了。爲要建成重工業，不僅需要解決資金積累問題。爲要建成重工業，還必須解決幹部問題，這就是說：（1）我們要吸收成千成萬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技術人材和專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我們要培養由工人階級出身的新起的紅色技術員和紅色專家。如果資金積累問題可以說在大體上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問題却還急待解決。而在目前，在工業技術改造時期，幹部問題却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決定一切的問題。

列寧說：

「我們尚嫌不夠的主要東西，就是文化程度，就是管理才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有可能造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底文化人材」（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頁）。

很明顯的，這裏所說的，首先就是關於「文化人材」問題，關於供給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供給工業建設和工業管理事業以幹部的問題。

而由此就得出結論：雖然我們在資金積累方面已得到種種對於重工業有重要意義的極大成績，可是在幹部問題尚未解決以前，是不可說重工業建成問題已經完全解決的。

因此，黨底任務就是切實實行解決幹部問題，無論如何都要佔領這個要塞。  
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二個成績，就是如此。

### (三) 在農業建設方面

最後，就來說黨在過去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與上述兩個成績有機體聯係的。這裏所說的，就是我國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規模狹小的落後的個人農業，進到規模巨大的先進的集體農業，進到共耕制，進到機器——拖拉機站，進到基於新技術的農業勞動組合和集體農莊，以及進到各以數百架拖拉機和康拜因機爲武裝的巨大蘇維埃農莊。黨在這裏的成績，就在於我們已把許多區裏的基本農民羣衆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引上新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舊的發展道路，僅僅有利於少數的富豪資本家，而極大多數的農民，却不得不忍受貧困的痛苦；而新的發展道路，却將富豪資本家排擠出去，而把中農貧農從新武裝起來，用新工具把他們武裝起來，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把他們武裝起來，使其能夠擺脫貧困的境遇和富農的盤剝，而走上協同耕種，集體耕種的廣濶道路。黨底成績，就是我們在農民本身裏造成了這個根本轉變，並引導着廣大的貧農中農羣衆向前邁進着，那怕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困難，那怕有一切種種黑暗勢力——由富農和神父起，到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止——拚命的反抗。

請看以下幾個數目字吧。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六百餘萬公擔（即三千六百餘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三百五十萬公擔（即二千餘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莊底播

種面積是等於一百八十一萬六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約等於八百萬公擔（約四千七百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是等於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是等於一千三百萬公擔（約七千八百萬普特）。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按計劃規定，蘇維埃農莊底播種面積應等於三百二十八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一千八百萬公擔（約一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則應等於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其穀物商品產量則應約等於四千九百萬公擔（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在當前的一九三〇年中，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底穀物商品產量應等於四萬萬餘普特，即超過整個農業穀物商品總產量（即運出農村以外的穀物總量）百分之五十。

必須承認：像這樣飛快發展的速度，甚至於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大工業也未會有過，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大工業一般就是按很大速度發展的。

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巨大農業（集體農莊的和蘇維埃農莊的農業）是有偉大的前途，將顯出發展的奇蹟，——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以有這個空前的成功，是有許多原因的，而從這些原因中，至少應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這個成功是因為黨實行了列寧的教育羣衆的政策，經過培植合作運動來一貫把農民羣衆引向集體農莊。這個成功是因為黨進行了順利鬥爭，既反對那些企圖跳過運動而命令集體農莊發展的份子（「左傾」清談家），又反對了那些企圖把黨拉向後退而甘作運動尾巴的份子（右傾糊塗蟲）。如果沒有採取這樣的政策，黨就不會能夠把集體農莊運動變為農民本身真正羣衆的運動。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駐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

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是必須採取比較漸進步驟的；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共耕制，那就荒謬絕倫了；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共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只採取為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鬥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二頁）。

如果黨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已獲得極大的勝利，那就是因為它確切遵行了列寧這一個策略的指示。第二，農業建設事業中的這個空前的成功，就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正確計算到農民是日益需要新式農具、需要新式技術的，正確計算到農民在保存舊式耕作方法時是沒有任何出路的，而正因為它既計算到這一切，所以就及時給與了農民以多方的幫助：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機器——拖拉機站，組織共耕制，成立集體農莊，以及用蘇維埃農莊力量來多方幫助農民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即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已實際證明它有決心和有能力來給勞動農民羣衆以有系統的長期的生產幫助。歷來苦於缺乏農具的勞動農民羣衆會不能不極力歡迎這種幫助而走上集體農莊運動的道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而從今以後，工人底舊口號——「面向農村」，大概會以集體農莊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又有何足怪呢？

最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中的這個空前的成功，是因為我國先進工人出來承擔了這一件事情。我這裏是指那些協助農村工作的工人隊而言，這些工人隊散佈於我國所有一切主要區域，成十成百不等，奔走工作。必須承認：工人宣傳員是最善於在農民羣衆中進行集體農莊運動宣傳工作的宣傳員，實為任何其他現有的和可能的宣傳員所不及。既然如此，那末這些工人竟說服了農民羣衆，使其相信集體巨大農業優越於個人細小農業，何況現有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就是表明這種優越性的具體實例，——這又有何足



怪呢？

這就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中的成績所由長成的根源，而據我看來，這一成績是近年來所有一切成績中最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成績。

「科學」底反對意見已經完全破產和被打得粉碎了，它反對組織那包含五萬至十萬海克脫面積的大規模穀物工廠，認為組織這種工廠是不可能而且不適當的事情。實踐已把「科學」底反對意見推翻了，並且再次表明，不僅是實踐應當向「科學」領教，而且就是「科學」也不妨去向實踐學習學習。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大規模的穀物巨型工廠，是無法生長的。可是，我們的國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個「小小的」區別是不可忘記的。在資本家那裏，因為有土地私有制，所以如果不預先購買大批田地，或如果不繳納絕對地租，就不能設立大規模的穀物工廠，而為要購買大批田地或繳納絕對地租，就使生產擔負極大的費用。而在我們這裏，却恰巧相反，因為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既沒有什麼絕對地租，又沒有田地買賣制度，——這個情況就不能不造成使大規模的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條件。在資本家那裏，大規模的穀物農莊底目的，是要獲得最高限度的利潤，至少是要獲得那適合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否則資本家就根本不會樂於設立穀物農莊。而在我們這裏，却恰巧相反，大規模的穀物農莊，同時也就是國營的農莊，這種農莊為保證其發展，是既不需要最高限度的利潤，也不需要平均利潤率的利潤的，而能以最低限度的利潤為限，而且有時甚至於不需要任何利潤，——這個情況又造成使大規模穀物農莊易於發展的順利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既沒有什麼特別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信貸，又沒有什麼特別優待大穀物農莊的特殊稅率，而在以幫助社會主義部份為己任的蘇維埃制度下，這種優待辦法却存在着，而且將來還會存在的。高貴的「科學」竟把所有這一切都忘掉了。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底斷語，已經完全破產和被打得粉碎了，他們斷言說：（一）農民不會

加入集體農莊；（2）加緊速度發展集體農莊，只能引起羣衆的不滿和工農聯盟的破裂；（3）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不是集體農莊，而是合作社；（4）發展集體農莊和進攻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就會使國家得不到糧食。右傾機會主義者所有這些斷語，這些舊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廢話，已經完全破產和被打得粉碎了。

第一，農民已加入了集體農莊，而且整村、整鄉、整區一同加入了集體農莊。

第二，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不僅沒有減弱工農聯盟，反而更加鞏固了這個聯盟，給了這個聯盟以新的生產的基礎。現在就連瞎子也看得見：如果基本農民羣衆還有什麼嚴重的不滿情緒，那就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底集體農莊政策，而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在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民方面，還不能趕上集體農莊運動底發展。

第三，關於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大路」問題的爭論，是只配愛恆瓦里得和斯列模科夫這班年輕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去從事的學究式的爭論。很明顯的，在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還沒有發展的時候，合作社底初級形式，即供給合作社和銷售合作社，曾是「大路」；而當合作社底高級形式，即集體農莊已經出現的時候，集體農莊就成爲發展「大路」了。如果不用括弧來講，那就要說，只有列寧底合作化計劃，才算農村的社會主義發展大路，這個計劃包括所有一切農業合作形式，由初級形式起（供給、銷售合作社），一直到高級形式止（生產、集體農業合作社）。把集體農莊拿來與合作社對立，那就是侮辱列寧主義而暴露自己愚昧無知了。

第四，現在就連瞎子也看得見：如果我們沒有進攻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如果我們沒有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運動，那我們現在就既不會有今年已在糧食採辦工作方面得到的有決定意義的成功，也不會有已經蓄積在國家手裏的不可侵犯的幾千萬普特穀物儲存了。而且可以肯定斷言：因爲有集體農莊和蘇維

埃農莊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走出缺乏糧食的恐慌，或者說已經走出這種恐慌。而如果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將日更迅速發展，那就沒有根據懷疑，將來再過兩三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會成爲最富有糧食的國家之一，甚至也許會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糧食的國家。

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現象，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現象，就在於現時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已不是如從前那樣只是幾人一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以至於整府一同加入集體農莊的。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的基礎，而這一個根本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過去這一年來的最重要的成績。

托洛茨基主義底孟什維克「主張」，即認爲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基本農民羣衆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已經完全破產和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就連瞎子也看得見：中農已經轉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大家都看得見：工業農業五年計劃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而那些不相信在我國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是沒有權利來慶賀我們五年計劃的。

各國資本家底最後的希望，即以爲在蘇聯會恢復資本主義，會恢復「神聖私有原則」的希望，已經陷於破產和被打得粉碎了。被他們看作資本主義滋養料的農民，已成羣結隊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度」旗幟，而走上集體制度的軌道，走上社會主義的軌道。指望於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希望，已經陷於破產了。

其中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國資本主義份子就拚命企圖掀起舊世界一切勢力來反對實行進攻的社會主義，而這種企圖就使階級鬥爭尖銳化。資本是不願意「生入」社會主義制度的。

同樣，也正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最近以來，資本家底忠實惡狗，如司徒威輩與黑先輩，米留可夫輩與克倫斯基輩，唐恩輩與阿布拉莫維奇輩，就對波爾什維主義狂叫狂吠。指望於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一點

希望歸於消滅，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呀。

階級敵人這樣瘋狂的憤恨，資本走狗這樣兇惡的狂吠，如果不是證明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困難線上確實已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那還是證明什麼呢？

列寧說：

「只有能夠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度優越時，只有能夠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只有在這個情形下，那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實在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實在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固地和真正地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關於吸收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方法問題的，就是這樣提出關於把農民引上集體農莊建設軌道的方法問題的。

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黨是順利解決着這一個任務，堅決克服那橫在這條道路上的一切種種困難的。

列寧說：

「只有當我們真正促進和改善中農生活底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能夠在明天就拿出十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揮發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這一步，首先就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使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親自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七〇頁）。

列寧就是這樣提出關於改換中農技術武裝的方法問題，關於把中農吸收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方法問

題的。

過去這一年已經表明：黨把這一個任務也是順利執行着的。大家知道，到來年春天，即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在田場上就會有六萬餘架拖拉機，再過一年，就會有十萬多架，而再過兩年，就會有二十五萬多架了。幾年以前還看作「夢想」的，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把它變為現實而有餘了。

中農所以轉到「康姆尼」方面來的原因，就在於此。

黨底第三個成績，就是如此。

黨在這一年來的幾個基本成績，就是如此。

## 結束語

我們正開足馬力，沿着工業化的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拋棄我們歷來的「俄拉西的」落後性。我們的國家日益成爲五金業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架在汽車上面，把農民架在拖拉機上面的時候，就請那些以「文明」自誇的高貴資本家們去試試追上我們吧。我們且來看，究竟那些國家可以「評定」爲落後的國家，那些國家可以「評定」爲先進的國家。

（此文曾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在真理報第二五九期上發表）

## 關於蘇聯土地政策問題

——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現在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引起大家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大規模增長的事實。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特點，就是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已不像從前那樣只有個別集團的貧農，而且大批中農也加入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已從個別勞動農民集團和個別勞動農民階層的運動變成幾百萬幾千萬基本農民羣衆的運動了。就中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實：集體農莊運動已具有強大的日益增長的反富農的巨浪性質，這運動在自己的發展道路上掃除富農的反抗，擊破富農，並在農村中開闢廣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

可是，如果我們可以誇耀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已有許多實踐的成績，那末關於我們一般在經濟方面，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理論工作的成績，却就不可這樣說了。而且必須承認：我們的理論思想是趕不上我們的實踐成績的，在實踐成績與理論思想發展間有些隔離的現象。而其實我們的理論工作却不僅應當趕上實際工作，而且還要超過實際工作，武裝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去爲社會主義勝利而奮鬥。

我現在不來多講理論底意義。你們關於理論底意義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論，只要它是真正的理論，就能給予實際工作者以確定方針的能力，明白的前途，進行工作時的把握，確信我們事業

定能勝利的信念。凡此種種，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有巨大意義的，而且是不能不有巨大意義的。不幸我們正是在這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却開始跛腳。如果不然，那爲什麼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裏，關於我國經濟問題，總還流行着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呢？如果不然，那爲什麼這些理論和所謂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遇到應有的回擊呢？如果不然，那爲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原理——這些最能打破資產階級理論和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武器——竟開始被人忘掉，而不在我們的刊物上廣加宣傳，不被提到最前面呢？不根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去對資產階級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敵人，——這難道難得瞭解麼？

新的實踐就產生出對於過渡時期經濟各種問題的新的看法。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速度問題，結合問題，黨底政策問題，皆有新的提法。爲要不落後於實踐，就須立刻根據新環境來研究這一切問題。如果不然，那就無法打破那些模糊我們實際工作者頭腦的資產階級理論。如果不然，那就無法剷除這些已變爲頑固成見的理論。因爲只有對理論中的資產階級成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陣地。

讓我現在把這些資產階級成見——所謂理論——拿出幾個來批評一下，並在說明我國建設幾個樞紐問題時來暴露這些成見是如何沒有根據吧。

##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在共產黨員中間，至今還存在有那說我國國民經濟各部份彼此「平衡」的所謂「平衡」論。這個理論，當然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處的。可是，這個理論却爲右傾營壘裏面許多人所

宣傳着。按這個理論說來，在我們這裏好似是有兩個木桶，在一個木桶裏裝着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在另一個木桶裏却裝着非社會主義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兩個木桶橫在彼此平行的軌道上，並排向前滾去，和平共處，不相抵觸。大家知道，按幾何學說來，平行線是不會交合的。可是，這高明理論底創作者却認為這兩條平行線總有彼此交合的一天，而當它們彼此交合時，我們就有社會主義了。這個理論卻沒有看見，在這兩個所謂「木桶」後面，是有各階級站立着的，而這兩個「木桶」底運轉，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生死的鬥爭，以「誰戰勝誰」為原則的鬥爭中間進行的。

不難瞭解：這個理論是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處的。不難瞭解：這個理論底客觀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底陣地，是要用「新的」理論武器去武裝富農份子來反對集體農莊，是要破壞集體農莊底陣地。可是，這個理論直到現在還流行於我們的刊物上。而且不可說它已經受到我們理論家方面的嚴重回擊，更不用說致命回擊了。這種荒謬絕倫的情況，不是因為我們的理論思想界落後，而是因為什麼呢？

而同時，只要從馬克思主義寶庫裏把再生產論拿出來和這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以把後一個理論打得粉碎。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教導說：現社會如果沒有逐年增加的積累，就不能發展；而逐年增加的積累，又非有逐年擴大的再生產不可。這是顯而易見，不言而喻的。我們的巨大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擴大再生產論而發展的，因為它的容量逐年增加，它有自己的積累，並一日千里地前進。可是，我們的大工業並沒有包括整個國民經濟。反之，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小農經濟還佔有較大的比重。可以說我國小農經濟是按照擴大再生產原則而發展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我國小農經濟，其大部分不僅沒有逐年實現擴大的再生產，而且恰巧相反，甚至於連單純的再生產，也不是時時都有可能實現的。這種小農經濟雖不能實現擴大的再生產，同時却又是在我國國民



經濟中佔有較大比重的力量，——試問既然有這樣的小農經濟爲農業基礎，可以加快速度推進我們社會主義工業麼？不是的，是不可能的。可以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築在最巨大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基礎上麼？不是的，是不可能的。長此以往，則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使這個農業成爲巨大的農業，使它成爲能夠實行積累的，能夠實現擴大再生產的農業，並以此而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可是，怎樣使它成爲巨大的農業呢？爲要達到這一步，就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以在農業裏培植資本主義來使農業成爲巨大的農業，其結果是使農民陷於貧困，並使資本主義企業在農業中發展起來。我們反對這條道路，因爲這條道路是與蘇維埃經濟不能相容的。另外一條道路則是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在農業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其結果是使小農戶聯合成爲那以技術和科學爲武裝的巨大集體農莊，並把資本主義份子從農業裏排擠出去。我們是主張走這第二條道路的。

所以問題是這樣：或者是走第一條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條道路，或者是向後退——退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向前進——進到社會主義。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而「平衡」論却是想規定第三條道路企圖。正因爲它指望着第三條道路（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所以，只要把馬克思底再生產論拿來和各部份彼此「平衡」論對立一下，就可以把這個「平衡」論打得體無完膚了。

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不幹這件事情呢？誰要令人發笑的「平衡」論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物上，而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却束諸高閣呢？

## (二)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自流」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二個成見，來說第二個資產階級式的理論。我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自流」論。這個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處的，可是却為右傾營壘中的同志所極力宣傳着。這理論底創作者所說的，約如下述。從前在我們這裏是有過資本主義的，當時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的，而農村却曾自發地、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照着資本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而改組着。既然在資本主義下曾是這樣，那末在蘇維埃經濟制度下又何嘗不可這樣呢？為什麼農村，小農經濟，不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照着社會主義城市底形相和模樣而改組呢？這理論底創作者根據這一點，就斷言農村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由此就有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農村能如此自然而然的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那末我們是否還值得着急於組織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我們是否還值得努力為此而奮鬥呢？

你們看，這又是一個理論，其客觀目的就是要給予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一個新的武器去反對集體農莊。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實質，是毫無疑義的。

這個奇怪理論是混亂着我們那些集體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底頭腦的，而我們的理論家却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工夫去痛斥這一個奇怪理論，——這不是很奇怪麼？

毫無疑義的，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鄉村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無可估量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工業就具有改造農業的作用。可是，單靠這一個因素，是否已足夠使小農鄉村自動跟着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呢？不是的，是不足夠的。在資本主義下，農村是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的，因為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小商品經濟，在其基本上是同一種類的經濟。當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可是，

在其基本上，它是和資本主義經濟同一種類的，因為它倚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列寧在評論布哈林所著過渡時期經濟一書時，說得萬分正確，他說「農民有商品資本主義趨勢」，這個趨勢是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趨勢背道而馳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正如列寧所說：「小生產是經常、每日、每時、自發、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既是如此，那是否可以說小商品農民經濟，在其基本上是和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同一種類呢？很明顯的，如果不離開馬克思主義，那就不可這樣說。否則列寧就不會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所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自流論是一種腐敗的反列寧主義的理論。所以，爲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裏培植巨大社會主義農莊，即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作爲社會主義根據地，以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

事情是很明白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自流」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城市應當引導小農鄉村，在鄉村裏培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按照新的社會主義的風格來改造鄉村。

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自流」論，直到現在都沒有遇到我們土地問題理論家方面應有的回擊，——這是很奇怪的。

### (三) 小農經濟「穩固性」論

現在來說政治經濟學中的第三個成見，來說小農經濟「穩固性」論。大家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大經濟優越於小經濟的著名提綱的，說這個提綱似乎只在工業中發生效力，而

\* 着重點是列寧所加。——「約、斯大林註」。

在農業中是不適用的。宣傳這個理論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達維特和格爾茨這班人所企圖「倚靠」的事實，就是說小農是吃得苦，忍得住，他爲着保留自己那一小塊土地而不惜挨受千辛萬苦，所以小農經濟在與大農業經濟鬥爭時，就表現出他那種穩固性。不難瞭解：這種「穩固性」是比任何不穩固性都更壞的。不難瞭解：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讚美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正因為它有這樣一個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很容易就把這個理論打破了。可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此。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實際情況，已拿出各種新證據來反對這個理論；而很奇怪的，就是我們的理論家却不願或不能利用這個新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我所指的實踐，就是在我國，土地私有制已經消滅，土地已經國有化，這就使小農已不復像奴隸一般忠順於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而易於從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的集體的經濟。

的確，在西歐方面，有什麼東西曾經是，現在還是，而且將來還會把小農束縛在小商品經濟上面呢？首先而且主要就是因爲他有一小塊私有土地，因爲存在有土地私有制。他多年積蓄一些金錢，以便購買一小塊土地，他買得土地以後，自然不願和它離別，而寧願挨受萬般痛苦，寧願過牛馬生活，只圖保持自己這一小塊土地，即他那個人經濟底基礎。可以說這個因素在我們這裏，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也仍然如此發生作用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爲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正因爲在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所以在我們這裏，農民也就不是像在西歐那樣如奴隸一般忠順於土地。而這個情況就不能不使小農經濟比較容易轉入集體農莊軌道。

你們看，在我國，在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農村中的大經濟——農村中的集體經濟——所以能夠這樣容易表明自己優勝於小農經濟，其原因之一，就在這裏。

你們看，已消滅絕對地租、取消土地私有制並施行土地國有化的蘇維埃土地法，其偉大的革命意義，

就在這裏。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我們擁有新證據去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反對他們那種硬說小農經濟在和大經濟鬥爭時能表現穩固性的妄談。

爲什麼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不充分利用這個新證據去反對一切種種資產階級理論呢？

我們在實行土地國有化時所持的出發點之一，就是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底名著剩餘價值論以及列寧底土地問題著作內所發揮的那些理論前提，這些著作是最豐富的理論思想寶庫。我所指的，就是一般地租論，特別是絕對地租論。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這些著作底理論原理已經被我們在城市和鄉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燦爛證實了。

所不可解的，只是爲什麼查揚諾夫這班「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理論，竟應當在我們的刊物上自由流行，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地租和絕對地租論的英明著作，倒不應當普遍宣傳和提到最前面，而應當束諸高閣呢？

你們大概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著名小冊子。你們當然記得恩格斯會如何慎重看待把小農引入協作經濟道路，引入集體經濟道路的問題。讓我從恩格斯這小冊子裏引證關於這個問題的一段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用一切可能方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協作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而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儘多時間，讓他們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你們看見，恩格斯是如何慎重看待把個體農戶引入集體制軌道的問題。恩格斯這種驟然看來未免過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分慎重的態度，究應怎樣來解釋呢？他在這裏是以什麼爲出發點呢？很明顯的，他的出發點就是認爲還有土地私有制，農民還佔有「自己那一小塊」土地，農民將難和這塊土地別離。西方農民就是如此。在土地私有制在着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就是如此。很明顯的，在這裏是須要非常慎重的。可以說在我們蘇聯也有同樣的情形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爲在我們這裏沒有那把農民束縛於其個體經濟上的土地私有制。其所以不可這樣說，是因爲在我們這裏有使個體農民易於過渡到集體制軌道的土地國有化。

你們看，集體農莊運動最近在我國發展得比較容易迅速的原因之一，就在這裏。

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還沒有企圖儘量明白揭露我國農民狀況與西方農民狀況間的這個區別。可是，這樣的工作不僅對於我們蘇聯工作者有最大的意義，而且對於世界各國共產黨員也有最大的意義。因爲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就立刻在土地國有化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抑是沒有這樣一個基礎而建設社會主義，這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我於不久以前發表的一篇論文（偉大轉變的一年）中，發揮了幾個有名的論據，證明大農業經濟優勝於小農經濟，而我在當時所指的，是巨大的蘇維埃農莊。用不着證明，這一切論據對集體農莊這種巨大經濟單位也是完全全適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那些已發達的具有機器和拖拉機爲基礎的集體農莊，而且把那些初步的、代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謂手工場時期的、以農民原有農具爲倚據的集體農莊，也包括在內。我所指的，是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所建立的初步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不過是把農民生產工具集合在一塊來耕種土地罷了。例如，就拿前頓河省鶴普爾區裏的集體農莊來說吧。從表面上看起來，從技術方面看起來，這些集體農莊彷彿是和小農經濟沒有什麼區別的（機器很少，拖拉機很

少)。而其實，在集體農莊裏面，單是把農民工具集合起來進行生產，就給了一種為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想都沒有想到的功效。這種功效有何表現呢？其表現就是自農民加入集體農莊以後，播種面積已經擴大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為什麼有這種「衝昏頭腦」的功效呢？就是因為農民在單獨勞動的時候，本來是沒有什麼力量的，而當他們把自己的農具集合起來而組織集體農莊以後，他們就變成極大的力量了。就是因為在各人單獨勞動的時候，是有許多荒土和生地很難耕種的，而自從組織集體農莊時起，農民却有可能耕種了。就是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裏了。就是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動用荒原、零星小塊土地、田界以及其他等等了。

耕種荒土生地問題對於我國農業是有巨大意義的。你們知道，舊時俄國革命運動底軸心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消滅地少現象會是土地運動底目的之一。當時有許多人以為地少現象是絕對的，就是說，以為在蘇聯再沒有適宜于耕種的空閒土地了。而在事實上究竟已查明什麼呢？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楚，在蘇聯曾有而且現在還有幾千萬海克脫空閒土地。可是，農民用其可憐工具是會沒有任何可能去耕種這些土地的。而正因為他們會沒有可能耕種生地荒土，所以他就會趨向于耕種「熟地」，耕種屬於地主的土地，耕種在單獨勞動時便於用農民工具來耕種的土地。你們看，「地少現象」底基本原因，就在這裏。因此，無怪乎我們的穀物托拉斯現在已經有可能動用約近兩千萬海克脫的空閒土地，這些土地是沒有被農民所耕種的，而且是不能在各人單獨勞動時去用小農工具耕種的。

集體農莊運動在其所有一切階段上——無論在其初級階段上，或在其更發展的階段上，即當它以拖拉機為武裝時，——所具有的意義，就在於農民現在已經有可能去動用荒土生地了。在農民過渡到集體勞動制時，播種面積所以大大擴充，就是由於這個原因。集體農莊所以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的基本原因之一，就在這裏。

不待說，將來在我們大批機器——拖拉機站和農業機器隊都開去幫助全盤集體化區域裏的初級集體農莊的時候，將來在集體農莊本身已有可能備置大批拖拉機和康拜因機的時候，集體農莊優勝於個體農民經濟，一定會是更其不容置辯的。

#### (四) 城市與鄉村

還有一種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培植的成見，即所謂「剪刀形態」論，對於這種成見，也像對於其他一切資產階級理論——可惜這些理論還流行於蘇聯的刊物上——一樣，是應當宣佈無情戰爭的。我所指的，是這樣一個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十月革命所給予農民的要比二月革命所給的少些，認為十月革命其實是一絲毫東西也沒有給予農民的。有一個時候，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曾在我們的刊物上鼓吹這個成見。不錯，他，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已經放棄了自己的理論。（噫聲：「到底是誰呢？」）。這就是格羅曼。可是，這個理論卻曾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所極力擁護並利用來反對黨。而且無論如何也不可說，現時在「蘇維埃的」輿論界中，這個理論已不流行了。同志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牽連到城鄉相互關係問題。它牽連到消滅城鄉對立性問題。它牽連到最迫切的關於「剪刀形態」的問題。因此，我認為值得分析這個奇怪理論。

說農民從十月革命方面沒有得到絲毫東西，——這話對不對呢？讓我們來看事實吧。

我手裏有著名統計學家聶蒙啓諾夫同志底著名統計表，這統計表已經在我所作論文在糧食戰線上內公佈過了。從這個統計表上可以看到，在革命以前，地主「所生產的」穀物，不下六萬萬普特。所以，



地主當時是六萬萬普特穀物底所有人。富農當時所「生產的」穀物有十九萬萬普特。這是富農當時所擁有的很大力量。而貧農中農當時所生產的穀物，却總共不過二十五萬萬普特。這就是舊時鄉村中，十月革命以前鄉村中的情景。

十月革命以後，在鄉村中已發生什麼變化呢？我又來引用這個統計表中的數目字。就拿一九二七年為例吧。地主在這一年的生產了多少穀物呢？很明顯的，他們是絲毫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的，因為地主已被十月革命所消滅了。你們當然懂得，這不能不大改善農民底狀況，因為農民已擺脫地主桎梏了。這當然是農民因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處。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已經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穀物了。所以，自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底力量已經削弱三倍多。你們當然懂得，這件事實是不能不改善貧農和中農底狀況的。而貧農中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呢？已經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了。所以，貧農和中農在十月革命以後所生產的穀物已經比革命以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你們看，這就是說明貧農和中農因十月革命而得到很大好處的事實。

你們看，這就是十月革命所已經給予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既然如此，那怎麼還可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絲毫東西呢？

可是，同志們，這豈不能概括一切哩。十月革命消滅了土地私有制，消滅了土地買賣制，奠定了土地國有化。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農民為要生產穀物，已不須要購買土地了。從前，他們為要買得一小塊土地，就不得不積年累月，勉強積蓄一些金錢，東湊西借，以至于債台高築，遭受盤剝。購買土地的费用，當然就增加穀物生產底成本費。而現在，農民已不必這樣幹了。現在，他不購買土地，就能生產穀物了。這是什麼——是改善農民底狀況，抑不是改善農民狀況呢？這很明顯是改善農民狀況的。

其次。直到最近時候為止，農民都會不得不用單獨勞動方法，用陳舊工具來勉強耕種土地。大家知道，那以現在已不中用的陳舊生產工具爲武裝的單獨勞動，是不能給予必要利益，以便享受寬裕生活，一貫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廣闊大道的。現時在集體農莊運動加緊發展以後，農民已經有可能彼此聯合起來，把自己的勞動同隣居的勞動打成一片，共同組織集體農莊，開墾生地，利用荒地，領得機器和拖拉機，這樣來把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兩倍，以至於三倍。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由於共同組織集體農莊的結果，農民現在已有可能用一樣多的勞動來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穀物。這也就是說，穀物生產底成本費已比最近以前便宜多了。最後，這也就是說，在價格穩定時，農民因出賣穀物而能得到的金錢，是比以前多得多的。

既然如此，那怎樣還可說十月革命沒有給予農民什麼利益呢？

散佈這種謠言的人們是顯然誣蔑我們黨，誣蔑蘇維埃政權，——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而從這一切當中就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就得出結論如下：現在關於「剪刀形態」問題，關於消滅「剪刀形態」問題，是應有新的提法的。從這裏就得出結論如下：如果集體農莊運動將按現有的速度發展下去，那末「剪刀形態」在最近將來就會消滅的。從這裏就得出結論如下：城鄉關係已經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城鄉對立性是將以加快速度消失着的。

這個情況對於我們整個建設工作是有極大意義的，同志們。它改變着農民底心理，並使農民面向城市。它造成基礎來消滅城鄉對立性。它造成基礎來使黨所提出的「面向農村」的口號，將由集體農民所提出的「面向城市」的口號來補充。而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爲農民現在從城市方面得到機器、拖拉機、農學家、組織者以及得到直接的幫助去反對並消滅富農。那極不信任城市而把城市看作強盜的舊式農民已

退到後面。他已由新式農民——集體農民所替代，這集體農民是對城市抱着希望，希望從城市方面得到切實的生產上的幫助的。那生怕降為窮人而只想暗中（恐怕喪失選舉權呵！）變成富農的舊式農民已由新式農民所替代，這新式農民是有新前途的：加入集體農莊並逃出貧困境地而走上經濟高漲的廣闊大道。

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同志們。

因此，同志們，更令人氣憤的，就是我們的土地問題理論家，沒有採取一切辦法去把那所有一切企圖辱沒十月革命勝利品、企圖辱沒日益增長的集體農莊運動的資產階級理論，澈底揭穿和連根剷除。

## （五）論集體農莊本質

集體農莊之為經濟種類，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這是不可懷疑的。

有一個人會在這裏發言辱沒集體農莊。他硬說，集體農莊之為經濟組織，是與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毫不相同的。同志們，我認為，他這個對集體農莊的估計是完全不對的。這個估計毫無疑義是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處的。

經濟種類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顯然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來決定的。那裏還有其他什麼東西可以決定經濟種類呢？而難道在集體農莊內有生產資料私有者階級和被剝奪生產資料者階級麼？難道在集體農莊內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麼？難道集體農莊不是在土地——況且是屬於國家的土地——上面經營生產的一切基本生產工具公有化麼？有什麼根據來說集體農莊這種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呢？

當然，在集體農莊裏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莊裏還有個人主義的，甚至富農心理的遺毒，這些遺毒還沒有消滅，可是，再過一些時候，隨着集體農莊底鞏固，隨着集體農莊底機器化，這些遺毒是一定會消滅的。可是，把集體農莊整個拿來說，把它的矛盾和缺點都一起拿來說，集體農莊這個經濟因素在基本上是農村發展底新道路，是農村發展底社會主義道路，是和富農資本主義道路相對立的道路，——這難道可以否認麼？集體農莊（我所指的，是真正的集體農莊，而不是冒牌的集體農莊）在我國條件下，是農村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底根據地和策源地，這根據地和策源地是在對資本主義份子作生死決鬥中發展起來的，——這難道可以否認麼？

有些同志想辱沒集體農莊而將其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形式的企圖，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在一九二三年，我們還沒有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當時，列寧在其小冊子論合作制中所指的，是合作社一切形式，無論是低等形式（供給、銷售合作社形式），無論是高級形式（集體農莊形式），都包括在內。他當時關於合作社，關於合作企業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呢？請看列寧所著小冊子論合作制中的一段話吧：

「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是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的，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如果它們是建立在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立在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可見，列寧在觀察合作企業時，不是把它當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看待，而是把它拿來與我國現存制度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聯繫起來觀察，注意到合作企業是在生產資料屬於國家的國家裏，在屬於國家的土地上面經營的；而因為列寧既然這樣觀察合作企業，所以他就斷定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這就是列寧關於一般合作企業的言論。

關於目前的集體農莊，更可以這樣說，——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列寧所以認為在我國條件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發展」，其原因之一，也就在此。你們由此可見，上述那位發言人既辱沒集體農莊，他就犯了極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

由這個錯誤中，就產生他那另一個錯誤，關於集體農莊內階級鬥爭問題的錯誤。這個發言人把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誇張到如此地步，以致可以得出結論，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與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沒有區別的。甚至於還可以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比集體農莊以外更殘酷的。而且，不只是這位發言人犯了這個錯誤。妄談什麼階級鬥爭，囂嚷胡說集體農莊內部的階級鬥爭，這在現時是我們的一切「左派」叫喊者底通病。而在這種囂嚷聲中最可笑的，就是這些囂嚷者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階級鬥爭的地方「看見」階級鬥爭，而在有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很厲害的地方，却又看不見階級鬥爭。

在集體農莊內有階級鬥爭成份麼？是的，是有的。既然在集體農莊內還保存着個人主義心理的，甚至於富農心理的遺毒，既然在集體農莊內還有某些不平等，於是在集體農莊內就不能沒有階級鬥爭成份。可以說集體農莊內的階級鬥爭是與集體農莊以外的階級鬥爭相同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我們的「左派」清談家底錯誤，正在於他們看不見這個區別。什麼是在集體農莊以外的，在成立集體農莊以前的階級鬥爭呢？這就是對那些佔有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用這些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來剝削貧民的富農作鬥爭。這個鬥爭是拚死命的鬥爭。而什麼是在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呢？這就是說，第一，

富農已被打破並已被剝奪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這就是說，第二，貧農和中農已經在基本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基礎上聯合成爲集體農莊。這就是說，最後，這裏是集體農莊莊員彼此間的鬥爭，因爲其中一部分人還沒有擺脫個人主義心理和富農心理的遺毒，想利用集體農莊內某些不平等情形來圖利營私；而另一部分人却想要剷除這些遺毒和這種不平等情形。只有瞎子才看不見在集體農莊基礎上的階級鬥爭與集體農莊外的階級鬥爭之間的區別，——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如果以爲給出集體農莊，於是就給出爲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那就錯誤了。如果以爲集體農莊莊員已經變成社會主義者，那就更其錯誤了。不是的，還要做很多工作來改造集體農莊，消除他的個人主義心理，使他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而集體農莊機器化越是進行得快，集體農莊拖拉機化越是進行得快，則我們就能越迅速達到這個目的。可是，這絲毫也不能減少集體農莊爲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槓桿的最大意義。集體農莊底偉大意義，正在於集體農莊是農業中應用機器和拖拉機的基本基礎，是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精神去改造農民，改造其心理的基本基礎。

列寧說得對：

「要改造小農，要改造小農底全部心理和習慣，是必須花費幾代工夫的。爲要解決這個關於小農的問題，爲要健全小農底全部心理，就一定要有物質基礎、技術、在農業裏大規模採用拖拉機和機器、大規模實行電氣化」（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九頁）。

集體農莊正是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只有經過這個形式，數千百萬小農才能廣泛採用機器和拖拉機，作爲保證經濟高漲的槓桿，作爲保證農業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槓桿，——這誰能否認呢？

我們的「左派」清談家却把所有這些忘掉了。我們的這位發言人也把這些忘掉了。

##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政策中的轉變

最後，就要說到階級的變動和社會主義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進攻的問題。

我們最近一年來工作底特徵，就是我們黨，我們蘇維埃政權：第一，開展了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實行的全線進攻；第二，這個進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已經給予並繼續給予很具體的優良的效果。

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這就是說，我們已經實行而且還在繼續實行我們整個政策中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轉變。

直到最近以前，黨是站在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立場上的。大家知道，這個政策還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已宣佈了。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以及在我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這個政策又重復宣佈過。大家還記得，列寧在其給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一封信裏（一九二二年），又回復說到必須實行正是這個政策的問題。最後，這個政策曾經由我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批准。而我們直到最近以前所實行的，正是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會是正確麼？是的，是絕對正確的。五年以前或三年以前，我們能這樣進攻富農麼？當時我們能實行這樣一個進攻而指望獲得成功麼？不是的，是不能的。否則便是最危險的冒險主義。否則便是把進攻當兒戲，這當然是危險之至。因為如果我們這樣輕舉妄動，我們就一定會遭失敗，而結果就會鞏固富農底陣地。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我們在農村中還沒有可據以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的支撐點——密佈各地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可能用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去代替富農的資本主義生產。

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會拚命強加於黨的那種立刻進攻富農的政策。而黨却没有採取這個危險的冒險辦法，因為黨知道，認真的人是不會輕舉妄動而把進攻當作兒戲的。進攻富農，乃是一件認真的事情。不可把進攻富農與空口反對富農混為一談。也不可把對富農的進攻與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會拚命強加於黨的那種與富農極扭的政策混為一談。進攻富農——這就是說打破富農並消滅它為階級。沒有這些目的，則進攻就是空談，就是搔扭，就是空砲，隨便怎樣稱呼都可，但無論如何也不是真正的波爾什維主義的進攻。進攻富農——這就是說準備去實際行動，並把富農打得一敗塗地，使他再也不能翻身。這在我們波爾什維克方面就叫作真正的進攻。五年以前或三年前，我們能實行這樣一個進攻而指望獲得成功麼？不是的，是不能的。

的確，富農在一九二七年所生產的穀物，共達六萬萬普特以上，而其中運往農村以外出賣的，約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這是一個頗嚴重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當時我們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生產了多少呢？約有八千萬普特，而其中運往市場的（即商品穀物），約有三千五百萬普特。請你們自己去判斷一下，我們當時是否能夠用我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去代替富農底生產和商品穀物呢？顯然是不能夠的。什麼是在這種條件下向富農實行堅決進攻呢？這就是說，一定會遭失敗，一定會加強富農陣地而得不到穀物。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管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反對派如何從事冒險主義的空談，我們曾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向富農實行進攻。

好吧，而現在呢？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已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來打破富農反抗，來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穀物產量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經濟底總產量少二萬萬普特）。其次，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商品穀物有一萬萬三千萬普特以上



（就是說，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些）。最後，大家也知道，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穀物總產量，將不下九萬萬普特（就是說，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總產量多些），而其商品穀物，將不下四萬萬普特（就是說，比一九二七年富農底商品穀物多得不可比擬）。

你們看，我國現在的情形是怎樣，同志們。

你們看，在我國經濟中已發生怎樣的變動。

你們看，我國最近已發生怎樣的階級力量的變動。

由此可見，現在我們已有物質基礎來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生產代替富農底生產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向富農的進攻，現在是有不容置疑的成功。你們看，如果是說真正的進攻，而不限於空洞的反富農的空談，那就須這樣進攻富農。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近來已從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

好吧，而關於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又是怎樣呢，可以容許在全盤集體化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麼？——許多人這樣問着。真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從前，當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時，當我們還沒有可能進而堅決進攻富農時，當我們還沒有可能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代替富農生產時，剝奪富農財產的辦法，曾是不可容許的。當時，不容許剝奪富農財產的政策是必需而且正確的。而現在呢？現在已是另一回事了。現在我們已有可能來堅決進攻富農，打破富農反抗，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並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來代替富農生產了。現在，剝奪富農財產是由實行全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羣衆自己來幹的。現在，在全盤集體化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已經不是簡單的行政辦法了。現在，在這些區域裏剝奪富農財產，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底組成部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現在來贅述剝奪富農財產問題，那是可笑而不莊重的。既然割下腦袋，就不會憐惜頭髮了。

另一個問題，即可否容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的問題，也是同樣可笑的。當然不容許富農加入集體農莊。其所以不可以，是因為富農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死敵。看來是很明白了。

## (七) 結論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底理論工作所不可不過問的六個樞紐問題。

這些問題底意義，首先就在於：用馬克思主義精神來研究這些問題，就可以連根剷除所有一切種種資產階級理論，而這些理論，有時——這真是使我們丟臉——甚至於被我們共產黨員同志所散佈，並模糊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們底頭腦。而其實是老早就已應當把這些理論連根剷除和摒棄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底理論思想，只有在和這些理論作無情鬥爭中，才能增長和強固起來。

這些問題底意義，最後就在於：它們給過渡時期經濟各個舊問題以新面貌。

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集體農莊問題，過渡時期經濟問題，皆有新的提法。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退却，而且解釋為僅僅是退却，——這個錯誤見解是必須揭穿的。其實，列寧還在着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就說過，新經濟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時也是準備向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作新的堅決進攻的政策。有些人以為新經濟政策所以必要，只是為着城鄉間的聯繫，——這個錯誤見解是必須揭穿的。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城鄉間隨便一種聯繫。我們所需要的，是那足以保證社會主義勝利的聯繫。而如果我們主張新經濟政策，那就是因為它效勞於社會主義事業。而當它不復效勞於社會主義事業時，我們就把它拋到九霄雲外去。列寧曾說新經濟政策是認真而長期施行的。可是，他從來也沒有說新經濟政

策是永久施行的。

還必須提出關於普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論的問題。必須研究我們國民經濟對照表編製格式問題。中央統計局在一九二六年當作國民經濟對照表公佈的東西，並不是什麼對照表，而是玩弄數字的把戲。巴查羅夫和格羅曼對於國民經濟對照表問題的見解，也是不切實用的。蘇聯國民經濟對照表格式，是應當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製定出來的，如果他們一般是願意仔細研究過渡時期各經濟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指定一部分專門工作人員，根據過渡時期經濟問題底新提法來專門研究這些問題，那就很好了。

## 關於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問題

在紅星報第十六期所載消滅富農之爲階級一文——該文一般說來，顯然是正確的，——中，有兩個不確當的措詞。我認爲這兩個不確當處是必須糾正的。

(一) 在該文中說道：

「在恢復時期中，我們進行了限制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從改造時期開始起，我們就從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過渡到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了」。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同一個政策。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是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底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這還不是排擠富農之爲階級。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就是排擠和克服富農個別隊伍，這些個別隊伍因爲受不住賦稅壓制，受不住蘇維埃政權底限制辦法，就被排擠和被克服了。顯而易見，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結果不能不排擠個別富農隊伍。因此，排擠個別富農隊伍，不能不看作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底必然結果和組成部分。

我們不僅在恢復時期中進行了這個政策，而且在改造時期中，而且在我們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

二七年十二月)以後時期中,而且在我們黨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九二九年四月)時期中,以及在這次代表會議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夏季爲止,也都進行了這個政策;而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我們就已進到全盤集體化的階段,已轉變到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

如果看一看黨底各個最重要文件——就算是從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起(見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而通過的決議)至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止吧(見關於農業高漲道路的決議)——那就不能不見,關於「限制富農剝削趨向」或「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提綱,總是與關於「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關於「克服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提綱,同時並提的。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黨沒有把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事情與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即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分開。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也如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一樣,完全是站在「限制農業資產階級剝削趨向」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站在「採取新辦法以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這一政策基礎上(見同上),站在「堅決限制富農剝削趨向」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站在「進攻富農」,即「更進一步,更有系統和更堅決限制富農和私商」這一政策基礎上(見同上),站在「更堅決在經濟上排擠」城鄉「私人資本經濟份子」這一政策基礎上(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所以,第一,該文作者把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他們的政策看作兩種不同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事實說明:這裏只有一個共同的政策,即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而排擠個別富農隊伍則是這一政策底組成部分和結果。

所以，第二，該文作者說只在改造時期，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才開始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是說得不正確的。其實，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即恢復時期，無論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即改造時期，都是有過排擠的。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期中，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不過是因採取新的補充辦法而更其加強，因此對於富農個別隊伍的排擠也就更其加強了。

(二) 在該文中說道：

「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完全是從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中產生出來的，它是後一政策在新階段上的繼續」。

這個說法是不確當的，因此也就是不對的。當然，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是不能從天上落下來。它是由整個前一時期——限制農村資本主義份子，也就是說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時期——所準備成就的。但這還不是說，這個政策不是與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根本不同，而似乎是限制政策底繼續。像這位作者那樣說，那就是否認從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農村發展中所發生的轉變。像他那樣說，那就是否認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在我們黨的農村政策上實行了轉變。像他那樣說，那就是替我們黨內的右傾份子造成某種思想上的護符，因為右傾份子現在正是企圖利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來反對我們黨底新政策，正好似福龍金會企圖利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來反對設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一樣。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宣佈加強那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時，是以什麼為出發點呢？其出發點就是：雖然這樣限制富農，但富農之為階級在相當時期內還是應當繼續存在。根據這一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就決定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並要求切實實行這個法律。根據這一點，就曾再度宣佈不准剝奪富農財

產。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是否與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相矛盾呢？絕對是不相矛盾的。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是否與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相矛盾呢？絕對是相矛盾的！所以，現時在全盤集體化區域內只得把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拋棄，而全盤集體化區域之擴大，却不只是與日俱增，而且是與刻俱增的。而且，這些法律和這些決議已被全盤集體化區域集體農莊運動進程本身所拋棄了。

既然這樣，那難道還可說，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底繼續麼？顯然是不可以的。

該文作者忘掉了：如果仍然把生產資料連同土地自由使用權保留在富農階級手裏，如果在我們的實踐中，仍然保留農村僱傭勞動法、租地法並禁止剝奪富農財產，而只採用抽稅辦法以及其他各種限制手段，那是無法排擠富農階級之為階級的。作者忘掉了：在進行限制富農剝削趨向的政策時，是只可指望於排擠富農個別隊伍的，——這不僅不與暫時保留富農之為階級相矛盾，反而是預料到暫時保留富農之為階級的。為要排擠富農之為階級，單靠限制和排擠富農個別隊伍的政策，是不夠的。為要排擠富農之為階級，就要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這階級底反抗，剝奪其維持生存並藉以發展的一切生產來源（土地自由使用權，生產工具，租地權，僱傭勞動權等等）。而這正是轉變於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如果沒有這個，那末所有關於排擠富農之為階級的議論，都不過是恰意於和有利於右傾份子的無謂空談。如果沒有這個，那就不會有什麼嚴重的農村集體化，更談不到農村全盤集體化了。關於這一點，我們農村裏那些粉碎着富農和實行着全盤集體化的貧農中農已懂得很清楚。而我們某些同志却大概還不懂得這一點哩。

所以，黨底現時農村政策，不是舊時政策底繼續，而是由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舊政策進到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新政策的轉變。

（此文曾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紅星報第一八期上發表）

##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說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了。甚至於就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有嚴重的勝利哩。而這些勝利，實在是偉大的。

事實指明說，到今年二月二十日，蘇聯全國百分之五十的農戶已經集體化了。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日，我們已把五年計劃超過執行至兩倍多。

事實指明說，到今年二月二十八日，集體農莊就已經給春種事業收藏三千六百萬公擔種子，即等於整個計劃百分之九十多，即約近二萬二千萬普特。不可不承認：只在集體農莊方面——在順利執行糧食採辦計劃以後——就收藏了二萬二千萬普特種子，這是一個極大的成績。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農村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轉變，可說已有保障了。

這些勝利對於我國命運，對於我國領導力量——整個工人階級，最後對於黨本身，都有極大的意義，這是無須證明的。姑且不說這些勝利底直接的實際結果，而這些勝利，對於我們黨本身底內部生活，對於我們黨底教育，就有巨大的意義。這些勝利賦與我們黨以奮發的精神，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這些



勝利以確信我們事業必然勝利的信念來武裝工人階級。這些勝利把千百萬新興後備力量引到我們黨底週圍來。

於是黨底任務就是：鞏固已得的勝利和有計劃地運用這些勝利以謀更加往前進展。

可是，勝利，特別是比較「容易」得到的勝利，「出乎意料以外」的勝利，也有其陰影的方面。這樣的勝利，有時使人發生自誇自大的心理：「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些勝利，往往薰醉人們，於是人們就開始因有勝利而頭昏眼花，喪失權衡輕重的知覺，喪失瞭解實際情況的能力，力圖誇大自己的力量而輕視敵人的力量，冒險企圖「一舉」而解決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切問題。於是人們就絲毫不關心到如何鞏固已得的勝利，就不注意到有計劃地運用這些勝利以謀更加往前進展。為什麼我們要來鞏固已得的勝利呢，——橫直我們都能夠「一舉」而跑到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因為「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

於是黨底任務，就是要進行堅決鬥爭來反對這些危險而有害於事的情緒，要把這些情緒從黨裏驅除出去。

不可說，這些危險而有害於事的情緒已在我們黨隊伍內有什麼廣泛的流行。可是，這些情緒，在我們黨裏面，畢竟是有的，而且不能斷定說這些情緒不會更其加強。而如果這些情緒將在我國得到大家的公認，那就用不着懷疑，集體農莊運動事業就會大大削弱，而這運動陷於破壞的危險就會成爲事實了。

於是我們報章底任務，就是要有系統地揭穿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件事實來說吧。

(一) 我們集體農莊政策所以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這個政策是以集體農莊運動自願原則並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特別條件爲依據的。決不可用強力來設立集體農莊。如果這樣做，那就愚蠢而

反動了。集體農莊運動應以農民基本羣衆積極擁護爲依據。決不可把先進區集體農莊建設模範，機械地搬到落後區裏去。如果這樣做，那就愚蠢而反動了。這樣的「政策」，一下子就會辱沒集體化思想。在規定集體農莊建設速度和方法時，必須仔細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的特殊條件。

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我們的穀物區，是比我們所有其他各區都要先進些的。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我們有較多的已經強固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於是農民就已有可能來確信新技術底力量 and 意義，新的集體的經濟組織底力量和意義。第二，因爲這些區域已在糧食採辦運動時經過兩年反富農鬥爭的經驗，而這會不能不促進集體農莊運動事業的進行。最後，因爲這些區域最近幾年來從工業中心方面得到極多的優秀幹部。

是否可以說在其他區域內，比方在那些消費區內，例如我國北方各省，或者是在那些還落後的民族區內，例如土耳其斯坦，也具備有這種特別順利的條件呢？

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

很明顯的，估計到蘇聯各個不同區域內特殊條件的原則，也和集體農莊運動自願性原則一樣，是健全的。集體農莊運動最重要前提之一。

而在事實上有時又是怎樣呢？是否可以說自願性和估計地方特點的原則沒有在某些區域裏被違背呢？不是的，可惜不可這樣說。大家都知道，例如在北方某些消費區內，本來是比在穀物區內較少有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的，而人們却往往這樣來替代那關於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如一味發佈強迫實行集體農莊運動的官僚主義命令，通過發展集體農莊的紙上決議，組織紙上虛文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在實際上還沒有，可是妄說這些集體農莊「已經存在」的吹牛決議，却已製成一大堆了。或者就拿土耳其斯坦某些區域來說吧，在這些區域內，是比在北方消費區內更少有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

件的。大家都知道，在土耳其斯坦某些區域內，曾有人企圖「趕上並超過」蘇聯先進區域，其方法就是以武力威脅那些此刻還不願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說誰如果不立刻加入集體農莊，誰就得不到灌田水和工業品。

試問這種上士普力施巴也夫式的「政策」與黨以集體農莊運動自願性和估計各地特點為倚據的政策，有什麼相同處呢？很明顯的，在它們彼此間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絲毫相同處的。

誰需要這種曲解呢？誰需要用這種官僚主義的命令方法來處理集體農莊運動呢，誰需要這樣無理威脅農民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而外，是誰也不需要！

這種曲解能產生什麼結果呢？結果只能加強我們的敵人而辱沒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

這些以「左派」自居的曲解家在事實上是幫助右傾機會主義者，——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二) 我們黨底政治戰略最大長處之一，就是它善於在每一個時機中選出整個運動底基本環節，而一抓住這個環節以後，就把整個鏈條向着一個總目標拖去，以求解決任務。可以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體系中已選出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麼？是的，可以而且必須這樣說。

這個基本環節是什麼呢？

也許就是共耕協作社吧？不是的，不是共耕協作社。共耕協作社——在這裏是還沒有把生產資料公共化的，——是集體農莊運動已往的階段。

也許就是農業公社吧？不是的，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暫時在集體農莊運動中還是少見的現象。把農業公社——在這裏是不僅把全部生產都公共化，而且把分配也公共化的，——當作主要形式所必要的條件，還沒有成熟。

在現今時機中，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即現時必須努力抓住的一環，

是農業勞動組合。

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在穀物經濟方面基本的生產資料——勞動、土地使用權、機器和其他農具、耕畜以及經濟建築物——是公共化的。在農業勞動組合中，屋旁園地（小菜園、小菜園），住宅，某一部分產乳牲畜、小家畜、家禽以及其他等等，是不公共化的。農業勞動組合現在是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因為它是解決穀物問題的最妥當形式。而穀物問題又是整個農業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因為不解決穀物問題，就既不能解決牲畜（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決那些為工業供給主要原料的技術作物和專門作物問題。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農業勞動組合，在現今時機中，是整個集體農莊運動系統中的基本環節。

那已經最終規定而於今天公佈的集體農莊模範章程，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我們的黨工作人員和蘇維埃工作人員也應當從這一點出發，而他們的責任之一，就是切實研究這個章程並徹底實行這個章程。

黨在現今時機中的方針，就是如此。

可以說黨這個方針是被確切實行而未被違背和曲解麼？不是的，可惜不可這樣說。大家知道，在蘇聯某些區域內，為集體農莊生存而鬥爭還遠沒有完結，農業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而在這些區域裏却有人企圖跳出農業勞動組合範圍而一下子就跳到農業公社那裏去。農業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而他們就已經把住宅、小牲畜、家禽「公共化」，而且這個「公共化」就變成爲紙上的官僚主義的命令，因為現在還沒有那些使這種公有化成爲必要的條件。人們這樣胡作亂爲，彷彿穀物問題在集體農莊中已經解決了，彷彿

\* 見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蘇維埃報》

穀物問題已經是已往的階段，彷彿現今時機中的基本任務不是解決穀物問題，而是解決養畜問題和養禽問題。試問誰需要這個把集體農莊各種形式混爲一談的魯莽「工作」呢？誰需要這個愚蠢而有害於事的跑得太前的行動呢？當穀物問題還沒有解決，集體農莊農業勞動組合形式還沒有鞏固時，竟把住宅、一切產乳牲畜、一切小牲畜、家禽「公共化」，藉以欺侮集體農民，——這樣的「政策」祇能使我們的可恨的敵人得到方便和益處，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在這些急躁的「公共化者」當中，有一個人甚至於弄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向農業勞動組下令令：「限於三天以內將每個農戶所有的家禽按隻計算出來」，並指定專門「指揮官」來指揮計算和監督事宜，「佔領農業勞動組合中的指揮地點」，「指揮社會主義戰鬥，不得離開崗位」，並把——當然的事——整個農業勞動組合一舉握住。這是什麼呢——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呢，還是瓦解集體農莊和破壞集體農莊信用的政策？至於那些從取消教堂神鐘來開始組織農業勞動組合的所謂「革命家」，那更不必說了。取消教堂神鐘，——這是多麼革命呵！

爲什麼在我們的隊伍裏竟能夠產生這些魯莽的「公共化」兒戲，這些可笑的跳過自己本身的企圖，這些想避免階級和階級鬥爭而事實上却替我們的階級敵人幫忙的企圖呢？這些企圖，只有當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戰線上獲得「容易」勝利和「意外」勝利的空氣中，才竟能產生。這些企圖所以竟能產生，只是因爲黨內一部分人懷有魯莽情緒，以爲「我們什麼都能做！」「我們什麼都不在乎！」。這些企圖所以竟能產生，只是因爲我們有些同志竟被勝利衝昏頭腦而暫時失去明確的理智和清醒的眼光。

爲要糾正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工作路線，就必須消滅這些情緒。  
黨底當前任務之一，就在這裏。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嚴重事情。不可落在運動後面，因爲落在後面——就是脫離羣衆。可是，也不可跑得太前，因爲跑得太前——就是喪失自己和羣衆的聯繫。誰願意領導運動而同時又願意保持自己和千

百萬羣衆的聯繫，誰就應當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反對落在後面的份子，又反對跑得太前的份子。

我們黨所以強而有力和不可被戰勝，就是因為它領導着運動，同時又善於保持着並增加着自己和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聯繫。

（此文曾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真理報第六十期上發表）

## 給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的答覆

大家從報上知道，斯大林所著論文勝利衝昏頭腦和中央有名決議爲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而鬥爭，在集體農莊運動實際工作者中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回聲。於是最近以來我就接到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許多來信，並要我答覆他們在信內所提出的問題。我本應當用私人通信方法來回答每個來信同志。可是，這竟是辦不到的，因爲來信同志大半沒有寫明自己的通信處（忘記註明通信處了）。而且，信內所涉及的問題，對於我們全體同志都有莫大的政治趣味。此外，對於那些忘記註明自己通信處的同志們，也當然不能不給以答覆。因此，我竟不得不把信內一切有關於事情重要的問題總合起來作一個公開的答覆，即在報紙上答覆。而因爲中央對此問題已有直接決定，於是我就更加願意這樣辦了。

第一個問題。在農民問題方面所犯錯誤底根源，究竟在那裏呢？

答覆。這根源就在於對中農採取不正確的態度。這根源就在於在與中農的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這根源就在於忘記以下一點：與中農羣衆的經濟結合，是不可以強力手段爲基礎的，而是應以與中農協定爲基礎，以與中農聯盟爲基礎的。這根源就在於忘記以下一點：在現今時機內，工人階級、貧農與中農聯盟去一般反對資本主義，特別反對富農，乃是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

當進攻富農的鬥爭還是與中農結成統一戰線來進行時，本來一切都做得很好。可是，當某些同志因

被成功所薰醉而無形中由進攻富農的路上滾到反對中農的路上時，當他們因貪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向中農採用強制手段，即褫奪中農選舉權，並像剝奪富農那樣去剝奪中農財產時，於是進攻路線就被曲解，那與中農結成的統一戰線就被破壞，而富農當然就取得企圖恢復本身勢力的可能。

他們忘記了：在進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強力是必要的有益處的；可是，如果用這種強力來對待我們的同盟者——中農，却就不可容許而且極端有害了。

他們忘記了：在解決軍事性作戰任務時，輕騎突擊手段是必要的有益處的；可是，如果用這種輕騎突擊手段來解決集體農莊建設——而且是在與中農聯盟中組織的建設——任務，那就藥不對症而且極端有害了。

在農民問題方面所犯錯誤底根源，就在這裏。

請看列寧關於與中農的經濟關係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最應當倚據於這樣一個真理，就是在這裏，採用強力方法，按實質是連什麼也做不到的。在這裏，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樣式擺着的。在這裏，沒有什麼上層可以拆去，而同時却把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都保留不動。在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曾經有過的上層，即資本人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誰如果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再愚昧不過了。」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六八頁）。

其次：

「用強力對待中農，那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人數衆多的，數千百萬人的社會階層。甚至在西歐方面，雖然該處中農勢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巨大，雖然該處技術與文化、都市生活、鐵路是特別發達的，雖然該處本最容易發生用強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那一



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都未曾主張以強力手段對待中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六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第二個問題。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錯誤是那些呢？

答覆。這種錯誤，至少有三個。

第一，在建設集體農莊時違背了列寧主義的自願原則。違背了黨底基本指示和農業勞動組合模範章程關於集體農莊建設自願原則的規定。

列寧主義教導說：必須按照自願原則，以說服農民相信公共集體農業優越於個體農業為方法來引導農民走上集體農業的軌道。列寧主義教導說：只有已在農民面前具體表明並用事實，用經驗證明集體農莊是優於個體農莊，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有利些，集體農莊能使農民——貧農和中農——免除困苦貧窮境況時，才可說服農民相信集體農莊底優越。列寧主義教導說：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集體農莊就不能穩固。列寧主義教導說：凡是企圖用強力來建立集體農莊，凡是企圖用強迫手段來設立集體農莊，其結果只能壞事，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

而事實果然如此，當這個基本規則尚被遵照執行時，集體農莊運動曾是給予節節成功的。可是，有些為成功所薰醉的同志，竟開始蔑視這個規則，表現過分的急躁，而且因貪求集體化底高度百分數之故，竟公然用強迫手段去設立集體農莊。無怪乎這種「政策」底惡果很快就暴露出來了。一下子產生的集體農莊，也就一下子陷於瓦解了，而一部分昨天還很信任集體農莊的農民，則開始離開集體農莊。

集體農莊運動中第一個而且主要的錯誤，就在這裏。

請看列寧關於集體農莊建設底自願原則的言論吧：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過渡到公共耕種制，過渡到巨大公共農莊。可是，任何強迫手段均爲蘇維埃政權所不可採用的；任何法律都不強迫這樣辦。農業公社是按自願原則而成立的；過渡到公共耕種制只能是自願的，在這一方面，絲毫強迫，均爲工農政府所不可採用——而且爲法律所不許。如果你們中間有人看見這樣的強迫，那末你們就應當知道，這是濫用威權，這是違反法律，這是我們正在竭力糾正而且將要糾正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頁）。

其次：

「只有能夠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底優越時，只有能夠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只有在這個情形下，那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實在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實在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固地和真正地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那一種促進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農業的辦法底意義，都不可過分誇大。我們有千百萬彼此分散的，散處於偏僻鄉村的個體農戶。只有已經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近的經驗來證明必須而且可以過渡到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有嚴重進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至五八〇頁）。

最後，還要引證列寧著作中的一段話：

「蘇維埃政權代表們在鼓勵各種協作社以及中農農業公社時，不應當容許在建立這種協作社和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農業公社時採用絲毫強迫。只有那些由農民本身自由發起而其益處已由農民本身實際考驗過的聯合，才有價值。在這件事中的過份的急躁，是有害的，因為這只能加強中農守舊惡新的成見。凡是擅敢實行強迫——不消說直接強迫，而即令是間接強迫也罷——農民加入公社的蘇維埃政權代表，都應受最嚴重的處分而被撤銷其在農村中的工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七四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黨是會十分嚴格實行列寧這些指示的。

第二，人們在處理集體農莊建設問題時，違背了列寧主義的關於注意蘇聯各個不同區域的特殊條件的原則。人們忘記了：在蘇聯有彼此極不相同的區域，各有彼此不同的經濟結構和文化水平。人們忘記了：在這些區域中間，有先進的，中等的和落後的區域。人們忘記了：集體農莊運動底速度和集體農莊建設底方法，在這些遠不一樣的區域裏，是彼此不能一樣的。

列寧說：

「如果我們簡單地按着死板格式而給俄國各地抄襲千篇一律的法令，如果那些在烏克蘭和頓河區工作的波爾什維克共產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竟不分青黃皂白而籠籠統統把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各地去，那就是錯誤了」……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來拘束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勞永逸地決定，說我們的經驗，俄國中部的經驗，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區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列寧接着又說：

「用死板格式把俄國中部、烏克蘭、西伯利亞混爲一談，使其服從於一定死板格式，那就是愚蠢萬分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四三頁）。

最後，列寧責成高加索共產黨員們，要他們

「懂得他們的特殊情形，他們各共和國底特殊情形是與蘇俄底情形和條件有所不同的；懂得不是要機械地抄襲我們的策略，而是要深思熟慮變更這一個策略底形式，以求適合於特殊的具體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九一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我們黨中央根據列寧這些指示，在其關於集體化速度的決議中（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曾以集體化速度爲觀點，把蘇聯各區分成三類：北高加索，窩爾加河中游，窩爾加河下流集體化工作，大體上能於一九三一年春天完結；其他穀物區（如烏克蘭，中部黑土省，西伯利亞，烏拉爾，卡查赫斯坦等等）集體化工作，大體上能於一九三二年春天完結；其餘各區集體化工作完結期限，則能延到五年計劃時期末，即延到一九三三年。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在事實上竟弄出什麼呢？原來，我們某些同志因被集體農莊運動第一批成功所薰醉，竟把列寧指示以及中央決議都安然忘記了。莫斯科省因拚命貪求集體化虛張數字，竟責成自己的工作人員在一九三〇年春天結束集體化，雖然莫斯科省擁有不下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底爲止）。中部黑土省因不願「落後他人」，竟責成自己的工作人員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時就結束集體化，雖然中部黑土省擁有不下兩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一年底爲止）。而南高加索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却爲拚命「趕上並超過」先進區域

起見，竟決定在「最短期內」結束集體化，雖然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擁有整整四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三年底爲止）。顯而易見的，那些對於集體農莊運動較少準備的區域，既然採取這樣匆忙的集體化「速度」，以圖「超過」那些對於集體農莊運動較有準備的區域，當然就不得不運用加強的行政壓制手段，企圖以自己的行政主義怒火來填補那些爲集體農莊運動迅速發展所缺少的因素。其結果是大家皆知的。大家知道，在這些區域內曾弄出一團糟，而只是因爲中央出來干涉，才得解開這一團糟。

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二個錯誤，就在這裏。

第三，人們在處理集體農莊建設問題時，違背了列寧主義的關於不許跳過運動尚未完結形式的原則。違背了列寧主義的下述的原則——不要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不要命令羣衆運動，不要脫離羣衆，而要和羣衆一塊前進并推動羣衆前進，把他們引到我們的口號下面來，並幫助他們根據其本身經驗來深信我們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

列寧說：

「當彼得格拉無產階級和彼得格拉駐軍兵士奪取政權時，他們已經明白知道：農村中的建設事業是會遇到巨大困難的；在這裏是必須採取比較漸進步驟的，在這裏企圖用法令，用法律來施行其耕制，那就荒謬絕倫了，當時只有很少數覺悟農民能夠同意實行其耕制，而大多數農民却還沒有立意這樣辦。因此，我們當時僅僅只採取爲革命發展所絕對必要的辦法：無論如何都不跳過羣衆底發展程度，而是要等待從這些羣衆本身經驗中，從他們本身鬥爭中長成前進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二頁）。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中央根據列寧這些指示，在其關於集體化速度這個著名決議中（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認為：（1）農業勞動組合在現時是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形式；（2）因此必須擬定農業勞動組合——集體農莊運動主要形式——模範章程；（3）不容許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有從上面「下令施行」集體農莊運動的現象，不容許「以集體化為兒戲」。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所應抱的方針，不是建立農業公社，而是建立農業勞動組合為集體農莊建設底主要形式；這就是說，不容許超過農業勞動組合階段而逕直跳到農業公社，不可以「下令施行」集體農莊和「以集體農莊為兒戲」去代替農民趨向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

看來是很明白了。

而在事實上竟弄出什麼呢？原來，我們某些同志竟因被集體農莊運動第一批成功所薰醉而把列寧指示以及中央決議都安然忘記了。這些同志不去組織那趨向農業勞動組合的羣衆運動，却把個體農民直接「轉入」公社章程。他們不去鞏固運動底勞動組合形式，却用強迫手段把豬羊、家禽、自用乳牛、住屋等等「化為公有」。這為每個列寧主義者所不容有的急燥態度引起的結果如何，現在是大家都知道的。穩固的農業公社，通常當然是沒有設立成功。可是許多農業勞動組合却輕易放棄了。固然，「好的」決議是剩下來了。可是，它們有什麼意思呢？

集體農莊運動中的第三個錯誤，就在這裏。

第三個問題。這些錯誤為什麼竟能產生；黨應當如何糾正這些錯誤呢？

答覆。這些錯誤是因為我們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獲得迅速成功而產生的。成功有時是能衝昏人們頭腦的。它們往往產生過分自誇自大的心理。執政黨底代表們是特別容易患這種毛病的。特別是像我們黨這樣具有無限量和威望的黨底代表們，更容易患這種毛病。列寧所無情反對的那種共產黨員誇

大狂事實，在這裏是很有可能發生的。相信法令萬能、決議萬能、訓令萬能的心理，在這裏是很有可能發生的。黨底革命設施在我們廣濶國家某個角落裏變爲黨個別代表底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險，在這裏是很實在的。我所指的，不僅是地方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省委工作人員，而且是個別中央委員。列寧說：「共產黨員誇大狂，這就是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竟妄想他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就能解決他自己一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你們看，集體農莊運動中的錯誤，對於黨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方面的路線的曲解，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如果讓這些錯誤和曲解繼續存在下去，如果不將其速即肅清無餘，那末它們有何危險呢？

這裏的危險就在於：這些錯誤會使我們逕直去辱沒集體農莊運動，去與中農紛爭，使貧農隊伍紊亂，使我們的隊伍錯亂，使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削弱下去，使富農恢復起來。簡而言之，這些錯誤是趨向於使我們離開那鞏固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道路，離開那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而走上那與這些羣衆決裂的道路，走上那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這個危險在二月下半月就已經顯露出來，正是在那時候，我們有一部分同志因被過去的成功弄得昏頭昏腦，竟與列寧主義路線背道而馳。黨中央注意到這個危險，立刻就出來干涉，於是委托斯大林在專論集體農莊運動的文章中，給那些輕舉妄動的同志們一個警告。有些人以爲勝利衝昏頭腦這篇論文是斯大林個人的創舉。這當然是廢話。我們黨中央所以存在，並不是好讓什麼人在這種事情方面來表現個人創舉的。其實，這乃是中央一個仔細探查辦法。而當錯誤底深度與範圍都已查明時，中央就立刻把自己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通過的著名決議公佈出來，用自己的全部威權來打擊這些錯誤。

要使瘋狂奔馳者懸崖勒馬而轉入正軌，自是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中央所以叫做列寧黨底中央，就是因為它善於克服困難，即使困難比這更大，也能克服。而且它在大體上已把這些困難克服了。

在這種情形下，對於黨內整批隊伍，要止住自己的奔馳足步，及時轉入正軌，及時改編自己的隊伍，自是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黨所以叫做列寧黨，就是因為它具有充分敏捷性來及時克服這種困難。而且它在大體上已把這種困難克服了。

這裏的主要問題，就在於要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要有立刻消滅這種錯誤的本事。因為沉醉於不久以前的成功而害怕承認自己錯誤，害怕自我批評，不願迅速和堅決改正錯誤，——這就是主要的困難。只要一克服這個困難，只要一拋棄虛張聲勢的數目字和形式辦公官僚主義的最高限度主義，只要轉而注意於執行集體農莊底組織上經濟上建設的任務，就能使這些錯誤消滅無餘。毫無疑義的，黨在大體上已把這個危險困難克服了。

列寧說：

「迄今以前一切革命黨所以陷於滅亡，就是由於它們自傲而不善於看見自己力量之所在，並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且學會克服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至第二六一頁）。

列寧這一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第四個問題。進行反對曲解黨路線的鬥爭，這是不是後退，是不是退却呢？

答覆。當然不是！只有那些把繼續錯誤和繼續曲解當作進攻，把改正錯誤當作退却的人們，才能說這是退却。用加深錯誤和加緊曲解來實行進攻，——那不消說是很好的「進攻」呵。

我們把農業勞動組合提出來作為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並會規定相當的模範章程作為集體農



莊建設工作的指南。我們現在是否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曾提出鞏固工人階級和貧農方面與中農的生產結合作爲現時集體農莊運動底基礎。我們現在是否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曾提出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口號，作爲我們現時農村實際工作底主要口號。我們現在是否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我們還在一九三〇年一月間就已規定蘇聯農業集體化一定速度，並把蘇聯各區分成幾類，而給每一類規定其特別速度。我們現在是否離開這件事情而退却呢？當然不是！

試問怎能說黨在「退却」呢？

我們是想使那些犯錯誤和曲解者從其錯誤中退出來。我們是想使那些魯莽從事者從其魯莽思想中退到列寧主義立場上來。我們所以想這樣，是因爲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可以繼續向我們的階級敵人進行真正的進攻。這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後退呢？當然不是！這只是說，我們想實行正確的進攻，而不肯把進攻作爲魯莽從事的兒戲。

只有那些奇怪人和「左傾」過火份子才能把黨這個立場看作退却，——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那些妄談什麼退却的人們，至少不懂得兩件事情。

第一，他們不知道進攻法則。他們不懂得：實行進攻而不鞏固既得的陣地，那就是必遭失敗的進攻。譬如在軍事方面，怎樣的進攻才可以成爲勝利的進攻呢？爲要使進攻成爲勝利的，那末進攻的軍隊就可只是一味前進，而同時還要努力鞏固既得的陣地，隨作戰環境變遷而重新配置自己的力量，振作後方，拉上後備軍。爲什麼要這樣辦呢？爲着防範意外，消滅爲任何一次進攻所不能絕對避免的個別失陷，並以此而準備完全消滅敵人。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底錯誤，如果單就軍事方面來說，就在於他們忽視了

這個規則。就中也是由於這個原故，所以當他們接連不斷地打到基也輔時，然後就不得不接連不斷地退到華沙。一九二〇年蘇維埃軍隊底錯誤，如果也單就軍事方面來說，就在於他們在其進攻華沙過程中會蹈波蘭軍隊底覆轍。

關於階級鬥爭戰線上的進攻法則，也要這樣說。不鞏固已得的陣地，不重新配置自己的力量，不用後備力量保證前線，不振作後方等等，就不能實行順利進攻以消滅階級敵人。

整個問題就在於魯莽從事者不懂得進攻法則。整個問題就在於黨是懂得並實行着這些法則的。

第二，他們不懂得進攻階級本質。他們只知高喊進攻。而究竟是向那個階級進攻，聯合那個階級去進攻呢？我們是聯合中農向農村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的，因為只有這樣進攻才能給予我們以勝利。可是，如果這個進攻竟因黨內個別隊伍醉心於成功而開始離開正軌，並轉移自己火力去反對我們的同盟者，反對中農，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所需要的是隨便一種進攻，而不是和一定階級聯盟去打擊一定階級的進攻麼？須知吉訶德先生也曾妄想他衝擊風車就是進攻敵人哩。可是，大家知道，他在這種所謂進攻中是把自己弄得頭破血流的。

我們的「左傾」過火份子，大概是不肯讓吉訶德先生專美於前哩。

第五個問題。什麼危險在我們這裏是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抑是「左傾」危險呢？

答覆。右傾危險在我們這裏是主要危險。右傾危險在我們這裏會是而且現在還是主要危險。

這個說法，是不是與中央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決議中的著名提綱——這提綱說「左傾」過火份子底錯誤和曲解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障礙——相矛盾呢？不是的，是不相矛盾的。因為「左傾」過火份子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錯誤，造成使右傾在黨內加強和鞏固起來的順利環境。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錯誤是曲解着黨底路線，——於是就便利着破壞黨威信企圖的企圖，——於是就便利着右傾份子進行反

對黨領導的鬥爭。破壞黨領導底威信，就正是右傾份子進行反黨鬥爭的必要條件。「左傾」過火份子，他們的錯誤和曲解，就是爲右傾份子造成這樣的條件。因此，要戰勝右傾機會主義，就要克服「左傾」機會主義者底錯誤。「左傾」過火份子在客觀上是右傾份子底同盟者。

「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主義間的特殊聯繫，就是如此。

正因爲有這種聯繫，所以就有這樣的事實：有些「左傾」份子時常說要與右傾份子締結同盟。也正因爲有這種聯繫，所以就有這樣的特殊現象：有一部分「左傾」份子，昨天還「實行」一味進攻和企圖在什麼兩三星期內把蘇聯全國集體化，而今天却消極起來，袖手旁觀，把鬥爭地盤安然讓給右傾份子，因而實行真正在富農面前退却（沒有括弧的退却！）的路線。

目前時局底特點就在於：進行反對「左傾」過火份子錯誤的鬥爭，是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順利鬥爭底條件和特殊形式。

第六個問題。應怎樣估計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的事實呢？

答覆。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的事實，就是說明最近在我們這裏產生了一些不堅固的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現時正在清出不穩定的份子。這就是說，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將消失，而堅固的集體農莊則一定會繼續保存並日益強固。我認爲這是完全正常的現象。有些同志一看見這點，就悲傷不已和張惶萬分，拚命抓住那種誇大的百分數。而另外一部分人則幸災樂禍，預言集體農莊運動「失敗」。這兩種人都是非常錯誤的。這兩種人都遠不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瞭解集體農莊運動實質的。

退出集體農莊的，首先就是那些所謂紙上掛名者。這甚至不能說是退出，而不過是暴露空架子而已。我們需要紙上掛名者麼？當然不需要。我認爲北高加索人和烏克蘭人解散那些具有紙上掛名者的集體農莊而組織真正實在的真正穩固的集體農莊，是做得完全對的。這樣做法只是使集體農莊運動得益不淺。

其次，退出集體農莊的，是異己份子，直接敵視我們事業的份子。很明顯的，這種份子越是驅除得快，則集體農莊運動就越是獲益得多。

末了，退出集體農莊的，是動搖份子，而這種份子是既不能叫作異己份子，也不能叫作紙上掛名者的。這正是這樣一些農民，這些農民是我們在今天還未能說服他們來相信集體農莊事業正確的，可是這些農民是我們到明天就一定說服他們的。這種農民退出集體農莊，這對於集體農莊運動是一個嚴重的損失，雖然這個損失不過是暫時的。因此，爭取集體農莊中的動搖份子，就是現時集體農莊運動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由此可見，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這不僅是一個壞現象。由此可見，因為這退出過程是清出集體農莊裏面的紙上掛名者和直接異己份子，所以這個過程就是使集體農莊趨於健全鞏固的有益過程。

一個月以前，有人以為穀物區中的集體化已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現在已很明白，如果拿真正的多少穩定的集體農莊來說，那末這個數目字顯然是過甚其詞。如果在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以後，穀物區內集體化百分數能保留得百分之四十，——而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目前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極大成績了。我只拿穀物區內的平均數來說，雖然我很知道我們有個別的全盤集體化區，其集體化百分數已達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穀物區內集體化達到百分之四十，——這就是說，到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就已把原定五年集體化計劃完成至兩倍。

誰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方面這個歷史成績底決定意義呢？

第七個問題。動搖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他們這種做法是不是好呢？

答覆。不是的，他們這種做法是不好的。他們退出集體農莊，是違反他們本身利益的，因為只有集體農莊才給農民以擺脫貧困黑暗境遇的出路。他們退出集體農莊，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在較壞的境地，

因爲他們使自己喪失蘇維埃政權所給予集體農莊的優待和便利。集體農莊中的錯誤和曲解，決不能作爲退出集體農莊的理由。必須留在集體農莊內來通力合作地糾正錯誤。更因爲蘇維埃政權將用全力反對這些錯誤，所以糾正這些錯誤是更其容易的。

列寧說：

「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免除羣衆生活貧困與遭受壓迫的境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說：

「靠小農經濟是不能擺脫貧困境遇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列寧說：

「如果我們將照舊依靠小農莊而生活，那怕就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我們都會橫直不免於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列寧說：

「只有藉助於共同的勞動組合的協作的勞動，才可逃出帝國主義戰爭把我們逼進的絕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七頁）。

列寧說：

「必須過渡到巨大模範農莊中的共耕制」，因爲「除非如此，就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的狀況，那種簡直是困苦不堪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八頁）。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是使農民能擺脫貧困黑暗境遇的唯一工具。

很明顯的，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做得不對的。

列寧說：

「你們大家當然從蘇維埃政權底全部工作中知道，我們是如何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那一般以使細小的個體的農業變為公共的協作的或勞動組合的農業，以逐漸促進這個轉變為目標的一切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列寧說：

「蘇維埃政權已把農業公社和協作社放在第一位，已給以直接優先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九頁）。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將優待集體農莊並給以優先權，而這是個體農戶享受不到的。這就是說，蘇維埃政權，無論在給予土地方面，無論在供給機器、拖拉機、種子等方面，無論在減輕賦稅方面，無論在發給借貸金方面，都將優待集體農莊。

為什麼蘇維埃政權優待集體農莊並給以優先權呢？

因為集體農莊是使農民能免除貧困境遇的唯一工具。

因為用優先權幫助集體農莊是幫助貧農中農的最切實方式。

幾天以前，蘇維埃政權已決定把集體農莊內一切公有的工作牲畜（馬匹和牯牛等等）以及集體農莊公共所有或集體農莊莊員個人所有的乳牛、豬、羊、家禽等等，概行免稅兩年。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此外，蘇維埃政權已決定把集體農莊莊員所欠國家貸金展期至年底償付，並把那些已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於四月一日以前所被判處的一切罰款和法庭處分取消。

最後，蘇維埃政權已決定在本年度內一定要借給集體農莊莊員以五萬萬盧布貸金。

這些優待是爲着幫助集體農民。這些優待是爲着幫助這樣一些集體農民，這些集體農民會能以中流砥柱精神抵擋退潮，曾在反對集體農莊敵人鬥爭中受到鍛鍊，會保持住集體農莊並緊緊支撐集體農莊運動底偉大旗幟。這些優待是爲着幫助這樣一些集體農莊莊員的貧農和集體農莊莊員的中農，這些貧農和中農現時是我們集體農莊底基本中堅，他們將鞏固並澈底形成我們的集體農莊，他們將把千百萬農民爭取到社會主義方面來。這些優待是爲着幫助這樣一些集體農民，這些集體農民是現時集體農莊底基本幹部，完全值得稱爲集體農莊運動英雄。

已退出集體農莊的農民是得不到這些優待的。

農民退出集體農莊，是做錯了，——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他們只有回到集體農莊以後，才能享受這些優待，——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第八個問題。怎樣處置農業公社呢，不應當把它們解散麼？

答覆。不是的，是不應當把它們解散的，而且是用不着解散的。我所指的，是真正的農業公社，而不是紙上的農業公社。在蘇聯穀物區裏，有一些很好的值得獎勵贊助的農業公社。我所指的，是舊有的農業公社，這些農業公社，已經過多年考驗，受過鬥爭鍛鍊，早已完全證實其有存在的價值。至於說到不久以前成立的那些新的農業公社，那末，只有在這些農業公社是按自願原則組織起來，並得到農民羣衆積極贊助而並不強迫實行日常生活公共化的情況下，才能維持下去。

成立和主持農業公社，——是一件複雜而困難的事情。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幹部和久經鍛鍊的領導

者，則巨大而穩定的農業公社，才能存在，才能發展。如果忽忙從事，一下子由農業勞動組合章程過渡到農業公社章程，那就只能使農民離開集體農莊運動。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情，應當特別鄭重其事，絲毫不可急躁。農業勞動組合是比較容易作到的事情，是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懂得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是現時集體農莊運動最流行的形式。只有隨着農業勞動組合日益鞏固和穩固，才能造成使農民羣衆趨向於農業公社的基礎。因此，農業公社這個集體農莊運動最高形式，只有在將來才能成爲集體農莊運動底主要環節。

#### 第九個問題。怎樣處置富農呢？

答覆。我們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中農。中農是工人階級底同盟者，因此我們對中農的政策應當是親善的政策。富農却是另一回事了。富農是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我們是沒有與富農講和平，而且也不能與他們講和平的。我們對富農的政策，是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就能夠消滅富農階級。可是，這是說，我們將力謀包圍並消滅富農階級。

#### 請看列寧關於富農怎樣說：

「富農是最殘忍的最橫暴的最野蠻的剝削者，他們在其他各國歷史上會屢次恢復地主、皇帝、神父、資本家們底政權。富農是比較地主和資本家多些。可是，富農在人民中間到底還是佔少數：。這些吮吸血汗者在戰時會利用人民生活困苦而乘機發財，他們會以提高糧食及其他物品價格而刮得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專靠吮吸因戰爭而破產的農民底血汗，專靠吮吸忍饑挨餓的工人底血汗，來養肥自己。這些吸血蟲會吸食勞動羣衆底血液；而且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越是饑餓，則他們越是發財。這些吸血鬼曾經並且現在還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裏，再三盤剝貧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當我們還在實行限制這些吮吸血汗者、蜘蛛和吸血鬼剝削趨向的政策時，我們是會容忍過他們的。我們所以容忍，是因為當時沒有什麼可以用來代替富農經濟，富農生產。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用我們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經濟來代替富農經濟，而且綽綽有餘。現在已用不着再容忍這些蜘蛛和吮吸血汗者了。如果再容忍這些放火焚燒集體農莊、刺殺集體農莊活動家並企圖搗亂播種運動的蜘蛛和吮吸血汗者，那就是違反工農利益了。

因此，我們應當用我們波爾什維克所具有的全部堅毅精神和澈底精神，來實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

第十個問題。集體農莊底最近實際任務何在呢？

答覆。集體農莊底最近實際任務，就在於要為播種而奮鬥，為儘量擴大播種面積而奮鬥，為正確組織播種事宜而奮鬥。

現在，集體農莊其他一切任務都須適應於播種任務。

現在，集體農莊中其他一切工作都須服從於組織播種工作。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及其非黨員積極份子究竟如何穩固，集體農莊領導者及其波爾什維克中堅幹部究竟有多大才幹，將不是按響亮決議和堂皇祝詞，而是按播種事業是否組織得當的具體事實來審查。

可是，要光榮實現這個實際任務，就要使集體農莊工作者轉而注意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底經濟問題，集體農莊內部建設問題。

直到最近以前，集體農莊工作者都是專心注意於追求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而且不願意看見真正集體化與紙上集體化間的區別。現在，這一種貪求數字的心理是應被拋棄了。現在，集體農莊工作者應當專心注意於鞏固集體農莊，在組織上完備集體農莊，在集體農莊裏面組織切實工作。

直到最近以前，集體農莊工作人員只是專心注意於組織巨大集體農莊，組織所謂「偉大農場」，而這些「偉大農場」，往往變成在鄉村裏沒有什麼經濟根基的笨重的紙上的機關。於是，外表工作就往往代替切實工作。現在，這種傾心於外表的心理是應被拋棄了。現在，工作人員應當專心於鄉村集體農莊組織方面的經濟方面的工作。當這個工作獲到應有成績時，「偉大農場」就會自然而然出現了。

直到最近以前，人們都很少注意吸收中農來參加集體農莊領導工作。而同時我們知道，在中農中間有許多出色的主管人材，他們能夠成爲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很好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這一個缺點是應被剷除了。現在，任務就在於要吸收中農優秀份子來做集體農莊領導工作，讓他們在這個事業中發揮他們的才能。

直到最近以前，人們都未曾充分注意農婦中的工作。過去這一時期表明：農婦中的工作是我們工作中最弱的部分。現在，這個缺點是應被堅決徹底剷除了。

直到最近以前，某些區裏的共產黨員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爲他們能夠單獨解決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的一切任務。他們因爲由此出發，所以就沒有充分注意吸收非黨員份子來參加集體農莊裏的負責工作，提拔非黨員份子來參加集體農莊裏的領導工作，在集體農莊裏組織廣大非黨員積極份子。我們黨底歷史已經證明，而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過去這一個時期的事實又再度表明：這種立場是根本不正確的。如果共產黨員竟閉關自守，竟與非黨羣衆隔絕，那他們就會葬送整個事業。而共產黨員所以在爲社會主義而奮鬥中已獲得勝利而榮光逼體，而共產主義底敵人却已被打得落花流水，除其他原因而外，也是因爲共產黨善於吸收非黨員羣衆中的優秀份子來參加工作，因爲他們善於在廣大非黨員羣衆中間吸取力量，因爲他們善於把廣大非黨員積極份子團結在自己黨周圍。現在，我們在非黨員羣衆工作中的這個缺點是應被堅決徹底剷除了。

糾正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根本剷除這些缺點，——這正是說把集體農莊底經濟工作引入軌道。  
總之：

(1) 正確組織播種工作——這就是任務。

(2) 把注意力集中於集體農莊運動底經濟問題——這就是為解決這個任務所必要的手段。

(此文曾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在真理報第九二期上發表)

##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

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你們的決議，我是略知大概的——你們將贊同一九三一年工業發展大綱，並擔承義務來完成這個大綱。

波爾什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波爾什維克是慣於約許什麼就履行什麼的。可是，什麼是擔承義務來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生產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担承這樣一個義務，那就是說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以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要有什麼決議，——而且約許要在三年以內完成各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約許完成一九三一年計劃，約許在三年以內完成五年計劃，這是很好的。但我們已經受過「辛苦經驗」教訓。我們知道，約言並不是時常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約許過完成該年度的計劃。當時會須把我們的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二。可是，這約言是沒有完全履行的。在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生產額，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而今年不

會重複這種情形呢？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現在約許在一九三一年度把工業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有什麼東西可擔保這次約言一定會實現呢？

爲要完成大綱，爲要把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爲要不是在四年，而是在三年以內就完成基本的有決定意義的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爲此就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就要有實在的可能，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客觀」可能性。

第二，就要有領導各企業的志願和才能，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在去年曾有完成計劃的「客觀」可能性麼？是的，是有過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生產額超過上年百分之三十一。試問爲什麼我們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會阻礙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才能不夠。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才能不夠。

我們會有第一個條件：爲完成計劃所必要的「客觀」可能性。可是我們却没有充分具備第二個條件：領導生產工作的才能。而正因爲領導生產工作的才能不夠，所以計劃就未曾完成。我們沒有使工業生產額增長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二，而僅僅只增長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經是一件大事。在一九三〇年，任何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量都沒有什麼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增長。反之，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都是一落千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是一個大進步。可是，我們本來能夠增加得更多，因爲我們曾有一切必要的「客觀」條件。

那末，要怎樣才可擔保不致又發生去年的怪事，才可擔保完全完成計劃，才可担保使所有可能性都

將被我們儘量利用，才可担保使你們的約言不致有一部分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家歷史中，在各國度歷史中，在各軍隊歷史中，曾有過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爲司令官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失敗。

我們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要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有什麼條件才可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棉花。我們有這些東西麼？是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些。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匯集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真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我國除橡皮以外，是連什麼都有的。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運橡皮也會有了。就這方面說來，就天然富源而論，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的，甚至於綽有餘。

還要有什麼呢？

要有這樣一個政權，這個政權是願意和能夠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以謀人民福利的。我們有這樣一個政權麼？是有的。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遇到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間的磨擦。譬如，去年，蘇維埃政權在關於建立第二個採煤冶金業根據地的問題上，曾不得不作一些鬥爭，而沒有這第二個採煤冶金業根據地，我們是不能再往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而我們在很快將來就會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這個政權是享有千百萬工農羣衆擁護的。我們的政權是享有這種擁護麼？是的，是享有這種擁護的。在全世界上找不出另外一個政權，如像蘇維埃政權享有工農這種擁護。我不來援引種種事實，如社會主義競賽的增長，突擊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羣衆爲迎展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明白證明千百萬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爲要完成並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綱，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這樣一個制度，這個制度是不患着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的，同時它又有大大優於資本主義的優勝處。危機、失業、浪費以及大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苦於這些病症，因爲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裏的，是握在工人階級手裏的，因爲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是不患着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的。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危機吧。他們盡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減低原料和糧食價格。可是他們却不願多少認真減低工業品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以取償於主要的商品消費者，以取償於本國工農羣衆，以取償於那原料糧食出產國的勞動羣衆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掘毀自己的立足地基。而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反而加深危機，反而造成新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勝處就在於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生產過剩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沒有無政府生產狀態，因爲我們進行着有計劃的經濟。但這還不是一切。我們的國家乃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夠用最優良的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曾是以渙散狹小農業爲根據的。可是這已過去了。現在情形已經不同。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莊和集

體農莊——而它們正是大農業形式——在今年出產的穀物商品，就已經等於全國穀物商品總額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是給予我們以這樣一種迅速前進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所夢想不到的。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這樣一個黨，這個黨是充分團結一致的，以至於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底努力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這個黨是充分有經驗的，以至於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波爾什維主義的政策。我們有這樣一個黨麼？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為這個政策給予重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是承認的。請看吧，大家皆知的「高貴」先生——美國的菲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寶是如何向我們黨拚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拚命狂吠呢？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因爲這政策給予節節不斷的成功。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部門中，甚至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可能性。

這樣，爲完成計劃所必要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

我們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才能麼？

換句話說，我們有對於工廠礦井的正確領導麼？在這裏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不是百事大吉的。我們既是波爾什維克，就應當爽直而坦白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總是用波爾什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爲領導就是簽署文件。這當然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令人不得不起謝德林小說中的瞎知事。你們記得瞎知事太太怎樣教訓瞎知事兒子的故事吧，太太對兒子說：不要用功學習呵，不



要諳通事理呵，讓別人去幹這種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呀，——你的事情就是領導，就是簽署文件。使我們丟臉的，就是甚至在我們波爾什維克當中，也有不少專靠簽署文件來進行領導的人。而如果你要他們諳通事理，精通技術，變成內行，那他們就會連說幾個「不」字了。

試問：我們波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的人，是已把最大工業建設任務解決的人，是已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為什麼在領導生產工作方面竟會屈服於文件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文件是比切實領導生產工作容易得多的。於是許多經濟工作人員走上這條阻力最少的道路。在這裏並且有我們的過咎，中央機關的過咎。在十年以前曾提出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不充分瞭解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須要學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舊技師、舊工程師、舊專家去管理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則不要去干預工作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但同時務必努力研究技術，努力研究生產管理學，以便將來能與忠於我們的專門家一同成爲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口號會是這樣。而在實際上又是怎樣呢？結果，這個公式第二部分被拋棄了，因爲學習是比紙上署名難些，而這個公式第一部分則被人庸俗化了，「不干預」幾字竟被人曲解爲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竟釀成一種胡說，危險而有罪的胡說；而擺脫這種胡說，是愈快愈好的。

實際生活本身會再三警告我們，說在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亭案件就是第一個警號。沙赫亭案件已經指明：黨組織和職工會底革命警覺性是不夠的。這事件指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實在是落後得不成樣子；許多舊工程師和舊技師，因爲沒有人監督他們的工作，就比較容易淪入暗害道路，尤其是因爲國外敵人又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繞他們。「工業黨」公審案，就是第二個警號。

當然，暗害勾當底基本原因是階級鬥爭。當然，階級敵人是瘋狂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可是，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盛行的事實，那就不夠了。

暗害勾當怎麼會能這樣猖獗盛行呢？這應歸咎於何人呢？這應歸咎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處理生產領導事情，如果我們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開始研究辦事技術，開始精通技術，如果我們會更時常而恰當地干預經濟領導工作，那末暗害份子就作不成若多暗害事情了。

要使我们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们自己轉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可是，無論第一個警號，甚至無論第二個警號，都還沒有保證發生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已經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種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自己成為專門家，成為諸通事理者，自己成為完全內行的時候了。

有人時常問道：爲什麼在我們企業裏沒有一長制呢？在我們尙未有精通技術以前，我們就沒有一長制，而且不會有一長制的。在我們中間，在波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熟悉技術問題、經濟問題以及財政問題的人材以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精通工廠礦井底技術、經濟以及財政，那末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是無濟於事的，也不會有一長制的。

因此，任務就在於要我們自己精通技術，要我們自己成為工作內行。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我們的計劃完全完成；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使一長制見諸實現。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事情。科學、技術經驗、知識——凡此種種都是可以求得的東西。今天沒有，而明天就會有了。在這裏主要點就在於要有波爾什維克的熱烈志願去精通技術，精通生產學。只要有熱烈志願，那就一切都可辦到，一切都可解決了。

人們有時發問：不可以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不可減低速度！恰巧相反，還必須盡力和盡可能增加速度哩。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這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可是，我們是不願挨打的。不呀，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羅斯歷史底內容，就是在於它因落後而時常挨打。蒙古的可汗會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會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會打過它。波蘭的和立陶宛的地主會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會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會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應。你們記得一位革命前期詩人底語句吧：「羅斯媽媽呵：你又豐富，你又單薄，你又強大，你又軟弱」。這些老爺們是把舊時詩人這段語句背得很熟的。他們會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豐富」，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會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單薄軟弱」，那就可以任意打你搶你而不受報應。打擊落後者，打擊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豺狼法則。你落後了，軟弱無力麼，——那末你就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和奴役你。你強大有力麼，——那末你就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

在過去，我們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的。但是現在，當我們已推翻資本主義，而我國政權又是工人政權時，我們已有祖國，而且我們將堅持其獨立。你們願不願讓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破和喪失其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其落後情況，而開展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真正的波爾什維克的速度。舍此而外，別無他途。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時說過：「或是死亡，或是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是我們被人打翻。

這就是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的義務所要求於我們的。

可是，我們還有其他一種義務，更重要更重大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的義務。這種義務是與第一種義務相符合的。可是，我們却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一部分。我們所以勝利了，不僅是叨蒙蘇聯工人階級努力，而且還叨蒙世界工人階級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擁護，那我們就會早被粉碎了。人們說，我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是說得很好的。可是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就擔負有最重大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爲什麼擁護我們呢？我們爲什麼配受這種擁護呢？就是因爲我們最先動手去與資本主義交鋒，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因爲我們所做的事情，只要一成功，就會翻轉整個世界和解放整個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成功呢？就是要剷除我國落後情況，加強波爾什維克高度建設速度。我們應當如此前進，使全世界工人可以望着我們而說道：看哪，這是我們的先鋒隊，這是我們的突擊隊，這是我們的工人政權，我們的祖國，他們幹着他們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幹着我們大家的事情，他們幹得好，我們大家來幫助他們反對資本家並促進世界革命事業吧。我們應當不辜負世界工人階級這種厚望麼，應當履行我們在他們面前的義務麼？是的，是應當的，如果我們不願完全丟臉的話。

我們的義務，我們的國內義務和國際義務，就是如此。

你們由此可見，就是這些義務要求我們採取波爾什維克發展速度的。

我並不說，我們近幾年來，在經濟領導工作方面沒有絲毫成績。是有成績的，而且是很多。我們已把工業出產量增加到戰前兩倍了。我們已創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時期中，曾努力來認真精通生產、精通生產技術、精通生產底財政和經濟，那我們就能作出更多成績了。

至多是在十年當中我們應當跑過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可能性

來做到這一點。所不夠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才能而已。而這却是取決於我們。而且只是取決於我們！已經是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不干預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新的適合現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方針的時候了。你既然是工廠經理，那你就得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就得學習和再三學習。波爾什維克應當精通技術。已經是波爾什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身爲經濟工作者，却不願意研究技術、不願意精通技術，那就是笑話，而不是經濟工作者了。

有人說，精通技術是一件困難事情。這是不對的！波爾什維克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我們已解決許多最困難的任務。我們已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已取得政權。我們已創立極大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已把中農引上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成了。剩下來要我們做的事情，已經不多：研究技術，精通科學。而一待我們做到這步時，我們就會有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而只要我們真正願意這樣幹，那我們是一定會做到這步的！

## 新環境和新經濟建設任務

——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本會議所有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情形，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有些工業部門出產量是比去年同時期內增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却不過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還有個別工業部門，却增加得極少極少，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或者甚至於更少。屬於最後這一種工業部門的，有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你們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爲什麼會這樣參差不齊呢？使某些工業部門落後的原因何在呢？使某些工業部門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增加得更多，因而落後於其他部門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於近來工業發展條件已經根本改變，已形成新環境，這個新環境是要求採取新式領導方法的，而我們某些經濟工作人員，却沒有改變工作方法，而仍然拘守成規，按照舊方式工作着。所以問題就在於：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本來要求採用新式工作方法，而我們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却不瞭解這一點，看不見現在有採用新式領導方法之必要。

這就是使我國工業某些部門落後的原因。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究竟是些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從何而來呢？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些條件吧。

## (一) 勞動力

首先就是說要以勞動力保證各企業。從前，工人照例都是自動跑進工廠的，——所以，當時在這些事情方面，會有某種自流动性。而這個自流动性所以產生，是因為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民分化，有貧困，有逼迫人們離鄉進城的飢餓恐怖。你們大概還記得所謂「鄉下人從鄉裏逃進城去」的公式吧？什麼東西會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飢餓恐怖，就是失業，就是以下一種情況：在農民看來，農村好似後母一樣，所以農民會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都可，只要找得到一點什麼工作就夠了。

在不久以前，我國情形會是如此，或者幾乎是如此。

可以說我國現在也有完全同樣的情形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環境已經根本變了。而正因為環境已經變更，於是我們就再沒有勞動力自流动性。在這一時期中，究竟已發生什麼變更呢？第一，我們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於是我們就消滅了那壓迫「勞動市場」的力量。第二，我們已根本打破農民分化現象，——於是我們就消除了那驅使農民由農村逃到城市的普遍貧困現象。最後，我們以數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了農村，擊潰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給了農民以像人類那樣來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對於農民，已不可把農村叫作後母了。正因為不可把它叫作後母，

所以農民已在鄉裏安居樂業，於是在我們這裏就既沒有「鄉下人從鄉裏逃進城去」的現象，也沒有勞動力的自流性了。

你們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已有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企業以勞動力的新條件。

而從這裏就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已不可再指望於勞動力的自流性了。這就是說，應當拋棄自流「政策」而採取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以供工業需要的政策。可是，爲此就只有一個辦法——由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以及集體農莊莊員訂立合同的辦法。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實際經驗已經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於集體農莊或工業企業，都是很奏功效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必須立刻實行把最笨重的生產手續機械化，並儘量開展這件事情（例如林木工業、建築業、採煤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黑色金屬冶鑄業等等）。這當然不是說似乎要拋棄手工勞動。反之，手工勞動還會長期在生產中發生極大作用。但這却是說：生產手續機械化，對於我們是一個新穎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因素，而如果没有這個因素，則我們就既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支持我們的新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經濟工作人員，他們既「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與集體農莊訂立的合同。這正是這樣一些經濟工作人員，這些經濟工作人員不懂得新環境，不願意按新方式去工作，却眷念着勞動力「自行流進」企業時的「舊日黃金時代」。不待說，這種經濟工作者是與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負新經濟建設任務相隔天壤的。他們大概認爲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是一件偶然事件，認爲勞動力缺乏現象將會自行消失，將會按所謂自流方式而消失。這是錯誤的想法，同志們。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是不會自行消失的。這種困難是只有經過我們自己努力以後，才會消失的。



總之，任務就是要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同時要把生產手續機械化。關於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條件。

## (二) 工人工資

我剛才已經說過關於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以供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工人還不能完全了事。爲要保證我們各企業以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工作中，使企業裏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如果沒有相當精通技術而習慣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那就無法前進，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如果沒有這種固定工人成份，那就每次都要重新教導新來工人，那就得把一半時間都跑去教導新來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而現在我們所有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們各企業裏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呢？不是的，可惜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裏，還有所謂勞動力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裏，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在一季當中，至少沒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工人成份變換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當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而生產規模還不宏大時，尚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時在擴展改造時期，當生產規模已經宏大而技術設備亦已極端複雜時，勞動力流動性就已成爲妨害生產的奇災大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如果在現時還「容忍」勞動力流動性，那就是腐化我國工業，消滅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性，破壞改

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在工資方面的「左傾」平均主義。在我們許多企業裏，工資標準是定得如此，以致幾乎完全抹煞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由於這種平均主義的結果，不熟練的工人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並因此而喪失上進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這企業裏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裏做些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由於這種平均主義的結果，熟練工人就不得不從這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便結果找到一個能夠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於是就有「普遍」流行的從這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勞動力流動性。

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而打破舊有工資標準。為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適當工資標準，這工資標準應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使熟練展鐵工人所得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工資相等，那是不可容忍的。使火車司機師所得工資與抄寫人所得工資相等，那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曾說：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還會存在；只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這個差別才會消失；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勞動而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而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竟不同意這點，却以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失了。究竟是誰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對呢，抑是平均主義者對呢？大概是馬克思和列寧對吧。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誰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內，在每個企業內，在每個車間內，都有一部分主要的比較熟練的工人，而如果我们真想保證在企業裏有固定工人成份，那我們首先而且主要就應當把他們固定在生產工作中。他們這一部分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內，固定在車間內，這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裏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裏，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其工資水平，正確規定工資標準以便使各工人熟練程度，都能得到應有報酬。而什麼是提拔他們上進和提高其工資水平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給不熟練的工人以上進機會，給他們以努力上進的刺激，努力變為熟練工人的刺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而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給不熟練的工人以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而我們愈是大膽這樣辦，則結果也就愈好，因為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方面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

可是，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為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裏，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不可否認，最近幾年以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做成不少事情。可是，我們所已做成的，還完全不夠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不可藉口說，從前住房是比現在少些，因此就可以拿已有成績來聊以自慰。也不可藉口說，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就可以認為現有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朽的人們，才能藉口往事而聊以自慰。不要以往事為標準，而要以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為標準。必須瞭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不是從前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的文化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糧食，又要有安適住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些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應該保證他們這些

條件。固然，他已經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夠。他還要求滿足其一切物質的文化的需要，而我們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執行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那就無怪工人在其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其應盡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們底物質的文化的生活的義務。

總之，任務就是要消滅勞動力的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關於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三個條件。

### (三) 勞動組織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必須消滅勞動力流動性，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內。可是，把工人固定起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只求消滅流動性，還是不夠的。除此而外，還須使工人處在相當勞動條件下，使他們有可能好好工作，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所以，必須如此在企業內組織勞動，務使生產率能夠一月高似一月，一季高似一季。

可以說現在我們企業中的勞動組織實況已適合於現代生產要求麼？可惜不可這樣說。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這樣一些企業，在這裏，勞動組織情形是很不好的，在這裏所有的，不是秩序井然和工作協

調，而是茫無頭緒和雜亂無章，在這裏流行的，不是對工作負責，而是完全不負責和無人負責現象。

什麼是無人負責現象呢？無人負責現象就是對所担任的工作、對機器、對機架、對工具不負任何責任。在無人負責現象盛行時，當然是談不到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愛惜機器，愛惜機架，愛惜工具的。你們知道，在鐵路運輸業方面，無人負責現象會引起什麼結果。這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正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已消滅無人負責現象並已提高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便把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程度。

不正確的勞動組織，是與無人負責以及各人對所担任具體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和睦共居的，——從前，靠這種不正確的勞動組織，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現時的情形却就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當生產規模宏偉和已有宏大企業時，無人負責現象就已是危害我國工業的奇災大禍，會使我們各企業內一切生產成績和組織成績都受到莫大危險。

為什麼無人負責現象竟能在我們有些企業裏根深蒂固呢？它是以非法伴侶資格而隨着不斷生產制混進企業中來的。如果說不斷生產制一定要引起生產中無人負責現象，那就錯誤了。如果勞動是組織得正確的，如果使每個人都對一定工作負責，如果指定一定工人集團來經常使用一定機器和機架，如果輪流班次是安排得正確的，各班質量和熟練程度是彼此相等的，那末不斷生產制就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根本剷除無人負責現象。譬如鐵路運輸業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鐵路運輸業中雖實行着不斷生產制，可是無人負責現象却已不復存在了。可以說在我們工業企業裏，不斷工作制實行情形也是如此順利麼？可惜不可這樣說。這是因為在我們有些企業裏，不斷生產制實行得太急，却沒有預備好相當條件，沒有適當地佈置質量和熟練程度多少相等的生產班，沒有使每人都對每一具體工作負責。而其結果，就使不斷生產制聽天由命而變成無人負責現象了。結果，我們在許多企業裏，就有紙上的口頭

的不斷生產制和非紙上的實在的無人負責現象。結果，就使人們對工作沒有責任心，不愛惜機器，讓機架大批毀壞，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無怪工人說：「我們本來很願意提高勞動生產率並改善工作質量，可是現在既然誰也不對任何事情負責，試問誰會看重我們呢？」

由此可見，我們某些同志是在某些地方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過分匆忙了，而既然過分匆忙，於是就曲解了不斷生產制，而將其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為要消滅這種情形和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就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仿照在鐵路運輸業中所已作過的先例，把實行不斷生產制的條件改變，使其不致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或者是在現時還沒有實行不斷生產制的順利條件的地方，就仿照在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裏不久以前所作過的例子，拋棄那紙上的不斷生產制，暫時轉到六日間斷制，並準備一些必要條件，以便日後可以再來實行真正的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再來實行那沒有無人負責現象的不斷生產制。

其他出路是沒有的。

毫無疑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是明明懂得所有這些事情的。可是，他們却默然不做聲。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害怕真情。可是，試問波爾什維克從什麼時候起竟開始害怕真情呢？在某些企業內，不斷生產制已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於是不斷生產制就被曲解到極點，——這難道不是實情麼？試問誰需要這樣的不斷生產制呢？誰敢說，保存這種紙上的已被曲解的不斷生產制的利益，是比正確組織勞動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真正的不斷生產制底利益重要些，是比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重要些？我們把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取消得愈快，則我們實現真正的而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亦愈快，——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有些同志認為，只要咒罵一頓，說響亮話，就可剷除無人負責現象。無論如何，我總知道有這樣一些經濟工作人員，這些人在其反對無人負責現象的鬥爭中，只是常常在大會上把無人負責現象咒罵一頓而

已，他們大概以為說罷這些話以後，無人負責現象就會自行消失，就會按所謂自流方式而消失。如果他們認為，單靠演說和咒語，就可從實際工作中剷除無人負責現象，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不呵，同志們，無人負責現象是總不會自行消失的。只有我們自己才能夠而且應當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因為你我大家共同執掌着國家政權，你我大家共同對於一切事情都應負責，就連無人負責現象也在其內。我認為，如果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從事於演說和咒罵，而是親自留在礦井或工廠裏——舉例來說——考察一兩個月，研究勞動組織方面的一切細節和「小事」，在事實上把那裏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然後把該企業方面的經驗傳佈到其他各企業去，——如果他們這樣做，那就會好得多。那就會簡直不知要好多少。那就是真正反對無人負責現象的鬥爭，為波爾什維克的正確勞動組織的鬥爭，為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力的鬥爭。

總之，任務就是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改善勞動組織，在企業裏正確佈置勞動動力。  
關於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四個條件。

####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對於一般工業指揮幹部，就中是對於工程技術人材的環境，也變更了。

從前我國情形是如此，就是我們全部工業底基本來源，是烏克蘭採煤冶金根據地。當時，我國一切工業區——無論是南部或莫斯科和列寧格拉——都是由烏克蘭供給金屬的。同時，我們蘇聯一切基本企

業所需要的煤炭，也是由烏克蘭供給的。這裏我把烏拉爾除開不講，因為烏拉爾當時所有比重是比頓巴斯小得多的。於是，我們在當時是有三個培養工業指揮幹部的基本策源地：南部，莫斯科區，列寧格勒區。很明顯的，在當時這種情況下，我們靠着我國當時所只能有的最低限額的工程技術人材，還可以勉強過得去。

在不久以前，情形曾是如此。

可是，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另一種環境了。我認爲，現在已經顯而易見，爲要支持現有發展速度和宏大生產規模，則我們就不能只靠烏克蘭採煤冶金根據地了。你們知道，雖然烏克蘭的煤炭和金屬出產日益增多，可是烏克蘭的煤炭和金屬已經不夠滿足我們需要了。你們知道，我們因此就會不得不在東方創立一個新的採煤冶金根據地即烏拉爾—庫茲巴斯。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創立這個根據地，不是沒有成效的。可是這還不夠。我們還須在西伯利亞本地創立冶金業來滿足該地速增需要。而且我們已在創立它了。此外，我們還須在卡查赫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創立一個新的有色金屬冶鑄業根據地。最後，我們還須開展極廣大的鐵路建設工程。這是整個蘇聯利益——無論是各邊疆共和國利益或中心區域利益——所要求的。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我們從前尚覺足夠的最低限額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現在已經不夠了。由此就得出結論：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材的策源地已經不夠了，必須在烏拉爾、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創立一大批新的策源地。如果我們現在真正要實現蘇聯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那我們就須保證自己已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

可是，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我們所需要的，乃是這樣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這種人材能夠瞭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領會這個政策並有決心誠懇實現之。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已經走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此時，工人階級應當造就它自己。



的，能夠維護它這個統治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向來無論那一個統治階級，都是除非有它自己的智識界不可的。毫無疑義的，蘇聯工人階級，也是除非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不可的。

蘇維埃政權有鑒於此，所以就極力吸收工人階級份子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高級學校去學習。你們知道，現在我國高級學校裏學習的有幾十萬工農青年。如果從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級學校是少爺公子獨佔的場所，那末現時在蘇維埃制度下，工農青年却是高級學校裏的統治力量了。毫無疑義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能從我們各高級學校裏得到成千數的新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國工業的新的指揮員。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問題底另一方面就在於：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將不僅由高級學校畢業生組成，同時還會由我們企業裏的實際工作人員，由熟練工人，由工人階級在工廠礦井裏面的文化人材組成的。社會主義競賽底發起人，突擊隊底隊長，勞動高潮底實際提倡人，各部分建設工作底組織者——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新進階層，正是這階層應當協同高級學校畢業同志來組成工人階級智識界底核心，我國工業指揮人材底核心。任務就在於不要埋沒這些富有提倡精神的同志，而應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給他們以表現其組織才能的機會，給他們以充實其知識的機會，並且不惜花費金錢來給他們造成相當的環境。

在這些同志們當中有不少非黨員同志。可是這不能妨礙我們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職務。恰巧相反，正是應當特別關心他們這些非黨員同志，應當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根據事實來確信我們黨是重視能幹而有天才的工作者的。有些同志認為只有黨員同志才可提拔來擔任工廠領導職務。於是他們就往往埋沒那些有才能有提倡精神的非黨員同志，而把黨員同志提到首位，那怕這些黨員同志是較少才能和沒有提倡精神的。不消說，這種所謂「政策」是愚蠢而反動到極點的。這種「政策」只能破

壞我黨威信並使非黨員工人離開我黨，這是不必證明的。我們的政策，並不是要把黨變成閉關自守的特殊等級。我們的政策，是要使得在黨員工人與非黨員工人間存在有「相互信任」的空氣，「相互審查」的空氣（列寧）。我們黨所以在工人階級中間負有隆重的威信，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黨實行着正是這樣的政策。

總之，任務就是要使我們蘇聯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關於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四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五個條件。

## （五）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的轉向的徵象

關於如何對待舊資產階級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也須有另一種提法。

兩年以前，我們所有情形如下：舊技術智識界中的最熟練部分，曾染受暗害病。而且在當時，暗害勾當曾是一種時髦東西。有一些人親自進行暗害勾當，另外有些人則掩護這些暗害份子，第三部分人則袖手旁觀和保守中立，第四部分人則在蘇維埃政權與暗害份子中間動搖不定。當然，舊技術智識界中的大多數人，當時仍然還是多少忠順地工作。可是這裏所講的，並不是大多數，而是技術智識界中的最熟練部分。

暗害運動是由什麼造成，是由什麼培植起來的呢？是由於蘇聯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政策，是由於這些資本主義份子反抗蘇維埃政權政策，是由於國際形勢

複雜，是由於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中有困難。如果戰鬥部分的暗害份子積極性所藉以支持的，是資本主義各國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陰謀以及我們國內的糧食困難，那末，另一部分舊技術智識份子向積極暗害份子方面的動搖，却是由托洛茨基孟什維克胡說者底時髦論調所加強的，這班胡說者硬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橫豎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硬說「蘇維埃政權橫豎是要蜕化而快要倒台的」，硬說「波爾什維克本身用自己的政策來促進武裝干涉」以及其他等等。而且，既然甚至于右傾份子當中的某些老波爾什維克，在當時也未能抗拒「時風」而離開了黨，那末在從來就沒有開過波爾什維主義氣味的一部分舊技術智識份子也叨蒙上天保佑而誤入迷途，那就毫不奇怪了。

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蘇維埃政權對於舊技術智識界就只有一個唯一無二的政策可以採取，這個政策就是粉碎積極暗害份子，分化中立份子，吸引忠順份子。

在一兩年以前，情形會是如此。

可以說我們現在也有完全這樣的環境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我們這裏已形完全另外一種環境了。首先，我們已擊破城鄉資本主義份子，而且正在順利消滅他們。這當然不能使舊智識界歡喜。很有可能的，就是他們還對他們這些已被擊破的朋友們流着同情淚哩。可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動搖者，在他們這些積極活動的朋友們遭受很厲害的一蹶不振的失敗以後，竟甘願遭到與他們這些朋友同樣的命運，那就是決不會有的事情了。其次，我們已克服糧食困難，而且不僅已克服這些困難，並且還輸運大批糧食出口，其數量之多，是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所未會有的。於是，動搖份子所持的這一「論據」，也消失了。其次，現在連瞎子也看得見，我們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方面已經獲得極大成功，已經一定勝利了。於是舊智識界「武庫」中最主要的東西，就完全顛覆了。至於說到資產階級智識界對於武裝干涉的希望，那就要承認，這種希望竟是——至少是暫時——海市蜃樓。真

的，人們約許武裝干涉已經六年了，可是武裝干涉却一次也沒有敢於嘗試。現在已經應當承認，我們的明眼的資產階級智識界，不過是受騙上當而已。至於積極暗害份子在莫斯科著名公審案中的行為本身，本應當而且果然已葬送暗害思想，那更不必說了。

不言而喻的，所有這些新情況，不能不影響到我國舊技術智識界。新環境，本應當在舊技術智識界中造成一種新情緒，而且果然造成這種新情緒。恰巧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就有舊智識界那一部分從前同情過暗害份子的人，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一定徵象。現在不僅這一部分舊智識份子，而且連那些明顯的昨天的暗害份子，昨天的暗害份子中的頗大一部分人，也開始在許多工廠裏與工人階級協力工作——這件事實，就是明白說明在舊技術智識界中的轉向過程已經開始。這當然不是說在我們這裏已沒有暗害份子了。不是的，不是這樣說。暗害份子仍然還是有的，而且當我國還有階級時，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時，暗害份子在將來也還會有。但這是說，既然舊技術智識界中頗大一部分從前這樣或那樣同情過暗害份子的人，現在已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那末積極暗害份子就已剩下不多，已陷於孤立，而且會不得不暫時深深隱藏起來。

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我們對於舊技術智識界的政策，也應依此而改變。如果從前在暗害勾當猖獗盛行時期，我們對待舊技術智識界的態度，主要是表現於粉碎政策，那末現時在這個智識界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時期，我們對待它的態度，主要就應表現於吸收和關照它的政策了。如果在已經改變的新條件下還繼續實行舊政策，那就是荒謬而不合辯證法了。如果現在幾乎把每個舊專門家和舊工程師都看作尚未捕得的犯人和暗害份子，那就是愚蠢而不合理了。在我們這裏，「反專門家主義」，向來都被看作是而且現在仍然被看作是有害而可恥現象的。

總之，任務就是要改變對舊工程技術人材的態度，多多關注和關照他們，更大胆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關於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五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最後一個條件。

## (六) 論經濟核算制

爲使情形完全明白起見，我還要說到一個新條件。這就是關於供給工業用的，供給國民經濟用的資金積疊來源，關於怎樣加緊這積疊速度的問題。

就資金積疊方面看來，我國工業發展中的新的特殊的東西何在呢？就在於舊積疊來源已開始不足保證工業繼續發展了。就在於如果我們真正想要保持並加強波爾什維克的工業化速度，於是我們就須找得新積疊來源並加強舊積疊來源。

從資本主義各國歷史中就可知道，無論那一個想把自己的工業提到更高階段的新起國家，都會不免要有外國的幫助，即長期的信貸或借款。西方各國資本家有鑒於此，所以完全不肯給我國以絲毫信貸和借款，以爲我國工業化事業既然得不到信貸和借款，就一定會遭受失敗。可是，資本家們是失算了。他們沒有計算到我們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我們國家原來有一些特別積疊來源，足以恢復並繼續發展工業。而且真的，我們不僅恢復了工業，不僅恢復了農業和運輸業，而且我們已在順利進行改造我國重工業、農業及運輸業的壯舉。不言而喻的，我們在舉辦這件事情時，已花費幾百萬萬盧布。試問這幾百

萬萬盧布是從何處得來的呢？是從輕工業，從農業，從預算上的積疊等方面得來的。我們不久以前的情形，曾是如此。

現在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如果在從前，舊積疊來源會是足夠來改造工業和運輸業的，那末在現時，這些積疊來源，却已顯然不夠了。現在，問題不在於要改造舊工業。現在，問題是要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建立技術設備精良的新工業。現在，問題是要在蘇聯各穀物區、養畜區、原料區，成立大規模的新農業生產。現在，問題是要建築一批橫貫蘇聯東西兩部的新鐵路。不言而喻的，舊積疊來源是不足夠來供應這種壯舉的。

但這還不是一切。除此而外，還要注意以下一點：在我們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裏，因以非經濟態度處理事務之故，經濟核算原則，竟被破壞無餘。事實是如此：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早已不復從事於計算、估價以及製擬有根據的收支對照表。事實是如此：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早已忘掉「節省」、「減少無謂費用」、「生產合理化」等等概念了。顯然的，他們是指靠着國家銀行「是橫直會給我們撥發必需經費的」。事實是如此：近來在許多企業中，生產成本費已開始提高起來。他們按計劃規定，本來應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十以上的，而他們却反而把成本費提高。而什麼是減低成本費呢？我們知道：每一個減低成本費的百分數，是等於在工業內部多積疊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盧布。很明顯的，在這種條件下來提高成本費，就是使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喪失數萬萬盧布。

由這一切當中就得出結論：我們已不可專靠輕工業，專靠預算上的積疊，專靠由農業方面得到的收入了。輕工業是一個最豐富的積疊來源，而且它現在還有一切繼續發展的可能，可是這個積疊來源不是沒有止境的。農業也是同樣豐富的積疊來源，可是在目前農業改造時期，農業本身也需要國家資助。至於說到國家預算上的積疊，那末你們自己知道，這種積疊是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沒有止境的。還有什麼

呢？還有重工業。所以，必須設法使重工業——而首先就是機器製造業——也給予積疊。所以，除加強並擴展舊積疊來源而外，同時還須設法使重工業——而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給予積疊。

這就是出路所在。

而爲此就要怎樣辦呢？就要消滅浪費現象，盡量動用工業內部富源，在我們所有一切企業內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在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工業部門裏加強工業內部積疊。

這就是達到出路的途徑。

總之，任務就是要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業內部積疊。

## (七) 按新方法來工作，按新方法來領導

同志們，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就是如此。

這些新條件底意義，就在於他們爲工業創造新環境，而這個新環境就要求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領導方法。

總之：

(1) 由此可見，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指望勞動力自流性了。爲要以勞動力保證工業，就要有組織地招收勞動力，並使勞動手續機械化。如果以爲我們不必實行機械化，而能支持我們的建設速度和生產規模，那就是希望可以用匙子來吸盡海水了。

(2) 其次，由此可見，現在已不可再容忍工業中的勞動力流動性了。爲要免除這個禍害，就要按

新方式來規定工資，使企業裏的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

(3) 其次，由此可見，現在已不可再容忍生產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了。爲要免除這個禍害，就要按新方式來組織勞動，要這樣來佈置人力，務使每一班工人都對工作、對機器、對機架、對工作質量負責。

(4) 其次，由此可見，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專靠資產階級俄羅斯所遺留給我們的爲數極少的舊工程技術人材了。爲要提高現時的生產速度和生產規模，就要使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5) 其次，由此可見，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把所有一切舊專門家和舊工程技術人材都看成一邱之貉了。爲要顧及已經改變的環境，就要改變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而盡量關注那些顯然轉向工人階級方面來的專門家和工程技術人材。

(6) 最後，由此可見，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專靠舊有積累來源了。爲要保證工業繼續發展，就須動用新積累來源，消除浪費現象，施行經濟核算制，減低成本費並提高工業內部積累。

這就是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這些新條件，就要求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爲要實現新式領導，就須怎樣辦呢？

首先，爲此就要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瞭解新環境，具體研究那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並適應於新環境底要求來改造自己的工作。

其次，爲此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領導企業，不是「從空中」領導企業，而是具體和切實領導企業；就要他們不是根據一般空談，而是以嚴格求實態度來對待每一個問題；就要他們不是限於紙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辭藻和口號，而是諳通工作技術，熟悉工作詳情，熟悉「小事情」；因爲現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構成的。



其次，爲此就要把我們現有的龐大的聯合局（一個聯合局往往包括一兩百個企業）立刻分小，分成幾個聯合局。一個聯合局主席既然要兼顧一百個以至於一百個以上的工廠，當然無法真正知道這些工廠，其生產可能，其工作狀況。而他既然不知道工廠，他當然就不能領導這些工廠。所以，爲要使各聯合局主席有可能真正研究工廠情形和領導工廠，就須使他們卸脫那過多的工廠，就須把一個聯合局分成幾個聯合局，使聯合局與工廠接近。

其次，爲此就要我們各聯合局由集議管理制過渡到一長管理制。現在情形是這樣：在聯合局委員會裏，照例都有十個以至於十五個委員坐着，寫着公文，進行辯論。這樣的管理方法是不可繼續下去的，同志們。必須停止紙上的「領導」，而去進行真正的實事求是的波爾什維克的工作。讓一個主席和幾個副主席留下來主持聯合局吧。這會完全足夠管理聯合局。其他的委員，最好是派到下層去，派到工廠中去。這無論對於他們自己，無論對於事情本身，都會是有益得多的。

其次，爲此就要聯合局主席和副主席更時常巡視各工廠，更多花些時間留在那裏工作，更仔細認識工廠中的工作人員，不僅要教導當地工作人員，而且向他們學習。如果以爲現時可以坐在遠離工廠的管理處裏，從辦公室裏領導工廠，那就想錯了。爲要領導工廠，就須更時常與廠內工作人員接洽，與他們維持活潑聯繫。

最後，我要簡略說一說我們一九三一年的生產計劃。有些在我黨周圍踱來踱去的庸人硬說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實在的，是不能完成的。這好像謝德林小說中好說廢話的「聰明鯽魚」一樣。我們的生產計劃是否實在呢？是絕對實在的！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這至少是因爲我們具備一切爲完成此計劃所必要的條件。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這至少是因爲這個計劃底完成，現在完全是取決於我們自己，完全是取決於我們是否善於和是否願意利用我們所有的最豐富的可能性。如果不然，那爲什麼許多企業和工

業部門已經超過完成了原定計劃呢？如果以爲生產計劃是歸結爲一張數字表和工作任務一覽表，那就是愚蠢想法了。其實，生產計劃是千百萬入底活潑實際活動。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這就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這就是活的人，——這就是你我大家自己，我們從事勞動的意志，我們按新方法來工作的決心，我們執行計劃的決心。我們有這個決心麼？是的，有這種決心。於是，我們的生產計劃就是可以而且應當實現的。（鼓掌多時）。

## 關於波爾什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給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編輯部的信——

敬重的同志們！

我提出堅決抗議，來反對你們曾把斯魯茨基那篇標題為波爾什維克論在戰前遭受危機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黨的半托洛茨基主義的論文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三〇年第六期）上發表出來當作討論的文章。

斯魯茨基硬說：列寧（波爾什維克們）曾經視德國戰前社會民主黨內以及一般戰前社會民主黨內的中派主義危險，就是說曾經輕視那暗藏機會主義危險，曾經視那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危險。換言之，照斯魯茨基說來，列寧（波爾什維克們）沒有進行反對機會主義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因為輕視中派主義，這實際上就是拒絕進行反對機會主義的擴展的鬥爭。這樣說來，列寧在戰前時期還不會是真正的波爾什維克，而只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或甚至只是在這次大戰結束時，列寧才成為真正的波爾什維克。斯魯茨基在其論文中就是這樣談論的。而你們却不痛斥這個新出台的「歷史家」為誹謗家和偽造家？反而去和他進行討論，給他以講壇。我不能不提出抗議來反對你們曾把斯魯茨基論文在你們雜誌上發表出來當作討論的

文章，因為關於列寧底波爾什維主義問題，關於列寧是否作過反對變態機會主義——中派主義——的原則的不調和的鬥爭，列寧會是否真正波爾什維克的問題，是不可變為討論對象的。

你們在你們於十月二十日送給中央委員會的「編輯部聲明」內承認說：編輯部把斯魯茨基論文當作討論的文章發表出來，是一個錯誤。這當然很好，雖然編輯部底聲明是出現得很遲。可是你們在自己聲明中又犯了一個新錯誤，因為你們在聲明中宣稱：「編輯部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篇幅上來繼續研究有關於波爾什維克與戰前第二國際間相互關係的一切問題，這在政治上是很迫切而且必要的」。這就是說，你們又立意把人們拉來討論那些本是波爾什維主義定理的問題。這就是說，你們又立意把關於列寧底波爾什維主義問題，由定理變成尚須「繼續研究」的問題。為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大家都知道，列寧主義正是在進行反對各色機會主義的無情鬥爭中產生、長和強固起來的，這裏也包括反對西方中派主義（考茨基）以及反對我國中派主義（托洛茨基等等）的無情鬥爭。對於這一點，甚至連波爾什維主義底公開敵人也不能否認了。這是定理。而你們却把我們拉向後退，企圖把定理變為尚須「繼續研究」的問題。為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也許是因為不知道波爾什維主義歷史吧？也許是為着實行腐敗自由主義，想使斯魯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其他門徒不能說人家禁止他們說話吧？真是很奇怪的以犧牲波爾什維主義骨血利益為代價來實行的自由主義呵！

究竟編輯部認為在斯魯茨基論文裏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

(1) 斯魯茨基硬說：列寧（波爾什維克們）沒有進行那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者，與戰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絕緣分裂的路線。你們想進行討論來反對斯魯茨基這一托洛茨基主義提綱。但這裏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斯魯茨基簡直是誹謗列寧，誹謗波爾什維克，——這難道不很明白麼？誹謗是須加以痛斥，而不應把它變成討論對象的。

每個波爾什維克——如果他真正是波爾什維克——都知道：這在大戰很久以前，約從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起，當波爾什維克派在俄國已形成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初露頭角的時候，列寧就已進行着那與機會主義者絕緣分裂的路線——既在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這裏，又在第二國際——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那裏。每一個波爾什維克都知道：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還在當時（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們就已經給波爾什維克加上「分裂者」和「搗亂派」的頭銜。可是，既然社會民主黨左派自己在第二國際，首先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裏會是軟弱無力的集團，在組織上沒有形成的，在思想上沒有素養的，甚至害怕說出「絕緣」和「分裂」字眼的集團，——試問：列寧在當時究竟能有什麼辦法，波爾什維克究竟能有什麼辦法呢？決不可要求列寧，要求波爾什維克從俄國去替左派在西方黨內造成分裂哩。我還不說組織上和思想上的軟弱，不僅在戰前時期是社會民主黨左派底特點。大家知道，這個弱點，甚至是在戰後時期，也還在左派方面保存着。大家知道，在列寧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即在大戰開始兩年多以後——所寫的標題爲論尤尼烏斯底小冊子 \* 的著名論文中，對於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估計，在這裏，列寧曾批評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許多最嚴重錯誤而說道：『德國所有一切左派份子具有許多弱點，他們在各方面都被考茨基的虛偽態度、學究氣以及對機會主義者的「友愛態度」的下蟻蛛網所糾纏着；在這裏，他說道：「尤尼烏斯尚未完全擺脫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甚至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包圍」，這些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是害怕分裂的，是害怕澈底說出革命口號的。」』

當時在第二國際一切派別中間，俄國波爾什維克是這樣唯一的派別，這個派別按自己所有的組織經驗與思想素養，是能夠採取一種嚴重辦法來實行直接與自己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者絕緣分裂的。而如果

\* 尤尼烏斯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首領羅沙、盧森堡。

斯魯茨基輩竟企圖縱然不是證明，而只是假定列寧和俄國波爾什維克未曾利用其全部力量來實行與機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唐恩）分裂，來驅逐中派主義者（托洛茨基以及八月聯盟其他擁護者），——那末，關於列寧底波爾什維主義問題和波爾什維克們底波爾什維主義問題，也許尚有爭論的可能。可是，問題就在於斯魯茨基輩連提都不敢提到這種荒謬的假定。他們所以不敢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盡人皆知的事實，即俄國波爾什維克（在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二年間）實行那與各色機會主義者絕緣的堅決政策的事實，是大聲反對這種假定的。他們所以不敢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在第二天就會被釘在羞恥柱上的。

可是在這裏就有一個問題：如果俄國波爾什維克當時未曾進行那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絕緣分裂的路線，那他們能不能還在帝國主義大戰很久以前（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二年）就實現那與本國機會主義者及中派調和主義者的分裂呢？當時，俄國波爾什維克認為自己對於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的政策是西方左派所應仿效的政策模範，——關於這一點，誰能懷疑呢？當時，俄國波爾什維克竭力推動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包括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在內——去實行與他們各本國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絕緣分裂，——關於這一點，誰能懷疑呢？如果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竟未成熟到效法俄國波爾什維克的地步，那就怪不得列寧和俄國波爾什維克了。

（2）斯魯茨基責備列寧和波爾什維克，說他們沒有堅決和逕直贊助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而只是在嚴重的附帶條件下贊助過左派，又說派別組織的成見會妨礙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去徹底贊助左派。你們想進行討論來反對這種騙人的完全捏造的責難。但這裏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斯魯茨基在這裏玩弄手腕，想以提出來反對列寧和波爾什維克的捏造責難，來掩飾德國左派立場中的真正過失，——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既然往往在波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間動搖不定，那末波爾什維

克除非有嚴重附帶條件，除非嚴格批評他們的錯誤，就不能贊助他們，否則便是背叛工人階級及其革命，——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騙人手腕是須加以痛斥，而不應將其變成討論對象的。

是的，波爾什維克只是在一定嚴重附帶條件下才贊助過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時又批評他們的半孟什維主義的錯誤。可是因此就須歡迎波爾什維克，而不應加以責難。

有人懷疑這一點麼？

讓我們來看看最顯著的歷史事實吧。

(甲)一九〇三年關於黨員資格問題，在俄國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暴露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當時，波爾什維克想以自己關於黨員資格的定義，來造成一個組織上的屏障，以制止非無產者份子湧進黨內來的現象。因為當時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所以非無產者份子湧進黨內來的危險在當時是非常實在的。俄國孟什維克堅持了相反的立場，他們主張給非無產者份子大開入黨之門。因為俄國革命各問題對於世界革命運動有重要意義，於是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就決定來干預此事。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巴烏斯和羅沙、盧森堡，即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當時的首領，也來干預此事。而結果怎樣呢？他們兩個人都發表意見來反對波爾什維克。而且責備波爾什維克有過分集中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趨勢。後來，孟什維克就拚命利用這種卑污的市儈的誣蔑語句，並將其散佈於全世界。

(乙)一九〇五年，關於俄國革命性質問題，在俄國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開展了意見分歧。波爾什維克堅持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思想。波爾什維克斷言：必須力謀成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便在保證貧農贊助下，立刻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俄國孟什維克則排斥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寧願採取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政策而排斥工農聯盟政策，把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宣佈為是與資產階級革命發展相矛盾的反動布朗基主義方案。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巴烏斯和羅沙、

盧森堡會怎樣對待這種爭論呢？他們杜撰出一個空想的半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對於馬克思革命方案的畸形曲解），這個方案是徹頭徹尾都被孟什維克否認工農聯盟政策的精神所貫注的；他們把這個方案拿來對抗波爾什維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方案。後來，托洛茨基（馬爾托夫也曾部分地）就拚命利用這個半孟什維主義的不斷革命方案，並將其變為反對列寧主義的武器。

（丙）在大戰前夜時期，在第二國際各國黨裏面，曾有一個問題出現而成爲最迫切問題之一，這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關於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問題，關於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問題，關於反帝國爭道路問題，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道路問題。波爾什維克爲着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和圍攻帝國主義起見，提出了根據民族自決原則來援助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政策，發揮了使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革命解放運動結成一戰線的方案。於是，各國機會主義者，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立刻就發動起來反對波爾什維克。他們把波爾什維克當作瘋狗來攻擊。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在當時採取了什麼立場呢？他們發揮了半孟什維主義的帝國主義論，排斥了馬克思主義見解的民族自決原則（直到分立和組織獨立國家爲止），否認了關於殖民地和被壓迫國解放運動具有嚴重革命意義的提綱，否認了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統一戰線可能的提綱，並把這整個完全輕視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半孟什維主義糊塗思想拿來對抗波爾什維克底馬克思主義方案。大家知道，後來托洛茨基就拚命利用這半孟什維克糊塗思想並利用它爲反對列寧主義的鬥爭武器。

這就是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那些盡人皆知的錯誤。

我還不说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其他各種曾被列寧在其相當論文中嚴厲批評的錯誤。

同樣，我還不说他們在估計波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時期政策時所犯的錯誤。

從戰前歷史中引來的德國左派這些錯誤，難道不正是說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雖然有其左派性，可



是還沒有擺脫孟什維克行囊麼？

當然，德國左派不僅有其嚴重的錯誤。他們也有其巨大的嚴重的革命事業。我所指的，就是他們在內政問題上，例如在選舉鬥爭問題上，在國會鬥爭和國會以外鬥爭問題上，在總罷工問題上，在戰爭問題上，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問題上等，都有許多功績和革命言行。正因為如此，波爾什維克才把他們當作左派看待，贊助他們，推動他們前進。可是，這並不推翻，而也不能推翻下面這件事實：就是德國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同時還有許多最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他們未曾擺脫孟什維克貨色，因此就需需要波爾什維克給他們以極嚴重的批評。

現在請你們自己評判一下：列寧和波爾什維克，既然不肯背叛工人階級利益，既然不肯背叛革命利益，既然不肯背叛共產主義，那末他們會能不帶着嚴重附帶條件，不嚴格批評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錯誤，而就去加以贊助麼？

斯魯茨基用他（如果他是波爾什維克）所應當歡迎列寧和波爾什維克的地方來非難列寧和波爾什維克，這樣他就徹底揭破自己是半孟什維克，是暗藏的托洛茨基份子，——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斯魯茨基竟假定說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在估計西方左派時是以自己的派別組織成見為出發點的，這就是說，俄國波爾什維克會為着自己的派別組織利益而犧牲國際革命底偉大事業。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假定是卑劣下賤到極點的。這種假定所以卑劣到極點，是因為甚至孟什維克中間那些露骨的卑劣份子也開始瞭解：俄國革命不是俄國人底私事，恰巧相反，它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底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這種假定所以以下賤到極點，是因為甚至第二國際中間那些以造謠中傷為職業者也開始瞭解：波爾什維克始終一貫的徹底革命的國際主義是昭示於世界各國工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模範。

是的，俄國波爾什維克會把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提到第一位，如政黨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對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的態度問題，工農聯盟問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國會的鬥爭和國會以外的鬥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帝國主義問題，民族自決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問題，援助這個運動的政策問題等等。他們曾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作為檢驗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堅定性的試金石。他們曾有權利來這樣做麼？是的，曾有權利來這樣做。不僅曾有權利來這樣做，而且曾有義務來這樣做。他們所以曾有義務來這樣做，是因為所有這些問題，同時就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而波爾什維克正是以世界革命任務為其政策和策略準則的。波爾什維克所以曾有義務來這樣做，是因為只有根據這些問題才可以真正檢驗第二國際各派別底革命性。試問這裏究竟有什麼俄國波爾什維克底「派別組織行為」呢，試問這究竟與「派別組織」成見有何相干呢？

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就在他所著做什麼？這本小冊子上寫道：「歷史現在向我們提出了最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其他那一國無產階級底一切最近的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打破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而且也是打破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自從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出版以來，已經有三十年了。誰也不敢否認，這一時期中的事變已燦爛證實列寧這一段話。可是，難道從這裏不是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樞紐麼，不是得出結論說俄國革命底根本問題同時也曾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根本問題麼？

只有根據這種根本問題才可真正檢驗西方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底革命性，——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誰把這些問題看作「派別組織」問題，誰就是澈底揭破自己是卑鄙小人和蜕化變節份子，——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3) 斯魯茨基硬說：現在還沒有找到足數正式文件來證明列寧（波爾什維克們）作過堅決不調和的

反對中派主義的鬥爭。他把這個官僚主義提綱用作無可反駁的論據來證明他那個議論，說可見列寧（波爾什維克們）曾經視第二國際裏的中派主義危險。你們着手討論來反對這種荒謬議論，反對這種騙人把戲。但這裏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討論呢？斯魯茨基是極力用關於文件的廢話來掩飾其貧乏的假冒的所謂立場，——這難道不是本來就很明白麼？

斯魯茨基認為現有的黨文件是不足夠的。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難道盡人皆知的關於第二國際以及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內部鬥爭的文件，還不足以十分明確表明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在其反對機會主義者和反對中派主義者鬥爭中的革命的不調和性麼？斯魯茨基一般是否看見過這些文件呢？他還需要什麼文件呢？

假定除了已經有名的文件而外，又將找到一大堆其他的文件，譬如波爾什維克再三說明必須消滅中派主義的決議。這不是說，只要有一些紙上文件，就足以表明波爾什維克會以真正革命精神和真正不調和態度對待中派主義呢？除那些無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而外，還有誰能只靠紙上文件呢？除那些檔庫老鼠而外，還有誰不懂得爲要審查黨和首領，首先就須根據他們的行動，而不只是根據他們的宣言呢？歷史上有過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會樂意簽署任何革命決議，以便搪塞那些討厭的批評者。但這還不是說他們會實行這些決議。再則，歷史上還有過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會說得口中流涎來要求其他各國工人黨採取最革命的行動。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在自己本黨內或自己本國內沒有屈服於自己的機會主義者和自己的資產階級。豈不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教導我們說，在審查革命黨、派別、首領時，不要根據他們的宣言和決議，而要根據他們的行動來審查麼？

如果斯魯茨基真想審查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在其對中派主義態度中的不調和性，那末他就不應以個別文件和兩三封私信爲其論文基礎，而是要根據波爾什維克底事業，根據波爾什維克底歷史，根據波爾什維克

底行動來審查波爾什維克爲其論文基礎，——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難道在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裏未曾有過機會主義者，中派主義者麼？難道波爾什維克未曾進行堅決不調和的鬥爭來反對所有這些派別麼？難道這些派別不是無論在思想上或組織上都曾與西方機會主義者及中派主義者聯繫着麼？難道波爾什維克不是如世界上任何一個左派集團都未曾作過的那樣擊潰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麼？既然有這一切，那怎麼可以說列寧和波爾什維克會輕視中派主義危險呢？爲什麼斯魯茨基竟忽視了這些對於估計波爾什維克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呢？爲什麼他沒有運用最可靠的方法，即根據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底事業和行動來審查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呢？爲什麼他寧願採用較不可靠的方法，即在偶然拾得的紙堆中翻來翻去呢？

就是因爲如果採用較更可靠的方法，即根據波爾什維克底行動來審查波爾什維克，那就會馬上根本推翻斯魯茨基底整個立場。

就是因爲如果根據波爾什維克底行動來審查波爾什維克，那就會表明波爾什維克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組織，這個組織澈底擊破了機會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並把他們逐出黨外了。

就是因爲如果以波爾什維克底實在事業和實在歷史爲根據，那就會表明斯魯茨基底老師——托洛茨基份子——曾是在俄國培植了中派主義，並爲此而建立了一個專門組織——八月聯盟——作爲中派主義策源地的主要的基本的集團。

就是因爲如果根據波爾什維克底事業來審查波爾什維克，那就會完全揭破斯魯茨基是偽造我黨歷史者，這偽造者企圖用誣說列寧和波爾什維克輕視中派主義危險的誹謗方法，來掩飾戰前托洛茨基主義底中派主義。

編輯同志們！關於斯魯茨基及其論文，就是如此。

你們由此可見，編輯部既容許和這偽造我黨歷史者進行討論，就犯了錯誤。

什麼東西竟能推動編輯部走上這條不正確道路呢？我認爲，推動編輯部走上這條道路的，是腐敗的自由主義，而這種腐敗的自由主義，現時在一部分波爾什維克中間，是有幾許流行的。有些波爾什維克認爲：托洛茨基主義是共產主義內的派別，這個派別固然是犯了錯誤的，做了不少愚蠢事情的，有時候甚至反蘇維埃的，但總還是共產主義內的派別。於是就對托洛茨基份子以及那些按托洛茨基主義思想者抱定一些自由主義態度。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看待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其實，托洛茨基主義早已不復是共產主義內的派別了。其實，托洛茨基主義是那進行着反共產主義、反蘇維埃政權、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鬥爭的革命資產階級底前鋒部隊。

是誰給了革命資產階級以反對波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武器，如說在我國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提綱，如說波爾什維克必然蜕化的提綱等等呢？這武器是托洛茨基主義給它的。下面這件事實不是偶然的：蘇聯境內所有一切反蘇維埃集團在企圖論證必然要進行反蘇維埃政權鬥爭時，總是援引托洛茨基主義說在我國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說蘇維埃政權必然蜕化，說資本主義一定會恢復的著名提綱。

是誰給了蘇聯境內革命資產階級以策略武器，如企圖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發動呢？這個武器是曾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試圖在莫斯科和列寧格舉行反蘇維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份子給它的。事實是如此：托洛茨基份子底反蘇維埃發動，鼓舞了資產階級底精神，放縱了資產階級專門家庭暗害工作。

是誰給了革命資產階級以組織武器，如企圖設立秘密反蘇維埃組織呢？這武器是組織了自己所有的反波爾什維克的非法集團的托洛茨基份子給它的。事實是如此：托洛茨基份子底秘密反蘇維埃工作，是便利了蘇聯境內各個反蘇維埃集團在組織上的形成的。

托洛茨基主義是革命資產階級底前鋒部隊。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對托洛茨基主義——那怕是已被擊潰的，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採取自由

主義態度，就是魯莽昏聩到極點，幾乎等於犯罪，幾乎等於叛變工人階級。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某些「著作家」和「歷史家」想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義廢物私販到我們文壇上來的企圖，就應當受到波爾什維克方面堅決的回擊。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可容許去和托洛茨基主義私販者進行文字討論。

我覺得，托洛茨基主義私販者們中的「歷史家」和「著作家」暫且是企圖在兩方面進行其走私勾當的。

第一，他們力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會輕視中派主義危險，於是就讓那些幼稚讀者去妄加推測，以為那末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革命家，而只有在大戰以後，在托洛茨基幫助下「改換武裝」以後，他才成為真正的革命家。斯魯茨基就可算是這類私販者底標本代表。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斯魯茨基及其同流，是不值得我們與之長久周旋的。

第二，他們力圖證明列寧在戰前時期沒有瞭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於是就讓那些幼稚讀者去妄加推測，以為那末列寧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波爾什維克，而只有在大戰以後，在托洛茨基幫助下「改換武裝」以後，他才瞭解這種轉變必然性。聯共（波）黨史教本作者瓦洛色維奇可算是這類私販者底標本代表。固然，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寫道：「我們將立刻從民主革命開始過渡，——而恰巧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為標準，依照有覺悟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為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固然，這類事實和文件是可以在列寧著作中找到很多很多的。可是，難道瓦洛色維奇肯顧到列寧生平事蹟中的事實麼？瓦洛色維奇輩所以著作文章，是爲了要塗着波爾什維克色彩來偷運其反列寧主義的私貨，誹謗波爾什維克和偽造波爾什維克黨歷史。

你們由此可見：瓦洛色維奇輩和斯魯茨基輩是一丘之貉。

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私販者底「道路和歧途」。

你們自己知道：把討論壇供給這類「歷史家」以便利其走私勾當，這並不是編輯部所應作的事情。

據我看來，編輯部底任務，是要把波爾什維主義歷史問題提到應有的高度，把我黨歷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學的波爾什維主義的軌道上，加強注意力去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以及其他一切的偽造我黨歷史者，有系統地揭破他們的假面具。

這一點之所以更其必要，是因為甚至於有些我們的歷史家——我所指的，是沒有加上括弧的歷史家，我們黨底波爾什維克歷史家，——也犯有一些替斯魯茨基輩和瓦洛色維奇輩助長聲勢的錯誤。可惜，這裏就連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也不是例外，在他所著的聯共（波）黨史教科書上，雖然有其優點，但也包含有許多原則性的歷史性的錯誤。

此致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此信曾於一九三一年在無產階級革命

雜誌第六期（第一—三期）上發表）

## 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

——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波)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報告——

### (一) 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

同志們！當五年計劃出現的時候，人們未必預料到五年計劃能有巨大的國際意義。反之，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五年計劃是蘇聯私自的事情，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總是蘇聯私自的一國的事情。

可是，歷史已經表明了：五年計劃是有無限國際意義的。歷史已經表明了：五年計劃不是蘇聯私自的事情，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底事情。

還在五年計劃尚未出現很久以前，當我們還在結束着我們反對武裝干涉者的鬥爭而開始實行過渡到經濟建設軌道的時候，列寧就已說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深刻國際意義的；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道路上每一步的進展，都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極不相同的階層中遇到深刻的回聲，並把人們分成兩個營壘——一個是擁護無產階級革命者營壘，而另一個則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者營壘。

列寧在當時說道：

「目前，我們主要是用自己的經濟政策來影響國際革命的。所有一切人們都注視着蘇維埃俄羅



斯共和國，的確是全世界各國所有一切勞動者，沒有任何例外，這絲毫也不是過甚其詞。這一層已經達到了。在這方面的鬥爭具有全世界規模的性質。我們一解決這個任務——那時我們就一定和最終在國際範圍內得到勝利。因此，經濟建設問題對於我們是有完全非常重大意義的。在這個戰線上，我們應當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不可急速——，但是一往直前地向上生長，向前進展，以取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一〇至四一一頁）。

這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內說的，當時我們還在結束着反對武裝干涉者的戰爭，當時我們還在開始實行由反對資本主義的軍事鬥爭過渡到經濟戰線上的鬥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

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許多年了，而蘇維埃政權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每一步驟，每一年，每一季，都燦爛證實列寧同志這些話底正確性。

可是，對於列寧這些話正確性的最燦爛的證實，却莫如我們的五年建設計劃，莫如這個計劃底產生，這計劃底發展，這計劃底實現。的確，大概是在我國經濟建設道路上，無論那一個步驟，都沒有像五年計劃及其發展和實現問題這樣在歐美亞三大洲資本主義國家各種極不同的階層中，遇到這樣的回聲了。

最初，五年計劃曾是遇到資產階級及其報章方面的嘲笑的。「空想」、「夢囈」、「烏托邦」——這就是他們當時給予我們五年計劃的稱呼。後來，當已開始看見五年計劃實現過程產生實在結果時，他們就大敲警鐘，硬說五年計劃會危及資本主義各國底生存，硬說五年計劃底實現將使歐洲市場充滿商品，將使傾銷政策加強，將使失業現象加深。後來，當這種運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把戲也沒有給出預期結果時，於是就有各種公司、報館、各種社團等等各種各樣的代表，接踵遊歷蘇聯，想親眼看看在蘇聯到底幹些什麼事。我在這裏不說工人代表團，而這些工人代表團，自五年計劃最初出現時起，就已表示其欽佩蘇維埃政權底創舉和成功的誠意，就已表現其擁護蘇聯工人階級的決心了。

自此時起，所謂輿論界、資產階級出版界、各種資產階級社團以及其他等等，就開始發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說五年計劃已遭完全破產，說波爾什維克已瀕於滅亡。反之，另外有些人則說：波爾什維克雖然是些壞人，但其五年計劃尙能成事，他們大概會達到自己的目的。

說到這裏，我也許不妨引證引證資產階級各種機關報底評論。

例如，我們就拿美國紐約時報來說吧。該報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寫道：

「五年工業計劃抱定要打破任何比例觀念的目的，並爲力求達此目的而『不管代價如何』，如莫斯科往往傲然自誇那樣，而其實這並不是什麼計劃。這不過是一種投機把戲而已。」

這樣說來，五年計劃甚至於不是計劃，而是一種空洞投機把戲。又如英國資產階級報紙每日電訊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評論道：

「如果把五年計劃看作實行『計劃經濟』的嘗試，那末我們就應當說它已完全失敗了。」

紐約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集體化事業已遭可恥失敗。它已使俄羅斯瀕於饑荒了」。

波蘭資產階級報紙波蘭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評論道：

「實際情形表明：蘇維埃政府及其農村集體化政策，似已陷入絕境」。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財政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斯大林及其黨，因實行其政策的結果，已處在五年計劃體系破產以及他所應實現一切任務概遭失敗的面前」。

意大利雜誌政治評論道：

「如果認爲一萬六千萬人民四年以來的工作，波爾什維克制度這樣一個強大制度四年以來在經濟

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非凡努力沒有作出一點東西來，那就荒謬了。反之，他們已作出許多東西：。可是，奇災大禍畢竟已在眼前，它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是朋友和仇敵，波爾什維克和反波爾什維克，左傾反對派和右傾反對派，都已確信的」。

最後，美國資產階級雜誌現代史評論道：

「所以，當吾人考察俄羅斯目前狀況以後，就應得出結論如下：五年計劃無論在其所標榜的目的方面，或尤其厲害是在其基本社會原則方面，都已遭失敗」。

一部分資產階級報紙底評論，就是如此。

對於這些評論的作者，未必值得加以批評吧。我想是不值得的。其所以不值得，是因為這些「硬頭」人物是與中古時代掘出的頑石一類的東西，在他們看來，事實是沒有意義的，無論我們這裏怎樣實現五年計劃，他們也橫直要固執己見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那些同是由這個資產階級營壘裏來的其他機關報上的評論。

法國著名資產階級報紙時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評論道：

「蘇聯既然不藉外資幫助而實行工業化，這就是說它已經贏得第一局」。

這個時報在一九三二年夏季又評論道：

「共產主義以極快速度來完成其改造事業，而資本主義制度却只能緩步前進：。在法國，因為地產毫無止境地分散於小私有者間的，農業機械化是無法實行的；而蘇維埃却使農業工業化，於是就已解決這個任務：。波爾什維克在和我們比賽中，竟已成爲勝利者」。

英國資產階級雜誌圓桌評論道：

「五年計劃底成績是一種驚人現象。哈爾科夫和斯大林格兩地的拖拉機工廠，莫斯科阿摩

汽車工廠，下新城汽車工廠，德涅泊爾水電站，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和庫茲涅茨克兩地的巨大鋼鐵廠，烏拉爾許多機器製造廠和化學廠——烏拉爾日益變成蘇聯的魯爾——所有這一切成績以及全國其他各種工業成績，都是證明：蘇聯工業，無論有何種困難，都已像灌溉優良的植物一樣，日益增長，日益強健……五年計劃已為蘇聯將來發展奠定基礎，非常加強了蘇聯底勢力」。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財政時報評論道：

「在機器製造業所達到的成績，是不容有任何懷疑的。他們在報章和演說中稱贊這些成績，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不要忘記，從前俄羅斯所生產的，只是極簡單的機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機器和工具輸入額絕對數目，也還在增加；可是進口機器與蘇聯本國所製機器數目比較起來，却不斷減少。現在，蘇聯製造着一切為本國冶金工業和電氣工業所必要的裝置品。它已經造成自己本國的汽車工業。它已經創立生產所有一切工具和儀器的工業，由很準確的最小儀器起，一直到最笨重的壓榨機為止。至於農業機器，則蘇聯已經不依賴於國外輸入了。同時蘇聯政府設法使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事業不致因煤鐵出產遲誤而受到阻礙。毫無疑義的，新建築的巨型工廠是能保證重工業產品大量增加的」。

英國資產階級報紙新自由報在一九三二年初評論道：

「波爾什維主義是可以咒罵的，可是必須知道它。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龐然大物，必須加以注意，至少是從經濟方面着想而必須加以注意」。

英國資本家基勃遜、札爾維——「領地聯合銀行」總經理——在一九三二年十月評論道：

「我要聲明，我並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波爾什維克，我始終是一個資本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俄羅斯現在向前進展着，而在我們這裏，則大批大批工廠停閉，約有三百萬失業者完全無法找

到工作。人們曾經嘲笑五年計劃並預言它必遭失敗。可是你們可不必懷疑，在五年計劃條件下所達到的實際結果，已超過原來的規定。在我所遊歷過的一切工業城市中，都有新區域出現，這些新區域，按照一定計劃築成，在這裏有用樹木和花園所點綴的寬廣街道，有最新式的樓房，有學校，有醫院，有工人俱樂部，當然免不了還有許多替女工照顧孩子的托兒所和兒童院。切勿輕視俄羅斯計劃，切勿錯誤設想，以為蘇聯政府會遭受失敗。今日的俄羅斯是一個精神煥發，理想深遠的國家。俄羅斯是積極性非常濃厚的國家。我相信俄羅斯所抱定的志向是健全的。也許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俄羅斯全體青年和全體工人都具有一件東西，而這件事，可惜現時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感覺缺乏，——這件東西，就是希望」。

美國資產階級雜誌民族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評論道：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帶來的，已經是真正卓越的成績。蘇聯以戰時強度來從事於創造新生活基礎的建設任務。國家面貌簡直改變到不可認識的地步。莫斯科就是如此，它已煥然一新，有成百數的新敷柏油的街道、新設立的美麗花園、新落成的樓房，有新建設的城郊，有林立於城邊的新工廠。而且其他較小城市，亦復如此。即在荒原沙漠地帶，亦有許多新城市出現，並且不是幾個城市，而至少當在五十以上，其中居民約由五萬至二十五萬不等。所有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來產生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或幾個新建工廠，開發天然富源，製造各種產品。幾百個新區電站以及許多如德涅泊爾電站一類的偉大電站，使列寧公式——「社會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電氣化」，逐漸見諸實現。蘇聯已設立無數種新的生產部門，大批出產許多為舊俄所從未出產的物品：拖拉機、康拜因機、上等鋼、人造橡皮、珠球滑輪、巨大發動機、具有五萬匹瓦特發電能力的渦輪機、電話裝置品、供鑛業用的電力機、飛機、汽車、腳踏車以及幾百種新機器等等。在俄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開採

鋁、鎂、燐灰石、磷、鉀以及其他許多貴重物品。蘇聯平原底指路標，已經不是十字架和教堂圓頂，而是積穀倉與穀草塔。在集體農莊裏，建築着房屋、牲畜棚、豬棚。電氣已浸入農村，無線電和報紙已普及農村。工人正在學習使用最新機器。青年農人在生產着並使用着最新式農業機器，而這種機器是比美國任何時候所見過的都更巨大更複雜的。俄羅斯已經開始「用機器來思想」了。俄羅斯正在迅速由木器時代進到鋼、鐵、三合土、摩托時代」。

英國「左派」改良主義雜誌前進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評論道：

「在蘇聯進行的偉大建設工作，是惹人注目的。新工廠、新學校、新電影院、新俱樂部、新巨大樓房，——到處皆是新建築物。其中許多工程已經落成，而其他工程則尚在建築中。要把最近兩年來已經完成的工作和繼續進行的工作，向英國讀者一一敘述出來，那是很困難的。爲要相信這一切，就得親眼去看。吾人在戰時所達到的成績，若與蘇聯現時建設工程相比，那就不足掛齒了。美國人承認：即在美國西部各州最興奮的創造時期，也絲毫未嘗有像蘇聯目前這樣熱烈創造努力的地方。蘇聯最近兩年來的變化既然這樣多，那末再經過十年工夫，其進展之偉大，自難設想了。請你們拋棄那些頑固而盲目造謠誹謗蘇聯的英國報紙所敘說的那些可怕的神話吧！請你們拋棄那些淺見智識份子所散佈的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吧！這些智識份子是完全不知道蘇聯實在情形的，却以中產階級眼光來小視蘇聯，以至于散佈這樣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蘇聯是根據健全原則而建設着新社會的。爲要實現這個目的，就須不怕危險，就須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熱忱和毅力來工作，就須爲克服極大的困難而奮鬥，而這種困難，當力謀在與其餘世界隔絕的廣大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時，是無法避免的。可是，我在兩年內第二次遊歷蘇聯以後，我却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就是蘇聯是在着實前進着，努力計劃着，努力創造和努力建設着，而且規模如此宏偉，好像是向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發

出的明顯的比賽書一樣哩』。

這就是在資產階級營壘裏面發生的意見分歧和分裂，其中有些集團是主張消滅蘇聯及其照他們說來已經失敗的五年計劃的，而另外一些集團，却大概是主張與蘇聯實行商業合作，大概是希望由五年計劃成績當中取得一些利益。

至于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對於五年計劃問題，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問題的態度，却是一個要特別講的問題。每年都有許多外國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我們在這裏只要引證比利時工人代表團底評論做例就夠了。比利時工人代表團在遊歷蘇聯以後，與任何那一國的工人代表團——無論是英國代表團或法國代表團，德國代表團或美國代表團，或其他各國代表團——一樣，曾發表以下的評論：

「我們在旅行時所看見的偉大建設，使我們不勝欽佩。在所有一切城市裏，無論是莫斯科或馬開葉夫克，或高爾洛夫克，或哈爾科夫以及列寧格勒，到處都是以最大熱忱進行着工作。所有一切機器都是最新式的。在工廠裏設備清潔，空氣新鮮，光線明亮。我們親眼看見在蘇聯怎樣給工人以醫藥衛生幫助。工人住宅是建築在工廠附近的。在工人住區裏，設立有學校與托兒所，極仔細地照料兒童。我們看見，新工廠和新住宅是與舊工廠及舊住宅迥然不同的。我們所看見的一切，使我們知道：由其產黨領導來建設新社會的勞動者是有如何偉大的力量。我們在蘇聯看見文化程度澎湃高漲，而同時在其他國家裏，在各方面都是滿目低落，大批工人失業。我們親眼看見蘇聯勞動者在其前進道路上遇到怎樣可怕的困難。我們因此更加瞭解他們以其勝利指明給我們看時所表現的那種自豪感。我們深信：他們是一定能夠克服一切障礙的。」

請看吧，這就是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只須我們在什麼兩三年內進行建設工作，只須顯示五年計劃第一批成功，就已經使全世界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裏的人是向我們狂吹不倦的，而另一個營壘裏的

人却目視五年計劃成功而感覺驚異；更不必說，在全世界上有我們自己的營壘，而且這個營壘日益加強起來，——這就是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營壘，他們因蘇聯工人階級成功而感覺歡樂，決意給蘇聯工人階級以幫助，而使全世界資產階級胆戰心驚。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五年計劃底國際意義，五年計劃各種成功和成績底國際意義，是不容懷疑的。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各國是懷妊着無產階級革命的，而正因為它們懷妊着無產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本來是想在五年計劃失敗中吸取反對革命的新論據的，反之，無產階級則努力於在五年計劃勝利中吸取，而且實際上已經在吸取擁護革命而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新論據。

五年計劃底成功，動員世界各國工人階級革命力量去反對資本主義，——這就是不容置辯的事實。五年計劃底國際革命意義真是不可計量的，——關於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更加注意五年計劃，這計劃底內容及其基本任務問題。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更加仔細分析五年計劃底總結，五年計劃執行和實現底總結。

## (二)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和實現這任務的道路

我們現在就來說五年計劃問題本身。

什麼是五年計劃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何在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在於要把我們這個具着落後技術，具着往往是中世紀技術的國家，移到新技術，現代技術軌道上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在於要把我們蘇聯由依賴於資本主義各國意旨的貧弱農業國家，變為完全獨立而不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意旨的富強工業國家。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在於要把蘇聯變為工業國家時，澈底排除資本主義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戰線，並造成經濟基礎來在蘇聯消滅階級，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在於要在我國創立這樣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不僅重新武裝和改造整個工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運輸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農業。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在於要把散漫細小個體農業，移到巨大集體農業軌道上，即此而保證社會主義在鄉村中的經濟基礎，並這樣來消滅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可能性。

最後，五年計劃底任務，就在於要在國內造成一切必要的技術的經濟的前提來最大限度提高國防能力，以便有可能決然打退所有一切種種外來的武裝干涉企圖，決然打退所有一切種種外來的武裝侵犯企圖。

五年計劃這個基本任務是由什麼所決定呢，這個基本任務是以什麼為根據呢？

其根據就是因為必須把蘇聯所有技術經濟落後情況消滅，而這種落後情況，是使蘇聯難得生存的；就是因為必須在我國創立這樣一種前提，這種前提是使我國能夠在技術經濟方面，不僅趕上，而且經過相當時候能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

其根據就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決不能在落後工業基礎上長久維持下去，因為只有那不僅不遜於，而且過些時候能夠勝過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的現代大工業，才能成為蘇維埃政權真正的可靠的基礎。

其根據就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決不能在兩個對立的經濟基礎上長久維持下去，決不能既以消滅資本主義份子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為基礎，而同時又以產生資本主義份子的細小個體農業為基礎。

其根據就是因為在未給農業奠定大生產基礎時，在未把細小農戶聯合成爲巨大集體農莊時，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乃是一切可能危險中最實在的危險。

列寧曾說：

「革命已做到這一步，就是在幾個月以內，俄羅斯按其政治制度說來已趕上先進國家了。可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鉄面無情的，它以毫不容情的嚴厲態度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來猛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一頁）。

列寧曾說：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這是必須記着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和將它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者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除資本主義底根蒂，我們還沒有打破國內敵人底基礎和根基。國內敵人是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的，爲要打破它的基礎，就只有一個方法——這就是把全國經濟，連農業也包括在內，轉移到新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的大生產技術基礎上。只有當國家已電氣化時，當我們已給工業、農業以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的大工業技術基礎時，——只有那時，我們才獲得最終勝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至四七頁）。

黨在規定五年計劃和決定五年計劃基本任務時所持的理由，就是以這些原理爲基礎的。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如此。

可是，爲要實行這種偉大計劃，是不可茫無頭緒而隨便動手的。爲要實行這種計劃，首先就要找到計劃底基本環節，因爲只有找到並抓住這個基本環節以後，才可把這計劃其他一切環節拖出來。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何在呢？

五年計劃底基本環節，就在於重工業及其核心——機器製造業。因爲只有重工業才能既改造並推進整個工業，又改造並推進運輸業，又改造並推進農業。因此也就會須從重工業來着手實行五年計劃。所以，就會須以恢復重工業作爲實現五年計劃的基礎。

關於這點，我們也有列寧指示：

「爲要挽救俄國，就不僅要農民經濟有良好收成，——這還不夠，——也不僅要那替農民供給消費品的輕工業有良好情況，——這也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根本不能繼續維持我們爲獨立國家的地位。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金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金，那我們就會不能繼續維持我們爲文明國家的地位，——更不必說繼續維持我們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地位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可是，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像在五年計劃開始時的我們國家這樣一個落後的不富裕的國家裏，乃是最困難的事情，因爲大家知道，重工業是要有大批財政費用和某種最低限度數目的有經驗的技術人材的，沒有這兩種條件，一般說來就不能恢復重工業。黨會知道這一點並估量到這一點麼？是的，曾知道這一點。而且不僅知道，並且還曾當衆宣佈這一點。黨會知道在英德美等國重工業是怎樣建成的。它曾知道：在這些國家裏，重工業所以能建成，或是因爲得到大批債款，或是因爲掠奪其他國家，或是因爲同時採用這兩種手段。黨會知道：所有這兩種手段都是我們國家所不可採用的。那末，它當時所指望的，

究竟是什麼呢？它所指望的，是我國本身力量。它會指望，我們既然有蘇維埃政權，並依據於土地國有、工業國有、運輸業國有、銀行國有、商業國有，我們就能夠實行極嚴格的節省辦法，以便積蓄為恢復和發展重工業所必要的資金。黨會爽直說：這件事情要求重大犧牲，而我們想要達到目的，就應當公開和自覺地去承受這種犧牲。黨會指望用我國內部力量來實現這個任務，而不用外來苛刻信貸和借款。

請看列寧會如何說明這個問題吧：

「我們應當努力來建成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工人能夠保持其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自己的信任，並以極大節省辦法來從自己社會關係中驅除任何浪費現象底任何遺跡。

我們應當把我們國家機關節省到最高限度。我們應當從這機關中驅除一切浪費現象底遺跡，而這種遺跡，由沙皇俄羅斯，由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下來而保存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還很多哩。

這不會是農民狹隘思想的天下麼？

不是的。如果我們保存着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那我們就可以在我們國家裏用極大極大節省辦法來把任何一點貯蓄都保存起來，以便發展我們大機器工業，以便發展電氣化，以便加緊開採水泥煤，以便完成瓦爾霍夫水電站建設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並且只是在這裏。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拿比喻來說）由一匹馬跨到另一匹馬上去，由農民的、鄉下人的、窮苦的馬，由指靠於破產農民國家的地主田莊的馬，跨到無產階級努力替自己尋找而且不能不尋找的馬，跨到大機器工業的、電氣化的、瓦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七頁）。

從窮苦鄉下人的馬，跨到大機器工業的馬上去，這就是黨在製定五年計劃和力謀實現五年計劃時所追求的目的。

奠定極嚴格的節省辦法和積蓄爲資助我國工業化所必要的經費，——這就是我們爲達到恢復重工業和實現五年計劃目的而應當走的道路。

大膽的任務麼？困難的道路麼？可是，我們黨所以叫做列寧黨，正是因爲它沒有權利來懼怕困難。不僅如此。黨是如此深信五年計劃可以實現和信任工人階級力量，以至於黨會認爲可以抱定在更短期間內實現這件困難事情的任務，就是說不是在五年內，如五年計劃所要求的那樣，而是在四年內，實在講起來——如果把特別季算進去——，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實現這件困難事情。

正是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一個著名口號：「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

而結果怎樣呢？

後來事實表明了：黨原來是對的。事實表明了：如果沒有這種勇氣，如果不是這樣相信工人階級力量，那末黨就會不能達到我們現在足以引爲自豪的勝利。

### (三) 在工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說五年計劃實現的總結問題。

在工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怎樣呢？

我們在這方面已達到了勝利麼？

是的，已達到勝利。不僅已達到，而且已超過我們所期待的，已超過我們黨內具有最熱頭腦者所能

期待的。現在，甚至于就連敵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了。我們的朋友，當然是更不能否認這一點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黑色金屬冶鑄業，即全國工業化基礎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拖拉機工業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汽車工業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機架製造業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嚴重的現代的化學工業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真正的嚴重的現代農業機器製造業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是沒有航空工業的。而我們現在却有它了。

我們從前在電力製造業方面是佔最末位的。而我們現在却已升到首位之一了。

我們從前在煤油品和煤炭出產量方面，是佔最末位的。而我們現在却已升到首位之一了。

我們從前只有一個採煤冶金根據地——在烏克蘭——，而且我們費了許多工夫，才把它整理好。而

我們現在不僅振興了這個根據地，而且還創造了一個新的採煤冶金根據地——在東部，這個根據地是我國可以引為自豪的得意創作。

我們從前只有一個紡織工業根據地——在我國北部。我們現在已達到這一步，就是在最近期間內，我們將有兩個新的紡織業根據地——在中亞細亞和西西伯利亞。

而且我們不僅創立了這些新的巨大工業部門，並且我們還使這些部門具有這種為歐洲工業規模與範圍所望塵莫及的規模和範圍。

而由於這一切的結果，資本主義份子就最終和永遠被排除於工業以外，而社會主義工業則已成爲蘇聯工業唯一形式。

而由於這一切的結果，我們國家就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為工業出產量底比重，與農業出產量比較起來，已由五年計劃初（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增至五年計劃第四年度（一九三二年）末的百分之七十了。

而由於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我們就能在五年計劃第四年度末，把整個工業原定在五年內完成的出產大綱執行到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使工業出產總量超過戰前水平兩倍以上，超過一九二八年水平一倍以上。至於重工業出產大綱，那末我們已把五年計劃執行到百分之一百零八。固然，我們整個工業五年計劃大綱，還有百分之六沒有完成。可是這是因為隣邦拒絕同我們簽訂互不侵犯公約，又因為在遠東方面發生糾紛，所以我們為加強國防起見，曾不得不把一批工廠立刻改組來製造現代國防武器。而因為這種改組需要經過相當準備時期，所以這些工廠曾停止出產至四個月之久，而這種情形就不能不影響到五年計劃所定整個生產大綱在一九三二年的執行。由於實行這個辦法的結果，我們已完全填補了國防能力方面的缺陷。可是，這個辦法却不能不使五年計劃所定出產大綱執行時受到不良影響。毫無疑義的，如果沒有這種外來情況，那末我們不僅已完成了，而且一定已超過完成五年計劃原定數目了。

最後，由於所有這一切的結果，蘇聯已由軟弱的國防準備不足的國家變成國防能力強大的國家，變成可以隨時應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國家，變成能夠大批製造一切現代國防武器，並將其供給自己軍隊以防外侮的國家。

在工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請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既然有這一切，那末資產階級報章說什麼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遭受「失敗」的廢話，究竟有什麼價值。

而現在遭受嚴重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其工業產品增長情形來說，又是怎樣呢？

請看人所共知的正式統計吧。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比戰前水平增至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國工業出產總量在同一時期內則降至百分之八十四，英國——降至百分之七十五，德國——降至百分之六十二。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三二年末已比一九二八年水平增至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國工業出產總量在同一時期內則降至百分之五十六，英國——降至百分之八十，德國——降至百分之五十五，波蘭——降至百分之五十四。

這些統計豈不正是證明，資本主義工業制度在其與蘇維埃工業制度競賽中，沒有經得住考驗，而蘇維埃工業制度却比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佔有一切優勢麼。

有人向我們說道，所有一切都是好的，建成了許多新工廠，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可是，如果拋棄工業化政策，拋棄擴大生產資料製造業政策，或者至少是把這件事情放在末位，以便多製造些布疋、皮鞋、衣服以及其他各種日常用品，那就更好得多了。日常用品製造得不夠用，而這就引起相當的困難。

可是，必須知道和必須想一想，這種把工業化任務放在末位的政策，會能使我們得到怎樣的結果。當然，我們會從這時期內用於重工業設備方面的十五萬萬金盧布內，拿出一半來向國外購買棉花、皮革、羊毛、橡皮等等。那時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布疋、皮鞋、衣服。可是那時，我們就會既沒有拖拉機工業，又沒有汽車工業，就會沒有若何嚴重的黑色金屬冶鑄業，就會沒有金屬來製造機器，於是我們就會在那具有新式技術武裝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面前陷於手無寸鐵的情況。那時，我們就會沒有可能用拖拉機和各種農業機器來供給農業，於是我們就會落得沒有糧食。那時，我們就會無法戰勝國內資本主義份子，於是我們就會大大增加資本主義復辟機會。那時，我們就會不能有一切新式國防武器，而如果没有這種武器，則國家底國家獨立地位就會不能維持，如果没有這種武器，則國家就會變成外敵用武的對象。那時，我



們的地位就會與現在中國所處地位多少相同，而中國是因為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所以任何一個逞性妄爲者都在蹂躪它的。

總而言之，我們那時所有的，就會是武裝干涉，不是互不侵犯公約，而是戰爭，這戰爭是危險的致命的，是流血的實力懸殊的，因爲在這戰爭中我們就會幾乎沒有武裝，而敵人則擁有一切現代進攻武器。

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的，同志們。

很明顯的，自重的國家政權，自重的黨，是不能採取這種亡國觀點的。

正是因爲黨排斥了這種反對革命的立場，所以黨在工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事業中，就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黨在實現五年計劃和組織工業建設勝利時，實行了以最快速度發展工業的政策。黨好像是會鞭策國家，督促它向前突飛猛進。

黨實行這種最快速度政策，是作得正確麼？

是的，是絕對正確的。

落後一百年並因落後而有滅亡危險的國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當時，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趕快用新式技術來重新武裝自己，而終於走上康莊大道。

其次，我們曾不能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那一天來進攻蘇聯和打斷我國建設；而他們隨時都能利用我國技術經濟弱點來進攻我們，那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曾不得不鞭策國家，以便不放過時機，而盡量利用休戰時間，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而這種基礎就是蘇聯富強底根據。黨曾沒有可能等待什麼機會和玩弄什麼手腕，而會應當實行最快速度的政策。

最後，黨會應當在最短期間內消滅我國國防底弱點。時局的條件，資本主義各國武裝的增長，裁軍思

想的失敗，國際資產階級對蘇聯的仇視，——凡此種種，都迫使黨來迅速加強國防能力作為國家獨立基礎。

可是，黨曾有實現最快速度政策的實在可能性麼？是的，它曾有這種可能性。它所以會有這種可能性，不僅是因為它會能及時發動我國迅速前進，而且首先是因為它在實行新的廣大建設中，會能倚靠着舊的工廠或革新的工廠，而這些工廠既已被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所熟習，於是就給我們以實行最快速度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所有的迅速的新建設的高漲，擴大建設的熱潮，努力從事新建設的英雄和突擊隊員，洶湧澎湃的發展速度，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可以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得實行完全這樣的最快速度的政策麼？

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

第一，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實現的結果，我們基本上已·完成五年計劃底主要任務——給工業、運輸和農業建立現代的新技術基礎。既然如此，那還值得鞭策和督促國家麼？很明顯的，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

第二，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我們已·把國防能力提到應有的高度。既然如此，那還值得鞭策和督促國家麼？很明顯的，現在已沒有這種必要了。

最後，由於五年計劃順利完成的結果，我們已建成幾十個和幾百個新的擁有新式複雜技術的大工廠和聯合廠。這就是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在工業出產量方面起基本作用的，不是技術已經熟習的舊工廠，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那樣，而是技術還沒有熟習而必須熟習的新工廠。可是，熟習新企業和新技術，是比利用那技術已被熟習的舊工廠或革新工廠，困難得多的。這需要更多時間來提高工人和工程

技術人員底熟練程度，來獲得可以完全利用新技術的新技能。既然有這一切，那豈不是顯而易見，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特別是在五年計劃頭兩三年，即使我們想實行，也不能實行最快發展速度政策哩。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為，對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須得採取較少加速的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出產量每年平均增加額會是百分之二十二。我認為，對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須採取使工業出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的標準。這種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達到的理想。莫說這樣的速度，就是連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五也是它們現在所達不到的理想。可是它們也就因此而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具有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蘇維埃國家則是另一回事了。在我國經濟制度之下，我們完全有可能，而且應當實現使出產量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四，作為最低限度。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善於組織了進行新建設的熱忱和熱潮並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成功。這是很好的。可是，現在這已經不夠了。現在我們還應當以努力熟習新工廠和新技術的熱忱和熱潮，以認真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認真減低成本來補充這件事情。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因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半期——譬如說——實行一個新的強有力的跑步，無論是在建設方面，無論是在工業產量增長方面。

最後，要約略說及速度和每年產量增長額百分數本身。我們的工業家是很少研究這種問題的。而同時，這却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什麼是產量增長額百分數呢，增長額每個百分數所包含的內容究竟怎樣呢？例如，拿一九二五年，即恢復時期來說。那時一年出產增長額曾等於百分之六十六。當時

工業產品總值爲七十七萬萬盧布。當時增長百分之六十六，按絕對數目說來就是增加三十餘萬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增加百分之一就等於增加四千五百萬盧布。再拿一九二八年來說。一九二八年產量增長額會百分之二十六，按百分比說來是幾乎比在一九二五年少至三倍。當時工業產品總值爲一百五十五萬萬盧布。所以，全年增長額絕對數目是三十二萬八千萬盧布。所以，當時每增加百分之一就等於增加一萬二千六百萬盧布，即幾乎比在一九二五年（該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多至三倍。最後，拿一九三一年來說。一九三一年產量增長額會百分之二十二，即幾乎比在一九二五年少至三倍。當時工業產量總值爲三百零八萬萬盧布。該年增長額絕對數目是五十六萬萬餘盧布。所以，當時每增加百分之一就等於增加二萬五千萬盧布以上，即比在一九二五年（該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多至六倍，比在一九二八年（該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強）多至兩倍。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這是說明，在研究產量增長速度時是不可以看看一般增長額百分數爲限的，——還須知道每個增長百分數究竟包含着什麼，全年產量增長額總數究竟是怎樣。例如，我們決定使一九三三年產量增長百分之十六，即比在一九二五年產量增長百分數少至四倍。但這還不是說這年產量增長額絕對數目也將少至四倍。一九二五年產量增長額絕對數目是三十餘萬萬，而每增長百分之一等於四千五百萬盧布。毫無疑義的，一九三三年產量既然增長百分之十六，則其絕對增長數目將不下五十萬萬盧布，即幾乎比在一九二五年多至兩倍，而每增長百分之一，則至少會等於三萬二千萬至三萬四千萬盧布，即比在一九二五年每增長百分之一所含數目，至少會多至七倍。

同志們，如果具體考察增加額速度和百分數問題，那末情形就是如此。在工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的總結，就是這樣。

#### (四)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現在我們來講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的總結問題。

農業方面的五年計劃是集體化的五年計劃。黨在實行集體化時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黨是從以下一點出發的：爲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除工業化而外，還須由小規模的個體農業過渡到擁有拖拉機和新式農業機器的大規模的集體農業，作爲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唯一堅固基礎。

黨是從以下一點出發的：除非實行集體化，就不能把我國引上康莊大道去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不能使千百萬勞動農民解脫貧困和愚昧狀況。

列寧曾說：

「靠小農經濟是不能擺脫貧困境遇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列寧曾說：

「如果我們將照舊依靠小農莊而生活，那怕就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我們都會橫直不免於滅亡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列寧曾說：

「只有藉助於共同的勞動組合的協作的勞動，才可逃出帝國主義戰爭把我們逼進的絕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七頁)。

列寧會說：

「必須過渡到巨大模範農莊中的共耕制；除非如此，就不能擺脫俄國現在所處的那種經濟破壞的狀況，那種簡直是困苦不堪的狀況」（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八頁）。

列寧根據這點而得出基本結論如下：

「只有能夠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度優越時，只有能夠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只有在這個情形下，那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實在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實在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固地和真正地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黨在實行農業集體化大綱，實行五年計劃農業發展大綱時，就是從列寧這些原理出發的。

因此，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那些散漫狹小而無法利用拖拉機和新式農業機器的個體農戶聯合爲以高度發展的農業一切現代工具爲武裝的巨大集體農莊，而在空閒土地上則到處建立模範國營農莊，即蘇維埃農莊。

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蘇聯由小農的落後的國家變爲具有巨大農業的國家，這農業是以集體勞動爲基礎而組織的，是能出產最多商品的。

黨在四年以內實現五年計劃所定農業發展大綱時已得到什麼成績呢？黨是把這個大綱實現了，抑是遭了失敗呢？

黨得到了以下的成績：在不過三年以內就組織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約近五千個穀物和養畜蘇維埃農莊，同時在四年以內就把播種面積擴大二千一百萬海克脫。

黨得到了以下的成績：集體農莊已經包括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及全國農民播種面積百分

之七十以上，這就是說在三年以內就超過完成五年計劃至三倍了。

黨得到了以下的成績：它現在已有可能每年採辦十二萬萬至十四萬萬普特穀物，不像個體農民經濟佔主要地位時期那樣每年祇能採辦五萬萬至六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黨得到了以下的成績：富農之爲階級已被擊潰，雖然還未全被剷除；勞動農民已解脫富農盤剝和剝削；我們已給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奠定堅固經濟基礎，即集體經濟基礎。

黨得到了以下的成績：蘇聯已由一個具有小農經濟的國家變成具有世界上最大農業的國家。

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的總結，大體上就是如此。

現在你們自己來判斷吧：既然這樣，那末資產階級報章那番硬說集體化「失敗」，硬說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破產」的廢話，究竟有何價值。

而現在遭受嚴重農業危機的資本主義各國農業情形又是怎樣呢？

請看人所共知的正式統計吧。

在各基本產穀國家裏，播種面積已縮減百分之八以至百分之十。在美國，棉花播種面積已縮減百分之十五；在德國和捷克斯拉伐克，糖蘿蔔播種面積已縮減百分之二十二以至百分之三十；在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亞麻播種面積已縮減百分之二十五以至百分之三十。

按美國農業部統計，美國農業出產總值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一十萬萬美金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五十萬美金，即減低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穀物出產總值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二萬八千八百萬美金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三萬九千一百萬美金，即減少百分之六十八以上。美國棉花出產總值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十三萬八千九百萬美金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三萬九千七百萬美金，即減少百分之七十以上。

所有這些事實，難道不是證明蘇維埃農業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農業制度麼？這些事實，難道不是證

明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和資本主義農莊更有生氣的經濟形式麼？

有人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不完全生利的，說它們耗費金錢很多，說保留這種企業是毫無理由的，說最好是把這些農莊解散而只把其中生利者保留起來。可是，只有絲毫不懂國民經濟問題，絲毫不懂經濟問題的人，才能這樣說。幾年以前，紡織工廠大半都是不生利的。當時，我們有一部分同志勸我們關閉這些工廠。如果我們聽從了他們的話，那我們會怎樣呢？我們就會在國家面前，會在工人階級面前幹出極大罪過，因為我們會因此而破壞了我們當時已在興盛的工業。我們當時是怎樣做了呢？我們等了一年多，結果已經把整個紡織工業都變成爲生利的工業了。而我們在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廠呢？須知它暫時也不生利哩。難道也要將其關閉麼？又如我們的暫時也是不生利的黑色金屬冶鑄業呢？難道也要將其關閉麼，同志們？如果這樣去觀察生利問題，那我們就應只去盡量發展幾個最能生利的工業部門，例如糖菓工業、麵粉工業、化妝品工業、編織品工業、兒童玩具工業等等。我當然不反對發展這些工業部門。恰巧相反，我們應當發展它們，因為它們也是居民所需要的。可是，第一，如果沒有重工業供給它們以機器和燃料，則它們就不能發展。第二，它們是不能成爲工業化基礎的。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

生利問題，是不可拿商人眼光，不可以眼前一刻爲觀點，而應當以全部國民經濟幾年情況爲觀點來觀察的。只有這種觀點才能稱爲真正列寧主義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這種觀點不僅應該用來看待工業，而且尤其應該用來看待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你們只要想一想：在區區三年以內，我們就創立了二十餘萬個集體農莊和約近五千萬個蘇維埃農莊，即創立了完全新的大企業，這種企業對於農業的意義，正如工廠對於工業的意義一樣。請你們再指出一個國家，說它能在三年以內創立若干新的巨大企業，姑且不說二十萬零五千個，就連二萬五千個也好。你們一定指不出來，因爲在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國家，



而且未曾有過這樣的國家。而我們却在農業方面創立了二十萬零五千個新企業。而你們看，世界上竟有這樣一些人，這些人竟要求這些企業立刻生利，如果不能立刻生利，那就要將其破壞，將其解散。這難道不是顯然說明這些非常奇怪的人們不肯讓格羅斯特拉塔專美於前麼？

在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不生利時，我絕對不想說它們一概不生利。絲毫不是如此！大家都知道，現在就已經有許多高度生利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我們現在就已有幾千個集體農莊和幾十個蘇維埃農莊是完全生利的。這些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是我們黨底得意之作，蘇維埃政權底得意之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當然不是到處一樣。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間，有舊的，有新的，也有完全年輕的。這是一些還幼弱的還未完全形成的經濟機體。它們在其組織建設中所處的時期，差不多與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所處的時期相當。當然，其中大多數還不能生利。可是，毫無疑義的，它們經過兩三年以後就一定能夠生利，也同我們的工廠在一九二一年以後就能生利一樣。如果藉口說它們現在還不是一概都能生利，而就不肯予以種種幫助，那就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幹出滔天大罪。只有人民公敵和反革命份子，才能提出用不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

黨在農業方面實現五年計劃時是以加快速度實行了集體化的。黨實行這種以加快速度進行集體化的政策，是做得正確麼？是的，絕對正確，雖然在這方面未免有過一些急燥行動。黨在實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和剷除富農巢穴的政策時曾不能半途而廢，——它應把這件事情貫徹到底。

這是第一。

第二，黨在一方面既擁有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而在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國沒有土地私有的情況（土地國有！），它於是就會有一切可能來加速進行農業集體化事業。而黨在這方面確已達到最大成功，因爲它把五年計劃所定集體化大綱超過完成至三倍了。

這是說我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也應實行加緊集體化速度的政策麼？不是的，不是這樣說。因為我們在基本上已經把蘇聯各基本區域集體化事業完結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所已做到的，已超過我們所可預料的。我們不僅在基本上完結了集體化。而且我們已使絕大多數農民認識了集體農莊是最恰當的經濟形式。同志們，這是一個莫大的成績。既然如此，那末現在還值得急求加快速度集體化麼？當然是不值得的。

現在，問題已經不是關於加快速度集體化，尤其不是關於集體農莊能否存在，——這問題早已肯定解決了。集體農莊已固定了，退向個體舊經濟的道路已永遠截斷了。現在任務就是要在組織上鞏固集體農莊，把暗害份子從這裏驅逐出去，挑選真正的受過審查的波爾什維克幹部來供給集體農莊，使集體農莊成爲真正波爾什維克的集體農莊。

現在，主要點就在這裏。

關於在農業方面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情形，就是如此。

## (五) 在工農物質狀況改善方面，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我在上面已說到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成功，說到蘇聯工業和農業高漲的情形。從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看來，這些成功已產生什麼結果呢？從根本改善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看來，我們在工業和農業方面所有成功底基本結果何在呢？

第一，基本結果就在於我們已剷除了失業現象，已消滅了工人中間所有的朝不保夕的心理。

第二，基本結果就在於幾乎全體貧農都已加入集體農莊建設，就在於以此為基礎而打破了農民分化為富農貧農的現象，並因此而剷除了農村貧窮困苦的現象。

同志們，這是一個莫大的成績，這個成績是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那怕它是最「民主的」國家——所不能夢想的。

在我們蘇聯，工人們早已忘掉失業現象了。大約三年以前，我們還有約近一百五十萬個失業業者。兩年前，我們就已經把失業現象剷除了。在這兩年當中，工人們已經忘掉失業現象，忘掉失業痛苦，忘掉失業慘狀。請你們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吧，該處在失業基礎上產生着何等悽慘的事情呵。在這些國家裏，現在至少有三四千萬個失業業者。這是些什麼人呢？普通都說這是一些「走頭無路的人」哩。

他們每天都想法取得工作，尋找工作，幾乎任何工作條件都情願接受，可是誰也不收容他們，因為他們是些「多餘的」人。而同時，大批商品和生產品却被逞性妄為的地主資本家的富豪子弟們任意揮霍。不給失業業者飯吃，因為他們無飯錢可付；不給他們居住，因為他們無房錢可付。他們是怎麼過活，何處棲身呢？他們所藉以糊口的，是從老爺棹上拋擲下來的微薄的施舍，他們在垃圾堆裏尋找腐爛的剩餘食品，他們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而他們大多數是住在郊外用木箱板和樹皮趕快築成的茅屋裏。而且不僅如此。不僅失業工人苦於失業現象。在業工人也苦於失業現象。他們所以苦於失業現象，是因為既有大批失業業者存在，就使他們在生產中地位不穩，使他們感覺朝不保夕。今天，他們還在工廠裏面做工，可是他們不敢担保，在明朝醒來時不會聽說他們已被開除工作麼。

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基本成績之一，就是我們已剷除失業現象，已使蘇聯工人免除失業慘境。關於農民，也要這樣說。他們也是忘掉了分化為富農貧農的情形，忘掉了富農剝削貧農的情形，忘掉

了每年都迫使幾十萬幾百萬貧農變爲乞丐的破產情形。三十四年以前，在我國農民人口中間，貧農至少佔百分之三十。這會等於一千萬人以上。而在更早以前，在十月革命以前，貧農至少佔農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什麼是貧農呢？這就是這樣一些人，這些人在經營農業時，照例是或缺乏種子，或缺乏耕馬，或缺乏農具，或是連所有這一切東西都缺乏的。貧農就是這樣一些人，這些人是過着半饑半飽生活的，通常是被富農剝削的，而在舊俄時代，是既受富農盤剝又受地主盤剝的。在很不久以前，還約有一百五十萬貧農，而有時甚至整整二百萬貧農，每年跑到南部——北高加索和烏克蘭——謀生，去受富農僱用，而在更早前，則受富農和地主僱用。而他們每年跑到工廠門口來補充失業者隊伍的，會是更多。而且不僅貧農會處於這種惡劣地位。就連一大半中農，也會如貧農一樣受着貧窮困苦。關於所有這一切苦況，農民早已忘掉了。

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結果，已給予貧農和下層中農什麼東西呢？它已把富農之爲階級打破擊碎了，已使貧農和大部分中農擺脫富農盤剝了。它已把貧農和大部分中農吸入集體農莊，並給他們造成了穩固地位。這樣，它就剷除了農民分化爲剝削者（富農）和被剝削者（貧農）的可能。它已把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和下層中農變成生活有保證的人，於是就剷除了農民破產貧困的過程。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百萬農民每年離鄉背井而跑到遠方謀生的現象了。現在要使農民離開自己的集體農莊而被吸收到什麼地方去做工，就須和集體農莊訂立合同，而且還要送給集體農莊莊員以免費車票。現在我國已經沒有幾十萬幾百萬農民陷於破產而站在工廠門口哀求工作的現象了。這種事情是曾經有過的，但它早已成爲已往舊事了。現在農民是生活有保障的主人，即集體農莊莊員，而集體農莊是擁有拖拉機、農業機器、存種、存糧等等的。

這就是五年計劃給予貧農和下層中農的東西。

這就是五年計劃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的基本成績所在。

由於在改善工農物質狀況方面已達到這些基本成績，所以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有以下的事實：

(1) 大工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人數，比一九二八年增至兩倍，這樣就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五十七；

(2) 國民收入——也就是說工農收入——在一九三二年已達四百五十一萬萬盧布，這樣就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五；

(3) 大工業方面的工人和職員全年平均工資，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這樣就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十八；

(4) 社會保險基金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二（一九三二年為四十一萬二千萬盧布，一九二八年則為十萬零五千萬盧布），這樣就超過五年計劃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5) 公共食堂迅速增加，共包括各最主要工業部門工人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樣就超過五年計劃五倍。當然，我們還沒有達到完全滿足工農物質需要的地步。而且在最近幾年內我們也未必會達到這個地步。可是，我們毫無疑義已達到逐年改善我國工農物質狀況的地步了。只有蘇維埃政權徹底死敵或也許某些資產階級報界代表——連資產階級報界一部分駐莫通信員在內——才能懷疑這一點，而他們對於國民經濟和勞動者狀況的瞭解，是未必勝過阿比西尼亞國王對於高等數學的瞭解程度的。

而資本主義各國工農狀況又是怎樣呢？請看正式消息吧。

在資本主義各國，失業人數已增加到駭人聽聞的地步。在美國，按正式消息，單就製造業而論，在業工人數目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八百五十萬人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而按美國勞動同盟消息，在美國全部工業中的失業工人數目，在一九三二年末已達一千一百萬人。在英國，按正式消息，失業人數

已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萬人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萬人。在德國，按正式消息，失業人數已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人增至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萬人。在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情形也是如此，而且正式統計照例都是故意減少關於失業人數的消息，其實在資本主義各國，失業人數總共已達三千五百萬以至四千萬人。

工人工資是一貫減低的。按正式消息，在美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已比一九二八年水平減低百分之三十五，在英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在同一時期內已減低百分之十五，而在德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甚至已減低百分之五十。按美國勞動同盟計算，由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減低工資的結果，美國工人所受損失，等於三百五十萬萬美金以上。

英德兩國工人所有本來就很少的保險基金，已大大減少了。在美法兩國，是完全沒有或者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失業保險形式的，因此特別是在美國，無家可歸的工人和無人照料的兒童人數，就大大增加着。

資本主義各國農民羣衆狀況也是一樣壞的，那裏的農業危機根本破壞農民經濟，把數百萬破產農民和法麥爾變成乞丐。

在改善蘇聯勞動者物質狀況方面，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總結，就是如此。

## (六) 在城鄉間商品流轉方面，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現在我們就來說在城鄉間商品流轉額增長方面，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總結。

工業和農業產量的大大增長，工業和農業所有商品剩餘量的增長，最後是工農需要額的增加，——所

有這一切，會不能不使城鄉間商品流轉活躍並擴大起來，而且果然已使它活躍並擴大起來。

城鄉間的生產結合是基本的結合形式。可是，單靠生產結合還是不夠的。必須用商業結合來補充生產結合，以便使城鄉聯繫成爲堅固而不可分離的聯繫。爲要達到這步，就只能經過發展蘇維埃商業。如果認爲只經過某一條溝道，例如經過合作社，就可發展蘇維埃商業，那就不正確了。爲要發展蘇維埃商業，就必須利用所有一切溝道：合作社系統，國營商業系統，集體農莊商業。

有些同志以爲發展蘇維埃商業，尤其是發展集體農莊商業，就是回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

蘇維埃商業——連集體農莊商業也包括在內——是與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根本不同的。

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我們會容許資本主義活躍，會容許私人商品流轉，會容許私商、資本家以及投機商人「活動」。

這會是多少自由的商業，不過由國家調節作用加以限制而已。當時在國內商品流轉方面，私人資本主義部份還佔頗大地位。我還不說，我們當時既沒有像現時這樣發展的工業，又沒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按計劃而工作並供給國家以巨量的後備農產品和工業品。

可以說我們現在也有同樣情況麼？當然不可這樣說。

第一，決不可把蘇維埃商業和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雖然是由國家所調節的商業相提並論。如果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會容許資本主義活躍和容許私人資本主義部份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那末蘇維埃商業就是以既不許資本主義活躍又不許私人資本主義部份在商品流轉方面活動爲出發點。什麼是蘇維埃商業呢？蘇維埃商業就是沒有大小資本家參加的商業，就是沒有大小投機商人參加的商業。這是特種商

業，這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而只有我們波爾什維克才在蘇維埃制度發展條件下加以實行的商業。

第二，我們現在有頗發展的國家工業與整批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供給國家以巨量後備農產品和工業品來擴展蘇維埃商業。這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所未曾有的，而且是曾不能有的。

第三，我們已達到這一步，就是在最近時期以來，我們已把私販、私商、各種中介人完全逐出商品流轉範圍了。當然，這並不排除以下一種可能，就是私販和投機商人將能利用他們最方便的場所，即集體農莊商業，以便按隔世遺傳律而重新出現于商品流轉範圍。況且，集體農莊莊員自己有時也甘願做一做投機生意，而這當然是不使他們臉上增光的。可是，我們有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頒佈的關於制止投機和懲罰投機商人辦法的法律，來反對這種惡劣現象。你們當然知道，這個法律是不特別柔和的。你們當然懂得，這樣的法律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條件下是未曾有的，而且是曾不能有的。

你們由此可見，既然有這一切，如果還妄說什麼回到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上的商業，那就是絲毫不懂得，真是絲毫不懂得我們蘇維埃經濟。

有人向我們說：沒有健全的金融和健全的貨幣就無法擴展商業，縱然這種商業是蘇維埃商業，也是無法擴展的；必須預先醫治我國金融和我們蘇維埃貨幣，因為我們蘇維埃貨幣似乎是沒有絲毫價值的。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學家就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我認爲：這些尊貴的經濟學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認識，是不勝於——舉例來說——肯特爾伯尼主教對於反宗教宣傳的認識的。怎能說我們蘇維埃貨幣沒有什麼價值呢？難道我們不正是用這種貨幣建築了馬格尼托工廠、德涅泊爾電站、庫茲涅茨工廠、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和哈爾科夫拖拉機工廠，高爾基城汽車工廠和莫斯科汽車工廠，幾十萬集體農莊和幾千蘇維埃農莊麼？這些老爺們莫非認爲這一切企業都是由稻草或泥土，而不是由具有一定價值的實際材料築成的麼？如果估



計到在我國商品流轉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有組織的市場，而不是那只有附屬作用的無組織的市場，那末我國貨幣穩定性是由什麼所保證呢？當然不僅是黃金準備。保證我國貨幣穩定性的，首先就是國家所支配的巨量商品，這些商品是按照穩定價格而加入商品流轉範圍的。試問有那一個經濟學家能夠否認蘇聯所獨有的這種保證是比任何黃金準備都更能切實保證貨幣穩定性呢？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學家是否有時也會懂得，他們已經完全被那個把黃金準備當作貨幣穩定性唯一保證的理論所弄糊塗了呢？

關於與擴展蘇維埃商業有關的種種問題，就是如此。

由於五年計劃實行的結果，我們在發展蘇維埃商業方面已達到什麼成績呢？

我們五年計劃總結中有以下的成績：

(1) 輕工業產量已比一九二八年增至百分之一百八十七；

(2) 合作社商業與國營商業零售額按一九三二年價格計算，已增至三百九十六萬萬盧布，就是說，零售商品量已比一九二八年增至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3) 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網，已比一九二九年增加十五萬八千個小舖和商店；

(4) 集體農莊商業日益擴展，個別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所採辦的農產品數量日益增加。事實就是如此。

資本主義各國內部商品流轉情況却就完全不同了，在那裏，由於經濟危機的結果，致使商業萬分減縮，致使大批企業關閉，致使中小商人破產，致使巨大商號破產，致使商店貨棧存貨充斥而無法銷售，而同時勞動羣衆底購買力却繼續降低。

在商品流轉發展方面，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總結，就是如此。

## (七) 在和敵對階級餘孽鬥爭方面，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實現的總結

由於工業、農業以及商業方面五年計劃實現的結果，我們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都已逐去了資本主義份子，而奠定了社會主義原則。

這種情形對於資本主義份子會產生什麼結果，而且確實已產生什麼結果呢？

結果，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工業家及其從僕，商人及其走卒，從前的貴族和神父，富農和富農走狗，從前的白匪軍官和警佐，從前的警察和憲兵，各種沙文主義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蘇維埃份子，已被打翻。

這些從前的人們既被打翻而散居蘇聯各地，於是就鑽進我們的工廠，我們的機關和商業組織，鐵路運輸和水路運輸企業，而主要是鑽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他們戴上「工」「農」假面具，鑽進這些地方並在這裏隱藏起來，而其中有些人甚至鑽進黨裏來了。

他們是帶着什麼東西鑽進這些地方的呢？當然是帶着仇視蘇維埃政權的心理，帶着切齒仇恨新式經濟、新式生活以及新式文化的心理。

這些老爺們要直接進攻蘇維埃政權，已經是無能爲力了。他們和他們的階級已曾屢次舉行這種進攻，可是他們已被擊潰和打散了。因此，他們還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體農莊莊員、蘇維埃政權、黨。於是他們就用暗中拆台手段來竭力進行危害勾當。他們放火焚燒倉庫和破壞機器。他們組織怠工事件。他們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裏面組織暗害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人——在這中間，並且

有某些大學教授——在瘋狂進行暗害工作中，竟不惜採用這樣的手段，如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裏面用瘟疫，用炭疽熱來傳染牲畜，在馬匹中間散佈腦膜炎等等。

可是，主要點還不在於此。這些從前的人們底主要「活動」，就是組織大批偷竊和侵吞國家財產，合作社財產，集體農莊財產。在工廠裏進行偷竊和侵吞勾當，在鐵路上偷竊和侵吞貨載，在堆棧和商店裏進行偷竊和侵吞勾當，尤其是在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進行偷竊和侵吞勾當，——這就是這班從前的人們底基本「活動」形式。他們好似是憑靠自己的階級本能而感覺到：蘇維埃經濟底基礎是公有制，要危害蘇維埃政權，就正須動搖這個基礎，——於是他們就極力以組織大批偷竊和侵吞勾當來動搖公有制。

爲要組織侵吞勾當，他們就利用集體農莊莊員——昨天還是個體農民，而今天已是集體農莊莊員——私有財產觀念的習氣和遺毒。你們既是馬克思主義者，就應當知道：人們意識在其發展中是比其所處實際地位落後的。就地位講，集體農莊莊員已不是個體者，而是集體者，但他們的意識暫且還是舊的意識，私有財產的意識。於是剝削階級中的從前的人們就利用集體農莊莊員底私有財產習慣來組織侵吞公產勾當，以便動搖蘇維埃制度底基礎——公有制。

我們有許多同志竟寬容這種現象，不懂得這種大批偷竊和侵吞公產的事實底意思和意義。他們好像瞎子一樣，看不見這些事實，却以爲「這裏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得的事」。可是，這些同志們是大錯而特錯了。正如資本主義底基礎是私有制一樣，我們蘇維埃制度底基礎就是公有制。如果資本家會宣佈私有制爲神聖不可侵犯，而曾在當時達到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那末我們共產黨人就更應宣佈公有制爲神聖不可侵犯，以便在一切生產部門與商業部門裏鞏固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容許偷竊公產和容許侵吞公產，——無論是國家財產，抑是合作社和集體農莊財產，那都是一樣——，不過問這種反革命胡行，那就等于幫助敵人來破壞我們這個以公有制爲基礎的蘇維埃制度。我們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所公佈

的關於保護公有制的法律，就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這個法律是現時革命法制基礎。而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工人以及每個集體農莊莊員底主要職責，就是務須極其嚴格實行這個法律。

有人說：現時的革命法制是和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毫無區別的；現時的革命法制是回復到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革命法制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的革命法制是以其主要鋒芒去反對戰時共產主義極端成份的，反對那些「非法」沒收和捐稅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革命法制在私有主、個體經濟者、資本家極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的條件下，保障其財產安全。可是，現時革命法制就完全不同了。現時革命法制底主要鋒芒不是用以反對戰時共產主義極端成份——這種成份早已不復存在——，而是用以反對公共經濟中的盜賊和暗害份子，反對惡棍和侵吞公產者。由此可見，現時革命法制底基本關注，正是要保護公有財產，而不是其他什麼事情。

因此，為保護公有制而鬥爭，用蘇維埃政權底法律所賦予我們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作鬥爭，就是黨底基本任務之一。

堅強而雄偉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東西，以便粉碎那些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並打破其盜竊詭計。

有些同志把關於消滅階級、關於建立無階級社會、關於國家消亡的提綱，瞭解為替那種苟且倖安和泰然自安態度辯護的論據，瞭解為替那種主張熄滅階級鬥爭和削弱國家政權的反革命理論辯護的論據。不消說，這種人是不能和我們黨有絲毫相干的。這是蜕化變節份子，或是兩面份子，而這種份子是須被逐出黨外的。階級之消滅不是以熄滅階級鬥爭來達到的，而是以加緊階級鬥爭來達到的。國家之消亡不是經過削弱國家政權，而是經過最高限度加強國家政權到來的；只有最高限度加強國家政權，才可以最終剷除垂死階級底餘孽，並組織國防以抵禦那尚未被消滅而且還不會快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包圍。

由於五年計劃實現的結果，我們已完全把敵對階級底最後餘孽從其生產陣地上趕走了，我們已把富農階級擊破，並準備好消滅富農階級的基礎。在與資產階級最後隊伍作鬥爭方面，五年計劃底總結就是如此。但這還不夠。任務就在於要把這些從前的人們從我們自己的企業和機關中趕走，使其永遠不能爲害。

不可說，這些從前的人們能用暗害與偷竊手段來改變蘇聯現狀中的什麼東西。爲要對抗蘇維埃政權底設施，他們已經是太軟弱無力了。可是，如果我們的同志不用革命警覺性武裝起來，如果我們的同志不從實踐中拋棄那種對於偷竊侵吞公產事實所採取的庸人的泰然自安態度，那末從前的人們就能作出不少害處來。

要知道，蘇維埃國家威力越增長，則垂死階級最後餘孽底抵抗也將越加強。垂死階級底最後餘孽正因為他們已在死亡和奄奄待斃，所以必將實行形式愈趨愈烈的反抗，嚇使和發動居民中落後階層來反對蘇維埃政權。這些從前的人們是把任何陷害和誣蔑手段都利用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來企圖發動落後份子的。在這個基礎上，各舊時反革命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中部和邊疆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所有殘兵敗將，能乘機復活而蠢動起來；托洛茨基份子與右傾份子中的反革命的反對派的餘孽，能乘機復活而蠢動起來。這當然沒有什麼可怕。可是，如果我們願意迅速剷除這些份子而無須特別犧牲，那就必須注意到這一切情形。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革命警覺性就是波爾什維克現在特別必要的品質。

## (八) 一般結論

在工業和農業方面，在改善勞動者生活和發展商品流轉方面，在鞏固蘇維埃政權方面和擴展反對垂死階級餘孽及遺毒的階級鬥爭方面，五年計劃實現的基本總結，就是如此。

蘇維埃政權最近四年內的成功和成績，就是如此。

如果根據這些成功而就以爲我們百事大吉，那就錯誤了。當然，我們還不是百事大吉的。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還有浪費現象和糊塗從事現象。可惜我現在不能說明這些缺點和錯誤，因爲委托我做的總結報告範圍不容許我來暢談這些問題。可是，現時問題並不在此。問題是在於雖然有各種缺點和錯誤，——而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否認有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可是我們終究達到了使全世界工人階級喜躍欽佩的嚴重成功，終究達到了實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試問有什麼東西會能而且確實已表現其主要作用，使我們黨不管有錯誤和缺點，而終究在四年內實現五年計劃方面獲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呢？

試問有一種什麼基本力量會不顧一切而終究保證我們達到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千百萬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底積極性和舍己精神，熱忱和首倡性，這些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協同工程師人員來施展了巨大精力去發展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運動。而如果沒有這個情況，則我們就會不能達到目的，就會不能前進一步，這是無可懷疑的。

其次，這就是黨和政府底堅強領導，黨和政府曾號召羣衆前進並克服那橫在達到目的道路上的一切種種困難。

最後，這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底特別長處和優勢，這制度本身包含有爲克服一切種種困難所必要的大可能性。

決定蘇聯獲得歷史勝利的，就是這三個基本力量。

一般結論：

(1) 五年計劃底總結，已推翻資產階級活動家和社會民主黨活動家們那種硬說五年計劃是幻想、是

夢話、是不可實現的夢想的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已經表明：五年計劃是已經實現了。

(2) 五年計劃底總結，已打破那種妄說工人階級只能破壞舊東西而不能建設新東西的著名的資產階級「信條」。五年計劃底總結已經表明：工人階級是能建設新東西的，也好似它能破壞舊東西一樣。

(3) 五年計劃底總結，已打破社會民主黨人那種硬說在單獨一個國家裏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提綱。五年計劃底總結已經表明：在一個國家裏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社會底經濟基礎已經在蘇聯建成了。

(4) 五年計劃底總結，已推翻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種硬說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最好體系，而其他一切經濟體系都不穩固，都不能克服經濟發展中的困難的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已經表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脚跟動搖而不穩固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在衰頹，它應當讓位於別的更高的經濟體系，即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只有蘇維埃經濟體系，才是不怕危機而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困難的唯一經濟體系。

(5) 最後，五年計劃底總結已經表明：如果黨知道作事方向並不怕困難，那黨是不可被戰勝的。

(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

## 論農村中的工作

——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在聯共(波)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各位發言同志已經把我黨農村工作狀況、工作缺點、工作優點——特別是工作缺點——作了一個正確的敘述。可是，我總還覺得，他們還沒有把關於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最主要點說出來，還沒有把這些缺點底根源揭露出來。而這一點却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因此，就讓我來發表我對於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意見，用波爾什維克所固有的全部爽直態度來發表我的意見。

在去年，在一九三二年，我們在農村中工作的主要缺點是什麼呢？

主要缺點就是我們在去年的糧食採辦工作遇到比前年——一九三一年——更大的困難。

決不可說這是由於收成不好，因為去年收成不僅不比前年壞些，反而比前年好些。誰也不能否認，一九三二年糧食收穫總量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在一九三一年因在蘇聯東北五個基本區內發生過旱災，致使糧食數量大形減少。當然，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因為庫班和特勒克以及烏克蘭幾個區域內氣候條件不好而受到一些損失。可是，毫無疑義的，就是去年所受損失還不及一九三一年因東北各區發生旱災而遭受的損失之半。所以，我國一九三二年份的糧食收成是比一九三一年多些。可是，雖然如此，而我們在一九三二年的糧食採辦工作所遇到的困難却比前年大些。



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的工作爲什麼有這個缺點呢？這個差異現象應怎樣來解釋呢？

(一)這首先是因爲我們的地方工作同志，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沒有顧計到因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而在農村中形成的新環境。而正因爲他們沒有顧計到這個新環境，所以他們就未曾根據新環境來從新改變工作方式。在沒有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在沒有兩種糧食價格——國家所定價格與市場價格——時，農村中的環境是一回事。而自從宣佈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起，農村中的環境就必定要急劇變更了，因爲宣佈集體農莊貿易就等於承認市場糧食價格爲合法價格，而這種價格是較高於國家所定價格的。不必證明，這種情況就使農民在向國家交納糧食時表現某種吝嗇態度。農民會這樣打算盤：「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已宣佈實行了，市場價格已經合法化了，於是我拿同等數量的糧食到市場上去賣，就能比交納給國家時得到較多的錢，而我如果不是傻子，就當然要把糧食扣留一下，少交納一些給國家，多留一些做集體農莊貿易，以便在出賣同等數量的糧食時可以多賺一些錢」。

這本來是最簡單而自然的邏輯！

可是，不幸處就在於我們的農村工作人員，至少是其中許多人，却沒有懂得這個簡單而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新環境中，爲要不致破壞蘇維埃政權所定糧食採辦計劃，共產黨員本應還在收穫開始時，還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時，就竭力加緊和督促糧食採辦工作。這是客觀環境所要求的。而他們在事實上又是怎樣幹了呢？他們未曾督促糧食採辦工作，却曾督促實行各種貯藏，於是就更使糧食交納者在履行其對國家所負義務時的吝嗇態度加強。他們既沒有懂得新環境，於是他們就不來顧慮農民在交納糧食方面的吝嗇態度能障礙糧食採辦工作，反而來焦心農民會想不到要扣留一些糧食，以便後來運到市場上去做集體農莊的貿易，焦心農民會不幸而把自己全部糧食統統交給國家倉庫。

換句話說：我們的農村共產黨員，至少是其中的多數人，只看見集體農莊貿易底處，只懂得，只領

會集體農莊貿易底長處，却完全沒有懂得，沒有領會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他們沒有懂得，如果他們——共產黨員——不從收穫糧食最初幾天起就極力督促糧食採辦運動，那末集體農莊貿易底短處就會使國家大受其害。

而且不僅集體農莊工作人員犯了這種錯誤。許多蘇維埃農莊經理也犯了這種錯誤，這些經理竟犯罪式地把應該交納給國家的糧食扣留起來，却按較高價格拍賣出去。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其關於發展集體農莊貿易的著名決議中，曾顧計到這個因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而形成的新環境麼？是的，是顧計到了的。該決議簡直說道：只有在已經完完全全執行糧食採辦計劃並把種子收齊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該決議簡直說道：只有在結束糧食採辦工作和收藏種子以後，大約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以後——只有履行這些條件以後，才可以開始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似乎是會用自己這個決議來對我們農村工作人員說：切不要以顧慮種種貯蓄和貯藏來模糊自己的視線，切不要離開主要任務；而應當從糧食收穫最初幾天起就開展糧食採辦工作並特別加緊這個工作，因為第一個訓條——就是完成糧食採辦計劃，第二個訓條——就是貯藏種子，只有履行這些條件以後，你們才可以開始和發展集體農莊糧食貿易。

也許中央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是錯在沒有充分割切強調這一點，沒有充分嚴厲預告我們農村工作人員關於集體農莊貿易所包含的危險。可是，他們是曾把這些危險情形預告我們農村工作人員的，而且預告得十分明白，——這是不可絲毫懷疑的事實。必須承認：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未免把我們各地工作人員——不僅是區工作人員，而且某些省工作人員——所具列寧主義鍛鍊和明達性，估量得稍許過分了。

也許本來就不必宣佈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吧？尤其是因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不僅有其長處，而且還有一些短處，那末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許會是一個錯誤吧？

不是的，這不會是一個錯誤。無論那一個革命辦法，如果它實行得不正確，都是不能担保沒有某些短處的。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也是如此。集體農莊貿易，無論對於農村或對於城市，無論對於工人階級或對於農民，都是同樣需要而且有利的。而正因為它是有利的，所以會須加以施行。

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在施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時是根據什麼理由呢？

首先，就是因為要擴大城鄉間商品流轉基礎，改善對於工人們的農村產品供給和對於農民們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毫無疑義的，只靠國營貿易和合作社貿易，還是不足以做到這一層的。這些商品流轉溝道還要用新溝道——集體農莊貿易——來補充。而我們既施行集體農莊貿易，就補充了這些溝道了。

其次，就是因為要利用集體農莊糧食貿易來給集體農莊莊員以附加的收入源泉，並鞏固他們的經濟狀況。

最後，就是因為要靠施行集體農莊貿易來更加推動農民去改善集體農莊工作，無論是在播種方面或在收穫方面。

你們知道，人民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所有這些理由，都已完全全由近來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具體事實所證實了。集體農莊之更加鞏固，退出集體農莊的現象之停止，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志願之加強，集體農莊莊員之力求以更嚴格選擇原則來接受新莊員，——凡此種種以及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事實就是毫無疑義地證明：集體農莊貿易不僅沒有減弱集體農莊底地位，反而加強和鞏固了集體農莊底地位。

所以，我們在農村工作中的缺點，不是由於施行集體農莊貿易，而是因為沒有時時都正確實行集體農莊貿易，因為不善於顧到因宣佈實行集體農莊糧食貿易而形成的新環境，不善於適應着這個新環境來改造自己的隊伍。

(二)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我們地方工作同志——而且不僅這些同志——沒

有瞭解我們在農村中工作條件已因集體農莊在基本穀物區內統治地位奠定而變更。在我國穀物區裏，集體農莊經濟形式已經成爲統治形式，——對於這件事實，我們大家都是覺得高興的。可是，這個情況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我們在發展農業方面的關注和責任，——關於這一點，却不是大家都懂得了。許多人認爲：既然集體化在某區某省已達到——例如——百分之七十或八十，那就是說一切事情都妥貼了，而我們就可毫不管事，聽其自然，聽其自流，以爲集體化自己會解決一切，自己會提高農業。但這是很深的迷誤，同志們。其實，過渡到作爲我國農業中的統治形式的集體農業，這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我們對於農業的關注；這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共產黨員在提高農業方面的領導作用。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危險是比在任何時候都大的。在目前這時候，自流態度是能葬送一切的。

當個體農莊主人還在農村中佔主要地位時，黨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干預，尙能以個別幫助辦法，個別忠告或個別警告爲限。當時，個體農民只得自己關照自己的經濟，因爲這經濟只是他個人的經濟，他不能把經營這經濟的責任推諉到其他任何一個人身上；當時，除自己而外，他就沒有什麼人可以依靠。當時，個體農民如果不願意挨餓和不願意餓死，他就得親自照料一切播種、收穫以及其他一切耕作手續。而一經轉入集體經濟時，情形就根本改變了。集體農莊不是個體經濟。所以，集體農莊莊員現在這樣說：「集體農莊是我的，又不是我的；集體農莊是我的，但同時又是張三李四王五以及其他集體農莊莊員的，集體農莊是大家公有的」。現在，他，即集體農莊莊員——他昨天還是個體農民，而今天已是集體農民——已可把責任推諉到本集體農莊其他莊員身上了，已可以指望於其他莊員了，因爲他知道集體農莊是不會使他挨餓的。因此，他，即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關注，就比他過去經營個人經濟時少些了，因爲現在對於經濟的關注和責任，是由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分擔的。

而從這裏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而從這裏就應得出結論如下：對於處理經濟所負責任的重心，已經

由個別農民身上移到集體農莊底領導機關，集體農莊底領導中堅身上來了。現在，農民不是要求自己，而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或更確切一點說，與其說是要求自己，不如說是要求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來關注經濟和正確處理事務了。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黨現在已不能以對農業發展過程採取個別干預辦法爲限了。它現在應當親身担起集體農莊領導責任，應當親自擔起對於工作的責任，並幫助集體農莊莊員根據科學技術成績來推進自己的經濟。

但這還不是一切。集體農莊是巨大經濟，而巨大經濟是不能沒有計劃而進行的。包含有幾百個農戶，而有時甚至於包含有幾千個農戶的巨大農莊，是一定要按計劃指導才可進行的。沒有計劃指導，它就會破壞和瓦解。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制度下的另一個新條件，這個條件是與進行個體細小經濟的條件根本不同的。可以把這種巨大農莊進行事宜交給所謂事物自然行程，自流過程麼？當然是不可以的。爲要進行這種經濟，就須保證集體農莊以某種最低限度數目的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材，這些人材應能計劃經濟並有組織地進行之。很明顯的，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干預集體農莊建設事業，除非由蘇維埃政權來經常幫助這事業，那是無法調理這個經濟的。

而從這裏就得出什麼結論呢？而從這裏就得出結論如下：集體農莊制度不僅不減少，反而增加黨和政府對於農業發展事業的關注與責任。從這裏就得出結論如下：黨如果願意領導集體農莊運動，那它就應當熟悉集體農莊生活和集體農莊領導中的一切詳情。從這裏就得出結論如下：黨不應當減少，而是應當增加它自己和集體農莊的聯繫。黨應當知道集體農莊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便及時幫助集體農莊並預防那些威脅着集體農莊的危險。

而我們在事實上所看見的情形是怎樣呢？我們在事實上所看見的，是有一些區組織和省組織竟與集體農莊生活隔離，不知道集體農莊底需求。人們在辦公室內坐着，自滿自足地寫東寫西，殊不知集體農莊是

繞過官僚主義辦公室而發展着的。有時，他們竟與集體農莊隔離到如此地步，以至於某些邊委委員不是從本邊疆內相當區組織方面，而是在莫斯科從中央委員方面得到關於本邊疆集體農莊內情形的消息。同志們，這是很痛心的，但這是事實。由個體經濟過渡到集體農莊，本來是應使共產黨員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加強的。而在事實上這一過渡却往往使得共產黨員專以集體化高度百分數自誇，以至於高枕而臥，毫不管事，聽其自然。必須對集體農莊經濟實行有計劃領導的問題，本來是應加強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裏面的領導作用的。而在事實上却往往得出這樣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員竟然袖手旁觀，而在集體農莊裏把持一切的，却是從前的白匪軍官，從前的皮特柳爾份子，以及一般工農敵人。

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如此。

(三)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第三個原因，就在於我們許多同志過分估計集體農莊為新經濟形式底作用，而他們既把集體農莊估計過分，於是就把集體農莊變成偶像。他們認定：既有集體農莊為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於是一切事情都已妥貼，於是集體農莊事務底正確進行，集體農莊經濟底正確設計，集體農莊變為模範社會主義的農莊，也就都有保證了。他們沒有瞭解：集體農莊就其組織結構來說尚屬幼弱，而需要黨給以重大幫助，無論是指供給它們以堅定波爾什維克幹部而言，或是指對於集體農莊事務的日常領導而言。但這還不是主要點。這裏的主要缺點，就在於我們許多同志過分估計集體農莊本身為新農業組織形式底力量 and 可能性。他們沒有瞭解：集體農莊雖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可是本身還遠未免除各種危險，還未免除有各種反革命份子鑽進集體農莊領導機關裏來的危險，還未免除這樣一種危險，就是集體農莊在某種條件下還能被反蘇維埃份子利用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正如蘇維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形式一樣。無論集體農莊或蘇維埃，都是我們革命底最大勝利品，工人階級底最大勝利品。可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不過是組織

形式，固然是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但終究是組織形式。而一切都以這個形式將包含什麼內容為轉移。我們知道有這樣一種事實，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曾在一定時期內幫助反革命來反對革命。這種事實是我們蘇聯曾經發生過，例如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當時蘇維埃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領導的，而蘇維埃當時是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革命的。這種事實在德國也有過，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末，當時蘇維埃是由社會民主黨人所領導的，而蘇維埃當時是掩護反革命來反對革命的。所以，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這一個組織形式，雖然這個形式本身是最大的革命勝利品。問題首先就在於蘇維埃底工作內容，問題是在於蘇維埃底工作性質，問題是在於蘇維埃究竟由誰所領導，——是由革命者所領導，抑是由反革命者所領導。正因為如此，所以反革命者並不是時時都表示反對蘇維埃的。例如大家知道，在克琅施塔得暴動時，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曾經表示贊成蘇維埃，但不要共產黨人參加。「擁護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反革命魁首米留可夫在當時的口號。反革命者懂得：問題不僅在於蘇維埃本身，而且首先是在於誰領導蘇維埃。

關於集體農莊，也要如此說。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形式，如果是由真正的革命者，即波爾什維克，即共產黨員所領導，那它就能顯出經濟建設奇蹟來。反之，集體農莊如果將由「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皮特柳爾軍官和其他白匪份子，從前的鄧尼金份子和高爾察克份子所把持，那它在一定時期內就能變成各種反革命罪行底掩護物。同時還要注意到，集體農莊這個組織形式不僅沒有免除反蘇維埃份子鑽進來的危險，而且在第一個時期甚至於還給反革命份子一些方便來暫時加以利用。當農民還在進行個體經濟時，——他們還是散居各處而彼此分立的，因為這個緣故，反蘇維埃份子在農民中間的反革命陰謀會不能發生大效果。而在農民過渡到集體農莊經濟以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裏農民已經有現成的羣衆組織形式，即集體農莊。因為這個緣故，反蘇維埃份子鑽進集體農莊和進行反蘇維埃活動就

能發生比較大得多的效果了。反蘇維埃份子是想必已顧到所有這一切情形的。大家知道，有一部分反革命份子——例如在北高加索一帶——自己設法建立某種好似集體農莊的組織，並利用這些組織爲其祕密組織底合法掩護物。同樣大家知道，反蘇維埃份子在他們還未被揭破和還未被擊潰的那些區域裏，是樂意加入集體農莊的，甚至於還讚美集體農莊，以便在集體農莊內建立反革命工作底巢穴。同樣大家知道，一部分反蘇維埃份子現在自己表示贊成集體農莊，但以不要共產黨員參加集體農莊爲條件。「擁護不要共產黨員參加的集體農莊」——這就是反蘇維埃份子在製擬着的口號。所以，問題不僅在於集體農莊這個社會主義組織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就在於這個形式包含着什麼內容，——問題首先就在於誰主持集體農莊，誰領導集體農莊。

從列寧主義觀點看來，集體農莊也如蘇維埃一樣，如果把它當作組織形式來看，那就是一個武器，而且僅僅是一個武器。在某種條件下，這個武器可以用去反對革命。這個武器可以用來反對反革命。它服務於工農。在某種條件下，它服務於工農敵人。全部問題就在於這個武器是握在誰人手中，這個武器將被利用去反對誰人。

工農敵人根據其階級本能，已開始瞭解這一點了。

而可惜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却還不瞭解這一點。

而正因爲我們有些共產黨員未曾瞭解這件簡單事情，所以我們現在就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在一些集體農莊裏面，那些善於隱藏原形的反蘇維埃份子竟把持一切，並在那裏組織着暗害工作和怠工勾當。

(四)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第四個原因，就在於我們許多地方工作同志不善於改變反富農鬥爭的戰線，不瞭解階級敵人底面目近來已經改變了，不瞭解農村中階級敵人底策略已經變更了，不瞭解必須因此而改變我們自己的策略以求達到成功。敵人已瞭解這個已變更的環境，已瞭解農村新制度底力量和威



勢，而他既瞭解這一點，於是就改變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就由直接衝擊集體農莊的策略，過渡到暗中拆台的策略。而我們却沒有瞭解這一點，沒有看透這個新環境，却還繼續在已經沒有敵人的地方去尋找敵人，却繼續採用那和富農作簡易鬥爭的舊策略，雖然這個策略早已陳舊不堪了。

人們竟在集體農莊以外尋找敵人，以為敵人還是面孔兇惡、牙齒巨大、頸項肥胖、拿着短槍的。人們還在尋找我們在標語上所看見者那樣的富農。可是，這樣的富農早已不存在於地面上了。現時的富農及其走狗，現時的農村反蘇維埃份子，大多數都是「沈默寡言的」，「和氣的」，幾乎是「潔白無疵的」。他們是用不着在集體農莊很遠以外去找的，他們是坐在集體農莊本身裏面，並在那裏担任管倉人、庶務員、會計員、祕書等職務的。他們無論何時也不會說「打倒集體農莊」。他們是「贊成」集體農莊的。可是，他們在集體農莊裏面進行這樣厲害的怠工勾當和暗害工作，以至於使集體農莊將會大吃其虧哩。他們無論何時也不會說「打倒糧食採辦工作」。他們是「贊成」糧食採辦工作的。他們「只是」進行蠱惑勾當，要求集體農莊劃出超過實際需要三倍的養畜存糧，要求集體農莊劃出超過實際需要三倍的保險存糧，要求集體農莊發給公共伙食以每個工作者一日六斤至十斤糧食為標準等等。不言而喻的，經過這種「存糧」和公共伙食頒發以後，經過這一番狡詐蠱惑勾當以後，集體農莊底經濟勢力當然要大受損傷，而糧食採辦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進行餘地了。

為要看透這種狡猾敵人而不落入蠱惑圈套，就須具有革命警覺性，就須要有本事來揭破敵人的底假面具，而向集體農莊莊員指明敵人的底革命真面目。可是，我們在農村中有很多具備這種品質的共產黨員麼？共產黨員往往不僅沒有揭破這種敵人，反而自己落入敵人的底狡詐蠱惑圈套，甘做敵人的底尾巴。

我們有些同志既沒有看穿那已經戴着新假面具的敵人，既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撞騙詭計，就往往這樣來安慰自己，以為世上似乎已沒有富農，以為農村中的反蘇維埃份子已因消滅富農之為階級政策實行的結果

而被剷除，以爲因此就可容許「中立的」集體農莊存在，這種「中立的」集體農莊既不是波爾什維主義的，也不是反蘇維埃的，可是這種集體農莊應當按所謂自然方式而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但這是很深的迷誤，同志們。富農是被打破了，可是遠遠未被澈底剷除乾淨。而且，如果共產黨人將打瞌睡而泰然自安，以爲富農會按所謂自然發展方式跑進墳墓去，那末富農就不會很快就澈底消滅的。至於說到「中立的」集體農莊，那在世人間就根本沒有這種集體農莊，而且不會有這種集體農莊。「中立的」集體農莊是那些空着眼睛而毫無視力者底夢想。在現時我們蘇維埃國家所有這種尖銳階級鬥爭的條件下，「中立的」集體農莊是沒有存在餘地的；在這種環境中，集體農莊只能或是波爾什維主義的，或是反蘇維埃的。而如果某一個集體農莊不是由我們所領導，那就是說這個集體農莊是由反蘇維埃份子所領導的。關於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五）最後，還有一個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原因。這個原因就在於看輕共產黨員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和責任，看輕共產黨員在糧食採辦工作中的作用和責任。說到糧食採辦困難時，共產黨員通常都是把責任推到農民身上，硬說一切都應歸咎於農民。但這是完全不對的，是絕對不公平的。農民是與此毫不相干的。如果說到責任和過咎，那末責任就完完全是落在共產黨員身上，而這裏所有全部過咎也只是由我們共產黨員担負。

在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如我們蘇維埃政權這樣一個強大而富有威信的政權。在世界上沒有而且未曾有如我們共產黨這樣一個強大而富有威信的政黨。誰也沒有阻礙，而且誰也不能阻礙我們按集體農莊底利益，按國家利益底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而我們並不是時時都按列寧主義底要求來進行集體農莊事業，如果我們往往做出許多不可寬恕的粗魯錯誤，譬如說在糧食採辦方面，那末這裏的過咎就是我們的過咎，而且只是我們的過咎。

我們應負其咎的，就是我們沒有看出集體農莊糧食貿易底短處，並犯過一些極其粗魯的錯誤。我們應負其咎的，就是我們有不少組織都會脫離集體農莊生活，却高枕而臥，聽其自然。我們應負其咎的，就是我們有不少同志還在過分估計集體農莊為羣衆組織形式底作用，却不懂得主要點不在於這個形式本身，而是在於要親自担負起集體農莊領導重任，並把反蘇維埃份子從集體農莊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我們應負其咎的，就是我們沒有看破新環境，沒有瞭解那些以暗中拆台手段而行動的階級敵人底新策略。

試問這與農民有何相干呢？

我知道有整批整批集體農莊都在向前發展，日益繁榮，按時確切執行國家所規定的任務，並在經濟方面日趨鞏固。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有些集體農莊，雖與上述集體農莊為隣，雖與上述集體農莊有同樣的收成和同樣的客觀條件，但它們却日見衰弱並趨於腐化。原因何在呢？原來就是因為第一種集體農莊是由真正的共產黨員所領導的，而第二種集體農莊則是由癡獸子所領導的，這些癡獸子雖也帶有黨證，但終究還是癡獸子。

試問這與農民有何相干呢？

由於看輕共產黨員底作用與責任的結果，人們往往就不是到應當尋找的地方去尋找那引起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原因，而缺點也就因此而依然未被剷除。

不是要在農民中間尋找那阻難糧食採辦工作的原因，而是要在我們自己中間，要在我們本身隊伍中間來尋找這個原因。因為我們執掌着政權，我們擁有國家寶具，我們担負有領導集體農莊的使命，於是我們就應當對農村工作負完全責任。

決定我們農村工作缺點的各主要原因，就是如此。

也許有人以為我所描寫的情形未免太糟，以為我們全部農村工作都只由缺點所構成。但這當然是不

對的。其實，我們的農村工作，除有這些缺點而外，還有許多最重大的有決定意義的成績。可是，我開始在此講話時就已經說過，我並不立意來敘述我們的成績，而只來講一講我們在農村工作中的缺點。

這些缺點可以糾正麼？是的，是絕對可以糾正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一定會糾正這些缺點麼？是的，是絕對一定會糾正的。關於這一點，是絲毫不容置疑的。

我認爲：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和蘇維埃農莊政治部，就是我們能藉以在最短期間消滅這些缺點的有決定意義的工具之一。（經久不息的熱烈鼓掌）。

# 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

##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集體農莊男女莊員同志們！我本沒有打算在你們代表大會上來發言。其所以沒有打算，就是因為各位在我以前發言的同志已經把所有要說的話都講過了，而且說得很好，說得中肯。既是如此，那是否還值得出來發言呢？可是因為你們定要我出來說話，而權力又在你們手裏（鼓掌多時），——我就該唯命是聽了。

我現在就關於個別問題說幾句話。

## （二）集體農莊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第一個問題——集體農民所已走上的道路是否正確呢，集體農莊道路是否正確呢？

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毫無意思的問題。你們集體農莊突擊隊員，關於集體農莊是站在正確道路上這一點，想必是不懷疑的。所以，這個問題在你們看來也許是一個多餘的問題。可是，並非個個農民都像你們

這樣想法的。有不少農民，其中也有集體農莊莊員，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底正確性。而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的確，數百年來，大家都過着舊生活，走着舊道路，替富農和地主，替高利貸者和投機者出力生利。雖不可說這條舊道路——資本主義道路——會得到農民贊同。可是，這條舊道路總是一條已經走熟走慣的道路，而且誰也沒有實地證明可以過另外一種生活，過較好的生活。何況在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人們總還過着舊生活呢？而波爾什維克却突然像狂風暴雨一般，衝進這個舊的暗淡無光的生活裏來說道：已經是拋棄舊道路的時候了，已經是開始來過新生活，來過集體農莊生活的時候了，已經是不照現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大家那樣生活，而來過新生活，來過勞動組合生活的時候了。而誰知道這新生活究竟是怎樣一種生活呢。恐怕它比舊生活更壞哩。無論如何，新道路是沒有走慣的道路，是沒有走熟的道路，是還沒有完全熟悉的道路。豈不是以留在舊道路上為妙麼？豈不是以等待一下才進到新道路——集體農莊道路——上去為妙麼？是否值得冒險呢？

這就是現在籠罩着一部分勞動農民的疑問。

我們應當消除這些疑問麼？我們應當揭露這些疑問而指明其毫無價值麼？當然是應當的。

所以，上面所提出的問題是不可叫作毫無意思的問題的。

那末，集體農民所已走上的道路究竟是否正確呢？

有些同志以為我們過渡到新道路，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這種意見是只局部正確的。當然，羣衆的集體農莊建設是在三年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這個過渡底特徵就是富農被擊潰，千百萬貧農中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可是，為要開始這種羣衆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過程，就要具備一些預備條件，否則羣衆集體農莊運動就會根本不可能了。第一，會須要有蘇維埃政權，這蘇維埃政權已經幫助，而且繼續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第二，會須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剝

奪其工廠和土地，並宣佈工廠和土地爲人民公產。第三，會須壓制富農，並剝奪其機器和拖拉機。第四，會須宣佈只有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中農方能享用機器和拖拉機。最後，會須使全國工業化，設立新拖拉機工業，建成新農業機器製造廠，以使用足數拖拉機和機器來供給集體農民。如果沒有具備這些預備條件，那就根本不必想那在三年前開始的羣衆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運動了。

所以，爲要過渡到集體農莊道路，首先就會須實現十月革命，推翻資本家和地主，剝奪其土地和工廠，創立新工業。

向新道路的過渡，向集體農莊道路的過渡，是從十月革命時候起就已開始的。這個過渡所以只在三年前才以新的力量擴大起來，是因爲只到那個時候，十月革命底經濟果實方才完全顯露出來，因爲只有到那個時候，我們才得以推進全國工業化的事業。

在各國人民史上曾有過不少的革命。這些革命和十月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這些革命都是一些片面的革命。對勞動者剝削形式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本身却仍然存在。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陳代謝了，但剝削者和壓迫者本身却仍然存在。只有十月革命才抱定目的要消滅任何剝削制和消滅所有一切種種剝削者和壓迫者。

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却用農奴主來代替了奴隸主，用農奴主對勞動者剝削形式來代替了奴隸主對勞動者剝削形式。這一種剝削者會由別一種剝削者所代替了。在奴隸制度時，「法律」會容許奴隸主打死奴隸。在農奴制度時，「法律」「只」容許農奴主出賣農奴。

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剝削形式廢除了。可是，這革命却用資本家和地主來代替了農奴主，用資本家和地主對勞動者剝削形式來代替了農奴制剝削形式。這一種剝削者是由別一種剝削者所

代替了。在農奴制度時，「法律」曾容許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時，「法律」只容許逼使勞力者陷於失業和貧困，陷於破產和餓死。

只有我們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十月革命，才抱定任務不是用這一種剝削者來代替別一種剝削者，不是用這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別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本剷除任何剝削制，根本剷除一切種種剝削者，一切種種富豪和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或是舊的。（鼓掌多時）。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十月革命是使農民過渡到新道路——集體農莊道路——的預備條件和必要前提。

農民當時幫助十月革命，是否做得正確呢？是的，他們是做得正確的。其所以做得正確，是因為十月革命幫助他們解脫了地主和資本家，高利貸者和富農，商人和投機者。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趕走壓迫者，趕走地主和資本家，壓制富農和投機者，——這當然是很好的。但這還不夠。爲要最後擺脫舊時羈絆，僅僅擊潰剝削者還是不夠的。爲此還須建立新生活，還須建立這樣一種生活，這種生活能給勞動農民以可能改善其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逐日逐年增進其幸福。爲此就須在農村中建立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這就是問題底另一方面。

舊制度與新制度——集體農莊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在舊制度下，農民總是單身做工，用祖傳老方法，用舊式農具做工，替地主和資本家，替富農和投機者做工，替他們生財致富，而自己却一輩子忍飢受餓。而在新制度下，在集體農莊制度下，農民們却是共同做工，按勞動組合方式做工，用新式農具——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做工，大家都是替自己，替自己的集體農莊做工，沒有資本家和地主，沒有富農和投機者而過着生活，他們做工，是爲了逐日改善自己的物質和文化狀況。在舊制度那裏，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是幫助富豪反對勞動農民的。而在新制度這裏，在



集體農莊制度這裏，政府却是工農的，是對助工農反對所有一切種種富豪的。舊制度是引向資本主義的。而新制度則是引向社會主義的。

你們看，這裏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另一條是向資本主義後退的道路。

有人以為有什麼第三條道路可走。有些還不完全相信集體農莊道路是正確道路的動搖同志，特別喜歡拚命援引這條誰都不知道的第三條道路。他們想使我們回到舊制度，回到個體經濟，不過是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已。同時，他們要求我們「只」容許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小資本家，作為我們經濟制度中的合理現象。其實，這並不是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為，什麼是回到個體經濟和恢復富農呢？這就是恢復富農剝削，恢復富農對農民的剝削，給富農以權力。可是，難道可以恢復富農而同時又保持蘇維埃政權麼？不是的，是不可能的。恢復富農，結果就會成立富農政權，取消蘇維埃政權，於是就會成立資產階級政府。而成立資產階級政府，結果就會恢復地主和資本家，恢復資本主義。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二條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請你們問一問農民，——他們是否願意恢復富農剝削，是否願意回到資本主義，是否願意取消蘇維埃政權而恢復地主資本家政權呢？你們只須問一問農民，那你們就會知道大多數勞動農民究竟是把什麼道路當作唯一正確的道路。

所以，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向前走，向上走——走向新制度，即集體農莊制度；或者，是往後走，往下走——走向舊制度，即富農資本家制度。

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勞動農民已拒絕資本主義道路而走上集體農莊建設道路，是做得正確的。

有人說，集體農莊道路是一條正確道路，但這條道路是困難的。這種說法是只局部正確的。當然，在這條道路上是有困難的。優美生活是不可憑空得到的。可是，問題是在於主要困難已經渡過了，而現在你們面前的困難，是甚至於值不得認真說及的。無論如何，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你們面前的困難，與工人們在十年至十五年前所經受的困難比較起來，是好似兒童玩具一樣的。你們各位發言人在這裏發言時，稱贊了列寧、格拉、莫斯科、哈爾科夫、頓巴斯等地的工人。他們說：在他們工人那裏是有各種成績的，而在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這裏所有的成績，却就少得多。我覺得，在你們這些發言人底演說中甚至流露出一些同志態度的羨妒心：如果我們集體農莊莊員也和你們列寧、格拉、莫斯科、頓巴斯和哈爾科夫等地工人一樣有這種成績，那是多麼好啊！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而你們是否知道，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工人是費了多少代價以後才獲得這些成績，是受過多少痛苦以後才達到這些成績呢？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關於一八一八年工人生活情形的事實。當時，往往在整個星期內沒有發給工人一塊麵包，更不必說肉類和其他食品了。當時只要能發給列寧、格拉和莫斯科工人一兩半黑麵包——而且一半還是油渣，——就算最好的日子了。而這種情況不僅繼續了幾個月，不僅繼續了半年，而且繼續到整整兩年之久。可是，工人們曾是忍耐着，而未會灰心喪氣，因為他們知道好時光是會到來的，他們是會達到決斷成績的。而結果怎樣呢，——你們自己看見工人果然沒有想錯哩。你們只須把你們的困難痛苦和工人們所受過的困難痛苦比較一下，那你們就會知道你們的困難痛苦是甚至於值不得認真說及的。

爲要推進集體農莊運動和儘量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首先，爲此就要集體農莊擁有完全有保證的宜於耕種的土地。你們有這種土地麼？是的，有這種

土地。大家知道，一切優良土地都已轉交給集體農莊，而且永遠交歸集體農莊使用了。所以，集體農莊莊員儘可放心耕種並改良這些土地，而不必害怕這些土地會落到別人手裏去。

第二，爲此就要集體農莊莊員能享用拖拉機和機器。你們有這些東西麼？是的，有這些東西。大家知道，我們的拖拉機製造廠和農業機器製造廠，首先而且主要是爲着以一切新式工具供給集體農莊而工作的。

最後，爲此就要政府是用人材和經費來儘量幫助集體農民，而不讓敵對階級餘孽破壞集體農莊的。你們有這樣的政府麼？是的，有這樣的政府。這個政府就叫做工農蘇維埃政府。請你們指給我看，究竟還有那一個國家裏的政府不是幫助地主和資本家，不是幫助富農以及其他富豪，而是幫助勞動農民的呢。在天地間是沒有這樣一個國家的，而且從來也未曾有過這樣一個國家。祇有在我們蘇維埃國家裏才有這樣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是猶如一座大山那樣庇護着工人和集體農民，庇護着城鄉一切勞動者，而反對一切富豪和剝削者的。（鼓掌多時）。

所以，你們是具有一切條件來擴展集體農莊建設和完全擺脫舊時羈絆的。

現在要求於你們的，只有一點——這就是誠懇工作，按勞動來分配集體農莊收入，愛惜集體農莊財產，愛惜拖拉機和機器，仔細照料馬匹，執行你們工農國家所定的計劃，鞏固集體農莊，把混進集體農莊來的富農和富農走狗驅逐出去。

你們大概會與我同意，認爲要克服這些困難，就是說要誠懇工作和愛惜集體農莊財產，是並不如何難作的。何況你們現在又不是替富豪工作，不是替剝削者工作，而是替自己，替自己集體農莊工作哩。

你們由此可見，集體農莊道路，社會主義道路，是對於勞動農民唯一正確的道路。

## (二) 我們最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

### 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爲生活豐裕者

第二個問題——我們在新道路上，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已達到了什麼，以及最近兩三年內又想達到什麼呢？

社會主義是一件好事情。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是一件不容置辯的好事情。可是，所有這些都是將來的事情。現在，主要問題不在於我們將來能達到什麼。主要問題是在於我們現時已達到了什麼。農民已經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了。這是很好的。可是，農民在這條道路上已達到了什麼呢？我們在集體農莊道路上前進時，已達到了什麼具體東西呢？

我們已達到了這一點，就是我們已幫助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集體農莊。我們已達到了這一點，就是千百萬貧農羣衆已因加入集體農莊和在集體農莊裏享用優良土地和優良農具而昇到中農水平了。我們已達到了這一點，就是千百萬從前忍饑挨餓的貧農羣衆，現時已在集體農莊裏成爲中農，成爲生活有保障者了。我們已達到了這一點，就是我們已把農民分化爲貧農富農的過程打破；已把富農粉碎，並幫助貧農成爲集體農莊裏本身勞動主人翁，成爲中農了。

四年以前，在集體農莊建設事業尙未擴展以前，情形會是什麼呢？富農會日益豪富，向上昇進。貧農會日益貧窮破產，遭受富農剝削。中農會想爬上去變成富農，但每一次都滾落下來變成貧農，使富農心悅意樂。不難猜透的，就是在所有這些紊亂情形中佔到便宜的，只有富農，或許還有幾個豐裕農。當時在農村每一百家農戶中，四五家是富農，八家或十家是豐裕農，四十五至五十家中農，以及三十五

家是貧農。所以，受富農盤剝的貧農至少要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三十五。我還不說那些能力單薄的中農，他們是佔中農總數大半數的，他們按其地位說是與貧農很少區別的，也是直接依賴於富農的。

我們既擴展集體農莊建設，於是就已達到了這一點，——消滅了這種紊亂而不公平的現象，打破了富農盤剝，把所有這些貧農羣衆都吸收到集體農莊裏來了，並在集體農莊裏面給了他們以有保障的生活，把他們提到了中農水平，使他們能夠享用集體農莊土地，享受集體農莊所有的優待權，享用拖拉機以及各種農業機器。

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不下二千萬農民，不下二千萬貧農，已擺脫貧困破產痛苦，已擺脫富農盤剝，已因加入集體農莊而變成生活有保障者了。

同志們，這是一個巨大成績。這是這樣一個成績，這個成績是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是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沒有達到過的。

你們看，這就是集體農莊建設事業所達到的實際的具體的結果，這就是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

但這還只是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所達到的第一個步驟，第一個成績。

如果以爲我們應當停留在這第一個步驟上，停留在這第一個成績上，那就不正確了。不呵，同志們，我們不可停留在這個成績上。爲要繼續推進並最終鞏固集體農莊，我們就應實行第二個步驟，就應當達到新成績。這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這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把集體農莊莊員——無論是從前的貧農也好，無論是從前的中農也好——地位提得更高。這第二個步驟就是要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爲生活豐裕者。是的，同志們，要使他們成爲生活豐裕者。（鼓掌多時）。

我們已達到了這一步，就是我們已憑靠集體農莊而把貧農提高到中農水平了。這是很好的。但這還不

夠。我們現在還應當更進一步，要幫助全體集體農莊莊員——無論是從前的貧農也好，無論是從前的中農也好，——昇到生活豐裕者水平。我們可以達到這一步，而且無論如何都應當達到這一步。（鼓掌多時）。我們現在在一切條件來達到我們這個目的。我們的機器和拖拉機現在還使用得不好。我們的土地還耕種得不好。只須改良機器和拖拉機的使用，只須改良土地的耕種，我們就能把我們的收成增加至兩三倍。而這就完全足以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集體農莊田場上的生活豐裕的勞動者。

從前，豐裕農是怎樣呢？當時要成為豐裕農，就須欺侮自己的鄰人，就須剝削他們，賣東西給他們時賣貴些，向他們買東西時買賤些，僱傭一些雇農，極力剝削他們，積累一些本錢，然後一經穩固就可變成富農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從前在個體經濟制度下，豐裕農就引起貧農中農方面的不信任和仇恨。現在情形就不同了。現在條件也不不同了。現在，集體農莊莊員為要成為生活豐裕者，完全不必欺侮或剝削自己的鄰人。而且現在要剝削某一個人也不容易了，因為在我們這裏，土地私有制或租佃制已不存在了，機器和拖拉機概行屬於國家，而擁有資本的人們在集體農莊裏邊已經不時髦了。從前是有過這種時髦的，但它已永逝而不復返了。現在，為要成為豐裕的集體農莊莊員，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要在集體農莊裏誠懇工作，正確利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利用耕作牲畜，正確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財產。

人們有時說：既然有社會主義，何必還要勞動呢？從前勞動，現在又勞動，——難道還沒有到停止勞動的時候麼？這種說法是根本不對的，同志們。這是懶漢底哲學，而不是誠懇工作者底哲學。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否認勞動的。恰巧相反，社會主義正是建築在勞動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和勞動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我們的偉大導師列寧曾說：「不勞動者不得食」。列寧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反對什麼人呢？是反對剝削者，反對不勞而獲的人，即反對那些強迫他人做工而靠剝削他人以致富的人。此外，還反對什麼

人呢？違反對那些好吃懶做，想靠他人來享福的人。社會主義所要求的，並不是好吃懶做，而是大家誠懇勞動，不是替別人去勞動，不是替富豪和剝削者去勞動，而是爲自己，爲社會而勞動。假使我們將誠懇勞動，爲自己，爲自己的集體農莊而誠懇勞動，——那我們在最近兩三年內就一定會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使這些從前的貧農和從前的中農都成爲生活富裕者，成爲享有豐富產品並過着完全文明生活者。

這就是我們最近的任務。我們可以達到這一步，而且無論如何都應當達到這一步。（鼓掌多時）。

### (三) 幾點個別意見

而現在就讓我來說幾點個別意見吧。

首先就要說說我們在農村裏的黨員。在你們當中是有許多黨員的，但非黨員還要更多。參加這次大會的非黨員比黨員更多，——這是很好的，因爲我們正是要首先就吸收非黨員來參加我們的事業。有些共產黨員是用波爾什維克態度來對待非黨員集體農莊莊員的。可是，也有些共產黨員却以自己是黨員而自傲，不許非黨員來和他們接近。這是不好而且有害的。波爾什維克所以有力量，共產黨員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爲他們善於把千百萬非黨員積極份子團結在我們黨週圍。我們波爾什維克如果未能使千百萬非黨員工農羣衆來信任我們黨，那我們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勝利。可是，要怎樣才可做到這一步呢？爲要做到這一步，就要黨員不是與非黨員隔絕；就要黨員不是閉戶幽居；就要黨員不以自己是黨員而自傲，而是傾聽非黨員底呼聲；就要黨員不僅教導非黨員，而且還要向非黨員學習。

不要忘記，黨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記着，所有一切黨員自己都是由非黨員變成黨員的。今

天他是一個非黨員，而到明天他就會成爲黨員。這裏究竟有什麼可以自傲呢？我們老波爾什維克當中許多同志已在黨內做了二三十年的工作。而須知我們自己在過去也有一個時候不是黨員哩。假使在二三十年以前，當時的黨員也鄙視我們而不許我們接近黨，那我們會遇到怎樣的情形呢？我們也許會在黨外多混幾年哩。可是，同志們，我們老波爾什維克並不是一些最不中用的人哩。（聽衆笑容滿面，鼓掌多時）。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有時瞧不起非黨員的現時年輕的黨員，就應當記着所有這些情形，應當記着：使波爾什維克增光的，不是驕傲，而是謙遜。

現在，我要關於婦女，關於集體農莊女莊員說幾句話。同志們，集體農莊裏的婦女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人是輕視婦女，甚至於嘲笑婦女的。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這是一個嚴重錯誤。這裏，問題不僅在於婦女佔居人口半數。問題首先就在於集體農莊運動已提拔出許多出色的能幹的婦女來擔任領導職務。你們只看看這次代表大會，看看代表成份，你們就可以看見婦女早已由落後者升爲先進者了。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一個巨大力量。埋沒這個力量，就等於犯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在集體農莊中提拔婦女前進和運用這個力量。

當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曾與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一個小小的誤會。這就是關於乳牛問題。可是，現在關於乳牛問題已經辦好了，於是這個誤會也就消散了。（長時間的鼓掌）。我們已經使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再過一兩年，就不會再有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沒有自家的乳牛了。無論怎樣，我們波爾什維克總是要努力設法使每個集體農莊莊員都有一條乳牛的。（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說到集體農莊女莊員本身，那她們就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與意義，應當記着她們祇有在集體農莊裏面才有可能與男子平等。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而在集體農莊裏面，就有男女



平權。請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請她們要像愛護瞳珠一樣來愛護集體農莊制度。（長時間的鼓掌）。

現在，我要關於集體農莊裏的男女青年團員講幾句話。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希望。青年將來應當替換我們這些老頭子。青年將來應當把我們的旗幟擡到最終的勝利。在農民當中有不少的老頭子是懷着舊見解，抱着舊習慣，思慕舊生活的。當然，這樣的老頭子不是時常都能跟上黨，跟上蘇維埃政權的。我們的青年就不同了。我們的青年是沒沾染有舊見解的，所以最容易瞭解列寧遺訓。正因為青年最容易瞭解列寧遺訓，所以青年就有引導落後份子前進，引導動搖份子前進的使命。固然，青年還缺乏知識。可是，知識是可以求得的东西。今天沒有知識，明天就會有知識了。因此，任務就在於學習和再三學習列寧主義。男女青年團員同志們！學習波爾什維主義和引導動搖份子前進吧！少講些空話，多做些工作吧，——那時你們的事情就一定會成功的。（鼓掌）。

現在，我要關於個體農民講幾句話。關於個體農民，在這裏說得很少。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已不復存在於人世了。決不是這樣一回事。個體農民還存在着，切不可忽略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明天的集體農莊莊員。我知道有一部分個體農民已經完全墮落而跑去作投機事業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在接收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時，總是加以嚴格挑選，有時甚至於完全不接收他們。這當然是正確而不容有異議的。可是，除此而外，還有其他的更大的個體農民是沒有作投機事業的，而是靠誠懇工作來維持自己的生活的。這些個體農民也許不拒絕加入集體農莊。可是，他們却遇到一些障礙，一則因為他們還懷疑集體農莊道路底正確性，二則因為現在集體農莊莊員中間有一種仇恨個體農民的心理。

當然，要瞭解集體農莊莊員，要諒解他們。他們在近幾年來是受到個體農民方面不少的侮辱和嘲笑

的。可是，侮辱和嘲笑在這裏是不應有決定意義的。一個領導者竟不肯忘掉這種侮辱，却把自己的感情看得比集體農莊事業利益還高，那他就不是一個不好的領導者。如果你們想作領導者，你們就應當忘記個別個體農民所加於你們的侮辱。兩年以前，我接到了一位寡居農婦從窩爾加區寄來的一封信。她對我訴說人家不願意接收她加入集體農莊，並且要我幫助她。我會寫信去問這個集體農莊。該集體農莊給我回信說，他們不能夠接收她加入集體農莊，因為她曾經侮辱過集體農莊大會。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是這樣一回事：在一次農民大會上，集體農莊莊員會號召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這位寡婦聽罷這個號召後，就將自己的裙子掀起來，說道：唯！把集體農莊拿去吧！（全場大笑）。毫無疑義的，這位寡婦會作得不對，而且確實侮辱了大會。可是，如果她經過一年以後已經誠懇悔過和承認錯誤，那是否還可拒絕她加入集體農莊的要求呢？我認為是不可拒絕的。於是我就把這種意見寫給該集體農莊。接着他們就把這位寡婦接收了。結果怎樣呢？原來，她現在在集體農莊裏做工做得很好，不僅沒有落後，而且還站在前列哩。（鼓掌）。

你們從這個例子中又可以看見：身居領導者地位的人們，如果他們想成爲真正的領導者，那他們爲着事業利益計，在必要時就得忘掉他們所受到的侮辱。

關於一般個體農民，也要這樣說。我並不反對經過選擇來接收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可是，我反對那種不分青黃皂白而不許個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辦法。這不是我們波爾什維克的政策。集體農莊莊員不應當忘記，他們自己在不久以前也曾是個體農民哩。

最後：我關於別金·楚·克·區·集·體·農·莊·莊·員·底一封信還要講幾句話。這封信已在報紙上發表過了，你們大概都讀過了。這封信當然是很好的。這封信證明，在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當中已有許多經驗豐富而覺悟程度也高的集體農莊事業組織者和鼓動者，這是我國可以引以自豪的人們。可是，在這封信裏也有一個

不正確的地點，對於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不可同意的。原來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把自己在集體農莊裏的勞動看作平庸的勞動，幾乎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勞動，而同時却把那些往往說得滔滔不斷的演說家和領袖們底勞動看作偉大的勞動，創造性的勞動。可以同意這種意見麼？不呀，同志們，無論如何也不可同意這種意見。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在這裏是犯了錯誤。也許他們是因謙遜而犯了這個錯誤。可是，錯誤並不因此而不成其為錯誤。把領袖看作唯一歷史創造者，而把工人和農民看得一錢不值的時候，早已過去了。現在，民族和國家底命運不只是由領袖來決定，而且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決定的。工人和農民是無聲無響地建設着工廠和製造廠，建設着鑛井和鐵路，建設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創造着一切生活資料，以衣食供給於全世界的，——這就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創造者。我們的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大概把這一點忘記了。誇大本身力量，誇功自傲，這當然是不好的。這就會弄到妄自尊大，而妄自尊大却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小視自己的力量，殊不知自己『平庸的』『不顯著的』勞動在事實上正是偉大的創造性的決定歷史命運的勞動，那就更壞了。

我希望別金楚克區的同志們贊同我對於他們那封信所作的這個小小更正。

同志們，我們就講到這裏為止吧。

（長時間的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向斯大林同志致敬，大呼『烏拉』。會場中高呼：

『斯大林同志萬歲，烏拉！先進的集體農莊員萬歲！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 向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

### 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一) 世界資本主義底延續危機和蘇聯底外部狀況

同志們！自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有三年多了。時期並不很長。可是，這一個時期是比他任何時期都含有更豐富內容的。我認爲，在最近十年以來，再沒有那一個時期含有如此豐富的事變了。

在經濟方面，這幾年份是世界經濟危機延續的年份。這危機不僅普及於整個工業，而且還普及於整個農業。這危機不僅在生產範圍和商業範圍裏洶湧流行了。它並且蔓延到信貸範圍和金融範圍中去，完全推翻各國間原有的信貸關係和金融關係。如果從前在某些地方還有人爭論是否有世界經濟危機；那末現在人們已不來爭論這個問題了，因爲經濟危機及其破壞作用已經是太明顯的事實了。現在所爭論的，已經是另一個問題，——是否有逃出危機的出路呢；如果有出路，那末應當怎樣來實現這條出路呢。

在政治方面，這些年份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關係以及各國內部關係更加尖銳化的年份。日本對華開戰和佔領東三省，就使遠東關係尖銳化；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取得勝利和復仇思想得勝猖獗，就使歐洲關係尖銳化；日德兩國退出國際聯盟，就更推動軍備擴張和帝國主義戰爭準備；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遭受失敗，就再次證明：革命危機正在成熟，而法西斯主義壽命是遠不長久的，——這就是報告期內最重要的事實。無怪乎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已奄奄待斃，而裁軍趨勢則公開和直接由擴充軍備和補充軍備的趨勢所代替。

在這種經濟震動和軍事政治災變的狂風大浪中，蘇聯却好似中流砥柱，巍然獨立，繼續進行其社會主義建設和為維護和平而奮鬥的事業。如果在那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經濟危機仍然在洶湧流行着；那末在蘇聯這裏，却無論是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都繼續高漲着。如果在那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正在瘋狂地準備着為從新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新戰爭；那末蘇聯却繼續為反對戰爭危險和擁護和平而進行着有系統的不屈不撓的鬥爭，而且不可說蘇聯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任何成功哩。

現時國際形勢底概況，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就來看關於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狀況和政治狀況的基本材料。

### (一) 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底動象

現時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和以前一切經濟危機不同的區別之一，就在於這次危機是最長久的最拖延的危機。如果從前的危機只以一兩年為限，那末現時的危機迄今已繼續到第五個年頭，使資本主義各國經濟一年比一年空虛，並把它在往年所積聚起來的脂膏消耗殆盡。無怪乎這次危機是所有一切危機中最沉重的危機。

爲什麼現時工業危機帶有這種空前拖延的性質呢？

首先，就是因爲工業危機已普及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於是就使它們彼此難於玩弄損人利己的手腕。

第二，就是因爲工業危機已與那普及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農業國和半農業國的農業危機互相錯綜着，而這就不能不使工業危機更加複雜和深入。

第三，就是因爲農業危機在這時期中已經加強並已普及於農業一切部門，包括養畜業在內，以至於使整個農業陷於退化，由機器生產退到手工勞動，用馬匹代替拖拉機，以及大大減少人造肥料的採用，有時甚至完全拒絕人造肥料的採用，而這就使工業危機更加拖延。

第四，就是因爲那些在工業中佔居統治地位的壟斷式的卡德爾努力保持高度物價，——這種情況就使經濟危機成爲特別痛苦的危機，並阻礙着存貨消散的事情。

最後，就是因爲——而這是主要點——這次工業危機是爆發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此時，資本主義無論在各基本國家或在各殖民地 and 依賴國裏，都已經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在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前有過的那種力量和堅固性；此時，資本主義各國工業已由帝國主義大戰方面領到這樣一種遺產：企業中的生產能力是經常不能全部利用的，失業人數則多至數千萬，而爲要擺脫這些現象，這工業已經是無能爲力了。這就是使現時工業危機具有深入拖延性質的種種情況。

同是由於這些情況，所以這次經濟危機就不僅以生產範圍和商業範圍爲限，而且已普及於信貸制、幣制以及債務等等範圍，打破各個國家彼此間以及各個國家內部各社會集團間歷來因襲的關係。

在這裏起了巨大作用的，就是物價的跌落。不管那些壟斷性的卡德爾如何反抗，而商品價格總是以自

發力量來日更跌落了，而價格跌得最先和最兇的，總是那些無組織的商品佔有人——農民、手工業者、小資本家——所有的商品，而那些有組織的商品佔有人——加入卡德爾的資本家——出賣商品的價格則跌得比較慢，比較少。物價的跌落就使債務人（工業家，手工業者，農民等等）境遇惡劣不堪，反之，却使債權人境遇空前優越。這種情況會應使許多公司和單個企業主遭受極大破產，而且真正已使它們遭到這種破產。最近三年來，在美德英法等國有成千成萬股份公司都因此而先後破產了。股份公司破產以後，接着就是貨幣跌價，結果就稍許減輕債務人所遭的困難。貨幣跌價以後，接着就有國家法定停付內債外債的事情。如德國達姆司泰銀行和特烈士登銀行，奧國信用機關銀行等銀行，以及如瑞典克萊格爾康采恩，美國殷蘇爾康采恩等康采恩破產的事實，是人所共知的。

不言而喻的，在這些使信貸制基礎動搖的現象發生以後，就會應發生而且果然已發生以下種種現象：停付信貸和外債，停付各協約國間的債務，停止資本輸出，更加縮小對外貿易，更加減少商品出口，加緊爭奪國外市場，各國彼此商業戰爭以及——傾銷政策。是的，同志們，的確是傾銷政策。我所說的，不是歐美高貴國會中某些高貴議員在不久以前還叫得聲嘶力竭的那種臆造的蘇維埃傾銷政策。我所說的，是現在幾乎被一切「文明」國家所實施，而這些勇敢而高貴的議員們却審慎緘默不言的真正傾銷政策。

同樣不言而喻的，這些在生產範圍以外爆發而陪着工業危機到來的破壞性的現象又曾不能不反過來影響工業危機進程，不能不使其更加深入和複雜化。

工業危機底一般動象，就是如此。

以下就是一些從正式統計中引證來說明報告期內工業危機動象的數目字。

工業出產量比較表（以一九二九年出產量爲標準，把一九二九年出產量當作百分之百）：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蘇聯	一〇〇	一二九·七	一六一·九	一八四·七	二〇一·六	
美國	一〇〇	八〇·七	六八·一	五三·八	六四·九	
英國	一〇〇	九二·四	八三·八	八三·八	八六·一	
德國	一〇〇	八八·三	七一·七	五九·八	六六·八	
法國	一〇〇	一〇〇·七	八九·二	六九·一	七七·四	

由此可見，這個統計表是自己說明自己的。

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與一九二九年水平比較起來，是一年比一年低落的，只在一九三三年才開始恢復一些，但遠遠未達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而蘇聯工業在同一時期却處在不斷高漲過程中，一年比一年增加着。

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出產量，到一九三三年末，與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比較起來，平均已減少百分之二十五，或者甚至於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蘇聯工業出產量在同一時期却已增至兩倍多，即增加百分之一百以上。（鼓掌）。



照這個統計表看起來，也許覺得：在這四個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所處的情況是最吉利的。但這是不完全對的。如果把這幾個工業拿來和其戰前水平比較一下，那末情形就稍許有些不同了。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工業出產量比較表（以戰前出產量為標準，把戰前出產量當作百分之百）：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蘇聯	一〇〇	一九四·三	二五二·一	三一四·七	三五九·〇	三九一·九
美國	一〇〇	一七〇·二	一三七·三	一一五·九	九一·四	一一〇·二
英國	一〇〇	九九·一	九一·五	八三·〇	八二·五	八五·二
德國	一〇〇	一一三·〇	九九·八	八一·〇	六七·六	七五·四
法國	一〇〇	一三九·〇	一四〇·〇	一二四·〇	九六·一	一〇七·六

由此可見，英德兩國工業迄今尚未達到戰前水平，而美法兩國却已稍微超過戰前水平；而蘇聯在這個時期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工業出產量，即是比戰前水平增加百分之二百九十以上。（鼓掌）。

可是從這些統計表當中還應得出一個結論。  
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從一九三〇年起，特別是從一九三一年起，會總是降低的，在一九三二

年會達到最低落點；而在一九三三年它却已開始稍許復原和上昇起來。如果拿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各月統計材料來看，那就更能證實這個結論，因為這些統計材料說明，這幾國底工業出產量，雖然在一九三三年是動搖不定的，可是沒有表現出降低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最低落點的趨勢。

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大概已渡過最低落點，它在一九三三年當中已沒有回復到這個最低落點了。

有些人愛說這種現象是完全由於如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的行情一類人造因素的結果。毫無疑義的，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的行情在這裏是起着不小作用的。這對於日本說來是特別對的，因為在日本，這個人造因素是引起某些工業部門——主要是軍事工業部門——稍許活躍的主要的有決定作用的動力。可是，如果用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的行情來解釋一切，那就是一個粗鄙錯誤了。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這至少是因為我在上面所說明過的在工業方面的某些進展不僅在個別區域和偶然區域內可以看見，而且在一切或幾乎一切工業國家——連幣制穩定國也包括在內——都可以看見的。顯然的，除了由準備戰爭和通貨膨脹所造成的行情以外，資本主義內部的經濟力量在這裏也是起着作用的。

資本主義已僥倖把工業困難情形稍許減輕一些，取償於工人——其方法就是以加強工人勞動強度來加深對工人的剝削；取償於法麥爾——其方法就是實行儘量減低他們的勞動產品價格，即減低糧食價格和減低一部分原料品價格的政策；取償於殖民地和經濟薄弱國家裏的農民——其方法就是更加緊減低他們的勞動產品價格，主要是原料價格，其次是糧食價格。

這是不是說，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從危機過渡到普通停滯狀態，而結果會引起新的工業高漲和工業興旺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無論如何，現時還沒有什麼直接材料或間接材料可以證明各資本主義

國家工業高漲行將到來。不僅如此，——根據一切事實來說，這種材料是不會有的，至少在最近將來是不會有的。其所以不會有，就是因為那些不讓資本主義國家工業若干認真向上增長的不利條件還繼續起着作用。這些不利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是繼續着，而經濟危機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環境中發生的；企業生產能力是經常不能完全動用的；大批失業者是經常存在着的；工業危機是與農業危機互相錯綜的；若干認真革新固定資本的趨向是沒有的，而這種革新通常都是工業高漲到來的先聲，以及其他等等。

顯然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從工業最低落點，從工業危機最深點過渡到停滯狀態，但不是過渡到普通停滯狀態，而是過渡到種種停滯狀態，這種停滯狀態不把工業引到新的高漲和興旺，可是也不使工業回復到最低落點。

## (二) 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狀況之尖銳化

拖延性的經濟危機底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各國內部以及彼此間政治狀況空前未有的尖銳化。

爭奪國外市場鬥爭的加強，自由貿易最後一點遺跡的消滅，禁止舶來品的關稅制，商業戰爭，貨幣戰爭，傾銷政策以及其他許多表明經濟政策上極端民族主義的類似辦法，已使各國相互關係極端尖銳化，已給武裝衝突造成基礎，已把戰爭提到日程上作為從新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而使較強國家得利的手段了。

日本對華戰爭和佔領東三省，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和進攻華北，就使形勢更加尖銳化。而爭奪太平洋鬥爭的加強和日美英法海陸軍備的擴張，就是這一尖銳化的結果。

德國退出國際聯盟和復仇威脅，就使歐洲形勢更形尖銳化，使歐洲各國軍備更加增長。

無怪乎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現在簡直是奄奄待斃，而裁軍的廢話就由實行增加軍備和補充軍備的「正經」議論所代替了。

現在又像在一九一四年一樣，黷武的帝國主義黨，戰爭黨和復仇黨，又最出風頭了。新的戰爭顯然已日益逼近。

同是由於這些因素的作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狀況也更加尖銳化。四年來的工業危機已把工人階級弄到精疲力竭和痛苦不堪的地步。四年來的農業危機不僅使各基本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貧苦農民階級完全破產，而特別是使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裏的貧苦農民階級也完全破產了。事實是如此：不管資產階級統計機關如何玩弄狡猾手段來故意減少失業者數目字，而就是根據資產階級機關正式公佈的材料，失業人數，在英國已達三百萬，在德國已達五百萬，在美國已達一千萬，更不必說歐洲其他各國了。如果你們除此而外，還注意到那人數超過千萬的半失業者和無數百萬已經破產的農民羣衆，——那末，你們就會看到勞動羣衆飢寒交迫和痛苦不堪的大概情形了。民衆還沒有達到實行衝擊資本主義的地步，可是衝擊思想已在羣衆意識中成熟着，——關於這一點是未必可以懷疑的。就像這樣的事實即可以很明白證明這一點：西班牙革命已把法西斯制度推翻了；中國蘇維埃區域是正在發展着，而這一發展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革命勢力所不能阻止的。

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極力剷除或取消那能被工人階級利用去反對壓迫者的國會制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最後一點遺跡，把共產黨逼入祕密狀態，並且進而採用公開的恐怖手段來保持自己的專政。

沙文主義和準備戰爭，作爲對外政策底基本因素；在內政方面鎮壓工人階級和實行恐怖手段，作爲鞏固將來戰線後方的必要手段，——這就是現代帝國主義政治家在目前所特別努力從事的事情。

無怪乎法西斯主義現時在黷武資產階級政治家中間已成爲最時髦的貨物。我不僅是指一般法西斯主義而言，而且首先就是指德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而言，而德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號稱爲民族社會主義，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爲那怕就是拿着顯微鏡，在它裏面也找不出一點社會主義影子來呵。

因此，就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替法西斯主義當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須把它看作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這樣一件事實表現，就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舊時的國會制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方法來實行統治，於是它就不得不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力量用和平對外政策來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於是它就不得不採用戰爭的政策。

情形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作爲擺脫現狀出路的新帝國主義戰爭是日益逼近了。

當然，沒有根據來假定說戰爭能給予真正的出路。恰巧相反，戰爭是一定會使現狀更加混亂的。而且戰爭一定會展開革命，並使某幾個資本主義本身存亡，也像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過程中一樣，根本發生問題。而如果資產階級政治家竟不顧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經驗，而終究抓着戰爭如溺人抓着水上稻草救命一樣，那就是說他們已經完全弄糊塗，已經走到懸崖絕境，而甘願跳入無底深淵了。

因此，我們不妨把資產階級政治家現在製造着的那些組織戰爭的計劃簡略考察一下。

第一種人認爲必須組織戰爭來反對某一個強國。他們想把這個強國弄得一敗塗地，並取償於它來補救自己的事情。假定說他們果然組織了這樣的戰爭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人們也曾想消滅一個強國——德國——並想從它身上來得利享福。而由此得到了什麼結果呢？他們並沒有消滅德國，却在德國散播了這樣一種仇恨戰勝國的心理，並爲復仇思想造成了這樣

一種豐富的基礎，以至於他們直到現在還不能把他們自己幹出來的一團糟糕醜事弄清楚，而且大概也不會很快就能弄清楚的。但他們却得到了這樣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在俄國被擊破了，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勝利了，以及——當然的事——蘇聯成立了。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會給他們以比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好些」的結果呢？如果作相反的推測，豈不是比較靠得住些麼？

第二種人認為必須組織戰爭來反對某一個軍力薄弱而市場廣大的國家，例如反對中國，而照他們說來，中國並不能稱為一個真正的國家，而不過是一塊需要強國來佔領的「無組織的地區」。他們顯然是想把中國完全瓜分掉，並取償於它來補救自己的事情。假定說他們果然組織了這樣的戰爭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紀初葉，人們看待意大利和德意志，也完全是和現在人們看待中國一樣的，就是說會把意大利和德意志當作是「無組織的地區」，而不把它們當作國家，並奴役它們。而由此得到了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結果就是德意志和意大利都進行了爭取獨立的戰爭，並把自己統一成為獨立的國家。結果就使這兩國人民更加懷着仇恨奴役者的心理，而其結果是至今還未消滅的，而且大概也不會很快就能消滅的。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戰爭不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呢？

第三種人認為必須由「上等入種」——譬如說日耳曼「入種」——組織戰爭來反對「下等人種」，首先是反對斯拉夫人；他們認為只有這種戰爭才可給予擺脫現狀的出路，因為「上等入種」是具有培植「下等人種」並統治「下等人種」的使命的。假定說這個與科學相隔天壤的奇怪理論果然已變成實際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大家知道，從前古代羅馬帝國看待現代德國人和法國人底祖先，也完全是和現時「上等入種」底代表們看待斯拉夫種族一樣的。大家知道，從前古代羅馬帝國是瞧不起德國人和法國人的，稱他們為「下等人種」、「野蠻人」，認為他們應該永遠屈服於「上等入種」，即「大羅馬帝國」的；而且，——在我們彼此間可以隨便說句話，——古代羅馬帝國當時這樣做還有一些理由，而現時「上

等人種」底代表們却就不然了。（掌聲如雷）。而由此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就是非羅馬人，即一切「野蠻人」，都統一起來反對共同敵人，並轟轟烈烈地把羅馬帝國推翻了。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現時「上等人種」代表們底野心不會遇到同樣傷心的結果呢？試問有什麼東西能担保柏林那些法西斯文墨政治家會比羅馬帝國老資格的富有經驗的征服者更幸運些呢？如果作相反的推測，豈不是比較靠得住些麼？

最後，第四種人認為必須組織戰爭來反對蘇聯。他們想擊潰蘇聯，想瓜分它的領土，想取償於它來發財享福。如果以為只有日本某些軍閥武人這樣想，那就錯誤了。我們知道，在歐洲某些國家政治領導者中間也擬製着這樣的計劃。假定說這班老爺們果然已由言論而進到實際行動吧。由此就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毫無疑義的，這次戰爭將是對於資產階級最危險的戰爭。它所以是最危險的戰爭，不僅是因為蘇聯各民族人民將為革命勝利品而拚命作戰。它所以是對於資產階級最危險的戰爭，還因為這次戰爭將不僅在前線上進行，而且還會在敵人後方進行。資產階級可以相信，蘇聯工人階級在歐洲各國的數千百萬朋友們，是一定會努力從後方來打擊本國那些挑起反對世界工人階級祖國的萬惡戰爭的壓迫者們的。如果在這樣一個戰爭開始以後第一天，資產階級老爺們就會失去幾個與他們親近而現在「叨蒙上帝保佑」平安統治着的政府，那就請他們不要來埋怨我們吧。（掌聲如雷）。這樣的反蘇聯戰爭已經有過一次了，你們可記得這是在十五年以前的事情。大家知道，人人尊敬的邱吉爾當時曾把這次戰爭歸結為一個富有詩意的句子：「十四國聯軍的征討」。你們當然記得，這次戰爭曾把我國全體勞動者團結為一個共同挺胸抵禦外寇而保衛自己農祖國的奮勇戰士的軍營。這次戰爭結局如何，是你們知道的。其結局是把武裝干涉者從我國境內趕走了，並在歐洲成立了許多革命「行動委員會」。毫無疑義的，第二次反蘇聯戰爭，結果是會使侵略者完全失敗，使歐亞某些國家爆發革命，並使這幾個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完全潰滅的。

頭腦昏迷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們底軍事計劃，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他們原來既無特別智慧，又無特別勇氣呵。（鼓掌）。

可是，如果資產階級選定戰爭道路，那末資本主義各國被四年危機和失業陷入痛苦不堪情況的工人階級却走上革命道路了。這就是說，革命危機是在成熟着，而且將會更加成熟起來。而資產階級愈是昏迷於其軍事勾當，愈是時常採用恐怖鬥爭方法來反對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則革命危機也將愈加迅速增長起來。

有些同志認為：既然有革命危機，則資產階級就應滾入沒有出路的位置，於是資產階級底死期已經預定，革命勝利已因此而有保證，他們只須等待資產階級覆亡和起草勝利決議就夠了。這是一個深刻的錯誤。革命勝利是無論何時也不會自動到來的。它是須要加以準備和奪取的。而能準備和奪取它的，却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有時候，革命形勢是有了，資產階級政權是根本動搖了，而革命勝利却終究不到來，這是因為還沒有其力量和威信均足以領導羣衆和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如果以為不能有這樣的「變故」，那就不合理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憶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革命危機所說的正理名言：

「我們現在已說到革命危機是我們革命行動基礎的問題。而在這裏首先就須指出兩種流行錯誤。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接着英國人雅緻字眼而把這個危機描寫爲簡單的「麻煩事」。另一方面，革命家有時力圖證明，說危機是絕對沒有出路的。這是一個錯誤。絕對沒有出路的狀況是不會有的。資產階級底行爲好似那瘋狂的昏頭昏腦的野獸一樣，接連不斷地幹着蠢事情，使狀況尖銳化，加速自己的滅亡。所有這些都是事實。可是不能「證明」，說它絕對沒有什麼可能去用某種細小讓步來麻醉某一小部分被剝削者，說它絕對沒有什麼可能去鎮壓某部分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底某種



運動或武裝起義。企圖事先「證明」「絕對」沒有出路，那就是空洞的學究主義，或者就是玩弄概念和玩弄字眼。在這個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上，只有實踐纔能成爲真正的「證據」。全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制度都遭遇着極大的革命危機。現在必須用革命黨底實踐來「證明」：這些革命黨具有充分的覺悟性、組織性、與剝削羣衆的聯繫、堅決性、智能，以利用這個危機來進行順利的革命，進行勝利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〇至三四一頁）。

### (三)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

不難瞭解：在這個戰雲密佈的險惡環境中，蘇聯會是很難實行其和平政策的。

在這種戰前狂熱已普及許多國家的環境中，蘇聯在這幾年來却繼續堅決而毫不動搖地站在自己的和平立場上，爲反對戰爭危險而奮鬥，爲維護和平而奮鬥，歡迎那些在某種程度內主張維護和平的國家，揭露並撕破那些準備戰爭和挑撥戰爭者底假面具。

蘇聯在這個困難而複雜的維護和平的鬥爭中曾指靠於什麼呢？

- (1) 曾指靠於自己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
- (2) 曾指靠於世界各國切身需要維護和平的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底精神援助。
- (3) 曾指靠於那些由於某種動機而不願破壞和平並想與蘇聯這樣一個守信主顧發展通商關係的國家底審慎態度。

(4) 曾指靠於我們決意抵禦外侮而保衛國家的光榮的軍隊。

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我們爲與各鄰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和侵略國定義公約而進行的運動。你們

知道，這個運動是有成功的。大家知道，我們不僅和我們西方和南方大多數隣國——其中包括芬蘭和波蘭——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而且還和法意這樣的國家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至於說到侵略國定義公約，那末我們也和這些鄰國——其中還包括小協約國——締結了。

同樣也是在這個基礎上，就鞏固了蘇聯與土耳其間的友善關係，就改善了蘇聯與意大利間的關係而成為確能令人滿意的關係，就改善了我們與法國、與波蘭以及與波羅的海沿岸諸國的關係，就恢復了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我們與中國等等的關係。

在反映蘇聯和平政策成功的種種事實當中，應特別指出兩件確有嚴重意義的事實。

我所指的，第一，就是在蘇波關係，蘇法關係中，近來已發生好轉。大家知道，從前我國與波蘭的關係是不大好的。在波蘭，曾有人殺害我國代表。波蘭曾以西方各國反對蘇聯的壁壘自居。所有一切種種帝國主義者都曾指靠波蘭為武裝侵犯蘇聯時的前鋒。當時，蘇法關係也並不比較好些。只須回憶在莫斯科審判拉姆靖暗害份子集團時的一些事實，就可以想見當時蘇法關係如何了。而這種不良關係現已開始漸漸消失。這種不良關係現正由別種關係所代替，而這別種關係是只可叫作彼此接近的關係的。問題不僅在於我們已和這些國家訂立了互不侵犯公約，雖然公約本身是有極嚴重意義的。問題首先是在於彼此互相猜疑的空氣現已開始消散。這當然不是說可以把這種已開始的接近進程看作是充分穩固而能保證事業最後成功的現象。政策上的意外事端和曲折變化，——例如在反蘇聯情緒還厲害的波蘭，——還是遠非絕無可能的。可是，我們相互關係中的好轉——不管其將來結果如何——總算是事實，而這件事實是值得我們將它當作改善和平事業的因素而特別指出並推到前列的。

這個好轉原因何在呢，它是由什麼所促成呢？

首先就是由於蘇聯力量和威勢的增長。

在現今時代，照例是不顧及弱者而只顧及強者的。而其次，是由於德國政策中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是反映德國方面復仇思想和帝國主義傾向增長的。

有些德國政治家一提到這個問題時，就說蘇聯現在是以指靠於法波兩國為方針的，說蘇聯已由反對凡爾賽條約者變為擁護凡爾賽條約者，說這種變化是由於在德國建立了法西斯制度。這是不對的。當然，我們是遠不因德國有法西斯制度而歡喜的。可是，這裏問題不在於法西斯主義，這從以下一件事實中就可看出：例如意大利雖也是由法西斯主義統治着，但這却沒有妨礙蘇聯去與意大利建立最好的關係。問題也不在於我們對於凡爾賽條約的態度已發生如人們所臆想的那種改變。受過布列斯特和約恥辱的我們，那裏會讚美凡爾賽條約呢。我們所不同意的，不過是那種藉口於這一個條約而把全世界捲入新戰爭漩渦的事情。關於人們所臆想的蘇聯改變方針，也要這樣說。我們未曾有指靠於德國的方針，也好像我們現在沒有指靠於法波的方針一樣。無論在過去或現時，我們都是以指靠於蘇聯自己，而且只是以指靠於蘇聯自己為方針的。（熱烈鼓掌）。而如果蘇聯利益要求我們去和某些不願破壞和平的國家接近，那我們就毫無猶豫地去和這些國家接近。

不是的，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德國政策的變更。問題是在於還在現今德國政治家上台執政以前，尤其是在他們上台執政以後，在德國就開始了兩條政治路線間的鬥爭，舊政策與「新」政策間的鬥爭；舊政策是表現在蘇德兩國所訂立的著名條約上；而「新」政策在大體上却與那曾有一個時候佔領過烏克蘭，實行進攻列寧格拉，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變為這進攻根據地的過去德皇政策相彷彿，而且「新」政策顯然是比舊政策佔着上風的。擁護「新」政策的人們在各方面都佔優勢，而主張舊政策的人們却處在怨望地位中，——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顧恆伯爾格在倫敦所發表的著名言論也不是偶然的；德國當權黨對外政策領導者羅森伯爾格所發表的同樣著名的言論也不是偶然的。問題就在這裏，同志們。

第二，我所指的，就是蘇美兩國正常關係的恢復。毫無疑義的，這一舉動是在整個國際關係方面都有最重大意義的。問題不僅在於這一舉動提高保持和平事業的機會，改善兩國間的關係，鞏固兩國間的商業聯系，並造成彼此合作底基礎。問題是在於這一舉動劃清了新舊兩時期的界線：在舊時期中，在各國是把美國當作一切反蘇聯趨勢的支柱的；而在新時期中，這個支柱却已自願拆去以適應兩國雙方利益了。

反映蘇聯和平政策成功的兩個基本事實，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以為我們在報告期內一切都順遂，那就不正確了。不是的，我們是遠非一切都順遂的。你們只要記起英國所採取的壓制手段，為禁止蘇聯輸出品而頒布的禁令，以及企圖干涉我國內政並藉此來試探我國抵抗力的事實吧。固然，這個企圖是完全沒有結果的，而禁令後來也取消了，但這種襲擊行動所留下來的惡果，是至今還在一切有關蘇英關係的事情中——包括兩國商務條約談判在內——都令人感覺到的。而這種反蘇聯的襲擊行動是不可算作偶然事情的。大家知道，一部分英國保守黨人是除非進行這種襲擊就不能過活的。而正因為這些襲擊行動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們應當計算到：人們今後也將實行襲擊蘇聯，造成種種威脅，給予它以損害等等的。

同時也不可注意到蘇日兩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須大大改善的。日本拒絕締結互不侵犯公約——而日本需要這一公約的程度，是不少於蘇聯的，——就是再次着重指明：在我們兩國關係方面是並非一切都順遂的。關於中東路問題談判的停頓，——而這種停頓是不能歸咎於蘇聯的，——以及關於日本辦事人員在中東路方面幹出不可容許的事情，非法拘捕中東路方面的蘇聯職員等等，也要這樣說。況且，日本有一部分軍人在另一部分軍人顯然贊同下，在刊物上公開鼓吹要和蘇聯開戰並要奪取沿海州，而日本政府却假裝與此無關而不去約束這些挑戰份子。顯而易見：這種情況是不能不造成一種令人焦慮不安的空氣的。當然，我們今後也將斷然進行和平政策並力謀改善我國與日本間的關係，因為我們是願意改善這

種關係的。但這裏並不是一切都依我們爲轉移的。因此，我們同時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來保障我國能免除意外的事端，並準備着保衛我國而打退外來的侵犯。（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除我們和平政策有種種成功而外，我們還有一些不良的現象。

蘇聯底外部狀況，就是如此。

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很明顯的。它是維護和平並增進我們與各國商務關係的政策。蘇聯是不想威脅任何人，尤其是不想侵犯任何人的。我們是主張和平並堅持和平事業的。可是，我們不害怕他人底威脅，却準備着以打擊去回答挑戰者底打擊。（熱烈鼓掌）。誰願意和平並力謀與我們發生業務聯繫，誰就總會得到我們方面的贊助。而那些擅敢侵犯我國的人們却總會遇到致命的回擊，使得他們以後再也不敢把自己的豬鼻嘴伸到我們蘇維埃的菜園子裏來。（掌聲如雷）。

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是如此。（掌聲如雷）。

任務就在於今後也十分堅決一貫實行這個政策。

## （二）蘇聯國民經濟之繼續高漲和內部狀況

我現在來講蘇聯內部狀況問題。

從蘇聯內部狀況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無論在國民經濟方面或在文化方面的高漲都日加強的時期。這個高漲，不只是單純的數量上的力量積累。這個高漲特別顯著的地方，就是它使蘇聯結構發生了原則上的變更，使蘇聯全國面目根本改變了。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根本改變樣子了，它已經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的面貌。它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已由具有個體小規模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具有集體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的國家。它已由黑暗無知的不識字的不文化的國家變成了——更確切一點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文化的國家，到處都遍設有應用蘇聯各民族語言的高級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

創立了許多新的生產部門：機架製造業、汽車工業、拖拉機工業、化學工業、發動機製造業、飛機製造業、康拜因機製造業、巨型渦輪機和發電器製造業、上等鋼製造業、化合鐵製造業、人造橡皮製造業、淡氣製造業、人造纖維製造業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鼓掌多時）。

在這時期內已建成和動工經營的，有幾千個新的完全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已建成如德涅泊爾電站、馬格尼托斯聯合廠、庫茲涅茨聯合廠、齊略賓聯合廠、波布里可夫聯合廠、烏拉爾機器聯合廠、克拉姆托爾機器聯合廠等巨型企業。幾千個舊企業已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了。在蘇聯各民族共和國和各邊境區域，如在別洛羅西亞、烏克蘭、北高加索、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卡查赫斯坦、布略特蒙古、韃靼里亞、巴什基里亞、烏拉爾、東西伯利亞、西西伯利亞、遠東邊疆及其他等等地方，建成了許多新企業和創立了許多工業根據地。

成立了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和五千多個蘇維埃農莊，並為它們設有了新的區域中心和工業地點。

居民衆多的新的巨大城市已在幾乎荒野的地帶生長出來。而舊的城市和工業地點也大大擴展了。

將庫茲涅茨、焦煤與烏拉爾鐵礦連接起來經營的烏拉爾、庫茲涅茨聯合廠基礎，已經奠定。於是，東方的新冶金業根據地，可說已由理想變成事實了。

在烏拉爾山脈西南斜面區，就是說在烏拉爾省、巴什基里亞、卡查赫斯坦一帶的新的強大的煤油根據地基礎，已經奠定了。

顯然的，國家在報告期內投入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共達六百餘萬萬盧布的鉅大資金，並沒有白費掉，而

是已開始給予自己的果實。

由於這些成績的結果，蘇聯底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二百九十萬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而在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國民收入在同一時期却已大大降低了。

當然，這一切成績與這全部高漲，都會應使——而且果然已使——蘇聯內部狀況更加鞏固起來。

爲什麼這些巨大變化竟能於區區三四年以內就在一個技術落後的文化落後的廣大國家境內發生呢？

這不是一件怪事麼？如果這個發展是在資本主義和個體小經濟基礎上發生的，那就會是怪事。可是，如果注意到我國這個發展是在擴展社會主義建設基礎上發生的，那就不可叫做怪事了。

當然，這個偉大高漲只有在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只有在數千萬人們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勝於資本主義和個體農民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方能開展起來。

因此，無怪乎蘇聯在報告期內的偉大經濟文化高漲同時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份子和把個體農民經濟排擠到後面去。事實是如此：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比重現時在工業方面佔百分之九十九，而在農業方面，如果拿穀物播種面積來說，則已佔百分之八十四點五，至於個體農民經濟底比重却總共只佔百分之十五點五。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經濟在蘇聯已被消滅，而個體農民經濟在農村中則已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

列寧在着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曾說在我國有五種社會經濟結構成份：（一）宗法經濟（多半是自給經濟），（二）小商品生產（出賣糧食的農民中的大多數），（三）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列寧認爲：在這五種經濟結構中，結果應由社會主義結構佔統治地位。我們現在可以說：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結構已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結構已被排擠到次等地位了，而第五種社會經濟結構——社會主義結構——則已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而唯一無二的指揮勢力了。（熱烈鼓掌多時）。

總結就是如此。  
這個總結就是蘇聯內部狀況穩固基礎，就是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前方陣地和後方陣地強固基礎。

我們現在就來看蘇聯經濟政治狀況個別問題的具體材料吧。

### (一) 工業之高漲

在我們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發展最快的部門就是工業。在報告期內，就是說從一九三〇年起，我國工業已增至兩倍有餘，即增長百分之一百零一點六，而如果與戰前水平相比，那它就幾乎增至四倍，即增長百分之二百九十一點九。

這就是說，我國工業化是進行得非常迅速的。

由於工業化迅速增長的結果，工業產量在全國國民經濟總產量中已佔首要地位了。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工業在國民經濟總產量中所佔百分比重表（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一九三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 工業（小工業除外）	四二·一	五四·五	六一·六	六六·七	七〇·七	七〇·四
(二) 農業	五七·九	四五·五	三八·四	三三·三	二九·三	二九·六
總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這就是說，我們國家已堅固地最終地變成工業國家了。  
 在工業化事業方面有決定意義的，就是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製造業在整個工業發展總和中的比重的增長。  
 報告期內的統計材料，指明這一項底比重已在整個工業總和中佔居主要的地位。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大工業兩種基本部門產量比重表（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全部大工業		總產量（以十萬萬盧布為單位）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其「甲」種	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	一一·〇	二七·五	三三·九	三八·五	四一·九
中「乙」種	消費品	一〇·二	一四·五	一八·八	二二·〇	二四·三
比重		一〇·八	一三·〇	一五·一	一六·五	一七·六
		（百分率）				
其「甲」種	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	四八·五	五二·六	五五·四	五七·〇	五八·〇
中「乙」種	消費品	五一·五	四七·四	四四·六	四三·〇	四二·〇
總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由此可見，這統計表是無須解釋的。

在我們這個技術還幼稚的國家裏，工業是負有特別任務的。它不僅應當用新技術來改造自己，不僅應當改造各個工業部門，連輕工業、食品工業、林木工業也包括在內。它還應當改造各種運輸業和一切

農業部門。可是，只有當機器製造業——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底基本槓桿——在它中間佔居主要地位時，它才能完成這一個任務。報告期內的統計材料，正是指明我國機器製造業已在我國整個工業總和中取得引導的作用了。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個別工業部門比重表（以各部門對工業總產量的百分比為標準）：

	全 蘇 聯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石煤業	二·九	二·一	一·七	二·〇
焦煤業	〇·八	〇·四	〇·五	〇·六
煤油開採業	一·九	一·八	一·五	一·四
煤油製造業	二·三	二·五	二·九	二·六
黑色金屬冶鑄業	未詳	四·五	三·七	四·〇
有色金屬冶鑄業	未詳	一·五	一·三	一·二
機器製造業	一·〇	一四·八	二五·〇	二六·一
基本化學業	〇·八	〇·六	〇·八	〇·九
棉織業	一八·三	一五·二	七·六	七·三
毛織業	三·一	三·一	一·九	一·八

這就是說，我們工業是在健全的基礎上發展着，而改造事業底關鍵——機器製造業——是完全操於我

們掌握的。只是必須善於利用它，合理地利用它。

報告期內工業發展情形，按各社會部份來說，是很值得注意的。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大工業總產量按各社會部份的分佈情形（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全部產量		其		中		全部產量		其		中	
(一)公有工業		(甲)國營工業		(乙)合作工業		(一)公有工業		(甲)國營工業		(乙)合作工業	
(二)私人工業		中		其		(二)私人工業		中		其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二一〇二五	二七四七七	三三九〇三	三八四六四	四一九六八	二〇八九一	二七四〇二	未詳	三八四三六	四一九四〇	一九一四三	二四九八九
一七四八	二四一三	未詳	二八四九	三〇〇八	一三九	七五	未詳	二八	二八	一七四	七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〇・六	〇・三	未詳	〇・七	〇・七	〇・六	〇・三
九九・四	九九・七	未詳	九九・九三	九九・九三	八・三	八・八	未詳	七・四一	七・一七	九一・一	九〇・九
九二・一	九〇・九	未詳	九二・五二	九二・七六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總產量（以百萬盧布為單位）

百分率

從這個統計表中就可以看出：工業裏的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消滅，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現在已是我國工業裏唯一的獨佔的體系了。（鼓掌）。

可是，工業在報告期內所獲得的一切成績中的最重要的成績却是下述的事實：工業在這時間內已造就和鍛鍊出成千成萬的新人材和新工業領導者，大批大批的新工程師和技師，以及幾十萬青年熟練工人，他們已精通新技術並推進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毫無疑義的，如果沒有這些人材，那工業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偉大而且足以引以自豪的成功。統計材料指明：在報告期內，工業從工廠藝徒學校裏調入生產的較熟練的工人約有八十萬，而從高等專門學校、大學及中等技術學校調入生產的工程技術人員則有十八萬餘人。如果說幹部問題是我國發展中的最大問題是對的，那就應當承認我們工業已開始切實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工業底基本成績，就是如此。

可是，如果以為我們工業只是有成績，那就不對了。不是的，它是也有其缺點的。其中主要缺點如下：

- (1) 黑色金屬冶鑄業依然落後；
- (2) 有色金屬冶鑄業還沒有整理就緒；
- (3) 沒有充分估計到發展地方煤礦開採事業（如莫斯科附近區域，高加索，烏拉爾，卡拉甘達，中亞細亞，西伯利亞，遠東，北方邊疆等等）對於全國燃料出產總量有極重大意義；
- (4) 沒有充分注意到在烏拉爾、巴什基里亞、恩巴等區建立新煤油根據地問題；
- (5) 沒有認真關注於擴充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以及林木工業方面的日用品生產事業；

(6) 沒有充分注意到擴展地方工業問題；

(7) 以完全不容許的態度對待改善產品質量問題；

(8) 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費、施行經濟核算制方面，工作仍然落後；

(9) 勞動和工資制組織不好的現象，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現象，還沒有剷除；

(10) 在各經濟人民委員部及其機關中——其中也包括輕工業人民委員部和食品工業人民委員部——，官僚形式辦公主義的領導方法，遠遠未消滅。

凡此種種缺點是絕對須要趕快剷除的——，這未必還要解釋。大家知道，黑色金屬冶鑄業與有色金屬冶鑄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是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的。它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內也沒有完成自己的計劃。如果它們今後還是繼續落後，那它們就會成爲妨礙工業發展的障礙物和引起工業虧空的原因。至於說到建立石煤業和煤油業新根據地問題，那就不難瞭解：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刻不容緩的任務，那我們就會使無論是工業或運輸業都陷於擱淺。關於日用品和發展地方工業的問題以及關於改良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費和施行經濟核算制等問題，也是無庸解釋的。至於說到勞動和工資組織得不良以及官僚形式辦公主義領導方法，那末頓巴斯方面的故事以及輕工業和食品工業企業方面的故事都已表明：這個危險病症是在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流行着，並妨礙着它們發展的。如果這個病症將不被剷除，那末工業就會寸步難行。

當前的任務：

(1) 保持機器製造業現時在整個工業體系中的引導作用。

(2) 剷除黑色金屬冶鑄業底落後情形。

(3) 整理有色金屬冶鑄業。

(4) 盡量擴展在所有一切已有名的產煤區裏的地方煤礦開採事業；建立新的採煤區（例如在遠東的布萊區），並把庫茲巴斯變成頓巴斯第二。（鼓掌多時）。

(5) 在烏拉爾山脈西南斜面各區認真着手創立煤油根據地。

(6) 在所有各經濟人民委員部企業中擴展日用物品的生產。

(7) 發展地方蘇維埃工業，使其能積極從事於日用商品的製造，並給以原料的和經費的可能幫助。

(8) 改良所產商品底質量，停止出產不完備的產品；不顧情面地懲罰那一切違背或迴避蘇維埃政權關於出產美質和完備產品的法律的同志。

(9) 有系統地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費和施行經濟核算制。

(10) 澈底剷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制現象。

(11) 消滅在各經濟人民委員部一切環節中的官僚形式辦公主義的領導方法，有系統地審查各下級機關執行各中央領導機關決議和指示的情形。

## (二) 農業之高漲

農業方面的發展情形，會稍有不同。農業基本部門在報告期內高漲速度雖比工業遲慢許多倍，但總比個體經濟佔主要地位時快些。而在養畜業方面，我們甚至曾有相反的過程，——牲畜數量減少，而只

在一九三三年，並且只在養豬一業方面，才表現出一些向上高漲的徵象。

農業高漲速度的遲慢，牲畜增長方面的比較長期的低落，顯然會是不不可避免地由以下各因素所預決了的，這些因素就是：把散漫細小農戶合併爲集體農莊是很困難的；要在幾乎荒野地帶創立許多大規模穀物農莊和養畜農場，是一件困難事情；而且一般說來，改造個體農業和把個體農業轉上新的集體農莊的軌道的改組時期，是要花費許多時間與大批成本的。

按實質說來，報告時期與其說是農業迅速高漲和飛快進展的時期，不如說是造成前提以保證在最近將來能有如此高漲和如此進展的時期。

如果拿一切農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來看，然後特別是拿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來看，那末報告期內農業發展情形就如下表。

蘇聯全國所有一切農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

(以百萬海克脫爲單位)

全部播種面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其	(甲) 穀物	一〇五·〇	一一八·〇	一二七·二	一三六·三	一三四·四	一二九·七
	乙) 技術作物	九四·四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丙) 菜蔬瓜類	三·八	七·六	八·〇	九·一	九·二	八·六
中	(丁) 飼料	二·一	五·〇	六·五	八·八	一〇·六	七·三

蘇聯全國技術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

(以百萬海克脫為單位)

棉花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長桿亞麻	〇·六九	一·〇六	一·五八	二·一四	二·一七	二·〇五
糖蘿蔔	一·〇二	一·六三	一·七五	二·三九	二·五一	二·四〇
油類作物	二·〇〇	五·二〇	五·二二	七·五五	七·九八	五·七九

這兩個統計表是反映着農業中的兩條基本路線：

(一) 第一條路線就是在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時期，當成萬集體農莊接連創立起來的時候，當這些集體農莊把富農驅逐於土地以外，奪取已被解放的土地，並將其抓到自己手裏的時候，——在這時候竭力擴大播種面積；

(二) 另一條路線就是拒絕那籠統擴大播種面積的辦法，却由籠統擴大播種面積轉而改良耕種工作，採用正確輪流播種和預耕制，並提高收成額，而且如有實際必要時，且暫時縮小現有播種面積。

大家知道，第二條路線——農業中的唯一正確路線——是在一九三二年宣佈實行的，當時農業改組時期快要完結，而提高收成率問題已成為使農業高漲的基本問題之一。

可是，關於播種面積增加情形的統計還不完全足以表明農業發展情形。有時候，播種面積是增加着，而出產量却不增加，或者甚至於降低了，這是因為耕種工作變壞，每畝面積收成率降低之故。因此，除關於播種面積的統計而外，還必須看看關於總產量的統計。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總產量統計表：

	(以百萬公擔為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穀類作物	八〇一·〇	七一七·四	八三五·四	六九四·八	六九八·七	八九八·〇
生棉花	七·四	八·六	一一·一	一二·九	一二·七	一三·二
亞麻纖維	三·三	三·六	四·四	五·五	五·〇	五·六
糖蘿蔔	一〇九·〇	六二·五	一四〇·二	一二〇·五	六五·六	九〇·〇
油類作物	二一·五	三五·八	三六·二	五一·〇	四五·五	四六·〇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農業改組工作最熾烈的年份——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曾是穀物產量最縮減的年份。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因為在麻棉產區裏，農業改組工作速度較慢，所以麻棉出產會幾乎完全沒有受到損失，而是比較平整地和一往直前地向上高漲，並保存其高度發展水平。

第三，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油類作物只受到少許波折，與戰前水平比較起來，會仍然保持其高度發展水平；而糖蘿蔔種植業却不是如此，因為在糖蘿蔔產區裏農業改組工作速度最高，而且進入改組時期最晚，所以在農業改組最後一年，即一九三二年，糖蘿蔔會遭受最大低落，把出產量降到戰前水平以下。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完結後第一年，是穀類作物和技術作物發展過程中的轉變的一年。

這就是說，首先是穀類作物，其次是技術作物，從今以後將腳踏實地和勇往直前地洶湧高漲起來。

在改組時期最受到痛苦的，就是農業中的養畜部門。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所有牲畜數量統計表：

		(以百萬頭為單位)					
(甲) 馬		一九一六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乙) 牛		三五·一	三四·〇	三〇·二	二六·二	一九·六	一六·六
(丙) 綿羊和山羊		五八·九	六八·一	五二·五	四七·九	四〇·七	三八·六
(丁) 豬		一一五·二	一四七·二	一〇八·八	七七·七	五二·一	五〇·六
		二〇·三	二〇·九	一三·六	一四·四	一一·六	一二·二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牲畜數量在報告期內不僅沒有增加，反而繼續低於戰前水平。顯然的，一方面，農業各養畜部門曾最含有大富農份子，另一方面，富農曾在改組年份乘機加緊煽惑農民大殺牲口的事實，是在這個統計表內反映出來了的。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從改組第一年起（一九三〇年），牲畜數量就已開始減少，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並且減少程度在頭三年最大，而在一九三三年，即改組時期終結後第一年，當穀類作物已向上高漲時，牲畜數量減少率就縮到最低限度了。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在養豬業方面已開始了相反的過程，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表現出逕直高漲底徵象。

這就是說，一九三四年應當而且能夠成爲使整個養畜業轉變於向上高漲的一年。

我國農戶集體化在報告期內是怎樣發展了的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集體化統計表：

集體農莊數目(以千為單位)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集體農莊內農戶數目(以百萬為單位)	五七〇	八五·九	二二一·一	二二一·〇五	二二四·五
農戶集體化百分數	一·〇	六·〇	一三·〇	一四·九	一五·二
	三·九	二二·六	五二·七	六一·五	六五·〇

而按各部份來說，穀物播種面積變動情形又是怎樣呢？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穀物播種面積按各部份的分佈情形統計表：

部份類別	(穀物播種面積以百萬海克脫為單位)					各部份在一九三三年播種面積總數中所佔的百分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蘇維埃農莊	一·五	二·九	八·一	九·三	一〇·八	一〇·六
(二)集體農莊	三·四	二九·七	六一·〇	六九·一	七五·〇	七三·九
(三)個體農民	九一·一	六九·二	三五·三	二一·三	一五·七	一五·五
全蘇勝穀物播種面積	九六·〇	一〇一·八	一〇四·四	九九·七	一〇一·五	一〇〇·〇

這些統計表是說明什麼呢？

這些統計表就是說明：農業改組時期，即集體農莊及其莊員數目洶湧增長的時期，已告結束，而且還

在一九三二年時就已告結束了。

所以，集體化今後的過程就是由集體農莊來漸漸吸收和重新教育個體農戶殘餘的過程。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經最終地和永遠地勝利了。（熱烈鼓掌多時）。

其次，這些統計表是說明：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總共已佔有蘇聯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八十四點五。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總和起來已成為能決定整個農業及其所有各部門命運的力量。

其次，這些統計表就是說明：已加入集體農莊的，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五的農戶，共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七十三點九，而剩下的佔全國農戶總數百分之三十五的全體個體農戶，却只佔有全國穀物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十五點五。

除此而外，如果還注意到一件事實，即集體農莊於一九三三年按所有各項交給國家的糧食，總共有十萬萬餘普特，而個體農民雖也完全執行了糧食採辦的計劃，可是他們交給國家的糧食却總共不過約近一萬三千萬普特；而在一九二九——三〇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曾約有七萬八千萬普特，而集體農莊當時交給國家的糧食却不過一萬二千萬普特，——如果還注意到這件事實，那就看得格外清楚：在報告期內，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已經完全更換作用，集體農莊在這時期內已成為農業中的統治力量，而個體農民却變成次要力量，它不得不服從集體農莊制度，不得不適應集體農莊制度。

必須承認：勞動農民，我們蘇聯農民，已經最終地和永遠地站在社會主義紅旗下面來了。（鼓掌多時）。

儘管「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和資產階級——托洛茨基的閒談婦如何信口開河地亂談，說什麼農民有反革命天性，說什麼農民担任有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使命，說什麼農民不能成為工人階級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事業中的同盟者，說什麼在蘇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吧。事實說明：這些老爺們是既誹謗蘇聯，

又誹謗蘇聯農民的。事實說明：我們蘇聯農民已最終地離開資本主義邊岸，而與工人階級聯合一致向着社會主義進展了。事實說明：我們在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底基礎，而我們剩下來要做的事情，已只是要用上層建築物來把它完成之；——這件事情毫無疑義是比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基礎容易的。

可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力量是不僅表現於其播種面積和出產總量增長中的。這個力量同時還表現於其所有拖拉機數量和機器化增長中。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在這方面已有長足的進展。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全國農業中的拖拉機數量統計表（消耗數目除外）：

		架數（以千架為單位）				
拖拉機總架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其	(甲)屬於機器——拖拉機站者	三四·九	七二·一	一二五·三	一四八·五	二〇四·一
中	(乙)屬於一切部門蘇維埃農莊者	九·七	二七·七	五一·五	六四·〇	八一·八
		馬力（以千馬力為單位）				
拖拉機馬力總數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其	(甲)屬於機器——拖拉機站者	三九一·四	一〇〇三·五	一八五〇·〇	二二二五·〇	三一〇〇·〇
中	(乙)屬於一切部門蘇維埃農莊者	二二·九	三七二·五	八四八·〇	一〇七七·〇	一七八二·〇
		一一三·四	四八三·一	八九二·〇	一〇四三·〇	一三一八·〇

於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有二十萬零四千架拖拉機和三百一十萬馬力。由此可見，力量是不小的，它能完全剷除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的一切種種根蒂。這個力量已經超過列寧當時當作遙遠前途的拖拉機數目一倍。

至於說到機器——拖拉機站和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部所轄蘇維埃農莊中的農業機器數量，那就有如下統計表可以說明。

屬於各機器——拖拉機站者統計表：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康拜因機（以千架為單位）	七架	〇·一	二·二	一一·五
發動機和蒸汽發動器（以千架為單位）	〇·一	四·九	六·二	一七·六
複雜打穀機和半複雜打穀機（以千架為單位）	二·九	二七·八	三七·〇	五〇·〇
打穀發電器	一六八	二六八	五五一	一二八三
機器——拖拉機站裏的修理場數量	一〇四	七七〇	一二二〇	一九三三
載重汽車（以千架為單位）	〇·二	一·〇	六·〇	一三·五
輕便汽車（以一架為單位）	一七	一九一	二四五	二八〇〇

屬於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會部所轄蘇維埃農莊者統計表：

康拜因機 (以千架為單位)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發動機和蒸汽發動器 (以千架為單位)	一·七	六·三	一一·九	一三·五
複雜打穀機和半複雜打穀機 (以千架為單位)	〇·三	〇·七	一·二	二·五
發電器	一·四	四·二	七·一	八·〇
修理場				
(甲) 基本修理場	七二	一三三	二〇八	三〇二
(乙) 中等修理場	七五	一六〇	二二五	四七六
(丙) 臨時修理場	二〇五	三一〇	五七八	一一六六
載重汽車 (以千架為單位)	二·一	三·七	六·二	一〇·九
輕便汽車 (以一架為單位)	一一八	三八五	六二五	一八九〇

我認為，這些統計是無須解釋的。

在機器——拖拉機站內和蘇維埃農莊內成立政治部，並以熟練工作人員供給農業，這對於發展農業也會有不小的意義。現在大家都承認，政治部工作人員在改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工作方面會發生莫大作用。大家知道，黨中央委員會在報告期內會總共派出二萬三千餘黨員到鄉村中去鞏固農業幹部，其中：有三千餘人是擔任農業部工作的，有兩千餘人是擔任蘇維埃農莊工作的，有一萬三千餘人是擔任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工作的，有五千餘人是擔任蘇維埃農莊政治部工作的。

關於用新的工程技術人材和農學專家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事情，也要這樣說。大家知道，在報告期內這種工作人員被派到農村中去的，共達十一萬一千餘人。

在報告期內已造就並派出的拖拉機駕駛人、康拜因機正副司機人、汽車夫，只就農業人民委員部一個系統而論，就有一百九十萬人以上。

在同一時期內已造就的和補習過的集體農莊管理部主席和委員、耕作隊長、養畜隊長、簿記員，共達一百六十萬人以上。

這當然還不能滿足我國農業底要求。但這總算是有了一些了。

由此可見，國家已盡一切可能來便利農業人民委員部和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部各機關對於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事業的領導工作。

可以說這些可能性已被儘量利用麼？

可惜還不可這樣說。

首先就要說，這兩個人民委員部是比其他各人民委員部都更患有以官僚形式辦公主義態度處置事情的毛病的。它們只決定問題，可是並不想定要審查執行情形，並不想定要制止那些違背領導機關指示和命令的人們，並不想定要提拔那些忠實誠懇的執行者。

本來，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既然這樣多，各農業機關就得好好保管這些貴重的機器，及時加以修理，比較合理地加以使用。它們在這一方面究竟做了一些什麼呢？可惜做得很少。拖拉機和農業機器是沒有好好保管的。修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為他們至今還不願意明白，主要的修理工作是臨時修理和中等修理，而不是基本修理。至於拖拉機和一般機器底利用情形，那末這件事情不能令人滿意更是如此顯而易見和盡人皆知，以至於無庸證明了。



農業方面的當前任務之一，就是要採用正確的輪流播種制，擴展預耕制以及改良各農業部門的種子工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什麼呢？可惜暫且還做得很少。關於穀種和棉種的事情竟弄得如此亂七八糟，以至於還要花費許多時間，才能整理就緒。

供給技術作物以肥料，是提高技術作物收成的有效辦法之一。在這一方面做了一些什麼呢？暫且還做得很少。肥料是有的，可是農業人民委員部各機關却不善於加以接收，而在接收以後，又不關心於將其接時送往各地和加以合理利用。

至於說到蘇維埃農莊，那就應當說它們仍然沒有勝任。我絕對不輕視我們蘇維埃農莊底巨大革命化作用。可是，如果把國家投入蘇維埃農莊事業的巨量資金與蘇維埃農莊工作現有實際結果對照一下，就可以看見一種很不相稱的情形，而使蘇維埃農莊大有遜色。引起這個不相稱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穀物蘇維埃農莊規模過分龐大，經理人無力應付龐大的蘇維埃農莊，而蘇維埃農莊本身又過於專門化，沒有採用輪流播種制和預耕制，沒有養畜業成份。顯然必須縮小各個蘇維埃農莊規模並取消其過分專門化的性質。有人也許以為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部一定是及時提出了這問題並力謀把它解決了。其實不然。這個問題曾是按照那些與蘇維埃農莊人民委員部毫不相干的人們發起而提出來並加以解決的。

最後，就要講到養畜業問題。關於養畜業底嚴重狀況，我已經報告過了。有人也許以為我們各農業機關已在拚命努力剷除養畜業恐慌，以為它們已在發出警號，動員工作人員和為解決養畜業問題而奮鬥。可惜絲毫未曾有這樣一回事，而且現在也沒有這樣一回事。他們關於養畜業方面的嚴重狀況不但沒有發出警號，反而極力抹煞問題，而有時在其報告中甚至於還企圖蒙蔽全國輿論而隱瞞養畜業底真相，而這種行為是波爾什維克所完全不應有的。既然如此，如果還希望農業機關會把養畜業引上大道和提到應有高度，那就是畫餅充飢了。養畜業應由我們全黨擔任起來，應由我們全體黨員工作者和非黨員工作者擔任

起來，須知養畜業問題是目前最首要的問題，正像我們已順利解決的穀物問題在昨天一樣。根本不必證明：蘇聯的人，是在朝着目標前進的道路上不止一次打破過嚴重障礙的人，他們就連這個障礙也一定能夠打破的。（掌聲如雷）。

這就是一個簡略而很不完全的必須加以剷除的種種缺點一覽表，以及必須在最短期內加以解決的任務一覽表。

可是，事情並不限於這些任務。除此而外，在農業方面還有其他一些任務，而關於這些任務是要稍許說一說的。

首先就要注意到，從前那種把我國各省區劃分為工業區和農業區的舊分法，已失去時效了。我國現在已沒有什麼專把穀物、肉類以及菜蔬供給工業區的純粹農業區；同樣我國現在也沒有什麼能專靠外面，專靠他區來供給一切必需食品的純粹工業區。發展底趨勢將使我國所有各區都成為多少是工業區，而且愈往前去，它們就愈加成為工業區。這就是說，烏克蘭、北高加索、中央黑土省及其他許多舊有農業區，已不復能像過去那樣把大批食品運往他處，運往工業中心，因為它們現在已不得不供給本地日益增加的城市和工人。可是，由此就得出結論：每一區都應在本地建立自己的農業基礎，以便有自己的菜蔬、自己的馬鈴薯、自己的牛油、自己的牛奶，並且在某種程度內有自己的穀物和肉類，以免陷入困難地位。你們知道，這件事情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現在已在進行中。

任務就在於無論如何都把這件事情貫徹到底。

其次，還要注意到，從前那種把我國各區劃分為消費區和生產區的有名分法，現在也開始喪失其特別性質了。像莫斯科省和高爾基省這樣的「消費」區今年已交給國家約達八千萬普特的穀物。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所謂消費地帶內約有五百萬海克脫灌木叢生的荒地。大家知道，在這一帶地方，氣候是

不惡劣的，雨水是不少的，旱災是沒有的。如果把這些土地上所有灌木除去並施行一些組織辦法，那就可以造成一個莫大的穀物產區，這個穀物產區在這些地方通常所有的那種豐收條件下，將能每年糶出大宗穀物，其數量將不少於窩爾加河下游或窩爾加河中游現在所能糶出的。這會是對於北部各工業中心的一個巨大助力。

很明顯的，任務就在於要在消費地帶各區內造成大規模的穀物產地。

最後，我要說到窩爾加河東岸區的防旱問題。在窩爾加河東岸各區培植森林和造成樹陰地帶，是有莫大意義的。大家知道，這個工作已在進行中，不過還不可說它進行得十分緊張。至於說到窩爾加河東岸區灌溉事業——而從防旱觀點上看來，這是主要的事情，——那是不容許把這件事情長久延擱下去的。固然，這件事情會因為有那些逼着我們耗費大批人力物力的外界情況而受到一些阻礙。可是，現在已沒有什麼理由把這件事情繼續延擱下去了。我們一定要在窩爾加河流域有一個嚴重的、完全穩定的、完全不受偶然天災影響的、每年能糶出兩萬萬普特穀物的產穀根據地。這是完全必要的，一方面因為窩爾加河流域城市數目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因為在國際關係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糾紛。任務就在於着手進行關於組織窩爾加河東岸區灌溉事業的嚴重工作。（鼓掌）。

### （三）勞動者物質狀況和文化水平之高漲

這樣，我們就已說明了我國工業農業狀況，我國工業農業在報告期內的發展，我國工業農業在現時的情形。

總結起來，我們就有以下各點：

(1) 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各基本部門方面，都有生產底雄偉高漲。

(2) 在這個高漲基礎上，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都已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變成整個國民經濟底唯一體系，資本主義份子已被從國民經濟所有各方面排擠出去了。

(3) 絕大多數個體農民已最終脫離小商品個體農業，他們已聯合為以集體勞動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集體農莊，集體農業已完全戰勝小商品個人農業。

(4) 集體農莊日益吸收個體農戶而更加向前擴展，而個體農戶數量就因此而一月少於一月，實際上變成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輔助力量。

很明顯的，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對於剝削者的勝利，曾不能不使勞動者物質狀況及其全部日常生活都有根本改善。

由於消滅寄生蟲階級的結果，人剝削人的現象也消滅了。工農勞動已擺脫剝削。從前剝削者由人民勞動中榨取的收入，現在已是完全留在勞動者手裏，其中一部分是用以擴展生產和吸收勞動者新隊伍參加生產，而另一部分則是用以直接提高工農收入的。

工人階級所遭受的奇災大禍——失業現象，已經消滅了。如果在資產階級國家裏有千百萬失業者因為找不着工作而遭受着飢寒痛苦，那末在我國却已不復有領不着工作和工資的工人了。

隨着富農盤剝制的消滅，於是農村中的貧窮現象也消滅了。現在，隨便那一個農民，不管是集體農民或個體農民，只要是願意誠懇工作，而不偷懶，不游蕩，不侵吞集體農莊財產，那他就有享受人生幸福的可能。

剝削制的消滅，城市中失業現象的消滅，鄉村中貧窮現象的消滅，——這是勞動者物質狀況中的這樣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成績，這種成績是無論在那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裏的工農所夢想不到的。

我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底面貌已經改變了。資產階級國家各大城市所不可避免的徵，就是那些破亂矮屋，即城郊一帶的所謂工人住區，是黑暗的潮濕的破落不堪的處所，大半都是地窖，其中居民，照例都是一些輾轉於污泥、埋怨厄運、吞聲叫苦的窮人。而在我們蘇聯，由於革命的結果，這種破亂矮屋已經絕跡。它們已被新建的美麗的光亮的工人住區所代替，而且我國許多工人住區往往比城市中心還要美觀得多哩。

鄉村底面貌更是改變了。在舊時鄉村中，最出風頭的是教堂廟宇，立在前面的是巡官、神父和富農底樓房，而在後面的則是農民底破爛草屋，——這種舊式鄉村現已開始絕跡。它們日益被新式鄉村所代替，這種新式鄉村有其公共經濟建築，有其俱樂部、無線電播音器、影戲院、學校、圖書館和托兒所，有其拖拉機、康拜因機、打穀機和汽車。舊時的名人，即剝削者的富農、吸血鬼的高利貸者、投機商人、巡官老爺等，已經絕跡。而今日的名人，已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裏的、小學校和俱樂部裏的勞動家，拖拉機駕駛人隊長和康拜因機司機人，耕作隊長和養畜隊長，集體農莊田場上的優秀男女突擊隊員。

城鄉間的對立性日益泯滅。城市在農民心目中已不復是剝削他們的中心。城鄉間的經濟的文化的結合的線索日益堅固。現在，鄉村經常由城市及其工業方面得到種種幫助：拖拉機、農業機器、汽車、人材以及經費等等。而且，鄉村本身現在也有自己的工業，如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場，集體農莊中的各種製造場，小型電站等等。城鄉間文化程度懸殊的鴻溝日益填平。

勞動者在改善其物質狀況、日常生活以及文化方面的基本成績，就是如此。

在這些成績基礎上，我們在報告期內就有下述各點：

(1) 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三百五十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五百萬萬盧布，而且因為資本主義份子（包括租借企業家在內）現時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部份已少於百分之點五，所以幾乎全部國民收入，都是由工人、職員、勞動農民、合作社和國家攤分的。

(2) 蘇聯人口，已由一九三〇年末的一萬六千零五十萬人增至一九三三年末的一萬六千八百萬人。

(3) 工人和職員人數，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四百五十三萬人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人，其中體力勞動人數在這時期內已由九百四十八萬九千人增至一千三百七十九萬七千人，大工業工人（連運輸工人包括在內）數量已由五百零七萬九千人增至六百八十八萬二千人，農業工人數量已由一百四十二萬六千人增至二百五十一萬九千人，而商業工人和職員數量則已由八十一萬四千人增至一百四十九萬七千人。

(4) 工人和職員底工資基金，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七百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三百四十二萬八千萬盧布。

(5) 工業工人每年平均工資，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九百九十一個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一十九個盧布。

(6) 工人和職員社會保險基金，已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萬一千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四十六萬一千萬盧布。

(7) 全部地面工業，皆已過渡到七小時工作制。

(8) 國家為幫助農民而給農民設立的機器—拖拉機站，共有二千八百六十處，並為此而投入二十

萬萬盧布。

(9) 國家爲幫助農民而發給集體農莊的信貸，共計十六萬萬盧布。

(10) 國家爲幫助農民而在報告期內借給他們的種子和糧食，共計二萬六千二百萬普特穀物。

(11) 國家爲幫助單薄農民而給予他們的免稅和保險優待，共計三萬七千萬盧布。

至於說到我國文化發展，那末我們在報告期內就有下述各點：

(1) 在蘇聯全國已施行普及初級義務教育，並把識字人口由一九三〇年末的百分之六十七提高到一九三三年末的百分之九十。

(2) 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五萬八千人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千六百四十一萬九千人，其中：受初級教育者，已由一千一百六十九萬七千人增至一千九百一十六萬三千人；受中等教育者，已由二百四十五萬三千人增至六百六十七萬四千人；受高級教育者，已由二十萬零七千人增至四十九萬一千人。

(3) 兒童受育嬰教育者人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八十三萬八千人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一萬七千人。

(4) 大學——普通大學和專門大學——數目，已由一九一四年的九十一所增至一九三三年的六百所。

(5) 科學研究院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四百所增至一九三三年的八百四十所。

(6) 俱樂部式的機關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三萬二千所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五萬四千所。

(7) 電影院、俱樂部電影機和流動電影機數目，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九千八百個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二

萬九千二百個。

(8) 報紙每日出版份數，已由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五十萬份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三千六百五十萬份。

此外，也許不妨指出，在我國各大學學生中，工人成份佔百分之五一點四，勞動農民成份佔百分之六點五，而同時例如在德國各大學學生中，工人成份在一九三二—三三學年間，却總共只佔百分之三點二，至於小農成份，則總共只佔百分之二點四。

還要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實和鄉村文化水平增長的明證，這就是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社會組織工作方面的積極性底增長。大家知道，例如現時在集體農莊女莊員中約有六千人當集體農莊主席，有六萬餘人當集體農莊管理都委員，有二萬八千人當生產隊長，有十萬人當生產班長，有九千人當集體農莊商品農場主任，有七千人當拖拉機駕駛人。不待說，這些統計材料是很不完全的。可是，就從這一個很不完全的數目中間也足以明白看出鄉村文化水平銳增的情形。這個情況是有莫大意義的，同志們。它所以有莫大意義，是因為婦女佔我國人口半數，是一支龐大的勞動軍，而且她們負有使命教育我們的兒童，我們的後輩，即我們的將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不可讓這支龐大的勞動軍沉淪於黑暗無知的境地！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應當歡迎勞動婦女日益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和被提拔來擔任領導工作的事實，作為我國文化水平增長的毫無疑義的明證。(鼓掌多時)。

最後，還應指出一件事實，但這已經是不良的事實。我所指的，是這樣一個不容許的現象，就是師範「科」和醫「科」在我們這裏至今還被輕視。這是一個幾乎等於違背國家利益的大缺點。這個缺點是一定要剷除的。而且這做得愈快愈好。



#### (四) 商品流轉之高漲與運輸業

這樣，我們就有下述各點：

(1) 工業產量——連日用品出產包括在內——增長了；

(2) 農業產量增長了；

(3) 城鄉勞動羣衆對於農產品和工業品的需要和需求量增長了。

爲要把這些條件結合起來並使全體消費者大眾都能得到必需的工業品與農產品，還要有什麼條件呢？有些同志認爲：只要有上述這些條件，就足以使全國經濟生活十分活躍了。這是很錯誤的。可以設想以下一種情形，就是這一切條件雖已完全具備，可是如果商品不達到消費者手上，那末經濟生活不僅不能十分活躍，反而會根本解體和紊亂。到底必須瞭解：商品畢竟不是爲生產而生產，而是爲消費而生產的。我們曾有過這樣的事實，就是工業品和農產品本來不少，但這些產品不僅沒有達到消費者手上，反而積年徘徊於官僚主義的迂迴曲折的路上，即所謂商品轉運網中，而不能與消費者見面。很明顯的，在這種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就失去其擴展生產的任何刺激，商品轉運網就堆滿貨物，而工農羣衆却落得沒有工業品和農產品。結果，雖有大宗工業品和農產品，而全國經濟生活還是陷於解體。爲要使全國經濟生活能夠十分活躍，而工業與農業又有其不斷擴大生產的刺激，那就還要有一個條件，而這條件就是——城市與鄉村間、區與區間、省與省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擴展的商品流轉。必須使全國各地都佈滿批發處、商店、貨攤。必須使商品經過這些溝道——批發處、商店、貨攤——而源源不斷地從生產地點達到消費者手上。必須使無論國營商業網、無論是合作社商業網、無論是地方工業、無論是集體農莊、

無論是個體農民，都來參加這一事業。

這就是我們所稱呼的擴展的蘇維埃商業，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業，沒有投機者參加的商業。

由此可見，擴展蘇維埃商業，就是這樣一個最迫切的任務，而除非解決這個任務，就沒有可能繼續前進。

可是，雖然這個真理是十分明白的，而黨在報告期內終究不得不克服許多橫在擴展蘇維埃商業道路上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如果加以簡要評估，就可說是由於一部分共產黨員不懂蘇維埃商業必要與意義問題的結果。

首先要說到的，就是在一部分共產黨員中間仍然流行着一種鄙視一般商業，其中也鄙視蘇維埃商業的高傲態度。這些所謂共產黨員認為蘇維埃商業是一件次要的毫無價值的事情，而商業工作人員則是毫無希望的人。這些人大概是不懂得他們以其鄙視蘇維埃商業態度所表現出來的，不是波爾什維克的觀點，而是那些大有野心而毫無本事的失意貴族的觀點。（鼓掌）。這些人不懂得蘇維埃商業是我們的切身的波爾什維克的事業，而商業工作人員——連店檯工作人員包括在內——只要是誠懇工作，就是我們的革命的波爾什維克的事業底傳達者。（鼓掌）。當然，黨會須把這些所謂共產黨員稍許打擊一下，並把他們那種貴族偏見拋到垃圾堆裏去。（鼓掌多時）。

其次，會須克服另一種偏見。此地所說的，就是那流行於我們一部分工作人員中的「左派」廢話，說蘇維埃商業似乎已成爲已往階段，說我們必須實行產品直接交換制，說貨幣很快就要取消，因爲貨幣似乎已變成簡單的核算符號，說根本用不着發展商業，因爲產品直接交換制已是指日可待了。應當指出，這種幫助資本主義份子來破壞蘇維埃商業擴展事業的「左派」小資產階級廢話不僅流行於一部分紅色教授中，而且還流行於某些商業工作人員中。這些甚至不能辦好最簡易的蘇維埃商業事情的人們竟在那

裏妄說他們決意要辦好更複雜困難的產品直接交換事情——這當然是滑稽可笑的。可是，吉訶德先生們所以叫作吉訶德先生們，就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生知覺。這些與馬克思主義相隔如天壤的人們，大概是不懂得貨幣在我們這裏還會長期存在，一直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完成時為止。他們不懂得貨幣是資產階級經濟底這樣一個工具，這個工具是已被蘇維埃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來使其適應社會主義利益，以便盡量擴展蘇維埃商業，並以此而準備條件來實行產品直接交換制的。他們不懂得產品直接交換制是只有在蘇維埃商業辦得盡善盡美以後才能取而代，而這種辦得盡善盡美的蘇維埃商業在我們這裏是完全沒有的，而且還不是很快就有的。很明顯的，黨既然力求擴展蘇維埃商業，所以會認為必須把這些「左派」畸形兒也打擊一下，並把他們那些小資產階級廢話拋到九霄雲外。

其次，會須克服商業工作人員那種機械分配商品的不良習慣，剷除那種忽視貨物種類要求和買者要求的態度，剷除那種機械運送貨物的辦法以及商業中的無人負責現象。為此目的而添設了許多省批發處和區間批發處，開設了幾萬個新商店和新貨攤。

其次，會須消滅合作社獨佔市場的狀態，並因此而會責成各人民委員部應開始各自經營銷售本部產品的商業，供給事業人民委員部則應開展廣泛的營業性的農產品貿易，其結果，一方面就按競賽辦法而使合作社商業改善，另一方面又使市場上的物價降低，使市場情形健全化。

開展了廣泛的廉價飯堂網（「公共飯堂」），在各工廠中組織了工人給養部，並取消了那些與各該工廠無關者所享有的給養證，單就重工業人民委員部一部而論，會須取消其給養證的局外人數目就不下五十萬人。

整理了統一集中的短期信貸銀行——國家銀行，這銀行有二千二百個能資助商業活動的區分支行駐設於各地。

由於實行這種種辦法的結果，我們在報告期內就有下述各點：

(1) 商店貨攤數目，已由一九三〇年的十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二所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四所；

(2) 新設立的省批發處有一千零十一個，新設立的區間批發處有八百六十四個；

(3) 新設立的工人給養部，共有一千六百處；

(4) 營業性的糧食商店網，已擴大而普及於三百三十個城市；

(5) 公共飯堂網，已擴大而包括一千九百八十萬個用膳者；

(6) 按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連公共飯堂包括在內）路線進行的商品流轉總額，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百八十九萬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的四百九十萬萬盧布。

如果以為蘇維埃商業這全部發展規模已夠滿足我國經濟需要，那就錯誤了。恰巧相反，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顯而易見，商品流轉底現狀是不能滿足我國需要的。因此，任務就在於要繼續擴展蘇維埃商業，吸收地方工業來參加此事，加強集體農莊的農民的商業，以便在提高蘇維埃商業方面求得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成功。

可是必須指出：問題是不能只以擴展蘇維埃商業為限的。如果為要發展我國經濟，就必須發展商品流轉，就必須發展蘇維埃商業，那末為要發展蘇維埃商業，就必須發展我國經濟——鐵路運輸業、水道運輸業、汽車運輸業。可以發生這樣一種現象：有商品，有擴展商品流轉的完全可能，但運輸業却趕不上商品流轉底發展，不能充分轉運貨物。大家知道，我們往往正有這樣一種現象。因此，運輸業現時是這樣一個狹窄處，我國整個經濟，首先是我國商品流轉，是能碰到它而跌交的，而且也許已開始在跌交了。

固然，鐵路運輸業底轉運量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一千三百三十九萬萬噸哩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七百二十萬萬噸哩了。可是，這還嫌少，這對於我們，對於我國經濟還嫌太少。水道運輸業底轉運量也

由一九三〇年的四百五十六萬萬噸哩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五百九十九萬萬噸哩了。可是，這還嫌少，這對於我國經濟還嫌太少。

我還不說汽車運輸業，這汽車運輸業所有的汽車數量（載重汽車和輕便汽車），已由一九一三年的八千八百輛增至一九三三年末的十一萬七千八百輛了。可是，這對於我國國民經濟是少得甚至不便說及的。

毫無疑義的，如果運輸機關沒有患着那稱為官僚形式辦公主義領導方法的有名病症，那末所有這各種運輸業就會工作得好得多。因此，除必須用人材和經費幫助運輸業而外，任務還在於要在運輸業各機關內根本剷除官僚形式辦公主義的處事態度，並使這些機關成爲更帶行動性的機關。

同志們！我們已獲得這樣一個成績，就是我們已把工業各基本問題正確解決了，於是工業現已立足穩固。我們已獲得這樣一個成績，就是我們已把農業基本問題也正確解決了，於是農業——我們可以直截這樣說——現在也已立足穩固。可是，如果我們的商業竟開始跛足，如果我們的運輸業竟成爲我們腳上的贅壘，那我們就會喪失這些成績。因此，擴展商品流轉額和斷然改良運輸業就是這樣一個最迫切的當前任務，除非解決這個任務，我們就不能前進。

### (三) 黨

我現在就來說關於黨的問題。

本次代表大會是在列寧主義已完全勝利的情況下進行的，是在已肅清各反列寧主義集團餘孽的情況下進行的。

反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份子集團已被擊破和擊散。這集團底組織者們現時在國外資產階級黨底後院中遊蕩着。

反列寧主義的右傾份子集團已被擊破和擊散。這集團底組織者們早已放棄自己的觀點，現正多方努力在黨面前改過自新。

民族主義傾向者集團已被擊破和擊散。這些集團底組織者們或是已和武裝干涉者僑民打成一片，或是已經表示悔過自新了。

這些反革命集團底大多數參加者都已不得不承認黨路線正確而投降於黨了。

如果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還須證明黨路線正確，還須對大家知道的反列寧主義集團作鬥爭，而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也還須給這些集團底最後信徒以最後打擊，那末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就既沒有什麼東西須要加以證明，而且大概也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打擊了。大家都看得見，黨路線已經勝利了。（掌聲如雷）。

全國工業化政策已經勝利了。這政策底成果現在是有目共睹的。用什麼東西能反駁這個事實呢？

消滅富農階級和實行全盤集體化的政策已經勝利了。這政策底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用什麼東西能反駁這個事實呢？

在我國經驗上已經證明了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完全可能的。用什麼東西能反駁這個事實呢？

不言而喻的，所有這些成功，而首先是五年計劃底勝利，已把所有一切種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打得完全垂頭喪氣和打得粉碎了。

必須承認：黨在現時是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一致的。（熱烈鼓掌多時）。

(一) 思想政治的領導問題。

可是，這是不是說鬥爭已經終結，社會主義底繼續進攻已失去時效而成爲贅舉呢？不是的，不是這樣說。

這是不是說在我們黨內已經是百事大吉，在它內部再不會有任何傾向發生，並因此而現在已可高枕而臥呢？

不是的，不是這樣說。

黨底仇敵，各色機會主義者，各種民族主義傾向者，已被我們擊潰了。可是，他們的思想遺毒還在個別黨員頭腦中生存着，而且往往流露出來。不可把黨看作是与其週圍人們隔絕的東西。黨是在圍繞着它的人們中間生存和活動的。無怪乎那些不良情緒往往由外界侵入黨內來。而在我國有培植這種情緒的基地，却是毫無疑義的，這至少是因爲無論在我國城市或我國鄉村中總還有一些中間居民階層，而這些階層就是培植這種情緒的處所。

我們黨第十七次代表會議曾經說：在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時的基本政治任務之一，就是「克服那留在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遺毒」。這是完全正確的思想。可是，難道可以說我們已克服了那一切留在經濟中的資本主義遺毒麼？不是的，不可這樣說。更不可說我們已克服了那留在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遺毒。其所以不可這樣說，不僅因爲人們意識底發展是落後於人們底經濟地位，而且還因爲資本主義包圍尚存在着，而資本主義包圍是竭力復活和支持那留在蘇聯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遺毒的；而我們波爾什維克正應當時刻戒備來反對這個資本主義包圍。

很明顯的，這些遺毒不能不是一種使那些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思想能在我們黨個別黨員頭腦中活躍起來的順利基地。此外，如果你們還注意到，我們黨大多數黨員底理論水平還不很高，黨機關底思想工作尚屬薄弱，我們黨工作人員因忙於純粹實際工作而沒有機會來充實自己的理論行囊，——那你們就會瞭解，為什麼在個別黨員頭腦中關於某些列寧主義問題竟有一種觀念糊塗，而這種觀念糊塗往往流露於我們的刊物上，並使那些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遺毒易於活躍起來。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可說鬥爭已經終結，不可說社會主義進攻政策已沒有必要。

可以舉出列寧主義幾個問題來具體說明那些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遺毒在某些黨員中還有多少生機。

例如，就拿關於建成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來說吧。第十七次黨代表會議曾經說：我們是向着創立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方向前進着的。不言而喻的，無階級社會是不能按所謂自流方式到來的。它是必須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努力——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為手段，以開展階級鬥爭為手段，以消滅階級為手段，以消滅資本階級餘孽為手段，在和內外敵人作戰鬥中——爭得和建成的。

這看來是很明白的。

可是，誰不知道列寧主義這一簡明提綱的宣佈曾在一部分黨員頭腦中產生不少的觀念糊塗和不良情緒呢？我們向無階級社會進展的提綱本來是作為口號發出的，而他們却誤解為自發的進程。於是他們就盤算着：既然說無階級社會，那就是說可以削弱階級鬥爭，可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和一般就取消國家，因為國家橫直是要在最近將來消亡的。因此，他們就像癡兒一樣，歡天喜地，束手而待，以為既然很快就會沒有任何階級，於是也就不會有階級鬥爭，於是也就不再不必操心，不必麻煩，於是也就可以放下兵器，高枕而臥，靜候無階級社會自行來臨。（全場大笑）。



毫無疑義的，這種觀念糊塗和這些情緒是與右傾份子底有名觀點毫無二致的，照這個觀點看來，舊東西應自流式地生入新東西，而在某一個良辰吉日裏，我們就會不知不覺地落到社會主義社會中了。

由此可見，那些已被擊潰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遺毒還完全有活躍的能力，遠遠沒有喪失自己的生機。

不言而喻的，如果這種觀點糊塗和這些非波爾什維克情緒竟普及於我們黨大多數黨員，那我們黨就會被廢弛和被解除武裝了。

其次，例如拿農業勞動組合和農業公社的問題來說吧。現在大家都承認：勞動組合在現今條件下是唯一正確的集體農莊運動形式。這是完全明白的，因為第一，勞動組合是正確地把集體農莊莊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與其公共利益配合起來的；第二，勞動組合是很恰當地使個人日常生活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並以此而便利於用集體主義精神來教育昨日個體農民的。

農業公社却與勞動組合不同，在勞動組合中是只把生產資料公有化的，而在農業公社中，不久以前却不僅曾把生產資料公有化，而且曾把每個社員底日常生活也公共化了，——這就是說，農業公社社員是與勞動組合組員不同，他們沒有個人佔有的家禽、小牲畜、乳牛，穀物和園圃土地。這就是說，在農業公社中，各社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是沒有顧及，沒有與公共利益配合起來，却爲着小資產階級平均制利益而被公共利益所蒙蔽了。顯而易見，這是農業公社底最大弱點。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農業公社沒有廣泛流行，而只能碰到幾個或幾十個。同樣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農業公社爲維持其生存而避免瓦解起見，竟不得不放棄日常生活公共化，而開始按照勞動日來進行工作，給社員分發穀物回家享用，允許社員個人佔有家禽、小牲畜以及乳牛等等，但由此可見農業公社在事實上已改爲勞動組合了。而這是沒有什麼壞處的，因爲這正是羣衆集體農莊運動底健全發展利益所要求的。

這當然不是說農業公社一般就不需要了，它已經不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了。不是的，農業公社是需要的，而且它當然還是集體農莊運動底最高形式；可是，這不是現時的在技術不發展與產品不夠的基礎上產生而且已經自動過渡到勞動組合地位的農業公社，而是將來的在技術更發展與產品極豐富的基礎上產生的農業公社。現時的農業公社是在技術不很發展和產品不充足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現時的農業公社就會實行平均制，而很少顧到自己社員底個人日常生活利益，因此它現在不得不過渡到勞動組合地位，而在勞動組合中集體農莊社員底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是有適當配合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從那已經發展的豐裕的勞動組合長成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只有在勞動組合田場上和農場中已有滿盈的米穀、家畜、家禽、菜蔬以及其他種種產品時，當在勞動組合中已附設有機械洗衣房、新式廚房、食堂、麵包廠等等時，當集體農莊社員已看見由農場領取肉類和牛奶是比自己飼養乳牛和小家畜便宜些時，當集體農莊女社員已看見在公共飯堂中用膳、向麵包廠領取麵包、向公共洗衣房領取乾淨衣服是比自己辦理這種事情方便些時，才會產生的。將來的農業公社是只有在技術更發展和勞動組合更發展時，在產品十分豐盈時，才會產生的。這在什麼時候才會呢？當然不是很快就有的。但這是一定會有的。如果用人工方法來勉強加速勞動組合轉變為將來農業公社的過程，那就是罪惡了。如果這樣做法，那就是紊亂一切計劃而便利我們的敵人底事業。勞動組合轉變為農業公社的過程應當是逐漸的，應當是以全體集體農莊社員都確信有這種轉變必要的程度為標準的。

關於農業勞動組合與農業公社問題，就是如此。  
這看來是很明白的，而且幾乎是很淺顯的。

可是，在一部分黨員當中對於這個問題却有一大堆糊塗觀念。他們認為：黨既然宣佈勞動組合為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形式，於是就離遠了社會主義，由集體農莊運動最高形式的公社退到低級形式了。試

問爲什麼呢？原來是因爲在農業勞動組合中沒有平等，因爲在農業勞動組合裏還保存着各組員底個人消費和日常生活中的差異，而在農業公社中却有平等，因爲在農業公社裏各社員底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狀況都是彼此平均化的。可是，第一，我國現在已經沒有這種在個人消費和個人生活方面都實行一律平均的農業公社。實踐已經表明：如果農業公社沒有放棄平均制，沒有在事實上過渡到農業勞動組合地位，那它就一定會已經滅亡了。所以，根本就用不着援引那已不復存在於天地間的東西。第二，任何一個列寧主義者——只要他是一個真正列寧主義者——都知道，在需要和個人生活方面的平均制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謬論，這種謬論是只適合於某種原始禁慾主義教門，但不適合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因爲決不可要求所有一切人們都有彼此一樣的需要和胃口，決不可要求所有一切人們都過着一個模樣的個人日常生活。而最後，難道在工人中間不是也保留着一種在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差異麼？這是不是說工人是比農業公社社員離社會主義離得遠些呢？

這些人大概認爲社會主義是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個人需要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平均起來、劃一起來、均等起來的。不待說，這種設想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馬克思主義所瞭解的平等不是個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第一，在推翻和剝奪資本家以後，一切勞動者都是平等地擺脫剝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以後，對於大家都是平等地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三，大家都有按其所能而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其勞動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社會）；第四，大家都有按其所能而勞動的平等義務，一切勞動者都有按其所需而領取勞動報酬的平等權利（共產主義社會）。同時，馬克思主義認爲：各人底胃口和需要，無論就質量或就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在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和彼此平等的。

你們看，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其他任何平等，都是馬克思主義所未會承認而且現在也不承認的。

如果由此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起來、劃一起來、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底計劃，一切人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同量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和誹謗馬克思主義了。

已經是預會馬克思主義爲平均制敵人的時候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痛斥那種簡陋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並因爲它鼓吹「普遍禁慾主義和粗鄙平均思想」而稱它爲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在其反杜林一書中，曾闡出整整一章來痛切批評杜林所提出來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對立的那種「急進派的平均思想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曾說：

「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是歸結於要求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

列寧也是這樣說：

「恩格斯寫得千真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竅不通的偏見。資產階級教授們會企圖藉口於平等概念來誣賴我們，硬說我們想把所有一切人都弄得一模一樣。他們會企圖拿他們自己臆造的這個謬論來歸罪於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由於自己昏暗無知而不知道社會主義者——而且正是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平等二字若不瞭解爲消滅階級，那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是想消滅階級的，而正是在這一方面我們主張平等。可是，如果以爲我們能把所有一切人都弄得彼此一模一樣，那就是最空洞的辭句和智識份子拙劣的杜撰了」（節自列寧

演說：論用自由平等口號來欺騙民衆的把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至二九四頁）。這看來是很明白了。

資產階級作家們是喜歡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描寫成爲一切都服從平均「原則」的舊時沙俄營房。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對資產階級作家們這種昏昏魯鈍醜態負責的。

毫無疑義的，個別共產黨員關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問題的這種觀點糊塗以及他們對於農業公社平均主義趨向的迷戀態度，是和「左派」糊塗蟲底小資產階級觀點毫無二致的，這些糊塗蟲會把農業公社理想化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他們有一個時候會企圖在工廠裏也培植公社制度，要各按本人手藝做工的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却把所得工資交出來混在一塊，然後按人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塗蟲這些平均主義的兒戲會使我國工業受到何種害處。

由此可見，已被擊破的反黨集團底思想遺毒是有頗大生機的。

顯而易見，如果這些「左派」觀點竟在黨內得到勝利，那末黨就會不成其爲馬克思主義黨，而集體農莊運動就會完全解體了。

或者，例如拿「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爲生活豐裕者」的口號來說吧。這個口號是不僅與集體農莊莊員有關的。它更其是與工人有關的，因爲我們想使所有一切工人都成爲生活豐裕者——成爲享受着豐裕的完全文化的生活的人。

這看來是很明白的。如果我們做不到使我國人們享受美滿生活，那就會不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實行推翻資本主義和多年建設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不是要人們貧窮困乏，而是要剷除貧窮困乏，要給社會全體組成員組織豐裕的文化的生活的。

可是，這一個很明白的而實在很淺顯的口號却在一部分黨員頭腦中引起許多誤會、糊塗觀念、混亂思

想。他們說：這個口號不是回復到那已被黨所推翻的舊口號——「發財吧」——麼？他們接着又說：如果大家都能為生活豐裕者，如果不復有窮人存在，那末我們波爾什維克在自己工作中將憑藉於何人呢，我們沒有窮人，怎能工作呢？

這聽起來也許是很可笑的，但這種幼稚的反列寧主義觀點之存在於一部分黨員中，却是一件毫無疑義而不可忽視的事實。

這些人大概是不瞭解：在「發財吧」的口號與「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生活豐裕者」的口號中間是橫着整條鴻溝的。第一，能夠發財的只有個別的人或個別的集團，而豐裕生活的口號却不是與個別的人或個別的集團有關，而是與一切集體農莊莊員有關的。第二，個別的人或個別的集團發財，是為要奴役和剝削他人，而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在集體農莊內生產資料公有化條件下享受豐裕生活的口號，却絕對排斥任何人剝削人的可能。第三，「發財吧」的口號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階段中提出來的，當時資本主義曾經局部地恢復起來，富農還有勢力，個體農戶還在國內佔居大多數，而集體農莊經濟則還處在萌芽狀態中；而「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生活豐裕者」的口號却是在新經濟政策最後階段中提出來的，此時在工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已被剷除，在農村中的富農已被擊潰，個體農民經濟已被排擠到次等地位，而集體農莊則已變成農業底統治形式。我還不說：「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生活豐裕者」的口號不是孤獨提出來的，而是與「使集體農莊成為波爾什維主義的農莊」的口號同時提出而彼此密切聯繫着的。

「發財吧」的口號按其實質是號召恢復資本主義，而「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生活豐裕者」的口號却是號召以加強集體農莊經濟勢力和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為生活豐裕勞動者為手段，來徹底剷除資本主義最後餘孽，——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喊聲：「對呀！」）。

在這兩個口號間是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處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喊聲：「對呀！」）。

至於說沒有窮人，就不能有波爾什維克的工作，就不能有社會主義，那就是一種甚至不好意思說及的蠢話了。當有資本主義份子和有被資本家剝削的窮人存在時，列寧主義者是倚靠於窮人的。可是，當資本主義份子已被擊潰，而窮人已擺脫剝削時，列寧主義者底任務就不是固定和保存那存在前提已被消滅的貧苦和窮人，而是剷除貧苦和使窮人成爲生活豐裕者了。如果以爲社會主義能以貧窮困乏爲基礎，以縮減個人消費爲基礎、以降低人們生活水平至窮人生活水平——何況窮人本人也不願照舊做窮人，而力求上進去過豐裕生活，——爲基礎而建設成功，那就愚蠢了。試問誰人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權且說這是社會主義吧，——呢？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對於社會主義的諷刺畫。社會主義是只有以社會生產力蓬勃發展爲基礎，以農產品和工業品豐盈爲基礎，以勞動者生活豐裕爲基礎，以文化水平洶湧昇長爲基礎，才可建成的。因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減少個人需要，而是盡量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不是限制或不肯滿足個人需要，而是盡量和完全滿足文化程度很高的勞動者底所有一切需要。

毫無疑義的，個別黨員對於貧困和豐裕問題所抱的這種糊塗觀念是「左派」糊塗蟲觀點底反映，這些「左派」糊塗蟲把窮人理想化，以爲窮人是波爾什維克在任何條件下的永遠靠山，而把集體農莊看作殘酷的階級鬥爭舞台。

你們由此可見，已被擊潰的反黨集團底思想遺毒就在這個問題方面也還沒有喪失其生機哩。

顯而易見，如果這種糊塗觀點竟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末集體農莊就不會得到其在最近兩年來所有的成績，而是很快就會陷於瓦解了。

或者，例如拿民族問題來說吧。就在這裏，在民族問題方面，也如在其他問題方面一樣，在一部分黨員中間也有造成某種危險的觀點糊塗。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遺毒底生機。應當指出，在民族問題方

面，留在人們意識裏的資本主義遺毒是比在其他任何問題方面都更有生機的。其所以更有生機，是因為它們有可能巧於隱藏在民族外衣中。許多人認為斯克賴卜尼克墮落變節是罕見的例外的事。這是不對的。斯克賴卜尼克及其在烏克蘭裏的集團底墮落變節，不是什麼例外的事。在其他民族共和國裏，個別同志也表現出這種毛病哩。

民族主義傾向——無論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或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是什麼意思呢？民族主義傾向就是要使工人階級底國際主義政策適應於資產階級底民族主義政策。民族主義傾向是反映着「自家的」「民族的」「資產階級力謀破壞蘇維埃制度而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的。由此可見，這兩個傾向是有其共同根源的。這就是離開列寧國際主義。如果你們想打擊這兩個傾向，那你們就應當首先打擊這個根源，打擊那些離開國際主義的份子——無論是說到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或是說到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都是一樣的。（熱烈鼓掌）。

有人在爭論：究竟什麼傾向是主要危險，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抑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呢？在現時條件下，這是形式上的爭論，因此也就是毫無意思的爭論。如果要定出一個適用於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的關於主要危險和次要危險的現成藥方，那就愚蠢了。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藥方。主要危險就是那種因人們中止與它作鬥爭而讓它滋長為禍國危險的傾向。（鼓掌多時）。

在烏克蘭，在很不久以前，烏克蘭民族主義傾向還不是主要危險，但當人們中止與它作鬥爭而讓它滋長起來以致與武裝干涉者打成一片的時候，這個傾向就成為主要危險了。關於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問題，不是由空洞的形式上的爭論來解決，而是要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當時實際情形和研究在這方面所犯錯誤為方法來解決的。

關於一般政治方面的右傾和「左」傾，也要這樣說。在這裏，也如在其他方面一樣，在我們個別黨



員中間也有不少觀點糊塗。有時候，人們在與右傾作鬥爭時竟寬容「左」傾並減弱反「左」傾鬥爭，以為它是不危險或者是少有危險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有危險的錯誤。這是黨員所不容有的向「左」傾讓步的態度。其所以更加不可容許，尤其是因為「左派」在近來已最終跌落到右派立場上去，在實質上已與右派沒有任何區別。

我們一向就說：「左派」也就是右派，不過他們是以左派詞句掩飾其右派本性而已。現在，「左派」自己已證實我們這個說法。試拿去年份的托洛茨基份子「情報」來看吧。托洛茨基份子老爺們在那裏要求什麼和寫着什麼呢，他們的「左派」綱領是表現於什麼地方呢？他們要求解散蘇維埃農莊，認為蘇維埃農莊是不生利的東西；他們要求解散一大部分集體農莊，認為這些集體農莊是虛張聲勢的空架子；他們要求放棄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他們要求恢復租讓政策；他們要求我們出租許多工業企業，認為這些企業都是不生利的東西。

你們看，這就是可惡怯夫和投降份子底綱領，這就是要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綱領！

它與極右派底綱領有什麼區別呢？很明顯的，是沒有任何區別的。由此可見，「左派」已公開附和右派底反革命綱領，以便和他們結成聯盟來共同進行反黨鬥爭。

既然如此，那怎樣還可說「左派」不危險或者少有危險呢？說這種蠢話的人們是替列寧主義底死敵助威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你們由此可見，就在這裏，在關於各種離開黨路線的傾向方面，——無論是說到一般政治方面的傾向，或是說到民族問題方面的傾向，都是一樣，——留在人們意識中以及我們黨個別黨員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遺毒，也是有充分生機的。

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幾個嚴重迫切的問題，關於這幾個問題，在個別黨員層中間

是有觀點模糊、觀念糊塗以至於有簡直離開列寧主義的偏向的。而須知這還不是可以拿來暴露個別黨員觀點糊塗的唯一問題哩。

既然如此，那怎樣還可說在我們黨內百事大吉呢？

很明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

我們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任務如下：

- (1) 把黨底理論水平提到應有的高度；
- (2) 在黨底一切環節中加強思想工作；
- (3) 在黨隊伍中努力不倦地宣傳列寧主義；
- (4) 用列寧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黨組織及其周圍的非黨員積極份子；
- (5) 不要抹煞，而要大胆批評個別同志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偏向；
- (6) 有系統地揭露那些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底思想和思想遺毒。

## (二) 組織的領導問題

我已經說過我們的成功。我已經說過黨路線在國民經濟和文化方面，以及在克服黨內各種反列寧主義集團方面的勝利。我已經說過我們勝利底全世界歷史意義。但這不是說在無論什麼地方，在一切事情方面都已獲得勝利，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天地間是根本就沒有這種成功和勝利的。我們還有不少尚未解決的問題和各種各樣的缺陷。在我們面前還有一大堆要求解決的任務。可是，毫無疑義的，大部分急待解決的當前任務已經順利解決了，而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黨底最大勝利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這裏就要問：這個勝利是怎樣造成的呢，它在事實上是怎樣達到的呢，用什麼鬥爭，用何種努力達到的呢？

有些人認為：只要把黨底正確路線規定出來，把它常衆宣佈，用一般提綱和一般決議形式把它敘述出來，並將其一致表決通過，就足以使勝利自行到來，即所謂自流式地到來了。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一個大錯誤。只有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形式辦公者才能這樣設想。其實，這些成功和勝利不是按自流方式得到的，而是在爲實行黨路線而進行的殘酷鬥爭中爭得的。勝利是無論何時也不會自行到來的，它通常都是被人拖來的。擁護黨總路線的良好決議和宣言，——這還只是事情底開端，因爲它們只是表示爭取勝利的願望，而不是勝利本身。當正確路線已經提出以後，當問題已經正確決定以後，事業底成功就要取決於組織工作，取決於組織鬥爭來實現黨路線，取決於正確挑選人材，取決於審查各領導機關決議執行情形。如果不然，那末正確的黨路線和正確的決議就會受到嚴重損失。況且：當正確政治路線已經規定以後，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就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底命運，——政治路線底實現或失敗。

其實，勝利是經過和那一切阻礙實現黨路線的困難作有系統的殘酷的鬥爭，經過克服這些困難，經過動員全體黨員和工人階級去克服困難，經過組織克服困難的鬥爭，經過撤換那些不中用的工作人員而選用那優秀的有克服困難本事的工作人員而取得和爭得的。

這些是什麼困難呢，這些困難是潛藏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困難就是我們組織工作底困難，是我們組織的領導底困難。這些困難是潛藏在我們本身中，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人員本身中，在我們的組織中，在我們各組織底機關中——黨組織底機關、蘇維埃組織底機關、經濟組織底機關、職工會組織底機關、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底機關以及其他各種組織底機關中。

必須瞭解：我們的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和其他各種組織及其領導工作人員底力量和威信，

已增長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正因為他們的力量和威信已增長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所以現在一切事情或幾乎一切事情都是取決於他們的工作的。藉口所謂客觀條件，是沒有什麼理由的。既然黨政治路線底正確性已為多年實際經驗所證實，而工農擁護這個路線的決心已是不容置疑，那末所謂客觀條件底作用就降到最低限度，而我們各組織及其領導人員底作用就足以決定一切和特別巨大了。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從今以後，對於我們工作虧空與缺點的責任，十分之九不是落在「客觀」條件身上，而是落在我們自己身上，而且只是落在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在黨內有兩百多萬黨員和候補黨員。我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內有四百多萬團員和候補團員。我們有三百多萬工農通信員。我們在國防航空化學協進會內有一千二百多萬會員。我們在職工會內有一千七百多萬會員。我們是叨蒙這些組織而獲得我們的成功的。而如果雖然有這些組織和這些便利我們得到成功的可能性，而我們在工作中還是有不少缺點與虧空，那末對此應負其咎的，就只有我們自己，我們的組織工作，我們的不好的組織的領導。

管理機關中的官僚主義與形式辦公主義；用關於「一般領導」的廢話來代替活的具體的領導；各組織以職能為標準的結構和缺乏專責制；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和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缺乏有系統的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害怕自我批評，——這就是我們所有困難底根源，這就是我們目前困難底潛藏處。

如果以為可以靠決議和決定來剷除這些困難，那就幼稚了。官僚主義者和形式辦公者早已慣於在口頭上表示盡忠于黨和政府底決議，而在事實上却把這些決議置諸高閣而不加執行。為打破這些困難起見，我們會須剷除我們組織工作落後于黨政治路線要求的現象，會須把國民經濟所有各方面的組織的領導底水平提高到政治的領導底水平，會須設法使我們的組織工作能保證實際黨底政治口號和決議。

為着打破這些困難而達到成功起見，會須組織鬥爭來克服這些困難，會須吸引工農羣衆來參加這個鬥

爭，會須把黨本身動員起來，會須把一切不可靠的份子、動搖份子、蛻化份子從黨和各經濟組織中清洗出去。

爲此會要求做些什麼呢？

會須組織以下各項工作：

- (1) 擴展自我批評和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
- (2) 動員黨組織、蘇維埃組織、經濟組織、職工會組織以及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去爲克服困難而奮鬥；
- (3) 動員工農羣衆去爲實現黨和政府底口號和決議而奮鬥；
- (4) 在勞動羣衆中間擴展競賽和突擊運動；
- (5) 廣設機器——拖拉機站和蘇維埃農莊政治部，並使黨領導和蘇維埃領導更接近於鄉村；
- (6) 把各人民委員部、各總管理局，各托拉斯分小，使經濟領導更接近於企業；
- (7) 剷除工作中的無人負責現象並消滅工資制中的平均主義的現象；
- (8) 取消「職能制」，加強專責制，並採取關於取消合議制的方針；
- (9) 加強審查執行情形，以改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來加強審查執行情形爲方針；
- (10) 把熟練工作人員由辦公處調到接近生產的地方去工作；
- (11) 揭破那些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和形式辦公者，並把他們逐出管理機關；
- (12) 把那些違背黨和政府決議者、誇功騙人者、專說廢話者概行撤銷職務，而以新人材——能保證具體領導所負工作並鞏固黨紀律和蘇維埃紀律的求實人材代替之；
- (13) 清洗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並裁減冗員；

(14)最後，把那些不可靠的份子和蜕化的份子從黨內清洗出去。

大體說來，黨爲克服困難，爲把我們的組織工作底水平提高到政治領導底水平，並以此而保證黨路線實現起見而會應採取的種種辦法，就是如此。

你們知道，我們黨中央在報告期內就正是這樣來進行其組織工作的。

在這裏，中央是以列寧說組織工作底主要點是挑選人材和審查執行情形的英明思想爲指南的。

關於挑選人材和撤換那些不稱職者的問題，我要說幾句話。

除我們大家都一致認爲必須摒除的那些不可救藥的官僚主義者與形式辦公者而外，我們還有兩種工作人員是阻礙着我們的工作，防礙着我們的工作，不讓我們前進的。

第一種工作人員，就是那些從前有過某種功勞而現在則已儼然以顯貴自居的人，就是那些以爲黨法律和蘇維埃法律完全與他們無關而是專爲蠢漢製定的人。這就是那些不以執行黨決議和政府決議爲其義務，並因此而破壞黨紀律基礎和國家紀律基礎的人。他們在違背黨法律和蘇維埃法律時是指望於什麼呢？他們是指望蘇維埃政權將因爲他們昔日有功而不敢觸犯他們的。這些妄自尊大的顯貴以爲他們是無可替代的人物，以爲他們是可以隨便違背領導機關決議而不會受到處分的。應如何處置這種工作人員呢？應毫無遲疑地撤銷他們的領導職務，不管他們從前有何功勞。(喊聲：「對呀！」)。應撤換他們並降低其職位，並將此事在報章上公佈出來。(喊聲：「對呀！」)。其所以必須這樣辦，是因為要打破這些妄自尊大的顯貴官僚底傲慢習氣，讓他們去安分守己。其所以必須這樣辦，是因為要在我們整個工作中鞏固黨紀律和蘇維埃紀律。(喊聲：「對呀！」鼓掌)。

現在來說第二種工作人員。這就是那種愛說廢話者，我可以說這是一些誠實的愛說廢話者(笑聲)，這是一些誠實的忠心於蘇維埃政權的，但不能做領導工作的，不能組織什麼事情的人。去年，我曾和

這樣一位同志談過話，這位同志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同志，但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者，他能把任何一件活事情都沉沒在廢話中去。請看這次談話內容吧。

我問：你們的播種工作情形怎樣呢？

他回答：斯大林同志，你說播種事情麼？我們已經動員了。（笑聲）。

我問：好吧，結果怎樣呢？

他回答：我們已把這個問題直截提出來了。（笑聲）。

我問：好吧，而後來又是怎樣呢？

他回答：斯大林同志，我們已有轉變，很快就會有轉變。（笑聲）。

我問：究竟怎樣呢？

他回答：我們已開始現出進展。（笑聲）。

我問：好吧，而你們的播種工作情形究竟怎樣呢？

他回答：我們的播種工作暫時還沒有絲毫頭緒哩，斯大林同志。（全場哈哈大笑）。

你們看，這就是愛說廢話者底面目。他們已經動員了，已經把問題直截提出了，他們既有轉變，又有進展，而工作成績却一點也沒有。

這完全和一位烏克蘭工人在不久以前描寫某一個組織情形時所說一樣，當有人問他說在這個組織裏有沒有路線時，他回答道：『怎樣，路線……路線當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見』。（全場大笑）。大概這個組織也是有其誠實的愛說廢話者的。

當我們把這些愛說廢話者撤職，而使他們遠離行動指導工作時，他們竟帶着莫明其妙的神情而發問道：「究竟爲着什麼而撤銷我們呢？難道我們沒有把對於事情必要的一切工作都做完整麼，難道我們沒有

召集突擊隊員大會麼，難道我們沒有在突擊隊員大會上宣佈黨和政府底口號麼，難道我們沒有選舉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爲名譽主席團麼（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沒有給斯大林同志送祝詞麼，——你們究竟還要我們做些什麼事情呢？」（全場哈哈大笑）。

應怎樣處置這些不可救藥的愛說廢話者呢？如果仍然讓他們担任行動指導工作，那他們就會把任何一件活事情沉沒到滔滔不斷的廢話中去。很明顯的，必須撤銷他們的領導職位，而派他們去做別的工作——非行動指導的工作。愛說廢話者是沒有担任行動指導工作餘地的。（喊聲：「對呀！」鼓掌）。

關於中央會如何指導在蘇維埃組織和經濟組織中的挑選人材的工作，會如何從事於鞏固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我已經簡略報告過了。在我們進行本代表大會議事日程第三項時，卡甘諾維亦同志將向你們作更詳細的報告。

關於今後加強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我想說幾句話。

正確組織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這在反對官僚主義和反對形式辦公主義的鬥爭中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領導機關底指示是被執行着，抑或是被官僚主義者與形式辦公者置諸高閣呢？這些指示是被正確執行着，抑或是被人曲解呢？某某機關是誠實地本着波爾什維克精神進行工作，抑或是徒事敷衍呢？

關於這一切，只有由於組織得完善的對於執行情形審查的結果，才可及時知道。組織得完善的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好似探照燈一樣，能幫助隨時查明各個機關底工作狀況，隨時揭破官僚主義者與形式辦公者。可以肯定說，我們的缺點與缺陷，十分之九都是由於缺乏組織得正確的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毫無疑義的，如果有這樣的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那末缺點與缺陷就一定會事先防止了。

可是，爲要使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能達到目的，那至少就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就要使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是有系統的，而不是時斷時續的；第二，就要使在各級黨組織、蘇維埃組織以及經濟組織中支持



執行情形審查工作的，不是次要的人，而是擁有充分威信的人——該組織底領導者自己。

正確組織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這對於各中央領導機關是有最大意義的。工農檢查院就其組織結構說來，已不能滿足這種組織得完善的對於執行情形的審查工作底要求。幾年以前，當我們的經濟工作還較簡單和還較少令人滿意時，當還可以指望有可能檢查各人民委員部和各經濟機關底工作時，工農檢查院曾是勝任的。可是，現在當我們的經濟工作已經擴大和更加複雜時，當已經既無必要又無可能由一個中央機關來檢查這個工作時，工農檢查院就應當實行改組了。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檢查，而是對於執行中央機關各決議情形的審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對於執行中央機關各決議情形的監督。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這樣一個組織，這個組織不抱定包羅萬象的要檢查一切的目的，而是專心從事於監督，專心從事於審查對於蘇維埃政權各中央機關決議的執行情形。只有蘇聯人民委員會直屬的蘇維埃監督局才能成爲這樣的組織，蘇聯監督局是遵照人民委員會指示而工作的，並在各地有其不由地方機關所支配的代表。而爲要使它擁有充分威信並能在必要時給任何負責人員以處分，就必須使蘇維埃監督局委員候選人是由黨代表大會擬定並由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的。我認爲，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鞏固蘇維埃監督和蘇維埃紀律。

至於說到中央監察委員會，那末大家知道它首先而且主要是爲了防止黨內分裂而設立的。你們知道，在過去有個時候，在我們黨內是確實會有分裂危險的。你們知道，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其所屬組織是把這種分裂危險防止了的。可是，我們現在已不復有分裂危險了。而同時，我們現在却又十分需要這樣一個組織，這個組織能將其注意力集中到審查對於黨和黨中央各決議執行的情形。只有聯共（波）中央直屬的黨監督局才能成爲這樣的組織，它是遵照黨及其中央指示而工作的，並在各地有其不由地方組織所支配的代表。當然，這樣一個負責的組織是應擁有很大威信的。而爲要使它擁有充分威

信並能給任何一個犯了過失的負責工作人員——連中央委員包括在內——以處分，就必須使這監督局底委員是由黨底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所選出而且只有這個代表大會才能加以撤換的。毫無疑義的，這樣的組織將完全能夠保證對於黨中央機關各決議執行情形的監督並鞏固黨的紀律。

關於組織的領導問題，就是如此。

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如下：

- (1) 今後也要督促我們的組織工作，使其能適應黨政治路線底要求；
- (2) 把組織的領導提到政治的領導底水平；
- (3) 務使組織的領導能完全保證黨政治口號及其決議的實現。

同志們，我現在就要結束總結報告了。

從這個總結報告當中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現在，大家都已承認我們的成功是偉大而非尋常的。我國在一個較短時間內就已轉上工業化和集體化軌道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已順利完成了。這就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間產生自蒙的意識並鞏固他們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成功有時也是有其陰暗面的。成功有時也能產生某些危險，而如果讓這些危險滋長下去，那這些危險就能葬送全部事業。例如，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有些同志也許會被這些成功衝昏頭腦。大家知道這種情形在我們這裏是有過的。現在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我們某些同志也許會因有成功而神魂顛倒，完全誇功自滿，却竟以各種誇調子自慰，說：「我們現在可以徒步過海」，「我們能投帽壓敵」等等。這種危險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同志們。這種情緒是極危險的，

因爲這種情緒能解除黨底武裝，能廢弛黨底隊伍。如果這種情緒竟在我們黨裏佔得優勢，那我們所有一切成功就會概被葬送。當然，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順利完成了。這是對的。可是，我們的事業並不就此結束，而且不能就此結束哩，同志們。第二個五年計劃還擺在我們面前，而這個計劃也是必須完成，而且也必須順利完成的。你們知道，計劃是在與困難作鬥爭中，是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完成的。這就是說將來還會有困難，於是也就要與這些困難作鬥爭。莫洛託夫同志和庫依貝舍夫同志將把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給你們聽。你們從他們兩人報告中就會知道：我們爲要實行這個宏偉計劃，就還須克服何等巨大的困難。這就是說：不要使黨高枕而臥，而要在黨內發展警覺性；不要使黨酣眠，而要把它保持在戰鬥準備狀態中；不要解除黨底武裝，而要把它武裝起來；不要廢弛黨底隊伍，而要把它保持在動員狀態中，以便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

由此就得出第一個結論：**不要醉心於已有的成功，不要驕傲。**

我們所以達到了成功，是因爲我們有黨底正確領導路線，並善於組織羣衆來實行這個路線。不待說，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我們就不能有現在我們所有的並理應引以自豪的成功。而具有正確路線並善於加以實現，——這却是執政黨生活中極其罕見的事情。

請你們看看我們周圍各國吧：你們能找到許多具有正確路線並加以實現的執政黨麼？老實說，這樣的執政黨現時在世界上是沒有的，因爲所有它們大家都是過着沒有前途的生活，都是在紊亂不堪的危機裏面掙扎，看不見什麼逃出絕境的道路。只有我們黨才知道引導事業的方向，並順利地引導着它前進。我們黨是因爲什麼而具有這種優勢呢？就是因爲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就是因爲它在自己工作中是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爲指南的。毫無疑義的，只要我們始終仍然忠於這個學說，只要我們始終把握着這個指南針，那我們今後在自己工作中也一定會有成功的。

有人說：在西方某些國家裏，馬克思主義已被消滅了。有人說：它似乎已被那命名爲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潮所消滅了。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只有不知道歷史的人們才能這樣說。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底科學表現。爲要消滅馬克思主義，就須消滅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無法消滅的。自馬克思主義出現於舞台以來，迄今已有八十多年了。在這八十多年間，幾十幾百個資產階級政府曾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而結果怎樣呢？資產階級政府是此起彼覆了，而馬克思主義却仍然存在着。（熱烈鼓掌）。況且，——馬克思主義已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了完全勝利，而且恰巧是在馬克思主義被人認爲已經完全消滅了的國家裏面獲得了勝利。（熱烈鼓掌）。不是偶然的，現在世界上只有馬克思主義已在那裏獲得完全勝利的國家，才是不知危機和失業爲何物的國家，而在其他一切國家裏——連法西斯國家也包括在內——，經濟危機和失業浩劫迄今已繼續彌漫四年之久。不是呀，同志們，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呵！（鼓掌多時）。

是的，同志們，我們所以獲得種種成功，是因為我們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旗幟下面工作和鬥爭了的。

由此就得出第二個結論：要始終忠心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底偉大旗幟。（鼓掌）。

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有力，不僅是因為它有其經歷戰鬥考驗的列寧黨。其次，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有力，不僅是因為它有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底擁護。蘇聯工人階級所以強大有力，還因為世界無產階級都援助和幫助它。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底一部分，是世界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我們的共和國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底產兒。毫無疑義的，如果蘇聯工人階級沒有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擁護，那它就會不會能保持自己手裏的政權，就會不會能保障有社會主義建設條件，於是它也就會不會能獲得現有的成功。蘇聯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間的國際聯繫，蘇聯工人與世界各國工人間的兄弟聯盟，這就是

蘇維埃共和國所具力量和威勢的基石之一。西方工人說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是很好的。這就是說世界無產階級今後也決意按其力量和可能來援助蘇聯工人階級。可是，這就責成我們以嚴重義務。這就是說我們應當努力工作來證明我們不辜負世界各國無產者們突擊隊這一光榮稱號。這就責成我們更加好好工作，更加好好奮鬥，使社會主義在我國最終勝利，使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勝利。由此就得出第三個結論：要始終忠心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忠心於世界各國無產者們底兄弟聯盟事業。（鼓掌）。

結論就是如此。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底偉大的不可被戰勝的旗幟萬歲！

（全場熱烈鼓掌多時。全體代表向斯大林同志歡呼致敬。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以後，又以更大聲浪歡呼。高呼：「斯大林萬壽無疆！」，「斯大林萬歲！」，「黨中央萬歲！」）。

### 幾句代替結論的話

同志们！代表大會上的討論已經表明：我們的黨的領導者們底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說關於黨政策所有一切問題的觀點都是完全一致的。你們知道：對於工作總結報告是未曾有任何異議的。於是就表明了：我們黨隊伍無論在思想政治方面或在組織方面都是非常團結一致的。（鼓掌）。既然這樣，試問還有做結論的必要麼？我認爲是沒有必要的。所以，就請你們恕我不做結論吧。

（熱烈歡呼，全場起立，高呼「烏拉！」；共同高呼「斯大林萬歲！」，全體站着高唱國際歌。唱完國際歌以後，歡呼聲音又起。高呼「烏拉！」，「斯大林萬歲！」，「中央萬歲！」）。

## 在克列姆里宮裏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同志們！不可否認：我們近來無論在建設方面或在管理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成功。於是在我們這裏關於領導者底功績，關於領袖們底功績，就未免講得太多了。人們把所有一切，幾乎把我們所有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領袖們。這當然是不對的，不正確的。事情不僅在於領袖們。可是，我今天所想說的，不是關於這一點。我想簡略說到的，是關於幹部，關於我們一般幹部，其中也關於我們紅軍底幹部。

你們知道：我們從舊時代方面所得到的遺產是一個技術落後的，幾乎赤貧的，破產的國家。這個國家既是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了，又被三年國內戰爭所破壞了的，其居民是很少識字的，其技術是落後的，其工業是好像個別孤島一樣沉沒在無數極小農莊這一汪洋大海中間的，——你們看，我們從舊時代方面得到的遺產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任務曾在於：把這個國家由中世紀的黑暗無知的軌道轉移到現代工業和機器化農業的軌道。可見，任務是嚴重而困難的。問題會是這樣擺着：或是我們在最短期間內就把這個任務解決成功，於是在我國把社會主義鞏固起來，或是我們解決不了這個任務，那時我們這個技術薄弱的和文化不開通的國家就會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並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玩具。

我國當時是處在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曾沒有充分機器來供給工業。曾沒有機器來供給農業。曾

沒有機器來供給運輸業。會沒有最低限度的技術基礎，而沒有這種基礎，是談不到國家工業改造的。會只有創立這種基礎的個別前提。會須創立頭等工業。會須使這種工業在技術上不僅能夠改組工業，而且能夠改組農業，而且能夠改組我國鐵路運輸業。而爲此就會須甘願承受犧牲並在各方面都極端節省，節省飲食，節省教育經費，節省布疋，以便積累那爲創立工業所必要的資金。會沒有其他什麼辦法可以消滅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列寧會這樣教導我們，而我們在這件事業上就循着列寧脚步前進了。

很明顯的，在這樣巨大而困難的事業中，是會不能期待接連不斷的迅速表現出來的成功的。在這種事業中，只有經過幾年以後，才能有成功表現出來。因此必須用堅強的精神，用波爾什維主義的堅定性，用堅忍不拔的意志把自己武裝起來，以便克服初次挫折，而勇往直前地向着偉大目的前進，不許在自己隊伍內有動搖和猶疑。

你們知道：我們正是這樣進行了這件事業的。可是，堅強精神、忍耐性和堅定性不是我們所有一切同志都足夠的。在我們的同志中間，會有些人一遇見初次困難，就叫人退却。常言道：「既往不咎」。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人總是有記性的，所以在總結我們工作的時候就會於無意中想起過去的事情來。（全場歡動）。是的，我們會有一些同志是害怕困難並叫黨退却的。他們會說：「你們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機器、鋼鐵、拖拉機、康拜因機，汽車，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呢？倒不如多給我們一些布疋，多買一些原料來生產日用品，多給居民們一切點綴日常生活的零件細物吧。要在我國落後情形下創立工業，何況是創造頭等工業，那就是危險的幻想」。

當然，我們也許會可以把極端節省下來並已用來創立我國工業的三十萬萬金盧布，用去輸入原料並增加日用品生產。這也是一種「計劃」。可是，如果我們採用這種「計劃」，那我們就會沒有冶金業，沒有機器製造業，沒有拖拉機和汽車，沒有飛機和坦克。那我們在外來敵人面前就會成爲沒有武裝的人。那

我們就會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底基礎。那我們就會成爲國內國外資產階級底俘虜。

顯然的，會須在兩個計劃中間選定一個：一個是退却計劃，這個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而且不能不使社會主義遭受失敗的；另一個則是進攻計劃，這個計劃是要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而且——你們知道——已經使社會主義在我國獲得勝利了。

我們就選定了進攻計劃而沿着列寧道路前進了，把這些同志排擠到後面去，因爲這種人只勉強看見自己鼻子下面的東西，可是却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國最近的將來，不願看見我國社會主義底將來。

可是，這些同志並不是始終都只限於批評和消極抵抗的。他們曾在黨內舉行暴動反對中央來威脅我們。而且：他們曾以槍彈來威脅我們某些人。他們大概會指望嚇倒我們並迫使我們離開列寧道路。這些人顯然是忘記了：我們波爾什維克是具着特殊氣概的人。他們忘記了：波爾什維克是既不怕困難，也不怕威脅的。他們忘記了：把我們鍛練成鋼的，是在鬥爭中不知恐懼爲何物和根本不承認恐懼二字的偉大列寧——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導師，我們的父親。他們忘記了：敵人愈是發狂發瘋，黨內敵對份子愈是神經錯亂，則波爾什維克就愈是堅強奮發地進行新的鬥爭，愈是猛勇地向前邁進。

當然，我們是也沒有想到要離開列寧道路的。而且，我們在這條道上固立起來以後，就更加猛勇地向前行進了，從道路上掃去所有一切種種障礙物。固然，我們在向前行進時會不得不沿途打翻這些同志中間的某些人。但這已是沒有別的辦法了。我應當承認：對於這件事情，我也是出了一臂之力。  
(熱烈鼓掌，高呼「烏拉」)。

是的，同志們，我們的確是自信地猛勇地沿着使我國工業化和集體化道路走了的。而現在這條道路可算已經走過了。

現在大家都已承認：我們在這條道路上已達到偉大的成功。現在大家都承認：我們已經有強大的頭



等的工業，強大的機械化的農業，日益開展的蒸蒸日上下的運輸業，組織精密的武裝優良的紅軍。

這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已渡過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

可是，渡過十分缺乏技術的時期以後，我們就走進了新的時期，走進了可說是十分缺乏人材，十分缺乏幹部，十分缺乏善於駕駛技術並推動技術前進的工作者的時期。問題是在於：我們有工廠，有集體農莊，有蘇維埃農莊，有運輸業，有軍隊，我們有技術來供給這全部事業，可是我們尚缺乏一些具有充分必要經驗來最高限度利用這種技術的人材。從前，我們曾說：「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幫助我們消滅了十分缺乏技術的現象並在一切工作部門裏創立了極廣大的技術基礎，以使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材。這是很好的。但這還千萬不夠。爲要使技術動作起來並把它利用到底，就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材，就需要有能夠按照一切藝術規則來學會利用和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技術若沒有精通技術的人材，那它就是死的東西。技術若有精通技術的人材來使用，那它就能夠而且應當顯出奇蹟來。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裏，在我們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在我們的運輸業裏，在我們的紅軍裏，有充分數量能夠駕駛這種技術的幹部，那末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比它現時所有的還更多三四倍。正因爲如此，所以現在應當特別注重人材，特別注重幹部，特別注重精通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爲如此，所以舊口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反映已經過去時期的口號，反映我們十分缺乏技術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由新口號，即「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現時的主要點，就在這裏。

可以說我們的人已完全瞭解和覺悟到這個新口號底偉大意義麼？我認爲是不可這樣說的。否則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就不會有人時常用豈有此理的態度去對待人材，去對待幹部，去對待工作者了。「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要求我們各領導人員對於我們各工作者，對於無論在那一方面做工作的「大」「小」工作者，都表現出最關切的態度，很懇懇地培植他們，當他們需要扶助時就予以幫助，當他們作

出初次成績時就予以獎勵，提拔他們上進等等。而我們在實際上却往往看見那種用官僚主義刻薄態度而且用簡直豈有此理的態度對待工作者的事實。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就往往不考察人材，不在考察他們以後才任用他們，而是往往把他們東拋西擲，如同拋擲棋盤上的小卒一樣。關於重視機器並呈報在我們工廠裏有多少技術品，——這算是已經學會了。可是，我從未聽見有人會以同樣熱情來呈報說在某個時期內我們培植了多少人材，我們怎樣幫助了工作者在工作中長進和鍛鍊起來。這是由於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重視人材，重視工作者，重視幹部。

說到這裏，我回想起我被逐放在西伯利亞時碰見的一件故事。這是在春天漲水時發生的。有三十個人跑到河裏撈取那由波濤洶湧的大河所沖下來的木料。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回到村莊來了，可是缺少一個同伴。當我問及第三十個人在那裏時，他們就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個人『留在那裏了』。我問：『怎麼會留在那裏呢？』他們又同樣冷淡地回答說：『那還要問什麼，當然是淹死了』。當時在他們中間就有一個人急忙要到什麼地方去，說『要去給母馬灌水喝了』。當我責備他們，說他們憐惜人還不如憐惜牲畜時，於是他們中間就有一個人在其餘同伴贊同下回答道：『我們為什麼要憐惜人呢？人是我們隨時都可做出來的。而母馬呢？你試一試做出一匹母馬來吧』。（全場顯見活躍）。你們看，這就是一個也許不大重要，但很標本的例子。我覺得，我們有些領導者對於人材，對於幹部所採取的冷淡態度以及不會重視人材的習氣，正是這會表現於上述那個遙遠西伯利亞故事中的人對人的奇異態度遺留下來的遺毒。

所以，同志們，如果我們想順利地消滅十分缺乏人材的現象，並使我國得到充分數量的能夠推進技術和運用技術的幹部，那我們首先就應當學會重視人材，重視幹部，重視每一個有益於我們共同事業的工作者。畢竟須要瞭解：人材，幹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的，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須要瞭

解：在我們的現時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中、在農業中、在運輸業中、在軍隊中將有良好的和人數衆多的幹部，那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不可被戰勝的。如果我們不會有這種幹部，那我們就會寸步難行。

我就說到這裏爲止，讓我舉杯敬祝我紅軍學院畢業生康健和進步吧！我希望他們在組織和領導我國國防事業中一切都順利！

同志們！你們已在最高學府畢業並在那裏受了初次鍛鍊。可是，學校還只是一個預備階段。幹部底真正鍛鍊是要在活的工作中，在學校以外，在和困難作鬥爭中，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取得的。同志們，請記着吧：只有那些不害怕困難，不躲避困難，反而前去迎接困難，以便克服和消滅困難的幹部，才是優良的幹部。真正的幹部是只有在和困難作鬥爭中才能鍛鍊出來的。如果我們的軍隊有充分數量的真正的受過鍛鍊的幹部，那它就會成爲不可被戰勝的軍隊了。

同志們，我敬祝你們康健！（全場熱烈鼓掌。全體起立，以高呼『烏拉』來慶祝斯大林同志）。

# 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 (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

同志們！關於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這裏，在這次會議上，有人已經說得很多而且很好，因此我實在沒有多少話可說了。可是，既然你們已把我叫到講台上來，我就得說幾句話。

斯達漢諾夫運動是不可看作男女工人們底一個普通運動的。斯達漢諾夫運動是男女工人們底這樣一個運動，這個運動將成爲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最光榮的篇幅之一。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何在呢？

首先就在於它表現着社會主義競賽底新高漲，表現着社會主義競賽底新的更高的階段。爲什麼是新的階段呢，爲什麼是更高的階段呢？因爲斯達漢諾夫運動之爲社會主義競賽底表現，是優越於社會主義競賽底舊階段的。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階段時期中，社會主義競賽並不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而且，我們當時本來就幾乎沒有什麼新技術。而社會主義競賽底現今階段，即斯達漢諾夫運動，却恰巧相反，却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如果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那就決不會有

斯達漢諾夫運動。現在你們面前的這些人，像斯達漢諾夫，布塞根，斯美坦寧，克里沃諾斯，普羅寧，兩位羅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一些新的人材，都是已經完全精通本行工作技術，駕馭並鞭策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工和女工。三年以前，我們是沒有這樣的人材的，或者幾乎是沒有這樣的人材的。這是新的特別的人材。

其次，斯達漢諾夫運動是男女工人底這樣一個運動，其目的是要打破現今的技術定額，打破現存的預定生產能力，打破現存的生產計劃和對照表。其所以要打破，是因為所有這些定額，對於現今時期，對於我們新人材，已經陳舊了。這個運動打破着對於技術的舊觀點，打破着舊的技術定額、舊的預定生產能力、舊的生產計劃，而要求規定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新的更高的預定生產能力，新的更高的生產計劃。它具有在我國工業裏實行一個革命的使命。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在其基本上就是一個具有深刻革命性的運動。

在這裏有人已經說，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底表現，是這樣一個高度勞動生產率底模範，這個高度勞動生產率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給出，而非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這是完全正確的。為什麼資本主義打破了克服了封建制度呢？就是因為它創立了比封建制度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它使社會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更多得無比的產品。就是因為它使社會更加富足了。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應當、而且一定會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呢？就是因為它能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給予更高的勞動模範，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就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給予社會以更多產品，能使社會更加富足起來。有些人認為：社會主義是可以以在貧苦生活基礎上稍許展平人們物質狀況為方法來鞏固的。這是不對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觀。其實，社會主義是只有在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基礎上，只有在那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高的高度勞動生產率基礎上，只有在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十分豐富的基礎上，只有在社會全體

組成員都過着豐裕文化生活的基礎上，才能勝利的。可是，爲要使社會主義能夠達到自己這個目的，並把我蘇維埃社會變成最豐裕的社會，就必須使我國有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勞動生產率。如果不然，那就根本用不着想有十分豐富的生產品和各種消費品。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是這樣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打破那些舊的技術定額——不充分的技術定額，並且往往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勞動生產率，這樣就造成實際的可能來在我國更加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來把我國變成最豐裕的國家。

可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遠不以此爲限。它的意義還在於它準備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社會主義底原則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每個人在工作時是各按其所能的，在領取消費品時，却還不是各按其所需，而是按其爲社會所作的工作。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平還不很高，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依然存在，勞動生產率還沒有達到能保證消費品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就只得不按社會各組成員底需要，而是按他們爲社會所作的工作來分配消費品。

共產主義是更高的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底原則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每個人在工作時是各按其所能的，在領取消費品時已不是按其所作的工作，而是按其爲文化程度很高者所有的需要。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平已經達到足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基礎的高度，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已經消失，而勞動生產率已經增高到可以保證消費品完全豐富的高度，於是社會就有按其各組成員底需要來分配這些消費品的可能。

有些人認爲：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的目的，是可以以把智力勞動者、工程師和技師底文化技術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練工人水平爲基礎，以把智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底文化技術水平稍許展平一下爲方法來達到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小資產階級的妄談者才能這樣來想像共產主義。其實，

只有以把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平提高到工程師技師底水平為基礎，才可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如果以為沒有提高到這個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這在蘇維埃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這裏，全國的生產力已擺脫了資本主義底枷鎖，勞動已擺脫了剝削制度的壓迫，工人階級已掌握着政權，工人階級底青年已經有受到完備技術教育的一切機會。一定要把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水平提到這樣的高度，才可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底基礎；也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證必要的高度勞動生產率與十分豐富的消費品，以便開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關於這一點，是絲毫不容懷疑的。

從這方面看來，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這個運動正是包含有我國工人階級這種文化技術水平高漲底萌芽，雖然這種萌芽現在還幼弱，但萌芽總算是有了。

的確，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同志吧。這是一些什麼人呢？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有文化素養的有技術素養的人物，他們表明出準確工作和着實工作的模範；他們善於重視工作中的時間因素，已學會計算時間——不僅一分鐘，就連一秒鐘也不浪費。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已學過所謂基本技術知識，而且還繼續充實自己的技術知識。他們沒有某些工程師、技師以及經濟管理員所懷抱的那種保守主義和頑固思想；他們很勇敢地前進着，打破陳舊的技術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他們對於我國工業領導者所製定的預定生產能力和經濟計劃提出修改，而且往往補充和糾正工程師和技師，他們時常教導工程師和技師，並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為這是已經完全精通本行工作技術並善於最高限度利用技術的人材。在今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還不多，可是到明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就一定會增至十倍，——關於這點，誰能懷疑呢？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裏的革新家，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我國工業未來之花，這個運動包含有工人階級將來文化的高漲底種子，這個運動給我們開闢這樣一條道路，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達到那些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這種指標

是爲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是爲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所必需的，——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同志們，這就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意義。

當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着手打破舊的技術定額時，他們會想到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這種偉大意義麼？當然沒有想到。他們是會有其自己的關注的——就是如何消滅他們企業裏的虧空，並超過完成經濟計劃。可是，他們在力求達到這一目的時，會須打破舊的技術定額，把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程度。可是，如果以爲這個情況能絲毫減少斯達漢諾夫者運動底偉大歷史意義，那就可笑了。

關於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在我國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工人們，也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們當然未曾想到工人代表蘇維埃竟會成爲社會主義制度底基礎。他們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只是爲着防禦沙皇政府底進攻，防禦資產階級底進攻。可是，這個情況却絲毫不與這樣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實相矛盾，就是由列寧格勒工人和莫斯科工人在一九〇五年所開始的爲工人代表蘇維埃而鬥爭的運動，歸根到底引起了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粉碎資本主義和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

## (二) 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

我們現在是站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搖籃面前，是站在這運動底泉源面前。

應當指出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某些特點。

首先一望而知的事實，就是這個運動是自行開始的，幾乎是自發開始的，由下層開始的，並沒有受到



我們各企業管理處方面的任何督促。不僅如此。這個運動在某種程度內，是違反着我們各企業管理處底意志，甚至於是在和他們作鬥爭中誕生和開始擴展了的。莫洛託夫同志已經向你們敘述過：阿爾漢格爾斯克的鋸木工人——毛新斯基同志，曾不得不背着經濟機關底眼睛，背着工作監督員底眼睛，來暗暗地裏做出新的更高的技術標準，足見他曾須挨過怎樣的折磨。斯達漢諾夫本人底遭遇也並不見得好些，因為當他向前進展時，他不僅會須防禦某些管理人員，而且會須防禦某些因他「創新立異」而加以譏笑和攻擊的工人。至於說到布塞根，那末大家都知道，他因為自己「創新立異」而幾乎被開除工作，只是多謝分廠主任蘇科寧斯基同志出來干涉，才得仍然留在廠裏做工。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各企業管理處對於斯達漢諾夫運動曾經有過什麼動作，那末這種動作就不是爲着幫助它，而是爲着阻礙它。所以，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從下層誕生的，從下層擴展起來的運動。而正因為它是自行誕生的，正是因爲它是從下層發生的，所以它是現代最有生氣而不可遏止的運動。

其次，還應講到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另一個特點。這個特點就在於：斯達漢諾夫運動並不是逐漸地，而是空前迅速地，好似狂風一樣散佈到我蘇聯全國各地的。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呢？斯達漢諾夫把掘煤技術定額提高到五六倍，甚至更多。布塞根和斯美坦寧也是作到了這一步，——布塞根是在機器製造業方面，斯美坦寧是在皮鞋製造業方面。報紙就把這些事實登載出來了。於是斯達漢諾夫運動底大火焰就立刻燃遍全國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爲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竟散佈得這樣迅速呢？也許是因爲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是兩個巨大組織者，在蘇聯各省各區都大有聯絡，於是就親自組織了這件事情吧？不是的，當然不是的！也許是因爲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居心要做我國偉人，於是他們就親自把斯達漢諾夫運動底火星子吹到全國各地去了吧？這也是不對的。你們在這裏已經看見了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他們在這次會議上發了言。他們是謙恭樸實的人，是沒有任何愛出風頭，想做蘇聯全國偉人的野心的。我

甚至覺得，他們因為看見這個運動竟出乎他們意料以外而在我國這樣廣泛發展起來，且表現出一些驚異的樣子。而如果雖然這樣，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兩人所燃點起來的火星子畢竟已足使這樣事情發展為大火焰，那就是說，斯達漢諾夫運動是一件已經完全成熟的事情。只是已經完全成熟而有一觸即發之勢的運動，才能這樣迅速散佈起來和好似雪團一般長大起來。

爲什麼斯達漢諾夫運動竟成了完全成熟的事情呢？這個運動散佈得這樣迅速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呢？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怎樣呢？

這裏至少有四個原因。

(1) 成爲斯達漢諾夫運動基本原因的，首先就是在於工人們物質狀況底根本改善。生活更加好些了，同志們。生活更加快樂些了。而生活既然快樂，工作也就來得有勁。於是就有高度的出產額。於是就有勞動英雄，——男英雄，女英雄。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根源，首先就在這裏。如果在我國有危機，如果在我國有使工人階級受苦的大禍——失業，如果在我國生活不好，不舒服，不快樂，那在我國就不會有任何斯達漢諾夫運動。(鼓掌)。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才不僅把自己的政治果實，而且把自己的物質果實顯示給人民看了。在過去一切工人革命中，只有一個工人革命會勉勉強強取得過政權。這就是巴黎公社。可是，巴黎公社沒有存在多久。固然，它曾企圖打破資本主義的枷鎖，可是，它沒有來得及把這種枷鎖打破，尤其是沒有來得及把革命底物質生活幸福的果實顯示給人民看。只有我們的革命才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不僅給予了人民以自由，而且還給予了人民以享受豐富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底力量和不可被戰勝性，就在這裏。趕走資本家，趕走地主，趕走沙皇衛隊，奪得政權，取得自由，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這是很好的。可是，單靠一個自由，可惜還是千萬不夠的。如果穀米不夠，油類不夠，布疋不夠，住宅不好，那末單靠一個自由是走不多遠的。

單靠一個自由是很難生活的呵，同志們。（聽衆齊聲贊同，鼓掌）。爲要有享受優裕快樂生活的可能，就必須除掉政治自由幸福而外，還加上物質幸福。我們的革命底特點就在於它不僅給予了人民以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以物質幸福，而且給予了人民以享受豐富文化生活生活的可能。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我國已有快樂的生活，而斯達漢諾夫運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面生長起來的。

（2）斯達漢諾夫運動第二個泉源，就是在我國已無剝削現象。在我國，人們不是替剝削者做工，不是替不勞而獲者做工生財，而是爲自己做工，爲自己的階級做工，爲自己的蘇維埃社會做工，在這個社會裏掌握政權的，是工人階級底最優秀份子。正因爲如此，所以勞動在我國就有社會的意義，它是一件體面的光榮的事情。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是有私人的個人的性質的。你做得多些麼，那就讓你多賺些吧，聽憑你去過你的生活吧。誰也不知道你，而且誰也不願意知道你。你是替資本家做工麼，你是替他們生財麼？而怎能不這樣呢？人們雇傭你，就是要你替剝削者生財。你不願意這樣幹麼，——那就請你滾到失業工人隊伍中去，聽憑你怎樣苟延殘喘吧，——而我們是隨時都能雇得其他的更馴服的工人的。正因爲如此，所以在資本主義下，人底勞動是不被重視的。當然，在這種條件下，是沒有斯達漢諾夫運動插足餘地的。可是，在我們蘇維埃制度條件下，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這裏，勞動者是備受尊敬的。在這裏，他不是替剝削者做工，而是爲自己做工，爲自己的階級做工，爲社會做工。在這裏，勞動者不能覺得自己是無人過問的人和零丁孤苦的人。恰巧相反，勞動者在我們這裏覺得自己是自己國家底自由公民，是一種社會活動家。而如果他好好做工，盡力效勞社會，那他也就是一位勞動英雄，就會榮光遍體。很明顯的，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斯達漢諾夫運動才能誕生出來。

（3）斯達漢諾夫運動第三個來源，就是在我國已有新技術。斯達漢諾夫運動是與新技術有機體聯系的。如果沒有新技術，如果沒有新工廠，如果沒有新設備，那斯達漢諾夫運動就會不能在我國誕生出來。

來了。如果沒有新技術，那至多也只能把技術定額提高到一兩倍。而如果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已把技術定額提高到五六倍，那就是因為他們完完全全倚靠着新技術。由此可見，我國工業化，我國工廠底改造，新技術和新設備底具備，就是使斯達漢諾夫運動產生出來的原因之一。

(4)可是，單靠一個新技術是走不多遠的。儘管你有頭等技術，頭等工廠，但如果你沒有能夠駕駛這技術的人材，那末你的這些技術也不過仍然祇是一些技術而已。爲要使新技術能夠發生效果，就一定還要有能夠指揮和推進這種技術的人材，男工女工的幹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誕生和增長就是表明：在我國男工女工中間已產生了這樣的幹部。約在兩年以前，黨就已經說過：我們雖已建成新工廠，我們雖已給予我們各企業以新設備，但我們畢竟還只做到一半事情。黨在當時已經說過：從事於建設新工廠的熱忱，是必須要用努力學會運用這些新工廠的熱忱來補充的，只有這樣才可把事情進行到底。顯然的，在這兩年以來是進行了學會利用這新技術的工作，同時新幹部人材已經陸續產生出來了。現在已經顯而易見，我們已有這樣的新幹部了。不言而喻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幹部，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新人材，那我們也就不會有任何斯達漢諾夫運動了。所以，男工女工中間已學會利用新技術的新人材，就是一個形成了和推進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因素。

這些就是產生了和推進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條件。

### (三) 新人材和新技術定額

我已經說過：斯達漢諾夫運動不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而是正如大水決堤一樣突然爆發式地發展起來的。顯然的，這一個運動會須冲破某些堤防。曾有人妨礙了它，曾有人拘束了它，而這斯達漢諾夫運

「動既經把精銳積蓄起來，就沖破這些堤防而汎溢於全國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究竟是誰妨礙了它呢？

妨礙了它的，就是舊技術定額以及站在這些定額背後的人們。幾年以前，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者人員根據我國男工女工當時的技術落後性來規定了相當的技術定額。自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過去幾年了。在這幾年中間，人材已經長進並獲得技術素養了。而技術定額却仍舊沒有改變。當然，這些定額對於我國新材已經是陳舊不堪了。現在大家都在責罵這些現行技術定額。可是，這些定額決不是從天空裏掉落下來的。而且這裏問題並不在於當時把這些技術定額規定得太低。問題首先是在於：當這些技術定額已經陳舊的時候，却還有人企圖把這些定額當作現代定額保留下去。人們拚命把我國男工女工底技術落後性當作根據，以這種落後性爲方針，以這種落後性爲出發點，以至於竟開始拿這種落後性來耍把戲。可是，如果這種落後性已經成了過去，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應當崇拜我們的落後性，把它奉爲偶像，奉爲神物麼？如果男工女工已經長進並獲得技術素養，那又怎麼辦呢？如果舊技術定額已經不合實際情形，而我國男工女工已在事實上超過它們五倍以至於十倍，那又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曾經咒發誓，說要盡忠於我們的落後性麼？同志們，我們似乎沒有這樣幹過吧？（全場大笑）。難道我們會以指望我國男工女工將永遠仍然落後爲出發點麼？我們好像未曾以此爲出發點吧？（全場大笑）。那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我們沒有充分勇氣來打破我們某些工程師技師底保守主義，打破舊傳統和舊定額，以便給予工人階級新興力量以廣闊的活動場所麼？

有些人在那裏談論着科學。他們說：科學底原理，技術指南和技術規則底原理，是奧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關於新的更高技術定額的要求相矛盾的。可是，試問這裏是說那一種科學呢？科學底原理向來都是由實踐，由經驗來考驗的。如果科學竟和實踐斷絕關係，竟和經驗斷絕關係，那還算是什麼科學呢？

如果科學就是像我們某些保守主義同志所形容的那樣一種東西，那末它對於人類就會早已等於死物了。科學所以叫作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却很仔細傾聽實踐經驗底呼聲。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根本沒有什麼科學，就會沒有——譬如說——天文學，而直到如今都會信奉着那陳腐不堪的普托萊米地心說，就會沒有生物學，而直到如今都會迷信着上帝造人的神話，就會沒有化學，而直到如今都會相信着鍊金術士底預言。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那些已經遠遠落在斯達漢諾夫運動後面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經濟工作人員翻然悔悟，不再去繼續拘守舊技術定額，而是認真來改變態度，用科學精神，用新的斯達漢諾夫的精神來改變態度，那就很好了。

也許有人會對我們說：好吧。那末怎樣一般處置技術定額呢？技術定額是為工業所需要呢，抑或是完全不要任何技術定額也可過得去呢？

有些人說：我們已不復需要任何技術定額了。這是不對的，同志們。而且是很愚蠢的。如果沒有技術定額，那就無法進行計劃經濟。除此而外，技術定額所以需要，還為着督促落後羣衆來趕上先進羣衆。技術定額是一個巨大的調節力量，它能在生產中把廣泛工人羣衆組織在工人階級先進份子周圍。所以，我們是需要技術定額的，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現行的定額，而是較高的定額。

另外有些人說：技術定額是需要的，可是現在就必須把它提高到斯達漢諾夫、布塞根、兩位維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等人所已經達到的高度。這也是不對的。這樣一種定額在目前這個時候是不實際的，因為那些比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等人底技術素養低些的男工和女工，就會不能完成這一種定額。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技術定額，應當是一個介乎現行技術定額與斯達漢諾夫和布塞根等人所達到的定額間的定額。例如就拿瑪利亞、德姆青科來說吧，——大家知道，她是從每一海克脫面積收穫五百公擔糖蘿蔔的女突擊

隊員。她達到了從每一海克脫面積收穫五百公擔以及五百公擔以上的糖蘿蔔。可以把這個成績作為烏克蘭——譬如說——整個糖蘿蔔種植業底收成定額麼？不是的，是不可以的。此刻還談不到這一點。瑪利亞、德姆青科從一海克脫面積收穫了五百公擔以及五百公擔以上的糖蘿蔔，而今年每一海克脫面積平均收成率，例如在烏克蘭，却只等於一百三十公擔到一百三十二公擔。由此可見，這裏的差別是不小的。可以把糖蘿蔔收成定額規定為每一海克脫出產四百公擔或三百公擔麼？所有一切內行人都說，此刻還不可這樣做。很明顯的，在烏克蘭方面，一九三六年的收成定額須規定為每一海克脫出產二百至二百五十公擔。而這個定額是不怎樣小的，因為它在被完成時，就能給我們以比一九三五年多至兩倍的糖。關於工業也要這樣說。斯達漢諾夫大概已超過現行技術定額十倍，甚至於十倍以上。如果把他所達到的這種成績宣佈為全體氣鑽掘煤工人底新技術定額，那就不合理了。很明顯的，須規定一個介乎現行技術定額和斯達漢諾夫同志所已實現的定額間的定額。

可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很明顯的：現行技術定額已經不符合實際情形了，這些定額已經落後而變成阻礙我國工業的東西，而為要不致阻礙我國工業，就必須用新的較高的技術定額來代替它們。既然有新人材，新時期，——就應當有新技術定額。

#### (四) 最近的任務

以斯達漢諾夫運動利益為觀點看來，我們最近的任務何在呢？為集中注意力起見，就讓我們把這件事情歸納為兩個最近任務吧。

第一。任務就在於要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去繼續擴展斯達漢諾夫運動，把它擴大和深入到蘇聯全國各省各區去。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要制止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裏面的那一切死守成規，不願前進並一味阻礙斯達漢諾夫運動擴展的份子。爲要把斯達漢諾夫運動儘量推行到我全國各地，單靠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本身，當然還是不夠的。一定要我們各個黨組織參與這個事業，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把運動進行到底。頓涅茨省黨組織在這一方面是表現了不容置辯的巨大倡導精神的。莫斯科省黨組織和列寧格勒省黨組織在這一方面也工作得很好。而其他各省情形怎樣呢？其他各省大概還在那裏「設法動作」。例如，從烏拉爾方面就好像連一點聲息也聽不到，或者是很少聽到，而同時大家都知道烏拉爾是一個很大的工業中心。關於西西伯利亞和庫茲巴斯，也要這樣說，大概在那裏還沒有來得及「動作起來」。不過，毋庸懷疑的，就是我們各個黨組織一定會擔任起這件事情，並幫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克服各種難關。至於說到另一方面的事情，——制止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裏的那些頑固保守份子，——那末在這裏事情就會比較複雜一些了。在這裏，首先就會須勸導，頑耐地和以同志態度勸導工業方面的這些保守份子，使他們相信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進步性，使他們相信有用斯達漢諾夫精神改變態度的必要。而如果勸導方法不能奏效，那就會須採取更堅決的辦法。例如拿鐵路人民委員部來說吧。不久以前，在這個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裏，曾有過這樣一些教授、工程師以及其他專家——其中有共產黨員，——他們硬要大家相信，每小時十三至十四公里的貨車駛行速率已是界限，如果超出這個界限，那就是甘願違背「營業學」。這會是一部分頗有威信的人，他們曾在口頭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觀點，而且給鐵路人民委員部所屬機關發出種種訓令，而且一般就是鐵路營業人員中間的「思想權威」。我們雖然不是鐵路事業專家，可是我們根據鐵路事業方面許多實際工作人員底建議，也奉勸這些有威信的教授說：十三個至十四公里的速率，並不是界限；在事情組織得相當正確時，是可以擴大這個界限的。



這些人在回答這點時，不僅沒有傾聽經驗和實踐底呼聲並改變其處事態度，却反而奔來進行鬥爭來反對鐵路事業方面的進步份子，並更其加緊宣傳自己那些保守主義觀點。當然，我們會不得不給這些受人尊敬的人們一個輕輕的打擊，並客客氣氣地請他們離開鐵路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鼓掌）。而結果怎樣呢？我們現有的貨車駛行速率已是每小時十八至十九公里。（鼓掌）。同志們，據我的意見，在我們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裏，在絕對必要時也須採取這種辦法，這當然是在那些頑固保守份子竟不停止其妨礙和阻撓斯達漢諾夫運動的行爲的時候。

第二。任務就在於要幫助另外一種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們改變其工作方法，並領導斯達漢諾夫運動，這些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是不想阻撓斯達漢諾夫運動的，他們是同情這個運動的，但他們還未能改變其工作方法，還未能領導這個運動。同志們，我應當說，這樣的經濟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師在我國是不少的。而如果我们將切實幫助這些同志，那他們在我國就一定會更其增多。

我認爲：如果這些任務將由我們完成，那斯達漢諾夫運動就會盡量開展，就會普及我全國各省各區，就會給我們顯出新成功的奇蹟。

## （五）兩句話

現在，我關於這次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底意義，還要說幾句話。列寧曾教導說：只有不懂善於教導工農，而且還善於向工農學習的領導者，才能是真正的波爾什維克的領導者。在波爾什維克中間，竟有些人聽不慣列寧這幾句話。可是，歷史却向我們表明，列寧就在這一方面也原來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的

確，千百萬勞動者、工人和農民，是勞動着，生活着，奮鬥着。這些人並不是白白生活着，他們在生活  
和奮鬥時，當然就積蓄着很豐富的實踐經驗，——關於這一點，誰能懷疑呢？忽視這種實踐經驗的領導  
者，是不能算作爲真正領導者的，——關於這一點，難道可以懷疑麼？所以，我們——黨和政府底領導  
者——不僅是應當教導工人，而且還應當向工人學習。如果說你們——本次會議參加者——在這裏，在  
這次會議上，是從我們政府底領導者方面學得了一些東西，——那末關於這一點，我當然不來否認。可  
是，另一方面，如果說我們——政府領導者——也從你們方面，從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方面，從本次會議參  
加者方面，學得了許多東西，——那同樣也是不可否認的。因此，實在感謝你們諸位同志，感謝教益，  
非常感謝！（熱烈鼓掌）。

最後，關於應如何標榜本次會議以誌紀念的問題，我還有兩句話要說。我們在主席團這裏已經商量  
過了，並認爲必須給這次會議——政府領導者與斯達漢諾夫運動領導者的會議——留下某種紀念。結果，  
我們就決定要從你們中間，薦舉一百個至一百二十個人去榮膺最高獎章。

喊聲：對呀。（熱烈鼓掌）。

斯大林說：同志們，既然你們贊成，那我們就來實行這樣辦吧。

（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參加者們向斯大林同志熱烈歡呼致敬。雷一般的鼓掌聲和雄壯的「烏拉」  
聲震動整個會場。慶祝全黨領袖斯大林同志的無數歡呼聲，從全場四面八方發出。最後，三千  
個參加會議者一致高唱無產階級的讚美歌——國際歌）。

## 論蘇聯憲法草案

——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非常第八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當斯大林同志走上講台時，全場熱烈鼓掌歡迎多時。全場起立。到處高呼：「願斯大林同志萬壽無疆！」，「斯大林同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偉大的英才斯大林同志萬歲！」，「維瓦特！」，「紅色戰線！」，「斯大林同志光榮！」）

### （一）憲法委員會之成立及其任務

同志們！

大家知道，提出憲法草案到本次代表大會來審核的憲法委員會，是根據第七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會底特別決議所成立的。這個決議是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通過的。其原文如下：

「（1）按照以下方向來修改蘇聯憲法：

（甲）使選舉制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選舉來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選舉，用直接的選舉來代替多級的選舉，用不記名的選舉來代替記名的選舉；

(乙) 確定憲法底社會經濟基礎——使憲法適合於蘇聯現時階級力量對比關係（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已建立成功，富農階級已被粉碎，集體農莊制度已經勝利，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奠定為蘇維埃社會底基礎等等）。

(2) 委託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憲法委員會根據第一項所定原則來擬定修正的憲法條文，然後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批准之。

(3) 蘇聯蘇維埃政權機關底下屆選舉，應根據新選舉制來舉行」。這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的事。在通過這個決議案後的次日，即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蘇聯中央執

行委員會就舉行其第一次全會，並為執行第七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而成立由三十一個委員組成的憲法委員會。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會委託憲法委員會擬定修正的蘇聯憲法草案。

這就是憲法委員會應當根據來進行其工作的正式理由和蘇聯最高機關底指令。

於是，憲法委員會就應當估計到那些從一九二四年至現今在蘇聯生活中向社會主義方面實現的一切進展，來修改那於一九二四年通過的現行憲法。

## (二)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

### 年間在蘇聯生活中發生的變更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生活中究已發生什麼變更，而是憲法委員會必須在其憲法草案中加以反映的呢？

這些變更底實質何在呢？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所有的情形怎樣呢？

這會是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當時，蘇維埃政權在儘量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曾容許資本主義有那些許的活躍；當時，它計算到在兩個經濟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競賽過程中來組織社會主義體系對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優勝。當時，任務是要在這一競賽過程中來鞏固社會主義底陣地，達到消滅資本主義份子，完成社會主義體系底勝利，使其成爲國民經濟底基本體系。

當時，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是很不雅觀的。固然，它當時已在慢慢恢復起來，可是，它的生產量還遠未達到戰前水平。它當時所倚據的，是舊的落後的不豐富的技術。當然，它當時是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了的。我國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份底比重在當時約佔百分之八十。可是，資本主義部份在工業中所佔比重，畢竟還不少於百分之二十。

當時，我國農業是更不雅觀的。固然，地主階級是已被消滅了，可是，農業資本家階級，即富農階級，還有不小的力量。當時，整個說來，農業好像是那些以中世紀落後技術來經營的細小個體農民農莊所形成的茫無邊際的海洋。而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則會好像是這個海洋中的零星細小的島嶼，老實說，它們當時在我們國民經濟中是還沒有若干嚴重意義的。當時，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尚屬薄弱，而富農則還有力量。我們當時還沒有說消滅富農，而只是說限制富農。

關於國內商品流轉，也要這樣說。當時在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部份尚不過只佔什麼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其餘地盤却尚被商人、投機者及其他私人佔據着。

我國經濟在一九二四年的情形，曾是如此。

我們現時在一九三六年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當時是處在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期，資本主義有些許活躍的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則已處在新經濟政策最後一個時期，新經濟政策終結時期，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都已被完全消滅的時期。

首先就從我國工業來看吧，我國工業在這個時期已經長成爲巨大的力量了。現在已經不可說它是力量薄弱和技術設備不好的工業了。恰巧相反，它現在是倚據於新的豐富的現代的技術，特別發展的重工業以及更發展的機器製造業的。而最主要的，就是資本主義已從我國工業範圍中完全被驅逐出去了，而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現時是在我國工業中獨佔統治的體系。我國現時社會主義工業從出產量方面看來已超過戰前工業至七倍以上的事實，是不可看作一件小事的。

在農業方面，我們現在所有的，已經不是技術落後和富農佔有勢力的細小個體農民農莊的海洋，而是世界上最大的機器化的用新技術武裝起來的生產，即包括一切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體系。大家知道，在農業中，富農已被消滅了，而那倚據於中世紀落後技術的細小個體農民農莊部份僅佔很小的地位，而它在農業播種面積方面所佔的比重，至多也不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不可不指出這樣一件事實，就是集體農莊現在已擁有三十一萬六千架拖拉機，共五百七十萬馬力，而與蘇維埃農莊一共計算起來，就有四十萬餘架拖拉機，共七百五十八萬馬力。

至於講到國內商品流轉，那末商人與投機者已被我們從這方面完全驅逐出去了。現在全部商品流轉都完全握在國家、合作社與集體農莊手中。新的蘇維埃的商業，沒有投機者的商業，沒有資本家的商業，已經產生和發展了。

這樣，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的完全勝利，現在已經是事實了。

而這是說明什麼呢？

這就是說，人剝削人的現象已被剷除和消滅了，而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則已奠定爲我們蘇維埃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了。（鼓掌多時）。

由於在蘇聯國民經濟方面有這一切變更的結果，於是我們現在就有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這個經濟是不知危機和失業爲何物，不知貧困和破產爲何物，並給予公民們以享受豐裕文化生活的一切可能的。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我國經濟方面所發生的變更，大體上就是如此。

由於在蘇聯經濟方面已發生這些變更，於是我國社會底階級結構亦與此適應而變更了。

大家知道，地主階級是由於國內戰爭勝利結束的結果就已被完全消滅了的。至於說到其他剝削階級，則它們也與地主階級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在工業方面已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面已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轉方面已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這樣，所有一切剝削階級都被消滅了。

剩下的有工人階級。

剩下的有農民階級。

剩下的有智識界。

可是，如果以爲這些社會集團在這時期中沒有發生任何變更，比方說，如果以爲他們還是與在資本主義時期一樣，那就錯誤了。

例如拿蘇聯工人階級來說吧。人們往往照舊稱它爲無產階級。可是，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無產

階級就是在這樣一個經濟體系下沒有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階級，在這個經濟體系下，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是屬於資本家的，資產階級是剝削着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就是被資本家剝削的階級。而在我國，大家知道，資本家階級已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從資本家手中奪來轉交給那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力量的國家了。於是，已沒有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家階級了。於是，我國工人階級就不僅沒有被剝奪生

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反而與全體人民一起佔有着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了。既然它佔有着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被消滅，——於是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都被完全排除了。既然如此，那難道還可把我國工人階級稱為無產階級麼？很明顯的，這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為要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家階級，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並消滅那些產生無產階級的生產條件。可以說蘇聯工人階級已實現了解放自己的這些條件麼？絕對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蘇聯無產階級已變成爲完全新的階級，已變成爲已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消滅，已把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奠定，並引導着蘇維埃社會按共產主義道路前進的蘇聯工人階級。

由此可見，蘇聯工人階級是完全新的已擺脫剝削制的工人階級，這樣的工人階級是在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

現在我們來說農民問題。人們照例都說農民是這樣一個小生產者階級，這個階級底組成份子，好像一盤散沙，散佈在全國地面上，各人單獨在自己的小農莊上運用落後技術來勉強從事耕種，他們是私有制度的奴隸，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所放肆剝削的。的確，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農民，如就其基本羣衆來說，就正是這樣的階級。可以說我國現代農民——蘇聯農民——羣衆是與這樣的農民相像麼？不是的，是不可這樣說的。這樣的農民在我國已經沒有了。我們的蘇聯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在我國已沒有能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了。於是，我國農民就是已擺脫剝削制的農民。其次，我們的蘇聯農民底絕大多數都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就是說，他們把自己的工作和財產不是建築在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上，而是建築在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上。最後，我國農民底經濟基礎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長成的集體所有制。

由此可見，蘇聯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在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



最後，我們就要說到智識界問題，工程技術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一般職員等等問題。在過去這一時期中，我國智識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更。這已經不是那企圖把自己看作超階級的，而其實大多數都是替地主資本家服務的舊的頑固的智識界了。我們的蘇聯智識界是與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聯的完全新的智識界。第一，智識界底成份變更了。在我們的蘇聯智識界中，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只佔很小的百分數。蘇聯智識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由工人階級、農民以及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份子。最後，智識界底活動性質本身也變更了。從前，它是會應服務於富人階級的，因為它曾沒有別的出路。現在，它應服務於人民，因為剝削階級已不復存在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它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這裏，它與工農攜手建設着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由此可見，這是完全新的勞動的智識界，這樣的智識界是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內都找不到的。這就是在過去這一時期中，在蘇維埃社會底階級結構方面發生的變更。

這些變更是說明什麼呢？

第一，這些變更就是說明：在工人階級與農民間以及在這兩個階級與智識界間的界線是正在泯滅着，而舊時的階級特殊性也正在消失着。這就是說，這些社會集團間的距離是日益縮減着。

第二，這些變更就是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經濟矛盾是正在降低着，正在泯滅着。

最後，這些變更就是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政治矛盾也是正在降低着，正在泯滅着。

這就是蘇聯階級結構方面的變更。

關於蘇聯社會生活變更的情形，如果不說說還有一方面的變更，那是不完全的。我所指的，就是蘇聯境內民族相互關係的方面。大家知道，在蘇聯成份內約有六十個民族、民族集團和小民族。蘇維埃國家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不言而喻的，關於蘇聯各族人民相互關係的問題，對於我們是不能不有第一等

意義的。

大家知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於一九二二年在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它是根據蘇聯各族人民平等與自願的原則組成的。那於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的現行憲法是蘇聯第一個憲法。在那個時候，各族人民間的關係還沒有應有的調整，對於大俄羅斯人的不信任心理底遺毒尚未消失，離心勢力還繼續發生作用。會須在這種條件下，在經濟政治軍事互助基礎上來調整各民族人民底兄弟合作，把他們聯合為一個聯盟的多民族國家。蘇維埃政權曾不能不見這件事業的困難。它看見了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失敗實驗。它看見了舊奧匈帝國破產的實驗。可是，它畢竟還是實行了創立多民族國家的實驗——因為它知道，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多民族國家，是一定能挨過一切任何考驗的。

從那時起，已經有十四年了。這樣一個時期，已足夠來審查這一實驗了。而結果是怎樣呢？過去這一時期，毫無疑義地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的實驗是完全成功了。這是列寧民族政策毫無疑義的勝利。（鼓掌多時）。

為什麼能有這一勝利呢？

因為已沒有剝削階級，而剝削階級是各民族彼此爭鬥的主要組織者；因為已沒有剝削制，而剝削制是培植互不信任心理和燃燒民族主義狂熱的；因為有工人階級執掌着政權，而工人階級是任何奴役制度敵人，是國際主義思想底忠實代表者；因為在事實上實現了各民族人民在經濟社會生活所有各方面的互助；最後，因為蘇聯各民族人民底民族文化，即形式為民族的而內容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已有蓬勃的發展——由於所有這些以及與此類似因素的結果，就使蘇聯各民族人民底面貌根本改變了，在他們中間已消失了互不信任的感覺，在他們中間已發展了互相友愛的情感，並因此而調整了在一個統一聯盟國家體系中各民族人民的真正兄弟的合作。

結果，我們現在就有已完全形成的、已挨過一切考驗的、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底堅固性是值得使世界任何一洲的任何一個單民族國家都望而生羨的。（熱烈鼓掌）。

這就是在過去這一時期中，在蘇聯民族相互關係方面所發生的變更。

這就是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蘇聯經濟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方面所發生的變更底總結。

### （三） 憲法草案底基本特點

蘇聯生活所有這些變更在新憲法草案中得到了什麼反映呢？

換句話說：提到本次代表大會上來審核的憲法草案底基本特點是怎樣呢？

憲法委員會曾受委託來修改一九二四年憲法底條文。由於憲法委員會工作的結果，就得出憲法底新條文，即蘇聯新憲法草案。憲法委員會在起草新憲法草案時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憲法不應當與綱領混淆起來。這就是說，在綱領與憲法間是有實質差別的。綱領所說的，是尚不存在的東西，是應在將來達到爭得的東西；反之，憲法所應當說的，却是已有的東西，是現在已達到已爭得的東西。綱領主要是關於將來，而憲法則是關於現在。

讓我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吧。

我們蘇維埃社會已達到這一步，就是它在基本上已實現了社會主義，已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說已實現了在馬克思主義者們方面又稱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初級階段的制度。這就是說，我們在基本上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鼓掌多時）。共產主義這第一階段底基本原則，就是人所共

知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公式。我們的憲法應當反映這一事實，即社會主義已被我們爭得的事實麼？我們的憲法應當以社會主義已被我們爭得的這一事實為基礎麼？絕對是應當的。其所以應當，是因為社會主義在蘇聯是已達到已爭得的東西。

可是，蘇維埃社會還沒有實現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式為基本原則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雖然它是以在將來達到實現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為目的。我們的憲法是否能以現時尚不存在的尚應爭得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為基礎呢？不是的，它是不能這樣作的，因為共產主義最高階段是在蘇聯尚未實現的，是在將來應當實現的東西。它是不能這樣作的，如果它不願意把憲法變成綱領或關於將來成功的宣言。

這就是我們的憲法在現今歷史時期的範圍。

這樣，新憲法草案是已走過的道路底總結，是已爭得的成功底總結。所以，它是在事實上已達到已爭得的種種成功底登記和立法固定。（熱烈鼓掌）。

這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第一個特點。

其次，各資產階級國家底憲法通常都是以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永古不移的信念為出發點的。構成這些憲法主要基礎的，就是資本主義底原則，資本主義底基本柱石：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以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人對人的剝削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存在；社會兩個極端底對立——在一個極端上是勞動者大多數人的貧窮困乏，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則是不勞而獲者少數人的奢華揮霍；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憲法就是倚據於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資本主義柱石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憲法就是反映這些柱石，用立法手續把它們固定起來的。

而蘇聯新憲法草案則與資本主義各國憲法不同，蘇聯新憲法草案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在蘇聯內已被消滅

的事實，以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內已獲得勝利的事實爲出發點的。構成蘇聯新憲法草案主要基礎的，就是社會主義底原則，就是已爭得已實現的社會主義基本柱石：對於土地、森林、工廠以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剝削制和剝削階級底消滅；大多數人貧困和少數人奢華揮霍現象底消滅；失業現象底消滅；按「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公式來從事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的公民底義務和光榮職責。勞動權，即每個公民領得有保障的工作的權利；休息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新憲法草案是倚據於這些以及與此類似的社會主義柱石的。它反映着這些柱石，它用立法手續把這些柱石固定起來。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第二個特點。

再其次。資產階級憲法是默然從下述前提出發的：社會是由彼此對抗的階級，由佔有財富的階級和沒有財富的階級所組成的；無論由那一個黨來執政，而對於社會的國家領導（專政）總是應當屬於資產階級的；憲法所以需要，是爲着把對於有產階級恰意有利的社會秩序固定起來。

而蘇聯新憲法草案則與資產階級憲法不同，蘇聯新憲法草案是從下述前提出發的：在社會中已經沒有彼此對抗的階級；社會是由兩個互相友愛的階級，即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執政權的，正是這兩個勞動階級；對於社會的國家領導（專政）是屬於工人階級，即社會先進階級的；憲法所以需要，是爲着把對於勞動羣衆恰意有利的社會秩序固定起來。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第三個特點。

再其次。資產階級憲法是默然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的，這個前提認爲：各民族與各人種是不能平權的；有享有完全權利的民族，也有無完全權利的民族；除此而外，還存在着第三種民族或人種——譬如在

殖民地，他們所有的權利是比那些無完全權利的民族更少的。這就是說，所有這些憲法在其基本上是民族主義的憲法，即各統治民族底憲法。

而蘇聯新憲法草案則與資本主義各國憲法不同，恰巧相反，蘇聯新憲法草案是具有深刻國際主義性的憲法。它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切民族和人種是完全平權的。它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各民族和各人種在膚色或在語言，在文化水平或在國家發展水平方面的區別，以及其他任何區別，是不能成爲辯護民族不平權現象的根據的。它所持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切民族和人種，不管它們過去和現在狀況如何，不管它們是強或是弱，都應當在社會所有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

這就是新憲法草案第四個特點。

新憲法草案第五個特點，就是它那一貫的徹底堅定的民主主義。從民主主義觀點看來，各資產階級憲法可分兩類：第一類憲法是直接否認公民平權和民主自由，或在事實上把公民平權和民主自由變爲烏有的。另一類憲法則是樂意接受甚至標榜民主主義原則的，但同時却加上這樣一些附帶條件與限制，結果就使民主權利與自由概被損傷無餘。他們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選舉權，可是立刻就用居住年限、教育程度以至於財產標準來加以限制。他們說公民有平等權利，但立刻就加上附帶條件，說女子或一部分女子是除外的。還有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蘇聯新憲法草案底特點，就在於它完全沒有此類附帶條件和限制。對於它是沒有積極公民或消極公民的，對於它是所有一切公民都是積極的。它不承認在男人與女子，「久居者」與「暫居者」，有產者與無產者，受過教育者與未受過教育者間有權利差別。對於它是所有一切公民都有平等權利的。決定每

個公民在社會上的地位的，不是財產狀況，不是民族出身，不是性別，不是職位，而是各人的能力和各人的勞動。

最後，新憲法草案還有一個特點。資產階級的憲法通常僅限於規定公民底形式權利，而不注意實現這些權利的條件，實現這些權利的可能，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他們暢談公民平等，可是忘記如果資本家與地主在社會上佔有財富和政治威權，而工人與農民却没有財富和政治威權，如果資本家和地主是剝削者，而工人和農民則是被剝削者，那末在僱主與工人之間，在地主與農民之間，是不能有真正平等的。又如：他們暢談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可是他們忘記：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可能來擁有適當的會場、良好的印廠、充分的印刷紙張等等，那末這些權利對於工人階級就會變成空話。

新憲法草案底特點，就在於它不以規定公民底形式權利為限，而是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的問題上。它不是簡單宣佈公民權利平等，而且還用立法手續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起來，把一切公民已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起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它不是簡單宣佈勞動權，而且還用立法手續把在蘇維埃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現象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起來以保證勞動權。它不是簡單宣佈民主自由，而且還按立法手續用一定物質條件來保證這些自由。因此，很明顯的，新憲法草案底民主主義不是一般「通常的」『公認的』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

這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底各個基本特點。

這就是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蘇聯經濟社會政治生活中發生的種種進展與變更在新憲法草案上的反映。

#### (四) 資產階級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

現在關於資產階級對憲法草案的批評說幾句話。

外國資產階級報章對於憲法草案的態度問題，顯然是有相當趣味的。外國報章既然反映各資產階級國家裏各種居民階層底輿論，所以我們就不能不說及這些報章所進行的反對憲法草案的批評。

外國報章對於憲法草案的最初反響，曾表現於故意緘默不提及我國憲法草案。我在此地所指的，就是最反動的法西斯的報章。這一種批評家認為最好是簡直默然不提及憲法草案，裝聾作啞，似乎不會有過憲法草案，而且似乎在天地間根本就沒有這種憲法草案一樣。也許有人說，緘默並不是批評。但這是不對的。作為特別藐視辦法的緘默方法也是一種批評方式，固然是愚蠢可笑的，但畢竟是一種批評方式。（全場大笑，鼓掌）。可是，他們所採取的緘默方法並沒有發生什麼效果。他們歸根到底不得不打開悶葫蘆，並通告世界，——雖然這對於他們是很痛心的，——說蘇聯憲法草案終究存在，而且不僅存在而已，並且對於人心開始發生有害的影響。而不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世界上總還有什麼輿論，有讀者，有活的人，這些人是想知道事實真相的，而要長久橫蠻欺騙這些人是沒有任何可能的。憑靠欺騙是走不多遠的……

第二種批評家是承認憲法草案確實存在於天地間的，但他們認為憲法草案是沒有多大趣味的，因為它在事實上不是憲法草案，而是一紙空文，而是用來玩弄某種手腕和欺騙人們的一種空洞的約言。他們同時還補充說：而且蘇聯也不能擬出較好的草案，因為蘇聯本身就是一個國家，而總共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



(全場大笑)，而既然蘇聯不是一個國家，那末它的憲法也不能是真正的憲法。這種批評家底標本代表，就是——雖然是很奇怪的——德國半官場雜誌德意志外交政治通信。該雜誌簡直說：蘇聯憲法草案是一種空洞約言，是一種欺騙，是「樸將卿的鄉村」。它毫不猶豫地宣稱：蘇聯不是一個國家，蘇聯「不過是一個確定的地理概念」(全場大笑)，所以蘇聯憲法不能認為是真正的憲法。

關於這種所謂批評家可以說什麼話呢？

偉大的俄國作家謝德林曾在其一篇傳奇小說中描寫一個剛復自用的官僚，這個官僚是眼界十分狹小，生性十分魯鈍的，可是他却極端自信和努力盡職。這個官僚在他所「管轄的」區域內殺了成千成萬的居民，燒燬了幾十座城市，建立了「秩序與治安」以後，眺望四周，忽然在天際雲邊看見了美國，這個國家當然是不十分著名的，而在那裏却有什麼誘惑人心的自由，在那裏却用別種方法來統治國家。這個官僚一看見了美國，就氣忿忿地說道：這是什麼國家，它是從那裏來的，它有什麼理由存在呢？(全場大笑，鼓掌)。當然，它是在數世紀以前偶然被人打開的，可是難道不能把它重新封閉起來，使它完全無聲無臭麼？(全場大笑)。他說罷這一番話以後，就寫下一個批示：「把美國重新封閉起來！」(全場大笑)。

我覺得德意志外交政治通信雜誌裏的老爺們與謝德林小說中的官僚是一而二的人物。(全場大笑，鼓掌表示贊同)。蘇聯早已成為這些老爺們底眼中釘了。蘇聯如燈塔一樣，已屹立一十九年，它用解放精神薰染着全世界工人階級，它使工人階級底敵人瘋狂發怒。而它，這個蘇聯，却不僅簡單存在而已，而且日益增長，不僅增長而已，而且日益繁榮，不僅繁榮而已，而且編製着新憲法草案，編製着這使各被壓迫階級精神奮發而懷着新希望的草案。(鼓掌)。既然如此，德國半官場雜誌裏的老爺們怎麼能不氣忿呢？他們大聲叫喊道：這是什麼國家，它有什麼理由存在呢(全場大笑)，如果它是一九一七年十月打開的，那為什麼不可把它重新封閉起來，使它完全無聲無臭呢？說罷這一番話以後，就批示如下：把

蘇聯重新封閉起來，並當衆宣佈說蘇聯不成其爲國家，蘇聯不過是一個簡單地理概念而已！（全場大笑）。謝德林小說中的官僚，雖然十分愚蠢，可是當他剛剛寫下那重新封閉美國的批示時，總還表現出一些瞭解實情的成份，因爲他立刻就捫心自問道：「可是，這也許是不能由我作主吧」。〔歡笑聲爆發，掌聲雷動〕。我不知道德國半官場雜誌裏的老爺們是否有充分智力來猜到下述一點，就是他們在紙上當然能夠「封閉」這個或那個國家，可是如果認真講起來，那末「這是不能由他們作主」的：（歡笑聲爆發，掌聲雷動）。

至於說蘇聯憲法好像是一種空洞約言，好像是「樸將卿的鄉村」等等，那我就援引一批已經確定不移而無待證明的事實。

在一九一七年，蘇聯各族人民推翻了資產階級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是事實，而不是約言。

其次，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地主階級並把從前屬於地主、官府和寺觀的一萬萬五千萬餘海克脫的土地轉交了農民，而且這還沒有把那些從前就在農民手中的土地計算在內。這是事實，而不是約言。

其次，蘇維埃政權剝奪了資本家階級，沒收了他們的銀行、工廠、鐵路以及其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把這些東西宣佈爲社會主義財產並委任工人階級最優秀人物來主持這些企業。這是事實，而不是約言。（鼓掌多時）。

其次，蘇維埃政權，既按新的社會主義的原則，用新的技術基礎，組織了工業和農業，於是就達到了下列的成績：現在蘇聯農業出產量比戰前多至一倍半，工業出產量比戰前多至七倍，而國民收入則比戰前增至四倍。凡此種種都是事實，而不是約言。（鼓掌多時）。

其次，蘇維埃政權消滅了失業現象，實現了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保證了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

子以良好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保證了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見諸實行。凡此種種都是事實，而不是約言。（鼓掌多時）。

最後，蘇聯製定了新憲法草案，這個草案不是約言，而是把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登記起來和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而是把已達到已爭得的東西登記起來和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

既然如此，試問德國半官場雜誌裏的老爺們關於所謂「模將卿的鄉村」的廢話，如果不是爲着對人民隱瞞關於蘇聯的真相，使人民誤入迷途，欺騙人民，而是爲着什麼呢？

事實就是如此。而事實却正如俗話所說那樣，是頑強的東西。德國半官場雜誌裏的老爺們也許會說，他們是不顧事實的人。（全場大笑）。可是，那時就可以用俄國名句來回答他們：「法律不是爲着傻子寫的」。（全場歡笑，鼓掌多時）。

第三種批評家是不嫌承認憲法草案具有相當價值的，他們認爲這個草案是一種好現象，可是他們却很懷疑草案中有些條文是否能夠見諸實現，因爲他們確信這些條文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所以這些條文應成爲紙上空文。這——如果說得客氣一點——就是懷疑論者。他們，這些懷疑論者，是在各國都有的。

老實說，我們不是第一次遇到他們的。當波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奪取政權時，懷疑論者曾說：波爾什維克也許不是壞人，可是掌握政權的事情，他們是辦不通的，他們一定會遭失敗的。而其實遭受失敗的，却原來不是波爾什維克，而是懷疑論者。

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這種懷疑論者曾說：蘇維埃政權當然是不壞的東西，可是鄧尼金協同高爾察克又加上外國人，大概會戰勝這個政權的。而其實，懷疑論者就在這一點上也失算了。

當蘇維埃政權公佈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懷疑論者又跑出台來說道：五年計劃當然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它未必可以實現吧，關於五年計劃的事情，波爾什維克大概是辦不成功的。可是事實又證明懷疑論者倒

霍：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就完成了。

關於新憲法草案以及懷疑論者對於此草案的批評，也要這樣說。只須把草案公佈出來，這種批評家就重新跑出台來發表他們那一套悲觀的懷疑議論，說憲法中有些條文未必可以實現。毫無疑義的，懷疑論者現在這一次，也會像他們過去屢次失敗那樣遭受失敗的。

第四種批評家在攻擊新憲法草案時，認為這個草案是「向右轉」，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是「取消波爾什維克制度」。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道：「波爾什維克已經向右轉，——這是事實」。在這方面特別賣力的，就是某些波蘭報紙以及一部分美國報紙。

關於這些所謂批評家可以說些什麼話呢？

如果擴大工人階級專政基礎以及使專政變為更靈活的，因而也就是更強大的對於社會的國家領導制度，這竟被他們解釋成爲不是加強工人階級專政，而是削弱這種專政，甚至放棄這種專政，那就可問一問：而這些老爺們一般是否知道什麼是工人階級專政呢？

如果用立法手續把社會主義勝利固定起來，用立法手續把工業化、集體化和民主化事業種種成功固定起來，這在他們看來是「向右轉」，那就可以問一問：這些老爺們一般是否知道左與右有何區別呢？（全場大笑，鼓掌）。

毫無疑義的，這些老爺們在自己對於憲法草案的批評中完全弄糊塗了，而因爲弄糊塗了，於是就把左右都弄錯了。

說到這裏，不可不記起戈果里所著小說死靈魂上面的一個貴族家裏的女僕「丫頭」片拉格妮。據戈果里所描寫，這個「丫頭」有一次自告奮勇地給齊切科夫底馬車夫謝里芳指示道路，可是她因爲不會分別道路的左右，於是就弄糊塗了，落到不好意思的地位。必須承認，波蘭報紙中的批評家雖然十分自負不

凡，可是却與死靈魂中的貴族家裏的女僕「丫頭」片拉格姬底瞭解程度，相去不遠。（鼓掌）。你們記得，馬車夫謝里芳認為因片拉格姬弄不清左右而必須加以譴責，於是對她說：「哎，你這個懶腳丫頭：竟不知道那邊是右，那邊是左」。我覺得也應當這樣譴責這些倒楣的批評家，對他們說：哎，你們這班可憐的批評家：竟不知道那邊是右，那邊是左。（鼓掌多時）。

最後，還有一種批評家。如果上述那種批評家責備憲法草案是放棄工人階級專政，那末這一種批評家，就恰巧相反，却責備憲法草案絲毫沒有改變蘇聯現狀，絲毫沒有觸犯工人階級專政，沒有容許各政黨自由，而是完全保留着蘇聯共產黨現在的領導地位。同時，這一種批評家認為：在蘇聯沒有各政黨自由，就是違背民主主義原則的標誌。

我應當承認，新憲法草案確實是保留着工人階級專政制度底效力，同樣也保留蘇聯共產黨現在的領導地位而毫無變更。（熱烈鼓掌）。如果可敬的批評家認為這是憲法草案底缺點，那就只可對此表示惋惜。可是，我們波爾什維克却認為這是憲法草案底長處。（熱烈鼓掌）。

至於說到各種政黨自由，那末我們在這裏却抱着與此有些不同的觀點。黨是階級底一部分，是階級底先進部分。幾個黨，也就是說各黨自由，只有在下述一種社會裏才能存在，在這種社會裏有彼此對抗的階級，而這些階級底利益是互相敵對而不可調和的，在這種社會裏——比方說——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等等。可是，在蘇聯已經沒有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等一類的階級了。在蘇聯只有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底利益不僅不彼此敵對，而是恰巧相反，是互相友愛的。所以，在蘇聯就沒有幾個黨存在的基礎，也就是說沒有這些黨自由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共產黨——存在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可以存在，這就是勇敢和徹底保護工農利益的共產黨。而它把這兩個階級底利益保護得不壞，——是未必可以絲毫懷疑的。（熱烈鼓掌）。

人們說到民主。但什麼是民主呢？民主在有彼此對抗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歸根到底是對於有勢力者的民主，是對於有財產的少數人的民主。反之，民主在蘇聯却是對於勞動者的民主，也就是說對於一切人的民主。而由此就得出結論：違背民主主義原則的不是蘇聯新憲法草案，而是資產階級的憲法。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我認為蘇聯憲法是世界上唯一澈底民主的憲法。

資產階級對蘇聯新憲法草案的批評，就是如此。

## (五) 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現在，我們就來說公民們在全民討論憲法草案時所提出的對於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

大家知道，在全民討論憲法草案時提出了頗多的修正和補充。所有這些修正和補充都在蘇聯報章上公佈過了。因為這些修正所含內容既很不一律，而其價值又不一致，所以我認為應將其分為三類。

第一類修正底特點就在於：這些修正所說的，不是關於憲法問題，而是關於將來立法機關日常工作問題。關於保險事業的個別問題，關於集體農莊建設事業的某些問題，關於工業建設事業的某些問題，關於財政事宜的問題，——這就是這類修正所提到的問題。提出這些修正者大概是沒有懂得憲法問題和日常立法問題間的區別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就力圖盡可能多滲進一些法律到憲法中去，簡直要把憲法變成某種法律大全。可是，憲法並不是法律大全。憲法是基本法，而且僅僅是基本法。憲法並不排除將來立法機關日常工作，而是預定要有這種工作。憲法給予這種機關將來立法工作以法定的基礎。所以，這類的修正和補充既與憲法沒有直接關係，就應當——在我看來——交到我國將來

的立法機關去。

應歸入第二類的，是這樣一些修正和補充，這些修正和補充是企圖在憲法內加進一些歷史備考成份，或者加進一些關於蘇維埃政權現時還沒有達到，而將來應當達到的成功的宣言成份的。在憲法內指出黨、工人階級以及一切勞動羣衆多年以來在爲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克服了那些困難；在憲法內說明蘇維埃運動底終極目的，即建成完全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這類修正用各種說法所重複提到的問題。我認爲；這類修正和補充既與憲法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也是應當擱在旁邊去的。憲法是把那些已經爭得的已有保障的勝利品登記起來和用立法手續固定起來。如果我們不願意曲解憲法這一基本性質，我們就不應當在憲法內填寫一些關於已往的歷史備考消息，或關於蘇聯勞動羣衆將來勝利品的宣言。爲着這件事情，我們是有其他方法和其他文件的。

最後，應歸入第三類的，是與憲法草案有直接關係的修正和補充。

這類修正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含着字句修改性質的。因此，這類修正可以交到本屆代表大會審編委員會，我想，代表大會一定會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並委託它把新憲法全文最後審編一番的。

至於第三類修正中其餘一部分，則它們有較關實質的意義，所以我認爲必須在這裏說說這些修正。

(1) 首先就要說到對於憲法草案第一條的修正。這裏有四個修正。第一個修正是主張用「勞動者國家」字樣來代替「工農國家」字樣的。另一個修正是主張把「工農國家」字樣改爲「工農及勞動知識界底國家」的。第三個修正是主張用「蘇聯境內所有一切人種和民族底國家」字樣來代替「工農國家」字樣的。第四個修正是主張用「集體農莊莊員」或「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幾字來代替「農」字的。

是否應當採納這些修正呢？我認爲是不應當的。

憲法草案第一條是說明什麼呢？它說明蘇維埃社會底階級成份。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否

可以在憲法內不說到關於我國社會底階級成份問題呢？不是的，是不可以的。大家知道，蘇維埃社會是由兩個階級，由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正是這一點。所以，憲法草案第一條是正確地反映着我國社會底階級成份的。有人可以問：而勞動知識界呢？要知道，知識界從來不是一個階級，而且也不能是一個階級，——它曾是，而且現在還是由社會裏各階級出身的份子組成的階層。在舊時，組成知識界的，多半是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份子，一部分是由農民出身的份子，至於由工人出身的份子，則是極少極少的。而在我們蘇維埃時代，知識界主要都是由工農出身的份子組成的。可是，不管它成份如何，不管它性質如何，它畢竟是一個階層，而不是一個階級。

這個情形不會損傷勞動知識界底權利麼？一點也不會！憲法草案第一條所說的，不是蘇維埃社會各階層底權利，而是這社會底階級成份。關於蘇維埃社會各階層底權利，包括勞動知識界底權利在內，主要是在憲法草案第十章第十一章內載明的。從這兩章內可以明白看見：工人、農民以及勞動知識界，在全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都是完全平權的。所以，關於勞動知識界底權利會被損傷的話，是根本說不上的。

關於蘇聯境內各人種和各民族，也要這樣說。在憲法草案第二章內已經載明蘇聯是各平權民族底自由聯盟。是否值得在憲法草案第一條——此條所說的，是蘇維埃社會底階級成份，而不是蘇維埃社會底民族成份，——裏，重複這一公式呢？很明顯的，是不值得的。至於蘇聯境內各民族和各人種底權利，則在憲法草案第二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內都已載明了。從這幾章內可以明白看見：蘇聯各民族和各人種，在全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所有各方面都是享有同等權利的。所以，關於民族權利會被損傷的話，是根本說不上的。

同樣，用「集體農莊莊員」字樣，或用「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農」字，也是不正確



的。第一，在農民中間，除集體農莊莊員而外，還有一百多萬非集體農莊莊員的農戶。怎樣處置他們呢？提出這個修正者是不是想要把他們除開不算呢？如果這樣想，那就不合理了。第二，雖然大多數農民已在進行集體農莊經濟，但這還不是說他們已經不是農民了，他們已經不復有其個人經濟，個人園圃等等了。第三，如果照這個修正推論下去，那就必須用「社會主義工業勞動者」字樣來代替「工」字了；但不知為什麼提出這個修正者竟沒有提議這樣作。最後，難道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已經消失了麼？如果它們還沒有消失，那是否值得把它們倆者固有名稱從字典中一筆勾銷呢？提出這個修正者大概不是指現有社會而言，而是指將來社會，指將來已沒有階級，而工人和農民都已變成統一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的勞動者的社會而言。所以，他們顯然是跑到前面去了。可是，在製定憲法時，是不應當從將來出發，而應當從現在，從已有事實出發的。憲法是不可以而且不應當跑到前面去的。

(2) 其次，就是對於憲法草案第十七條的修正。這個修正正是主張完全刪去憲法草案第十七條，這條是說各盟員共和國均保留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的。我認爲這個修正是不正確的，因此是代表大會所不應採納的。蘇聯是各平權盟員共和國底自願聯盟。如果從憲法內把關於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一條刪去，那就是違背這聯盟底自願性質。我們可以同意這個步驟麼？我認爲是不可以而且不應當同意這個步驟的。有人說：在蘇聯沒有一個共和國竟會願意退出蘇聯，所以第十七條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說在我們蘇聯沒有一個共和國竟會願意退出蘇聯，這當然是對的。可是絕對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說我們不應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盟員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同樣在蘇聯也沒有那個盟員共和國竟會願意壓迫另一個盟員共和國。可是絕對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說應當從蘇聯憲法裏把關於盟員共和國權利平等一條刪去。

(3) 再其次，有人提議在憲法草案第二章內另外加上一條說：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其經濟和文化發展到相當水平時即可改組爲盟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可以採納這個提議麼？我認爲是不

應把它採納的。它不僅按其內容說來是不正確的，而且按其所持理由說來也是不正確的。把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是不可以該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成熟性爲理由的；同樣，把某個共和國留爲自治共和國，也是不可以該共和國底經濟和文化落後性爲理由的。如果以此爲理由，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不是列寧主義的看法。例如韃靼共和國仍爲自治共和國，而卡查赫共和國却要改爲盟員共和國，但這還不是說，從文化和經濟發展程度方面看來，卡查赫共和國高於韃靼共和國。實際情形是恰巧相反的。例如，關於窩爾加河岸日耳曼人自治共和國和基爾吉茲盟員共和國，也要這樣說，按文化和經濟方面說來，前者是高於後者的，但前者則仍爲自治共和國。

究竟要具備那些標誌時，才有根據把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呢？

這種標誌有三。

第一，就是一定要這個共和國是邊疆的，而不是四週皆爲蘇聯領土所包圍的。爲什麼呢？因爲如果給盟員共和國保留着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那就一定要這個已改爲盟員共和國的共和國有可能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提出關於它退出蘇聯的問題。而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却只有那與某一外國相毗連的，因而也就不是四週皆爲蘇聯領土所包圍的共和國。當然，在我們蘇聯是沒有那一個共和國竟會在事實上提出關於退出蘇聯的問題的。可是，既然給盟員共和國保留着退出蘇聯的權利，那就須使這個權利不致變成空洞的毫無意思的紙上虛文。例如拿巴什基里亞共和國或韃靼共和國來說吧。假定這兩個自治共和國已改爲盟員共和國。試問它們會能夠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提出關於它們退出蘇聯的問題麼？不是的，是不會能夠的。爲什麼呢？因爲它們四週都被蘇維埃共和國和蘇維埃省區所包圍着，所以實在說來，它們就是要退出蘇聯，也是無處可退的。（全場大笑，鼓掌）。因此，如果把這些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那是不正確的。

第二，就是一定要那個把自己的名稱給予該蘇維埃共和國的民族，在該共和國境內是比較密集的大多數。例如拿克里木自治共和國來說吧。它雖然是一個邊疆共和國，可是克里木的韃靼人在該自治共和國內是不佔大多數的，反之——他們在該處是佔少數的。所以，如果把克里木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那是不正確的，不合邏輯的。

第三，就是一定要這個共和國按其人口數量說來不是一個很小的共和國，一定要它所有的人口至少不在一百萬——譬如說——以下，而是在一百萬以上。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以爲一個人口極少而軍隊不大的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指望於獨立的國家的生存，那就不正確了。毫無疑義的，帝國主義猛獸們是一定會把它抓去吞食的。

我認爲：如果沒有具備上述三個客觀標誌，在現今歷史時期中提出關於把某個自治共和國改爲盟員共和國的問題，那是不正確的。

(4) 再其次，有人提議把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以及第二十九條內關於各盟員共和國屬下各邊區和各省行政區域劃分的詳細記載一概刪去。我認爲這個提議也是不可採納的。在蘇聯有些人非常樂意和孜孜不倦地隨便變更各邊區各省的界線，以致在工作中造成一種混亂而無把握的心理。憲法草案正是給這種人以限制。而這是很好的，因爲在這方面，也如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我們要有很有把握的自信空氣，要有穩定性，明確性。

(5) 第五個修正正是與第三十三條有關的。提出這個修正者認爲建立兩院制是不適當的，並提議取消民族蘇維埃。我認爲這個修正也是不正確的。如果蘇聯是單民族的國家，那末一院制是會優於兩院制的。可是，蘇聯並不是單民族的國家。大家知道，蘇聯是多民族的國家。我們有一個不分民族而代表蘇聯一切勞動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機關。這就是聯盟蘇維埃。可是，蘇聯各民族，除有共同利益而外，

還有它們自己的與其民族特點相關的特有的、特別的、利益。可以忽視這些特別利益麼？不是的，是不可能的。是否需要一個恰巧反映這些特別利益的專門最高機關呢？絕對是需要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機關，那就無法管理像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樣的機關就是第二院，就是蘇聯民族蘇維埃。

人們往往援引歐美各國國會制度底歷史，援引兩院制在這些國家裏僅僅給出許多壞處來，第二院照例都變爲反動勢力底中心，變爲阻礙着前進運動的障礙物的事實。所有這一切都是對的。可是，這些現象所以發生，是因爲在這些國家裏，在兩院中間是沒有平等的。大家知道，第二院往往是比第一院享有較多權利的，而且第二院照例都是用非民主方法組織起來的，往往是由上面指定其議員的方法組織起來的。毫無疑義的，如果使兩院彼此平等，使第二院也如第一院那樣按民主手續組織起來，那就不會有這種壞處了。

(6) 其次，有人給憲法草案提出補充，要求使兩院底代表名額相等。我認爲這個提議是可以採納的。據我看來，這個提議是能給予明顯的政治優點的，因爲它更加着重指出兩院底平等。

(7) 再其次，有人給憲法草案提出補充，說民族蘇維埃代表，也如聯盟蘇維埃代表一樣，應按直接選舉法選舉之。我認爲這個提議也是可以採納的。固然，它能造成一些在選舉時的技術不便。可是，它却能給予巨大的政治益處，因爲它一定會提高民族蘇維埃底威信。

(8) 又其次，是對於第四十條的補充，說應賦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頒佈臨時立法條例的權利。我認爲這個補充是不正確的，是不應由代表大會所採納的。不由某一個機關而由整批機關立法的情形，究竟是必須剷除的。這種情形是與法律穩定性原則相抵觸的。而法律穩定性却正是我們現時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的。立法權在蘇聯是只應當由一個機關，即蘇聯最高蘇維埃來行使的。

(9) 再其次，是對於憲法草案第四十八條的補充，說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不應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選出，而應由全國人民選出。我認爲這個補充是不正確的，因爲它與我國憲法底精神不合。依照我國憲法制度，在蘇聯不應有由全國人民選出的，與最高蘇維埃並列的，並能與最高蘇維埃對立的個人總統。在蘇聯的總統是集議制的——這就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包括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在內，這個主席團不由全國人民選出，而由最高蘇維埃選出，並應向最高蘇維埃報告工作。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最高機關的結構，是最民主的，是能夠保障國家免除不良變故的。

(10) 再其次，是對於同一條，即對於第四十八條的修正。這個修正底內容如下：將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增至十一人，以便由每一盟員共和國都有副主席一人。我認爲這個修正是可以採納的，因爲它會改善我們的事業，而且只會鞏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底威信。

(11) 再其次，是對於第七十七條的修正。這個修正是要求組織新的全蘇聯人民委員會——國防工業人民委員會。我認爲這個修正也是應當採納的（鼓掌），因爲把我國國防工業特別分出來並正式建立一個相當人民委員會來主持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我覺得這是只會改善我國國防事業的。

(12) 再其次，是對於憲法草案第一百二十四條的修正，要求以禁止舉行宗教儀式爲方向來修改該項憲法條文。我認爲這個修正是應被否決的，因爲它與我國憲法底精神不合。

(13) 最後，還有一個比較有關實質的修正。我所說的是對於憲法草案第一百三十五條的修正。該修正是主張褫奪僧侶、從前的白匪份子以及所有一切從前的人們和不參加有益於社會的勞動的人們底選舉權，或無論如何，應限制這種人底選舉權，只給予他們以選舉權，而不給他們以被選舉權。我認爲這種修正也是應被否決的。蘇維埃政權從前褫奪不勞動份子和剝削份子底選舉權，並不是永久的，而是暫時的，到一定時期爲止的。曾有過一個時候，這些份子進行了反對人民的公開戰爭，反抗了蘇維埃的法律。關

於褫奪他們的選舉權的蘇維埃法律，曾是蘇維埃政權對於他們這種反抗行動的回答。自那時到現在，已經過不少時間了。在過去這一時期中，我們已經把剝削階級消滅了，而蘇維埃政權則已變成爲不可被戰勝的力量了。難道還沒有到審改這種法律的時候麼？我認爲是已經到了。有人說這是有危險的，因爲那些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某些從前的白匪份子、從前的富農、神父等等，會鑽進國家最高機關裏來。但這裏究竟有什麼可怕呢？你怕甚麼，那你就不要到樹林裏去。（全場歡動，熱烈鼓掌）。第一，並非所有一切從前的富農、從前的白匪份子或神父都是敵視蘇維埃政權的。第二，如果人民在某些地方竟會選上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那就是說我們的鼓動工作做得太壞，於是我們就理應受到這種恥辱，而如果我們的鼓動工作將真是按波爾什維克精神去進行，那末人民就決不會容許這些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份子混進自己的最高機關裏來。這就是說，應當工作，而不應當叫苦（熱烈鼓掌），應當工作，而不應當等待以行政命令方式把一切都安排妥當。列寧還在一九一九年就說過，在不遠的將來，蘇維埃政權就會認爲施行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制是有益處的。請你們注意：沒有任何限制。這是他當外國武裝干涉還未被消滅，而我國工業和農業遠處在極壞狀態時說的哩。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十七年了。同志們，難道還沒有到實行列寧這一指示的時候麼？我認爲是已經到了。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在其所著俄共（波）黨綱草案中如何說吧。請讓我讀一下：

「爲避免那由一時歷史需要中得出不正確的普選結論起見，俄國共產黨應當向勞動羣衆解釋，褫奪一部分公民選舉權的辦法，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完全不像在大多數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所見過的一樣，涉及某一種類的宣佈爲終身被褫奪公權的公民，而只是涉及及剝削者，只是涉及及那些不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底基本法律，而進行頑強的反抗，以謀維持自己的剝削者地位，以謀保存資本主義關係的份子。因此，一方面，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因社會主義日益鞏固，以及因那些在客觀上有可能維

持其剝削者地位或保存資本主義關係的份子日益減少之故，被褫奪選舉權者的百分數，將自然日益減少。現時在俄國，這個百分數未必多於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在另一方面，在最不遠的將來，因外國武裝干涉停止，以及剝奪剝削者的事業完成之故，在某種條件下，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那時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將採取另外一種鎮壓剝削者反抗行動的方法，並實行沒有任何限制的普選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九四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關於對蘇聯憲法草案的修正和補充，就是如此。

## （六）蘇聯新憲法底意義

按照繼續幾及五月之久的全民討論結果說來，可以預料憲法草案是會被本次大會贊同的。（熱烈鼓掌，轉為歡呼，全場起立）。

再經過幾天，蘇聯就會有以擴展的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憲法了。

這將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以簡單明瞭的語氣，幾乎是以記錄的體裁，來說明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事實，來說明蘇聯勞動羣衆已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度而得到解放的事實，來說明擴展的最徹底的民主制在蘇聯勝利的事實。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這將是一個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裏千百萬誠實人們所曾經幻想的以及繼續幻想着的東西已在蘇聯實現了的文件。（熱烈鼓掌）。

這將是一個證明凡在蘇聯所已實現的，在其他國家裏也是完全可能實現的文件。（熱烈鼓掌）。

而由此就得出結論：蘇聯新憲法底國際意義是無限偉大的。

現在，當法西斯濁流污辱着工人階級底社會主義運動，污辱着文明世界最優秀人士底民主主義趨向時，蘇聯新憲法將是一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公訴書，說明社會主義與民主制度是不可被戰勝的。（鼓掌）。

蘇聯新憲法對於所有那些現在進行着反法西斯野蠻暴行的鬥爭的人們，將是一種精神幫助和實在助力。（熱烈鼓掌）。

蘇聯新憲法對於蘇聯各民族人民是有更大意義的。如果蘇聯新憲法對於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將是行動的綱領，那末它對於蘇聯各民族人民就是他們奮鬥的總結，他們在爲人類解放而奮鬥的戰線上勝利的總結。由於已經走過的鬥爭道路和忍受艱辛的結果，現在得到這一個說明自己勝利果實的憲法，是如何覺得爽快而快樂呵。知道我們的人究竟爲着什麼而作了堅忍的奮鬥，以及他們怎樣獲得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是如何爽快而快樂呵。知道我們的人所流的許多血原來沒有白流而是給了應有的結果，是如何爽快而快樂呵。（鼓掌多時）。這就在精神上武裝着我國工人階級、我國農民、我國勞動智識界。這就推動他們向前邁進，並提高其正當的自尊心。這就鞏固他們對自己力量的信心，並動員他們進行新鬥爭去爭取共產主義底新勝利。（熱烈鼓掌歡呼。全場起立。「烏拉」之聲如雷。一致高呼「斯大林同志萬歲！」全體代表起立唱國際歌。國際歌唱完後，又鼓掌歡呼。高喊：「烏拉！」，「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萬歲！」）。



# 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一九三八年九月——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底世界觀。這世界觀所以叫作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則是唯物主義的。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其辯證方法底特徵時，通常都是援引黑格爾，作為是規定了辯證法底基本特徵的哲學家。但這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法是和黑格爾底辯證法一樣的。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僅僅從黑格爾辯證法中採取其「合理的內核」，而摒棄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外殼，並向前發展了辯證法，因而賦與了辯證法以現代的科學的形態。

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方法不僅是根本上與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是與它正相對的。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他甚至於用觀念這個名稱把思維過程變成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界底創造主（*demiurge*），而現實界却不過是思維過程底外部表現。在我看來，却是恰巧相反，觀念只不過是被

「移置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其唯物主義底特徵時,通常都是援引費爾巴黑,作為是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但這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是和費爾巴黑底唯物主義一樣的。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從費爾巴黑底唯物主義中採取其「基本的內核」,把它向前發展為科學——哲學的唯物主義理論,而摒棄了它那唯心主義的和宗教——倫理的雜質。大家知道,費爾巴黑雖在本質上是唯物主義者,但他會極力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恩格斯曾多次聲稱,說「我們只要一去考察他的倫理學和宗教哲學,就立刻看出費爾巴黑有擺脫舊時的唯心主義的羈絆」(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頁)。

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dialego」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思維中的矛盾之揭露以及對立意見之衝突,是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維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為認識自然界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恆運動着和永恆變化着的現象,而把自然界發展看作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自然界中各對立勢力互相影響的結果。

辯證法是根本上與形而上學正相對的。

(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基本特徵如下:

(1) 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反,它把自然界不是看作什麼彼此隔離的彼此孤立的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底偶然堆積,而是看作聯繫着的統一的整體,在這裏,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是互相有機聯系着,互相依賴着,互相制約着。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沒有

聯系的，那它就是不可瞭解的，因為自然界任何一部分中的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條件沒有聯系的，是與它們隔離的，那它就會變成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把它看作是受其週圍現象所制約的，那它就可瞭解，就可論證了。

(2) 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反，它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的和不動的狀態，停頓的和不變的狀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的和不斷變化的狀態，不斷革新的和不斷發展的狀態，在這裏，無論何時都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都總有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衰頹着。

因此，辯證方法要求：在觀察現象時，不僅要以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為觀點，而且要以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為觀點，要以它們的產生和衰亡為觀點來加以觀察。

在辯證方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那在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那正在產生着和在發展着的東西，即令它在現時還似乎是不堅固的，因為在辯證方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才是不可被戰勝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體，由沙粒到太陽，由 protist (原始的活細胞。——「約、斯大林註」) 到人，都是處在永恆的產生和消滅過程中，處在毫不間斷的流動中，處在始終不倦的運動和變化中」(同上，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觀察物象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主要是在它們的相互聯系中，在它們的結合中，在它們的運動中，在它們的產生和消滅中來加以觀察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三頁)。

(3) 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反，它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簡單的增長過程，在這裏，數變是不引起質變

的；——而是看作這樣的發展，這個發展是由不大的和不顯露的數變進到顯露的變，根本的變，質變；在這裏，質變不是逐漸地到來的，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到來的，是表現於由一個狀態躍進於另一個狀態；質變不是偶然地到來的，而是按規律到來的，是由於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變積累起來的結果。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發展過程不應當瞭解為循環式的運動，不應當瞭解為過去事物底簡單重複，而應當瞭解為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的質態進到新的質態，由簡單而發展到複雜，由低級而發展到高級。

恩格斯說：

「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現代的自然科學，既供給這個檢驗以非常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於是就證明了：在自然界中，歸根到底說來，一切都是按辯證律進行的，而不是按形而上學進行的；自然界不是在永遠一樣的經常輾轉重複的循環週裏運動着，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在這裏，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以最有力的打擊，因為他證明了：整個現代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是那會延長到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底產物」（同上，第二三頁）。

恩格斯在說明辯證發展過程是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時說：

「在物理學中……每一個變化都是數轉變為質，即某個物體所固有的或某個物體所承受的某種運動底數量數變的結果。例如水底溫度最初對於水底液體狀態是沒有絲毫意義的；可是，當液體水底溫度不斷增加或不斷減少時，那就會有這樣一個時機到來，那時這個結合狀態就要變化，於是水就會變為蒸汽或冰塊……。例如必須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電力時，白金絲才開始發光；例如每種金屬都有其一定的熔解熱；例如每種液體都有其相當氣壓下特有的一定的冰點和沸點，——既然我們能用我們所

有的工具求得相當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其一定的危機點，在這點上只要施以相當的氣壓和冷化，就可把它變成液體了。物理學中所謂 *critical*（即由某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點。——約、斯大林註），大部分都不過是這樣一些交錯點底名稱，在這些交錯點上，運動底數的增減（數變）引起該物體狀態底質變，——因而在這些交錯點上是數轉變為質」（同上，第五二七至五二八頁）。

其次，恩格斯進而說到化學，他繼續說：

「化學可以稱為研究物體質變的科學，這種質變是在數量成份變化底影響下發生的。黑格爾自己已經知道這一點。譬如拿氧氣來說：如果結合在一個分子中的有三個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樣只有兩個原子，那我們就得到臭氧，即得到一種按其氣味和作用是與普通氧氣顯然不同的物體。更不待說，如果把氧氣與淡氣或硫黃按各種比例結合起來，那末其中每一種結合都產生出一種以其質別於其他一切物體的物體哩！」（同上，第五二八頁）。

最後，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而杜林曾大罵黑格爾，但同時却又暗中剽竊黑格爾底著名原理：由無感覺世界進到感覺世界的過渡，由無機物世界進到有機物世界的過渡，是進到新狀態的跳躍；——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說：

「這正是黑格爾的度量關係交錯綫，在這綫上，純粹數的增減，到一定交錯點上就引起質的跳躍，例如水液被燒煮或冷化時，沸點或冰點就是這樣的交錯點，在這些交錯點上——在通常的氣壓下——就發生由舊的物態進到新的物態的跳躍，因而在這裏是數轉變為質」（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頁）。

（4）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反，它是從以下一點出發的：自然界的對象，自然界的現象，具有內在的

矛盾，因為所有這些對象，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這些對立方面底鬥爭，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產生着的東西間的鬥爭，衰頹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間的鬥爭，就構成發展過程底內在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底內在內容。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不是經過各現象協和的開展，而是經過各對象，各現象所固有的矛盾底揭露，經過那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底「鬥爭」。

列寧說：

「辯證法按其本義說來就是研究對象自身本質內的矛盾」（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二六三頁）。其次：

「發展就是各對立方面底「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二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不難瞭解：把辯證方法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研究社會歷史，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如果在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如果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聯系着並互相制約着，那末很明顯的，在估計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都不要以「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為觀點，如歷史家時常所作的那樣，而是要以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關連的那些條件為觀點。

奴隸佔有制度，就現代的條件看來，是荒謬的現象，反自然的蠢事。而奴隸佔有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比較起來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存在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

俄國，曾是完全可以瞭解的正確的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當時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蘇聯現時的條件看來，却是荒謬的反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比較起來是後退一步。

一切都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為轉移。

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這樣的觀察社會現象的歷史看法，那末歷史科學就沒有可能存在和發展，因為只有這樣的看法，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於變成種種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於變成荒謬絕倫的錯誤堆。

其次。如果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如果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底規律，那末很明顯的，再也沒有什麼「永古不移的」社會秩序，沒有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沒有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了。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的，正好似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樣。

由此可見，不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而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正在發展着的，具有遠大前程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鬥爭的時代，無產階級在俄國與當時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佔不大的少數。可是當時，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發展着，而農民之為階級則日趨瓦解。而正是因為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發展着，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指靠於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為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為頭等的歷史的和政治的力量。

由此可見，為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

其次。如果由遲慢的數變進到迅速的突然的質變是發展底規律，那末很明顯的，由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的變革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之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經過緩慢變化，決不能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經過資本主義制度底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就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

其次。如果發展過程是經過內在矛盾底揭露，是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而進行，那末很明顯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它們，不是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把它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就要進行不調和的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政策，而不要進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而不要進行資本主義「長成」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政策。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應用到社會生活上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來，那末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就是如此。

至於說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那末它是根本上與哲學唯心主義正相對的。

(貳)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基本特徵如下：

(1)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認爲世界是「絕對觀念」；「宇宙精神」、  
「意識」底體現，——而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認爲：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是運動着的物質底各種形態；各現象由辯證方法所判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規律；世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而發展着，它並不需要任何「宇宙精神」。



恩格斯說：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不需要任何外來的附加」（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頁）。

列寧談到古代哲學家赫拉克利泰底唯物主義觀點時，——而照這個觀點看來，「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體，它不是由任何一個神所造成，也不是由任何一個人所造成，而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按規律燃燒着的並按規律熄滅着的永恆活火」，——列寧論到這個觀點時說：「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基礎底很好的說明」（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三一八頁）。

（2）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硬說只有我們的意識才真實存在着，硬說物質世界、存在、自然界只在我們的意識中，只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概念中存在着，——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認為：物質、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識以外和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物質是第一性的現象，因為它是感覺、觀念、意識底來源；而意識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因為它是物質底反映，存在底反映；思維是發展到完善高度的物質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而人腦則是思維底器官；因此，如果不願意大錯特錯，那就不可把思維和物質隔開。

恩格斯說：

「整個哲學底最高問題，就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哲學家們之分成兩大營壘，就是按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為標準的。凡斷定說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者；，就組成唯心主義的營壘。而凡認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者，則屬於唯物主義底各派」（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九頁）。

其次：

「物質的可感覺得到的世界，即我們自己也屬於它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實的世界……。我們的意識與思維，無論它如何彷彿像是超感覺的東西，總是物質的實體的器官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而精神自己不過是物質底最高產物」（同上，第三三二頁）。

馬克思談到物質與思維問題時說道：

「決不可把思維與思維着的物質隔開。物質是一切變化底主體」（同上，第三〇二頁）。

列寧在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特徵時說道：

「一般唯物主義就是承認客觀現實的存在（物質），這個存在是不依賴於意識的，是不依賴於感覺的，是不依賴於經驗的……。意識……只是存在底反映，至多也不過是存在底近乎正確的（等量的，理想地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其次：

「物質就是射着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客觀現實……。

物質、自然界、存在、物理現象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精神、意識、感覺、心理現象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同上，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

「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質如何運動着和「物質如何思維着」的情景」（同上，第二八八頁）。

「人腦是思想底器官」（同上，第一二五頁）。

(3)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否認有認識世界及其規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們知識底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真理，並認為世界是充滿着那些為科學所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的，——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認為：世界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我們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知識既已由經驗、實踐所考驗，就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

物，而只有尚未認識之物，這些尚未認識之物是將被科學和實踐力量所揭露和認識的。

恩格斯在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主義者關於世界不可認識和「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原理，而堅持關於我們知識底確實性的著名唯物主義原理時，寫道：

「而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徹底的，就是實踐，就是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夠以這樣一種方法來證明我們對於自然界某一現象的瞭解正確，就是說，我們自己把它製造出來，依它的條件而把它產生出來，並且強迫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既然如此，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完結了。在動植物身體上所形成的種種化學原素，當有機化學還未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曾仍然是這類的「自在之物」；而當有機化學已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爲我之物了；例如拿亞里查林，即茜素顏料來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從那生於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更便宜得多地、更簡單得多地從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曾於三百年間被人視爲假設，固然是很可信的假設，但終究是一種假設。可是，當列月爾根據這太陽系學說底證據不僅已證明一定有一個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計算方法確定它在天空中所佔的地位，而後來當加勒果然已發現這個行星時，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就被證明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三〇頁）。

列寧在責備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以及其他馬赫信徒爲非德主義者（非德主義是排斥科學而崇尚信仰的反動理論），而堅持唯物主義著名原理，認爲我們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科學知識是確實的知識，認爲科學底定律是客觀真理時，說道：

「現代非德主義並不否認科學；它只是否認科學底「過度奢望」，即科學想成爲客觀真理的奢望。既然有客觀真理存在（如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既然只有那反映外部世界於人類「經驗」

中的自然科學能給我們以客觀真理，那末任何非德主義就毫無條件地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顯著特徵，就是如此。

容易懂得：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去研究社會歷史，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發展底規律，那末由此就得出結論：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也同樣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就不復是「種種偶然現象」底堆積，因為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底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底研究則已變爲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應當不是以「卓越人物」底善良願望爲基礎，不是以「理性」、  
「普遍道德」等等底要求爲基礎，而是以社會發展底規律爲基礎，而是以這些規律底研究爲基礎。

其次。既然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那末由此就得出結論：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是可以認識的，而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材料就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材料。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如何複雜，總都能夠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準確科學，它能夠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其實際活動中應當不是以什麼偶然的動機爲準則，而是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就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爲科學。

由此可見，科學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就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黨底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則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那末由此就得出結論：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藉以產生的來源，不是要到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本身中去尋找，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尋找，因爲這些觀念、理論、觀點等等是這社會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如果在社會歷史各個不同的時期，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如果我們在奴隸佔有制度下所遇見的，是一種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却是另一種，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却是第三種，那末這就不是由於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由於在社會發展底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社會底存在怎樣，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怎樣，——那末，社會底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也就是怎樣。

馬克思因此就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而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爲着不致陷入空洞理想家的地位，那末無產階級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就應當不是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是從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即社會發展底決定力量出發；不是從「偉大人物」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是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現實需要出發。

空想派——連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包括在內——所以陷於覆亡，就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而且他們既然陷入唯心主義，於是就把自己的實際活動不是建築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上面，而是——不依賴於這些需要並違反着這些需要——建築在那些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草案」上面。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因爲它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正是憑藉於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而無論何時也不脫離社會底現實生活。

可是，不應當從馬克思這段話裏面作出結論，說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沒有意義，說它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物質條件底發展。我們在這裏暫且只說到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底起源，只說到它們的產生，只說到社會精神生活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底反映。至於說到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底意義，至於說到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僅不否認，而且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有舊的觀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已經衰頹，並服務於社會裏正在衰頹着的勢力底利益。它們的意義就在於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觀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服務於社會裏先進勢力底利益。它們的意義就在於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它們就獲到愈加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以後，才產生出來。可是，當它們已經產生出來以後，它們就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由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正是在這裏，就表現出新觀念、新理論、新政治觀點、新政治制度底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所以產生出來，正是因爲它們是爲社會所必需，因爲如果沒有它們的組織的動員的改造的工作，就沒有可能來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既然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就給自己打通道路，深入民衆意識，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裏正在衰頹的勢力，並因此而便利着推翻社會裏正在衰頹的阻礙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勢力。

於是，社會觀念、理論、政治制度既然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社會存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自己然後就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物質生活，並造成必要條件來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中已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物質生活向前發展成爲可能。

馬克思因此就說：

「理論只要一掌握羣衆，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六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爲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它就應當憑藉於這樣一個社會理論，憑藉於這樣一個社會觀念，這個理論和這個觀念正確反映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並因此而能夠發動廣大民衆，能夠動員他們並把他們組織成無產階級黨底偉大軍隊，這個軍隊是決意打破社會裏的反動勢力並給社會裏的先進勢力打通道路的。

「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所以陷於覆亡，就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觀念底動員的組

織的改造的作用，而他們既然落到庸俗唯物主義中去，於是就把先進理論、先進觀念底作用看成幾等於零——因而也就是力圖使黨陷於消極無爲，陷於萎靡不振。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憑藉於正確反映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個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以澈底利用這個理論底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力量爲己任。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來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間的關係，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精神生活發展間的關係問題的。

現在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究竟應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些終歸是決定着社會底面貌，社會底觀念、觀點、政治制度等等的條件——瞭解爲什麼東西呢？

實在說來，——這「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究竟是什麼；它們的特徵究竟是怎樣呢？

毫無疑義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個概念，首先就包含有環繞着社會的自然界，地理環境，這個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而且當然是影響到社會發展的。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如何呢？地理環境不就是决定着社會面貌、人們社會制度性質、以及由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的主要力量麼？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否定式的。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發展，——它是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的。可是，它的影響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爲社會底變化和發展，是比地理環境底變化和發展快得無比的。在三千年中間，在歐洲已更換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佔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即在蘇聯，甚至於已更換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



境內的地理條件或是完全沒有變更，或是變更得如此小，甚至地理學都不肯提及。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環境稍許嚴重的變更都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社會制度甚至最嚴重的變更也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夠了。

而由此就得出結論：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的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爲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是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底主要原因的。

其次，毫無疑義的，人口底增長，居民密度底高低，也是包含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概念中的，因爲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底必要的要素，而如果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那末任何社會物質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人口底增長不就是决定着人們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麼？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否定式的。

人口底增長當然是影響到社會發展的，是促進或延緩社會發展的，可是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決定的影響，因爲人口增長的本身並不能給我們以關鍵來說明：爲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是要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來替代；爲什麼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隸佔有制度所替代，奴隸佔有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資產階級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底增長是社會發展底決定的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一定應當產生出相當於它的較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在事實上却没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至四倍的，但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於中國，因爲在中國仍然是以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了。比利時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至十九倍，是比蘇聯高至二十六倍的，但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於比利時，而蘇聯則較比利時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爲在比利時還以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在

蘇聯則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在本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

而由此就得出結論：人口底增長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

既然如此，那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系統中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就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就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為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為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要生產它們，而為要生產它們，就要具有那些被人們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的生產工具，就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要素總合起來，就構成社會底生產力。

可是，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這一方面是表明人們對於那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物件和自然界力量的關係的。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着，並不是以彼此隔絕的單身資格，而是以集團為單位，以社會為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條件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不受剝削的人們間的合作關係和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這些關係也可以是由一個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

係。可是，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而它們總是構成——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下——生產底必要的要素，正好似社會底生產力一樣。

馬克思說：

「在生產中，人們不僅是影響着自然界，而且還彼此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形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那他們就不能生產。爲要生產，人們就彼此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而只是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有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存在，才有生產」（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既包括着社會底生產力，又包括着人們底生產關係，因而就是它們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統一底體現。

生產底特點之一就在於：它永遠也不會長期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時處在變更和發展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然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底變更，——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人們利用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淺一點說，——人們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以及餘此類推。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制度，也各不相同。

社會所有的生產方式怎樣，——那末，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是怎樣，社會底觀念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是怎樣。

或者粗淺一點說：人們底生活樣式怎樣，——那末，人們底思想樣式也就是怎樣。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就是在數千百年中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就是

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生產過程底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底生產——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如果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和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應當首先就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關鍵，就不要在人們底頭腦中，不要在社會底觀點和觀念中去尋找，而要在社會於每個一定歷史時期內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在社會底經濟中去尋找。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研究和揭明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如果想成爲真正的黨，首先就應當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末無產階級黨，無論是在製定自己的黨綱時或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首先就應當以生產發展底規律，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

生產底第二個特點就在於：生產底變更和發展，無論何時都是從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而開始的。所以，生產力是生產底最活動的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變更和發展，而然後，依賴於這些變更並與此相適合的，就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發生變更。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或加速其發展，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

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太長期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增長相矛盾，因為生產力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狀況並給生產力以發展餘地時，方能儘量發展起來。因此，無論生產關係怎樣落後於生產力底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當而且一定會去適合於生產力發展底水平，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看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生產體系裏統一底根本破壞，整個生產底破裂，生產危機，生產力底破壞。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不相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和生產力底性質，處在極不相適合的地位。而這種不相適合的結果，就是使生產力陷於破壞的經濟危機，而同時這種不相適合情況本身就是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而這個社會革命底使命就在於破壞現有的生產關係，並建立新的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係。

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實例就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在蘇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因此在蘇聯既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底破壞。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底最活動的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同時又是生產發展過程底決定的要素。生產力是怎樣，——那末，生產關係也就應當是怎樣。

如果生產力底狀況所回答的問題，是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那末生產關係底狀況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利，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是歸誰所有，生產資料是由誰所支配——是由全社會所支配呢，抑或是由單個人們、集團、階級所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人們、集團、階級呢。

以下就是生產力由古代發展到現代的一般情景。由粗笨的石頭工具過渡到弓箭，並因此而由狩獵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嘴犁等等），並與此相適合而過渡到種植植物和從事農業；金屬製物工具繼續改良，過渡到打鐵爐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適合而有手工業底發展，有手工業離農業而分立，有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的工場手工業生產底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制，以及現代巨大機器化工業底出現，——這就是社會生產力在人類史上發展的一般的——遠不完全的——情景。同時，不言而喻的，生產工具底發展和改善是由那些和生產有關係的人們所實現的，而不是與人們無關的，——所以，隨着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人們——即生產力最重要的要素——也變更和發展了，他們的生產經驗、他們的勞動技能、他們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變更和發展了。

隨着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的變更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此相適合而變更和發展了。

歷史所知道的，有五個基本形式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的，奴隸佔有制度的，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性質的。石頭工具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們絕對沒有可能單身去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鬥爭。人們當時為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裏捕獲魚類，建築某種住所，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就會餓死，被猛獸所吞食或為鄰近部落所犧牲。公共的勞動就引起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在這裏還不知道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何物，而不過有些同時又是用來防禦猛獸的生產工具為個人所有。在這裏是沒有剝削的，是沒有階級的。

在奴隸佔有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奴隸主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一時期內的狀況的。此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此時，已經不是貧乏的、原始的、既不知畜牧業為何物，也不知農業為何物的狩獵經濟，而是已經出現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在這些生產部門間的分工；此時，已經有可能在各個人間以及在各個部落間交換生產品，已經有可能把財富積聚於少數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產資料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已經有可能迫令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為奴隸。在這裏已經不是社會中一切組成員在生產過程中間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了，——在這裏已經是由奴隸們底強迫勞動佔統治地位，而這些奴隸是由那些不勞而獲的奴隸主們所剝削的。因此也就沒有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它已被私人所有制所替代了。在這裏，奴隸主是第一個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主。

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者和毫無權利者，他們彼此間的殘酷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佔有制度底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可以買賣的農奴。與封建所有制並存的，還有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對於生產工具以及對於自己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一時期內的狀況的。鎔鐵和製鐵工作底繼續改善；鐵犁和織布車底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製油業底繼續發展；與手工作坊並存的工場手工企業底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狀況底顯著特徵。

新的生產力要求工作者具有某種在生產中的自動性，具有從事勞動的意向，具有從事勞動的興趣。因

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為奴隸是沒有從事勞動的興趣和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而寧願利用農奴，因為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並具有某些從事勞動的興趣，因為一定要有這種興趣，農奴才會耕種土地並能以自己收成所得的自然品付給封建主。

私有制在這裏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是和奴隸制下面的剝削一樣殘酷，而不過是稍許減輕一些罷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階級鬥爭，就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在這裏已經沒有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資本家既不能加以屠殺也不能出賣的雇傭工人，因為雇傭工人已免除人格上的依賴，可是他們沒有生產資料，而為要不致餓死，他們就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担负剝削制的桎梏。與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並存的，還存在有而且在第一個時期還廣闊流行的，就是已擺脫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私有制是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起而代之工作坊和工場手工企業的，是以機器裝備的巨大工廠。起而代之那些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來耕作的貴族地產的，是根據農藝學來經營並具備有農業機器的巨大資本主義農場。

新的生產力要求生產工作者是比閉塞無知的農奴們文化程度更高的，伶俐些的，能夠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的人們。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那些已擺脫農奴制羈絆的雇傭工人，這些雇傭工人是具有足夠的文化程度來正確使用機器的。

可是，資本主義既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的程度，於是它就陷入它自己不能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既然生產着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價格，於是它就使競爭趨於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買能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



主義既然擴大着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巨大工廠以內，於是它就賦與生產過程以社會公共的性質，並因此而破壞自己本身的基礎，因為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要求有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的，而同時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却仍然還是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即與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的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在那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當中明顯暴露出來，此時，資本家既因自己已使大批居民遭受破產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遂不得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居民不得不忍受失業和飢餓的痛苦，而這並不是因為商品不夠，却是因為商品出產得太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不復適合於社會生產力底狀況，而是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懷妊着革命，這個革命底使命就是以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

這就是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個制度此刻還只在蘇聯實現，——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是生產關係底基礎。在這裏已經既沒有剝削者，也沒有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而按勞動分配的。在這裏，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底特徵就是已經擺脫剝削制的工作者們底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在這裏，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於生產力底狀況的，因為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由那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所鞏固的。

因此，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是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週期生產過剩危機以及與此危機相牽連的荒謬現象的。

因此，生產力在這裏就以加快的速度發展着，因為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給與生產力以這樣發展的完全廣闊可能的。

這就是人們生產關係在人類史上發展的情景。

這就是生產關係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而首先是對於生產工具發展的依賴性，而因為有這種依賴性，所以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就遲早要引起生產關係與此適合的變更和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其萌芽形式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是人類勞動過程所獨具的顯著特徵，所以佛蘭克林斷定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底遺骸對於研究已經消亡的諸社會經濟形態，也正如動物骨骼底遺骸結構對於研究已消亡的諸種動物底身體組織一樣，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使各經濟時代彼此區別的，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而且是勞動在其中實現的社會關係底指標」（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一頁，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

——「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密切聯系着的。人們既獲得新的生產力，就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底改變，即本身生活保證方式底改變，——他們就改變自己所有一切社會關係。手力的

\* 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是指生產工具而言。——「約、斯大林註」。

磨坊就產生以緒則連（即封建主。——「約、斯大林註」）爲首的社會；蒸汽力的磨坊就產生以工業資本家爲首的社會」（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生產力增長底運動，社會關係底破壞，觀念底產生，——凡此都是毫不間斷地發生着；而不動的只是運動底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頁）。

恩格斯在說明共產黨宣言內規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特徵時說：

「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它而生的每一歷史時代底社會結構，就構成這時代底政治史和思想史底基礎。：。與此相應的，就是自原始公社土地佔有制瓦解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的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征服階級與統治階級間鬥爭的歷史。：。現在，這個鬥爭已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已經是除非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鬥爭，就不能擺脫那剝削它和壓迫它的階級（資產階級）了。：。：」（恩格斯給宣言德文版所作序言）。

生產底第三個特點就在於：新的生產力以及與其相適合的生產關係底產生，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的，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的，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的；不是由於人們有意的自覺的活動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而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發生的，是因爲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因爲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這是因爲當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是遇着已經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的結果，因此，這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並應當遷就於這些東西，以便取得生產物質資料的可能。

第二，就是因為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他們並不覺悟到，不瞭解到，也不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而只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爲自己謀得某種直接的感觸得到的益處。

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們逐漸地和摸索式地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鉄製工具時，他們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這種革新辦法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瞭解和沒有意識到：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金屬工具，就是生產中的變革；這個過渡終究會引導到奴隸佔有制度；——他們當時只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謀得眼前的感覺得到的益處，——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只限於這種日常個人益處的狹隘範圍。

當歐洲年輕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時期開始建造巨大工場手工企業以與細小行業作坊並列，並因此而推進社會生產力時，它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它這種革新辦法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它沒有意識到和沒有瞭解到：這種「細微的」革新辦法會引起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將以革命來終結，而這個革命既要反對它當時所十分推崇其恩德的王室政權，又要反對那爲它的優秀代表們所往往夢想側身其間的貴族；——它當時只想要減低商品生產成本費，更多拿些商品到亞洲市場以及剛才發現的美洲市場上去銷售，並藉以取得更多的利潤，——它當時的自覺活動只限於這種日常實踐的狹隘範圍。

當俄國資本家們協同外國資本家們來加緊在俄國培植現代巨大機器化工業，而又絲毫不觸動沙皇制度，同時却聽憑地主們隨便魚肉農民時，他們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生產力這種嚴重的增長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意識到和沒有瞭解到：這個在社會生產力方面發生的嚴重跳躍會引起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會給無產階級以可能把農民和自己結合起來並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他們當時只是想要極端擴大工業生產，掌握巨大的國內市場，變成壟斷家並從國民經濟中吸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未曾超過他們的日常的狹隘實踐的利益。

馬克思因此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就是說，在生產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中。——「約·斯大林註」），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發展階段的」（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底變更以及由舊生產關係到新生產關係的過渡是一帆風順地進行，而不經過衝突，不經過震動。恰巧相反，這樣的過渡通常都是經過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舊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生產關係的。到一定時期爲止，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的變更，是自發地、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而進行的。但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爲止，只是到那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尚未及充分成熟的時候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爲這樣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這個障礙是只有經過新階級底自覺活動，經過新階級底強力行動，經過革命，才可掃除的。在這裏，新社會觀念，新政治制度，新政權底偉大作用，就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其使命就是要用強力來廢除舊生產關係。在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底新經濟需要的基礎上，就產生出新社會觀念，這些新觀念就組織着和動員着羣衆，而羣衆就團結爲新政治大軍，建立新革命政權並運用着這個政權，以使用強力來廢除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發展底自發過程就讓位於人門底自覺活動，和平發展就讓位於強力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團結成爲階級……它以實現革命而把自己變爲統治階

\* 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

級，並以統治階級資格來用強力廢除舊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頁）。

其次：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之手，即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之手，並儘可能更加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同上，第五〇頁）。

——「強方是任何一個舊社會在懷妊着新社會時的產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一九三五年版）。

馬克思於一八五九年給他自已那本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所作的有歷史意義的序言中會英明地把歷史唯物主義底實質歸納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發展階段的。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社會底經濟結構，即現實的基礎，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樹立起來的；同時，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是和這個基礎相適合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一般社會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而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和現存生產關係或所有權關係——所有權關係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稱謂而已——發生矛盾，而生產力在此以前是在這些關係內部發展了的。於是這些關係就由生產力底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底枷鎖。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變更，在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或多或少迅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在經濟生產條件方面發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去與法律

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而言之就是去與觀念形式，分別清楚，而人們就是在這些觀念形式中意識着這個衝突並力求克服這個衝突的。正如我們不可根據一個人自己對於自己的揣度來判斷這個人一般，同樣也不可根據這樣的變革時代底意識來判斷這樣的變革時代。恰巧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來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充分發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尚未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本身胎包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無論何時都只給自己提出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一看，那就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就其應用於社會生活，應用於社會歷史說來，就是如此。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

##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

### 關於聯共(波)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

#### (一) 蘇聯底國際形勢

同志們！從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以來已經有五年了。你們看，時期是不小的。在這個時期內，世界已經歷了許多巨大的變化。各個國家以及它們彼此間的關係，在很多方面都變成完全另外一個樣子了。

在這個時期內，在國際環境中究竟發生了那些變化呢？在我國外部形勢和內部狀況中究竟是什麼東西發生了變化呢？

對於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時期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是遭受最嚴重震動的時期。在經濟方



面，這些年份是停滯的年份，而然後，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却已是新經濟危機的年份，是美英法三國工業重新衰落的年份，因而也就是新經濟糾紛的年份。在政治方面，這些年份是嚴重政治衝突和嚴重政治震動的年份。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進行到第二個年頭了，這個戰爭是在廣闊地面上發生的，東起上海，西至直布羅陀海峽；這個戰爭已籠罩着五萬萬以上的居民。歐非亞三大洲的版圖是被用暴力改變着。整個戰後所謂和平制度體系已被根本動搖了。

反之，對於蘇聯，這些年份却是它增長和繁榮的年份，是其經濟和文化更加高漲的年份，是其政治實力和軍事實力更加增長的年份，是它爲保持全世界和平而鬥爭的年份。

一般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關於國際環境裏所發生變化的具體材料吧。

(一)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新經濟危機。 爲銷售場、

爲原料來源、爲從新重分世界而鬥爭之尖銳化

於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資本主義各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末。接着，危機就轉爲停滯，而然後就開始了少許的工業活躍，少許的工業高漲。可是，這個工業活躍並沒有轉爲繁榮，如像普通在活躍時期所常見的那樣。反之，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又開始了新的經濟危機，這個危機首先就籠罩着美國，而接着就把英法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也都包括進去了。

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未及醫好自己由不久以前經濟危機方面所受到的創傷，就已經碰到新的經濟危機了。

這個情況自然就使失業現象更其加強起來。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會由一九三三年的三千萬減至一九三七年的一千四百萬的失業人數，現在又因有新危機而增至一千八百萬人了。

新危機底顯著特點就在於它與上次危機很不相同，而其不同處又不是在於比上次危機好些，而是在於比上次危機更壞。

第一，新的危機不是在工業繁榮以後開始的，如像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危機那樣，而是在停滯和少許活躍以後開始的，但這個活躍並未會轉為繁榮。這就是說，現時的危機是比較上次危機更加沉重，更加難於克服的。

其次，現時的危機不是在和平時候發生的，而是在已開始的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內發生的：此時，日本已經和中國作戰到第二個年頭，它搗亂着無限廣濶的中國市場，並使這市場變成他國商品幾乎不能插足的處所；此時，意德兩國已把自己的國民經濟轉上戰時經濟的軌道，並為此而揮霍了自己的原料儲存和金幣儲存；此時，所有其他一切巨大資本主義列強都開始按戰時需要來改造自己。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爲着用平常方式逃脫現時危機的資源，將比上次危機時期更少得多。

最後，現時危機與上次危機不同處，就在於現時危機不是普遍的危機，而暫時主要還只包括那些經濟勢力強大的國家，這些國家還沒有過渡到戰時經濟的軌道。至於說到侵略國，如日德意這些已按戰時需要而把本國經濟改造過的國家，那末它們既然加緊發展着自己的軍事工業，所以暫時還沒有陷於生產過剩的危機，雖然它們正在走近這個危機。這就是說，當那些經濟勢力強大的非侵略國將來開始爬出危機階段時，而侵略國既然已在戰爭狂熱中耗盡自己的黃金儲存和原料儲存，就一定會走進極劇烈危機的階段。

只要舉出各資本主義國家現有明顯黃金存額的統計，就可把這一點明白顯示出來。



儲存。

茲舉出幾個統計數字，來說明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最近五年來的工業危機情形和蘇聯工業高漲情形。

工業出產量對一九二九年的百分比（以一九二九年為一百）

美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英國	六六·四	七五·六	八八·一	九二·二	七二·〇
法國	九八·八	一〇五·八	一一五·九	一二三·七	一一二·〇
意大利	七一·〇	六七·四	七九·三	八二·八	七〇·〇
德國	八〇·〇	九三·八	八七·五	九九·六	九六·〇
日本	七九·八	九四·〇	一〇六·三	一一七·二	一二五·〇
蘇聯	一二八·七	一四一·八	一五一·一	一七〇·八	一六五·〇
	二三八·三	二九三·四	三八二·三	四二四·〇	四七七·〇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只有它才不知道危機為何物，而其工業總是不斷向上增長着的。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在美英法三國，嚴重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並正在發展着。

再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在比德國更先把自己國民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的意日兩國，工業底降低過程還在一九三八年就已開始了。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在比意日兩國較遲按戰時需要來改造本國經濟的德國，工業暫時還處在少許向上上升的狀態中，固然升長得不大，但總算是向上上升的，——這正和日意兩國最近以前的情形相當。

毫無疑義的，如果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事故，那末德國工業也一定會走上日意兩國所已走進的那條下降道路。因為什麼是把國內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呢？這就是說，給工業以片面的軍事的趨向，極力擴大那些專供戰爭需要而與居民消費無關的物品底生產，極力縮小居民消費品底生產，特別是縮小居民消費品底出售，——因而也就是縮減居民消費額，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新經濟危機進程底具體情形，就是如此。

顯而易見的，這樣不順利的經濟局勢是不能不使列強相互關係尖銳化的。上次危機就已經紊亂全局，並已使那為搶奪銷售場、為搶奪原料來源的鬥爭尖銳化了。日本強佔東三省和華北，意大利強佔阿比西尼亞——，所有這些都是列強鬥爭尖銳化底反映。新的經濟危機會應當而且果然已使帝國主義鬥爭更加尖銳化。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市場上的競爭，已經不是商業戰爭，已經不是傾銷政策。這些鬥爭手段早已認為是不夠了。現在的問題已經是用軍事行動來重新重分世界，重分勢力範圍，重分殖民地。

日本就這樣來辯護自己的侵略行動，說在締結九國公約時，人家分配給它的太差，沒有讓它藉侵略中國來擴大自己的領土，而英法兩國却佔有龐大的殖民地。意大利回憶起來，說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實行分贓時，人家分配給它的太差，所以它應當靠佔英法勢力範圍來彌補自己。會因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及凡爾賽和約結果而遭受嚴重損失的德國，就附和日意而要求擴大自己在歐洲的領土，索還那些曾被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勝利國從它手中奪去的殖民地。

三個侵略國底同盟就是這樣開始形成的。

關於用戰爭來從新重分世界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二) 國際政治形勢之尖銳化，戰後和約體系之崩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之開始

茲將報告期內那些已使新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各最重要事變列舉如下。

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並把它強佔了。一九三六年夏，德意兩國實行武裝干涉西班牙，同時德國盤據西班牙北部和西屬摩洛哥，而意國則盤據西班牙南部和巴列阿爾羣島。日本強佔東三省後，又於一九三七年侵入中國北部和中部，佔據平津和上海，並開始把自己的外國競爭者從佔領區域裏排擠出去。德國於一九三八年初奪去奧地利，而於一九三八年秋則已奪去捷克斯拉夫克底蘇台區。日本於一九三八年末佔據廣州，而於一九三九年初則佔據了海南島。

這樣，於無形中臨到各國人民面前的戰爭就籠罩着五萬萬以上的居民，彌漫於廣闊的地面，從天津、上海、廣州起，經過阿比西尼亞，一直到直布羅陀海峽。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戰勝國，主要是英法美三國，建立了新的各國間關係制度，即戰後和平制度。這個制度底主要基礎在遠東就是九國公約，而在歐洲則是凡爾賽條約以及其他許多條約。國際聯盟本來擔負有在這個制度範圍內，在各國統一戰線基礎上，在集體保護各國安全基礎上，來調節各國間關係的使命。可是，三個侵略國以及它們所開始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却已把這整個戰後和平制度體系根本推翻了。日本撕毀了九國公約，德意撕毀了凡爾賽條約。而爲着便於任意行動起見，所有這三個國家都退出了國際聯盟。

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成了事實。

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果不顧及各種條約，不顧及社會輿論，却想一下子就擺脫頸圈，直接奔入戰爭，那是不很容易的。這是資產階級政治家所充分知道的。這是法西斯專權者也知道的。因此，法西斯專權者在開始奔入戰爭以前，就決定要用相當方法來籠絡社會輿論，就是說，迷惑它，欺騙它。

德意結成軍事同盟以反對英法在歐洲的利益麼？天曉得，這那裏是同盟呢！「我們」並沒有什麼軍事同盟。「我們」總共只有一個沒有害處的「柏林—羅馬軸心」，就是說，一點兒幾何學的軸心公式。（笑聲）

德意日結成軍事同盟以反對美英法在遠東的利益麼？絕沒有這回事！「我們」並沒有什麼軍事同盟。「我們」總共只有一個沒有害處的「柏林—羅馬—東京三角形」，就是說，一點兒愛好幾何學的僻性。（全場大笑）。

反英法美利益的戰爭麼？真是廢話！「我們」進行戰爭，是反對共產國際，而不是反對這些國家。如果不信，就請讀意德日三國所締結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吧。

侵略者老爺們就是想這樣來籠絡社會輿論的，雖然不難瞭解，這整套笨拙的假面把戲是用白線縫成的，因為要在蒙古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亞山嶽間，在西屬摩洛哥密林中去尋找共產國際底「策源地」，那是很可笑的。（笑聲）。

但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是無論用什麼掩蓋物也隱藏不了的。因為無論什麼「軸心」、「三角形」以及「反共產國際協定」都不能隱藏以下一件事實，就是日本在這個時期內強佔了中國很大一塊領土，意大利強佔了阿比西尼亞，德國強佔了奧地利和蘇台區，德意兩國共同強佔西班牙，——而所有這一切都是違反着非侵略國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始終還是戰爭，侵略者軍事同盟始終還是軍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終

還是侵略者。

新帝國主義戰爭底顯著特點就在於它還沒有成爲普遍的世界的戰爭。現在進行戰爭的是侵略國，它們多方損害着非侵略國底利益，首先就是損害英法美三國底利益，而後者却向後退走，向後退却，給侵略者以接二連三的讓步。

這樣，在我們眼前所發生的是取價於非侵略國而公開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而非侵略國却絲毫也沒有企圖抵抗，却甚至於給以相當的縱容。

這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事實。

怎樣來解釋新帝國主義戰爭這種片面的奇怪的性質呢？

爲什麼那些擁有巨大可能性的非侵略國竟這樣輕易而不加抵抗地放棄了自己的陣地和自己的義務以討好於侵略者呢？

這是不是由於非侵略國力量薄弱呢？當然不是！非侵略的民主的國家總共起來，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軍事方面都顯然是比較法西斯國家強大些的。

既然如此，那末究竟怎樣來解釋這些國家對於侵略者所作的一貫的讓步呢？

這也許可以用——例如——害怕革命的心理來解釋，因爲如果非侵略國一旦加入戰爭，而這戰爭將帶着世界戰爭的性質，那就會有革命爆發出來。資產階級政治家當然知道：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已使革命在最大國家之一裏獲得勝利。他們害怕：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也會使革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裏獲得勝利。

可是，這在現時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於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在於：多數非侵略國——首先是英法兩國——拒絕集體安全政策，它們拒絕給侵略者以集體抵抗的政策；它們轉入不干涉立場，轉



入「中立」立場。

從表面上說來，也許可以把不干涉政策描寫如下：「讓每個國家隨自己的志願和按自己的能力去防禦侵略者吧，這與我們無干，我們既要和侵略者講交易，也要和被他們侵略者講交易」。而在事實上，不干涉政策却是縱容侵略，展開戰爭，——因而也就是把它變成世界戰爭。在不干涉政策中，浸透着一種趨向，一種願望——就是不妨礙侵略者去幹自己的黑暗勾當，譬如說不妨礙日本糾纏於對華戰爭，更好是對蘇戰爭；譬如說不妨礙德國陷落於歐洲事務和糾纏於對蘇戰爭；讓一切參戰國都深深陷入戰爭深淵；暗中懲惡他們這樣幹；讓他們彼此削弱和互相疲竭；而然後，當他們已被充分削弱時，就帶着新鮮力量來出台活動，當然是「爲着和平」而出台活動，並迫令那些已陷於疲竭的參戰國來接受自己的條件。

真是價廉物美呵！

例如拿日本來說吧。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日本正開始侵略華北以前，一切有影響的英法報紙都曾大聲疾呼，說中國能力單薄，說它不能抵抗，說日本及其軍隊能在兩三個月以內就把中國征服。然後，歐美政治家就來等待和觀望。而後來，當日本已開展其軍事行動時，他們就向日本讓出外國資本在華中心的上海，讓出英國影響在華南獨佔基礎的廣州，讓出海南島，任其包圍香港。可不是麼，所有這些都很像是在德惠侵略者說：你儘管深深滾入戰爭去，那時我們再看吧。

又例如拿德國來說吧。他們已把奧地利讓給德國，雖然他們擔負有保護奧地利獨立的義務；他們已讓出蘇台區，把捷克斯拉伐克拋棄不管，因而違背一切和任何義務，然後就在報章上囂嚷造謠，說什麼「俄國軍隊軟弱無力」，說什麼「俄國空軍瓦解」，說什麼在蘇聯內部發生「騷亂」，這樣來推動着德國人更往東進，約許他們能輕易獲得勝利品，並對他們說：你們只要對波爾什維克開始戰爭就是了，而以後一切都會順暢的。必須承認：這也是很像推動侵略者，德惠侵略者哩。

英法報界和北美報界關於蘇維埃烏克蘭問題而發出的噪聲，也是值得注意的。這些報界人物會聲嘶力竭地喊道：德國人是向蘇維埃烏克蘭開動着；德國人現在已握着那約有七十萬居民的所謂卡爾帕特烏克蘭；德國人至遲要在本年春季就會把那擁有三千多萬居民的蘇維埃烏克蘭合併到所謂卡爾帕特烏克蘭去。這很像是這麼一回事，就是這種形跡可疑的噪聲，目的是要激起蘇聯對於德國的憤怒，散布有毒的空氣，挑撥我們去和德國發生沒有根據的衝突。

當然，在德國很有可能是有一些瘋人，是夢想把一隻巨象，即蘇維埃烏克蘭，合併到一顆瓢蟲，即所謂卡爾帕特烏克蘭那裏去的。而在那裏果然有這樣的狂人，那就毋庸懷疑吧，在我們國家裏是一定可以爲這種瘋人找到足數的鎮瘋袍的。（大鼓掌）。可是，如果撇開瘋人而去問問常態的人，那末要認真說把蘇維埃烏克蘭合併到所謂卡爾帕特烏克蘭去，就豈不顯然可笑而又愚笨麼？你們只要設想一下：一顆瓢蟲跑到巨象面前，把雙手往腰裏一插，向它說道：「唉！我的小兄弟，我是多麼可憐你呀！你總是在這裏生活着，既沒有地主，又沒有資本家，既沒有民族壓迫，又沒有法西斯專權者，——這算什麼生活呢？我瞧着你時，不能不告訴你，——除非合併到我這裏來，你是別無救藥的：（全場大笑）。好吧，就是這樣作吧，我允許你把你這不大的領土合併到我這無限廣濶的領土上來吧：（全場大笑並鼓掌）。」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歐美有些政治家和報界人物，既因渴望「討伐蘇維埃烏克蘭」而等待得不耐煩，自己就開始揭露不干涉政策底真相了。他們簡直說道，並且白紙黑字地寫道：德國人使他們「失望」殊甚，因爲德國人並沒有更往東進去反對蘇聯，却竟然折轉向西並給自己索取殖民地。可以想見：人家把捷克斯拉伐克各區奉送給德國人，本來是作爲代價以換得向蘇聯開始戰爭的義務，而德國人現在竟然拒絕兌現，却教他們遠遠滾開了。

在說到不干涉政策問題時，我絕不想來宣傳道德，絕不想說什麼變節，背叛等等。如果向一些根本

就不承認人類道德的人們去宣傳道德，那就幼稚了。政治終究是政治，正如那些老奸巨猾的資產階級外交家所說的一樣。可是必須指出：那些主張不干涉政策者所開始的巨大而危險的政治把戲，結果是會使他們遭受嚴重失敗的。

現時佔統治地位的不干涉政策底真正面目，就是如此。

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政治環境，就是如此。

### （三）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

戰爭在國際關係中造成了新的環境。它給這些關係帶進驚惶不安和恐慌焦慮的空氣。戰爭既已打破戰後和平制度底基礎，既已推翻國際公法底起碼概念，於是就使國際條約和國際義務底價值發生問題了。和平主義和裁軍草案已被埋葬下去。而擴大軍備的狂熱却已起而代之。所有一切大小國家都來擴大軍備了，其中也有而且首先就是那些實行不干涉政策的國家。現在，已經是誰都不相信那種油滑的演說，說什麼在慕尼黑會議上對於侵略者的讓步和慕尼黑協定似乎開闢新的「太平」時代的紀元。甚至於連參加慕尼黑協定的英法兩國自己也不相信這些演說了，它們已經是不落人後地加強着自己的軍備。

不言而喻的，蘇聯會不能不顧及這些險惡的事變。毫無疑義的，由侵略者所開始的任何一個甚至不大的戰爭，即令是在世界上某一個很遼遠角落裏開始的，也都是對於愛和平國家的一種危險。而已把亞非歐五萬萬多居民捲入自己漩渦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就是更嚴重的危險了。因此，我國一方面是始終不渝地實行着維護和平的政策，同時又開展了最嚴重的工作來加強我們紅軍和我們紅色海軍底戰鬥準備性。

同時，蘇聯爲鞏固自己的國際地位起見，還曾決定採取其他一些步驟。一九三四年末，我國加入國際聯盟，因爲我國認爲：國際聯盟雖屬軟弱，但總還可以作爲揭露侵略者的場所，作爲某種的——雖然——是薄弱的——可以阻礙戰爭瀰漫的和平工具。蘇聯認爲：在這樣令人感覺不安的時候，甚至於連國際聯盟這樣軟弱的國際組織也是不應忽視的。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法蘇兩國締結了互助條約以反對那從侵略者方面可能的侵犯。同時又與捷克斯拉伐克締結了同樣的條約。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締結了互助條約。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與中華民國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

在這種困難國際條件中，蘇聯實行着自己的對外政策，堅持着維護和平的事業。

蘇聯底對外政策是明白而顯然的：

(1) 我們主張和平並主張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的業務聯繫，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侵犯我國底利益。

(2) 我們主張和那一切與蘇聯交界的鄰國保持和平的親近的善鄰的關係，我們現在站在這個立場上，而且將來還會站在這個立場上，只要這些國家也會對蘇聯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只要它們不來試圖直接或間接侵犯蘇維埃國家邊界完整性 and 神聖性底利益。

(3) 我們主張援助那些遭受侵略並爲自己祖國獨立而奮鬥的民族。

(4) 我們不怕侵略者底恫嚇，並準備着以加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蘇維埃國界神聖性的戰爭挑撥者底打擊。

蘇聯底對外政策，就是如此。(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蘇聯在其對外政策中是倚據於：

(1) 自己的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文化的實力；

力更加鞏固的時期。

現在，我們來說我國內部狀況。  
從蘇聯內部狀況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我國整個國民經濟更加高漲，我國文化更加發展，我國政治實

## (二) 蘇聯底內部狀況

黨在對外政策方面的任務如下：

- (1) 即在今後也實行維護和平並鞏固我國與世界各國間業務聯系的政策；
- (2) 小心謹慎，決不讓那些慣於假手他人而從中漁利的戰爭挑撥者把我國捲入衝突中去；
- (3) 極力鞏固我國紅軍和紅色海軍底戰鬥實力；
- (4) 鞏固我們與世界各國需要國際和平友善的勞動者間的國際友誼聯系。

(2) 我們蘇維埃社會底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

(3) 我國各族人民底友誼；

(4) 自己的紅軍和紅色海軍；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世界各國切身需要保持和平的勞動者底精神援助；

(7) 那些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底審慎態度。

\*

\*\*

\*

在報告期內國民經濟發展方面的最重要結果，要算是工業和農業在現代新技術基礎上改造事業的完成。在我國，已經再沒有或幾乎再沒有那種使用落後技術的舊工廠和使用古代農具的舊農莊戶了。現在構成我國工業和農業基礎的是現代的新技術。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從生產技術方面看來，從工業農業所具有的新技術裝備程度方面看來，我國和其他任何一國比較起來都是最先進的國家，在其他國家裏，舊的裝備是懸在生產跟上的累贅，阻礙着新技術的採用。

在報告期內我國社會政治發展方面的最重要成績，要算是剝削者階級餘孽的被最終消滅，工農以及智識份子的團結爲一個總的勞動戰線，蘇維埃社會在精神上政治上統一的鞏固，我國各族人民友誼的鞏固，以及——由於所有這一切的结果——我國政治生活的完全民主化，新憲法的創立。我們的憲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而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以及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選舉結果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這是誰也不敢辯駁的。

由於這一切的结果，我們就有完全穩定的內部狀況，而我國政權已是這樣堅固，以至於使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能望而生羨的。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關於我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具體材料。

### (一) 工業與農業之更加高漲

(甲) 工業。我國工業在報告期內進展情形是一幅蒸蒸日上的高漲圖畫。這個高漲不僅反映着一般出產量底增長，而且首先就反映着：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工業底繁榮，而另一方面則是私有工業底滅亡。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蘇聯工業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間增長情形統計表

全部生產品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以百萬盧布爲單位(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							
全部生產品		四二〇三〇	五〇四七七	六二一三七	八〇九二九	九〇一六六	一〇〇三七五
其(甲)社會主義工業		四二〇〇二	五〇四四三	六二一一四	八〇八九八	九〇一三八	一〇〇三四九
中(乙)私有工業		二八	三四	二三	三一	二八	二六
對於上年的百分比							
全部生產品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對一九三三年的百分比
其(甲)社會主義工業		一一二〇·一	一一三三·一	一一三〇·二	一一一·四	一一一·三	一一三八·八
中(乙)私有工業		一一一·四	六七·六	一三四·八	九〇·三	九二·九	九二·九
百分比							
全部生產品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其(甲)社會主義工業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中(乙)私有工業		〇〇·七	〇〇·七	〇〇·四	〇〇·四	〇〇·三	〇〇·三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工業在報告期內已增至兩倍以上，而且出產量底全部增長都是出自社

會主義生產方面的。

其次，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體系是蘇聯工業底唯一體系。

最後，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私有工業底最終滅亡，是連瞎子現在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私有工業底滅亡，不是偶然的。它所以滅亡了，首先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比資本主義體系更高的體系。它所以滅亡了，第二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給了我們以這樣的可能性，——使我們在幾年內就在現代新技術基礎上把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工業改造了。這樣的可能性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沒有產生，而且也是它所不能產生的。事實是如此：從生產底技術方面看來，從工業生產所具有的新技術裝備程度方面看來，我國工業佔全世界第一位。

如果把我國工業發展速度拿來對戰前水平作百分數的比較，並把這速度拿來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速度比較一下，那就會看見以下的情景：

蘇聯工業發展情形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情形比較表（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蘇聯	一〇〇・〇	三八〇・五	四五七・〇	五六二・六	七三二・七	八一六・四	九〇八・八
美國	一〇〇・〇	一〇八・七	一一二・九	一二八・六	一四九・八	一五六・九	一二〇・〇
英國	一〇〇・〇	八七・〇	九七・一	一〇四・〇	一一四・二	一二一・九	一一三・三
德國	一〇〇・〇	七五・四	九〇・四	一〇五・九	一一八・一	一二九・三	一三一・六
法國	一〇〇・〇	一〇七・〇	九九・〇	九四・〇	九八・〇	一〇一・〇	九三・二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工業與戰前水平比較起來已增至九倍以上，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底工業則依然在戰前水平周圍踏步不進，總共只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這就是說，按發展速度說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佔全世界第一位。

由此可見，按生產技術和我國工業發展速度說來，我們已經趕上並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了。

我們究竟是在什麼方面落後呢？我們是在經濟方面，即在我國工業按人口來計算的出產額方面，仍然落後。我們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約近一千五百萬噸生鐵，而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則只出產了七百萬噸。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情形是比英國好些。可是，如果把這些噸數的生鐵拿來按人口數量分攤一下，那末結果就是這樣：在一九三八年，在英國攤歸每人的，是一百四十五個基羅格蘭姆的生鐵，而在蘇聯則不過八十七個基羅格蘭姆。又如：英國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一千零八十八萬噸的鋼和約近二百九十萬萬基羅瓦特小時的電（電力產量），而蘇聯則出產了一千八百萬噸的鋼和三百九十萬萬多基羅瓦特小時的電。驟然看來，也許覺得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情形是比英國好些。可是，如果把這些噸數和這些基羅瓦特小時拿來按人口數量分攤一下，那末結果就是這樣：在一九三八年，在英國攤歸每人的，是二百二十六個基羅格蘭姆的鋼和六百二十個基羅瓦特小時的電，而在蘇聯攤歸每人的，却不過一百零七個基羅格蘭姆的鋼和二百三十三個基羅瓦特小時的電。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原來是因為我國人口比英國人口多幾倍，所以需要額也比英國多；在蘇聯有一萬萬七千萬人口，而在英國却不過四千六百萬。在判定工業底經濟實力時，不要只看一般工業出產量而不管國內人口如何，而是要把工業出產量與國內每人對這出產量的消費額直接聯系起來觀察。在按人口分攤時落到國內每人份額上的工業出產品愈多，則該國經濟實力也愈高，反之，落到國內每人份額上的工業出產品愈少，則該國以及該國工業底經濟實力也愈低。所以，國內人口愈多，則國內對於消費品

的需要額也愈大，於是該國工業產量也應當愈大。

例如拿生鐵出產來說吧。爲要在生鐵出產方面，在經濟上超過英國——而英國生鐵出產額在一九三八年是七百萬噸——，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鑄量提到二千五百萬噸。爲要在經濟上超過德國——而德國生鐵出產額在一九三八年總共是一千八百萬噸——，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鑄量提到四千萬至四千五百萬噸。而爲要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此地不是指危機年度的一九三八年水平而言，該年在美國總共只出產一千八百八十萬噸生鐵；而是指一九二九年度水平而言，該年在美國曾有工業高漲，該年在美國曾出產約近四千三百萬噸的生鐵——，那我們就要把我國每年生鐵鑄量提到五千萬至六千萬噸。

關於鋼和展鐵底生產，關於機器製造業等等，也要這樣說，因爲所有這些工業部門也如其餘各部門一樣，歸根結底是依生鐵出產爲轉移的。

我們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已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了。這是很好的。但這還不夠。必須在經濟方面也超過它們。我們能夠做到這一步，而且我們應當做到這一步。只有當我們在經濟上也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才可指望我國將完全充滿消費品，我們將有豐富的產品，那時我們就有可能完成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過渡。

爲要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就要有什麼東西呢？爲着這件事，首先就要有嚴重而不可遏止的前進志願，要有不惜坦受犧牲的決心，不惜拿出巨量建設基金來極力擴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決心。我們有這種條件麼？絕對有！爲着這件事，其次就要有高度的生產技術和高度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有這種條件麼？絕對有！爲着這件事，最後就要有時間。是的，同志們，要有時間。必須建築新工廠。必須給工業造就新幹部。可是，爲着這件事，就必須要有時間，而且要有不少的時間。要在兩三年以內就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那是不可能的。爲着這件事，是要有較多一些時間

的。例如又拿生鐵及其出產來說吧。要在多少時間內才可在生鐵出產方面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呢？在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國家計劃局舊成份中某些工作人員曾提議把臨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終結時的生鐵出產額規定為六千萬噸。這就是說，他們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有可能使生鐵鑄額每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一千萬噸。這當然是幻想，如果不比幻想更壞的話。而且這些同志曾不僅是在生鐵出產方面陷於幻想境地。例如他們曾認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蘇聯人口每年增長率應當是三四百萬，或且更多。這也是幻想，如果不比幻想更壞的話。可是，如果把幻想家撇開，而站在現實基地上，那我們根據現時的鑄鐵技術狀況，就可以把生鐵鑄額每年平均增長率規定為二百萬至二百五十萬噸，作為完全可能的增長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史以及我國工業史告訴我們：這種每年增長率是緊張的，但是完全可以達到的。

所以，要有時間，而且要有不少的時間，以便在經濟上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而我國勞動生產率愈高，我國生產技術愈臻完善，則也就會愈迅速實現這個最重要的經濟任務，則也就會更大縮短實現這個任務的期限。

(乙)農業。在報告期內農業發展也和工業發展一樣是按高漲路線前進的。這個高漲不僅表現於農業出產量底增長，而且首先是表現於：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農業底增長和鞏固，另一方面則是個體農民經濟底滅亡。集體農莊所有穀物播種面積已從一九三三年的七千五百萬海克脫增至一九三八年的九千二百萬海克脫，而個體農民所有穀物播種面積在這同一時期內則從一千五百七十萬海克脫縮減到六十萬海克脫，即縮減到只等於全部穀物播種面積千分之六。我還不說技術作物播種面積，在這方面，個體農民經濟底作用已降到等於零了。此外，大家知道，現時已加入集體農莊的，共有一千八百八十萬農戶，即佔全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點五，而集體漁場和其他集體營業場還不算在內。

這就是說，集體農莊已經最終奠定和鞏固，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現在已是我國農業底唯一形式了。如果把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在報告期內增長的情形拿來和革命以前時期的播種面積數量比較一下，那就會看見以下的情景：

全蘇聯所有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統計表

以百萬海克脫為單位					全部播種面積 總數	一九三八年對 一九一三年的 百分比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九四·四	一〇四·七	一〇三·四	一〇二·四	一〇四·四	一〇二·四	一〇八·五
四·五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八	一一·二	一一·〇	二四四·四
三·八	八·八	九·九	九·八	九·〇	九·四	二四七·四
二·一	七·一	八·六	一〇·六	一〇·六	一四·一	六七一·四
二·一	七·一	八·六	一〇·六	一〇·六	一四·一	六七一·四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我國播種面積，在一切農作物方面，而尤其是在飼料作物、技術作物以及菜蔬瓜類方面，是增長了。

這就是說，我國農業日益成為更完善的更富有出產能力的農業，而採用正確輪種制的辦法則已獲得實在的基礎。

在報告期內我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具有拖拉機、康拜因機以及其他機器的裝備程度，已增長得怎

樣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下列各個統計表來回答：

(1) 蘇聯農業中的拖拉機數量統計表

全部拖拉機總數			全部拖拉機總數(以千架為單位)			全部拖拉機總數(以千架為單位)		
中	其	引力量	中	其	引力量	中	其	引力量
(乙)蘇維埃 農場內拖拉 機引力量	(甲)機器 拖拉機站內 拖拉機引 力量	(甲)機器 拖拉機站內 拖拉機引 力量	(乙)蘇維埃 農場內拖拉 機數量	(甲)機器 拖拉機站內 拖拉機數量	(甲)機器 拖拉機站內 拖拉機數量	(乙)蘇維埃 農場內拖拉 機數量	(甲)機器 拖拉機站內 拖拉機數量	(甲)機器 拖拉機站內 拖拉機數量
一四〇·一七	一七五八·一	三二〇九·二	八三·二	一一三·二	二一〇·九	八三·二	一一三·二	二一〇·九
一六六九·五	二七五三·九	四四六二·八	九五·五	一七七三	二七六·四	九五·五	一七七三	二七六·四
一八六一·四	四二八一·六	六一八四·〇	一〇二·一	二五四·七	三六〇·三	一〇二·一	二五四·七	三六〇·三
一七三〇·七	五八五六·〇	七六七二·四	八八·五	三二八·五	四二二·七	八八·五	三二八·五	四二二·七
一六四七·五	六六七九·二	八三八五·〇	八四·五	三六五·八	四五四·五	八四·五	三六五·八	四五四·五
一七五一·八	七四三七·〇	九二五六·二	八五·〇	三九四·〇	四八三·五	八五·〇	三九四·〇	四八三·五
一二五·〇	四二三·〇	二八八·四	一〇二·二	三一九·八	二二九·三	一〇二·二	三一九·八	二二九·三

一九三三年對一九三三年的百分比

(2) 蘇聯農業中的康拜因機以及其他機器數量統計表(以千架為單位; 以年底為標準)

康拜因機	內燃發動機和 蒸汽發動機	複雜打麥機和 半複雜打麥機	載重汽車	輕便汽車(以 一架為單位)
一九三三年	二五·四	四八·〇	一一〇·三	二六·六
一九三四年	三三·三	六〇·九	一一一·九	四〇·三
一九三五年	五〇·三	六九·一	一二〇·一	六三·七
一九三六年	八七·八	七二·四	一二三·七	九六·二
一九三七年	一二八·八	七七·九	一二六·一	一四四·五
一九三八年	一五三·五	八三·八	一三〇·八	一九五·八
一九三八年對 一九三三年的 百分比	六〇四·三	一七四·六	一〇八·七	七三六·一
				二四〇·四
				七五五·五
				五五三·三
				三九九·一

如果除這些數目字以外，還加上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報告期內我國所有機器——拖拉機站總數，已由一九三四年的二千九百處增至一九三八年的六千三百五十處，——那就可以根據所有這些統計而有把握地說：我國農業在現代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在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於是，我國農業和其他任何一國農業比較起來，就不僅是最巨大的最機械化的農業，因而也就是商品產額最大的農業，而且是最富有現代技術裝備的農業。

如果把穀物 and 技術作物出產量在報告期內增長的情形拿來和革命以前時期的情形比較，那就會看見以

下的情景：

全蘇聯穀物和技術作物出產總量統計表

	以百萬公担爲單位							一九三八年 對一九一三 年的百分比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穀物	八〇一·〇	八九四·〇	九〇一·〇	八二七·三	一一〇二·九	九九九·九	一一八·六	
生棉花	七·四	一一·八	一七·二	二二·九	二五·八	二六·九	三六三·五	
亞麻（纖維 質）	三·三	五·三	五·五	五·八	五·七	五·四六	一六五·五	
糖蘿蔔	一〇九·〇	一一三·六	一六二·一	一六八·三	二一八·六	一六六·八	一五三·〇	
油類植物	二一·五	三六·九	四二·七	四二·三	五一·一	四六·六	二一六·七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雖然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在東部各區和東南各區曾遭受旱災，雖然一九一三年曾有空前未有的豐收，可是，我國穀物和技術作物在報告期內每年出產總量與一九一三年水平比較起來，還是不斷向上增長的。

關於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穀物生產底商品額問題，是值得特別注意的。著名統計學家昂蒙啓諾夫同志計算出：在戰前時期，從五十萬萬普特的穀物出產總量中拿到市場上出賣的商品穀物，總共不過一十三萬萬普特左右，這就是說，穀物生產底商品額等於當時穀物出產總量百分之二十六。據昂蒙啓諾夫同

志所計算，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既是大規模的生產，其商品額——例如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約等於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七，而個體農民經濟底商品額則只約等於百分之十二。如果更加謹慎從事，而把一九三八年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生產底商品額當作是等於出產總量百分之四十，那末結果就是這樣：我國社會主義穀物業能夠供給，而且在本年度內確實已供給大約二十三萬萬普特的商品穀物，就是說比戰前穀物生產底商品額多十萬萬普特。

所以，蘇維埃農莊——集體農莊生產底高度商品額是其最重要的特點，這個特點對於國家供給是有最嚴重意義的。

我國所以能這樣容易而迅速解決了穀物問題，解決了充分供給我們這個巨大國家以商品穀物的問題，其祕密所在，就正是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個特點。

應當指出的，就是在最近三年以來，我國每年採辦的穀物都未曾少於十六萬萬普特，有時——例如一九三七年——甚至於增至十八萬萬普特。如果除此而外，再加上國家每年所收買的約二萬萬普特穀物以及集體農民按集體農莊穀物貿易路線所賣出的數萬萬普特穀物，那我們總共就得到適如上述的由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供給的商品穀物數量。

其次，還值得指出的，就是在最近三年以來，商品穀物底根據地已由那向來認作我國穀倉的烏克蘭移到北部和東部去了，就是說移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去了。大家知道：在最近兩三年以來，烏克蘭每年採辦的穀物共計四萬萬普特左右，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每年採辦的商品穀物却等於十一萬萬至十二萬萬普特。

穀物出產情形，就是如此。



豬	山 羊	綿 羊 和	牛	馬 匹	以每年七月為標準							
					一九一六年 (按調查結 果)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 對一九一六 年調查結果 的百分比
二〇·九	一一一·二	六〇·六	三五·八	一六·六	一五·七	一五·九	一六·六	一六·七	一七·五	四八·九	一〇五·四	
一二·一	五〇·二	三八·四	四二·四	四九·二	五六·七	五七·〇	六三·二	一〇四·三	一六四·六	一四六·四	二五二·九	
一七·四	五一·九	六一·一	七三·七	八一·三	一〇二·五	三〇·五	二二·八	三〇·六	一四六·四	二五二·九		
二二·五	六二·一	七三·七	八一·三	一〇二·五	三〇·五	二二·八	三〇·六	一四六·四	二五二·九			

全蘇聯所有牲畜數目統計表（以百萬頭為單位）

請看關於這方面的統計材料吧：

至於說到養畜業，那末就是在這個最落後的農業部門中，在最近幾年來也表現出重大的進展。固然在養馬業和畜羊業方面，我們還落後於革命以前的水平，可是在養牛業和養豬業方面，我們已經超過過革命以前的水平了。

毫無疑義的，養馬業和畜羊業方面的落後情況是在最短期內就會被消滅的。

(丙) 商品流轉與運輸業。 隨着工業和農業之高漲，我國商品流轉額也增長了。 在報告期內國家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額已增長百分之二十五。 國家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額已增長百分之一百七十八。 集體農莊市集貿易額已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商品流轉額統計表

設各省人民工業各工人民委員部、輕工業人民委員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林水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以年底為標準
一九三三年	二八五三五五	四九七八九二	一一五〇〇〇	七一八	一九三四年	二八六二二六	六一八一四七	一四〇〇〇〇	八三六
一九三五年	二六八七二三	八一七一二一	一四五〇〇〇	一一四一	一九三六年	二八九四七三	一〇六七六〇	一五六〇七二	一七九八
一九三七年	三二七三六一	一二五九四三	一七七九九七	一九一二	一九三八年	三五六九三〇	一三八五七四	二四三九九二	一九九四
一九三八年	一一五·一	二七八·三	二二二·二	二七七·七	對一九三三年 的百分比				

不言而喻的，如果運輸業轉運額沒有相當的增長，則我國商品流轉額就會不能這樣擴展起來。而實際上，在報告期內，轉運額——在所有各種運輸業方面，特別是在鐵路運輸業和航空運輸業方面——是已經增長了。轉運額在水道運輸業方面也增長了，可是增長得很不平整，而在一九三八年，水道運輸業方面的轉運額，可惜甚至於比上年減低了一些。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轉運額統計表

								一九三八年對 一九三三年的 百分比
鐵路運輸（以 十萬噸哩為 單位）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河海運輸（以 十萬噸哩為 單位）	一六九·五	二〇五·七	二五八·一	三二三·四	三五四·八	三六九·一		二一七·七
民用航空運輸 （以百萬噸哩 為單位）	三·一	六·四	九·八	二一·九	二四·九	三一·七		一〇二二·六
	五〇·二	五六·五	六八·三	七二·三	七〇·一	六六·〇		一三一·五

毫無疑義的，水道運輸業在一九三八年稍許落後的情況是在一九三九年就會被消滅的。

## (二) 人民底物質狀況和文

### 化狀況之更加高漲

工業和農業之繼續高漲，曾不能不使而且確實已使人民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更加增進起來。

剝削現象之被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中之鞏固，失業現象以及與此相連的貧困現象在城鄉內之絕跡，工業之宏偉的擴大，工人數量之不斷的增長，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底勞動生產率之增長，土地之永遠留歸集體農莊使用，集體農莊之得到巨數頭等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供給，——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更加提高工農物質狀況的實在條件。而工農物質狀況之改善又自然使智識界物質狀況改善了，而這智識界就是我國底重大力量，並服務於工農底利益。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要設法把那些拼命逃出農村和忍飢受餓的失業的無家可歸的農民們安插到工業中，並開恩似地收容他們來作工了。這樣的農民在我國早已沒有了。這當然是很好的，因為這是我國農村生活豐裕的明證。現在的問題，只能是勸集體農莊來尊重我們的請求，給與我們每年至少是約近一百五十萬個青年集體農莊莊員來供我們工業發展的需要。已在過着豐裕生活的集體農莊應當注意到：如果沒有它們方面的這種幫助，那就會很難繼續擴大我們的工業，而如果不擴大工業，那我們就不能滿足農民們日益增長的對於日常消費品的需求。集體農莊是完全有可能來滿足我們這個請求的，因為在集體農莊中既有豐足的技術，就能在農村中解放一部分工作者，而這些工作者一轉移到工業中來，就能給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以莫大的益處。

總結起來，我們在報告期內有以下的關於工農物質狀況改善的指標：

(1) 國民收入，已由一九三三年的四百八十五萬盧布增至一九三八年的一千零五十萬盧布；

(2) 工人和職員底數量，已由一九三三年的二千二百餘萬人增至一九三八年的二千八百萬人；

(3) 工人和職員底全年工資基金，已由三百四十九萬五千三百萬盧布增至九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萬盧布；

(4) 工業工人底每年平均工資，已由一九三三年的一千五百一十三個盧布增至一九三八年的一千四百四十七個盧布；

(5) 集體農莊底貨幣收入，已由一九三三年的五十六萬六千一百九十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一百四十一萬八千零十萬盧布；

(6) 在穀物區內每年平均發給每個集體農戶的穀物，已由一九三三年的六十一個普特增至一九三七年的一百四十四個普特，而種子和保險種子存額，公共牲畜飼料存額，對於國家的穀物交納，對於機器—拖拉機站工作的自然品報酬等，尚不計算在內；

(7) 國家按預算支出舉辦社會文化設施的款項，已由一九三三年的五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萬盧布增至一九三八年的一百五十二萬零二百五十萬盧布。

至於說到人民底文化狀況，那末它也隨人民底物質狀況高漲而高漲了。

從人民底文化發展方面看來，報告時期真正是文化革命底時期。普通初級義務教育制按蘇聯各民族語言之實現，各級學校與學生數目之增加，由高級學校畢業的專門家數目之增加，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之養成和鞏固，——這就是人民文化程度高漲底一般情景。

請看相當的統計表吧：

(1) 人民底文化水平增高情形表

報紙全年出版份數	其中有聲影片機架	農村中所有電影機架(小影片機架除外)	其中有聲影片機架	電影機架(小影片機架除外)	戲院數量	俱樂部式的機關數量	其中所有書籍數量	羣衆圖書館數量	蘇聯所有學習者總數(包括一切學習方式)	其		各級學校學生總數	指標
										(甲)受初級教育者	(乙)受中等普通教育者和受中等專門教育者		
以百萬份爲單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以一架爲單位	以一所爲單位	以千所爲單位	以百萬冊爲單位	以千所爲單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以千人爲單位	計算單位
四九八四·六	二四	一七四七〇	四九八	二七四六七	五八七	六一·一	八六·〇	四〇·三	—	四五八·三	五四八二·二	二三八一四	一九三三—三四年度
七〇九二·四	六六七〇	一八九九一	一五二〇二	三〇四六一	七九〇	九五·六	一二六·六	七〇·〇	四七四四二·一	六〇一·〇	一二〇七六·〇	二二二八八四	一九三八—三九年度
一四二·三	增至二百七十八倍	一〇八·七	增至三十一倍	一一〇·九	一三四·六	一五六·五	一四七·二	一七三·七	—	一三一·一	二二〇·三	一一九·一	對一九三三—三九年度 的百分比

(2) 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 在蘇聯所建成的學校數目統計表

年 份	學 校 數 目		總 計
	在 城 市 與 市 鎮 地 方	在 鄉 村 地 方	
一九三三年	三二六	三二六一	三五八七
一九三四年	五七七	三四八八	四〇六五
一九三五年	五三三	二八二九	三三六二
一九三六年	一五〇五	四二〇六	五七一
一九三七年	七三〇	一三三三	二〇五三
一九三八年	五八三	一二四六	一八二九
由一九三三年至 一九三八年總計	四二五四	一六三五三	二〇六〇七

(3) 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由高級學校畢業的年輕專家人數統計表(以千人為單位)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蘇聯全國每年畢業專家總數 (軍事專家除外)	三四·六	四九·二	八三·七	九七·六	一〇四·八	一〇六·七
(1) 工業和建築業工程師	六·一	一四·九	二九·六	二九·二	二七·六	二五·二
(2) 運輸業郵電業工程師	一·八	四·〇	七·六	六·六	七·〇	六·一
(3) 農業機械化工程師， 農學家，獸醫以及動物學技 術家	四·八	六·三	八·八	一〇·四	一一·三	一〇·六
(4) 經濟學家和律師	二·五	二·五	五·〇	六·四	五·〇	五·七
(5) 中學教員，工人速成 中學教員，中等實業學校教 員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人員 (包括藝術工作人員在內)	一〇·五	七·九	一二·五	二一·六	三一·七	三五·七
(6) 醫生，製藥師以及體 育工作人員	四·六	二·五	七·五	九·二	一一·三	一三·六
(7) 其他專家	四·三	一一·一	一二·七	一四·二	九·九	九·八

由於這個巨大文化工作的結果，於是在我國就誕生了和形成了人數衆多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這個智識界是由工人階級、農民以及蘇維埃職員隊伍中出身的，是和我國人民彼此血肉相連的，——這個智識界是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剝削制枷鎖，而是仇恨着剝削者並準備着忠誠效勞於蘇聯各族人民的。



我認爲：這個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之誕生，就是我國文化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

### (三) 蘇維埃制度之更加堅固

報告時期最重要結果之一，就在於它使我國內部狀況更加鞏固了，使蘇維埃制度更加堅固了。

而且也只能是如此。社會主義體系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之奠定，工業和農業之高漲，勞動者物質狀況之高漲，民衆文化程度之提高，民衆政治積極性之提高，——所有這一切都是蘇維埃政權領導下實現的，結果就不能不使蘇維埃制度更加堅固起來。

現時蘇維埃社會別於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就是在蘇維埃社會裏，彼此對抗的彼此敵視的階級已經不復存在，剝削者階級已被消滅，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子則在友愛合作基礎上生活着和工作着。當資本主義社會正被工人和資本家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農民和地主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所撕裂着，致使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情況動搖不穩的時候，而我們這個已擺脫剝削制枷鎖的蘇維埃社會却根本沒有這種矛盾，根本沒有階級衝突，而是表現爲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子友愛合作的圖畫。而正是在這個共同性基礎上，就使蘇維埃社會底精神上政治上統一，蘇聯各族人民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這樣的動力，擴展了起來。同樣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通過的蘇聯憲法，以及我國各最高機關選舉制完全民主化的事實。

至於說到我國最高機關選舉本身，那末這些選舉就正是光輝燦爛地顯示了蘇維埃社會底統一和蘇聯各族人民底友誼，而這種統一和友誼就正是我國內部狀況底顯著特點。大家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投票贊成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的，幾乎有九千萬個選舉人，即等於曾參加投票的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而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選舉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時，投

票贊成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的，則有九千二百萬個選舉人，即等於曾參加投票的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

蘇維埃制度所以堅實牢固，蘇維埃政權力量所以源源不絕，其基礎，其根源，就在這裏。

而這也就是說，在戰爭一旦爆發時，我國軍隊底後方和前線，因其性質單純和內部統一之故，將比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裏都更加強固些，而這一點是國外那些愛鬧軍事衝突者們所應當謹記着的。

國外某些報界人物，正在那裏胡說八道，硬說從蘇維埃組織裏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屠哈切夫斯基、羅津果里茨、布哈林以及其他暴徒一類的間諜、兇手、暗害份子清除出去，似乎是「動搖了」蘇維埃制度，似乎是引起了「瓦解」。這種卑鄙下賤的廢話是只值得受人譏笑的。從蘇維埃組織裏把暗害份子和敵人份子清除出去，這怎麼會能動搖和瓦解蘇維埃制度呢？托洛茨基——布哈林份子這一小夥間諜、兇手、暗害份子，這一小夥總是在外國面前奴顏婢膝的賤人，這一小夥總是在每一個外國官老爺面前俯伏跪拜，甘願投奔到他那裏去担任間諜勤務的奴才，——這一小夥不懂得每個已擺脫資本枷鎖的最平常蘇維埃公民都比國外任何一個背着資本主義奴隸制枷鎖的大官顯宦高尚得多的人們，——這樣一個小得可憐的賣國奴匪幫究竟誰人需要呢，究竟對於人民能有什麼價值呢，究竟能「瓦解」誰人呢？一九三七年，屠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波列維奇以及其他暴徒被判決槍斃。在此以後，我們就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結果，給了蘇維埃政權以全體參加投票者總數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三八年初，羅津果里茨、李可夫、布哈林以及其他暴徒被判決槍斃。在此以後，我們就舉行了各盟員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結果，給了蘇維埃政權以全體參加投票者總數百分之九十九點四。試問這裏有什麼「瓦解」標誌呢，爲什麼這個「瓦解」竟沒有反映到選舉結果中來呢？

假如聽信外國這些胡說八道者，那就會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如果我們會讓間諜、兇手以及暗害份子

們逍遙法網，任憑他們進行暗害勾當、行兇殺人、從事間諜活動而不加以妨礙，那末蘇維埃組織就會更加堅強穩固得多了。（笑聲）。這些如此厚顏辯護着間諜、兇手、暗害份子的老爺們，豈不是把自己的黑幕揭破得太早麼？

如果說從蘇維埃組織裏把間諜、兇手、暗害份子清除出去，這會應當使而且確實已使這些組織更加鞏固起來，——如果這樣說，那豈不是正確些麼？

哈桑湖事件——舉例來說——豈不正是說明從蘇維埃組織裏把間諜和暗害份子清除出去，就是鞏固這些組織的最可靠的手段麼？

\*

\*

\*

黨在國內政策方面的任務如下：

(1) 繼續加緊發展我國工業，繼續加緊提高勞動生產率，繼續加緊完善生產技術，以便——當我們現在已經在生產技術和工業發展速度方面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以後，——能於最近將來十年至十五年當中在經濟上也超過它們。

(2) 繼續加緊發展我國農業和養畜業，以便在最近將來三四年當中把每年穀物產額提高到八十萬萬普特，使每個海克脫底平均收成率等於十二至十三公擔，把技術作物產額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把羊羣和豬羣增至兩倍，把牛羣增加百分之四十，把馬匹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3) 繼續向前改善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子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

(4) 始終一貫地實施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徹底實現我國政治生活民主化，鞏固蘇維埃社會底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以及工人、農民、智識份子間的友愛合作；多方鞏固蘇聯各族人民底友誼，發展和培植蘇維

埃愛國主義。

(5) 不要忘記資本主義包圍，而要謹記着：外國偵探機關將來還會把間諜、兇手、暗害份子遣送到我國來；謹記着這一點，並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偵探機關，有系統地幫助它去粉碎和根絕人民公敵。

### (三) 聯共(波)之更加鞏固

從政治路線和日常實際工作方面看來，報告時期是我們黨總路線完全勝利的時期。(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社會主義體系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之奠定，工業和農業在新技術基礎上改造之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之先期完成，每年穀物產額之提高到七十萬萬普特的水平，貧困和失業現象之消滅，人民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之高漲，——這就是表明我們黨政策正確，表明我們黨領導正確的基本成績。

在這些偉大成績面前，我們黨總路線底一切敵人，那各種各樣的「左傾的」和「右傾的」派別，那所有一切蛻化變節的份子——托洛茨基——皮達可夫份子和布哈林——季可夫份子，却不得不把身子縮緊，掩藏其老生常談的「政綱」，並深深暗藏起來。他們既無順從人民意志的勇氣，就寧願去與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法西斯蒂打成一片，跑去效忠於外國偵探機關，受備為間諜，並担任幫助蘇聯底敵人來瓜分我國，來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奴隸制度。

這就是我們黨路線底敵人——他們後來已變成人民公敵——可恥的結局。

黨既把人民公敵打得粉碎並把蛻化變節份子從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裏清除出去，於是黨在自己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中就更加一致了，就更加密切團結在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周圍了。(掌聲如雷。全體代

表起立慶祝報告人。高呼：「烏拉！斯大林同志萬壽無疆！斯大林同志萬歲！我們黨底中央委員會萬歲！烏拉！」。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關於我們黨內部生活發展，關於我們黨在報告期內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的具體材料。

(一) 改善黨成份的辦法。把組織單位分小。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

在報告期內，黨及其領導機關底鞏固首先就是按兩方面實現的：一方面就是調節黨成份，排除不可靠的份子而揀選優秀的份子；而另一方面，就是把組織單位分小，把個別組織底範圍縮小，並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的行動的具體的工作。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代表着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個黨員。如果把這個數目拿去和上次，即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所代表的黨員數目比較，那末所得結果，就是從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至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時期中加入黨的，共有六十萬個新黨員。黨會不能不感覺到：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的條件下，這樣大批湧進黨來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和不適宜的擴大黨成份的現象。黨會知道：走進黨來的，不僅只有真誠忠實的人，而且還有一些偶然份子，而且還有一些想利用黨旗幟來達到其個人目的的野心家。黨會不能不知道：它所以強有力，不僅是由於自己黨員底數量，而首先就是由於自己黨員底質量。於是就提出調節黨成份的問題。會決定把那尚在一九三三年就已開始的清洗黨員和候補黨員的工作繼續下去，而這個清黨工作就確實繼續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其次，會決定停止接收新黨員入黨的工作，而這個

工作就確實一直停止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而且接收新黨員入黨的工作只有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才恢復起來。其次，因基洛夫同志被兇殺案已證明在黨內有不少可疑份子，於是會決定實行審查並更換黨證表冊，而且這兩項工作都是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才告結束。只有自此以後，才宣佈接收新黨員和新候補黨員入黨。由於實行這一切辦法的結果，黨已達到這一步，就是它把偶然份子、消極份子、野心家以及直接敵人從黨隊伍中清除出去了，而揀選了最堅定最忠實的人們。不能說在實行這個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所犯的錯誤，可惜竟比原來所能預料的的多些。毫無疑義的，我們今後無須再來採用大批清洗的方法。可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的清洗終究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它在基本上是給了良好結果的。本屆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所代表的，約有一百六十萬個黨員，即比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時少二十七萬個黨員。但這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反之，這正是向好的方面進展的現象，因為黨是把壞東西從自己隊伍中清除出去而鞏固起來的。現在，我們黨按其黨員數量說來雖是少了一些，但按質量說來却已更加優良了。

這是巨大的成績。

至於說到改善日常的黨的領導，就是說，使其更接近於下層工作，使其更加具體化，那末黨就會認為：把組織單位分小，把個別組織底範圍縮小的辦法，是最好的辦法，以便使黨機關易於領導這些組織，並使領導本身成為具體的生動的行動的領導。把組織單位分小的辦法，既在各人民委員部方面實行了，也在行政區域組織方面，就是說在各盟員共和國、各邊疆、各省、各區等方面實行了。由於採取各種設施的結果，我們現在所有的，已經不是七個盟員共和國，而是十一個盟員共和國，已經不是十四個蘇聯人民委員部，而是三十四個蘇聯人民委員部，已經不是七十個邊疆和省，而是一百一十個邊疆和省，已經不是二千五百五十九個市區和鄉區，而是三千八百一十五個市區和鄉區。同時與此相應的，就是我們現時在黨領導機關系統中，已有以聯共（波）中央為首的十一個中央委員會，六個邊疆委員會，一百零四

個省委員會，三十個州委員會，二百一十二個全市委員會，三百三十六個市區委員會，三千四百七十九個區委員會，十一萬三千零六十個初級黨組織。

不能說把組織單位分小的事業已經完竣了。把組織單位分小的事業是多半還會繼續進行下去的。可是，無論如何，它已經貢獻出自己的良好結果，無論是在改善對於工作的日常領導方面，無論是在使領導本身更接近於下層具體工作方面。我還不說，把組織單位分小的辦法給了我們以提拔成百成千個新人物來担任領導工作的可能。這也是巨大的成績。

## (二) 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

調節黨成份和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具體工作，這不會是而且會不是更加鞏固黨及其領導的唯一辦法。在報告期內的另一個鞏固黨的辦法，就是根本改善對於幹部的工作，改善挑選幹部、提拔幹部、佈置幹部、在工作過程中審查幹部的事業。

黨底幹部是黨底指揮人員，而因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所以他們也就是國家領導機關底指揮人員。當正確的政治路線——在實踐中考驗過的路線——已經規定以後，黨底幹部就成為黨領導和國家領導底決定力量。具有正確的政治路線，——這當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事情。但這終究還是不夠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所以需要，並不是為着宣佈，而是為着實現。而為要實現正確政治路線，就要有幹部，就要有這樣的人材，這些人材是懂得黨底政治路線的，是接受它為自己本身路線的，是決意把它實施的，是善於在實踐中把它實現的，是能夠對它負責的，是能夠擁護它的，是能夠為它而奮鬥的。沒有這個條件，

則正確的政治路線就會化爲紙上具文了。

正是在這裏就發生關於正確挑選幹部、關於培養幹部、關於提拔新人材、關於正確佈置幹部、關於按其已作成的工作來審查幹部的問題。

什麼是正確挑選幹部呢？

正確挑選幹部，這還不是說給自己找得幾個代理人和助手，成立一個辦事室並從那裏發佈各種指令。（笑聲）。這也不是說濫用自己的職權，毫無意思地把幾十人幾百人從甲處拋到乙處，又從乙處拋到甲處，並舉行沒有止境的「改組」。（笑聲）。

正確挑選幹部，這就是說：

第一，要重視幹部，要把他們看作黨和國家底寶貴基金，要愛護他們，要尊重他們。

第二，要知道幹部，要仔細考查每一個幹部工作者底優點和缺點，要知道這個工作者究竟是在怎樣的職位上能最容易發揮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細心培養幹部，要幫助每一個發展着的工作者向上升進，不惜花費時間去「耐煩照顧」這樣的工作者，並加速他們的發展。

第四，要及時和大膽提拔新起的年輕的幹部，不要讓他們永遠停滯在一個地方，不要讓他們冷淡下去。

第五，要這樣按職位來佈置各個工作者，使每個工作者都覺得自己適得其所，使每一個工作者都能按其品質所能給出的最高限度貢獻給我們公共的事業，使幹部佈置工作底一般方向完全適合於政治路線底要求，而幹部佈置工作本身就正是以實現這政治路線爲本旨來實行的。

關於大膽和及時提拔新起年輕幹部的問題，在這裏有特別的意義。據我想來，在我們的人當中，對



於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認識。有一部分人認為在挑選幹部時主要是須指望於老幹部。反之，其他一部分人則認為主要是須指望於年輕幹部。我覺得這兩部分人都弄錯了。老幹部當然是黨和國家底一筆巨大財富。他們具備着年輕幹部所沒有的東西——領導方面的豐富經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鍛鍊，諳通事理的知識，決定方針的力量。可是，第一，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少於需要之數，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而開始局部衰老亡故。第二，在老幹部中，有這樣一部分人，他們有時懷着一種頑固守舊的僻性，拘守成規的僻性，而既然拘守成規，於是就看不見實際生活中的新穎事物。這就叫做喪失對於新穎事物的知覺。這是很嚴重而危險的缺點。至於說到年輕幹部，那末他們當然是沒有老幹部所具備着的那種經驗、鍛鍊、諳通事理的知識、決定方針的力量。可是，第一，年輕幹部是佔絕大多數的；第二，他們既然年輕，所以他們暫時還遭遇不着衰老亡故的危險；第三，他們具備着綽綽有餘的對於新穎事物的知覺，——這是每一個波爾什維克工作者底寶貴品質；第四，他們是長進得和開明得如此迅速，他們是向上飛奔得如此快，以至於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趕上那些老頭子，而與他們並肩前進，成爲他們的有資格的替班。所以，任務並不在於——或是指望老幹部，或是指望年輕幹部；而是在於抱定方針去把老幹部和年輕幹部配合起來，把他們團結爲一個擔任黨領導工作和國家領導工作的總的音樂隊。（鼓掌多時）。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必須及時和大胆提拔年輕幹部來擔任領導職務。

黨在報告期內鞏固黨領導方面的重大成績之一，就是它在挑選幹部方面正是自下至上地，成效卓著地實行了這個配合老工作者和年輕工作者的方針。

在黨中央裏有一些材料，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在報告期內，黨善於提拔五十多萬個年輕波爾什維克——黨員波爾什維克和接近於黨的波爾什維克——來擔任國家方面的領導職務和黨方面的領導職務，

而婦女在其中佔居百分之二十以上。

現時任務何在呢？

任務就在於要自下至上地把挑選幹部事業完全集中起來，並把它提到應有的科學的波爾什維主義的高度。

爲此就必須剷除那種把考查、提拔、挑選幹部事業分割於各部各科的現象，而把這個事業集中到一個地點。

聯共（波）中央委員會裏的幹部管理處以及每個共和國黨組織、邊疆黨組織、省黨組織裏的相當的幹部，就應當是這樣的地點。

### （三）黨的宣傳工作。以馬克思主義

#### ——列寧主義來教育黨員和黨幹部

在報告期內藉以實行鞏固黨及其領導機關的，還有一個黨工作部門，而且是很重要的和很負責的工作部門，這就是黨的口頭的和刊物的宣傳和鼓動，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精神來教育黨員和黨幹部，就是提高黨及其工作者底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

關於黨宣傳事業，關於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教育我們工作者的事業底最嚴重意義，是無須說及的。我在這裏不僅是指黨機關底工作者而言。我同時還是指青年團的、職工會的、商業合作社的、經濟的、蘇維埃的、教育的、軍事的以及其他組織的工作者而言。儘管可以令人滿意地進行調節黨成份並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儘管可以令人滿意地進行提拔幹部、挑選幹部、佈置幹部；儘管可以做到

這一切，但如果我們的黨宣傳工作竟因某種原故而開始跛起腳來，如果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我們幹部的事業竟開始衰弱起來，如果我們提高這些幹部底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的工作竟削弱起來，而這些幹部自己又因此而不再注意我們向前進展前途，不復瞭解我們事業底正確性，而變成爲茫無前途的、盲目式和機械式執行上級指示的事務主義者，——那末我們整個國家的和黨的工作，就一定會衰弱起來。必須把以下一點看作是一個定理，就是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的工作者底政治水平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則工作本身也愈高和愈有成效，工作底結果也愈有效力；反之，工作者底政治水平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則在工作中也就愈會發生延誤和失敗，則工作者本身就愈會變爲鼠目寸光的小人和墮落爲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則他們也就愈會蜕化變節。可以大膽說：如果我們已在思想上把我們所有各工作部門的幹部造就得這樣，在政治上把他們鍛鍊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使他們能夠自由認清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如果我們已把他們變成完全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使他們能夠解決國家領導問題而不犯什麼嚴重錯誤，——那末我們就會有一切根據來說我們一切問題底十分之九都已經解決了。而這個任務是我們毫無條件地能夠解決的，因爲我們具有爲解決這個任務所必要的一切辦法和可能性。

在我們這裏，年輕幹部底培養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個別科學部門和技術部門進行着，按各個專門知識進行着。這是必要和適當的。沒有什麼必要使醫學專家同時又是物理學專家或植物學專家；反之，也沒有什麼必要使後者同時又是前者。可是，有一個科學部門則是所有一切科學部門中的波爾什維克所必須知悉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社會、關於社會發展規律、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關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規律、關於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因爲決不可把這樣一個人當作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這個人雖以列寧主義者自命，而同時却以自己的專門知識爲限，譬如說以數學、植物學或化學爲限，

而除了自己的專門知識以外，再也看不見其他什麼東西。列寧主義者不能祇是他自己所喜愛的科學部門底專家，他同時還應當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要積極注意於本國底命運，要通曉社會發展底規律，要善於運用這些規律，並力圖成爲國家政治領導底積極參加者。當然，這對於波爾什維克專家將是一種附加的負擔。但這將是大有出息的負擔。

黨宣傳工作底任務，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幹部的任務，就在於幫助我們一切工作部門中的幹部去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

關於宣傳工作和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幹部事業的改善辦法問題，曾在聯共（波）中央裏討論過多次，在討論時會吸收各省黨組織底宣傳員列席參加。在這裏並且曾注意到聯共（波）歷史簡要讀本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出版問世的事實。曾經認定：聯共（波）歷史簡要讀本出版問世，就奠定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宣傳事業新高漲底始基。聯共（波）中央工作底結果已經在它那有名的關於因聯共（波）歷史簡要讀本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宣傳工作的決議中公布出來了。

聯共（波）中央根據這個決議並注意到聯共（波）中央三月全會（一九三七年）關於黨工作缺點的著名決定，就規定了下列各個主要辦法來剷除在黨宣傳工作方面的缺點，並改善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教育黨員和黨幹部的事業：

（1）把黨的宣傳工作和鼓動工作集中到一個地點，把宣傳鼓動部和刊物出版部統一爲聯共（波）中央裏的一個宣傳鼓動工作管理處，同時在每一個共和國黨組織、邊疆黨組織、省黨組織裏成立相當的宣傳鼓動部；

（2）認爲醉心於小組制的宣傳是不正確的，而認爲由黨員們各人獨立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的方法是較爲適當的，所以必須使黨集中注意去進行刊物的宣傳和組織講演制的宣傳；

- (3) 在每一個省中心裏成立學期一年的補習班，以供我們的下層環節幹部來補習；
- (4) 在我國許多中心裏成立學期兩年的列寧學校，以供我們的中層環節幹部來學習；
- (5) 在聯共(波)中央下成立學期三年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高學校，以造就我們黨的深造的理論幹部；

(6) 在我國許多中心裏成立學期一年的宣傳員和辦報人員補習班；

(7) 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高學校下成立學期六個月的補習班，以供各高級學校中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教員來補習。

毫無疑義的，這些辦法的實現——這些辦法已在實行着，但還沒有充分實現，——是會立刻產生出自己的良好結果的。

#### (四) 幾個理論問題

還有一點也要算是我們的宣傳工作和思想工作底缺點，這就是在我們的同志中間，對於幾個具有嚴重實際意義的理論問題沒有完全明確的認識，在這些問題方面存在有一些糊塗觀念。我所指的，就是一般關於國家，特別是關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問題，以及關於我們的蘇維埃智識界問題。

人們有時發問道：「剝削者階級在我們這裏已被消滅了，敵對階級在國內已不復存在了，已經是沒有誰可鎮壓了，於是也就不復需要國家，而國家就應當消亡下去，——那末爲什麼我們不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消亡下去，爲什麼我們不努力把它結束，難道不已經是把這整個國家廢物拋到九霄雲外去的時候麼？」

或者又問道：「在我們這裏，剝削者階級已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在基本上已建成了，我們是向共產主義行進着，而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是認爲在共產主義下不應當有任何國家的，——爲什麼我們不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消亡下去呢，難道不已經是把國家送到古物陳列所裏去的時候麼？」

這些問題證明：這些發問者是誠心讀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學說底個別原理的。可是這些問題同時又證明：這些同志沒有瞭解現時的國際環境，忽略了資本主義包圍以及由此而生的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危險的事實。從這些問題中不僅可以看出人們輕視了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從這些問題中還可以看出人們輕視了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機關底作用和意義，而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機關是把間諜、兇手、暗害份子遣送到我國來，並力圖乘機來實行武裝侵犯我國的；從這些問題中同樣又可以看出人們輕視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軍事機關、懲罰機關以及偵探機關底作用和意義，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機關是爲保護社會主義國家而打退外來侵犯所必需的。必須承認：犯有這種輕視過失的，不僅是上述的同志。在某種限度內，所有我們大家，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波爾什維克都犯了這個過失。我們只有在最近的時候，只有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才知道上層托洛茨基份子和上層布哈林份子底間諜的和陰謀的活動，雖然從材料中可以看出，這些老爺們還從十月革命最初時日起就已經充當外國偵探機關底間諜並進行着陰謀活動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竟只有在最近的時候，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才知道，這難道不是奇怪麼？我們怎樣竟會把這件嚴重事情忽略過去了呢？這個過失究應如何解釋呢？人們通常總是把這個問題回答如下：我們曾不能推測到這些人竟會墮落到這樣下流的地步。可是，這並不能解釋，尤其是不能辯護這個過失，因爲過失之爲事實依然如故。這個過失究應如何解釋呢？這個過失應當這樣來解釋：就是因爲輕視了圍繞着我們的各資產階級國家及其偵探機關這一機構底力量和意義，而這些國家及其機關是力

圖利用人們底弱點，利用人們底虛榮心，利用人們底懦弱性，來把他們籠絡到自己的間諜羅網中去，用他們來包圍蘇維埃國家底機關的。這個過失應當這樣來解釋：就是因為輕視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及其偵探機關這一機構底作用和意義，輕視了這個偵探機關，却在那裏胡說八道，說蘇維埃國家條件下的偵探機關是小事情和沒有意思的東西，說蘇維埃偵探機關以及蘇維埃國家本身是很快就得送到古物陳列所裏去的。我們所有的這種輕視態度是在什麼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呢？

這種態度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底某些一般原理尚未臻完善，尚不充分。這種態度所以能夠流行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於國家理論諸問題抱有不可容許的疏忽態度，雖然我們具有二十年國家活動底實際經驗，而這種經驗給予了我們以從事理論綜合的豐富材料；雖然我們具有一種可能，就是我們只要願意就可以順利填補這個理論缺陷。我們忘記了列寧關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擔負的理論義務的最重要指示，他說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担负有繼續向前研究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使命。請看列寧會如何說明這個問題吧：

「我們決不把馬克思底理論看作什麼一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這個理論只給這樣一個科學奠定基礎，而這個科學是社會主義者所應當在各方面把它推向前進的，如果他們不願意落後於實際生活的話。我們認為：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必須獨立研究發揮馬克思底理論，因為這個理論只給予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底應用，局部說來對於英國是和對於法國不同的，對於法國是和對於德國不同的，對於德國是和對於俄國不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九二頁）。

例如拿恩格斯所規定的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論的典型公式來說吧：

「當必須加以控制而使其就範的社會階級已不復存在時，當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

那以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爲根源的生存鬥爭已不復存在時，當由此而生的衝突和強力已被剷除時，那時就會再沒有什麼人須加以鎮壓和約束，那時就會不復需要現在執行着這種職能的國家政權。國家將來以全社會真正代表資格所作的第一個行動——把生產資料變爲社會公有財產，——同時也就是它以國家資格所作的最後一次獨立行動。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逐漸成爲贅舉，並會自行終止。那時，對於人的管理，將由對於物的管理和對於生產過程的指導所替代。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見恩格斯，反杜林，黨出版局一九三三年版本，第二〇二頁）。

恩格斯底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是的，是正確的，但只有在下述兩條件之下才是正確的：（甲）如果只以某國內部發展爲觀點來從事於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而預先就撇開國際因素不說，並爲便於研究起見而把該國和該國家看作是離國際環境而孤立的；或者是（乙）如果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所有一切國家裏或大多數國家裏勝利了，而那時所有的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而是社會主義包圍，已經不復有外來侵犯的威脅，已經不復有加強軍隊和國家之必要。

好吧，而如果社會主義還只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並因此而無論如何也不可把國際條件撇開不說，——在這種情形下，究竟怎樣辦呢？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底公式是沒有給以回答的。而且恩格斯本來就沒有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於是在他那裏也就不能有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恩格斯所持的出發點就是假定：社會主義已經是多少同時在所有一切國家裏或大多數國家裏獲得勝利了。所以，恩格斯在這裏所研究的不是這一國或那一國底這個或那個具體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底發展，同時他假定有社會主義在大多數國家裏勝利的事實，——就是說，是按以下的公式：「假定說社會主義已在大多數國家裏勝利了，試問——在這個情形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應當遭受到怎樣的變化呢」。



只是因為問題帶有這樣一般的抽象的性質，才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恩格斯在研究社會主義國家問題時，完全把如像國際條件，國家環境這樣的因素，撇開不說。

但由此就得出結論：不可把恩格斯關於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命運的一般公式，推廣來運用到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勝利的局部的具體的情況中來，而這個國家在自己周圍是有資本主義包圍的，這個國家遭遇到外來武裝侵犯的威脅，這個國家因此就不能把國際環境撇開不說，這個國家應當既握有訓練得好的軍隊，又握有組織得好的懲罰機關，又握有堅固的偵探機關，因而也就是說，應當握有自己的充分強有力的國家，——以便有可能來保護社會主義底勝利品而打退外來的侵犯。

不可向那距現時四十五年 and 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要求，要他們預見到在遠遠的將來，在每一個別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的歷史曲折。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給我們規定出對於那些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以後，在每一個別國家裏發生的一切和任何理論問題的現成答案，以便使我們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底後代子孫——可以安然躺在火炕上來咀嚼現成答案，那就可笑了。（全場大笑）。

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向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提出要求，要他們不只是限於讀熟馬克思主義底個別一般原理，而要他們領會馬克思主義底實質，要他們學會估計到社會主義國家已在我國存在二十年來的經驗，最後，要他們學會倚據於這個經驗和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來把馬克思主義底個別一般原理具體化，使其更加確切，更加完善。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就是說在十月革命和成立蘇維埃國家幾個月以前，寫成了自己的名著——國家與革命。列寧認為他這本著作底主要任務就是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以打退機會主義者對這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會立意撰寫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部份，在第二部份裏，他打算給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作出主要的總結。毫無疑義的，列寧是要在他那本書第二部份裏倚據着蘇維埃政權在我國存在的經驗，來繼續向前研究發揮和向前發

展國家理論的。可是，他還未及實現這個任務，就不幸逝世了。可是，列寧所未竟的事業是他的門生所應去完成的。（掌聲如雷）。

國家是因社會分裂為敵對階級而產生的，其所以產生，就是爲着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控制被剝削者多數。國家政權底工具主要都是集中於軍隊、懲罰機關、偵探機關、監獄。國家底活動是表現於兩種基本職能上：內部的（主要的）職能——控制被剝削者多數；外部的（非主要的）職能——靠侵略他國領土來擴大本國統治階級底領土，或是抵抗他國侵犯而保護本國底領土。以前在奴隸佔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如此。現時在資本主義下的情形也是如此。

爲要推翻資本主義，會不僅須要打倒資產階級底政權，不僅須要剝奪資本家，而且須要完全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打破它的舊軍隊，打破它的官僚員吏，打破它的警察，並代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知道，波爾什維克就正是這樣做了的。但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方面，決不能保存舊國家底某些職能，使其適應於無產階級國家底需要而變更。尤其是不可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形式應當始終不變，說我們國家底一切最初原有職能都應當在將來也完全保存着。其實，我們國家底形式是隨我國發展和外部環境變更而變更着，而且將來還會變更着。

列寧說得完全對：

「各資產階級國家底形式是非常繁雜的，但它們的實質却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這樣或那樣，但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其實質將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從十月革命時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其發展中已經過兩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這就是從十月革命時起，至各剝削者階級被消滅時為止的時期。這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階級底反抗，組織國防以打退武裝干涉者底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條件來消滅資本主義份子。與此相適應的，就是我們的國家在這個時期實現了兩個基本職能。第一個職能就是鎮壓國內已被推翻的階級。這樣，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就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底職能是在於鎮壓那些不降服者，可是在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我們的國家是為勞動者多數底利益來鎮壓剝削者少數的，而從前的國家却為着剝削者少數底利益來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第二個職能就是保衛國家而打退外來的侵犯。這樣，我們的國家在外表上也和從前的國家相似，因為從前的國家也曾從事於武裝保護本國的事情，可是在這裏有一個原則上的區別：我們的國家是打退外來侵犯而保護了勞動者多數底勝利品的，而從前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則保護了剝削者少數底財富和特權。這裏還有過第三個職能——這就是我們國家各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其目的就是發展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底萌芽和以社會主義精神重新教育人們。可是，這個新職能在這個時期未曾得到嚴重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這就是從城鄉資本主義份子被消滅時起，至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時為止的時期。這時期底基本任務就是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消滅資本主義份子最後餘孽，組織文化革命，組織完全現代式的軍隊來保衛國家。與此相適應的，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職能也變更了。在國內實行武力鎮壓的職能已經消失——消亡，因為剝削制已被消滅，剝削者已不復存在，已沒有什麼人必須加以鎮壓了。鎮壓的職能就由國家方面用以防範那些偷竊和侵吞人民財富者而保護社會主義公產的職能所代替。武力保護國家而反對外來侵犯的職能依然完全保存着，所以紅軍、紅色海軍以及為捕捉和處罰那些被外國偵探機關派來我國的間諜、兇手、暗害份子所必要的懲罰機關和偵探機關也就仍然保存着。

國家機關底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職能依然保存着，並且得到了完全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在於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於說到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以及偵探機關，那末它們的鋒芒已經不是向着國內，而是向着國外，向着反對外部敵人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所有的是完全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這個國家按其形式和職能是和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大不相同的。

可是，發展過程並不能就此止步。我們是繼續向前行進着，向共產主義前進着。我們的國家不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也會保存着呢？

是的，會保存着，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在那時還未被消滅，如果外來的武裝侵犯危險在那時還未被剷除。同時很明顯的，我們的國家底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變更而變更的。

不是的，不會保存着，而會消亡下去，如果資本主義包圍在那時已被消滅，如果它在那時已由社會主義包圍所替代。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情形就是如此。

第二個問題，這就是關於蘇維埃智識界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也如對於國家問題一樣，在我們黨內存在有一些模糊見解和糊塗觀念。

雖然黨對於蘇維埃智識界問題的立場是完全明顯的，可是在我們黨內終究有一些敵視蘇維埃智識界而與黨底立場勢不兩立的觀點流行着。大家知道，這種不正確觀點底代表者實行以藐視和鄙棄態度來對待蘇維埃智識界，把它看作對於工人階級和農民是異己的，甚至於是敵視的力量。固然，智識界在蘇維埃發展時期內，無論是按其成份說來或按其地位說來，都已經根本變更了，它已經是與人民接近並與人民誠心合作，因此它已經是在原則上異於舊時資產階級智識界了。可是，這些同志却大概不肯顧及這一點。

他們還是不厭舊調重彈，不正確地把這種觀點和態度搬來對待蘇維埃智識界，而這種觀點和態度，在舊時，當智識界還是替地主資本家服務時，是有其根據的。

在舊時，在革命以前的時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智識界首先就是由有產階級——貴族、工業家、商人和富農等等——出身的人們組成的。在智識界隊伍中也曾有從小市民中，從小官吏中，甚至於從農民和工人中出身的人，可是他們會沒有而且會不能在那裏起決定的作用。當時，整個說來，智識界是就食於有產階級並效勞於有產階級的。因此，當時我國革命份子，首先是工人對智識界懷着不信任心理，甚至於往往懷着仇視心理，這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固然，舊時智識界也曾產生個別的和成十數的勇敢而革命的人，這些人接受了工人階級底觀點並畢生以其命運繫於工人階級底命運。但這種人在智識界中會是太少，所以他們曾不能改變整個智識界底面貌。

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在外國武裝干涉被粉碎以後，特別是工業化和集體化事業勝利以後，當剝削制底被消滅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底奠定已造成實在可能來給予國家以新憲法並實施這新憲法的時候，智識界底情形就根本改變了。舊時智識界中最有影響的和最熟練的一部分，還在十月革命最初時日起就已脫離智識界其餘羣衆，而向蘇維埃政權宣佈鬥爭，並去做怠工者了。這一部分會爲此而受到應得的懲罰，曾被蘇維埃政權機關所打破和驅散。其中所保留下來的，後來多數已被我國敵人招募去做暗害份子和間諜，並因此而把自己置身於智識界隊伍以外了。舊智識界中的另一部分，即熟練程度較差但人數却較衆多的一部分，則許久還是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來，可是後來，他們大概已覺得沒有其他出路而拋棄了自己的念頭，就決定來做服務供職者，決定來和蘇維埃政權協和共居。舊智識界這個集團中的大部分入已經是年紀老了，並開始衰亡。舊智識界中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其中的下層部分，他們是比上述那部分底熟練程度更差的，他們已經是和人民聯合在一起並跟着蘇維埃政權走了。他們會須要補習，而

他們就確實開始來在我們的高級學校裏補習了。可是，當時與舊智識界這種分化瓦解的痛苦過程平行的，還有新智識界形成、動員、積聚力量的洶湧過程。數十萬個年輕的人，從工人階級、農民、勞動智識份子隊伍中出身的人，進入了高級學校和實業學校，而他們畢業回去以後就補充了智識界單薄的隊伍。他們把新血液注入智識界裏去，並按新方式，按蘇維埃方式把它復活起來。他們按自己的形像和模樣來根本改變了智識界底整個面貌。舊智識界底殘餘就溶解到新的蘇維埃的人民的智識界中間了。於是就造成了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這個智識界是和人民密切聯繫着，而且其中絕大多數人是決意去竭誠盡忠服務於人民的。

總結起來，我們現在所有的，就是人數衆多的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這個智識界無論按其成份說來或按其社會的面貌說來，都是根本和舊時的資產階級的智識界不同的。

舊的關於智識界的理論，即指明必須對它抱不信任態度並與它作鬥爭的理論，對於舊時的革命以前的服務於地主資本家的智識界是完全適用的。現在，這個理論已經失去時效，它已經不適用於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了。對於新的智識界，須要有新的理論，這個理論指明必須以友愛態度對待這個智識界，必須關懷它，尊重它，必須和它合作，以造福於工人階級和農民底利益。

這顯然是很明白的。

所以，尤其使人覺得奇怪而詭異的，就是雖然在智識界地位中已有這一切根本變更，而在我們黨裏面却竟然還是有人企圖把那種反對資產階級智識界的舊理論應用來對待我們的新的蘇維埃的智識界，而這個智識界在其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智識界。這些人竟然硬說：那些在不久以前還是在工廠和集體農莊裏按斯達漢諾夫方式做工，而後來才被派送到高級學校裏去求學的工人和農民，竟因此而就不成其爲真正的人了，就變成第二等人了。這樣一來，學識原來是一種有害而危險的東西。（笑聲）。我們想把一切

工人和一切農民都變成文化的有學識的人，而且我們再過一些時候就會做到這一步的。可是，據這些奇怪同志看來，我們這種計劃却包含有巨大的危險，因為當工人和農民一旦變成文化的有學識的人以後，他們就會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險。（全場大笑）。很有可能的，這些奇怪同志再過一些時候將會滾落到頌揚落後性，頌揚愚昧無知，頌揚黑暗，頌揚反動觀點的地步。而這是不言而喻的。理論上的失足，是從來沒有使人得到好處的，而且不會使人得到好處的。

關於我們的新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問題，情形就是如此。

\*  
\*  
\*  
\*  
\*

我們在更加鞏固黨方面的任務如下：

（1）有系統地改善黨底成份，提高黨員底覺悟程度，按單個挑選手續而只把那些已被考驗過的並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同志接入黨；

（2）使領導機關更接近於下層工作，以便把它們的領導工作變成更加是行動的和具體的，更要是坐着開會式的和紙上辦公式的；

（3）把挑選幹部的事業集中起來，細心培養幹部，仔細研究工作者底優點和缺點，更大胆提拔年輕工作者，使挑選幹部和佈置幹部的事業適應於黨政治路線底要求；

（4）把黨宣傳鼓動事業集中起來，擴大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底宣傳，提高我們幹部底理論水平和政治鍛鍊。

同志們！我現在就要結束我的總結報告了。

我已把我們黨在報告期內所經歷的道路作了一番大概的敘述。黨及其中央在這個時期內的工作結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我們的工作中是有過缺點和錯誤的。黨及其中央沒有隱瞞這些缺點和錯誤，並努力把它們糾正了。也有嚴重的成功和巨大的成績，但這些成功和成績是不應當衝昏我們的頭腦的。

主要的總結就在於：我國工人階級既已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並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於是就向全世界證明了自己事業底正確性。這就是主要的總結，因為這個總結鞏固着確信工人階級力量，確信工人階級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心。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硬說：人民非有地主和資本家不行，非有商人和富農不行。我國工人階級已在事實上證明了：人民沒有剝削者是能夠順利行進的。我國工人階級已在事

實上證明了：人民沒有剝削者是能夠順利行進的。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硬說：工人階級破壞資產階級舊制度以後，不能建設什麼新東西來代替舊的。我國工人階級已在事實上證明了：它不僅能夠破壞舊制度，而且完全能夠建成新的優美的社會主義的制度，而這個制度是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危機，什麼是失業現象的。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硬說：農民是不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我國集體農民已在事實上證明了：他們是能夠順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走卒們所特別力求達到的主要點，——就是要在工人階級中間剷除工人階級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對於自己有可能而且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心，並因此而使資本主義奴隸制



度永垂不朽。因為資產階級知道：如果資本主義還未被推翻而還繼續存在着，那就不是因為它自己有什么良好品質，而是因為無產階級還沒有對於自己有可能獲得勝利的充分信心。不能說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的努力完全沒有成效。必須承認：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階級裏的走狗，在某種程度內是得以用猶疑心理和缺乏信念的毒藥傳染了工人階級底心靈的。如果我國工人階級底成功，如果我國工人階級底鬥爭和勝利，將提高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底精神並鞏固它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對於自己必獲勝利的信心，那末我們黨就可以說自己工作得不是徒勞無益了。毋庸懷疑吧，情形一定會是這樣的。（掌聲如雷，經久不息）。

我們的勝利的工人階級萬歲！（鼓掌）。

我們的勝利的集體農民萬歲！（鼓掌）。

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智識界萬歲！（鼓掌）。

我國各族人民底偉大友誼萬歲！（鼓掌）。

蘇聯波爾什維克共產黨萬歲！（鼓掌）。

（全體代表起立慶祝斯大林同志，並向他歡呼多時。高呼：「烏拉！斯大林同志萬歲！偉大的斯大林萬歲！我們敬愛的斯大林萬歲！」）。

重要刊誤更正表

六二〇	二九三	二八五	一一五	七八	六八	六五	頁
二	一四	八	一五	一四	六	七	行
抽象的	作爲指出	被剝奪	宣佈	正確鬥爭	寧列	八月	誤
抽象的	作爲提出	被剝奪	宣佈	順利鬥爭	列寧	九月	正



